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魯國堯

語言學論文集





坚实
会通
创新

鲁国尧
江苏省泰州市人
1937年生 南京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教
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
音韵学研究会会长

借03-51-016



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

吕叔湘题 乙亥正月时年九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 / 鲁国尧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10
ISBN 7-5343-5499-4

Ⅰ. 鲁… Ⅱ. 鲁… Ⅲ. 语言学-文集 Ⅳ.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2500 号

书　　名	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
作　　者	鲁国尧
责任编辑	吴葆勤 (wbaoqin @ yahoo.com.cn)
封面设计	张兆临
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扬州市运河西路 215 号　电话 0514-7231836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23.5
插　　页	4
字　　数	730 000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680 册
书　　号	ISBN　7-5343-5499-4/G·5194
定　　价	48.00 元
邮购电话	025-5400774,8008289797
批发电话	025-3249327,3249091
盗版举报	025-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邮购免收邮费，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与周祖谟先生（左二）、王力先生（左三）、沙加尔博士（左四）合影　　陕西省乾县师范学校唐柏下
1982年8月3日　薛凤生教授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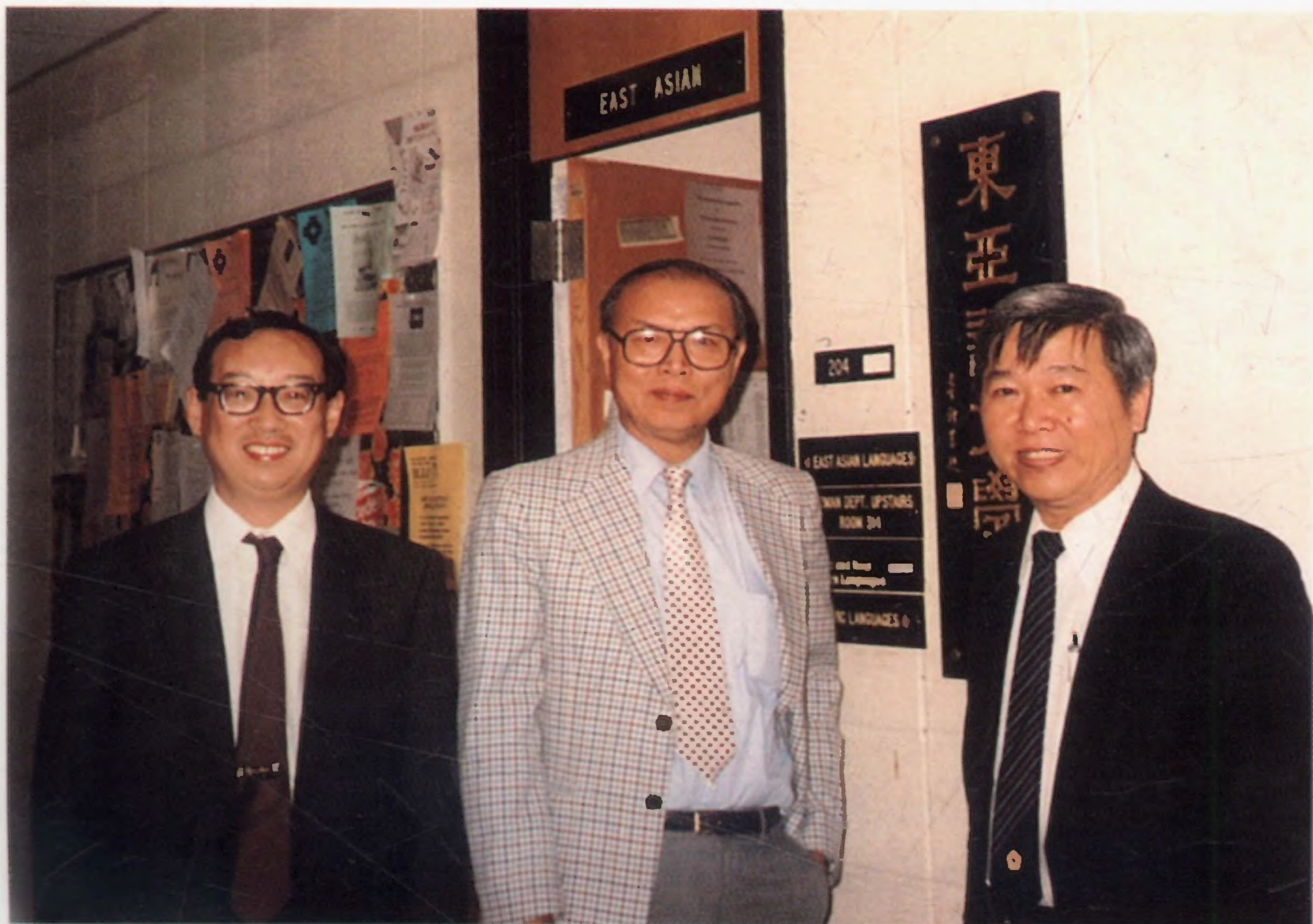
与吕叔湘先生（左二）、吕师母程玉振女士（左三）、练棣华（左四）合影　　南京鼓楼渊声巷45号405室
1988年5月29日　鲁明泓摄



与朱德熙先生（左一）合影
南京清凉山扫叶楼
1983年5月13日



与平山久雄教授（左二）合影
日本东京大学中国语中国文学研究室
1998年11月11日



与薛凤生教授（左二）
松本丁俊教授（左三）合影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东亚语文学系
1992年6月8日



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
级学生时　张毓茂画
1957年2月15日



“山登绝顶我为峰”(林则徐语)　于华东最高峰

1981 年 4 月 23 日　平田昌司摄



于南京鼓楼渊声巷寓所　1985 年



于公元前三世纪楚汉相争古战场遗址

1998 年 6 月 25 日



于金陵德风园

1999 年 5 月



黄山天下无（刘海粟语）

2003 年 4 月 14 日 王兆鹏摄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
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衆裏
尋他千百度驀然迴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
闓堯吾弟屬書
王力 一九七九年七月時年八十

王力先生墨宝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休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沐庄当止

闿尧如我嗜于书法，而远道寄纸来索书，意甚不计工拙，留以为念也，因录东坡志林二则以应。 一九八八年立冬后十日 吕叔湘 时年八十又四。

吕叔湘先生墨宝

目　录

楷体标题表示兼入此类

◇序

第一序(1996)/1

第二序(2003)/7

壹 方言

"方言"和《方言》/1

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12

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123

"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136

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议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181

通泰方言研究史脞述/193

《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217

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508

平田昌司《徽州方言研究》序/253

词典史上的一座丰碑——祝贺41卷本《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出版/263

贰 音韵

"多元""争鸣""创新"的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11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6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267

谈"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序刘晓南《宋代闽音考》/271

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181
评《上古音手册》／277
读《论章系归端》谐声表书后／282
“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136
初读《敦煌音义汇考》／295
关于《广韵》和《韵镜》——《宋本广韵·永禄本韵镜》合刊影印本弁语／301
从宋代学术史考察《广韵》《集韵》时距之近问题／623
《集韵》——收字最多规模宏大的韵书／310
沈括《梦溪笔谈》所载切韵法绎析／317
《卢宗迈切韵法》述论／326
学术是链——序《宋辽金用韵研究》／380
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385
元遗山诗词曲韵考／426
白朴的词韵、曲韵及其同异／445
白朴曲韵与《中原音韵》／458
致宁继福论《中原音韵》书／476
《中原音韵音位系统》译者弁言／479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著作与元代语言／481
《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217
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508
《诗·豳风·东山》“蜎”、“蠋”二字音议兼辨《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之误／522
富有时代气息与创新精神的《古音系研究》——为纪念魏天行师诞辰一百周年而作／535

《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217
《诗·豳风·东山》“蜎”、“蠋”二字音议兼辨《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之误／522
“布文”辨识本末及其他／540
“退了”和“离了”／546
《同义成语词典》序／548
《反义成语词典》序／550
关于《应用汉语词典》的一段对话／553
说“读字典”／564

肆 语 法
《孟子》“以羊易之”、“易之以羊”两种结构类型的对比研究／571

伍 文 字
“隶书”辨／586
重论“隶书”的名称——答谢阿辻先生／616

陆 文史语言学
“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136
通泰方言研究史脞述／193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著作与元代语言／481
《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217
从宋代学术史考察《广韵》《集韵》时距之近问题／623
话说江苏语言学家／629
《汉语与汉文化》序／641

柒 古籍整理
校辑本《山中白云词》之讹误／644
从曲律、曲韵查核诸家对白朴曲点校的失误／651

捌 文
“布文”辨识本末及其他／540
平田昌司《徽州方言研究》序／253

话说江苏语言学家／629
关于《应用汉语词典》的一段对话／553
说“读字典”／564
“退了”和“离了”／546

玖议
“多元”“争鸣”“创新”的音韵学／267
谈“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271
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181
欣喜·忧虑——序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666

拾源
读《魏建功先生纪念专辑》稿书后／678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683
“啊，门——”／686
“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695
重温朱德熙先生的教导／702
这三声“老师好”／708

◇索　引
一　本论集所涉及的部分学术观点、现象、问题 ／710
二　本论集所探究或涉及之字音 ／718
三　本论集或引用之文献所涉及之语言文字学专门词语 ／719
四　本论集所涉及、讨论的一般词语 ／721

◇跋
跋语：读书恨少／725

第一序

岁云暮矣。年年岁岁，辞旧迎新。而今年，于我更添一层意义，因为我如今正处在按农历算六十岁和按公历算六十岁的中间。花甲之年，人生的一个重要时点，中国传统对它极为重视，自不待言。近年联合国把四十五岁至六十岁界定为中年，此后则谓之老年。但是又细加划分，六十岁至七十五岁的人则名为年轻的老年人，定语加得太妙了，连我也为之感奋。蒙江苏教育出版社厚爱，令我编这本集子，辛苦多日，值此交稿之时，也就带着些许轻快的心情回顾过去并展望未来。

在壬午年元旦不久，那时我六岁（虚岁），父亲送我上私塾（家乡方言叫“书房”），对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磕了头，这是我开始求学的正式标志。此后除了在“文革”前、“文革”中奉命常到农村，也有时到工厂去接受“再教育”外，就一直在学校里求学，于今五十有四年矣。

此时心潮激荡，就直抒胸臆了。

求学，我以为，首先应该求精，没有严谨就不能有精。先贤的光辉榜样，师长的言传身教，使我一开始就走上了坚实的求学大道。记得1962年某日我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当时在北京城内祖家街）孟琮同学的工作室里见到了吕叔湘先生，他亲切地问起我的学习情况后说：“我和王先生那时都写了一本语法学的书，时间花得都不算太多。现在你们写一篇论文，应该用一年两年的功夫，要精雕细刻。”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我的少作《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自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每半年一稿，计写了六稿。八十年代初当我研究《南村辍耕录》时，把陶宗仪的这本书逐字逐句读了几遍，穷尽式地辑录了其中有关语言文字的片言只语。该书卷十九“射字法”条，以四句七言诗代表元代松江方言的声母，既有“澄”字，何以又有“橙”字？苦苦思索了一年，终于在某个夜半彻悟个中原

因。1990年秋我应国际著名汉语学家平山久雄教授之邀去东京大学做宋元语音史的研究工作,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发现了中国失传的宋代韵学要籍《卢宗迈切韵法》,欣喜之后首先面临的便是辨伪证真的问题,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是"涿郡卢宗迈"有无其人。众所周知,日本学者的索引工作做得很出色,那里的工具书很多很多,但是遍求"卢宗迈"三字而不得,忧思焦虑百端煎熬。离开东京的前一天(1991年2月22日)我下决心再作一次最后的搜寻,步行近两小时到了日本国会图书馆,连续抢读了六个半小时的书。离闭馆时间只剩最后一小时了,几乎是绝望了。忽然灵机一动,向管理员试调了几部卢姓家谱,最后一部是民国十年石印的《江西卢氏宗谱》,赶紧翻阅,猛然跳出了三个字——"卢宗迈"。要不是阅览规章的约束,真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在馆员的最后的很礼貌的催促声中,我累得几乎站不起来。好不容易走出馆外,路灯下发现,鼻血溅了手帕一片。古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算是亲身经历了一次。人生能得几回搏?归国以后我全力以赴,翻阅了396种宋人文集计8 442卷,看了宋元明类书几十部,自宋以来的书目百种,宋元笔记百余种,史书十余部,方始下笔,反反覆覆地修改,仅得三万余字。

我回母校,都要去看望林焘先生,有两次(时距约在一两年以上)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都是:"你的下死功夫的文章我都看了。"这是老师给学生的最高分数吧。我为获得这样的评语而骄傲,我所以能得到这样的评语是穷尽法的赐予。在急功近利者看来,穷尽法是十分吃力不讨好的,但在对语言史料的搜集和分析的诸方法中,穷尽法是最保险的,其成果可以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因此是值得大加提倡的。穷尽法的成果应该是精品,是干货。记得《利玛窦中国札记》的何高济等的中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后,我在南京杨公井的古籍书店见到了它,站着看了约一个小时,发现这书记述明代汉语的地方不少,似乎中国人的文献反而不及它详细。但是这上下两册价格贵了点,还是把它放回了书架。回家来思想斗争了一晚,第二天还是骑车赶去买下,2.30元。于是逐字逐句地细读,凡是书中有关语言文字的片言只语都无遗漏地摘下来,特别是第30页关于"官话(Quonhoa)"的记载,而第391页太监"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子

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这一段更令我惊心动魄,迫使我不能不提出明代官话或许以南京方言为基础方言的假说,文章终于在翌年正式发表。近年常见学人提倡"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这两句话也是我十分向慕的,愿上苍保佑,我能再坐二十年冷板凳。

我在跟友人论学时常常由衷地推崇前辈学者,他们的过人之处很多,其一是多方面都有成就。受前辈们的影响,"少年心事当拿云",除了音韵学外,我年轻时先是对方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着做过《孟子》句法的研究,考释过若干词语的来龙去脉,也曾旁涉历史、目录等学。我以为一个学人治学不能太窄,窄则陋。治语言史的人不能仅在纯语言学的资料中讨生活,应该尽可能地多览群书,扩大视野,寻觅更多的史料,开拓更多的领域。如不研究古史就不能推论古吴语本北抵淮河;不看目录书就不会知道南宋前有王浩《方言》十四卷;不细读陶宗仪笔记,就不知元代中州之音入似二声、"方言"一词可指外族语言,等等。广和精,宏观和微观是相辅相成的,我也曾尝试把二者结合起来,例如我把新发现的《卢宗迈切韵法》置于宋代音韵学史的广阔背景下进行研究,从汉代文化史研究"隶书"得名的时间与缘由,从宋代学术史考察《广韵》《集韵》两大韵书时距之近的问题。前辈有言:"例不十,法不立。"为研究一专题,博览杂书;为立一说,旁征博引,是苦事,然而也是乐事。

研究是创造性的劳动,研究的成果应该有新意,如果总是拾人牙慧,自己也觉乏味。杜甫名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其精义即在求新。艰苦耗时的研究应该导出带有理性的推断,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作严密的考证,若有可能不妨提出假说,我虽不才,也曾黾勉求之,因此我在文章中提出了若干看法。例如,南北朝后期存在南朝通语和北朝通语,现代通泰、客、赣方言源于南朝通语。以五十余证论断唐宋夏金元只有"切韵学"、"切韵图"而无"等韵学"、"等韵图"的名称。论证宋代存在《广韵》系韵图和《集韵》系韵图,后者还不止一种。韵图是层累地造出来的,韵图音系说尚待商榷。从宋词韵的研究推论宋代通语十八韵部,提出词韵随语音之变而变的

规律。打破近体诗韵牢守官韵的成说，证明其用韵多植根于口语。指出元好问、白朴师弟的用韵反映了金元时代北方汉语的韵部系统，而这早于《中原音韵》约百年之久，是北音史上的宝贵资料，可谓之“前中原音韵韵系”。发掘出陶宗仪的“中州之韵”入似二声说，使周德清的入派三声说的惟一性受到挑战。提出明代方始出现“官话”一词，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方言。从泰州方言史的研究中总结出音变的四种模式，考求近现代方言史的四条途径。从先秦至汉魏的“吏”、“隶”的考辨指出段玉裁擅改许慎《说文解字叙》之谬。通过宋金元近体诗韵的研究否定了钱大昕的“借韵”说。拙文中的这些发现、这些见解，都是我经过苦心研究而提出的新说。这些新说，有些也许能成立，有些则可能被推倒，但在学术上提出的新说，即使被推倒也是令人愉快的，因为这体现了学术的进步及学友们的关心与爱护。

我跟我指导的研究生讲过不止一次：语言学理论的文章犹如写意画，神传气足，高才之士，动辄万言，洋洋洒洒，但其末流则不免流于夸诞枝蔓，多篇文章的多次重复，令人生厌。而从事具体语言的研究，犹如工笔画，纤毫毕现，非一年两载不能成一文，但有时流于支离琐碎，若读者非专门研究此课题的学人，读来难以终卷。我的若干长文当属于后者，我曾想有所改进，如给《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一文安了“凤头”、“豹尾”，《隶书辨》好几处引了王充的带哲理性的名句，其结果呢？大概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我想，应该求文，提倡写一种比较活泼的论文。它应该不同于道貌岸然、规行矩步的正式论文，要求谨严其里而文采其表，合于法度而挥洒自如；它又不同于篇幅短小、内容浅显、以“可读性”为特点的科普文章，必须言人之所未闻、所未见，有创新、有深度。我写了《“布文”辨识本末及其他》、《话说江苏语言学家》，这就是我的所谓“实践”。但我缺乏才气，两文三年得，便是证明，我靠的是长期酝酿，惨淡经营和畏友的反复斧正。

花甲回眸，在几十年的求学生涯中，我是有追求的，总想有点自己的特色：求精，求广，求新，求文，然而资质鲁钝，条件限制，并不能如所愿，成果若此，能不感愧？

但是我自信是努力的,1991 年春我在日本京都的时候,朱德熙先生于 3 月 16 日自美国加州 Palo Alto 赐我一信,谆谆诲我:"我看主要精力和时间仍应放在语言事实的搜集和分析上。近年来美国语言学有重理论轻事实的弊病,而且不独语言学,经济学甚至物理学亦有类似的情形。(附上李昂迪夫谈经济学的一则剪报,供参考。)"谨遵师教,多年来我做了若干汉语史的专题研究,自信不游谈无根,不急功计利,不随波逐流,只是埋头去作文,去修改,去增补,以求一事之是,一字之实,一心之安。我乐于采用的是竭泽而渔式的穷尽法和旁征博引式的会通法的结合,有新发现是令人愉快的,又读了许多许多书也许是更令人愉快的。

记得是 1989 年,为了写《长安论韵考》,撰《新切韵年表》,我阅读了许多南北朝史籍,当看到隋代文士李孝贞的一段话,忽地一惊:"五十之年,倏忽已过,鬓垂素发,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时尽矣,悲夫!"(《隋书·李孝贞传》)此后每查阅《隋书》,总要去翻看这一段,因为我周围的同事、友人常发这类感慨,而我自己也到了这年龄。1991 年秋,我在读宋人文集时,苏辙的《颍滨遗老传》很引起我的注意。苏辙从五十六岁被贬至南方时起,"杜门复理旧学",至六十八岁时写成学术著作四部,"抚卷而叹,自谓得圣贤之遗意",得意之态,跃然纸上,他由诗人、散文家,因此而兼了学者,这是步入老境时的又一种人生取向。人到了六十岁这人生的转折点时,难免不惶惑、彷徨,我非圣贤,亦何能免?一日为学易,终身为学难,我这一介书生,既然大半生求学,那就应在老之已至时益自勖勉,再做若干年书蠹鱼吧。

最后谈谈这本集子的选编情况。从我做研究生起至今年写的文章,多数选入了本集,但也有些没有选进,特别是我的关于宋词韵的好几篇论文,那是在诸位师友的指导、关怀下研究了三十余年的成果。好几位师长一直在督促我:"你年龄也不小了,应该抓紧,早点写成一部系统的专著吧。"小子不敏,敢不遵命?因此这本集子只收了两篇关于宋词韵的文章,一是带初步总结性的,一是论江西词人用韵的,因为都涉及金元,所以选入。纯讲宋代的,概不收进。

集中文章以类相从,分若干类,音韵及方言史类收文最多,以所研究对象的时代为序。

我看到不少作者自编的论文集，只是将旧文汇集重印，个别连原有的排印错误依旧存在。我编这本集子，除了改正错误外，论文都必须有提要，原来发表时没有的现在补写，多数文章都有或多或少的增补，有的插进正文中，有的放在文末，这些或者是我的新看法，或者是学界关于这一课题的新信息。我将现时能找到的俞敏、周法高、蒋希文、杨福绵、平山久雄、李思敬、何九盈、俞扬、阿辻哲次、黄笑山诸先生（大致以年龄为序）对拙文的批评、异议、质询、评论收入本集内，我衷心地感谢他们的教导和帮助。在诸文之末，曾对几十位师友表示谢意，今在此再次鸣谢。畏友蒋荫楠学长多次俯允改我的作文，无不中肯，令我由衷叹服。

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为拙集题签，使我感到十分荣幸。

本书彩插内有几帧珍贵的相片和老师赐我的条幅。

我衷心感谢江苏教育出版社赵所生、薛正兴、徐宗文、周方、胡慧斌诸位先生，让我大半生写成的论文能够结集出版，感谢责编叶笑春同志给予我的帮助。我的论文集能在这样一家蜚声国内外的著名出版社出版，那是很为荣幸的事。我为了修改、增补，一再延期交稿，谨致歉意。

鲁国尧于颜之推、萧该故里

1996 年 12 月 25 日

第 二 序

这不是第二版的序，当然也不是“第二次印刷”的序，是真正的第二序。是同一版，却有第一序、第二序，能这样吗？我这个研究传统的人总喜欢到传统中找根据，能，前贤已开先例，这位前贤就是梁启超，他的《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于民国九年十月十四日，第二自序于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这是我知道的一例。可是我这两序却相隔七年之久。我得说，这本论文集之所以跨世纪，之所以相隔如此之长，其咎全在于我。1996年底，自序写好了，万事俱备了，就等印刷了，我却向出版社提出，等一等印吧，我想将我孕育于胸的几篇文章写出来，再一块儿印吧。而我禀性愚鲁，研究、写作都非常缓慢，直到最近才将《“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一文完工，就这样，这本论集竟拖了这么久，我打心眼里感谢社长张胜勇同志、总编徐宗文同志、编辑室主任周方、戎文敏、叶笑春同志、责编吴葆勤同志，他们的超常的宽容和关心使我十分感动。我还要感谢为我校对的许多同学、朋友。

这次真的要付印了，我就想写个新序，不过，还是把七年前的序设法找来看了，看了以后，我舍不得把它扔掉。因为那个序，是我那时的心声，还是保留下来好，就略加增删。

人，总是有追求的，我在那篇序中表达了求精、求广、求新、求文的愿望。如今我向自己提出治学三原则：坚实、会通、创新。坚实是第一义，否则“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而偏执一端，必隳大道；在坚实、会通的基础上必能创新，唯此创新方为创新。

因为“颜之推谜题”一文刚刚发表，脑子里的兴奋灶还在这儿，就谈一些想法吧。拙文《“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在《中国语文》发表后，有些同志来信或打电话表扬，也有就某些问题商榷的。有位同道说：“张琨先生在《汉语音韵史论文集》中认为，关于《切韵》音系性质最重要的两篇论文是陈寅恪先生的《从史实论切韵》和周祖谟先生的

《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如今大文《"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可以追随陈、周二位先生之后了。"听了这话,愧不敢当。老同学王恩保同志(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告诉过我,他曾经亲闻周祖谟先生说过:"我写《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目的就是追踪陈先生,也纠正了陈先生的一些错误。"我在中学、大学时代就偏好历史,在当研究生的时代读了陈寅恪先生和周祖谟先生的两文后,就"窃慕焉而欲效之"。在"文革"后期,书禁稍弛,我从历史系一位先生处借了《北齐书》、《北周书》、《梁书》、《陈书》等等来读。从1989年起,为写《长安论韵考》、编《新切韵年表》,我读了更多的魏晋南北朝的典籍,《颜氏家训》的王利器先生的集解本、周法高先生的汇注本(周先生赠我的)是我经常阅读的两本书,我发现很多学人对《音辞篇》的"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特感兴趣,论述多集中于此,而颜之推明明白白地说,这是"谬失轻微者","如此之例,两失甚多"。《音辞篇》关于当时语言状况的论述,其精髓实在于"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可见中国六世纪时就有学者提出了语言(方言)接触、影响的问题,这是关乎中国语言(方言)史、中国民族史、中国人口史的重大问题! 这就是"颜之推谜题"。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值得深究的大问题前人却都没有深究。我们中国的学术有深且厚的传统,而传统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冥冥之中启迪后来者。我确是企图步武陈、周二位前修,走近这个谜题,企图破解这个谜题,于是这谜题一直萦回于脑际,为此读书、思考多年,终于在2001年下笔,然而写来却是十分艰难,历时17个月方始成篇,这由于我的学力跟陈、周二先生相差甚远,能不愧怍? 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的"前言"中说:"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引用一位物理学家的话,说是在科学上提出正确的问题比寻求正确的答案还要难。这句话是不是有点说过了头,也许还可以研究,可是问题提得对路,解决起来就比较容易,这个经验是人人都有的。"我提出了"颜之推谜题",在论文中,以五节的篇幅加以确认、论证。我自信是在科学上提出问题,而且是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问题。我还想进一步运用新的"二重证据法"试解"南染吴越"的谜题,我自信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拙文《长安论韵考》,1990 年 6 月在香港浸会学院举办的国际声韵学研讨会上宣读过,但我一直没有正式发表,因为想和《新切韵年表》一道儿作认真的修改后再向杂志投稿。我还想再继续做几个专题研究,最后汇总为《〈切韵序〉相关史实之研讨》。

这本论文集的文章分成十类,得做些具体说明。

把方言类的文章放在第一,是因为我的第一篇论文是方言史,最近的一篇论文也是方言史。经历的艰辛也多,这第一篇文章是二十三岁着笔,二十六岁六稿,字逾十万,又隔了二十四年才能发表,所以爱惜的心情尤甚。而且在四十多年的研究方言史的过程中,我逐渐接触到若干重大问题,如南北朝通语问题,南朝通语与吴方言的接触、斗争问题,古吴语何时转变为汉语的古吴方言问题,通泰、客、赣方言的同源问题,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等等,我对这些疑难问题有兴趣,我还要研究下去,所以把"方言"列为第一类。

第二类是音韵,收的文章较多,但是关于宋元词韵的若干论文,除了《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外,都没有收进。因为我想完成一部宋词韵与宋代通语问题的专著,周祖谟先生、吕叔湘先生、李荣先生、唐作藩先生等都曾一再督促我早日完成,愧对诸师。

第三类是"词语和词典"。我对词语的考释、疏证也饶有兴趣,可以说是有一丁点儿考据癖。我的专业是汉语史,职业的习惯使我总是要从历时的角度省察问题,因此在研究《南村辍耕录》里的吴方言词语时,在研究先秦和两汉的"徒"、"隶"、"徒隶"时,我总是想尽可能地探源竟委,这也可以说,有一丁点儿历史癖。要说明的是,只有最近的这篇文章,为了研究其中的一些词语,我使用了电脑检索,其他都是我自己看的书搜集的材料,的确是耗费了大量时间,经年累月。但是世间事,有利必有弊,有弊必有利,我为了搜集词语的书证,却读了大量的书,提高了自己的文史水平,这是很令我感到快慰的。

年轻时当研究生,1963 到 1964 年做的毕业论文是《〈孟子〉句法结构初探》,写了十万字。毕业后只节取了其中一个小题目即"以"字结构,拿出来发表了。这篇文章算是"少作",但是我却不悔。这是第四类。

第五类是"文字"。在"文革"后期和"文革"后我写过关于"隶书"的考证文章,不意傅杰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云

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却收了拙文。

好几年前,我在北师大讲了从学术史考察《广韵》和《集韵》的时距之近问题,伍铁平先生说,这就是文化语言学,这才是文化语言学。我本想把第六组文章命名为"文化语言学",思之再三,还是改为"文史语言学"。这是第六类。

研究古代语言史和古代语言学史,必然与古籍结下不解之缘,这第七类"古籍整理"是副产品。

第八类是"文",何以言"文"? 语言学,跟文学不同,是科学,因此语言学文章严谨有余而文采不足。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以我想写些带有文采的语言学文章。不过,我试验的结果,觉得"文"最终还是被"质"所拘限。大概跟原本喜爱文学有关,我有时不觉技痒,也写写散文,发表过《落英》、《雪泥鸿爪集内外篇》,有好几万字了,还有些放在抽屉里,或夹在杂纸堆里,那些随笔或随兴致而信笔,或因感愤而直书。看过我的文章的朋友说:"是抒发的真性情。"我因此获得"还是个写散文的料子"的评价。这样的评语必然有鼓励作用,所以等退休以后,我想回归文学,也写写散文,包括学术散文,待我八十岁时出个集子。可是现在还得皱着眉头去写专业论文,否则年关难过呀,对付不了那么多的考核和检查。此为稻粱谋,非为性灵也。每念及此,唯有嗟叹而已。

第九是"议"。我在好多文章中,不禁就学术、学风,甚至世风发些议论,尤以《欣喜·忧虑》中的后半部分和《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为多。有所见,有所闻,不能无感,不能无思,骨鲠在喉,一吐为快。

有新的博士生入学,我总是只赠送他们一个字,就是"正"字:人要正,学要正。人不正,学焉能正? 人正学正必有其源,所以本集最后以"源"压轴。这些是对老师的怀念文章。对有些老师,我还没来得及写,以后要写的,一定要写的。这第十组里的文章以发表的先后为序。①

① 第十类"源"的最后一篇《这三声"老师好"》在脑中酝酿了十几年,最近在张荣、徐川山两位先生的激发、鼓励之下终于写成。2003年6月记。

不能使书太厚，书厚了，价格就高，吴葆勤同志的这条建议很正确。所以有些文章，如《宋元江西词人用韵研究》及为朋友写的一些序，决定删去。但是我要说明，写序，我都是绞了脑汁写就的，举个例子：为了写序，我常要先复习《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中那些古文。

我的一位老同学批评我的文章太长，有些学术观点被淹没了，例如在 1978 年定稿、1981 年发表的《“隶书”辨》长文中，我提出了：《史记》、《汉书》、《后汉书》所载的诏疏文赋应该视为撰作时代的语言资料，而非司马迁、班固、范晔的语言，这一观点我放在一个脚注里头（按，在此论集中为页 600 注③），又例如我考证出段玉裁擅改《说文解字叙》之“隶卒”为“吏卒”、“兴役戍”为“兴戍役”之谬，我也只放在一个脚注里头（此论集为页 605 注③）。看来有必要将这些学术观点做个索引。我也考证过百条左右词语、字音，我自己去查，都很费劲，制个索引，利己利人。本集共有四个索引，本集最不成功的地方在“索引一：本论集所涉及的部分学术观点、现象、问题”，事非经过不知难，我才知道，从意义上分类、命名，太困难了，这索引一中，在我勉强以为的“类”和“类”之间以空一行隔开，我不敢给我心目中的“类”命名。索引二、三、四，太容易了，因为是按音序排列的。

这一序写到这儿，本该收场了。但是在回顾自己的这些文章的时候，不禁感慨系之。年轻人“述志”，我却只能“述怀”了。

最近读到一首诗，清初的一位诗人，叙述他的老师黄宗羲的话：

南雷未殁尝语我，
人生须得三百年。
百年读毕今昔书，
百年看毕名山川，
百年手提尺寸柄，
经纶揭地还掀天。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我绝无黄宗羲的“揭地掀天”的壮志，但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学术，悃诚之心不少减，所以有时竟忍不住发议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比起黄宗羲来，我的要求减半，我

只想：

百年读毕今昔书，
五十著述成一家。

能么？能么？

2002年12月22日星期日

“方言”和《方言》

提要 一提及“方言”这个词儿，学人们会自然地想起扬雄的《方言》一书，也就认为扬雄首先使用此词。其实不然，就文献记载而言，“方言”一词及《方言》书名都是首先见于东汉末年应劭的著作。就我浅见，直至 19 世纪末，汉语里的“方言”意指各地的语言，它既包括现在意义的汉语各方言，也包括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甚至被用来指称国外的语言。后来词义缩小了，仅指各地的汉语土话；在本世纪，随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兴起，专家们袭用传统词，赋予“方言”以科学的定义，例如“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如汉语的粤方言、吴方言等”。近年又出现“地域方言”、“社会方言”两个术语。

笔者还从古代史籍和目录中发现，汉《方言》后，十六国时期人刘昞、南宋前人王浩都著有《方言》多卷，可见传统未断，此似为本世纪学人所未曾道及者。

一

北京语言学院张清常教授的新著《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年 8 月）出版后，时贤已有专评，我谨做一点补充。

张著第 39 页云：“元朝的街巷名称，虽然文献材料极少，尚略有可考，但是胡同名称，实在少见。例如元末熊梦祥《析津志》已亡佚，据清乾隆年间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三八引云：‘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方言二字熊梦祥本人如何解释不得而知。我们认为，按照中国古代的概念，方言包括氏外族语言。扬雄《方言》里面，东齐青徐方言包括夷语，南楚方言包

括蛮语，西秦方言包括氐羌语，秦晋北方言包括狄语，燕代朝鲜归为一起更不必说。这种看法是跟后代和现在大不相同的。”

上引“氏外族语言”的“氏”可能是排印错误。张先生的这一见解很有价值，台湾的《中文大辞典》、上海的《汉语大词典》“方言”条都未能如此解释。笔者1986年著有《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著作与元代语言》(待刊)也曾注意到这一问题，指出陶氏《辍耕录》使用“方言”四次，其中有三例肯定指非汉语，现将我所搜集到的若干则“方言”用例抄录于下，也许能起到与张先生桴鼓相应的作用。元人熊梦祥《析津志》中的“方言”一词显然指蒙古语，古代著作不乏类似用例。

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五载道安《注经及杂经志录》序：“佛之著教，真人发起，大行于外国，有自来矣。延及此土，当汉之末世，晋之盛德也。然方言殊音，文质从异，译胡为晋，出非一人。或善胡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胡。众经皓然，难以折中。”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自法师至印度，印度始通中国，至是及西使再返，又敕二十余人随往印度，前来国命，通议中书。敕以异域方言，务取符会，若非伊人，将论声教。故诸信命，并资于奘，乃为转唐言。”此中“异域方言”与“唐言”相对，当指印度语言。

唐终南太一山释氏《大唐众经音义序》：“实相窅冥，开宗于文字；权道综御，崇尚于方言。”“今所作者，全异恒伦，随字删定，随音徵引，并显唐梵方言，翻度雅郑，推十代之纰紊，定一朝之风法。”

宋人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阇婆国方言谓真珠为没爹虾啰，谓牙为家凌，谓玳瑁为家啰，谓香为昆燉卢麻，谓犀为低密云。”同卷：“阇婆，在大食之北。”庞元英是宋神宗时的官员。

宋代出使高丽的使臣孙穆著《鸡林类事》，记载了当时的高丽语语词数百条，首三条为“方言天曰汉㮈，日曰姮，月曰契(自注：黑隘切)”，此中的“方言”显然是指当时的高丽语。

南宋淳熙年间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卷四专立“方言”条，云：“方言者，古人有之，乃若广西之娄语，如称官为沟主，母为米囊，外祖母为低，仆使曰斋捽，吃饭为报崖，若此之类，当待译而后通。至城郭居民，语乃平易，自福建湖湘皆不及也。其间所言，意义颇善，有非中州

所可及也。早曰朝时，晚曰晡时，……若此之类，亦云雅矣。”周去非的“方言”既指当时的少数民族的娄语，也指广西的汉语。

笔者曾对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的关于语言文字的条目作过穷尽式的研究，“方言”一词计出现四次，陶氏系元末明初人，但《南村辍耕录》结集成书不晚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冬，说详拙文《〈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载《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陶宗仪和熊梦祥都生活在元末，陶氏本黄岩人，但中年以后隐于松江；而熊氏，据元人顾瑛的《草堂雅集》，本江西人，晚年“以诗酒放浪淮浙间，卜居娄江上扁得月楼，……旷达之士，号松云道人。”娄江指今江苏太仓一带，与松江相距甚近。

《辍耕录》卷八“温暾”条：“南人方言曰温暾者，乃微暖也。”

同书卷二一“喝盏”条：“天子凡宴飨，一人执酒觞，立于右阶，一人执柏板，立于左阶，执板者抑扬其声，赞曰‘斡脱’，执觞者如其声和之，曰‘打弼’。……盖沿袭亡金旧礼，至今不废……‘斡脱’、‘打弼’，彼中方言，未暇考求其义。”笔者按，此条述元帝宴飨之礼，明言沿袭亡金旧礼，则“彼中方言”当指金代的女真语。

同书卷七“回回石头”条：“回回石头，种类不一，其价亦不一。大德间，本土巨商中卖红刺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估直中统钞一十四万锭，用嵌帽顶上。……呼曰刺，亦方言也。”按，元代的回回，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分布于我国西部及其以西地区。

同书卷十“马判”条：“冯公士启梦弼尝言，为八番云南宣慰司令史日，尝因公差抵一站，日已暮矣。站吏告曰：‘今夜马判上岸，麻线须暂停驿程以避之。’……比曙，抵前站，站吏惊曰：‘是何麻线，大胆若是耶！’……麻线，方言曰官人，”笔者按，陶宗仪此条系据其先辈郑元祐《遂昌杂录》改写，查郑著无“麻线”、“方言”二词。

清代田雯《黔书》卷下“蚂蟥”条，多同于陶氏《辍耕录》，作“驿吏告曰：‘今夕马蚌上岸，麻色须暂停以避之。’……比曙，抵前驿，吏惊曰：‘是何麻色，乃若是！’……麻色，方言官人也”。

田雯《黔书》卷上特立“方言”条，文凡四段，前三段皆以“父母”起首。第一段为“拔，父也，一曰罢。蒙，母也，一曰明……”，第二段为“父为包，母为蔑……”，第三段为“父谓之索，母谓之咪……”。

田雯,清康熙时人,《黔书》是其任贵州巡抚时所著,叙贵州少数民族事甚详。《黔书》"方言"条所述必系当时贵州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常用词。

上举诸例,加上张书所举元人熊梦祥一例,超过十例。如果我们有时间多查阅古代记载国内少数民族的典籍和中外交通史的著作,想必能找到更多的用例。黎锦熙先生曾云:"例不十,法不立。"此说之立当无可疑了。

二

那么,在中国古代,"方言"一词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呢?张清常先生认为"方言"包括外族语言,他重申林语堂说。林氏《前汉方音区域考》根据扬雄《方言》一书将前汉方言区分为十四系,兹将张先生所引的五系录如下:

(8) 燕代北鄙朝鲜冽水为一系;

(9) 东齐海岱之间淮泗(亦名青徐)为一系(杂入夷语);

(11) 南楚自为一系(杂入蛮语);

(13) 西秦为一系(杂入羌语);

(14) 秦晋北鄙为一系(杂入狄语)。

现在我再作申说:扬雄《答刘歆书》中自称其著作曰《殊言》,自述搜集方言词的方法:"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刘歆《遗扬雄书》也说到"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郭璞《方言注序》说:"盖闻《方言》之作,出乎𬨎轩之使,所以巡游万国,采览异言。"葛洪《西京杂记》卷三亦云:"扬子云好事,……从诸计吏,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上述的"殊言"、"异语"、"异国殊语"、"异言"、"殊方绝域四方之语"指的什么呢?那我们还是看看应劭的《风俗通义序》:"周秦常以岁八月遣𬨎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这是"方言"一词首见于典籍。颜师古《汉书注》于"司马迁传"引应劭曰:"扬雄《方言》云:'海岱之间,骂奴曰臧,骂婢曰获。燕之北郊,民而聓婢谓之臧,女而妇奴谓之获。"这是《方言》书名始见于文献。扬雄的这本著作中搜罗的词语主要是各地的汉语词,也有不少非汉语词,例如卷八:"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

之间谓之李耳,或谓之於𪁪(郭璞注:今江南山夷呼虎为𪁪)。”据现代中外学者考证,“李父”、“李耳”、“於𪁪”都是非汉语词(详见张永言《词源探索三例》,《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左传·庄公四年》孔颖达疏:“扬雄以《尔雅》释古今之语,作书拟之,采异方之语,谓之《方言》。”总之,《方言》所搜罗的“方言”,都是异方之语,自然不论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都在采集之列。

我再妄言如下:在中国古代,“语言”、“语”、“言语”、“方言”、“方语”等似乎是近义词,不像在现代汉语里有严格的区别。晋道安《鞞婆沙序》:“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适今俗,此所不取。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之辞趣耳,何嫌文质?”(按,着重号为本文笔者所加,下同。)晋法显《佛国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言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八慧观《法华宗要序》:“(鸠摩罗什)自手执胡经,口译秦语,曲作方言,而趣不乖本。”(参梁慧皎《高僧传》卷三“译经·论”:“鸠摩罗什……历游中土,备悉方言。”)同上卷十五“佛念法师”:“家世西河,洞晓方语。”梁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支)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一:“狼揭罗国……文字大同印度,语言少异。”唐冥详《大唐故三藏法师行状》:“先代翻译,多是婆罗门法师,为初至东国,方言未融,……至如罗什称善秦言,译经十有余年。”唐刘知几《史通·言语》:“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四十:“凡象会处,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以汉语为证,方能辨之。”元汪大渊《岛夷志略》“交趾”条:“其诵诗读书谈性理为文章皆与中国同,唯言语差异耳。”萧大亨《夷俗记》“习尚”条:“其言语多喉舌声,而不清轻。”而元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则“语言”、“话语”和“言语”并用:“国中语言自成音声虽近,而占城暹人皆不通话语。……城市村落言语各自不同,亦与中国无异也。”宋人周去非则数词并用,其《岭外代答》卷三“五民”条:“二曰北人,语言平易。”卷四“方言”条:“方言者,古人有之,乃若广西之蒌语……至若城郭居民语乃平易。”

当我写好此文初稿后,查阅赵元任先生的《语言问题》时,发现前

辈先得我心，高山仰止，深悔自己以前读书不细心。不过赵先生书中只举一例，拙文可作赵著的注脚。另外赵先生的论点未尝不可以做点修正。《语言问题》第七讲“方言和标准语”里有一段话：“方言这个名词，在中国是很久就有的名词，从前是当各处地方不同的语言讲。东汉有相传是扬雄写的《方言》一部书，讲什么地方管什么叫什么，它是注重一处一处语言词汇的不同，同样的东西叫法不同，那都是中国的语言。不过方言这个名词在广义上讲起来么，也当根本不同的语言讲，比方清末在北京有广方言馆，事实上就是教英国语言、德国语言、俄国语言、法国语言、日本语言，各处很不同的语言，根本不一定有关系的、历史上不一定同源的一些语言。那是最广义的方言的名词的用法。”

三

赵先生的广义说似乎可以商榷，那是由于站在“今义”的立场而“以今视昔”的缘故。在 19 世纪以前（含 19 世纪）的中国人的心目中，“方言”即语言，无所谓外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之分，这是和今人迥然不同的。今人看下列例子时怪顺眼的：晋葛洪《抱朴子·钧世》：“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唐皇甫冉《同诸公有怀绝句》：“移家南渡久，童稚解方言。”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三：“尝观文字注：‘秦人谓豹曰程。’予至延州，人至今谓虎豹为程，盖言虫也。方言如此，抑亦旧俗也。”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二：“宰相沈该，顷在蜀郡，买贱卖贵，舟车络绎，不舍昼夜。蜀人不以官名之，但曰沈本，盖方言以商贾为本也。”宋费衮《梁溪漫志》卷七“方言入诗”条：“方言可以入诗，吴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谓之淋露，九月霜降而云谓之护霜。……诗人皆用之，大抵多吴语也。”今人看这些例子毫无滞疑，是因为在现代汉语里，“方言”词义缩小了。“方言”既是各方的语言，一个地方的语言当然也是“方言”了。典籍中还见有将“土语”、“俗语”和“方言”相提并论的，这也使现代人容易接受。梁慧皎《高僧传》卷二“昙无谶传”：“谶以未参土言，又无传译，恐言舛于理，不许即翻。”刘知几《史通·言语》：“唯王宋著书，叙

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史通·杂说中》:“晋楚方言,齐鲁俗语,六经诸子,载之多矣。”宋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二十八:“乡邦俗语即方言也,今人简帖或用之。”民国初年的《辞源》将“方言”释为“土俗语也。囿于一方,不能通行各地,故曰方言”。民国十九年的《王云五大辞典》解释为“各地方的土话”。我揣测,“方言”词义在现代汉语里缩小的原因可能是:汉语自古以来方言分歧十分复杂,几乎人人都能感知,而接触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民族语的人总是少数,能形诸笔墨的则更少。而至 20 世纪,现代语言学的建立给予“方言”以科学的明确的界定,不再含混。例如民国八年的范祥善《国音浅说》:“国音者,国人公有之音也。一国之人,必有语言文字以传达意思。语言文字,必有声音,其限于一区域者,为土音,为方音,不适于全国之用,未可谓之国音。”这段方音与国音即标准音对立的论述,是具有现代语言学观点的人才能作出的。沈步洲在其《言语学概论》(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给“方言”下的定义也显出时代的精神:“故方言者乃同一种语言中由历史所经之情境而发生,非两种源流不相同之语言由历史之机会而接触者也。因地而殊,莫为之界;因时而异,难辨其期;废之不可,减之甚难者也。”

在 20 世纪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当然与西方语言学的影响密切相关,即以“方言”一词而言,英语的 dialect、法语的 dialecte,源于拉丁语 dialectus,导源于古希腊语的 dialectos,“言语、语言、方言”的意思。这个名词源于动词 dialegesthai,“谈话”的意思。西方在 19 世纪初期,方言研究成为一门学科,其后方言地理学盛行,大型方言地图集问世。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布龙菲尔德《语言论》都花了很多篇幅介绍方言地理学。索绪尔说:“这一事实在德国和意大利是很普遍的,那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方言和正式的语言并存。在任何时候,任何已达到一定文化程度的民族都曾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希腊人曾有过它们的 Koinè‘共同语’,那是从阿狄克方言和伊奥尼亚方言发展出来的,跟它并存的就有好些地方方言。”(《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 273、274 页),上举范祥善语可与之比照。沈步洲在其《言语学概论》的序言中自称“性喜习文于英、德、法各语”,其书就是引进西方语言学的产物,他给“方言”下的定义当然渊源有自。

且看近年汉语词典的“方言”定义。《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版):“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如汉语的粤方言、吴方言等。”《辞海》(1989年版):“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与此同时,不少西方的词典和百科全书给 dialect 下定义也仍然如此。如 Mario Pei and Frank Gaynor 所编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1954):“a specific form of a given language, spoken in a certain locality or geographic area, showing sufficient differences from the standard or literary form of that language, as to pronunciatio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and idiomatic usage of words, to be considered a distinct entity, yet not sufficiently distinct from other dialects of the language to be regarded as a different language.” *Longman Modern English Dictionary* (1976):“a regional form of a language, esp.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standard or literary language.” *Oxford American Dictionary* (1980):“the words and pronunciation that are used in a particular area and differ from what is regarded as standard in the language as a whol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1983)首段:“The way a language is spoken in a particular region (for example, the ‘Southern dial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近来西方语言学家给 dialect 下的定义有所变化。如 David Crystal 的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1985):“A regionally or socially distinctive variety of a language, identified by a particular set of word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于是中国的语言学家又相应地造出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个术语,但是多数语言学者和一般人还是把“方言”局限为“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

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的“方言地理学”的一章里说:“有一句至理名言,……每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我愿借用此语,说明汉语里的“方言”一词,自东汉以来一千余年,意义并不单纯。只是我们掌握的用例还太少,不足以确定它在各个时期的意义,也难以推阐它的演变史。这样一个重要的词,尚且未能研究清楚,某些学术著作对其古义也未作阐述,可见汉语史研究的薄弱。我们不禁要向汉语词汇史家呼吁,在大力研究俗语词的同时,可否也注意非俗语词的考察。

四

关于《方言》一书是否扬雄所作，历来作肯定回答的多，如戴震《方言疏证》、卢文弨《校正方言》、钱绎《方言笺疏》、罗常培先生《扬雄〈方言〉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等；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十五"别国方言"条则持否定态度："必汉魏之际，好事者为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云："反复推求，其真伪皆无显据。"周祖谟先生的《方言校笺序》："方言是不是扬雄所作，很不容易断定。"赵元任先生《语言问题》说，"东汉有相传是扬雄写的《方言》一部书"，这都是持审慎的态度。按，《方言》书名也是始于应劭，颜师古《汉书注》的"司马迁传"引录了应劭的话，应劭引扬雄《方言》证"臧获"二字。此后《尔雅·释虫》"莫貈蛄蜋蛑"郭璞注："孙叔然以《方言》说此义，亦不了。"叔然乃孙炎字，魏人，著《尔雅音义》。《左传·庄公四年》"授师孑焉"晋杜预注："扬雄《方言》'孑者，戟也。'"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上"先贤士女总赞"、卷十二"梁益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各出现《方言》书名两次。可见自应劭以后，扬雄《方言》书名逐渐出现在魏晋典籍上。不过有些现象值得注意，如《华阳国志》袭用、点窜《汉书》成句，《汉书·扬雄传》："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华阳国志》改末句为"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而应劭的《风俗通义序》叙述扬雄调查方言事乃是依据扬雄《答刘歆书》，我想，如能从词汇、语法、风格等方面鉴定刘歆、扬雄遗答二书，也许是解决扬雄是否著《方言》这一悬案的办法之一，前人、今人似尚未从此着手，汉语史学人从词汇史角度辨证《列子》真伪，成绩斐然，可否也如法炮制？

罗常培先生在《扬雄〈方言〉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一文中，例举扬雄以后续补《方言》和考证方言俗语的若干书后说："总起来看，这些书大都是从史传、诸子、杂纂、类书以及古佚残编等抄撮而成；除去一两种外，始终在'文字'里兜圈子，很少晓得从'语言'出发。能够了解并应用《方言》本书的条例、系统、观点方法的，简直可以说没有人。可惜在中国语言史上发达最早的词汇学，从《方言》以后，就

这样暗淡无光,不能使第一世纪左右已经有了的逼近语言科学的方法继续发展!”就我浅知,这个传统虽然“如缕”,但还是“不绝”。汉代《方言》后的继作者是十六国时期的西凉北凉人刘昞,《魏书》卷五二“刘昞传”:“字延明,敦煌人也。”“著《方言》三卷。”《北史》卷三四“刘延明传”同。刘昞,当时人誉之为“河右硕儒”,《史通·杂述》对他评价很高:“其如常璩之详审,刘昞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此书也受到以后学人的重视,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四“艺文·小学上”载“汉别国方言”、“北史刘延明著《方言》三卷”。明方以智《通雅》卷首一“方言说”亦谓“北史刘延明亦著《方言》”。惜乎此书散佚。其后还有一位著《方言》的,即王浩,书凡十四卷。南宋高宗绍兴年间秘书省颁有《四库阙书目》和《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二种,后者至清光绪二十九年,为叶德辉刊入其《观古堂书目丛刊》中。叶氏《刊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序》云:“《秘书省书目》则自宋浙漕司摹板后,别无刻本,东南藏书家虽间有抄存,而孤本单传,海内学人无由共见。往余得丁氏迟云楼抄本,文多讹误,然于宋讳缺避及脱烂空白之处,皆无所改移,是知其书传授自古,必有依据。”该书目“经类·小学类”列“王浩撰《方言》一十四卷,阙”。则是王浩为南宋前人,其生平仕履待考,其《方言》惜亦不传。刘昞、王浩二书当与清代的采摭经传故记的《续方言》(杭世骏著)、《续方言补正》(程际盛著)等不同。刘昞《方言》,尤其是王浩《方言》,当今学人知之者甚少,故特为表而出之。希望今后写《中国语言学史》和《汉语方言学概论》的专家能表彰刘昞、王浩两位“先贤”。还有一书,不是讲词汇的,而是讲语音的,《隋书·经籍志》载《河洛语音》一卷(王长孙撰),当是北魏迁都洛阳后的书,附此以见汉语方言研究的传统。

“方言志”一词,如今的语言工作者耳熟能详。就我浅闻,第一个提出此词的是唐刘知几,其《史通·书志》:“茫茫九州,言语各异,大汉輶轩之使,译导而通,足以验风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广被。且事当炎运,尤相关涉,《尔雅》释物,非无往例,既艺文有志,何不为方言志乎?……至若许负相经、扬雄方言,并当时所重,见传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书,何独舍诸?深所未晓。”刘知几认为班固著《汉书》时既据刘歆《七略》而作“艺文志”,也应据扬雄《方言》而作“方言志”。

宋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三“方言”云:“刘子玄欲作方言志而未果。”本此,然误解《史通》。

戴震《方言疏证序》云:“至应劭集解《汉书》,始见征引,称扬雄《方言》。”这是据《后汉书·应劭传》“又集解汉书,皆传于时”和《隋书·经籍志》“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应劭撰”立言的,戴书卷三引录了应劭语。我也将《汉书》颜注所引录的应劭注百余条全部翻检一过,确仅“司马迁传”一条。但戴震未能注意颜师古的《汉书叙录》中的一段话:“《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

赵元任先生在《语言问题》里说:“清末在北京有广方言馆。”这是误记。同治元年(1862)恭亲王奕䜣,设京师同文馆,翌年署理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和广州“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随后拟定“上海初期议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试办章程十二条”。同治六年(1867)“江海关道应详通商大臣曾江苏巡抚部院郭”的文书中出现“上海广方言馆”字样,此后文书均如是称,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为兵工专门学堂和中学堂。现存《广方言馆全案》,约编定于光绪二十年(1894)或稍后,未署编者姓名,系江苏巡抚、江海关道、江南制造局总办、会办等关于广方言馆的往来咨札及有关章程,号称全案,实很不全,因系原始案牍,故价值高。上海广方言馆学习的外国语文主要是英文,其次为法文、俄文、布文、德文。(光绪五年的“江海关道刘禀复南洋通商大臣沈”的文书中有“至俄文、布文,似应一并令其肄习”,“沪上广方言馆,向有学习英文、法文、布文生徒”,“至俄文、布文本应兼习”诸语,其中“布文”不知何指。)

1991 年

本文原题为《“方言”的涵义》,发表于《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 年第 1 期。迄今计增补两次。 1996.12.5

请见《“布文”辨识本末及其他》一文(本集 540—545 页)。

请见本论文集跋语。 2003.2.21

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

提要　在方言学内，方言史的研究是很为薄弱的一环，原因是难。

笔者做研究生时的专业方向是汉语史，这使我发奋从史的角度研究自己家乡方言的两千多年的变迁和衍化。首先穷尽式地从富含历史矿藏的共时语言现象理出其发展脉络，继而以对多位高龄老人的调查、乡邦历史文献的稽考和历史比较法的运用追溯泰州方音的历史，并提出带有理论性的总结。笔者研究古史，在六十年代初期提出吴方言本不局限于江南，原本北抵淮河，通泰、客、赣方言同源，现代江淮方言始于4世纪。这些都是本文的重要创获。

笔者还发现了一本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的方言韵书，对全书作了述评，着重指出该书对泰州方音史研究的价值和功用。

目　　录

引言
上篇
　一　泰州方言及其音系
　二　泰州方言语音向普通话集中靠拢的诸种现象
中篇
　一　研究泰州方言语音史的几条途径
　二　近代泰州方言语音史研究

---

* 此文1961年5月初稿，1964年5月六稿，1987年8月修订定稿。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仲一侯、魏建功、袁家骅、周祖谟、丁声树、叶蜚声、王福堂、熊正辉、侯学超、俞扬、王恩保等先生的教导和帮助，先君子照林先生曾谆谆迪励。桥本万太郎先生热情地劝我发表此文。倏忽二十余载，仲、魏、袁三师，先君子照林先生及桥本先生皆先后逝世，谨以此文作为对他们的纪念。

三　解放以后泰州方言加速向普通话集中靠拢
四　泰州方言语音系统由于邻近方言的影响而出现的分歧摇摆
五　结论——泰州方言语音向普通话集中靠拢的途径和方式
下篇
一　试说通泰方言为三、四世纪汉语北方方言的“后裔”而具有吴方言的底层
二　通泰、赣、客方言同源论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　《字音集义通考》解析
书影　五张

引　言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近代和现代的泰州方言语音的发展历史并探讨通泰方言的起源。

本文由上中下篇和一个附录组成。上篇主要是泰州方言语音的现状描写。我们知道，任何语言或方言都处在不断运动的过程中，现在的泰州人的方音只是历史发展长途中的承前启后的一个截面，因此我们是从历史运动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现状描写的。同时，我们没有孤立地对待泰州方言语音，而是把它放在同邻近诸方言及汉民族共同语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中观察并比较的。因而我们对泰州方音现阶段的复杂、矛盾和体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特性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我们还进行了泰州方音史的勾稽工作，这是本文中篇的重要内容。当前汉语方言的研究多数是共时的描写，也确有一些学者进行过某种方言史性质的研究，主要是词源的推寻和与广韵音系的比较，这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却不能令人满意。本文尝试用多种方法研究方音史，我们的目的在于更清楚地认识现状，了解方言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预测它今后又将循着什么样的道路继续发展。

本文下篇提出了通泰、客、赣方言同源论。指出吴方言本北抵淮河，永嘉之乱后北方方言进入江淮之间，通泰方言渊源于此。现代南通方言较多地保存了古老的面貌，而泰州方言变化最快。

最后是附录，解析清同治年间泰州方言韵书《字音集义通考》（稿本）。

文中常提到“×十年前”、“百年前”皆是以此文写作时间即20世纪六十年代初为基点。

上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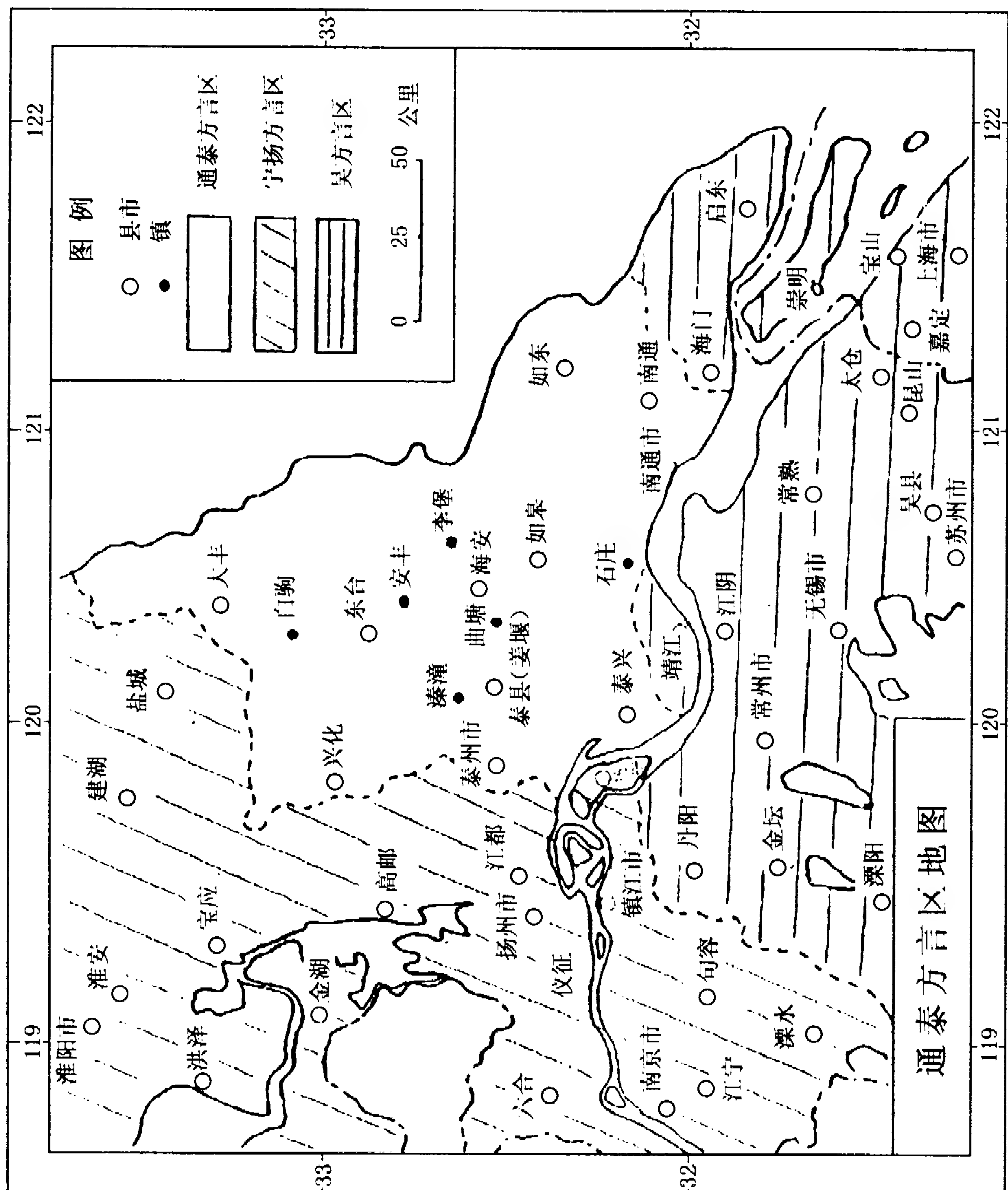
一　泰州方言及其音系

江苏省的方言，按照《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一书（以下简称《概况》）可划分为四区。徐州市、丰县、新沂等地的方言为第四区，那是属于官话方言的中原方言区。常州、苏州一带的方言是第二区。南京、扬州、淮阴一带的方言是第一区。而苏北的东南部则为第三区，包括下列诸点：兴化、泰州市、泰县、东台、大丰、海安、泰兴、如皋、如东、南通市、南通县（西部）。

参看地图，图中称第二区为吴方言区，称第一区为宁扬方言区，因南京话、扬州话是其代表。第三区则名之为通泰方言区，因为南通话、泰州话是其东西两极。

泰州在西汉时即设县，名曰海陵。五代南唐时置泰州，今兴化、如皋、泰兴皆其辖县。从南宋高宗至清雍正初，如皋一直属泰州。清代雍正三年起泰州为散州，隶扬州府，清乾隆时于泰州东北部析置东台县。入民国泰州为泰县。解放前后的变动大致是：1940年以泰县东部（包括海安镇）及如皋县西部、东台县南部设紫石县，1948年改称海安县。1949年由泰县析置泰州市，农村为泰县（县政府驻姜堰镇）。1951年主要由东台县北部及兴化县东部设大丰县。总之上述诸市县在历史渊源上有密切关系。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泰州市、泰县、东台县、大丰县及部分兴化县、海安县的方言基本相同，这是广义的“泰州方言”。狭义的“泰州方言”则是指泰州市的话，本文所述主要据此，必要时也提到泰县的姜堰镇、溱潼镇等地的话。

宁扬方言和通泰方言都属于江淮方言。江淮方言的北邻是中原官话，而南接吴、徽、赣诸方言，可以说，江淮方言是广袤的官话方言与中国东南部的复杂方言群（吴、赣、湘、闽、粤诸方言）的过渡地区，它所具有的这一高度价值尚未被学界重视，研究很不充分。通泰方



通泰方言区地图
图例
○ 县市
● 镇
通泰方言区
宁扬方言区
吴方言区
0 25 50 公里
33
32
119
120
121
122
盐城
建湖
淮安
淮阴市
洪泽
宝应
金湖
高邮
兴化
东台
安丰
李堡
海安
曲塘
如皋
泰县(姜堰)
溱潼
泰州市
江都
扬州市
仪征
六合
南京市
江宁
句容
溧水
镇江市
丹阳
金坛
溧阳
常州市
江阴
靖江
泰兴
石庄
无锡市
常熟
苏州市
吴县
昆山
太仓
嘉定
上海市
宝山
崇明
海门
启东
南通
南通市
如东

言介于宁扬方言和吴方言之间，可以说，它是江淮方言与吴方言的过渡地区，它的复杂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通泰方言西缘的泰州方言紧邻扬州方言（江都县的话就是扬州方言），它是宁扬方言与通泰方言的过渡地区，泰州方言语音上的一系列特点表明它动摇于二者之间，这是平面观察的结果。如果作较深入的调查和历史的探讨，从泰州方言语音系统的分歧摇摆当中可以发现，泰州方言语音很早以前特别是近百年来，表现出一个确定不移的向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集中靠拢的趋势，而这是通过向宁扬方言接近的具体途径表现出来的。解放以后，向普通话的集中靠拢又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更好地了解下面所提出的泰州方言语音向普通话集中靠拢的诸种现象，有必要先将泰州方言音系作一简单介绍。

（一）声　母

p	布病	pʻ	爬盘	m	门麻	f	焚抚	v	闻威
t	到担	tʻ	套道	n	南兰				
k	贵干	kʻ	开跪			x	化寒		
ts	糟招	tsʻ	仓昌			s	苏书	z	绕人
tɕ	精究	tɕʻ	青秋			ɕ	心休		
ø	延王								

说明：

1. p、pʻ、t、tʻ、k、kʻ比起北京话来都是较硬的塞音。
2. x 比北京话稍后。
3. z 的发音部位因人而异，或 z 或 ʐ 或介于二者间。
4. tɕ、tɕʻ、ɕ 比起北京话来，舌面与上颚的磨擦较强。
5. 零声母以 i、u、y 起头的有磨擦。
6. tɕi、tɕʻi、ɕi 三个音节，泰州人的另一种读法为 tsɿ、tsʻɿ、sɿ（详见本文中四）。

（二）韵　母

开尾韵、鼻化韵和鼻音尾韵：

ɿ　资市　i　鸡帝　u　姑河　y　鱼吕

ə	而二						
a	爬舍	ia	加架	ua	花夸	ya	靴茄
e	猜海	ie	冶写	ue	怪坏	ye	帅甩
ɔ	桃傲	iɔ	条小				
ɯ	头走	iɯ	流朽				
əi	飞尾			uəi	鬼桂		
		iĩ	边煤				
ʊ̃	官半					yʊ̃	宣圈
ɛ̃	三慢	iɛ̃	减监	uɛ̃	关患	yɛ̃	赚闩
aŋ	汤港	iaŋ	良讲	uaŋ	光枉	yaŋ	床撞
əŋ	恩庚	iŋ	心幸	uəŋ	魂棍	yŋ	云孙
oŋ	东共	ioŋ	琼用				

喉塞尾韵：

		iɪʔ	灭漆				
əʔ	色直			uəʔ	骨忽	yəʔ	卒穴
ʊʔ	活割					yʊʔ	月缺
ɛʔ	纳杂	iɛʔ	匣甲	uɛʔ	刮滑	yɛʔ	刷
ɔʔ	北屋	iɔʔ	欲菊				
aʔ	各落	iaʔ	药虐	uaʔ	郭霍	yaʔ	捉镯

鼻韵

ŋ̍ 我

m "m妈"

说明：

1. t、t'、n 拼 i 时，有人韵母读为 ʅi，p、p'、m 拼 i 时，有人读为 pʅ、p'ʅ、mʅ。

2. u 的圆唇程度甚差，且带有轻微摩擦。

3. ə 较后，有些人卷舌（程度不等）。

4. a、aŋ 中的 a 偏央。

5. e 略开，ie、ue、ye 中的 e 较开。

6. ɔ 较闭。

7. ɯ 较开，iɯ 实近于 iɤɯ。

8. uəi 中的 ə 在非上声时不显著。

9. iĩ 和 iɪʔ、ʊ̃ 和 ʊʔ、ɛ̃和 ɛʔ 各自除一鼻化，一有喉塞音尾外，元音音色相同。

10. əʔ 中的 ə 较后较开。

11. aʔ 中的 a 较后，跟阴声韵韵母 a 不同。

12. ts、tsʻ、s、z、n 拼除 u 以外的合口诸韵母时，不少泰州人读成撮口呼。故本表比《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中的泰州音系表多列 ye、yɛ̃、yaŋ、yəʔ、yɛʔ、yaʔ 六韵。

（三）声　　调

阴平	˨˩	21	诗飞丈 望
阳平	˦˥	45	时微棉盲
上声	˨˩˧	213	使野产厂
去声	˦	44	士泰丈 望
阴入	˦˧	43	识竹洛食
阳入	˦˥	45	石麦盒食

说明：

1. 阳平调值起点略低于 4。
2. 去声调值先平而后稍降。
3. 入声是短调，且带有显著的喉塞音尾。
4. 两字组的连续变调只有在“上声 + 阳平”、“上声 + 阳入”时，前字上声由 213 变为平调 22。

另有轻声，出现在两字组的后字，三字组的中字。随前字调值的终点高度而定：前字为阳平、阳入，调值终点高度为 5，后字的轻声调较高，可记为·˦(实略低于 4)，如“明白”[miŋ˦˥pɔʔ˦˥·˦]，“麦子”[mɔʔ˦˥tse˨˩·˦]。在去声、阴入、上声后的轻声调基本相同，可记为·˧，如“太阳”[tʻe˦iaŋ˦˥·˧]，“舍不得”[sa˨˩˧pəʔ˦·˧təʔ˦]，“瞎子”[xɛʔ˦˧tse˨˩·˧]，“眼睛”[ɛ̃˨˩˧tɕiŋ˨˩·˧]。在阴平后的轻声调可记为·˨，如“清楚”[tɕʻiŋ˨˩tsʻu˨˩·˨]，“诸葛亮”[tsu˨˩ku˦·˨niaŋ˦]。轻声调后还可有轻声，如“写一下”[ɕia˨˩˧ə·˧tse·˨]。

二　泰州方言语音向普通话集中靠拢的诸种现象

这里不取举例的方式，尽可能详列现象，并作出统计，如此更能

有助于问题本质的发现与探讨。

泰州方言中有很多字具有两读，本文则将它们所在词儿(或词组)的整个音注出来，因为某字该读何音，只有在具体的词(或词组)里才能确定。如果仅凭直觉，这些具有两音的字往往只能读出一音。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对这些字的读音泰州人很不一致，年龄的大小，文化程度的不同均有关系，这里的记录基本上可以作为20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泰州青年知识分子(20—30岁)读音的代表。

本文所载字音曾全部或部分地请同乡核对过，达十次以上。(1987年7月又请胡立群同学读此文中所载字音、词音，又与俞扬先生等商讨某些字的读音。立群是地道泰州人，1966年生，上大学以前一直在家乡，现为南京大学二年级学生。今以案语形式记其读音的特异处，于此可略窥这二十余年泰州语音的变迁。)

本文不只是陈述泰州方言的语音现象，而且把它和宁扬方言与普通话联系起来观察。另一方面，也跟如皋、泰兴、南通等地的话甚至吴方言联系起来研究。如此，既有助于看清泰州方言的发展趋势，也可了解江苏方言由南而北，由东而西的递变倾向。(所引材料根据《概况》，但如皋话的不同于《概况》的材料，泰兴、东台、姜堰、溱潼的材料则是我自己调查的。)

(一) 中古外转诸摄开口二等牙喉音字在泰州方言里的衍变

中古外转蟹、梗、咸、山、江、效、假七摄的某些韵开口的牙喉音字(臻摄无此类字)在现代泰州话里有的为开口呼，声母为舌根音和零声母；有的变成齐齿呼，声母是舌面前音和零声母；有的则兼具两读，读作齐齿呼的是书面语音，读作开口呼的是口语音(取决于它们存在于书面语词还是口语词里)。变为齐齿或兼具齐齿的日益增多。

基本根据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方言调查字表》(1955年第一版，科学出版社)列表于下，同音字类聚在一起，只注一音，下加“=”号的为书面语音，加“-”号的是口语音，这是第一表。此外，每摄还可能有第二表和第三表。第二表是泰州方言和邻近诸方言及普

通话大致情况一览表(有些摄改用文字说明),第三表是挑选典型字,比较他们在各方言中的读音。

蟹 摄

表 1.11

	皆韵(举平以赅上去,下同)	佳 韵
开口	皆阶秸街 ke˨˩,介芥疥届戒械 ke˥,揩 k'e˨˩,楷 k'e˨˩˦,骇 xe˨˩,挨 e˨˩、e˥	解 ke˨˩˦,解(姓)懈 xe˨˩,鞋 xe˥,蟹 xe˨˩˦,矮 e˨˩˦,隘 e˥
开齐两读	界(搭界 tɛʔ˦ke˥,政界 tsəŋ˥ tɕie˥),谐(谐调 xe˥ t'iɔ˥,ɕie˥ t'iɔ˥)	
齐齿		佳 tɕia˨˩,涯 ia˨˩

表 1.12

南通	泰兴	如皋	泰州	扬州	南京	北京
开口	开多齐少,少量两读			齐多开少 不少两读	齐齿	

上表是就《概况》及我的调查而作的约略统计(以后各摄同)。北京话于上列字绝大多数为齐齿,但亦有少量如“楷骇挨”非齐齿,为简洁起见,径填“齐齿”二字。

解放后由于普通话的大力推广,有些字在泰州青年学生中新增齐齿一读,如“东街”[toŋ˨˩tɕie˨˩],“解放”[tɕie˨˩˦faŋ˥],但目前大多数学生在读书时仍多作开口。

案,1987 年 7 月胡立群同学的读音:“皆阶械解懈”有开齐两读,“介芥疥届戒”齐齿。

梗　摄

表 1.21

舒　声

	庚韵开口二等	耕　韵
开口	更打～庚羹 kəŋ˨，哽 kəŋ˨˦，更～加 kəŋ˥，坑 k'əŋ˨，亨 xəŋ˨，衡 xəŋ˥，硬 əŋ˨	耕 kəŋ˨，耿 kəŋ˨˦，茎 xəŋ˥
两读	行（道行 tɔ˥xəŋ˧，品行 p'iŋ˨˦ ɕiŋ˧）	
齐齿	杏*（杏树 ɕiŋ˨ su˨，杏花 ɕiŋ˥ xua˨），行～为 ɕiŋ˥	幸 ɕiŋ˥，莺鹦樱 iŋ˨

促　声

	陌韵开口二等	麦　韵
开口	格 kəʔ˧，客咳 k'əʔ˧，赫吓 xəʔ˧，额*（额角 əʔ˥ kaʔ˧，名额 miŋ˥ əʔ˧）	革隔 kəʔ˧，核覈 xɔʔ˥，厄扼轭 əʔ˧

* "杏额"之所以有两读（又见表 4.1 和表 5.1），是由于古浊声母字在泰州话演变的不同所致，在甲项音变中算是具有口语音与书面语音两读，而按乙项音变的规则，此二音只能皆认为是口语音（或书面语音），这种现象多见，此后不再赘言。

关于此摄的衍变，南通、泰州、扬州等方言和普通话基本相同。中古二等韵开口牙喉音字在北京话里只此摄有很多字未变为齐齿。但在北京土话和东北话里"耕"字和"更打～"字有念为 tɕiŋ阴平 的，"客"有念作 tɕ'ie上 的。

咸摄、山摄

表 1.31

舒 声

	咸 韵	衔 韵	山 韵	删 韵
开口	尴 kɛ̃˩,鹹 xɛ̃˥	嵌 k'ɛ̃˩,舰 k'ɛ̃˧˥,衔 xɛ̃˥	拣 kɛ̃˧˥,苋 xɛ̃˩,眼 ɛ̃˧˥	雁 ɛ̃˩,颜 ɛ̃˥,晏 ɛ̃˥
两读	陷(陷痕儿 xɛ̃˩ xəŋ˥ə˞re˞˩,陷落 ɕiɛ̃˥ naʔ˧)	监(坐监 ts'u˩ kɛ̃˩,监视 tɕiɛ̃˥sɿ˥)	间(房间 faŋ˥kɛ̃˩,空间 k'oŋ˩tɕiɛ̃˩),限(不限定 pəʔ˧xɛ̃˩ tiŋ˥,局限 tɕiɔʔ˧ɕiɛ̃˥)	
齐齿	减碱 tɕiɛ̃˧˥,咸 ɕiɛ̃˥	鉴 tɕiɛ̃˥	艰 tɕiɛ̃˩,简柬 tɕiɛ̃˧˥,间 tɕiɛ̃˥,闲 ɕiɛ̃˥	姦奸 tɕiɛ̃˩,谏 tɕiɛ̃˥

促 声

	洽 韵	狎 韵	黠 韵	辖 韵
开口	夹 kɛʔ˧,掐 k'ɛʔ˧	鸭押 ɛʔ˧,压 ɛʔ˧,ɛʔ˥	轧 tsɛʔ˧	瞎辖 xɛʔ˧
两读	袷(袷褴子* k'ɛʔ˧ təŋ˥ tse˧,袷衣 tɕiɛʔ˧ i˩),狭(狭巷子 xɛʔ˥ xaŋ˩tse˞˩,狭隘 ɕiɛʔ˧ e˥)	甲(指甲* tsɿ˧˥k'ɛʔ˧,甲壳 tɕiɛʔ˧ k'aʔ˧),匣(匣子 xɛʔ˥ tse˧,宝匣 po˧˥ɕiɛʔ˥)		
齐齿	恰 tɕ'iaʔ˧,峡 ɕiɛʔ˧			

* 袷褴子:袷袄。
* "指甲"是 k'ɛʔ,不是 kɛʔ。

案，胡立群1987年7月读法："监限"只有齐齿一读(在表列的口语词中亦然)。"房间"之"间"，泰州人在一起时读开口，如夹有外地人，则读齐齿。"嵌"读 tɕʻiĩ˨˩。"舰"，小时读 kʻɛ̃˥，中学时读 tɕʻiĩ˥。"衔"ɕiɛ̃˥。"轧"kɛʔ˧。但"咸丰"读 xɛ̃˥foŋ˨˩。

表 1.32

	苏　州	南　通	泰　兴	如　皋	泰　州	扬　州	南京	北京
舒声	开口较多，少量齐齿		开、齐、两读均有			一般齐齿，少量两读	齐　齿	
促声	开　　口		一般开口，少量两读		开口较多	两读较多	齐　齿	

江　　摄

表 1.41

	江　　韵	觉　　韵
开口	肛缸 kaŋ˨˩，港 kaŋ˨˩˧，虹 kaŋ˥，xoŋ˥，巷 xaŋ˨˩，项xaŋ˨˩，xaŋ˥	角 kaʔ˧，壳 kʻaʔ˧
两读	江(江阴 kaŋ˨˩iŋ˨˩，长江 tsʻaŋ˥ tɕiaŋ˨˩)，讲(讲谣言 kaŋ˨˩˧io˥iĩ˨˩，演讲 iĩ˨˩˧tɕiaŋ˨˩˧)	觉(得福不觉 təʔ˧ fɔʔ˧ pɔʔ˧ kaʔ˧，知觉 tsʅ˨˩tɕiaʔ˧)，学(学乖* xaʔ˥kue˨˩，学习ɕiaʔ˥ɕiɪʔ˧)
齐齿	降下～ tɕiaŋ˥，腔 tɕʻiaŋ˨˩，降投～ ɕiaŋ˥	确 tɕiaʔ˧，嶽岳乐音～iaʔ˧

* 学乖：学生意，做学徒。俞扬同志1990年指出，"巷"有三读：xaŋ^{阴平}，xaŋ^{去声}，ɕiaŋ^{去声}。"项"有二读：xaŋ^{去声}，ɕiaŋ^{去声}。

这些字在下列各方言中大致情况是，苏州话开口较多，南京、北京基本齐齿，其他与泰州话大致相同。递变之迹仍可看出，如泰兴话里"讲确"皆为开口。兹举"降下～项"二字为例以观递变情况。

表 1.42

	苏州	南通	泰兴	如皋	泰州	扬州	南京	北京
降	tɕiã 阴去文 kɑ̃ 阴去白	tɕiẽ 阴去文 kõ 阴去白	tɕiaŋ 去	tɕiã 去	tɕiaŋ 去	tɕiaŋ 去 tɕiæ̃ 去	tɕiɑ̃ 去	tɕiaŋ 去
项	ɦɑ̃ 阳去	xõ 阴去	xaŋ 阴平	xã 阴平	xaŋ 阴平 xaŋ 去	ɕiaŋ 去文 xaŋ 去白	ɕiɑ̃ 去	ɕiaŋ 去

效 摄

表 1.51

开口	搞铰 kɔ˦˨,咬 ɔ˦˨,坳拗 ɔ˥
两读	教(教人kɔ˩ zəŋ˥,教育tɕiɔʔ˥iɔʔ˧),绞(绞绳子kɔ˦˨˧ səŋ˥tse˧,绞刑tɕiɔ˦˨˧ɕiŋ˥),觉(睡觉 suɔi˥kɔ˧,suəi˥tɕiɔ˧),敲(敲门k'ɔ˩ məŋ˥,敲击tɕ'iɔ˩tɕiɪʔ˧)
齐齿	交郊胶 tɕiɔ˩,搅狡较 tɕiɔ˦˨,校~对 tɕiɔ˥,巧 tɕ'iɔ˦˨,肴淆 ɕiɔ˥,孝效校学~ ɕiɔ˥

诸方言的情况：北京话、南京话绝大多数为齐齿。苏州话两读较多，在泰州话为齐齿的字，苏州往往兼有开口一读。从下列三字在有关方言的不同读音看递变趋势：

表 1.52

	苏州	南通	泰兴	如皋	泰州	扬州	南京	北京
交	kæ 阴平白 tɕiæ 阴平文	tɕiɤ 阴平	tɕiɔ 阴平	tɕiɔ 阴平	tɕiɔ 阴平	tɕiɔ 阴平	tɕiɔu 阴平	tɕiau 阴平
胶	kæ 阴平白 tɕiæ 阴平文	kɤ 阴平白 tɕiɤ 阴平文	tɕiɔ 阴平	tɕiɔ 阴平	tɕiɔ 阴平	tɕiɔ 阴平	tɕiɔu 阴平	tɕiau 阴平
敲	k'æ 阴平白 tɕ'iæ 阴平文	k'ɤ 阴平白 tɕ'iɤ 阴平文	k'ɔ 阴平白 tɕ'iɔ 阴平文	k'ɔ 阴平白 tɕ'iɔ 阴平文	k'ɔ 阴平白 tɕ'iɔ 阴平文	k'ɔ 阴平白 tɕ'iɔ 阴平文	tɕ'iɔu 阴平	tɕ'iau 阴平

假　摄

表 1.61

	麻韵开口二等
开口	桠 a˨˩,哑 a˨˩˧
两读	家(家里k ȧ˩ni.ɪ,国家 kɔʔ˦tɕia˩),傢(傢伙* ka˩xu.ɪ,傢俱tɕia˩tɕy˥),稼(庄稼 tsuaŋ˩kə.ɪ,稼穑tɕia˩səʔ˦),架(架子* ka˥tse·ɪ,骨架 kuəʔ˦tɕia˥),嫁(嫁不掉ka˥pəʔ˦t'iɔ·ɪ,嫁娶tɕia˥tɕ'y˨˩˧),虾(虾儿xa˩ə.ɪ re.ɪ,虾仁ɕia˩zəŋ˥),蛤(蛤蟆xa˥ma˨˩˧,ɕia˥ma·ɪ),下(下河xa˩xu˥,下野ɕia˥ie˨˩˧),丫(丫头a˩t'ɯ.ɪ,丫鬟ia˩k'uɛ̃.ɪ),牙(门牙 məŋ˥a˥,牙科ia˥k'u˩),芽(冒芽 mɔ˩a˥,萌芽 moŋ˥ia˥)
齐齿	加嘉 tɕia˩,贾假 tɕia˨˩˧,驾价 tɕia˥,夏厦 ɕia˩,瑕遐暇霞 ɕia˥,鸦 ia˩,衙 ia˥,雅 ia˨˩˧,讶亚 ia˥

*傢伙:傢俱、用具。如念为tɕia˩xu.ɪ,则是骂人语。

*架子。如念为tɕia˥tse·ɪ,则是"摆架子"的"架子"。

表 1.62

苏　州	南　通	泰　兴	如　皋	泰　州	扬　州	南　京	北　京
两读多齐齿少	两读多	两读和齐齿多			一般齐齿,两读少	齐齿	

表 1.63

	苏州	南通	泰兴	如皋	泰州	扬州	南京	北京
家	ka 阴平白 tɕia 阴平文	ko 阴平白 tɕia 阴平文	ka 阴平白 tɕia 阴平文	ka 阴平白 tɕia 阴平文	ka 阴平白 tɕia 阴平文	ka 阴平白 tɕia 阴平文	tɕia 阴平	tɕia 阴平
牙	ŋa 阳平白 ɦia 阳平文	ŋo 阳平白 ia 阳平文	ŋa 阳平白 ia 阳平文	ŋa 阳平白 ia 阳平文	a 阳平白 ia 阳平文	ia 阳平	ia 阳平	ia 阳平
鸦	o 阴平白 ia 阴平文	ŋo 阴平白 ia 阴平文	ua 阴平白 ia 阴平文	ia 阴平	ia 阴平	ua 阴平白 ia 阴平文	ia 阴平	ia 阴平
加	ka 阴平白 tɕia 阴平文	tɕia 阴平	tɕia 阴平	tɕia 阴平	tɕia 阴平	tɕia 阴平	tɕia 阴平	tɕia 阴平
贾	tɕia 上	tɕia 上	tɕia 上	tɕia 上	tɕia 上	tɕia 上	tɕia 上	tɕia 上

在泰州方言里，不仅“嘉驾瑕”这类表示书面语词(或其词素)的字读成齐齿，而且那些表示口语中常用词(或其词素)的字如“交假加鸦”也读成齐齿。而在苏州话里则是开齐两读。

结　语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古假、效、江、山、咸、梗、蟹七摄的开口二等牙喉音字在北京话里和许多方言里都有由开口变齐齿的倾向，这倾向在北京话里表现得比较清楚，但还有少量字特别是梗摄字仍为开口。在苏州方言里，这批字变化不是太大。如果把北京和苏州比作两极的话，宁扬方言和通泰方言的情况则介于其间。而泰州方言则介于南通、泰兴、如皋和扬州、南京之间，递变之迹很为清楚，在泰州方言里，假、效二摄字变化较快，梗、蟹两摄字则较慢。这与北京话的轨迹也颇近似。

现将外转七摄二等牙喉音字(臻无此类字)在泰州方言里的读音情况作一统计：

表 1.71

	蟹	梗	咸	山	江	效	假
开　口	21	25	10	9	8	5	2
两　读	2	1	6	2	4	4	11
齐　齿	2	6	6	8	7	13	17
总　计	25	32	22	19	19	22	30

兹将这一类字在如皋、泰州、扬州、北京四地的读音状况列表于下：

表 1.72

	如　皋	泰　州	扬　州	北　京
开口字数	96(57%)	80(47%)	46(27%)	40(24%)
两读字数	24(14%)	30(18%)	24(14%)	1(不足 1%)

续　表

	如　皋	泰　州	扬　州	北　京
齐齿字数	49(29%)	59(35%)	99(59%)	128(76%)
共　　计	169	169	169	169

（二）麻韵开口三等字的衍变

在诸家对汉语中古音的构拟中，一般都把麻韵主元音构拟为低元音 a，麻韵三等字则有介音 i。麻韵三等的精、清、从、心、邪、知、以七母字在普通话里都变成-ie(或 ie)，现代泰州话有的仍保存-ia(或 ia、a 音)，有的则兼具(或只有)-ie(或 ie)，少数是-i、e。而-ie、ie、-i、e 只出现在书面语词儿里。

表 2.1

	精组、知母、以母字
口语音	斜 tɕʻia˥，卸 ɕia˥，耶椰 ia˩
两　　读	邪(邪气tɕʻia˥tɕʻi˥，正邪 tsəŋ˥ɕie˥)，爹(tia˩，ti˩)，姐(姐姐tɕia˨˩˧ tɕia˧，小姐 ɕiɔ˨˩˧tɕi˨˩˧)，借(借东西tɕia˥ toŋ˩ɕi˨，借贷tɕie˥ te˥)，谢*(花谢了 xua˩tɕʻia˩nə˨，谢谢ɕia˩ɕia˨，谢恩ɕie˥ əŋ˩)，些(一些 iɪʔ˦ɕia˧，iɪʔ˦ɕi˥)，写(写字ɕia˨˩˧tsʻɿ˩，书写 su˩ɕie˨˩˧)，泻(ɕia˥，一泻千里 iɪʔ˦ɕie˥tɕʻi i˩ni˨˩˧)，爷(爷爷ia˩ia˨，ia˥ia˧，爷娘i˥ niaŋ˥)，夜(夜里ia˩ni˨，夜色ie˥səʔ˦，e˥səʔ˦)，也(也来了a˨˩˧˦ ne˥ nɔ˧，之乎者也 tsɿ˩fu˩tse˨˩˧ie˨˩˧)，野(野处ia˨˩˧tsʻu˧，视野 sɿ˥ie˨˩˧，sɿ˥ e˨˩˧)，且(你且去 ni˨˩˧tɕʻia˨˩˧tɕʻy˥，姑且 ku˩tsʻe˨˩˧)
书面语音	嗟 tɕie˩，籍 tɕie˥，冶 ie˨˩˧

* 谢，下列例子可见异词同字，不分列条。类似现象不再赘言。

这些字在有关方言里的情况：苏州、南通-ia 或 ia。如皋、泰兴近于泰州，不少字具有两读。但有些在泰州具有二音的字，泰兴、如皋只有-ia 一音，如“写借”(据侯学超、俞源两位同窗提供)。扬州话

作-iɪ 或 iɪ,南京话作-ie 或 ie。

麻韵开口三等的章、昌、船、书、禅、日六母字在普通话里变为-ɤ。在泰州,本来是-a,但现在有些兼具-e 音或只具-e 音,而这是书面语音。

表 2.2

	章组、日母字
口语音	遮 tsa˨,蔗 tsa˨,tsa˨˧,扯 tsʻa˨˧,蛇 sa˥,赦 sa˥,惹 za˨˧
两　　读	车(火车 fu˨˧tsʻa˨, xu˨˧tsʻe˨),舍(舍不得sa˨˧pəʔ˧təʔ˦,施舍 sɿ˨ se˨˧),舍(刁家舍 tiɔ˨kə˧sa˥,宿舍 sɔʔ˦se˥)
书面语音	者 tse˨˧,奢 se˨,射社 se˥

案,1987 年胡立群同志云:"扯"只说 tsʻe˨˧,"花谢了"的"谢"说 ɕie˥。俞扬同志 1990 年指出,"社"有 sa 阴平音,专名"社学庵"(索行街南头)sa$^{\text{阴平}}$ɕiaʔ$^{\text{轻}}$ũ$^{\text{阴平}}$。

整个麻韵开口三等字的韵母主元音,泰州原为 a,后产生 e。泰州以东的方言里保存的古音多些,如皋、泰兴"车"只有 tsʻa$^{\text{阴平}}$ 一音,无论在口语词"车子"或书面语词"车辆"里。1961 年 5 月,泰州耆老,年近古稀的仲一侯先生告诉笔者:"在泰州东乡里,读书人念'南冥者,天池也'(《庄子》)这类句中的'者、也'时,是读成 tsa˨˧、ia˨˧的。这是我三十几年前在曲塘亲耳所闻,最近问姜堰人曹伯丹老先生,也是如此说法。"按,曲塘镇在海安镇之西(今属海安县),在泰州东 43 公里,姜堰东 24 公里。

泰州"爹姐些"的书面语音-i 则是受扬州话的影响的结果。现将表 2.1、表 2.2 的读音情况统计如下:

表 2.3

	如　　皋	泰　　州	扬　　州
口语音字数	13(39.5%)	10(30%)	3(9%)

续　表

	如　皋	泰　州	扬　州
两读字数	13(39.5%)	16(49%)	4(12%)
书面语音字数	7(21%)	7(21%)	26(79%)
总　计	33	33	33

（三）古邪、心、崇、禅母字的读音

船、禅，从、邪这两对声母在古汉语里的分混与古音构拟问题，一直有争论，它们在现代方言里的演化也颇不一致。根据《概况》，在苏南吴方言里，不但“从邪澄崇船禅”六母变为塞擦音还是摩擦音，瞀乱纠结，无规则可寻，甚至“心书日”母今音亦有歧异。如心母，今音该变为清擦音，可是“搔”，在苏州、无锡、常熟、常州、海门、上海、嘉定、松江八点皆为 ts。“鼠”，书母字，上述八点中除松江外皆为清塞擦音。“蕊”，日母字，常熟、海门是 dz。“柔”，日母字，常熟为 dʐ，常州、海门为 dz，皆为浊塞擦音。普通话尚有规律，基本情况是：古崇母今平声为 tʂʻ，仄声 tʂ、ʂ 不定。古船、禅母今平声 tʂʻ、ʂ 不定，仄声为 ʂ（“植殖”为 tʂ）。从、邪母规则得多，从母今平声为 tsʻ或 tɕʻ，仄声为 ts 或 tɕ。邪母今皆为 s 或 ɕ（但“辞词”为 tsʻ，“囚”为 tɕʻ）。至于“瑞”（禅母）ʐ、“赐”（心母）tsʻ则是个别情况。

泰州方言的情况近于普通话，但也有异处：

邪：斜 tɕʻia˥，徐 tɕʻy˥，祥详 tɕʻiaŋ˥

船：剩 tsʻəŋ˥

禅：纯莼醇 suəŋ˥，尝偿 saŋ˥

书：暑黍鼠 tsʻu˧˥

但是还有些字两读，其书面语音的声母在音值或音类上都跟普通话相同。

表 3

	泰　州　话	北京话
邪	邪（邪气tɕʻia˥tɕʻi˥，左道邪门 tsu˧˥tɔ˥ɕie˥mən˥）	ɕie 阳平
	谢（花谢了 xua˩tɕʻia˩nə˨，林花谢了春红* niŋ˥xua˩ɕie˥niɔ˧˥tsʻuəŋ˩xoŋ˥）	ɕie 去
	巳（辰巳午未 tsʻəŋ˥tsʻɿ˩vu˧˥vəi˩，tsʻəŋ˥sɿ˥vu˧˥vəi˥）	sɿ 去
	寺（光孝寺 kuaŋ˩ɕiɔ˥tsʻɿ˧˥，寺庙sɿ˥miɔ˥）	sɿ 去
	嗣（承嗣 tsʻəŋ˥tsʻɿ˥，宗嗣 tsoŋ˩sɿ˥）	sɿ 去
	随（随你tsʻuəi˥ni˧˥，随和suəi˥xu˥）	suei 阳平
	寻（躲躲寻寻* tu˧˥tu˧ tɕʻiŋ˥tɕʻiŋ˧，寻钱* tɕʻiŋ˥tɕʻiĩ˥；寻找ɕyŋ˥tsɔ˧˥）	ɕyn 阳平
	像（tɕʻiaŋ˩，ɕiaŋ˥）	ɕiaŋ 去
	席（席子tɕʻiɪʔ˥tse˧，玉席y˥ɕiɪʔ˥）	ɕi 阳平
心	塞（塞子tsəʔ˦tse˧，塞起来tsəʔ˦tɕʻi˧ne˨；堵塞 tu˧˥səʔ˦）	sɤ 去
崇	馋（馋猫儿sɛ̃˥mɔ˥ə˧re˧，眼馋ɛ̃˧˥tsʻɛ̃˥）	tʂʻan 阳平
	铡（铡刀sɛʔ˥tɔ˩，tsʻɛʔ˥tɔ˩）	tʂa 阳平
	柿（柿饼tsʻɿ˩piŋ˧˥，柿子sɿ˩tse˨）	ʂɿ 去
禅	垂（垂suɔi˥，垂直tsʻuəi˥ tsəʔ˩）	tʂʻuei 阳平
	殊（tsʻu˥，su˥）	ʂu 阴平
	侍（侍候tsʻɿ˥xɯ˧，侍从sɿ˥tsʻoŋ˥）	ʂɿ 去

* 林花谢了春红：李后主《乌夜啼》首句。　* 躲躲寻寻：捉迷藏。　* 寻钱：挣钱。

俞扬同志 1990 年指出：邪母字“穗”：ɕy阴平、tɕʻy阴平（麦穗头儿）、suəi去（读书音）。

比起泰州话来，南通话、如皋话距离北京话要远些，如“谢”，南通话 tɕʻia阳去，如皋话在“谢谢”、谢恩”里念 tɕʻia阴平，在“感谢”里音 tɕʻiɛ阴平。

（四）中古全浊声母上声字和浊声母去声字在泰州方言里的衍变

通泰方言在声调方面的特点之一是分阴阳去。兴化、如东、南通的方言有七个声调，内有阴去、阳去两独立调。而泰州、如皋、泰兴、东台等点只有六个声调。中古浊声母去声字（包括全浊声母上声字）不成独立的一调，往往读同阴平（逢今音塞音、塞擦音送气）。

而在宁扬方言，这些古浊声母去声字（包括全浊声母上声字），跟古清声母去声字变化相同，今音都读成去声（逢塞音、塞擦音不送气），这与普通话相合。

泰州方言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中古全浊声母上声字和浊声母去声字很多有两读：口语音为阴平（逢塞音、塞擦音送气），书面语音是去声（不送气）。有些字只有口语音一读，而大量字只有书面语音，兹列表于下。

表 4.1

果　摄

	全　浊　上	浊　　去
口 语 音	舵 tʻu˩，祸* xu˩	磨石～mu˩，摞 nu˩
两　　读	坐（坐下来 tsʻu˩ xa˩ ne˨，tsu˥ ɕia˥ ne˧）	饿（饿了 u˩ nɔ˨，饥饿 tɕi˩u˥），大*（大小 tʻu˩ ɕiɔ˨˩˧，大刀 ta˩ tɔ˩，大将 tɔ˥ tɕiaŋ˥）
书面语音	荷 xu˥，惰堕 tu˥	贺 xu˥，座 tsu˥，卧 u˥

* 在泰州方言里，以 u 为韵母的古晓匣母歌戈韵字如“祸荷”等字，声母为 x，但部位靠前，且摩擦强。另有些人声母变为 f。　*《广韵》个韵：大，唐佐切，循音变规律，泰州今音应为 tʻu˩。“大小”：最大的儿子。如皋话“大爹”[tʻou 阴平 tia 阴平]也是古音的保留（果摄字，如皋为-ou）。

案：1987 年胡立群同志说，他们年轻人只说“大小”为 ta˩ɕiɔ˨˩˧，不说 tʻu˩ ɕiɔ˨˩˧。

假 摄

	全浊上	浊去
口语音	夏姓 ɕia˩	夏春～ɕia˩
两读		骂(骂人ma˩ zəŋ˥,唾骂 t'u˥ma˥),谢(花谢了 xua˩tɕ'ia˩ nə˨,新陈代谢 ɕiŋ˩ts'əŋ˥ te˥ɕie˥),夜(半夜 pũ˥ia˩,子夜 tsɿ˧ie˥),下(下来xa˩ ne˨,下降ɕia˥tɕiaŋ˥)
书面语音	下低～ɕia˥,社 se˥	乍 tsa˥,讶 ia˥,藉 tɕie˥,射 se˥
其他		暇 ɕia˥

遇 摄

	全浊上	浊去
口语音	簿 p'u˩,父 fu˩,竖 su˩	芋 y˩
两读	部(一部 iɪʔ˧p'u˩,部分 pu˥ fəŋ˨),肚(肚里疼 t'u˩ni˨t'əŋ˥,大肚子 ta˩ tu˧ tse˨),杜(杜家巷 t'u˩ kɔ˨xaŋ˩,杜甫 tu˥ p'u˧)	步(一步 iɪʔ˧pũ˩,步伐pu˥ fɛʔ˧),渡(渡船t'u˩tsũ˥,过渡 ku˥tu˥),路(大路ta˩ nu˩,道路tɔ˥nu˥),露(露出来nu˩ ts'uəʔ˧ ne˨,暴露 pɔ˥nu˥),住(住家ts'u˩ka˩,居住 tɕy˧tsu˥),遇(遇到y˩ tɔ˨,奇遇 tɕ'i˥ y˥),树(大树ta˩ su˩,树建su˥ tɕi˥)
书面语音	户沪 fu˥,序叙绪 ɕy˥,苧柱 tsu˥,墅 su˥,巨拒距聚 tɕy˥	埠互护瓠附 fu˥,度镀 tu˥,怒赂 nu˥,误悟务雾 vu˥,虑滤 ny˥,箸助 tsu˥,遽具惧 tɕy˥,御禦与参～誉预喻寓裕 y˥,薯署 su˥
其他	釜腐辅 fu˧	捕 pu˧,续 sɔʔ˧

案，1987年胡立群同志云，“部”只有书面语音。“续”在“继续”里读入声，“续篇”里读ɕy˥，后者显是受普通话的影响所致。俞扬同志1990年指出：“父”可有两读，“聚宝盆”之“聚”念 tɕ'y阴平，“护短”之“护”音 u阴平，“抱不住黄瓜抱瓠子”之“瓠”音 u阴平。“箸筒儿”（筷筒）之“箸”音 ts'u阴平。

蟹 摄

	全 浊 上	浊 去
口语音	亥骇解姓 xe˩，荠 tɕi˩	袋 t'e˩，艾 e˩，癞 ne˩，例 ni˩
两 读	汇（汇钱xuəi˩ tɕi˥˧，文汇报 vəŋ˥ xuəi˥ pɔ˥），待（待人 t'e˩ zəŋ˥，对待 tuəi˥te˥），怠（懈怠 xe˩t'e˧，怠工te˥ koŋ˩），在（在tse˩，存在 ts'uəŋ˥ tse˥），弟（兄弟* ɕi oŋ˩ ti˧，弟兄ti˥ ɕioŋ˩）	碍（碍事e˩ sɿ˩，阻碍 tsu˩ e˥），卖（卖掉 me˩ t'iɔ˧，买卖 me˩ me˥），大*（大东桥 t'e˩ toŋ˩tɕ'iɔ˥，大夫te˥ fu˩），代（上代 saŋ˩ t'e˩，唐代 t'aŋ˥te˥），赖（赖ne˩，抵赖 ti˩ ne˥），害（害病xe˩ p'iŋ˩，病虫害piŋ˥ ts'oŋ xe˥），厉（厉害ni˩ xe˧，严厉 i ɪ˥ni˥）隶（隶书ni˩su˩，奴隶 nu˥ni˥），妹（妹子mi˩ tse˧，兄妹 ɕioŋ˩mi ɪ˥），外（外头ve˩ t'ɯ˧，外交ve˥ tɕiɔ˩），会（够会* kɯ˥xuəi˩，领会 niŋ˩xuəi˥），坏（坏人xue˩ zəŋ˥，破坏 p'ʊ˥xue˥），画（画画儿xua˩ xua˥ə˧ re˧，画饼充饥 xua˥ piŋ˩ts'oŋ˩tɕi˩），话（说话 suʔ˧xua˩，会话xuəi˥ xua˥），败（败子p'e˩ tse˧，败坏pe˥ xue˥）
书面语音	殆 te˥，罢 pa˥，陛倍 pi ɪ˥，罪 tsuəi˥	耐奈 ne˥，械 ke˥，迈 me˥，稗 pe˥，寨 tse˥，敝弊币毙 pi ɪ˥，励丽 ni˥，滞 ts'ɿ˥，誓逝 sɿ˥，艺呓刈诣 i˥，递 t'i˥，系係繫 ɕi˥，佩 p'i ɪ˥，昧 mi ɪ˥，队兑 tuəi˥，内累 nuəi˥，溃 k'uəi˥，绘慧惠 xuəi˥，卫 vəi˥，锐 zuəi˥，吠 fəi˥，第ti˥
其 他	蟹 xe˩	谜 mi˥

* “兄弟”指弟弟，“弟兄”指弟和兄。 * 大东桥：《广韵》泰韵：大，徒盖切。泰州地名“大东桥”、“大桥”之“大”音为 t'e˩，源于此。 * 够会，即“会不会”。

俞扬同志 1990 年指出，“受罪”之“罪”音 tɕ‘y[阴平]。

止 摄

	全 浊 上	浊 去
口 语 音	痔 ts‘ɿ˨, 市 sɿ˨, 柿 tsɿ˨ 、sɿ˨, 跪 k‘uəi˨, 婢 piĩ˨	离～开痢 ni˨, 篦 p‘i˨, 二贰 ə˨, 魏为～什么 vəi˨, 柜 k‘uəi˨
两 读	被（被单p‘i˨ tɛ̃˩，被服厂pi ĩ˧ fɔʔ˧ts‘aŋ˨˦），是（是 的 sɿ˨ tə˩，是 否 sɿ˥ fɯ˨˦），已（ts‘ɿ˨，sɿ˥）	忌（忌嘴tɕ‘i˨ tsuəi˨˦，顾忌 ku˥tɕi˥），易（易容* i˨ ioŋ˩，难易 nɛ̃˥i˥），地（地下t‘i˨ xə˩，天地t‘i ĩ˨ti˥），利（利钱ni˨ tɕ‘i ĩ˩，赢利 iŋ˥ ni˥），自（自己ts‘ɿ˨ tɕi˨˦，自动tsɿ˥toŋ˥），字（写字 ɕia˨˦ts‘ɿ˨，字体tsɿ˥ t‘i˨˦），寺（觉正寺 tɕiaʔ˧tsəŋ˥ts‘ɿ˨，寺庙sɿ˥miɔ˥），事（事情 sɿ˨ tɕ‘iŋ˩，事业sɿ˥ iɪʔ˧），位（位子vəi˨ tse˩，地位ti˥ vəi˥），味（味道vəi˨ tɔ˩，味觉vəi˥ tɕiaʔ˧），未（辰巳午未 ts‘əŋ˥ts‘ɿ˨ vu˨˦ vəi˨，未来vəi˥ ne˥），穗（ɕy˨，ɕy˥）
书面语音	氏似祀士仕俟恃sɿ˥，技妓 tɕi˥	避备 pi ĩ˥，荔吏 ni˥，义议肄异毅 i˥，媚寐 mi ĩ˥，稚 ts‘ɿ˥，治 tsɿ˥，示视嗜饲嗣侍 sɿ˥，遂隧瑞睡 suəi˥，类泪 nuəi˥，悴 ts‘uəi˥，坠 tsuəi˥，蝟胃谓 vəi˥，彙 xuəi˥
其 他		谊 i˥，鼻 p‘iɪʔ˥，饵 ə˨˦，纬伪 vəi˨˦

* 易容：即“容易”。

案，1987 年胡立群同志云：“巳忌自位未”只有书面语音，“瑞”青年人只念 zuəi˥。

效　　摄

	全　浊　上	浊　　去
口 语 音	稻 tʻɔ˩,赵 tsʻɔ˩,鲍 pʻɔ˩	帽 mɔ˩,号～数 xɔ˩,铇 pʻɔ˩,召 tsɔ˩,绕 zɔ˩,轿 tɕʻiɔ˩,尿 ɕy˩,niɔ˩
两　　读	抱(抱 pʻɔ˩,抱负 pɔ˥ fu˧),道(道士 tʻɔ˩ sɿ .ı,道教 tɔ˥ tɕiɔ˥),造(造桥 tsʻɔ˩ tɕʻiɔ˥,建造 tɕi ĩ˧ tsʻɔ˥),皂(皂壳 tsʻɔ˩ k aʔ.ı,肥皂 fəi˥ tsɔ˥)	冒(冒 mɔ˩,冒充 mɔ˥ tsʻoŋ˩),庙(大庙 ta˩ miɔ˩,寺庙 sɿ˥ miɔ˥),料(料子 niɔ˩ tse.ı,肥料 fəi˥ niɔ˥)
书面语音	浩 xɔ˥,鳔 pʻiɔ˥,兆肇 tsɔ˥	暴 pɔ˥,盗 tɔ˥,导 tʻɔ˥,傲 ɔ˥,貌 mɔ˥,效校 ɕiɔ˥,妙 miɔ˥,耀 iɔ˥,掉调 tiɔ˥,邵 sɔ˥
其　　他	绍 sɔ˥	疗 niɔ˥

案,1987 年胡立群同志云,"赵道"只有书面语音,"导"都说成tɔ˩,此音显然来自普通话。俞扬同志 1990 年指出,"赵邵"皆另有一读,"掉头"之"掉"音 tʻiɔ阴平,"旋来暴到,摸不到锅灶"之"暴"音 pʻɔ阴平。

流　　摄

	全　浊　上	浊　　去
口 语 音	闩咎 tɕʻiɯ˩	溜 niɯ˩,又 iɯ˩
两　　读	后(后头 xɯ˩ tʻɯ.ı,落后 naʔ˧ xɯ˥),舅(舅母 tɕʻɯ˩ mu.ı,舅舅 tɕiɯ˥ tɕiɯ˧),厚(厚书 xɯ˩ su˩,厚薄 xɯ˥ paʔ˧),受(受气 sɯ˩ tɕʻi˥,领受 niŋ˩˧ sɯ˥)	就(就* tɕʻiɯ˩,迁就 tɕʻi ĩ˩ tɕiɯ˥),寿(寿限 sɯ˩ xɛ̃.ı,福寿 fɔʔ˧ sɯ˥),旧(旧衣裳 tɕʻiɯ˩ i˩ saŋ.ı,旧诗 tɕiɯ˥ sɿ˩),豆(豆子 tʻɯ˩ tse.ı,目光如豆 mɔʔ˧ kuaŋ˩ zu˥ tɯ˥),漏(漏水 nɯ˩ suəi˩˧,漏斗 nɯ˥ tɯ˩˧)

续　表

	全 浊 上	浊　去
书面语音	后～妃 xɯ˥,妇负阜 fu˥,纣 tsɯ˥	戊 vu˥,茂贸 mu˥,逗荳 tɯ˥,陋 nɯ˥,候 xɯ˥,袖 ɕiɯ˥,宙骤 tsɯ˥,授售 sɯ˥,柩 tɕiɯ˥,右宥祐柚釉 iɯ˥,谬 miɯ˥
其　他		偶 ɯ˨˦,復～兴 fɔʔ˥

*就:“这件衣服只能就这块布做”,“就他一个人没来”,其中的“就”都念 tɕiɯ˩。

案,1987 年胡立群云,“寿”只有书面语音。俞扬 1990 年指出,“釉”只有阴平一读。

咸　摄

	全 浊 上	浊　去
口 语 音	簟 tʻi ĩ˩,范姓 fɛ̃˩	腌 i ĩ˩
两　读	淡(淡咸tʻɛ̃˩ xɛ̃˥,浓淡 noŋ˥ tɛ̃˥)	焰(焰火i ĩ˩ xu.ɪ,火焰 xu˨˦i ĩ˥),验(验一下 i ĩ˩ ə.ɪ tse.ɪ,检验 tɕi ĩ˨˦ i ĩ˥),陷(陷下去xɛ̃˩ xa.ɪ tɕy.ɪ,陷没 ɕiɛ̃˥ məʔ˧),念(念□* ni ĩ˩ kuʔ.ɪ,思念 sɿ˧ni ĩ˥),滥(滥用nɛ̃˩ ioŋ˩,泛滥 fɛ̃˥nɛ̃˥)
书面语音	渐 tɕi ĩ˥,範犯 fɛ̃˥,撼 xɛ̃˥	憾 xɛ̃˥,暂 tsɛ̃˥,赚 tsuɛ̃˥,艳 i ĩ˥
其　他	舰 kʻɛ̃˨˦,俭 tɕi ĩ˨˦	缆 nɛ̃˨˦,敛殓 ni ĩ˨˦,梵 fɛ̃˥

*念□:思念之意。

案,1987 年胡立群同志云,“范姓焰”只有书面语音,“验”只有口语音,“舰”音tɕi ĩ˥。

深　摄

	全　浊　上	浊　　去
口 语 音		赁 zəŋ˩
书面语音	甚葚 səŋ˥	任妊 zəŋ˥
其　　他	朕 tsəŋ˩˧	

山　摄

	全　浊　上	浊　　去
口 语 音	旱 xɛ̃˩，辫 p'iĩ˩，圈 tɕ'yʊ̃˩	汗苋 xɛ̃˩，慢 mɛ̃˩，雁 ɛ̃˩，单姓 ɕiĩ˩，麵 miĩ˩，垫 t'iĩ˩，砚 niĩ˩、iĩ˩，缎 t'ʊ̃˩，饭 fɛ̃˩
两　　读	限(期限 tɕ'i˩xɛ̃˨，限期ɕiɛ̃˥ tɕ'i˩)，件(一件 iɪʔ˧tɕ'iĩ˩，零件 niŋ˥ tɕiĩ˥)，伴(伴夜 pʊ̃˩ ia˩，伴侣 pʊ̃˥ ny˩˧)，断(断了 t'ʊ̃˩ nə˨，断续 tʊ̃˥ sɔʔ˧)	万(一万 iɪʔ˧vɛ̃˩，万紫千红vɛ̃˥ tsɿ˩˧ tɕ'iĩ˩ xoŋ˥)，蛋(鸡蛋 tɕi˩t'ɛ̃˩，蛋白质tɛ̃˥ pɔʔ˧ tsəʔ˧)，烂(腐烂 fu˩˧nɛ̃˩，灿烂 ts'ɛ̃˥nɛ̃˥)，段(一段 iɪʔ˧t'ʊ̃˩，段落tʊ̃˥ naʔ˧)，岸(岸边 ɛ̃˩ piĩ˩，彼岸 pi˩˧ɛ̃˥)，漫(水漫金山 suəi˩˧ mʊ̃˩ tɕiŋ˩sɛ̃˩，漫山遍野mɛ̃˥ sɛ̃˩piĩ˥ie˩˧)，乱(乱nʊ̃˩，治乱 tsɿ˥nʊ̃˥)，换(换钱xʊ̃˩ tɕ'iĩ˥，调换 tiɔ˥xʊ̃˥)，恋(恋家niĩ˩ ka˩，留恋niɯ˥ niĩ˥)，院(院子yʊ̃˩tse˨，院落yʊ̃˥ naʔ˧)
书面语音	诞 tɛ̃˥，辨辩 piĩ˥，践键 tɕiĩ˥，善 ɕiĩ˥，撰 tsuɛ̃˥，篆 tsʊ̃˥	但弹 tɛ̃˥，难患～nɛ̃˥，翰 xɛ̃˥，办瓣 pɛ̃˥，绽栈 tsɛ̃˥，汴便 piĩ˥，面 miĩ˥，贱健腱 tɕiĩ˥，羡膳擅现 ɕiĩ˥，谚 iĩ˥，殿电佃奠 tiĩ˥，炼练 niĩ˥，叛 pʊ̃˥，玩 ʊ̃˥，幻患宦 xuɛ̃˥，传 tsʊ̃˥，倦 tɕyʊ̃˥，愿 yʊ̃˥
其　　他	缓皖 ʊ̃˩˧	碾 niĩ˩˧

案,1987年胡立群同志云:“旱”,去声,xɛ̃˥。“善”,青年人说 sɛ̃˥。“玩具”青年人说 vɛ̃˥tɕy˥。“单姓”,有二音 ɕĩ˩、sɛ̃˥。这都是普通话的影响。他认为“万岸”只有阴平一音。俞扬1990年指出,“限”尚有 ɕiɛ̃阴平一音,“麵垫缎饭贱愿”皆有二读。

臻 摄

	全 浊 上	浊 去
口 语 音	菌 tɕyŋ˩	认 zəŋ˩,嫩 nəŋ˩,闰晕 yŋ˩
两 读	近(近得很tɕiŋ˩ təʔ˧ xəŋ˩˧,近代tɕiŋ˥te˥)	阵(阵上雨ts'əŋ˩ saŋ˧ y˩˧,龙门阵 noŋ˥ məŋ˥ tsəŋ˥),恨(恨 xəŋ˩,愤恨 fəŋ˥ xəŋ˥),闷(闷məŋ˩,苦闷 k'u˩˧məŋ˥),钝(刀钝 tɔ˩t'əŋ˩,迟钝 ts'ɿ˥təŋ˥),问(问vəŋ˩,问题vəŋ˥t'i˥),份(一份 iɪʔ˦fəŋ˩,iɪʔ˦ fəŋ˥),运(运气yŋ˩ tɕi˧,命运miŋ˥yŋ˥)
书面语音	牝 piŋ˥,尽 tɕiŋ˥,肾 səŋ˥,笨 pəŋ˥,囤沌盾 təŋ˥,愤忿 fəŋ˥,混 xuəŋ˥,xuəŋ˩˧	吝 niŋ˥,慎 səŋ˥,遁 təŋ˥,论 nuəŋ˥,殉 ɕyŋ˥,顺 suəŋ˥,郡 tɕyŋ˥,韵润 yŋ˥
其 他	很 xəŋ˩˧,浑 xuəŋ˥,窘 tɕioŋ˩˧	刃 zəŋ˩˧,仅 tɕiŋ˩˧

俞扬1990年指出:“闰”本市人念 zuəŋ阴平,“顺东西”、“顺遂”之“顺”阴平。

宕 摄

	全 浊 上	浊 去
口 语 音		浪 naŋ˩,匠 tɕiaŋ˩,忘 uaŋ˩

续 表

	全 浊 上	浊 去
两 读	像(tɕ'iaŋ˨,ɕiaŋ˥),丈(一丈 iɪʔ˦ts'aŋ˨,丈量 tsaŋ˥ niaŋ˥),上(上去 saŋ˨ tɕ'y˩,上台 saŋ˥t'e˥)	亮(亮光niaŋ˨ kuaŋ˨,明亮 miŋ˥niaŋ˥),量(量大niaŋ˨ ta˨,度量 tu˥niaŋ˥),状(告状 kɔ˥ts'uaŋ˨,状纸tsuaŋ˥ tsʅ˧),尚(尚姓saŋ˨,风尚 foŋ˨saŋ˥),上(上头saŋ˨ t'ɯ˩,上面saŋ˥ mi ĩ˥),让(让zaŋ˨,谦让 tɕ'i ĩ˨ zaŋ˥),样(样子iaŋ˨ tse˩,榜样paŋ˧ iaŋ˥),望(望见 uaŋ˨ tɕi ĩ˩,展望 tɕi ĩ˧ uaŋ˥)
读书音	荡 taŋ˥,象 ɕiaŋ˥,仗杖 tsaŋ˥	傍 paŋ˥,宕 taŋ˥,藏西~脏 tsaŋ˥,酿谅 niaŋ˥,向 ɕiaŋ˥,妄旺 uaŋ˥,恙 iaŋ˥
其 他	强勉~tɕ'iaŋ˧	辆 niaŋ˧

案,1987 年胡立群同志云,“像、让”只阴平一读,“告状”之“状”去声。俞扬 1990 年指出,“荡宕”皆二读。

江 摄

	全 浊 上	浊 去
口语音		撞 ts'uaŋ˨,巷 xaŋ˨
两 读	棒(槌棒 ts'uəi˥p'aŋ˨,棒球 paŋ˥ tɕ'iɯ˥),项(项圈 xaŋ˨ tɕ'yʊ̃˨,项目 xaŋ˥ mɔʔ˦)	
书面语音	蚌 paŋ˥	

案,1987 年胡立群同志云,“项目”之项,另有 ɕiaŋ˥音。

曾　摄

	全　浊　上	浊　　去
口 语 音		赠 tsəŋ˩,瞪 təŋ˩
书面语音		邓 təŋ˥,剩 ts'əŋ˥,兴 ɕiŋ˥,孕 yŋ˥

俞扬 1990 年指出,有些老年人念"邓"为阴平。

梗　摄

	全　浊　上	浊　　去
口 语 音		硬 əŋ˩
两　　读	杏(杏树ɕiŋ˩ su˩,杏花村ɕiŋ˥ xua˩ tsuəŋ˩)	病(害病xe˩p'iŋ˩,病痛piŋ˥ t'oŋ˥),命(命好miŋ˩ xɔ˧,命运 miŋ˥ yŋ˥),定(定做t'iŋ˩tsu˥,预定 y˥tiŋ˥)
书面语音	幸 ɕiŋ˥,静 tɕiŋ˥,并 piŋ˥	孟 moŋ˥,行 ɕiŋ˥,竞净 tɕiŋ˥,令另 niŋ˥,郑 tsəŋ˥,盛 səŋ˥,锭 tiŋ˥
其　　他	艇挺 t'iŋ˧,迥 tɕioŋ˧	横 oŋ˥,泳咏 yŋ˧

俞扬 1990 年指出,有些老年人今"郑姓"为阴平,"幸亏"之"幸"、"纸锭"之"锭"皆为阴平。

通　摄

	全　浊　上	浊　　去
口 语 音		哄 xoŋ˩,缝 foŋ˩

续 表

	全 浊 上	浊 去
两 读	动(动身t'oŋ˩ səŋ˩,运动 yŋ˥toŋ˥),重(重ts'oŋ˩,重量tsoŋ˥ niaŋ˥)	洞(漏洞nɯ˩t'oŋ˩,洞府toŋ˥ fu˩˧),梦(梦moŋ˩,红楼梦 xoŋ˥nɯ˥moŋ˥),仲(仲姓ts'oŋ˩,伯仲 pɔʔ˦tsoŋ˩),用(用ioŋ˩,使用sɿ˩˧ioŋ˥),弄(弄noŋ˩,弄臣noŋ˥ts'əŋ˥)
书面语音	奉 foŋ˥	凤俸 foŋ˥,送诵颂讼 soŋ˥,共 koŋ˥
其 他	汞 koŋ˩˧	

本节所列古全浊声母上声字和浊声母去声字共523字,除去第四项(即“其他”一项)外,计482字,其前三项的读音情况如下表:

表 4.2

	字 数	百分比
口 语 音	75	15%
两 读	119	25%
书面语音	288	60%
总 计	482	100%

笔者曾将本节所列数百字请泰兴、如皋、东台三地的同志念过,发现这三地,尤其是泰兴、如皋,古全浊声母上声字和浊声母去声字念作阴平或具有阴平一音(逢塞音,塞擦音送气)的比泰州要多,而念作去声或具去声一音(逢塞音、塞擦音不送气)的均较泰州为少。

从比较中可知,泰州、如皋、泰兴等地的方言,古全浊上与浊去原是混同于阴平(逢塞音、塞擦音送气)的,后来逐渐地变成去声(即合并于清去),现在正是这过渡时期。较早层次,即混同于阴平的,我们称之为口语音;较晚层次,即合并于去声的,我们称之为书面语音,书面语词、成语或读古文多用书面语音。其所以如此,当是受民族共同语影响的结果,在有关方言中泰州方言向普通话集中靠拢的倾向最为明显。

还要指出一点,上列诸表的"其他"一项读音中很多与普通话一致,或是与普通话同步发展的结果,或是受普通话影响所致。

(五) 中古浊声母入声字在泰州方言里的变化

泰州方言的入声所表现出来的若干现象也很能体现向普通话集中靠拢的趋势。

本节只谈入声的调类问题。通泰方言分阴阳入,古浊声母入声字一般变为阳入(今音逢塞音、塞擦音送气),而宁扬方言古清入和古浊入统变为今入声(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不送气),这是二者的重大歧异之一。

在泰州话里,浊入有些只有阳入一读,不少则既有阳入一读,又有阴入一读(声母方面,逢塞音、塞擦音也改为不送气),前者为口语音,后者为书面语音。有大量的浊入字如今只有书面语音即阴入一读。

表 5.1

咸入	口语音	盒盍 xuʔ˥,蜡 nɛʔ˥,闸 ts'ɛʔ˥,炸油~sɛʔ˥,镊 niɪʔ˥
	两读	合(合不来xuʔ˥ pəʔ˧ ne˥,适合 səʔ˦xuʔ˦,合伙kuʔ˦ xu˨˩˧,合作xuʔ˦tsaʔ˦),腊(腊八nɛʔ˥ pɛʔ˦,腊梅nɛʔ˦ mi ĩ˥),狭(狭xɛʔ˥,狭小ɕiɛʔ˦ ɕiɔ˨˩˧),匣(匣子xɛʔ˥ tse˧,宝匣 pɔ˨˩˧ɕiɛʔ˥),叶(树叶子 su˨˩iɪʔ˥ tse˧,枝叶 tsɿ˨˩iɪʔ˦),乏(布乏了 pu˥fɛʔ˥ kə˧ nə˧,疲乏 pi˥fɛʔ˦)
	书面语音	纳 nɛʔ˦,杂 tsɛʔ˦,峡侠 ɕiɛʔ˦,挟 kɛʔ˦,洽 tɕ'iaʔ˦,聂猎 niɪʔ˦,捷 tɕiɪʔ˦,涉胁协 ɕiɪʔ˦,业 iɪʔ˦,叠 tiɪʔ˦,牒蝶谍 t'iɪʔ˦
山入	口语音	瘌 nɛʔ˥,铡 ts'ɛʔ˥, sɛʔ˥,舌 ɕiɪʔ˥,热 iɪʔ˥,篾 miɪʔ˥,捏 niɪʔ˥,抹 mɛʔ˥,捋 nʊʔ˥,滑猾 xuɛʔ˥,罚 fɛʔ˥,袜 vɛʔ˥,拔 p'ɛʔ˥
	两读	捺(捺nɛʔ˥,按捺ɛ̃˥nɛʔ˦),裂(裂niɪʔ˥,分裂 fəŋ˨˩niɪʔ˦),末(末子mʊʔ˥ tse˧,细末 ɕi˥mʊʔ˦),夺(夺t'ʊʔ˥,抢夺 tɕ'iaŋ˨˩˧ tʊʔ˦),活(死活 sɿ˨˩˧ xʊʔ˥,生活 səŋ˨˩xʊʔ˦),劣(劣等niɪʔ˥ təŋ˨˩˧,优劣 iɯ˨˩niɪʔ˦),绝(绝后代tɕ'yʊʔ˥ xɯ˥t'e˨˩,断绝 tʊ˥ tɕyʊʔ˦),月(坐月子 ts'u˨˩yʊʔ˥tse˧,年月 ni ĩ˥yʊʔ˦),越(yʊʔ˥,yʊʔ˦)

续 表

	书面语音	达 tɛʔ˧,辣 nɛʔ˧,曷 xuʔ˧,辖 xɛʔ˧,别离～piɪʔ˧,灭 miɪʔ˧,列孽 niɪʔ˧,截辙 tɕ'iɪʔ˧,折杰竭 tɕiɪʔ˧,迭跌 tiɪʔ˧,钹 p'uʔ˧,跋 p'ɛʔ˧,沫 muʔ˧,悦阅粤曰 yuʔ˧,伐筏 fɛʔ˧,掘 tɕ'yə˧,穴 ɕyəʔ˧,ɕyuʔ˧
深入	口 语 音	十拾 səʔ˥
	两 读	立(立春niɪ˥ ts'uəŋ˩,立正niɪʔ˧ tsəŋ˥),习(习一下ɕiɪʔ˥ kəʔ˦ tse·˩,学习ɕiaʔ˥ɕiɪʔ˧)
	书面语音	粒 niɪʔ˧,集及 tɕiɪʔ˧,辑 tɕ'iɪʔ˧,袭 ɕiɪʔ˧,入 yəʔ˧,yuʔ˧
臻入	口语音	蜜 miɪʔ˥,侄 tɕ'iɪʔ˥,核～子 xuəʔ˥,佛 fəʔ˥
	两 读	栗(栗子niɪʔ˥ tse˦,栗姓niɪʔ˧),实(实在səʔ˥ tse˥,确实 tɕ'iaʔ˧səʔ˧),日(日子zəʔ˥ tse˦,一日 iɪʔ˧zəʔ˧),没(没得məʔ˥təʔ˧,沉没 ts'əŋ˥məʔ˧)
	书面语音	弼 piɪʔ˧,密 miɪʔ˧,暱律率 niɪʔ˧,疾 tɕiɪʔ˧,秩 ts'əʔ˧,逸 iɪʔ˧,勃脖p'əʔ˧,突 t'əʔ˧,术述 ɕyəʔ˧,物勿 vəʔ˧,掘倔 tɕ'yəʔ˧
宕入	口 语 音	摸 maʔ˥,凿 ts'aʔ˥,嚼 tɕ'iaʔ˥,疟 niaʔ˥,钥 iaʔ˥
	两 读	膜(膜子maʔ˥ tse˦,肋膜炎nəʔ˧ maʔ˧ iɪ̃˥),药(中药 tsoŋ˩ iaʔ˥,云南白药 yŋ˥nɛ̃˥pɔʔ˧ iaʔ˧),薄(薄粥p'aʔ˥ tsɔʔ˧,薄膜paʔ˧ maʔ˧),踱(踱踱t'aʔ˥ t'aʔ˦,踱方步taʔ˧ faŋ˩pu˥),落(落雨naʔ˥ y˩˧,降落 tɕiaŋ˥naʔ˧),烙(烙铁naʔ˥ t'iɪʔ˥,烙印naʔ˧ iŋ˥),昨(昨□子* ts'aʔ˥ kəʔ˦tse·˩,昨天ts'aʔ˧ t'iɪ̃˩),着(火着了 xu˩˧ts'aʔ˥ kə˦nə·˩,附着 fu˥tsaʔ˧),勺(勺子saʔ˥ tse˦,铜勺 t'oŋ˥saʔ˧)
	书面语音	莫幕寞 maʔ˧,泊 p'aʔ˧,度揣～taʔ˧,铎 t'aʔ˧,骆酪洛络乐naʔ˧,鄂鳄 aʔ˧,略掠虐 niaʔ˧,芍 saʔ˧,若弱 zaʔ˧,跃 iaʔ˧,缚faʔ˧,鹤 xaʔ˧
江入	口 语 音	镯 ts'uaʔ˥,tɕ'yaʔ˥,学 xaʔ˥,ɕiaʔ˥
	书面语音	雹 p'aʔ˧,浊濯 tɕyaʔ˧,狱岳乐 iaʔ˧

续 表

曾入	口语音	贼ts'əʔ˥
	两读	默(默写mɔʔ˥ɕie˩˧,默哀 mɔʔ˧ e˩),特(特地t'əʔ˥ t'i˧,特别t'əʔ˧ piɪʔ˧),肋(肋骨nəʔ˥ kuəʔ˧,肋木nəʔ˧ mɔʔ˧),勒(勒nəʔ˥,勒索nəʔ˧ saʔ˧),力(力气niɪʔ˥ tɕ'i˧,力量niɪʔ˧ niaŋ˥),直(笔直 piɪʔ˧ts'əʔ˥,曲直 tɕ'iɔʔ˧tsəʔ˧),值(值钱ts'əʔ˥ tɕ'i ĩ˥,价值 tɕia˥tsəʔ˧),食(鸡食 tɕi˩ səʔ˥,食品səʔ˧ p'iŋ˩˧)
	书面读音	墨 mɔʔ˧,匿 niɪʔ˧,殖植 tsəʔ˧,极 tɕiɪʔ˧,弋翼 iɪʔ˧,域 yəʔ˧、yʊʔ˧,或惑 xɔʔ˧,蚀 səʔ˧
梗入	口语音	麦 mɔʔ˥
	两读	白(白p'ɔʔ˧,洁白 tɕiɪʔ˧pɔʔ˥),额(额角əʔ˥ kaʔ˧,额手相应əʔ˧ sɯ˩˧ ɕiaŋ˩ tɕ'iŋ˥),脉(把脉 pa˩˧mɔʔ˥,脉络mɔʔ˧ naʔ˧),逆(忤逆 vu˩˧niɪʔ˥,逆定理niɪʔ˧ tiŋ˥ni˩˧),席(一席酒 iɪʔ˧ ɕiɪʔ˥ tɕiɯ˩˧,就席 tɕiɯ˥ɕiɪʔ˧),石(石头səʔ˥ t'ɯ˧,王安石uaŋ˥ɛ̃˩səʔ˧),笛(笛子t'iɪʔ˥ tse˧,羌笛 tɕ'iaŋ˩tiɪʔ˧),核(核实xəʔ˥səʔ˧, xəʔ˧ səʔ˧)
	书面语音	帛 p'ɔʔ˧,泽择宅 tseʔ˧,寂籍藉狼~剧 tɕiɪʔ˧,辟 piɪʔ˧,夕 ɕiɪʔ˧,掷 tsəʔ˧,硕 saʔ˧,亦译 iɪʔ˧,觅 miɪʔ˧,敌狄籴 tiɪʔ˧,曆歷 niɪ ʔ˧,虢 kuəʔ˧,获 xɔʔ˧,劃 xɔʔ˧,xua˥,疫役 yəʔ˧、yʊʔ˧
通入	口语音	斛 xɔʔ˥,六 nɔʔ˥,轴 ts'ɔ˥,熟赎 sɔʔ˥,肉 zɔʔ˥、zɯ˥,褥 zɔʔ˥
	两读	木(木头mɔʔ˥ t'ɯ˧,树木su˩ mɔʔ˧),读(读书址* t'ɔʔ˥ su˩ tsɿ˩˧,读书tɔʔ˧ su˩),族(族长ts'ɔʔ˥ tsaŋ˩˧,汉族 xɛ̃˥ts'ɔʔ˧),毒(毒蛇t'ɔʔ˥ sa˥,毒瓦斯tɔʔ˧ ua˩˧sɿ˩),独(吃独食 ts'əʔ˧t'ɔʔ˥ səʔ˥,单独 t ɛ̃˩tɔʔ˧),服(服输fɔʔ˥ su˩,信服 ɕiŋ˥fɔʔ˧),伏(伏在地下fɔʔ˥ kə˧t'i˩ xɔ˩,埋伏 me˥fɔʔ˧),穆(穆姓mɔʔ˥,肃穆 sɔʔ˧mɔʔ˧),陆(陆姓nɔʔ˥,大陆ta˥ nɔʔ˧),绿(绿nɔʔ˥,绿杨nɔʔ˧ iaŋ˥)
	书面语音	仆 p'ɔʔ˧,沐目牧 mɔʔ˧,牍 tɔʔ˧,鹿禄录戮 nɔʔ˧,復 fɔ˧,逐 tsɔʔ˧,淑俗续蜀属 sɔʔ˧,育狱欲慾浴玉 iɔʔ˧,辱 zɔʔ˧,局 tɕiɔʔ˧

* 昨□子:口语,即"昨日"。 * 读书址:地名,在泰州东北 40 余华里,溱潼西 7 华里。

案,1987 年胡立群同志云,"蜡"有二音:"蜡烛"nɛʔ˥ tsɔʔ˧, "打蜡" ta˨˩˧nɛʔ˧。"夺穆席"只有阴入一音,"剧"只读tɕy˧[去声],"玉"有y˨˩[阴平]、y˧[去声]二音等等。俞扬同志 1990 年指出,"纳鞋底"之"纳"、"夏家泊"之"泊"、"戴家泽"之"泽"、"择菜"之"择"、"还俗"之"俗"、"欲不着"之"欲"都是阳入,"麦芽糖"之"麦"阴入。

古全浊入声在今泰州话里的读音情况如下:

表 5.2

	字　数	百　分　比
口 语 音	41	16%
两　读	55	22%
书面语音	154	62%
总　计	250	100%

可以看出,泰州方言两个入声归并为一的趋势非常明显,这样就向普通话靠近了一步。

再列一张有关方言的声调对照表:

表 5.3

古调类 / 今调类 古声母 / 今方言	平		上			去		入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浊	清	清	次浊	全浊
苏　州	阴平	阳平	上	阳去			阴去	阴入	阳　入	
南　通	阴平	阳平	上		阳去		阴去	阴入	阳　入	
泰　兴	阴平	阳平	上		阴平多,去声和两读少		去	阴入	阳入多,阴入和两读少	
如　皋	阴平	阳平	上		阴平多,去声和两读少		去	阴入	阳入多,阴入和两读少	
泰　州	阴平	阳平	上		15%阴平,25%两读,60%去		去	阴入	16%阳入,22%两读,62%阴入	

续 表

古调类 / 古声母 / 今调类 / 今方言	平		上			去		入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浊	清	清	次浊	全浊
扬　州	阴平	阳平	上		去			入		
南　京	阴平	阳平	上		去			入		
北　京	阴平	阳平	上		去			阴阳上去	去	阳平

显然,在泰州方言的较早阶段,一定跟其他通泰方言一样,古全浊声母无论什么声调,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一律送气。后来古浊声母仄声字逢塞音、塞擦音变为不送气,声调也相应地改变,主要出现于书面语音中。可是也有些字声调变同书面语音,但声母仍为送气。例如"递 t'i˧"、"稚 ts'ɿ˧"、"截 tɕ'iɪʔ˦"、"族 ts'ɔʔ˦"、"跋 p'ɛʔ˦"等等。这种错乱现象可能是受了原来口语音影响的缘故。

(六)古止蟹两摄重唇音字的分化

古止摄重唇音字、蟹摄重唇音字(二等韵除外)在普通话里或-i或-ei,很不一定。在泰州方言里或-i或-iĩ,令人注目的是有些字在口语词读-i,在书面语词里读-iĩ,而这些字在普通话里正好都是读-ei的。

下面除了列举这些两读字的,也将-i和-iĩ两类字列出。

表 6

	-i	两　读	-iĩ
支韵	彼 pi˨˦,披 p'i˨,皮疲脾 p'i˧,弥靡糜 mi˧	被(被单 pi˨ tɛ̃˩,被服厂 piĩ˧ fɔʔ˦ ts'aŋ˨˦)	碑卑裨婢 piĩ˨,臂避 piĩ˧,譬 p'iĩ˧
脂韵	鄙比 pi˨˦,秘泌 pi˧,篦 p'i˨,琵痹 p'i˧,丕庇 p'i˨˦,屁 p'i˧	眉(眉毛 mi˧ mɔ˧,眉宇 miĩ˧ y˨˦),美(美国 mi˨˦ kɔʔ˦,miĩ˨˦ kɔʔ˦)	悲 piĩ˨,备 piĩ˧,楣霉 miĩ˧,媚寐 miĩ˧

续 表

	-i	两　　读	-iĩ
灰韵	坯 pʻi˩，裴 pʻi˥，胚pʻi˨˩，媒 mi˥	陪（陪 pʻi˥，陪衬 pʻiĩ˥ tsʻuəŋ˥），赔（赔钱 pʻi˥ tɕʻiĩ，赔偿pʻiĩ˥ saŋ˥），配（pʻi˧，配 给 pʻiĩ˧ tɕiɪʔ˧），煤（mi˥，miĩ˥），妹（妹子 mi˩ tseɹ，兄妹 ɕioŋ˩miĩ˧）	杯 piĩ˩，背倍辈 piĩ˧，培 pʻiĩ˥，佩 pʻiĩ˥，梅枚玫 miĩ˥，每 miĩ˨˩，昧 miĩ˧
泰韵			贝 piĩ˧，沛 pʻiĩ˧
祭韵			蔽敝弊币毙 piĩ˧
齐韵	批 pʻi˩，迷谜 mi˥，米 mi˨˩		闭陛 piĩ˧

案，1987 年胡立群同志读“蔽敝弊币毙”五字为 pi˧。俞扬 1990 年指出“楣背梅闭”皆有两读。

这类字的韵母兼具 iĩ 和只具 iĩ，表示在音类上和 i 韵母有了区分；iĩ 是复元音，在听感上也与单元音 i 有较大差异，这都是近于普通话之处。

（七）“新派”、“老派”在覃、谈、寒韵牙喉音字和覃韵部分舌齿音字的歧异

在泰州方言里这批字的韵母，“老派”是 ʊ̃，“新派”是 ɛ̃。“老派”和“新派”大致以三十岁为分界。“新派”只在个别口语词里还沿袭旧音，而“老派”阵营在分化中，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已改变或正在改变中。这项音变在近三四十年间进行得相当迅速，已接近完成了。

在通泰方言和吴方言，中古覃谈寒韵的字可分为两组：三韵的牙喉音字和覃韵的舌齿音字为 A 组，谈寒韵的舌齿音字为 B 组，A、B 两组今音韵母不同，泰州“老派”亦然。A 组为 ʊ̃，B 组为 ɛ̃，如此就使 A 组和桓韵字相混，“庵”（覃韵）=“安”（寒韵）=“豌”（桓韵），而“新

派”，A组和B组相同，别于桓韵，正与普通话相合。

现将有关方言情况列表于下：

表 7.1

	A组	B组	桓韵
苏　　州	ø	ᴇ	牙喉音 uø 舌齿音 ø
南　　通	ʊ̃(覃韵舌齿音字多为 ỹ)	ɑ̃	牙喉音 ʊ̃ 舌齿音 ỹ
泰　　兴	ʊ̃	舌音 ɛ̃，齿音 iɛ̃	ʊ̃
如　　皋	ʊ̃	ẽ	ʊ̃
泰州老派	ʊ̃	ɛ̃	ʊ̃
泰州新派	ɛ̃	ɛ̃	ʊ̃
扬　　州	æ̃	æ̃	õ
南　　京	ɑ̃	ɑ̃	uɑ̃
北　　京	an	an	uan

从表可见，各方言的韵母音值由南而北，由东而西逐步向普通话接近，如桓韵的韵母在泰州新派和扬州还是一个与覃谈寒韵异趋的 ʊ̃ 和 õ，南京则是覃谈寒韵的合口，跟普通话更显得一致了。

覃韵舌齿音字，《方言调查字表》所列十二字中，“南男蚕簪”新派老派读法不同，“潭谭耽贪婪参惨探”八字两派皆作 ɛ̃。各方言对这些字的读音也不尽相同。

表 7.2

	谭	贪	探	南	男	蚕	参	惨
苏　　州	ᴇ	ø	ø	ø	ø	ø	ø	ø
南　　通	ɑ̃	ỹ	ỹ	ỹ	ỹ	ỹ	ɑ̃	ỹ
泰　　兴	ɛ̃	ʊ̃	ʊ̃	ʊ̃	ʊ̃	ʊ̃	ɛ̃	ʊ̃

续　表

	谭	贪	探	南	男	蚕	参	惨
如　皋	ẽ	ʊ̃	ʊ̃	ʊ̃ ẽ	ʊ̃ ẽ	ʊ̃ *	ẽ	ʊ̃
姜　堰	ɛ̃	ʊ̃ * ɛ̃	ɛ̃	ʊ̃ ɛ̃	ʊ̃ ɛ̃	ʊ̃ ɛ̃	ɛ̃	ɛ̃
泰　州	ɛ̃	ɛ̃	ɛ̃	ʊ̃ ɛ̃	ʊ̃ ɛ̃	ʊ̃ ɛ̃	ɛ̃	ɛ̃
扬　州	æ̃	æ̃	æ̃	æ̃	æ̃	æ̃	æ̃	æ̃
南　京	ɑ̃	ɑ̃	ɑ̃	ɑ̃	ɑ̃	ɑ̃	ɑ̃	ɑ̃
北　京	an	an	an	an	an	an	an	an

* "蚕",《概况》等 372 页载如皋话有二音,然据魏建功师和俞源同志云,在"蚕儿"与"蚕食鲸吞"里,"蚕"只有一音。　　* 姜堰"贪"二音中,tɛ̃˩ 较常见。

递变痕迹昭然,姜堰介于如皋、泰州之间,泰州新派、老派只在少数字上有分歧。对新派而言,覃韵舌齿音字与谈寒韵完全一致,跟宁扬方言与普通话一样。

(八) 支、脂、之韵开口日母字由 zɿ 变 ə

支、脂、之三韵开口日母字"儿、尔、二、贰、而、耳、饵"等,据老年人说,泰州原都念 zɿ,"耳朵"[zɿ˨˦ tɔ˧]、"儿子"[zɿ˥tse˧],后来这些字都变成了 ə。这个新音位的增加大约是一百年间的事儿。年近古稀的仲一侯先生说,他曾亲自听他祖父谈及、读及。大概 zɿ 音在城里"退却"以后,在附近乡镇还保存,所以有些老先生说,他们曾听到过邻镇(如北边的港口镇)的长辈说过。在五十年前,泰州的一些劳动人民如挑箩工人还说"十二"为 si˩zɿ˩。

外地人(主要是宁扬方言区的人)根据泰州话语音的一些异于宁扬方言的特点(这些多是口语音特点的反映,可以说,也基本上代表了如皋、泰兴方音的特点)编了几句话嘲笑泰州人,这几句话是:

泰州有个南[nʊ̃˥]门,南[nʊ̃˥]门有个高桥,高桥底下有个洞[t'oŋ˩],洞[t'oŋ˩]里头有条蛇[sa˥],蛇[sa˥]有二丈[zɿ˩ts'aŋ˩]二[zɿ˩]

尺二[zɿ˩]寸长。

按,夏绍侯《耐庵丛著》二集之七《吴陵野纪》"扬人讥泰音"条亦述此事,但"有个洞"作"有个坛(音 t'ʊ̃˥)子"。而 1987 年询问胡立群同学,他不知有此语。俞扬 1990 年说,听一老人云,下面还有两句:"嘴[tɕy˨˩]一奓[tsa˩],要吃[ts'əʔ˦]人[zəŋ˥]。"

(九)泰州方言入声字的喉塞收音在萎缩中

泰州方言有两个入声,阳入趋向并入阴入,前已详论。

关于泰州方言入声,还有若干值得重视的现象。

1. 喉塞音尾 ʔ 在萎缩中。我在 1959 年的调查情况是,老年人都有明显的喉塞收音,青年人不及老年人那么清楚、明朗,还有一些青年人(主要是高中学生)只是喉头带点紧张,少数人甚至失落喉塞收音,阳入近似于阳平,只是音程稍短些,但是当这些入声字跟其后的字连读时,喉塞收音又出现了。泰州方言有轻声调,入声字处于轻声地位时,喉塞音自然不太明显。如"勤力"[tɕ'iŋ˥niɪʔ˧]、"麻木"[ma˥mɔʔ˧]、"踱踱"[t'aʔ˥t'aʔ˧]、"诸葛亮"[tsu˩kuʔ˨niaŋ˥]、"吃不掉"[ts'əʔ˦pəʔ˨t'iɔ˩]。

2. 在泰州方言里,如果一个阳入音节后紧跟一个以 m、n、v、z 或零声母起头的音节,则调类往往由阳入变成阴平,喉塞音尾模胡。举例如下,且以不变的字音作对照:

熟人熟事[sɔʔ˩zəŋ˥sɔʔ˥sɿ˩],熟老菱[sɔʔ˩nɔ˨˩niŋ˥];熟菜[sɔʔ˥ts'e˥]

石人石马[səʔ˩zəŋ˥səʔ˩ma˨˩],石榴[səʔ˩niɯ˥],石人头巷[səʔ˩zəŋ˥t'ɯ˥xaŋ˩];石头[səʔ˥t'ɯ˨]

白沫[p'ɔʔ˩mu˨˩],白毛[p'ɔʔ˩mɔ˥]),白马庙[p'ɔʔ˩ma˩miɔ˩](地名),白米[p'ɔʔ˩mi˨˩](地名),白面儿[p'ɔʔ˩mĩɪ˥ə˨re˨](毒品海洛因);白板[p'ɔʔ˥pɛ̃˨˩]

腊月[nɛʔ˩yʊʔ˩];腊八[nɛʔ˥pɛʔ˩]

十一[səʔ˩iɪʔ˦],十二[səʔ˩ə˩],十五[səʔ˩vu˨˩],十六[səʔ˩nɔʔ˥];但"十三、十四、十七、十八、十九"中的"十"调值仍为45,十年[səʔ˩niɪ˥],十月[səʔ˩yuʔ˩]。

六一年[nɔʔ˩iɪʔ˧ni ĩ˥]，六二年[nɔʔ˩ə˩ni ĩ˥]，六五年[nɔʔ˩vu˩ni ĩ˥]，六六年[nɔʔ˩nɔʔ˩ni ĩ˥]；但“六三年、六四年、六七年、六八年、六九年”中的“六”调值仍为45。

毒药[t'ɔʔ˩iaʔ˥]；毒蛇[t'ɔʔ˥sa˥]

肉案子[zɔʔ˩ʊ̃˩tse.ɪ]，肉圆子[zɔʔ˩yʊ̃˥tse˧]；肉身子[zɔʔ˥səŋ˧tse.ɪ]

直来直去[ts'əʔ˩ne˥ts'ə˥tɕ'y˥]

别人[p'iɪʔ˩zəŋ˥]；别的[p'iɪʔ˥ti˧]

落雨[naʔ˩y˩]，□头落尾[t'əʔ˧t'ɯ˥naʔ˩vəi˩]（丢三拉四）；落雪[naʔ˥ɕyuʔ˧]

叶二[iɪʔ˩ə]（叶家老二）；叶大[iɪʔ˥ta˩]（叶家老大）

这种现象扬州话没有，而泰兴、如皋、东台都有。如皋“十一”、“十二”中的“十”韵母也变，成了道地阴声韵。此外，阳入字作为最末一个音节时也可能产生这种现象，如泰州“港口泊”之“泊”，“一个月”“两个月”之“月”，如皋“麻萝卜”之“卜”，都变成了阴平。又“索索”[saʔ˩saʔ.ɪ]（索性）的第二音节是 s-，但第一音节也变，如写成“索”字，但该字非阳入。应该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尚有待深入的研究。

3. 有些入声音节塞音尾脱落，即使跟其后的音节连读时也如此。调值也变同舒声韵的阳平、上声和去声。如：

霍乱[xua˥nʊ̃˥]（霍[xuaʔ˧]）

药人[ia˩zəŋ˥]（药[iaʔ˥]）

白沫[pɔʔ˩mu˩]（沫[mʊʔ˧]）

皂壳[ts'ɔ˩ka˩]（壳[kaʔ˧]）

以下诸词中的第二音节入声，泰州城里有人念成上声，但较多人念成轻声（此时保留模糊的喉塞音尾），市区以东则都念成上声：

根脚[kəŋ˩tɕia˩]（房基意）　针脚[tsəŋ˩tɕia˩]（脚[tɕiaʔ˧]）

角落[taʔ˧na˩]（落[naʔ˧、naʔ˥]）

戒尺[ke˥ ts'ə˩]（尺[ts'əʔ˧]）

背脊[pi ĩ˥tɕiɪ˩]（脊[tɕiɪʔ˧]）

注意，虽然变成了上声，喉塞音尾也失落，但韵母主元音仍然是入声韵的韵母主元音。如前三例中的 a 稍后，“针脚”[tsəŋ˩tɕia˩]≠“真假”[tsəŋ˩tɕia˩]原因即在此。

更多的例子是后接构词后缀"儿"("ə"后还有一个以舌尖后的闪音起首的ɽe,为方便起见,写作 re。但如在一个词里,"儿"后还有音节,则 re 消失,如"木头人儿戏"):

脚踏儿[tɕiaʔ˦t'ɛ˨ə˩re˩]

紫果叶儿[tsɿ˧ku˧ii˨ə˩re˩]

勺儿[sa˨ə˩re˩](可与"勺子"[saʔ˥tse˩]对比)

鞋拔儿[xe˥p'ɛ˨ə˩re˩]

洋火盒儿[iaŋ˥xu˧xu˨ə˩re˩](可与"盒子"[xʊʔ˥tse˩]对比)

试金石儿[sɿ˥tɕiŋ˨sə˨ə˩re˩]

百儿八十[pɔ˨ə˩pɛʔ˦səʔ˥] (一百或八十)

姨侄儿[i˥tɕ'ii˨ə˩re˩](可与"侄子"[tɕiiʔ˥tse˩]对比)

枕头席儿[tsəŋ˧t'ɯ˥tɕ'ii˨ə˩re˩](可与"席子"[tɕ'iiʔ˥tse˩]对比)

笑佛儿[ɕiɔ˨fə˨ə˩re˩](弥勒佛,喜欢笑的人)

闷汤热儿[məŋ˧t'aŋ˨ii˨ə˩re˩](微温)

——以上入声字声调变同阴平

薄薄儿[p'aʔ˥p'a˧ə˦re˩](较薄)

狭狭儿[xɛʔ˥xɛ˧ə˦re˩](较狭)

蛐蛐儿[tɕ'yəʔ˦tɕ'ye˧ə˦re˩](蟋蟀)

疙瘩儿[kəʔ˦tɛ˧ə˦re˩]

蝴叶蝶儿[xu˥iiʔ˦t'ii˧ə˦re˩]

——以上入声字调变同上声

野鸭儿[ia˧ɛ˥ə˦re˩](可与"鸭子"[ɛʔ˦tse˩]比较)

错儿[ts'a˥ə˦re˩](梳子)(比较"错头"[ts'aʔ˦t'ɯ˥],梳头发义)

蛋壳儿[t'ɛ˨k'a˥ə˦re˩]

下巴壳儿[xa˨pa˩k'a˥ə˦re˩]

小脚儿[ɕiɔ˧tɕia˥ə˦re˩]

次脚儿[ts'ɿ˥tɕia˥ə˦re˩](饭菜的剩余物)

麻雀儿[ma˥tɕ'ia˥ə˦re˩](亦指男孩阴茎)

豆角儿[t'ɯ˨ka˥ə˦re˩]

打角儿[ta˧ka˥ə˦re˩](买东西时,并无专意,随便问问,但如价廉或合意,也可能买。)　——以上入声字声调变同去声

这些例子颇为难得，这种现象迄未为人重视，故不惮烦列举于上。其中很多为俞扬同志提供的。入声字没有变成阳平的，大概因为阳入、阳平太近似了。

这种变化不是连续变调造成的。在泰州方言里有个活跃的构词后缀"儿"，如"香瓜儿"[ɕiaŋ˨kua˩ ə˩re˩]，"心口塘儿"[ɕiŋ˨k'ɯ˩ t'aŋ˥ ə˩ re˩]。上列诸例中的入声字，当是因构词后缀"儿"的作用，失去喉塞收音，变同舒声调。

4. 有些字古代有入、去二音，今只剩下去声一读。如：

"画"，《广韵》麦韵胡麦切，卦韵胡卦切，今音 xua˥或 xua˨。

"暴曝瀑"，并《广韵》号韵薄报切，屋韵蒲木切，今只读 pɔ˥。

5. 有些古入声字今只有阴声一音，如"陌"，陌韵莫白切，今音 me˥(1987 年胡立群同学音 mu˥)。"液腋"，昔韵羊益切，今音ie˥或e˥，大概是由于谐声偏旁"夜"的缘故。"易交~"，昔韵羊益切，今音i˥，这是被"易难~"(以豉切)取代的结果。"忆亿肊"，职韵于力切，今音 i˥("忆头"之"忆"阴入)，这是读其偏旁"意"的结果。

6.《广韵》只有入声一音的字，今泰州方言除保存入声一音的，而且具有非入声一音。如：

"劃"，麦韵胡麦切，又呼麦切，今音 xɔʔ˦、xua ˥，前者只出现在口语中，后者常见，这大概是由于所从得声的"畫"字是舒声字的缘故。

"曰"，月韵王伐切，今音 yuʔ˦、ya˨，后者不知何所自，知识分子念"子曰诗云"时多如此。

"玉"，烛韵鱼欲切，泰州念做 iɔʔ˦，可是又念 y˨、y˥，青年人很少念iɔʔ˦。

"肉"，屋韵如六切，今音 zɔʔ˥、zɯ˥，即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多说成 zɯ˥。

"褥"，烛韵而蜀切。"褥单"，老年人说zɔʔ˥ tɛ̃˩，年轻人说zɯ˥ tɛ̃˩。

有些字的阴声一读历史较浅，如"剧"，陌韵奇逆切，本音 tɕiɪʔ˦，泰州话又音 tɕy˥，"话剧"、"剧本"之"剧"，现多念成 tɕy˥，此音源自北京话。"跃"，药韵以灼切，今音 iaʔ˦，但在"跃进"、"跳跃"里，大多数人念 iɔ˥，当是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吸收而且普及的。泰州方言喜用

自己语音系统里原有的与普通话近似的音位来引进新的字音，如iɔ˥与普通话 iau$^{\text{去}}$音类上相当，音色上相近，犹如 zɯ˥与普通话的 ʐou˥的关系一样。

（十）疑母的消失

今泰州方言无声母 ŋ。古疑母字今音声母多为零声母，如“我”[u˧˥]、“颜”[ɛ̃˥]，少数为 v 或 n，如“吴”[vu˥]、“顽”[vɛ̃˥]、“牛”[niɯ˥]。

但是在不太久的以前，泰州方言一定有疑母 ŋ，理由有三：

1. 泰州方言保存了 ŋ 母的唯一残迹，即“我”的口语音[ŋ̍]，由于这是使用频率极高的代词，故口语音以这种形式保存下来。

2. 跟泰州方言“血缘关系”最密的姐妹方言——南通、泰兴、如皋等方言中尚保存有 ŋ 母，其主要来源为古疑母。

3. 比较“牛”字在各方言的读音也给我们以启发。“牛”是尤韵字，吴方言今音为齐齿，疑母也相应地变成 ȵ，如无锡 ȵiɤɯ$^{\text{阳平}}$。通泰方言呢？

南通 ŋe$^{\text{阳平}}$　　ȵy$^{\text{阳平}}$
泰兴ŋei$^{\text{阳平}}$　　nəi$^{\text{阳平}}$
如皋ŋei$^{\text{阳平}}$　　ȵiou$^{\text{阳平}}$
兴化ɤɯ$^{\text{阳平}}$　　liɤɯ$^{\text{阳平}}$
泰州ɯ$^{\text{阳平}}$　　niɯ$^{\text{阳平}}$

“牛”有二音，不只是通泰方言如此，江西临川话ŋɛːu$^{\text{阳平}}$，ȵiu$^{\text{阳平}}$。丁声树先生说，他的家乡河南南阳、新野、邓县、镇平等地也有两读，口语音是 ou$^{\text{阳平}}$。丁先生同意我这个推测：在古代，“牛”除了有尤韵疑母一音外，尚应有侯韵疑母一音，只是韵书载前者而失收后者。我们认为在通泰方言里“牛”字原有开口呼和齐齿呼二音，声母皆源于疑母，南通、如皋、泰兴直保存到今日（齐齿变 n 或 ȵ）。而泰州方言 ŋ 声母却消失了。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相信泰州方言疑母在不久前经历了一个由存在到消失的音变过程。

即以“牛”字而论，1987 年胡立群同志说，他小时全念ɯ˥，现在全说niɯ˥。ɯ˥也在消变中，当然是普通话推广的结果。

（十一）古匣母的异读

有些古匣母字，在泰州方言里口语音为零声母字，书面语音则为 x 母（开口呼）或 ɕ 母（齐齿呼）字：

横：横七竖八[oŋ˥tɕʻiɪʔ˧su˨pɛʔ˧]，纵横[tsoŋ˧xoŋ˥]

黄：黄豆[uaŋ˥tʻɯ˨，xuaŋ˥tɯ˧]

活：活计[uʔ˥tɕi˩]，死活[sɿ˧xuʔ˧]

换：换一下[ũ˨ə˩tse˩]，调换[tiɔ˧xũ˧]

画：画招*[ua˨tsɔ˨]，画供[xua˧koŋ˥]

雄*：雄鸡[ioŋ˥tɕi˨]，[ɕioŋ˥tɕi˨]

霞：烧霞*[sɔ˨a˥，sɔ˨ɕia˥]（前者泰州很少说）

在北京话里的一些以 u 介音起头的零声母字，在泰州方言里，除了主元音为 a 者外、多附上 v 母（如晚[vɛ̃˩]），所以有些古匣母字的口语音合于上述条件的往往也附上 v 母：

怀：解怀*[ke˧ve˥]，胸怀[ɕioŋ˨xue˥]

护：护他*[vu˨tʻa˨]，保护*[pɔ˧fu˧]

胡：胡萝卜[vu˥nu˥pʻɔʔ˧，u˥nu˥pʻɔʔ˧]，胡琴[fu˥tɕʻiŋ˥]

湖：湖西庄[vu˥ɕi˨tsuaŋ˨]，湖广[fu˥kuaŋ˧]

*画招：承认错误。*雄，《广韵》羽弓切，《集韵》胡弓切。*烧霞：夏日早晨或傍晚天空满布霞彩。*解怀：妇女生过孩子、得义之源或与哺乳解怀有关。*护：偏袒。*保护：古晓匣母字，今泰州音韵母为 u 时，有人往往读成 fu˧。

俞扬 1990 年指出，“护他”之“护”、“胡萝卜”之“胡”市区音无声母。

上述诸字中除“横”外，单念时绝不会有口语音，它只依存于具体的口语词（或词组）中。此外“桓缓完丸皖”只有ũ一音，如“齐桓公”[tɕʻi˥ũ˥koŋ˨]。在古汉语里，喻三和匣不分，泰州方言的口语音正是这种现象的遗迹。在如皋、泰兴也有这种情况。而书面语音则显然与普通话的传播有关。

（十二）其　他

在泰州方言，歌韵（举平以赅上去，下同）的牙音字“哥歌可个”原跟果摄其他字一样，都读 u，但近来这四字，有很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念成-ɯ，因为 kɯ 比 ku 近于普通话的 kɤ。

案，1987 年胡立群同志说，他只“可个”二字念作-ɯ。

模韵字、部分鱼虞韵字和歌、戈韵字在泰州方言混为-u。有关诸方言分混情况如下表：

	模　韵	歌 戈 韵
南　通	u	
如　皋	u	ou
兴　化	u	o
姜堰、溱潼	u	ʊ
泰　州	u	
扬　州	u	o
南　京	u	o

泰州青年人对-u 韵字已有分的趋势，如顾宗仁同志念“座”时，在“座位”一词里是 ts‘ʊ˩，在书面语词“讲座”、“雅座”里念成 tso˧。

在泰州方言，以 u 为韵母的古晓匣母字不少人念成 fu，如“火车”[fu˨˦ ts‘a˩]（胡立群不分 f、x，如斧 = 火，湖 = 河），但有不少青年人念书面语音xu˨˦ts‘e˩，欲改则二音全改。

蟹、止两摄合口舌齿音字，今泰州方言有-ʊəi 和-y 两种念法，如“草堆”[ts‘ɔ˨˦ ty˩]、“堆积”[tuəi˩tɕiɪʔ˧]，也有人全念作-y 或全作-uəi，今青年人很多念作-uəi，这显然是靠向普通话的一种读法。关于这个问题，下一部分再作讨论。

俞扬 1990 年指出，少数匣母字文读为 x-，白读为 k‘-：“茴香头”之“茴”、“识宝回子”之“回”、“环腿”之“环”均为 k‘-。

(十三) 小　　结

1. 泰州方言语音系统的变动

泰州方言音变如此多样复杂,这使语音系统和声韵母的配合关系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动。我们从声、韵、调三方面来观察:

Ⅰ. 增加了什么;

Ⅱ. 减少了什么;

Ⅲ. 起了什么变化。例如(k-)ɔ→(tɕ-)iɔ“教敲”,但是 kɔ“高”与 tɕiɔ“骄”始终是存在的,声韵母的数目与声韵拼合的结构类型都没有增减。

在叙述增减与变化时,每一条后的括弧内注出见于前述十二项音变中的哪一项,有的还注出某表并举例。在叙述韵母的音变条例时,一般也指出声母相应地有无变化,注于其前的括弧内,反之亦然。“k-”表示 k、kʻ、x、ø 这一个类的声母。

(1) 声　　母

Ⅰ. 减少	ŋ	熬(十)
Ⅱ. 变化	k-→tɕ-	教(一)
	tɕʻ→ɕ	谢(三)
	ts→s	塞(三)
	tsʻ→s	寺(三)
	s→tsʻ	垂(三)
	z(ɿ)→ø(ə)	儿(八)
	ø→x、ɕ	黄雄(十一)
	v→x、f	怀湖(十一)
	f(u)→x(u)	火(十二)
	送气的塞音、塞擦音→不送气的塞音、塞擦音	(四、五)

(2) 韵　　母

Ⅰ. 增加	(tɕ-)iɛ̃←(k-)ɛ̃	限(一,表1·31)
	(tɕ-)iɛʔ←(k-)ɛʔ	匣(一,表1·31)

	(tɕ-)ie←(k-)e	界(一,表1·11)
	(tɕ-)ie←(tɕ-)ia	借(二,表2·1)
	(tɕ-)ia←(k-)a	下(一,表1·61)
	(Ø)ə←(z)ɿ	儿(八)
	o←u	座(十二)
Ⅱ. 减少	(tɕ-)ia→(tɕ-)ie	借(二,表2·1)

案：这条音变如完成，则泰州方言将失去 ia 韵母。但(k-)a→(tɕ-)ia 的音变在迅速进行，现正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

Ⅲ. 变化	(k-)əŋ→(tɕ-)iŋ	行(一,表1·21)
	(k-)aŋ→(tɕ-)iaŋ	讲(一,表1·41)
	(k-)ɔ→(tɕ-)iɔ	敲(一,表1·51)
	(tɕ-、t-)ia→(tɕ-、t-)i	姐爹(二,表2·1)
	(ts-)a→(ts-)e	车且(二,表2·2)
	(p-)i→(p-)iĩ	美(六)
	(k-、t-、ts-)ũ→(k-、t-、ts-)ɛ̃	寒南(七)
	(k-)aʔ→(tɕ-)iaʔ	觉(一,表1·41)
	(k-)u→(k-)ɯ	可(十二)
	少数入声字转化为阴声字	(九)

(3) 声　调

Ⅰ. 减少	入声字的喉塞收音，青年不及老年明显，有萎缩的迹象	(九)
Ⅱ. 变化	部分阴平→去声	(四)
	部分阳入→阴入	(五)
	少量入声调转化为阴平、上声和去声	(九)

由于其它方言影响而出现的分歧摇摆的各种现象，那也引起了语音系统的一些改变和混乱。此不赘论。

2. 泰州方言在向普通话集中靠拢

在通泰方言区内，如皋、泰兴的方言与泰州方言关系最为密切，它们比较“保守”，虽然也有若干变化，但程度上远为不及。可以说，

泰州方言若干年以前的面貌跟它们目前的状况相同或接近。

泰州方言为什么变得快些？因为它接近宁扬方言特别是扬州方言的缘故。从前面的大量材料都可以看出，它的一系列新特点都接近扬州话。这也许会给人一种错觉，把这些特点仅仅归结为扬州方言的影响。这未免低估了这些音变的意义，也不能洞彻问题的本质。按照这种看法，泰州方言既然倾向于扬州方言，那扬州方言所具有的异于通泰方言的诸种特点，泰州方言都该向它们看齐。事实上泰州方言对扬州方言不是亦步亦趋的，例如扬州、泰州都不分 n、l，可是扬州人多数为 l，泰州却是 n，各行其是。又如普通话的 ʐ，扬州方言没有，多半混入 l 里，而泰州有 z，并无削弱的痕迹。再如麻韵开口三等章组字，普通话是-ɤ，开口呼，泰州方言由-a 变-e，音值上接近，而且也仍为开口，这项音变并未走扬州方言的道路（扬州是齐齿呼-iɪ）。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儿二”等字，扬州读为 a，与“麻马”韵母同。而泰州方言当它在约百年前抛掉原来的 zɿ 时，“输入”的不是扬州的 a，而是近于普通话的 ə（这是一个新成分，今有人发为 ɚ）。因此，泰州方言大量的音变实是民族共同语（“官话”、普通话）诱发的。不过因为特殊的地理、历史环境“假道”，通过向扬州话接近的途径而向民族共同语集中靠拢。

案俞扬 1990 年指出：“此句有语病，似乎否定了上面的论述。应当说：泰州话在向北方话靠拢（本质），扬州话近于北方话，看起来似乎在向扬州话靠拢（现象）。谈不上‘通过’的问题，‘同路人’而已。”

前面所列举的音变达十几项，说明变化的深入，第一、四、五这三项音变涉及面广，近一千字。它们的变化百分比列表于下：

	一	四	五
口语音	47%	15%	16%
两读	18%	25%	22%
书面读音	35%	60%	62%

第四、五两项音变，即古全浊上和浊去在今泰州音由阴平变去，古浊入由阳入变阴入，可谓是同步的。口语音，应该说是较早层次的音，

而书面语音则是新层次的音,“两读”正是这两个层次的过渡。两读加书面语音都超过50%,甚至过80%,这说明了泰州方言磨损自己的方言特点向普通话集中靠拢的深入程度。

中 篇

一、研究泰州方言语音史的几条途径

自五十年代开始,汉语方言的描写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方言历史的研究则显得很不相称,这块园地需要我们去大力开垦。

对于泰州方音史我们拟从下述四条途径来开展研究工作。

(一) 如斯大林所云:“要了解某种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研究方言的历史正需要这样。

(二) 稽考历史文献。对于以往的记录当时方言面貌的文献材料我们都应尽量采摭、搜罗。因为缺乏科学的观点、方法、工具,文献记载往往不全面、不准确,所以应该在审慎的甄别之后加以利用。如果材料较多时,可以根据它们所反映的各个时期的特点和现在的状况,建立纵的历史的联系。

(三) 进行实际调查。方言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同一时代的青年人和老年人、知识分子和文化较低的人、不同地区的人如城里人和郊区人,他们的话都可能有差别,而这些差别往往透露出变化的痕迹和趋向,因此我们调查时对象要多,面儿要广,尽可能地深入。我们特别要向老年人调查更早的语言现象,因为他们对于父辈、祖辈的一些特殊语言现象总是有印象的。这种“活”的调查具有很大的可靠性。当然,这种方法也有局限,只能了解最多是一百年或稍长时间的历史。

(四) 历史比较研究是研究方言史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我们把很多方言材料放在一起观察,不仅单纯地为了比较其异同,而主要目的则在于了解它们亲属关系的程度,推测它们在历史上的发展情况和今后的发展趋势。

二、近代泰州方言语音史研究

在文献可征的范围内，从清初起的泰州方言情况我们才真正有所了解。因此，我们可以说泰州方言语音向普通话的集中早已开始，而近百年来则大大加强。

（一）泰州方言语音向普通话集中靠拢的原因

1. “官音”的影响

根据上一部分的叙述，可见泰州方言语音正处在一个规模巨大的音变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呢？

我们知道，普通话即汉民族共同语，其前身就是所谓“官话”，凭着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官话逐渐传播扩展。而方言在和它的接触中，不得不接受其影响，逐渐改变着自己的面貌。向普通话集中靠拢是汉语各方言的共同趋势，泰州方言是表现得颇为突出的一员。

我于 1961 年夏曾询问过泰州的几位老先生，泰州方言的一些书面语音是何时产生的，年逾八十的陈冕甫老先生说，已无可考，这些音叫做“官音”，乃是幼年读书时由先生传授下来的。一位东台人说，在东台，旧时私塾即“书房”有所谓“京馆”，多是有功名的知识分子教的，而他们教的音多是本文所说的书面语音。可见，书面语音多是由当地的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带进来的“官音”。“官音”者，“官话”之音也。因此，只有“官话”形成并传播它的影响以后，泰州方言的诸种音变才能产生。

我们曾经强调指出，泰州方音是通过向宁扬方言接近的具体途径而向普通话集中的。宁扬方言的很多音是和普通话比较接近的。现在我们来看看泰州和扬州的关系，长期以来它们处在一个行政区划内，在清代，扬州府有八县（包括散州）：甘泉、江都、仪征、高邮、宝应、兴化、泰州、东台。前五县皆操宁扬方言，既同在一府，这几县的知识分子和平民常相往来，泰州方言也就易于受到宁扬方言的影响。而在扬八属里，泰州是仅次于扬州的一个文化中心，古来江淮很多文人常聚会于此。在科举时代，府考在扬州，院考却在泰州，各方士子皆来此会试，加上当时一般人员的来往，外来影响自会被经常带进泰

州方言里。

普通话的影响是促使泰州方音变化的早已存在并一直起作用的因素。但是近百余年来，趋势大大加强，究其原因，应该考虑到此时期内的人口的变动。

2．以宁扬方言区人民为主的大批人口的迁入

关于泰州人口的来源，夏绍侯氏《耐庵丛著》二集之四《泰县氏族略》(1930年)曾有叙述，这部手稿前附《泰邑氏族来源略述》一文，该文云来源有五：(一)奉明祖谕旨移实吾泰而来者；(二)以避乱来者；(三)以从戎来者；(四)以作宦来者；(五)以经商来者。(一)项所指事实是，元末，张士诚部守泰州，朱元璋部攻之，放水淹泰州，死者无数，事后朱元璋移苏郡之人以实之。这些苏州移民对泰州方言究竟有何影响，尚待研究。时代久远，暂不讨论。值得重视的是(二)、(五)两项。

19世纪中叶，太平军曾迭克扬州。当时南京、扬州的大批官员及其家属、仆从都曾逃至泰州，更重要的是此时迁入大批安徽人、江南人、镇扬人，其中徽州人和镇江人最多，这些人往往留居不返，子孙遂家焉。镇江人自然是操宁扬方言，徽州话复杂难懂，因此徽州人必须操准官话和泰州人打交道。虽然他们的子孙都说泰州话，但是这些外地话也给战胜者的方言以影响，那就是使泰州方言里的“官音”得到巩固。

以经商来泰州者主要是安徽人、镇江人。皖南人居泰经营茶业、漆业的有洪姓、胡姓，经营盐业的有吕姓、汪姓，经营布业的有江姓，经营香业的有姚姓。镇江人经营南货业，福建人经营旱烟叶。在泰州，皖人有新安会馆、旌德会馆，镇江人有京江会馆，福建人有闽中会馆。此外，山西汾阳人卖汾酒，陕西人开皮货店。直至解放前，泰州商业中还有两帮：徽帮和江帮，可见皖南人和镇江人在泰州的影响。

清末以来，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起来，泰州位于里下河之端，作为苏中的商业枢纽与货物集散地，也繁荣起来，与苏中各县关系极为密切，西与扬州、镇江、南京，南与吴语区各大城市的联系也与日俱增。泰州人出外做工、经商、求学的日益加多，而外地人到泰州来的或迁入泰州的也非常多。这样，使得各方言相互接近，加速

了语言统一的过程。

民国以后，苏北战事不息，泰州受战争影响较少，因此商业畸形繁荣，人口激增，外地迁入者日多。1927 年后盐城、阜宁、淮阴人不少来泰，抗日战争时，南方的江阴、丹徒、无锡，北方的徐、淮、盐、阜及附近县镇均有大批人迁入。抗战后海安、姜堰迁入者不少。泰州现有人口中，很多不是道地的泰州人。这对泰州方言语音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语音系统的稳固性，因而产生了一些分歧摇摆的现象，不过主流却是加速了泰州方言向普通话集中的过程。

除了从社会史、居民史来研究外，还应该重视下面一点原因。

3. 汉民族共同语的文学语言的影响

在今天的泰兴、如皋话里，虽然也有一些字产生了像泰州方言的那种书面语音，但是有大量字即使在念文言文和现代的标准书面语时也还是跟口语音一致。这两个姐妹方言的情况有助于对泰州方言的以前的面貌的推测。可以推想，原来泰州方言在语音上是"言文一致"的，有些较文的字儿至今也仍只有口语音，这一点也可证明。后来，泰州知识分子接受了"官音"的影响，在读古书的时候，有些字儿采用了"官音"。对于当时而言，这种音还不如说是"读书音"更准确些，因为它一般地是在"读书"的时候才出现的。

清末民初汉民族共同语的文学语言——晚近的"白话"——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那时，泰州的新知识分子也学"白话"，用"白话"。"白话"中的新词新语成了日常语言中必需的而又无法替换的东西。泰州方言没有自己的方言文学，"白话"就成了它的"书面语"。而读这些"书面语"的词儿一般必须用"官音"，特别在学堂里更是如此。泰州中学堂 1902 年冬创办，1903 年十月开学（据《宣统泰州志》）。初等小学办于 1904 年，此据马锡纯编《泰州乡土志（泰州历史）》（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据仲一侯先生回忆说，那时在学堂里，读教科书中的新词新语的音与口语迥不相同。泰州方言书面语词儿里的异于土音的音就是书面语音，亦即从前的"官音"，但此时，它的势力大大加强了。

方言口语不同于书面语之处，就词汇组成成分说，在于它的词儿包括：A. 一般生活交际中用的词，如"木头"[mɔʔ˥ tʻɯ˧]、定做[tʻiŋ˩

tsu˥˧]。B. 特有的土词儿,如“落雨”[naʔ˨˩y˨˩˧](“下雨”)、“淡话”[t'ɛ̃˨˩ xua˨˩](“闲话”)。在这两种词里多保存土音,尤以后者为最。这种音是口语音。

在此时的泰州方言里,一个字所代表的音节如仅表示口语词或其词素时,则只有口语音一音。如果它同时既表示口语词或其词素,又表示书面语词或其词素,那它就能同时具有并保持住口语音和书面语音二音。而且,一般地说,这两个音各在特定性质的词里,不能替换。例如“狭”字,在“狭巷子”[xɛʔ˥˧ xaŋ˧˩tse˨˩˧]、“狭隘”[ɕiɛʔ˧˥ e˥˧]里的二音即是。至于仅在古书和一些在书面语中出现的字儿,却经历了口语音→书面语音的过程。口语音之丧失是由于无口语词为依凭之故。总之,音因词生,音依词存,音无与之同性质的词为依托则亡,此可为一定则。

可见,口语、书面语区别的产生是促使泰州方言语音分化的原因之一,书面语的壮大加速了向普通话的集中,而书面语的产生乃是汉语文学语言影响的结果。

(二) 研究泰州方音史的文献资料

——《天然穷源字韵》、《韵史》、《字音集义通考》及其他

下面我们将研究泰州方言向普通话集中的历史。在分项叙述以前,我们先介绍三个比较能系统全面地反映通泰方言语音面貌的文献。本文所引用的材料除了泰州话的外,还有如皋话和泰兴话的,因为他们是姐妹方言,这些材料也能说明泰州话的问题。

我们先介绍《天然穷源字韵》。乾隆十五年序刻的《如皋县志》卷二十艺文志下载“姜日章天然穷源字韵七册”附有一篇序。关于该书的文字学部分我们不录,只录有关音韵的部分:

> 广陵姜日章……著《天然穷源字韵》,……其言韵也,统之以天星风山官上地郊阶州波下十有二韵,别之以额喉腮舌牙齿唇七声,中平上去入五声,亦为标射字母等字反切之法,悉本《字汇》而扩充之。济之以言叶,证之以诗易二经,限之以六十二韵,区之为日月水火木金土七册,而《天然穷源字韵》之书以成。夫《正字通》之为书也,引据甚详,而字不若此书之备,《字汇》之为

书也，标射甚妙而韵不若此书之全。盖探喉而出，天然中节，无丝毫强勉。其字能该天下之字，其韵能尽天下之韵。所谓心得之妙，非从检阅中得来，后学者玩图索义，以心印心，以口印口，则不独有字有声者可得，即有声无字与无字无声者无不在四千二百十有六声之中矣。……

同书卷三十一隐逸传：

姜日章，字旦童，号全脉子。治北李家堡人。……又作《天然穷源字韵》，七载书成，人鲜有喻之者。岁壬寅十有二月丁卯作偈曰："浮沉六十年，落魄无人识，作书欲穷源，源穷人已寂。……"语毕端坐而逝。

关于姜日章及其著作的传闻，清王华葑《海安考古录》卷二有记载，王氏书收入韩国钧辑《海陵丛刊》，为其第十三种。

据《如皋县志》，姜日章是李堡（今属海安县）人，壬寅年卒。县志刻于乾隆十五年，最接近的壬寅年为康熙六十一年即1722年，姜日章死于是年，如他真活了六十岁（偈中之语可能是举其概数），那么他便是生于康熙二年即1663年。

姜日章既是李家堡人，那么他的《天然穷源字韵》大概也就反映了清初康熙年间的李家堡话。其书恐已佚，否则将是研究通泰方言史的极宝贵的资料。保存下来的这篇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当时的语言事实。姜氏分韵为十二，"天、星、风、山、官、上"六韵为鼻化韵和鼻尾韵，正与今如皋话的iĩ、əŋ、oŋ、ẽ、ũ、ã相当，"地、郊、阶、州、波、下"为开尾韵，"地"可能包括ɿ、i、u、y四韵母。案，在明清的等韵学著作中，相当于姜氏"地韵"这一类的韵部往往所包很广，如樊腾凤《五方元音》之"地韵"所包比姜氏还广（只是u独立为"虎韵"），潘耒《类音》以ɿ、i、u、y为相配的四呼，《康熙字典》的《字母切韵要法》的裓摄包括有ər、ɿ、ʅ、i、u、y等韵。从当时的这种学术见解看，我们推测姜氏"地韵"所包可能为这四韵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小学类存目一"列《天然穷源字韵》，云"是编成于康熙丁酉"，即1717年成书。《四库提要》称该书九卷分十四韵，即多"支"、"夫"二韵，当表示ɿ、u、y。其他五韵合于今如皋话之ɔu、ɛ、ei、ou、a。这就概括了今音除ər以外的所有的舒声韵母。（关于姜氏时代的ər韵母，有两种可

能：一是当时李堡方言里还没有，一是虽有但被姜氏归于地韵内。）据姜氏所言，这方言有五个声调：中、平、上、去、入。“中”、“平”即“阴平”、“阳平”，通泰方言有两个平声，“中”字是阴平调，“平”字是阳平调，故以此二字为二调的名称。姜氏认为入声只一个，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通泰方言的两个入声不会是这三百年间产生的。这是通泰方言区的音韵学家的通病。只要看看何萱《韵史》就更可明了了。

何萱，字石闾，号羼庐，泰兴人，道光岁贡。长期居住在如皋石庄，晚年归泰兴。生于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殁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韵史》是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共八十卷，1936年商务印书馆始刊印该书，分十四册。这是一部训诂的总汇书。但其编排体例以声韵为纲。

何萱对于音韵的见解，见于《韵史》卷首的“切字简易法”及“审定二十一字母”和附录的《答吴百盉论韵史书》。罗常培先生曾为《韵史》作跋（见《韵史》第14册，亦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四本二分）。罗先生认为该书与《说文通训定声》有同等价值，“此书虽以《韵史》名，而其所以嘉惠来学者，乃在训诂，不在音韵”。罗先生对何萱的音韵观点进行了仔细的剖析与批评，然而却未道出症结所在——何氏的音韵学体系根源于泰兴方音。如今我们利用它研究通泰方言史。

首先看何萱对声母的意见，在《答吴百盉论韵史书》中说：

三十六母行之既久，似为近矣。然谛观之，则有复有漏，未为精善也。非敷泥娘皆一误为二，复矣。见端等母有阴无阳，明微等母有阳无阴，漏矣。知彻澄三母之字，古音同于端透定，今音同于照穿床，不必另出，另出亦复矣。……方氏（密之）并非敷奉为一是也，然去影喻二母则漏矣。戴先生东原亦用二十母，而与方大异，惟其微母字别为条，则非愚心所安也。故愚之《韵史》定为二十一母，平声有阴阳，则以二十一为四十二也。旧时言字母者或云九音，或云七音，今细审之，只须言四音耳，见溪影晓喉音也（见溪不必言牙音），端透泥来舌音也（来不必言半舌），照穿日审精清疑心正齿之头音也（日不必言半齿，疑乃鼻音，非牙音也，附齿头差近），帮滂明非微唇音也（重唇三，轻唇二）。萱之所

> 拟二十一字母曰“见起影晓，短透乃赉，照助耳审，井净我信，谤并命匪未”也。概不用平声字，避平声字有阴阳也。

从其“审定二十一字母”所附的声母表和同书中所用的每母的反切上字再参以今如皋、泰兴话可以看出，该方言有21声母。“见起晓”为k、kʻ、x；tɕ、tɕʻ、ɕ。“井净信”为ts、tsʻ、s；tɕ、tɕʻ、ɕ。“照、助、审”为ts、tsʻ、s。其它为Ø、t、tʻ、n、l、z、ŋ、p、pʻ、m、f、v，共21母。与今方言正符。

而其声母的特点是，古塞音、塞擦音全浊声母今音归送气清声母。“审定二十一母”所列表中，何萱的二十一母下皆注上和旧三十六母的什么母相当。如“见”下注“旧见”。而送气音清声母皆注旧次清和全浊字母，如“起—旧溪、郡”、“透—旧透、定”、“助—旧穿、彻、床、澄”、“净—旧清、从”等。每母常用的反切字亦包括古全浊声母字，如起母有“俭、郡”，透母有“代、杜、洞”，助母有“秩、状、仲”等。我们知道，古全浊声母今音逢塞者、塞擦音不论平仄一律送气，正是通泰方言的重大特点之一。何萱对声母的这种看法也存在于其他通泰方言区的音韵学家中，如南通人徐昂《音学四种》（南通翰墨林书局，1930年）页一：“声纽颚音，溪郡之属，清浊同源，喉舌齿唇诸音类推。”

《答吴百盉论韵史书》对声调的意见：

> 音之有清浊也，为平声言之也。阴平为清，阳平为浊，不容淆也。上去二声，各只一音，无阴阳清浊之可言也。……入声每字皆含阴阳二声，视水土之轻重而判。轻则清矣，其出音也送之不足而为阴，重则浊矣，其出音也送之足而为阳。《韵史》内入声并合者此也。

何萱承认他的方音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阳入六调，而且明白指出阴入阳入之分在于出音送之足与不足，亦即声母送气与否的问题（今通泰方言阳入逢塞音、塞擦音声母皆吐气，阴入则否）。可是它还是要将入声合并为一。这是由于不敢尽背旧传统的缘故。平声分阴阳，自周德清始，其后的音韵家多遵行，已有较长的传统，故何萱敢于明白分平声为二，而入声分阴阳则未免太悖于旧传统了。在《韵史》前的《天然穷源字韵》如此，在其后的《字音集义通考》亦如此。

《字音集义通考》是一部方言韵书，我于1959年夏得于泰州，这

部手稿的上册题作“怀恕轩主人茂哉氏编订”，下册题作“怀恕轩主人茂之编订”。作者大概是溱潼镇北边不远的人，编著时间大概是清同治年间(1862—1874)。所反映的方言是广义的泰州话里的一个小土语，该土语性质介于东台方言和狭义的泰州方言之间。

该书韵分十八部：东、真、江、京、云、闲、干、天、支、朱、岐、灰、须、来、高、嘉、州、而。真、京、云三部只是介音的区别，应并为一部，尚须增入其后补的“戈部”，则共有十七部。

声母共有十九，与今泰州话之 p、pʻ、m、f、v、t、tʻ、n、ts、tsʻ、s、z、tɕ、tɕʻ、ɕ、k、kʻ、x、ø 相合，较之泰兴、如皋，无 ŋ、l。

声调分为五，两个平声、上、去、入。两个平声即阴平、阳平。入声实际上也应分阴、阳，而作者竟未依据实际语音这样做。

《字音集义通考》(以下简称《通考》)的价值在于，泰州方言向普通话集中靠拢的诸种现象它多半都有反映。详见附录“《字音集义通考》解析”，本文只利用其一部分材料。

我们还可以从泰州市人关于方言词汇的著作中钩稽出一些语音材料。1930 年编的《泰县志》(稿本)卷二十四，“社会志三方言”序中云：

> 始纂泰邑方言之书有高尔庚氏，分天地人物四部，录入续纂州志而未刊行。继而有陈启彤、高裕瑞二氏，虽搜罗浸广，不专为泰邑之言，采陈高二家之作，续高氏之后，其尚有可增者，更为补之。

高尔庚氏是光绪己亥(1899)岁贡，著作被采入这部《泰县志》中。陈启彤，字管侯，著有关于文字学方面的专著和论文若干篇，校田宝臣《小学骈支》，关于方言的著作有《广新方言》，自序于辛亥(1911)，这是属于章太炎《新方言》一派的著作，主要是研究泰州方言的词汇，也涉及芜湖等地方言。高裕瑞，字寿徵，高尔庚从弟，光绪监生，不久前去世。他的关于方言的著作约成于 1927 年左右。《泰县志·方言》“增”的部分除去《广新方言》所见者，当为高裕瑞氏的著作的一部分。这三位学者的著作也有助于我们对泰州方音史的研究。

其他文献材料则在逐项讨论时提及。

（三）古浊去、全浊上、浊入字演变的历史

古全浊声母字，在通泰方言里，逢塞音、塞擦音，无论平仄，一律送气，泰州方言本来也是这样（浊去、全浊上变阴平调，浊入变阳入调）。但现在却有大量仄声字，声母变为不送气，声调也相应地分别变为去声和阴入。现在我们按时间先后看看文献对这批字的读音情况的记载，当然，也利用活的调查材料。

"读"是古定母入声字，按规律应念阳入，可是在现在泰州方言里，只有阴入 tɔʔ˧一音，因它是个书面语词儿，口语里另有一与之同义的"念"。但是在泰州东北 40 余华里溱潼西 7 华里有个村子叫"读书址"，"读"在这个地名里保存了阳入的念法：t'ɔʔ˥。据说，这个村子得名的来由是，元末群雄之一的泰州白驹场人张士诚，他的老师王旦雷曾在此村教书。据此可知，在明初，即使在"读书"这样的书面语词里，"读"还是念阳入的，只是后来才产生阴入一音。

清康熙十二年（1673）编成的《淮南中十场志》是一部地方志，淮南中十场是指当时泰州所属的十个盐场：东台场、安丰场、富安场等，皆在今泰州市的东北和东面，今分属东台、海安诸县。该书卷一"风俗附方言"中有几句话值得重视：

> 至于以稻为滔，以豆为偷，以咸为寒，以学为鹤，以地为梯，以丈为昌之类，则声之转也。

稻＝滔、豆＝偷、地＝梯、丈＝昌，正表明了古浊去、全浊上混同阴平、声母送气的事实。该书的编者是王大经，清夏荃辑《海陵文徵》卷十四载有《王石袍先生传》：

> 先生姓王氏，名大经，字伦表，号石袍，一号待庵居士，又号修水子。原籍江西南康，父本部始迁于东台之安丰，即家焉，娶李氏，生四子，先生其季也。……国朝康熙辛亥，靖江令郑山公征修县志十八卷，越明年泰州分运汪芾斯征修中十场志十卷。

嘉庆《东台县志·文苑》有传。王氏是安丰人，安丰镇距东台县城最近，在其东南 25 华里。那么，王氏所记载的语言情况当是根据东台方言。

这四个字中"稻"今仍只念 t'ɔ˨，其余三字则兼具口语音和书面语

音了。

嘉庆《东台县志》卷十五"风俗附方言"中所记录的一些词与今音对勘,也可发现一些问题,该书曰:

缓步曰踱(音铎)

"踱"是个土词儿,音 t'aʔ˥,该书以"铎"注"踱",则"铎"亦音 t'aʔ˥,可是今音只念 taʔ˧,是阴入。("铎、踱"并在《广韵》铎韵,徒落切。)该书又曰:

器破未离谓之璺(本音问,土音闷,声之转也。)

按"璺"字应作"璺",该书以"闷"注"璺",二字今并音 məŋ˩,彼时当亦如此。而"璺"在《广韵》问韵,亡运切,古微母归明母,今音 m 母正是此种残迹。该字为古浊去字,变为平声。

李汝珍《李氏音鉴》卷三第二十四问"初学入门总论":"东台谓豆为太候切。"以"太"作切语上字,说明"豆"是送气清声母字。

何萱的《韵史》明确地反映了古浊声母今音一律送气的事实,并指出阳入的特点在"其出音也送之足"。何氏虽就其方音而言,但这项文献纪录亦适用于泰州方言。

《通考》虽然违背实际情况把古浊去、全浊上归入去声,但却记录了这项音变。如"抱"为蒲交切,又音博号切,"被"既音篇夷切,又音邦昧切。说明这些字当时就有阴平(声母送气)与去声(不送气)二音了。《通考》规定入声只有一个,这是不对的。但它把古浊入基本上并入全清入中,又把一些字归入次清入,说明它在这方面也能反映一些实际情况。具体分析见附录。

这类字之有书面语音,在文献上首见于《通考》,其实,书面语音渊源甚早,陈冕甫先生说:这种"官音"是幼年读书时老师口耳相传下来的,来源于何时,已不可考。

劳乃宣《等韵一得》著于光绪癸未(1883),重订于光绪戊戌(1898)。该书外篇四十一页曰:

戛类浊母,北音于平声,皆读透类之浊,上去入则仍读戛类,而江西、皖南有数处及江苏之泰州、如皋诸处则上去入亦读透类。如忌读若气,弟读若替,别读若撇,住读若处,族读若簇之类,是则戛类浊母有戛透两用。

补篇页十七也有类似的话。

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自序于 1886 年)“方言”页四：

扬州东乡读豆为透，病为聘。

他们述及古浊音今泰州音逢塞音、塞擦音送气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泰州，如皋浊去、全浊上是归入阴平的，劳、胡二氏举例如“气透”皆为次清去声字，这比起王大经来，毕竟是隔了一层。

泰州市人的著作往往反映了一些语音的变化。《泰县志·社会志·方言》载高尔庚氏著作“赵”条：

作事不顺谓之赵(呼平声)。

“赵”，今泰州音 tsʻɔ˨。

《泰县志》载高裕瑞氏著作“姅”条：

姅音丰。……泰俗喻家人嘻嗃谓之㛔，或女子轻狂曰㛔事(事音如司)。

“事”古崇母去声字，今音口语音为 sɿ˨，书面语音为 sɿ˥。高裕瑞氏特注“事音如司”，意即读阴平。

又，“䩠”条：

音挣，《广韵》:“张皮也。”一作扽。俗谓引狭使广曰䩠，音如邓。

“邓”，古定母去声字，高氏以之注口语词“䩠”[təŋ˧]，则“邓”是时亦念作təŋ˧了。夏绍侯《耐庵丛著》二集之二《泰县方言补(附吴陵语录)》(歙县程小可序于 1936 年)云：

吾泰土音去声字呼作阴平者极多，例如：洞、重、事、味、代、饭、饿、夏、状、病、寿、验、树、艾、顺、问、贱、断、豆、淡、垫。

上声字有讹为去声因而呼作阴平者亦有之，如：动、市、件、竖、并、范、奉、丈、舅、稻。

其中“贱、奉”今只有书面语音(俞扬 1990 年指出，今口语“贱卖没好货”之“贱”是阴平。)，其余很多兼具书面语音。

在青年人的读音中，大量字已丧失了口语音，可是老年人还读作口语音或另具口语音。如“骆驼”，我们念 naʔ˧tʻu˥，而 1959 年我听到一位邻居，八十几岁的高老先生却说成 naʔ˥tu˧。1961 年 5 月初我曾随手抄了近三百个青年人只剩下书面语音的字由北京寄回泰州，

我推测其中有些字老年人还保存有口语音，果然，仲一侯先生圈了下列字："射、墅、聚、罪、泪、患、象、邓、郑、共、截、灭、集"，仲先生又为我请教了高寿徵(即高裕瑞)先生，他又加圈了："滤、系、吏、貌、候、愿、孟、另、折、倔、莫、筏、宅、独、浴、局。"(俞扬同志1990年指出，上述字中"聚罪邓郑灭貌候愿另倔莫宅独"如今在少数词语中念口语音。)从泰州几代人读音的不同可以证实我们前面的论点：这些字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一个口语音→口语音和书面语音兼具→书面语音的过程。从表4.2和表5.2可以看出，停留在第一阶段的是少数，只是15%、16%，而走到第三阶段的都已达60%、62%左右。

(四) 外转七摄开口二等牙喉音字演变的历史

外转七摄开口二等牙喉音字由开口变齐齿的过程，比起上项音变来，显然是较短的。如表1.72所示，读开口的占47%，两读占18%，齐齿占35%，暂将梗摄不论，蟹、咸、山摄字保持开口的占半数左右，这说明音变过程，相对来说还不是深入的。

这批字开口变齐齿，不仅江淮方言如此，即吴、湘、赣诸方言亦然，不过，也只是部分地贯彻。例如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古今"页八：

> 癸未新刻切音蒙引，本暨阳郦珩切音捷诀。……韵用公弓姑居……卅六。皆奸交加为开口正呼。

癸未恐为1883年，暨阳即江阴(吴语区)，郦珩之《切音捷诀》当早于1883年，此书与《切音蒙引》当系吴方言的等韵学著作。"皆奸交加"等其时皆为开口字，即令今日吴方言变齐齿的仍是很少。可见这种向普通话靠拢的现象是比较后起的。

在19世纪下半叶的南京话里，这批字有些字是有两读的。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方音"页二：

> 方音有沿袭他处之音不为通例者。如金陵谓道行为道恨，及读行字仍为齐齿呼，谓打更为打金，刚刚为姜姜，及读更字刚字仍为开口呼。

泰州话本身的历史呢？

王大经在《淮南中十场志》中说：

至于……以咸为寒，以学为鹤，……则声之转也。

这时的泰州话“咸、学”仍念 xɛ̃˥、xaʔ˥，未产生齐齿一读。

比胡垣书早二十年左右的《通考》，在这批字上反映了泰州话的一些情况，譬如江摄二等字在《通考》里列于开口音节的有“肛、扛、港、角、项、巷”等，列于齐齿的有“江、讲、降、觉、腔、确、壳、学、岳、嶽、乐”等，其它诸摄也大致如是。

陈启彤《广新方言》卷一页十三“朾”条：

《说文》：“朾，撞也，宅耕切。”……泰州谓……以手击人，音如德下切。

“朾”即“打”，以“德下”出切，那“下”当然是读 xa˨˩了。

《泰县志》载高裕瑞氏著作“讲谣言”条：

讲……诸字书皆古项切，音港，不作蒋，此正音也。亦与苏人音读正同。

今泰州土话“讲谣言”仍作 kaŋ˨˩iɔ˥i ĩ˨˩，但“讲”字在多数词语里已作 tɕiaŋ˨˩了。高氏认为“讲”在“讲谣音”一语中念开口，合乎古音并同于苏州话，因而是正音，可见其时另有齐齿一音并列。而《通考》正是把“讲”列入齐齿音节内。

仲一侯先生说：光绪末年泰州办学堂，读教科书中之字就与口语迥不相同，如“上学”之“学”读土音，音同“鹤”xaʔ˥，而“学堂”之“学”则读成 ɕiaʔ˥。又如“觉”在土语词或词组“得福不觉”、“觉着”“觉格了”(孕妇将生子之意)里音同“角”kaʔ˧，而在新词“觉醒”里就念 tɕiaʔ˧。可见由于汉民族共同的文学语言的影响，这项音变的速度就加快了。

(五)“儿、二”等字由 zʅ 变 ə 的历史

“儿、二、耳”等字今泰州话念 ə，可是很多老年人都说，在他们父祖的时代，即约百年前这些字本读 zʅ。改变的原因呢？据仲一侯先生说：“zʅ 这个古音在苏中一带只有泰州话保存住，可是很难听，被人家笑，于是都改说 ə。”显然，这是由于普通话的强大引力！

泰州话“儿、二”等字读音的奇特，在文献中是有记载的。

李汝珍《李氏音鉴》(1810)“凡例”：

即如儿字，古皆瓤移切，以近时南北方音辨之，读昂移切，吴音或读娘移切。唯泰州方音读瓤移切，音与古同。

同上卷三第二十四问“初学入门总论”：

泰州谓二为让至切。

李氏虽是大兴人，曾长期居住在苏北海州，对苏北方言，相当了解，其内弟许桂林是海州人，与他常相问难。许氏著《许氏说音》(1807)，他也曾提到“儿”字读音。这段话有助于对李氏话的理解。《许氏说音》卷二“音谱丛说”：

而、尔、二，三音古入日母字，此谱应在若冈切内，而今天下之音多读入昂母。秦、晋、齐、楚、燕、赵、滇、黔皆然，不可废其音也。

如以今东海话来对许氏的“十九音”的话，那么其昂母即零声母，若冈切指 ʐ 母字。

这都是19世纪初期的材料，说明当时很多地方“儿、二”等字多读 ər，惟泰州读 zɿ。

19世纪下半叶的《字音集义通考》则明白地记载了此时泰州话已由 zɿ 变成了 ə。《通考》韵分十八部，最末为而部，这是一个独立的部。“儿”等今东台话读为 a，如果《通考》所代表的方言与东台话合，则“儿”等应入嘉部，如读为较早时期的泰州话的 zɿ，则应入支部。《通考》把“而”独立成部，正说明了这个变化。

（六）覃、谈、寒韵牙喉音字和覃韵舌齿音字演变的历史

《广韵》“何”字下注：

又姓，出自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后，封于韩。韩灭，子孙散江淮间，音以韩为何，字随音变，遂为何氏，出庐江、东海、陈郡三望。

这是上古音的阴阳对转，因元音相同，阳声寒部转入歌部。在通泰方言里也有类似现象，“韩”作 xũ，与“何”xu˥很近。

覃、谈、寒韵牙喉音字和覃韵舌齿音字通泰方言为-ū。这种读音在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传声”页四中有记载：

泰兴读甘为官。

在通泰方言里，这批字由-ū变-ɛ̃，主要在泰州话和如皋话里实现。尤以泰州为著。推其历史，《淮南中十场志》说：

至于……以咸为寒……则声之转也。

山咸摄二等字韵母主元音一直为 ɛ̃，不是 ū。“咸”，今泰州人读为开口的xɛ̃˧，彼时当亦然。既然“寒”与之同，当为 xɛ̃˧了，而非 xū˧。

再看百年前的《通考》，它分立闲部与干部。覃、谈、寒韵牙喉音字和覃韵牙齿音字多入干部，可是也有些字被收入闲部，而且其中的一些字两部兼收，如“函、南、喃、贪、勘”等。同时，闲部字又常用干部字如“旱、寒、甘、含”等作反切下字。这说明当时已有些字由-ū变-ɛ̃了。

《泰县志》载高尔庚氏著作“寒肉”条：

腌肉谓之寒肉。

泰州方言的 xɛ̃˧zɔʔ˥一词似应写作“咸肉”，而高氏写作“寒肉”，说明他也读“寒”为 xɛ̃˧。

陈启彤《广新方言》卷一“詉尉”条：

今俗谓以甘言劝慰人曰安慰。《说文》：“安，竫也。”“竫者，停安也。”当以詉为本字。言部“詉”训“尉也”，“尉者上案下也”。詉者，以言案其心也。泰州谓以甘言劝尉曰詉尉，言读不讹。

“詉，从言，夗声。”大徐本：“於愿切。”陈氏以此字代“安”，则在他那时“安”当读 ũ˨˩，“安慰”音 ũ˨˩vəi˧。今青年人“安慰”音ɛ̃˨˩vəi˨˩。

同书卷二“米糂、糂饭”条：

《说文》“粒，糂也。”“糂，以米和羹也，从米，甚声。一曰粒也。”桑感切。今泰州谓饭粒曰米糂，以羹煮饭曰糂饭，音读若酸。

陈氏以今方言音之“酸”sũ˨˩对《说文》大徐注音的“桑感切”，则“感”读kũ˨˩无疑，今老年人还有如此读的，青年人则读感为 kɛ̃˨˩。

同上“衦”条：

《说文》：“衦，摩展也。”古案切。摩展者，摩其褶绉而展平之也。今谓作面曰衦面，此引申之义也。泰州读如管，他处多读若敢。

“衦面”一般写作“擀面”，“衦”，旱韵见母字，因是口语词儿，泰州至今

仍作kɯ̃˨˦,同“管”音。陈氏说:“他处多读若敢。”则是拿他自己的“敢”对外地音如扬州话之 kæ̃上,南京话之 k ã上,北京话之 kan上,可见他已读“敢”为 kɛ̃˨˦了。但“敢”是敢韵字,至今泰州还有人说作 kɯ̃˨˦的,多数人作 kɛ̃˨˦。

夏绍侯《耐庵丛著》二集之二《泰县方言补(附吴陵语录)》指出古浊去今音呼作阴平者多,例中有“断续之断呼为贪”。“断”是古合口一等字,今口语音 t'ɯ̃˨˩。“贪”既与之同音,当亦为 t'ɯ̃˨˩,这是覃韵透母字,今音只是 t'ɛ̃˨˩,唯东乡还有人读 t'ɯ̃˨˩。

总之,从这几条里可以考证出泰州、东台的高级知识分子们的读音情况,陈氏读“安”为 ɯ̃˨˩,“感”为 kɯ̃˨˦,“衦”为 kɯ̃˨˦,夏氏读“贪”为 t'ɯ̃˨˩,都是通泰方言本来的读音。王氏、高氏读“寒”为 xɛ̃˥,《通考》把一些干部字收入闲部,陈氏读“敢”为 kɛ̃˨˦,当是这些知识分子受了官音的影响已把少数字改读成-ɛ̃了。

目前的泰州方言的情况呢?根据我在家乡调查的结果,大致是:“新派”都念-ɛ̃,而“老派”一般念-ũ,ũ变 ɛ̃的音变已达很深刻的程度,可用下列事实说明:

首先,“老派”纷纷改变。现在,“新派”不分文化程度一律念-ɛ̃(只在个别口语还沿袭-ũ音)。在“老派”中,非知识分子今仍多念作-ũ,但不少知识分子很早就改变了。仲一侯先生说,他父、祖和他本人年轻时大多数字也还多念作-ũ(仲先生是陈启彤先生之甥,从此语也可窥见陈氏语音的一些情况),大概四十年前,他改说-ɛ̃。我的一位邻居——姓贡的教师,现年四十余,他说,他很早就改说成-ɛ̃了,但在“南风”等个别词里还说-ũ。近来,-ɛ̃音的势力更是“所向披靡”。例如,十年前,我父亲也常说“感”、“函”为-ũ,而近几年,改了。我的一位亲戚,现年近五十,是家庭妇女,以前都说-ũ,而 1958 年以来,因经常参加学习和地方工作之故,已彻底地变过来了,如今-ɛ̃音已有一统的趋势。

其次,青年人对-ũ音的印象很淡漠。有些出现在使用频率很高的口语词里的字,如“南门”、“寒天”中的“南、寒”,“新派”、“老派”虽各有各的读音,但不碍交际,又如青年人虽读“蚕”为 ts'ɛ̃˥,但碰到[ts'ɯ̃˥t'ɯ˩ɹəɪ.re.ɹ]这一口语,也知道写成字是“蚕豆儿”。可是,很多情

况却大不然，两种读音有妨碍交际的现象。比如老年人说“陶侃”为 t'ɔ˥k'ũ˩，“邯郸”为 xũ˥tɛ̃˩，“韩非子”为 xũ˥fəi˨˦tsɿ˨˦。青年人往往茫然不解，因为他们不那么读。又有一些常见的口语词 fu˥kũ˩tse˧(“河坎子”)、xũ˩ tse˩(“蚶子”)、p'u˥sɛ̃ʔ˧k'ũə˩re˩(“菩萨龛儿”)，一般青年人总觉得这是很土的词，写不出字儿的，其实，这是因为他们把“坎、甘、龛”已读成-ɛ̃的缘故。对于其它几项正在进行的音变，青年人都能借着联想能力运用自发的类推律正确无误地把两个音联系起来，而在这里，自发的类推律的应用范围已经大大缩小了，足证这项音变已处在彻底完成的前夕了。

这三四十年是这项音变加速进行的时代，从这阶段看-ɛ̃和-ũ的对立是“新派”和“老派”的分歧，而不是口语音和书面语音两读。

（七）其　他

邪、禅等母字的读音通泰方言和普通话有一定的出入，分歧在声母上。文献曾有所记载。李汝珍的《李氏音鉴》(1810)，凡例中说：“又如详字，考之等韵第三摄系归邪母。平声为详，去声为象。又徐字，按等韵第五摄，亦归邪母，平声为徐，仄声为叙。又鼠字，亦在第五摄，归入审母，平声为书，上声为鼠。又初字，亦在第五摄，归入穿母。四者皆与近时北音同，而南音读详，晴阳切。徐，全鱼切。鼠，喘武切。初，村舒切。皆与等韵异。”

李汝珍，大兴人，他所说的“北音”是指北京话无疑。“南音”指什么呢？《李氏音鉴》卷五第三十三问“着字母总论”里提到他到过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老师是歙人凌廷堪，内弟是许桂林，许是海州人，东海话属江淮方言。这都使得他有可能对江淮方言和吴方言都有所研究。分析他所述的四字即可证明“南音”指的是什么。“详”字声母，北音 ɕ，江苏省的江淮方言包括连云港市在内都是 tɕ'，吴方言一般是 z(只有少数是浊塞擦音)，至于“徐”字的声母，最能说明问题，吴方言和北方方言一样，是摩擦音，只有江淮方言全是tɕ'，合乎《音鉴》所云。因此，关于江淮方言这些读音事实在《李氏音鉴》里是有所反映的。

而在百年前的《字音集义通考》里，则反映了这批字的一些变化。

“尝、祥、纯、醇、黍、鼠、暑、徐、斜、剩”同于今泰州话的读音，“邪”有两读，按之今音，当一为 tɕʻia˥，一为 ɕie˥。而对于其它有两读的字，就仅记录了其书面语音，这些字是“像、寺、巳、嗣、侍、寻、垂、谢、殊、馋”。

麻韵开口三等字口语音为-a、-ia，书面语音为-e、-ie。这种音变，文献亦有记载。赵瑜（渔亭）《海陵竹枝词》（同治三年即 1864 年刊本）其一云：

侬家孙孙庄前往，许烧奶奶庙里香，哥哥巷口郎等我，姐姐（叶音假）桥头我等郎。（自注：系森森庄、歌舞巷、且乐桥之讹，奶奶庙则古德寺也。）

韩国钧《海陵丛刻》第一种清夏荃《退庵笔记》卷九“奶奶庙”条：

且乐桥讹为姐姐桥，歌舞巷讹为哥哥巷，流俗相沿，亦奚足深辨也。

“且”音 tɕʻia˨˩˧，方能与“姐”[tɕia˨˩˧]相讹。夏绍侯《耐庵丛著》二集之二《泰县方言补（附吴陵语录）》（歙县程小可序于 1936 年）云：

泰音有当世认为土俗，而实与古音合者，不尽俗也。

例子有“蛇、且（斜上声）、车”等，可见夏氏读上三字为 sa˥、tɕʻia˨˩˧、tsʻa˨˩。今泰州人多读“且”为 tsʻe˨˩˧，只在“你且去”中读 tɕʻia˨˩。

《通考》对古麻韵开口三等字的处置：收入“嘉部”（韵母当为 ia）的有“车蛇姐斜”等，收入来部（韵母当为 e、ie）的有“者社借”等，“且邪写”则兼入两部。

关于入声问题，文献也有记载。赵瑜（渔亭）《海陵竹枝词》其一云：

眼（叶音俺）睛耳刀鼻（读平声）子嘴（叶音举），字字方言笑杀人，会义谐声都不讲，单余肉韵最清真（土语为“肉”字不讹）。

这首竹枝词是记述方音的。首句四个词儿，今音为 ɛ˨˩˧tɕiŋ˧，ə˨˩˧tɔ˨˩，pʻiɪʔ˥tse˧，tɕy˨˩˧，“鼻”乃阳入，非阳平。“耳刀”可能当时音 zʅ˨˩˧tɔ˨˩，值得注意的是，赵瑜指出“肉”字不讹。可见当为阳入，今音犹然，zɔʔ˥。

夏绍侯《耐庵丛著》二集之二《泰县方言补（附吴陵语录）》云：

乡谈中有以字之正音不雅而转其音者如“肉”字，如育切，收尾韵，泰音通呼如辱，固不失正音也。而妇女以其音不雅驯，呼如褥，虽《正韵》亦有“肉，如又切，音糅”之说，然音糅者与“食肉”

之"肉"义固不同也,不可以不辨。

这说明在夏氏的时代,"肉"之去声音 zɯ˥已普遍存在了。

夏氏著作又说:

"十"本入声,而亦呼作平声。

我曾询问过泰州人,确有人将"十五"说成 si˩vu˨˩˧,据老人云,四五十年前有些挑箩工人说"十五"为 si˩u˨˩˧,"十二"为 si˩zɿ˩。

三、解放以后泰州方言加速向普通话集中靠拢

与解放前相比,解放后政治、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使方言的集中大为加强。解放后,泰州出外工作、学习的人大幅度增加,同时也有很多外地人来泰工作,人口的流动也加速方言磨损自己特点的过程。文化普及、扫除文盲,青年人多数受过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这就使得书面语的词儿(连同书面语音)和句式大量渗透到口语中来,如今一个老太太也常用"学习"[ɕiaʔ˥ɕiɪʔ˧]来代替口语词儿"学"[xaʔ˥]或"习"[ɕiɪʔ˥]。国家的推广普通话的政策起了重大的作用,通过广播、戏剧、电影,普通话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泰州绝大多数人都听得懂普通话,短期在外出差、开会的人都在外地不同程度地改变乡音,少用土词,尽可能地说普通话或一种"蓝青官话",在外工作、学习的人更不待说了。

应该指出这种现象:我在家乡调查方言,一般不取询问的方法,而是听别人对话或同人交谈,从中注意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现象,及时或随后记在本子上。如果是中老年,特别是家庭妇女,往往使我能搜集到很丰富的材料。而对象如果是学生,所得甚少,因为他们在日常谈话中多使用书面语的词儿和句式,即使口语中有相应的词儿和句式,也多不用。在外工作、学习的人回乡后,语音倒能很快地复原,而词儿和句式却难改回来。

中学生的语音都有一定的改变,因为他们常常听广播,看电影,更重要的是,中学老师有很多外地人,或虽为本地人,却在外念大学,分配或调动回乡任教,他们的语音都有一定的变化。这些老师的学生必然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常问些中学生:"你为什么这样说?"回答是:"老师这么教的。"

近年来泰州方言加速向普通话集中靠拢，表现在：

（一）有些字兼具口语音和书面语音，出现在不同性质的词里，一般说，是不能换用的。然而现在青年人说口语词也改用书面语音了，例如“定做”、“定钱”中的“定”以前说t'iŋ˩，现在说tiŋ˥。“陷下去”原说xɛ̃˩ xa˞ tɕ'y˞，现说ɕiɛ̃˥ ɕia˧ tɕ'y˞。

口语词的另一部分——土词儿，带的口语音尤多，用书面语替换的办法极少见。青年人则是把整个词抛掉，代之以普通话的词儿，例如不说“踱踱 t'aʔ˥t'aʔ˧”而说“散散步”，不说“大小 t'u˩ɕiɔ˩”而说“大儿子 ta˥ə˥tes˧”，不说“外家 ve˩kə˞”而说“姑娘”、“女儿”。

（二）外转七摄开口二等牙喉音字的演变加剧，如“解街夹项”等字产生了齐齿音。又如“界”字，1961 年夏我调查时，陈冕甫老先生认为 ke˥是正音，而青年人认为 tɕie˥才是正音。这说明“正统观点”转移了。

（三）覃谈寒韵的牙喉音字和覃韵部分舌齿音字由-ũ变-ɛ，近年来特别加快，-ɛ̃快成一统局面。

（四）新的音变产生。歌韵牙音字“歌哥可个”不少中学生念成-ɯ，而不念成-u。-ɯ 在听感上当然较-u 接近普通话的-ɤ。

（五）入声字喉塞音尾，青年人普遍不如老年人明朗、清楚。1959 年我见到几个高中生，他们的喉塞音尾也在单读时失落。有些入声字新增阴声一读，如“剧”之 tɕy˥，“跃”之 iɔ˥。

案，1987 年从对胡立群同学的调查中得出的印象是：原来只有口语音的字增加了书面语音，原来两读的字只剩下书面语音，前者如“皆扯”，后者如“监限”，兹不赘言。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房间”一词，如果泰州人在一起的时候则说 faŋ˥kɛ̃˩，如果其中夹有外地人，则说 faŋ˥tɕiɛ̃˩。“善单姓”说成 sɛ̃˥，这就突破了语音规律。它们是山摄开口三等字，这批字泰州都念-iĩ，山摄开口二等字和部分一等字才念-ɛ̃。按理，“善单姓”应念ɕiĩ˩、ɕiĩ˥，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念成 sɛ̃˥则是为了接近普通话，“玩具”不念 ũ˥tɕy˥而说 vɛ̃˥tɕy˥，其理亦然，而且声调也趋同于北京话（泰州阳平与北京阳平调值近似）。“陌上桑”上“陌”念成 mu˥，“玉剧褥”这些原入声字丧失了入声音，“牛”，小时说 ɯ˥，上中学以后只说 niɯ˥，……究其缘由，答云：“都是在中学时老师教的。”

四、泰州方言语音系统由于邻近方言的影响而出现的分歧摇摆

泰州市人口虽只有十一万(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册1987年》载泰州市人口十四万),但是它的语音并不单纯,内部存在相当程度的分歧。

邻近方言的影响是必然的,长期存在的。民国以后,苏北战事不息,泰州相对安定,从外地及附近村镇迁入者很多,这当然更促进泰州方言语音的分歧。

略举几点如下:

泰州方言的tsɿ、tsʻɿ、sɿ(相当于北京话的tʂʅ和tsɿ两组)与tɕi、tɕʻi、ɕi两组字如兹—机、雌—欺、丝—希,多数人能分,也有不少人混,都读作tsɿ、tsʻɿ、sɿ。很多在外求学的人说,他们小时候是混的,后来才分开。有家姓吴的三弟兄,两个大的能分,因为他们外出过,而弟弟却混。因此并不如一些泰州人所云,是个人发音能力造成了混。还有人把pi、pʻi、mi念成pɿ、pʻɿ、mɿ(南通话有此读法)。

除u以外的合口诸韵母和ts、tsʻ、s、z、n相结合的音节,有些泰州人读成撮口呼(声母读成tɕ、tɕʻ、ɕ、Ø),此外tuəi、tʻuəi也有人读为ty、tʻy。现列表于下,将撮口一音附于例字之后。

	ts	tsʻ	s	z	t	tʻ	n
ua	抓 tɕya˨˩		耍 ɕya˨˩˧				
ue	拽 tɕye˥		帅 ɕye˥				
uəi	罪 tɕy˥	吹 tɕʻy˨˩	睡 ɕy˥	锐 y˥	堆 ty˨˩	推 tʻy˨˩	雷 ny˥
uɛ̃	撰 tɕyɛ̃˥		闩 ɕyɛ̃˨˩				
uaŋ	庄 tɕyaŋ˨˩	疮 tɕʻyaŋ˨˩	霜 ɕyaŋ˨˩				
uəŋ	尊 tɕyŋ˨˩	村 tɕʻyŋ˨˩	孙 ɕyŋ˨˩	闰 yŋ˨˩			伦 nyŋ˥
uəʔ	卒 tɕyəʔ˧	出 tɕʻyəʔ˧	术 ɕyəʔ˧	入 yəʔ˧			
uɛʔ			刷 ɕyɛʔ˧				
uaʔ	卓 tɕyaʔ˧	戳 tɕʻyaʔ˧	朔 ɕyaʔ˧				

还有不少人读音动摇于二者间，不能始终贯彻，甲字念合口，乙字却为撮口，音各不同。也有些人音值含胡，声母介于 ts、tɕ 间，u 的发音部位前移。

甚至如"瘸靴"二字是果摄合口三等牙音字，按规律，应作 tɕʻya˥、ɕya˩，很多人如此，可是也有些人读成 tsʻua˥、sua˩，这是一种反方向的类化。

邻近方言把这批字念成撮口的有高邮、淮阴、南通等点（见《概况》页 74、80、93），其中部分字念作撮口的有宝应、大丰、兴化、海安、如皋（见《概况》页 10、26），这种摇摆现象在苏中诸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此邻近方言人口的迁入和与邻县人的交往可能是导致泰州方言分歧现象的原因。当然也可以考虑另一种可能，在苏北多数地方这批字本来是念撮口呼的，由于普通话或扬州、南京方言的影响，才改成合口呼，但是还或多或少地保存了些原来的读法。

解放后泰州地方领导干部很多是泰兴人，因而也受了泰兴方言的一些影响，如有些古浊去字在泰州本来只有去声一读，或在某词里只能读去声，现在反而读成阴平，比如把"内"和"开会"的"会"念成 nuəi˩、xuəi˩。

案，1987 年调查了胡立群同学，他是 1966 年生，道地泰州人，离乡至南京求学才两年，调查时他的乡音很重。可是他念"儿"为 a˥，"够会"（即"会不会"）为"格会"[kəʔ˧xuəi˩]，"舰"为 tɕĩ˥，"嵌"为 tɕʻĩ˩，他声称他在泰州时长期如此念。看来这些现象都可能是受扬州方言和吴方言等影响的结果。

五、结论——泰州方言语音向普通话集中靠拢的途径和方式

对一个具体方言的现状和历史应该作出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描述与探讨，但是我们还应进一步，从具体语言事实的深入研究中发现、概括、总结出贯穿于整个现象中的规律。

泰州方言作为汉语方言中的一种，是跟汉民族共同语及其他方言紧密联系并相互影响的。就在这种相互联系与制约中，泰州方言展开了自己的发展历史。它不断受到其他方言的影响，产生了一定

程度的分歧、摇摆，但是贯彻于泰州方言的近代的和现代发展历史中的主线是向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集中靠拢。

近代和现代，汉语各方言都接受普通话（及其前身“官话”）的影响和支配，各方言都因不同条件而通过各自的具体途径向普通话集中靠拢。泰州方言虽是官话方言的一个“成员”，但是它处在“辖区”的最南缘，跟普通话有相当差距。其东和南是通泰方言的核心地带，紧西邻是公认为宁扬方言代表之一的有着特殊历史、文化条件的扬州方言。宁扬方言及其一员的扬州方言比泰州方言近于普通话，这个具体条件使得普通话在对泰州方言影响、吸引时必然以宁扬方言特别是扬州话为媒介，泰州方言向普通话集中靠拢时必然通过向宁扬方言特别是扬州话接近看齐的具体途径。

解放以后，经济的发展，交往的频繁，文化的普及特别是国家的推广普通话的政策加速了泰州方言向普通话的集中靠拢。

泰州方言音变复杂多样，涉及面广，历时已久。这多种音变都使泰州方言语音逐步削弱和抛弃旧质要素，强化和增添新质要素，而向普通话（其前身为“官话”）集中靠拢。兹提出泰州方言语音向普通话集中的四种模式。

（一）调节。每个方言的语音系统都是一个自身完善的内部各成分间相互依存、制约的系统，泰州方言的若干项音变即是充分利用自身语音系统内的与普通话近似的成分，作自我调节。例如泰州话原有 kɔ˨（“高”）、tɕiɔ˨（“焦骄”），而“教”原音 kɔ˨，为了向普通话的 tɕiau 靠拢，就改读成 tɕiɔ˥，形成书面语音。又如“寒”原念 xũ˥，与北京话 xan阳平 相距悬殊，泰州人就改读为xɛ̃˥，而 xɛ̃˥也是泰州方言音系统内原有的成分，“咸”音即是（咸山摄二等字皆为-ɛ̃）。这种“调节”并不使语音系统内成分的数目和声韵拼合的结构类型有所增减，它只是使某些与普通话音类相当或音值上近似的成分及声韵拼合的结构类型的出现频率增高，反是，则减小，通过口语音→口语音与书面语音兼具→书面语音的长时间过程，亦即强化近于普通话的成分向普通话集中。部分阴平（源于古全浊上及浊去）变为去声也是通过调节力求在调类上向普通话看齐的一种音变。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成分跟普通话的“近似”尚需阐发，上举的泰

州的 ɔ 与普通话的 au，从语音学的观点看，差别甚大，一为单元音，一为复元音，音值之异更不待言。然而在泰州人的自我心理感觉上，自己方言的 ɔ 与北京话的 au 听感相同，音类相当（都是由豪韵字变来的）则是原因之一。又如在泰州人的自我听感上，ɛ̃ 就是北京的 an，ũ与 an 歧异太大可能是造成 ɛ̃ 即 an 的心理感觉的原因之一。泰州人的这种自我听感上的“相同”大有“当局者迷”之势，他们在学习普通话时即以 ɔ 当 au，以 ɛ̃ 当 an，而不去学习复元音，学习舌尖顶上颚，非得“旁观者”指出，或者自己有了语音学训练后方能“觉今是而昨非”。

（二）组新。用方音系统内的原有的语音成分组成新的与普通话一致或相近的结构类型，如蟹摄开口二等牙喉音字“界解”等由（k-)e→(tɕ-)ie，就使韵母系统内增加了一个新成分 ie，这无论在音类上和音值上都同于普通话，而它是由方音的原有成分 i 和 e 组成的。“匣狭”由-ɛʔ 变-iɛʔ 则是在自身语音系统的支配下重新组装，也向普通话靠近了一步。

（三）引进。“儿耳二”在 19 世纪的泰州话里念 zʅ，文献记载如此，故老相传如此。古止摄开口照穿床审禅母字在泰州话变成 tsʅ、ts'ʅ、sʅ，那末日母字念 zʅ，是十分符合语音规律的。但是北京话念 ɚ，强大的吸引力迫使泰州方言于顽固地坚持之后（于《李氏音鉴》可见）还是抛掉了 zʅ 音，改弦更张，念 ə，这对泰州方言来说，是个新成分。由于泰州话有 tsʅ、ts'ʅ、sʅ 而无 tʂʅ、tʂ'ʅ、ʂʅ，所以这新成分 ə 不卷舌，这个引进是适合泰州方言语音系统的“国情”的。案，今有一些泰州人读成 ɚ。

入声字“跃”原音 iaʔ˦，五十年代特别是大跃进时代引进了 iɔ˥，这与北京话 iau去对应。

（四）消变。从与如皋、泰州方言的比较中可知，泰州方言本有疑母 ŋ。北京话无 ŋ 声母，于是泰州话的 ŋ 母也就失落了，今第一人称代词“我[ŋ̍]”是 ŋ 声母的残迹，如果疑母的丢失是很早以前的事，那末现今入声正处在消歇的过程中。不像其他通泰方言那样，阳入与阴入壁垒分明，旗鼓相当，现泰州方言阳入纷纷投向阴入，而且有若干入声字取得了阴声韵的调值（阴平、上、去），有的喉塞收音失落，

有的虽存而模胡，又如 zɿ 这个声韵结构类型的消失。

在这四种模式内，一、二两种是主要的，占支配地位。调节是将语音系统内原有成分加以调整，一方面强化与普通话接近的成分，一方面削弱差异较大的成分，以达到向普通话靠拢的目的。组新则是利用原有的单纯要素组建新的近于普通话的复合成分。至于引进和消变则突破了原有的语音系统。但是方言的稳固性和内聚力使得它不可能大量取第三、四种模式，而是以调节和组新为主。即使是引进，也是在适应方言语音系统的条件下的引进。总之，泰州方言向普通话的集中是一个削弱和摒弃旧质要素，强化和增益新质要素的缓变过程，较之它的过去，音类渐与普通话相当，音值尽可能与之接近。我们相信，今后泰州方言将继续并加速向普通话集中靠拢。

但是还远不到讨论它的消亡问题的时候，尽管有许多旧质在磨灭中，但是它的语音系统基本上仍旧维系着，单元音的 ɔ 并不等于复元音的 au，特有的字调始终保存完好，……这些都说明它的本质仍旧是方言，不是能轻易消亡的。邻近方言的干扰虽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因素，但是是有吸引力的，而且是持续不断的。

本文描述了泰州方言的现状，并研究了泰州方言的音变历史，试图在理论上作些总结。或许可为治方言史或方言学理论的学者提供些一得之见，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下　篇

一　试说通泰方言为三、四世纪汉语北方方言的“后裔”而具有吴方言的底层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幅江苏省方言地图引起我们提出两个问题：

在江淮之间的东南角，有一个范围不大的约一千万人口的通泰方言区，它处在江淮方言和吴方言之间，表现出一系列特点，它渊源何自？

官话方言（江淮方言是其一支）与吴方言基本上划江而守，然而长江天堑并不能把这两大方言截然分开，以扬中县为中心，于东，吴方言越江至靖江、海门、启东；于西，江淮方言在江南伸展出很大一块地区，南京、镇江、句容、江宁、丹徒的方言皆与吴方言迥异。这种局

面是自古以来如此呢,还是经过角逐和斗争造成的呢?

我们认为吴方言在古代是北抵淮河的,江淮之间本为吴语的地盘,4世纪永嘉之乱,北方汉族人民的大批南迁,江淮之间以至江南的今南京、镇江甚至常州、常熟一带为北方话所占领。通泰方言是三、四世纪汉语北方话的"后裔"。

兹述管见如下。

(一)江淮之间和江南古为一体

通常谈到吴国的历史,就会提到太伯、仲雍的奔吴,以为吴最初活动在太湖流域。但是从考古学研究江苏历史,则有另说,曾昭燏、尹焕章《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江海学刊》1961年12月号)、《试论湖熟文化》(《考古学报》1959年4期)二文认为吴国主要是由湖熟文化的荆蛮族建立的,湖熟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西至马鞍山、皖中地区,东至丹徒,武进,南至句容、江宁,北至长江两岸,发现长江北岸遗址的有江浦、六合、仪征及扬州市的胡芦山等处。

1954年在丹徒烟墩山出土宜侯夨毁,从铭文可知,夨最初封在畿内为虞侯,后改封于宜。唐兰先生《宜侯夨毁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2期)认为宜侯是吴国的最早的祖先,夨即《史记》所载的仲雍的孙子周章,"周章在武成之间封为虞侯,隔三十多年到康王时封为宜侯"。学者们认为,毁铭中的"宜"即在丹徒及其附近地区,那么吴最初本在长江南岸,而后向南发展至太湖地区,当然也就必然越江而北伸展其势力,江淮之间特别其南部最初的居民是吴人则是有较大可能的。

再从史籍记载看江淮地区与吴国的关系。《左传》襄公三年(公元前570年):

> 六月,公会单顷公及诸侯,己未同盟于鸡泽。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吴子不至。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认为"淮上"乃吴地,"当在临淮、泗州之境"。《左传》襄公五年:

> 吴子使寿越如晋,辞不会于鸡泽之故,且请听诸侯之好。晋人将为之合诸侯,使鲁、卫先会吴,且告会期,故孟献子、孙文子

会吴于善道。

《穀梁传》襄公五年：

仲孙蔑、卫孙林文会吴于善稻。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

范宁集解：

善稻，吴地。夷狄所号地形及物类当从中国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缓，而言善稻，人名当从其本俗言。

显然，《左传》之“善道”即《穀梁传》之“善稻”。高士奇引阮胜之《南兖州记》：“盱眙本吴善道也。”

《春秋》哀公十二年：

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

杜注：

郧，发阳也。广陵海陵县东南有发繇口。

注中的“海陵县”即今泰州、泰县。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今如皋县亦海陵地，县南十里有会盟原，相传为吴楚会盟处，考春秋之世，吴楚始终无盟会事，意必指此矣。”有意思的是《左传》哀公十二年：

秋，卫侯会吴于郧，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太宰嚭说，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

卫侯在他的扣留地——今泰州以东一带——竟学会了夷言即吴语，这为华夏的人所惊奇，故被记载下来。显然，江淮之间的语言与江南吴语是一致的。

《左传》哀公九年：

秋，吴城邗，沟通江淮。

杜注：

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邗江是。

邗城即今扬州，末口为淮安，皆吴地，邗约在春秋以前为吴所灭，地遂并入吴。

郭沫若《吴王寿梦之戈》(《沫若文集》17卷)云：“邗王是埜戈”的“邗王是埜”即吴王寿梦，吴王又称邗王，邗可作为吴国名的别称，可见江北对吴的重要性。

公元前482年，夫差率大军至黄池会诸侯，与晋争做盟主，是时越袭其后，夫差急欲退回。《国语·吴语》载王孙雒进策语，中有：

必设以此民也，封于江淮之间，乃能至于吴。

这里的“吴”是狭义的，指吴都姑苏。

据上述，可见吴之国境北抵淮，后来扩张至淮北，灭徐、伐齐、侵鲁。吴国都虽在江南，而江淮之间一直为其所有，今扬州、泰州、盱眙、淮安皆吴地。邗沟乃其国境内的运河。

（二）江淮之间在吴亡后的情况

鲁哀公二十二年即前473年，越灭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勾践灭吴后，将吴原有的淮河以南地并吞，将吴所扩张的淮北地放弃。《楚世家》的“楚东侵，广地至泗上”与上引的“以淮上地与楚”正相合。《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

是年为周显王三十六年即公元前333年。那么江淮之间为越所有，达一百四十年。此后则为楚地。

《战国策·楚策》：

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曰：“……楚地……东有夏州海阳。”

元吴师道重校鲍彪校注本对“海阳”的注释是：

卢藏用云，在广陵东，今扬州海陵县。刘氏(按，指刘伯庄)云，楚之东境。

海陵即今泰州。据《史记·燕召公世家》知苏秦说燕是公元前334年，历说诸国，也许次年最后至楚，适楚灭越，拓地于江淮，占有海边的“海阳”。楚领土原不至海，如今灭越，疆域大拓而东至海，故苏秦以此迎合威王。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则是楚占有江淮之间达一百一十年之

久。越虽并于楚，但越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仍是与楚不同的地区。公元前3世纪前期的著作《禹贡》划分天下为九州，其中"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为扬州"，则是二州以淮为界。扬州即越地，以国名当州名。《吕氏春秋》："东南为扬州，越也。"《尔雅·释言》："越，扬也。"皆可证(本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所载顾颉刚先生说)。

秦以后，江淮之间仍与江南为一体。汉高祖封刘贾为荆王，"王淮东"。刘贾后为英布击杀，刘邦复立刘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尽得吴越故地，都广陵，即今扬州。景帝三年，吴王反，起兵广陵，其遗诸侯书中称"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七国之乱平息后，"徙汝南王非王吴故地，为江都王"。

按，汉高之分封诸王固然因袭前代的传统，然语言、风俗也是考虑的因素，如《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 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

荀子之时，楚已灭越，但《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楚"、"越"、"夏"三者并称，可见越之语言仍有特色。

扬雄《方言》是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著作，林语堂《前汉方言区域考》据之分当时方言为十四系，其中吴扬越为一系，早已是汉语方言的一种。

此后江苏的江淮之间的居民并无什么大变动，当仍是吴语区。东汉末战事频仍，《三国志·吴志·刘繇传》：

> 曹公攻陶谦，徐土骚动，(笮)融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

同书《吴主传》：

> 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

《宋书·州郡志》"扬州刺史淮南太守"："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居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故复立焉。"今扬州、泰州等地在西晋时仍为吴语区。

（三）永嘉之乱后大量北方居民迁徙至江淮间

4世纪初的永嘉之乱，西晋王朝崩溃，导致南北分裂。北方战乱频仍，大量人口南迁。《晋书·王导传》："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从永嘉直到刘宋末一百六十年间，多次有居民大规模迁徙。这可从东晋、刘宋的侨州郡县考求出一个大致轮廓，现据沈约《宋书·州郡志》，参以《晋书·地理志》，看看长江下游的移民主要来自何处，重点放在江苏省范围内。司马睿建都今南京，因此今江苏地区成了北方移民的主要地区。《宋书·州郡志》序：

> 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

同书"南徐州"序：

> 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移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割扬州之晋陵，兖州之九郡侨在江南者属焉。故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

《晋书·地理志》"徐州"后序：

> 元帝渡江之后，徐州所得为半，乃侨置淮阳、阳平、济阴、北济阴四郡，又琅邪国人随帝过江者遂置怀德县及琅邪郡以统之。……割吴郡之海虞北境，立郯……七县，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东海……等郡，属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等郡，以属徐、兖二州。

晋陵郡在今常州及其附近；京口即今镇江；海虞，今常熟县东；曲阿，今丹阳；江乘在句容北，可见北方流民满布江南，深入至今丹阳，常州、常熟一带，当然北方话也随之而来。

从《宋书·州郡志》"扬州"序及"（南徐州）南琅琊太守"等条所述，整个北方各州的世家大族及其部曲都有居住于首都及其附近地区的，兹不赘言。

江苏的江淮之间如何呢,从上引宋志"南徐州"序及晋志"司州"后序可见,幽冀青并徐兖司七州皆曾侨置于今之扬州、高邮、泰州一带,其移民来源的复杂不下于长江南岸。据宋志"南兖州广陵太守"条,晋曾侨立辽西郡,统肥如(幽州)、真定、新市(冀州)、路(并州),宋以并广陵郡。清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郡县表卷二"东晋广陵郡"下云:

既侨立兖青并及幽冀五州于江淮间,故广陵与晋陵互有五州之号。……安帝义熙……七年分立山阳、海陵二郡,又领临淮之高邮焉,而所侨之青并二州尚如故。……盖文帝永嘉八年竟割江淮间为南兖州境矣,所领山阳、海陵与本广陵三实郡外,仍侨立南沛……六郡。

再看今长江北岸西起扬州东至南通的情况。西晋时沿江北岸只有广陵(今扬州)、江都、舆(今仪征)、高邮、海阳(今泰州、泰县)五县,海阳是最东的一县。晋安帝义熙七年,将广陵郡分为三郡:山阳郡在淮南,广陵、海陵二郡在长江北岸。

宋时的海陵郡领县六:建陵、临江、如皋、宁海、蒲涛、临泽(宋明帝泰豫元年立),这六县皆在今泰州以东的东台、如皋、泰兴、南通一带。蒲涛县在今南通境,如皋置县即从东晋始。建陵县乃侨县,旧县在东海附近,侨县在今泰州东北70华里,即东台县内。还有宋明帝泰始七年立的新平侨郡的海安县(即今海安),齐永明五年,罢新平郡,以海安县属海陵郡,永明元年又增设齐昌县,则至萧齐时海陵郡领八县。

据宋志,广陵郡(领广陵、海阳、高邮、江都四县,舆与江都并),人口有7744户,45613口,新置的海陵郡,领六县,人口有3626户,21660口。海陵郡虽只有广陵郡人口的一半,但须知西晋时只是海阳县的部分辖地,地广人稀。而永嘉后至东晋末一百年间人口陡增至此数,以致为之立郡、县,可见大批北方人徙居于此。宋末侨立的新平郡的外来户的数字尚未统计入内。

《晋书·毛璩传》:

寻补镇北将军、谯王恬司马。海陵县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议率千人讨之,时大

> 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

据《嘉庆泰州志》，青蒲在泰州东北60华里，今属东台县，谓之青蒲角。此事发生在东晋孝武帝时，所云万户，未免夸张，但可见当时人口的激增程度。

宋末明帝时失淮北四州，再次发生北方流民南徙的高潮，在今高邮、扬州、泰州一带侨立了北淮郡等郡。《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序云：

> 凡诸流寓，本无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15期)云："宋志：'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南徐州今镇江武进一带)，实查则又有司州之广平郡后省为县，豫州之南鲁郡立鲁县，并隶南徐州。五方杂处，无远勿至，盖以此州为最。"据《宋志》，南徐州有420640口，诸侨郡有248440口，可见侨郡人口所占比数之巨。

江淮间的南兖州的北方居民成分的复杂并不下于南徐州。据《宋志》，全州有159362口，三分之二为本土郡县。但有可怀疑者，海陵设置自西汉始，一直至西晋皆是江淮间的最东的都邑，海陵之东则是一片近海的荒地，而至东晋末，突然置郡，当是人口激增之故，除建陵县明确知道是侨置外，其余五县人口也当多是北方流民，因此海陵郡从居民成分说，当与侨郡一致。

总之，永嘉之乱后百余年间，北方人民纷纷迁徙南下，首都自是迁移的重点对象，淮河以南的吴语区涌进大量中原流民，在江南，自今南京而东，直深入至今丹阳、武进、常熟诸县内。江淮之间，本是渡江南迁的必由之地，因此同样有大量北方居民聚集，从此以后北方话占领了江淮间和江南的北部地区，迫使吴语后撤到江南中部。后来两者当又反复斗争，吴语"反攻"，取得了今丹阳、武进、常熟，然北方话则固守于今丹徒、句容一线。

今日的官话方言与吴语基本上划江而峙的局面当奠基于4世纪时。江淮间也于是时由吴语区成了北方方言区。南京、扬州等地乃通都大邑，交通要道，历代争战的场所，所以语言变迁较快。通泰地

处偏僻,故保存古老的成分为多。溯通泰方言之源,当自4世纪北方人民南迁于这一区域开始。

(四)通泰方言具有吴方言的底层

现代通泰方言显然是官话方言的一支,但它和宁扬方言比较起来有若干显著特点,声调六至七个,都分阴阳入(泰州话有若干阳入字并入阴入,那是近现代向普通话集中靠拢的结果),都分阴阳去(泰州、如皋、泰兴阳去混同阴平),古浊声母字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一律送气,这一点与客方言、赣方言(它们也与4世纪永嘉之乱后的北方人民的语言有密切关系)一致,而与多数官话方言不同。通泰方言比一般官话方言复杂得多,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

通泰方言和吴方言有许多相似之处,一般总认为它与吴方言是近邻,必然受吴方言的重大影响,这当然有其道理。不过笔者拟提出这样的假说:江淮之间本为吴语区,直至4世纪,北方方言将吴语逐退至江南武进、常熟一线。但这一带的官话方言具有吴语的底层,千百年来,由于通泰地区僻处东隅,因而保留了较多的古代语言的特点,包括吴语的底层,所以现代通泰方言与吴语近似之处不少,如韵母单元音化,阳声韵尾的丢落使元音鼻化,山咸摄的一等和二等元音有别,依古声母清浊为条件而分出较多的声调,入声有两个,通泰方言中保留了喻三和匣相混的痕迹,等等。

有一点值得提出的是,现代苏南吴方言阴入高、阳入低,而通泰方言则反是,阴入低、阳入高。这是它们的重大区别之一,泰州方言也是阳入字调值(45)高于阴入字调值(43),可是在某些特定的词里,有些阳入字调值变为21,这就低于阴入了。举例如下,并以一个不变的字音作比较:

毒药 tʻɔʔ˥˩ iaʔ˥	毒蛇 tʻɔʔ˥sa˥
腊月 nɛʔ˥˩yuʔ˩	腊八 nɛʔ˥pɛʔ˧
熟人 sɔʔ˥˩ zəŋ˥	熟客 sɔʔ˥kəʔ˧
十五 səʔ˥˩ vu˩	十三 səʔ˥sɛ̃˩

例子详见本文"上篇"关于入声韵消变的叙述(那里提出的是另一种解释),这种变化不是连读变调。这种阳入字在某个别词里是低调的

现象可不可以假设为吴语的“底层”？在如皋、泰兴、东台、姜堰、溱潼的方言里也有类似的现象。

又，在苏南吴方言里，只有丹阳话阳入高(4)，阴入低(3)，独异于其他点，而同于通泰方言，可是丹阳与通泰距离甚远。这令我们想到丹阳一带在古代正是北方汉语与吴方言角逐的场所，北方方言曾深入到丹阳，后来退至镇江、丹徒。丹阳仍旧成为吴方言区，但保留了北方方言的底层。

也许古代进入江淮间和江南的北部地区的北方话浊声母有某种“遗传基因”，而这只在东隅的通泰方言里保存下来，使得它逢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一律送气，又使得它的阳入调值高于阴入调值。丹阳方言在后一点上保留了这一底层特点。

通泰方言跟吴方言在词汇上有很多相同之处，这是通泰方言区的学人都注意到的，此不赘论，这些相通处是长期为邻相互影响的结果呢，还是4世纪的吴方言的底层呢？当然这个假设能否成立，尚须从各方面加以论证。

二、通泰、赣、客方言同源论

如上所述，苏北的江淮之间本为吴方言区，4世纪初永嘉之乱，几乎北方各地区人民都有大批往东南迁徙，“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其后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多次南侵，又迫使北方汉人陆续南徙。建康(今南京)周围是北地流民的麇集之所，而江淮之间乃迁徙的必由之径，其居民成分必于此时大为改观，北方话也由此而进入江淮间。因此若追溯江淮方言之源，当始于东晋南朝时期。

南北朝对峙期间，战争频仍，由于建康是南朝都域，江淮之间成了重要战场，兹举一例，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总师经鼓城，临江屯于瓜步(按，瓜步山在今六合东南)，退攻盱眙，不拔而旋”(《通典》卷一七一“州郡一”)。

此后隋文帝统一中国，隋炀帝为游幸江都，开大运河。“炀帝大业元年(案，公元605年)……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

纪四")。在唐代,江南成了全国最富裕的地区,扬州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一千余年来,大运河成了中国的一条主要动脉,直至清末,津浦铁路起而代之。可以说,自徐州而南,经淮安、高邮、扬州至南京、镇江一线,是北中国和南中国的最主要的通道。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北方政治中心有关的巨量政务都促使这条黄金通道上人员来往极其频繁。一千多年(直至1948、1949年)若干次大小战争使这条通道附近的较大城市如淮安、扬州、南京的人口成分经历了多次的变动,这些都必然使这条通道上的语言不断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些也促使这条干线上的语言与广大的北方方言的发展采取某种协同的步调,因此今日的宁扬方言相对来说,就比较接近于广大北方方言。

而通泰地区甚为狭小,东濒大海,西与这条黄金通道有一定距离,比较偏僻、落后,战乱也少得多,虽然通泰方言为整个北方方言的发展大势所裹挟,但它毕竟僻处东南边缘,又面对着强大的吴方言的"北犯"(靖江南部、海门、启东的吴方言皆由南而来),所以它变得比较慢,保存了较多的古代方言的特点。似可认为,通泰方言是4世纪汉语北方方言的一支嫡系后裔,在黄海与大江所夹的狭窄三角形地带苟存了千余年,直至今日。

操客家方言、赣方言的人民,专家们认为导源于永嘉之乱时的中原居民。北方汉语的这一支系在江西、闽西、粤东北地区独立发展了一千余年,远处于南方山区,脱离了北方汉语的大本营,因而保留了很多的汉语的古老特征。

乍一看来,通泰方言与客、赣方言地理上悬隔过远,而方言面貌也大不相同,特别是通泰方言跟现代广大的北方方言有较多的共同性,这是由于它虽处边沿,但仍在广大的北方方言的阵营内的缘故。

若作较认真的观察,就会发现,通泰方言与客、赣方言有着某种"血缘"上的相近关系,兹述如下。

(一) 古全浊声母今音逢塞音、塞擦音无论平仄一律送气,这是三个方言的共同点。兹以"田"(全浊平)、"跪"(全浊上)、"旧"(全浊去)、"白"(全浊入)四字为例,列举通泰方言的泰州、如皋、南通(后二者据《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赣方言的南昌(据《汉语方音字汇》,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62年),

临川(据罗常培《临川音系》,科学出版社,1958年新一版),客家方言的华阳凉水井(据董同龢《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科学出版社,1956年新一版)、梅县(《汉语方音字汇》)七个点的读音于下:

	泰州	如皋	南通	南昌	临川	华阳	梅县
田	tʻiĩ阳平	tʻiĩ阳平	tʻĩ阳平	tʻiɛn阳平	tʻiɛn阳平	tʻiɛn阳平	tʻiɛn阳平
跪	kʻuəi阴平	kʻuei阴平	kʻue阳去	kʻui上	kʻui上	kʻueɪ上	kʻui上
旧	白 tɕʻiɯ阴平 文 tɕiɯ去	tɕʻiou阴平	tɕʻy阳去	tɕʻiu阳去	tɕʻiu阳去	tɕʻiu阳去	kʻiu去
白	白 pʻɔʔ阳入 文 pɔʔ阴入	pʻɔʔ阳入	pʻoʔ阳入	pʻak阴入 pʻɛt阴入	pʻaʔ阳入	pʻaʔ阳入	pʻak阳入

泰州的"文读",逢仄声不送气,显然都是后起的读音,古全浊声母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都送气,并非个别点的偶然相似,而是三个方言的大面积的雷同,这就值得重视了。我们还注意到,徽州方言也普遍存在这种现象,而徽州与江西地理上紧邻,史载东晋南朝时期,大批汉人进入了山越人居住的皖南山区。具有这种现象的若干方言形成了一个对古老的吴方言、闽方言的包围态势,这是很令人重视并感兴趣的。(案,笔者在六十年代初期,只能向安徽友人索得徽州方言的普查油印资料若干本,近几年发表的报告有平田昌司的《休宁音系简介》,载《方言》1982年4期,可参看。)

(二)阳入调值高于阴入调值是通泰方言的重要特点,而临川、华阳凉水井、梅县亦然,南昌反是。

	泰州	如皋	南通	南昌	临川	华阳	梅县
阴入	43	3	4	5	43	32	21
阳入	45	4	5	21	5	5	4

案，南昌调值据《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1983 年，北京)页 132。又，今赣方言只临川一带阳入调值高于阴入，然不可因其为少数而忽视之。

(三) 这三个方言七个点的声调系统有两种类型。a 型七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b 型六个声调：去声只有一个。古全浊上声字在 a 型里变阳去，在 b 型里变同阴平或在白读里为阴平，而一般说来，白读表现的是更早的音。这在通泰方言、客家话里都有这种现象，“客家话古全浊上声文言变去声，白话变阴平。”(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第 81 页)兹举七字为例：

	泰州	如皋	南通	南昌	临川	华阳	梅县
动	阴平(白)	阴平	阳去	阳去	阳去	阴平	阴平(白)
重	々	々	々	々	々	々	々
淡	々	々	々	々	々	々	々
坐	々	々	々	々	々	々	々
弟	々	々	々	々	々	々	々
上	々	々	々	上声	々	々	々
下	々	々	々	阳去	々	々	々

上表中的梅县音据《汉语方言概要》(第一版)页 154。

(四) 在这三个方言里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古山摄一等寒韵的舌齿音与二等删山韵母主元音相同，寒韵的牙喉音字与合口一等桓韵的韵母主元音相同，上述二者形成对立，前者是前、较低、不圆唇元音；后者是后、较高、圆唇元音(南通有些特殊)。而在咸摄也有类似的倾向：二等咸衔与一等谈韵舌齿音字为一组，谈韵牙喉音字与整个覃韵为一组，在通泰方言与赣方言皆如是，而客方言则不形成对立，韵母相同。我们揣测，这或许是广州话的影响，广州音两组皆为 aːm，或许是客方言自己独立的发展所致。

	泰 州	如 皋	南 通	南 昌	临 川	华 阳	梅 县
删山	ɛ̃	ẽ	ã	an	an	an	an
咸衔	ɛ̃	ẽ	ã	an	am	an	am
寒舌齿	ɛ̃	ẽ	ã	an	an	an	an
谈舌齿	ɛ̃	ẽ	ã	an	am	an	am
寒牙喉	ʊ̃	ʊ̃	ʊ̃	ɔn	on	on	ɔn
谈牙喉	ʊ̃	ʊ̃	ʊ̃	ɔn	om	an	am
桓舌齿	ʊ̃	ʊ̃	ỹ	ɔn	on	on	ɔn
桓牙喉	ʊ̃	ʊ̃	ʊ̃	uɔn	uon	on	uɔn
覃舌齿	ʊ̃	ʊ̃	ỹ	ɔn	om	an	am
覃牙喉	ʊ̃	ʊ̃	ʊ̃	ɔn	om	an	am

要说明的是,覃韵舌齿音字在泰州、如皋、南通、南昌、临川皆有两类韵母。“贪”、“蚕”: 如皋 ʊ̃、南通 ỹ、南昌 ɔn、临川 om。“谭”、“参”: 泰州 ɛ̃、如皋 ẽ、南通 ã、南昌 an、临川 am。“蚕”、“贪”是很土的词儿,而“谭”、“参”则较文。有些覃韵舌齿音字有文白异读,如“惨”字如皋有两读,“南”、“男”、“蚕”,泰州、如皋有两读,泰州东北十余华里的“靳家潭”的“潭”音 t'ʊ̃˥。据此可知,前、较低、不圆唇元音是后起的,当是受寒韵舌齿音字读法类化的结果。通泰和赣方言的这种现象,在个别南方方言也存在,这或许是共同祖语的几个支系同向发展的结果。

在广韵音系里,寒韵与桓韵是一等开口韵与合口韵的关系(在陆法言《切韵》和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里,寒韵未析出桓韵),谈韵与覃韵是一等重韵的关系,这是音韵学界公认的。不过,现代泰州、如皋、南通、南昌、临川五点方言表现出,覃韵与谈韵的关系相当于桓韵与寒韵的关系。在诸家构拟的广韵音系里,山摄一等有合口,而咸摄一等无合口,通泰方言与赣方言的现状启示我们: 在它们的祖语里或许覃韵竟是谈韵的合口,由于韵头 u 和韵尾 m 都有唇的作用,产生异化,导致 u 的丢失,遂使咸摄一等无合口。

本文首次提出通泰方言为三、四世纪汉语北方方言的后裔及通泰、赣、客方言同源的假说,以上论证只是抛砖引玉,亟盼海内外同行

专家不吝指正。

主要参考文献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0年
泰州话里的文白异读　俞扬　中国语文1961年5月号
海陵丛刻　1919年韩国钧辑
第一种　退庵笔记　清夏荃著
第十三种　海安考古录　清王华封著
海陵文征　清夏荃编
海陵竹枝词　清赵瑜　1864年
广新方言　陈启彤　民国戊辰菊月镌于北平，民国十二年癸亥凌文渊序，自序于辛亥。
耐庵丛著　夏绍侯　稿本
二集之二　泰县方言补(附吴陵语录)　程小可序于1936年
二集之四　泰县氏族略　1930年
二集之七　吴陵野纪
泰州方言　高尔庚
俚言古证稿　高寿徵　稿本
字音集义通考　怀恕轩主人茂哉氏编订　约清同治时　稿本
韵史　清何萱　商务印书馆　1936年
音学四种　徐昂　南通翰墨林书局　1930年
李氏音鉴　李汝珍　1810年
许氏说音　许桂林　1807年
古今中外音韵通例　胡垣　1886年
等韵一得　劳乃宣　1898年
淮南中十场志　1673年
乾隆如皋县志
嘉庆东台县志
光绪泰州志
民国泰县志稿　1931年
泰州乡土志(泰州历史)　马锡纯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
春秋地名考略　高士奇
江苏古代历史上两个问题　曾昭燏、尹焕章　江海学刊1961年12月号

试论湖熟文化　曾昭燏、尹焕章　考古学报 1959 年 4 期
宜侯夨毁考释　唐兰　考古学报 1956 年 2 期
吴王寿梦之戈　郭沫若　沫若文集 17 卷
前汉方言区域考　林语堂　语言学论丛　1933 年
晋永嘉丧乱之后之民族迁徙　谭其骧　燕京学报 15 期　1934 年
东晋南朝之吴语　陈寅恪　史语所集刊 7 本 1 分　1936 年
语言与文化　罗常培　北京大学出版部　1950 年

[附录]

《字音集义通考》解析

1959年夏在故乡泰州时，我从一位收购旧书者栾启明先生处得到一部手稿，题作《字音集义通考》，分上、下册。上册是把废弃的账簿反过来加以利用的，下册的纸张、装帧一如旧式账簿。这是一部方言韵书，有一定的价值。

一　作者、写作时间、发现地点等问题

该手稿上册署"怀恕轩主人茂哉氏编订"，下册署"怀恕轩茂之主人编订"，皆印有一图章"兰畦"，"怀恕轩主人"当为别号，前无序后无跋。因此著者的确切姓名及身世无法知道。

该书写作的时间也颇难考证，因为翻检全书也找不着一个记载具体时间的字样。我们只好另找线索。上册既是把旧账簿纸反折过来书写的，那就把它裁开，先来研究这个账簿。这是长年的往来账，在某页的"周二房"名下，记有付房钱的时间：嘉庆十六年，道光三年，咸丰五年、六年至八年。在"周藕船翁"名下，记载的时间是道光十二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接着的是二年。有不少户下虽不书年号，但记载的时间多是二十几，最多是三十，下面接着的是元年、五年、六年。可见这账簿是清道光、咸丰年间的，因为清道光帝在位时间是三十年，所记的货币名称主要是大钱，此外有洋钱、大龙洋、小龙洋、纹银。

只有在账簿废弃后才有利用的可能，因此可以肯定这部韵书的写作时间不早于咸丰。作者用废账簿时，不是依原叠缝反折，而是移开一至三毫米，原叠缝比起现今这个叠缝来，模胡得很，可见反折账簿纸的时间是在账簿废弃不久。再观察避讳的情况，《字音集义通考》(以下简称《通考》)避清穆宗载淳讳，将"淳"字写作"湻"。按《康

熙字典》有“淳”无“湻”，《中华大字典》(1915年)云：“湻”同“淳”，清穆宗讳载淳，避乃书此。同治帝之讳一字，这正合清末诸帝的讳例(陈垣《史讳举例》：“道咸而后，讳例渐宽。前此两名皆讳，道光后上一字与亲王同者不讳。”)。《通考》不讳光绪帝“载湉”之“湉”字。梁僧宝《四声韵谱》刊于光绪年间，讳“湉”字，又将“淳”写作“湻”，亦可作旁证。因此似可断定《通考》作于清同治年间(1862—1874)。

如能知道作者是什么地方的人，那就可以了解这书反映的是什么地方的方言了。遗憾的是，我们对作者一无所知，只好从该书出现的地点来考证了。我们还是先看账簿本身所提供的线索，这是家杂货店，与它来往的户数不太多，而且户数多集中在“徐、沈、张、孙、郜、王、周、庞”等几姓，这家店可能是开在一个大庄子上的。个别户下注明地点，这些地点可能是靠近该地的其他村庄。出现的地名计有“俞家垛”、“小甸庄”、“周庄”(一处作“河北周庄”)、“徐富庄”。俞家垛在溱潼镇西18华里处，小甸庄在溱潼北偏西10华里处，其他二地未详。按，溱潼镇在泰州市东北约30公里处，东台县又在溱潼东北30公里处。据当时所知，收购此书者栾启明先生是离溱潼12华里的姜家庄人，他收旧书的地点多在溱潼附近。因此，这部手稿出现的地点可能就是溱潼北边的某个村庄，而作者可能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我们再研究该书所反映的音系本身，发现这个方言是属于广义的泰州话系统的，更具体说，这个方言的性质介于东台方言和泰州方言之间，二者有分歧之处，它或同前者，或同后者。

经过仔细的研究，我们认为《通考》基本上反映了百年前的泰州话的面貌。

在西学东渐，现代的方言调查方法传入前，能够反映江苏省的江淮方言语音情况的著作是很少的。就我所知，本方言区人的音韵学著作有许桂林(东海人)的《许氏说音》(自序于1807年)，胡垣(浦口人)《古今中外音韵通例》(自序于1886年)，何萱(泰兴人，1774—1841年)《韵史》，刘熙载(兴化人，1813—1881年)《四音定切》，徐昂(南通人)《音学四种》(1930年)。仅保留序而全书恐佚的有姜日章(海安县李堡人，1663—1722年)的《天然穷源字韵》，仅知书名的有

徐英(兴化人)《韵学考辨》,戴清(扬州人)《韵辨》(?)。就前五书而论,这些作者在研究等韵学(即传统的语音学)或涉及到它的时候,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自己的方言出发,因而也就能反映出一些乡音的情况。不过,它们多没有把某一时期的某一方言的全貌记录下来。而《通考》基本上能做到,因此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与上列诸书性质不同的另一类著作,应该受到重视。

它既然是百年前的泰州话语音的文献记录,那在我们研究泰州方音史时它就是一个极其宝贵的资料了。罗常培先生在《汉语方音研究小史》一文中说:

>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从前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而我们现在必得另眼看待的东西,这就是流行于民间的方音韵书。这种书流传于各地的很多,然而搜集起来也颇不易。……这种书本来为一般人就音识字用的,它们辨别声韵固然不见得精确,而大体总是以当地乡音为准,这实在是我们调查方言最好的间接材料。……由此看来,我们对于现代的方音韵书,是实在不应该轻视的。

下面我们首先介绍该书体例,接着对所反映的语音情况进行分析,我们的重点将在于叙述它所能反映的泰州方音史的内容,而这些工作必须与现代的泰州、溱潼、东台诸地的方言联系起来加以比较。

二 《字音集义通考》的体例

这是一部方言韵书,主元音和韵尾相同的字为一个韵部,每个韵部内,声韵相同的为一个小韵(姑且借用这个传统术语。本文只指声韵相同者),在书口写上小韵的名称,多为第一字。不同声调字依次贯连,每个声调标目下类聚一批同音字,先列常见字,末尾多是僻字,天地头上往往补充不少字(僻字居多)。每组同音字的声调标目上方一般多注一反切(也有些没有反切)。每字下都有简单的解释。我们举"风"小韵为例看其体例。(按,新式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原状请见书影。)

平 風陰陽相怒而爲—又教也—俗 峰山嵩也 豐滿也大也盛也歲熟曰— 酆地名周文王所都 封—疆培也緘也 蜂蜜—[下略]

平　馮姓　逢迎也值也　縫以鍼線連衣也　渢弘大聲　漨澤也又水名　鄷姬姓國

上　諷誦也刺也託音曰諷　風因一感物曰一

去　鳳靈鳥羽蟲之首生丹穴山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色備五彩鳴中五音飛則羣鳥隨之雄曰一雌曰凰王者有道則見　賵送葬車馬曰一［下略］

入　福善也備也休也　服衣一湀也治也職也　伏仆也匿藏也　宓姓安也　茯一苓多年樵斫之松根之氣味精英未絶發泄于外結成［下略］

该韵书上册有一目录，一是从《康熙字典》卷首“检篇卷数法”（更早的来源是《经史正音切韵指南》所载之“检篇卷数捷法”）抄来的三十六字母歌诀，这没有什么意义。另一是韵部表：“卷上：东、真、江、京、云、闲、干、天。卷下：支、朱、岐、灰、须、来、高、嘉、州、而。”卷上是阳声韵八部，卷下是阴声韵十部（入声韵不独立，附阳声韵部）。

该书分声调为五：平、平、上、去、入。这两个平声依次实即阴平、阳平。

至于声母，该书没有列出，我们只好从每个韵部所具的各个音节来归纳，再参以今音定其音值。

三　《字音集义通考》的韵母系统

在讨论各个韵部时，我们将把每个韵部的所有小韵列出，原书的名称，本文基本采用，但冷僻字换以常用字，而且在前八部内，促声也取一代表字。原书诸小韵的排列次序凌乱，本文则按一定的声母次序重排。又，原书区分韵部的原则是：只要韵腹、韵尾相同即可为一部，介音不同无妨。因此真、京、云三部之区分违背通例，本文虽不予合并，但把此三部置于一处讨论，视作一部。江部挪为第五部。每部后多附有笔者的讨论，说明今日泰州话的情况（以泰州市的话为代表，如溱潼、东台的话有不同，则特别说明，否则，不再申言其相同），指出这个古方言的特异之处。

1. 东　部

A　崩伯　烹珀　蒙墨　风福　东督　通秃　砻禄　宗祝
　　聪族　嵩粟　戎辱　功国　空哭　轰或　翁屋

B　迥菊　琼曲　兄旭　雍玉

共19个小韵，今泰州话正是。在今泰州话里，A组韵母为oŋ、ɔʔ，声母依次为p、pʻ、m、f；t、tʻ、n；ts、tsʻ、s、z；k、kʻ、x、ø（以后诸部各小韵的声母次序同此，特别者方提出）。B组韵母为ioŋ、iɔʔ。声母依次为tɕ、tɕʻ、ɕ、ø（以后诸部次序同此）。

《广韵》东、冬、钟三韵（举平以赅上去入，下同）字尽在此。而且登、庚、耕三韵的唇音字如"崩、烹、棚、北、百、麦"等入此部，此三韵合口牙喉音字如"国、横、轰"等亦入此部。

2. 真　部

敦德　吞特　能勒　真质　称尺　升实　人入

3. 京　部

宾笔　屏霹　民密　丁笛　厅涤　霖笠　京集　青七　星夕　阴一

4. 云　部

A　奔不　喷勃　门没　分佛　温物　庚格　坑客　亨黑　恩厄

B　衮虢　坤窟　昏忽

C　钧橘　春出　勋述　论碑　云入

中古音的深、臻、曾、梗四摄基本在此。今泰州话韵尾为ŋ。《通考》在此分三部的原因似乎是真部开口，京部齐齿，云部为合口、撮口。如依此原则，云部A组应入真部。"庚"小韵去声"艮、更"等字的反切是"居邓切"，而"邓"在真部，可为证明。

真部及云部A组，今泰州话韵母为əŋ、əʔ、"温物"声母为v。京部韵母为iŋ、iɪʔ。云部B组为uəŋ、uəʔ。

泰州市的语音中有这样一种分歧摇摆现象：一些人口中的ts、tsʻ、s、z、n和除单元音u以外的合口韵母相拼的音节，另一些人读为撮口，还有些人动摇于二者之间，溱潼的语音主要是读为撮口，东台也如此，但有些人对这批字的读音声母在tɕ、ts间，韵母介音在y、u间。《通考》所反映的跟今溱潼、东台话相近。因为一批合口字读为撮口，遂与原之撮口韵相混，如"谆一君"、"存一群"、"孙一勋"、"润一运"同音，这就是云部C组的特点。

"敦、吞"为开口，"泳、永"在云小韵内，皆与今泰州音相符，"人"

字,《通考》既为"云"之入,又为"人"之入。

5. 江　部

A　帮博　庞雹　忙莫　方缚　当度　汤托　郎落　臧着
　昌绰　商芍　壤若　纲阁　康壳　杭郝　昂恶

B　良略　江觉　羌却　香学　央岳

C　广郭　匡廓　慌霍　汪䨜

D　庄琢　窗戳　霜朔

四组为开齐合撮四呼,今泰州话此部字韵腹和韵尾为aŋ、aʔ。本部D组情况同上述云部C组(以后此类情况,不再申言)。

中古微、疑、影、喻四母合口呼字,今泰州话多读成开口呼v声母字,只有主元音为a者如"汪、瓦"则为以u介音起头的零声母字。溱潼、东台亦然,唯东台之东南接近海安之富安镇一律为v-。所以在《通考》的系统里我们列"汪、䨜"于C组。

6. 闲　部

A　颁八　盼拔　蛮抹　凡法　湾袜　丹答　滩塔　兰腊
　斩札　参察　三萨　艰甲　刊掐　闲峡　庵压

B　关刮　环　还滑

C　撰炪　闩刷

今泰州话A组字韵母为ɛ̃、ɛʔ。B组为合口。C组是撮口,参见云部C组。

从"睘"得声诸字如"環、闤、圜、鬟"等今音k'uɛ̃,《通考》亦然,因为"環、還"是对立的。

7. 干　部

A　搬钵　潘泼　馒末　端夺　贪脱　南捋　专辍　川撮
　酸说　阮

B　干葛　宽渴　欢合　安遏

C　捐决　圈阙　宣雪　鸳月

今泰州话A组字韵母为ʊ̃、uʔ,C组为yʊ̃、yʊʔ。

B组字所包括的除了桓韵牙喉音字外,尚有覃、谈、寒韵的牙喉音字。

覃、谈、寒韵牙喉音字和覃韵部分舌齿音字,在泰州话里,由于普

通话的影响,青年人多读为-ɛ̃,与《通考》的闲部相同,但老年人多数仍读为-ʊ̃,《通考》把这批字收入干部,以别于闲部,正是反映了泰州话百年前的本来面貌。

不过,这批字由-ʊ̃变-ɛ̃的事实在《通考》里也有若干反映,我们可从闲部的收字与反切里看出。首先,有些应入干部或已入干部的字被收进闲部,如"闲"小韵有"函、崡","兰"小韵有"岚、男"等字(后又补充"南、婪、喃、啉"等),"三"小韵有"毵、毶、缕"等字(后加"糁、鬖"等),"参"小韵收"参、骖、惨"等,"滩"小韵有"贪、探、潭、赚"等,"庵"小韵有"庵、黯"等,"斩"小韵有"簪","刊"小韵有"堪、勘、阚、刊、看"等。其中的"函、南、喃、贪、赚、勘"已收入干部。其次,看闲部一些字的反切,"奴含"切"兰","洛旱"切"览","都寒"切"丹","苏甘"切"三","苏旱"切"伞","居寒"切"艰","仓含"切"参","傥旱"切"坦","他案"切"叹","苦绀"切"勘",诸反切下字皆干部字。

8. 天　部

A　边别　篇撇　绵灭　巅跌　天贴　年列

B　笺接　谦切　先协　烟业

C　沾折　廛彻　膻涉　然日

本部字来源于中古山咸摄开口三四等字。其韵母泰州话皆为iɪ、iɪʔ。

C组是仙、盐韵的知系字,今泰州、溱潼与B组混,读为tɕiɪ̃、tɕʻiɪ̃、ɕiɪ̃、iɪ̃。而东台不混,C组字读为tsiɪ̃、tsʻiɪ̃、siɪ̃、ziɪ̃。《通考》在这一点上同今东台话。

天部、京部皆为阳声韵,今泰州话韵母分别为iɪ̃、iŋ,因其主元音都是高元音,故相配的入声混同,韵母为iɪʔ。而《通考》厘分为二,是根据这些入声字古音隶属于何阳声韵而定。这种人为的做法有时毕竟露出了马脚,如天部入声有"檄、绩、泣"等字,它们为中古锡韵和缉韵字,应入略部。这可能是因为作者固守着阳声韵与入声韵必须一一配对原则的缘故,否则,天京二部里必有一部成为光杆儿的阳声韵部了。

9. 支　部

支　雌　诗

今泰州话为 tsɿ、tsʻɿ、sɿ。

10. 朱部(附戈部)

波 铺 谋 夫 乌 都 拖 罗 朱 初 书 儒 哥 柯 河 窝

“初”小韵内有“鼠、暑、黍”三字,《通考》作者在上方加注曰:“暑,鼠本赏杜切,误读。”按,此三字中古音为书母字,而苏北很多方言念成 tsʻu 上声,作者虽据实际语音列入“初”小韵内,却曰“误读”。又“夫”小韵内有“巫”,作者也说:“按巫字本讹胡切,俗读扶音,今姑从之。”可见作者对传统音韵学是有修养的,但并非很高,巫是古微母字,却用古疑母字作切上字。所注切语皆以当时当地之音为据。

朱部包括中古音的遇摄字和果摄字。在这一带地方,唯有泰州市的话二者是混的,读作 u,《通考》这种做法与泰州市相符。今泰州市的话古晓匣母字有不少人念成了 fu。而在《通考》的体系里,朱部“夫”、“河”二音节对立,那么“河”只能是 xu 了。再看“河”音节所收字,全是果摄字,而“夫”音节全是遇摄字(包括“胡、虎、护”等古晓匣母字)。

往后翻这部韵书,在嘉部后州部前看到几页,所收字全是古果摄字,反切下字也一律是果摄字,没有名称,我们姑名之曰“戈部”。有下列音节:

波 坡 磨 多 拖 罗 鹾 蹉 蓑 戈 科 呵 阿

为什么又要把果摄字独立出来?将现在溱潼、东台的话调查一下,就会恍然大悟。在溱潼、东台,遇摄字韵母为 u,很紧,且带点摩擦,而果摄字为 ʊ。作者大概先是依今泰州市的话,将两摄字混合,但是又受了自己的方音影响,立了纯为果摄字的“河、窝”二音节。大概后来感到如此终觉不妥,便索性在书末补了个“戈部”。

11. 岐 部

彼 披 霉 低 梯 霓 畿 西 伊

今泰州话韵母为 i。

12. 灰 部

A 杯 培 霏 巍

B 堆 推 雷 追 催 虽 蕤 圭 窥 灰

A 组字今为 iĩ,B 组字今为 uəi。

在泰州话里,止蟹两摄重唇音字,有的为 i,有的为 iĩ。还有些字兼具二音,i 是口语音,iĩ 是书面语音。而在《通考》里有些字岐、灰两部兼收:"被、胚、丕、赔、彼、比、鄙",这说明了今泰州话的"文白异读"现象那时已存在。"被"字,在岐部为篇夷切,在灰部为邦昧切,与今音之 p'i˩、piĩ˥ 相合。

《通考》和今泰州话也有相异之处,表现在岐部的"嵋、煤、眉、梅、玫、每、美、媚、寐"今音为 iĩ 或二音异读。

13. 须　部

闾　居　催　须　俞

今音韵母为 y。

在泰州话里,ts、ts'、s、z、n、t、t'和 uəi 相拼的字不少兼有撮口 y 一音,这种现象在《通考》的时代也存在。须部和灰部皆收的字有"虽、绥、嘴、催、崔、翠、耒、诔、馁",还有些字仅见于须部,它们是"穗、邃、燧、遂、祟"等字。

14. 来　部

A　摆　牌　霾　歪　戥　邰　来　斋　钗　奢　该　开　谐　哀

B　嗟　邪　埃

C　乖　快　淮

D　揣　衰

今音韵母主元音为 e,四组分别为开齐合撮四呼,D 组字的情况同云部 C 组。蟹摄二等牙喉音字在泰州话里只有少数变成齐齿 ie。在《通考》里,这批字仍为开口。B 组的来源为古麻韵开口三等字的一部分,将 B 组收入来部表明作者遵照方言实际语音。"埃"音节在这系统里为 ie,但其中有些字如"埃、霭"今音 e,"涯、崖"今音 ia。"夜、野"等才是 ie。

15. 高　部

A　包　刨　旄　刀　滔　劳　昭　操　骚　饶　高　考　蒿　鏖

B　标　飘　苗　彫　挑　僚　交　敲　霄　妖

今音 A 组韵母为 ɔ,B 组为 iɔ。

16. 嘉　部

A　巴　杷　麻　打　挐　遮　差　沙　惹　卡

B　乜　嘉　斜　些　耶

C　瓜　夸　花　娲

D　抓　瘸　靴

今音韵母 A 组为 a。B 组为 ia,"乜"音节为 mia。"卡"音节和"斜"音节是对立的,所以"嘉、斜、些、耶"四音节为齐齿,"卡"为开口,《通考》系统里就缺少了 ka、xa、a 三音节。C 组韵母为 ua,D 组为 ya。依今音,本部尚缺三音节:"他"[t'a]("他"字《通考》入朱部,应音 t'uɹ)、"爹"[tia]、"曰"[ya]。

中古音麻韵开口三等字今音很多字有两读:口语音 a 或 ia,书面语音 ie。这种现象已反映于《通考》,只是具体的情况有些出入。入嘉部的有"遮、蔗、车、蛇、惹、姐、斜、邪、且、些、写、泻、卸、耶、邪("莫邪"之"邪")、琊、冶",收入来部的有"者、奢、捨、舍、社、射、赦、且、嗟、藉、借、邪、写、谢、冶、野、也、夜"等。其中兼入两部的字有"冶、且、邪、写"。在来部的"邪"下注"通斜","写"下注"通霞"。嘉部的"且"有七野切与七谢切二切,而"野"、"谢"均在来部,此皆二部相通之迹。

《通考》收入嘉部的字今音很多已变成 e 或 ie 了,可见泰州话这百年来有很大的发展。

17. 州　部

A　否　兜　偷　楼　州　抽　收　柔　沟　抠　侯　讴

B　谬　丢　旒　鸠　邱　修　呦

今音 A 组韵母为 ɯ,B 组为 iɯ。

否[fɯ]、谬[miɯ]、丢[tiɯ]三小韵是在另一处补充的。

18. 而　部

本部只有一个小韵,所收字为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而、尔、二"等。

这批字,在今东台念作 a,在约百年前的泰州念作 zɿ。《通考》既不入嘉部,也不入支部,却独立为一部,说明这些字当时念作 ə。今

泰州、溱潼皆为 ə,但据泰州老年人所说,约百年前 zɿ 变成了 ə,而《通考》所纪录的正与此相符,这是项珍贵的文献记载。

总之,《通考》分 18 韵部,实为 17 部,真、京、云三部应合一,戈部应补入。

泰州方言的各项音变在《通考》里多有反映,上面已介绍了一部分,下面我们再讨论两个波及范围较广(即涉及很多部)的问题。

(一) 由于普通话的影响,有些古入声字在今泰州话里增加了阴声韵一读,有些古阴、入两读的字丧失了入声一读。从《通考》可以看出这种发展。

"肉"古入声字,今泰州话有 zɔʔ˥、zɯ˧二音。《通考》既为入声,又收入州部,此为百年前 zɯ˧音存在的确证。

"暴、瀑",《广韵》号韵、屋韵兼收。《通考》既把该二字列为入声,但又在天头写道:"又音报。"而在高部,并音"博号切"。彼时二音均存,今只剩 pɔ˧音,可见入声一音的丧失乃是百年之内事。

(二) 中古音外转七摄开口二等牙喉音字,泰州话本为开口,而今不少兼具齐齿一读,或者只有齐齿一读。《通考》尚能反映此种现象。分述如下:

《通考》真、京、云部的古梗摄字的开口字与齐齿字跟今泰州话相同,来部的古蟹摄字只有"埃"为齐齿。

江部的古江摄字列于开口小韵的有"肛、扛、港、角、项、巷"等,列于齐齿小韵的有"江、讲、降、觉、腔、确、壳、降、学、岳、嶽、乐"等。收字与今音多半相符。但未见一字分别收入开口和齐齿二小韵者,以下各部亦然。也许作者认为同一部内一字出现两处不太好,以前所讨论的两收现象皆属于不同部。

高部的古效摄字收入开口小韵的有"酵、坳",收入齐齿小韵的有"交、郊、胶、校、绞、教、觉、敲、巧、肴、孝、效、咬"等字。与今音基本相符。

闲部的古咸摄、山摄字全为开口,嘉部的古假摄字全为齐齿。此二部的措置距离语言实际未免太远了。

在这个问题上,虽然不能把《通考》当作语言实际的绝对无误的

记录，但是这批字的齐齿音的出现则是确凿无疑的了。

四 《字音集义通考》的声母系统

该书基本上是一音节的每一调注一反切，但反切字很不统一。如灰部“窥”小韵阴、阳、上、去四调分别注“枯规切”、“渠规切”、“苦委切”、“渠贵切”。又如“蒿、息功切”、“星、思营切”。据今音“蒿、思”声母为 s，“息、星”为 ɕ。作者如此做法，只是因为他们都是古心母字罢了。

唯一的办法是从每部所收的各音节来归纳声母系统。结果是十九声母，与今音相符。

五 《字音集义通考》的声调系统

《通考》有五个声调，两个平声（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

讨论两个问题：

（一）入声问题。古清声母和浊声母入声字在《通考》里并为一。那些古塞音、塞擦音声母的浊入字如何归并呢？

首先，它们大多数并入《通考》入声的不吐气清声母的字里去了。如“东”之入中有古端母字“督、笃、衽”等，又有定母字“独、读、犊、毒、瑇”等。

今泰州话确有很多古塞音、塞擦音声母浊入字变成不吐气的清声母阴入字，或者兼具阴入一读。

其次，少数被并入《通考》入声的吐气清声母里去了，有：

东部“趋玉切”：族（从母）、轴（澄母）、蔟（床母）

江部“去约切”：嚼（从母）、膙、噱、郄（群母）

江部“匹角切”：雹、泊、薄、（並母）

江部“窗”之入（《通考》有时没有反切，我们只好叫作“某之入”了）：凿（从母）

江部“汤”之入：铎、剫、踱、喥、伍、澤（定母）（比较“当”之入：度、暯、谑、愫［定母］）

闲部“测洽切”：闸（床母）

闲部“滩”之入：涾、蜡、阘、蹋（定母）

闲部"盼"之入：拔、魃(定母)

天部"谦"之入：缉、截(从母)

东部蒲沃切：朴、仆、瀑、帛(並母)、匐(奉母)

真部昌石切：秩(澄母)

真部他骨切：特、突、凸(定母)

京部毗亦切：辟(並母)

云部"春"之入：掘、倔(群母)

云部蒲没切：勃、渤、悖(並母)

天部他结切：蝶、蹀、谍(定母)

我们知道今泰州话是有阳入调的，古浊入字有一部分变为阳入。上列字中的"轴、嚼、凿、踱、闸"今为吐气清声母阳入字，"族、薄"兼有吐气清声母阳入一读，"截"东台话阳入。也许是因为实际口语中，这些阳入字是吐气的，而次清的阴入字也是吐气的，作者就不自觉地把少量阳入字混进去了。凡人为的归并难免不露马脚！

今泰州话中也确有少数古浊入字变成吐气清音阴入字，如上表中的"朴、扑、帛"以下至"蝶、蹀、谍"都是。

总之，通过具体分析可以知道《通考》对入声字的处理虽然抹煞了阳入调的存在，但还是相当程度地反映了百年的泰州话的面貌的。

(二) 古浊声母去声字(包括全浊声母上声字)在今泰州话里本混入阴平(逢塞音、塞擦音送气)，由于普通话影响，方有很多字变成或兼具去声(逢塞音、塞擦音不送气)。而在《通考》里，这批字被处理为去声，也许又是传统韵书的力量在作怪。然而实际语言使作者不得不现出下列的破绽：

一字两收："被"，岐部篇夷切，又灰部邦昧切，释义同，则前者是吐气清声母阴平字，后者为不吐气清声母去声字，今音 p'i˨、pi˦。"抱"蒲交切，为吐气清声母阴平字，但在"包"音节去声博号切下又补收"抱"字。"祚、助"，《通考》列入朱部"朱"音节去声字中，但在天地头上又写道："祚、助，粗故切"，那又变成送气清声母了。

朱部"杜"，冻互切，是为不吐气清声母去声字，然而，岐部之"题、体、剃"分别用"杜梨、杜里、杜利"出切，"题"等声母为吐气清音，那"杜"也是吐气清音字了。今音 t'u˨、tu˦。

"篦",古並母去声字,依《通考》通常规则应为去声。可是,却归入岐部,"篇夷切",是送气清音阴平字,今读只有 pʻi˩音。

《通考》在声调的处理上不敢完全依据实际语言。平声之分为二,那是因平分阴阳在音韵学上还有相当久的传统之故。作者对音韵学是有相当修养的,因而在上述大问题上就为传统所束缚,但我们在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后,仍能发现,它是怎样反映当时的泰州话的实际的,从而也就为我们的方言史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校后记]

拙稿于1965年后即束之床下纸箱内。1986年我出席第十九届国际汉藏语学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晤桥本万太郎先生,9月12日晚谈及通泰方言,论及此文,桥本先生热情建议我将此文发表于AA研究所的刊物上。盛情难却,乃于1987年暑假修订定稿。不意今竟刊于纪念桥本先生的专号,能不凄然?

1988.3.31

我在北京大学做汉语史研究生时,热衷于家乡方言史的研究,1961年至1964年5月共写了六稿,竟成了十万余字的长文。自知无法发表,但自己的心血又舍不得丢弃,只得束之床下,"文革"中辗转寄存于同志家。终于在1986年得晤日本桥本先生,承桥本先生盛意,建议将此文发表在他主编的刊物上。1987年岩田礼先生一再催促,于是酷暑中取出发黄的旧稿,略加修订,妻、儿、女助我誊抄,毕,请阿辻哲次先生带往日本。赖岩田礼先生、平田昌司先生、中嶋干起先生大助,始得发表于日本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アジア·アフリカ語の計數研究》(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 African Languages)第30号,1988年3月。这次承江苏教育出版社诸公厚爱,得以收入本集。谨致谢忱。

再赘几段。

近魏至师兄示我一笔记本,前为魏建功先生《韵书研究纲目》稿,末有三页:"1961年秋鲁国尧自泰县回京,携示乡人旧书所得《字音集义通考》稿本。稿用账册翻背书,题'怀恕轩主人茂哉氏编订',有'兰畦'长印。"(下录韵目)"共计十八韵,是按苏北方言归成韵类,其

地域当是泰东范围，以注音字母对照之，得其分类：……”

拙文发表后，东京大学平山久雄教授赐函云：“我早就拜读过您的《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受到一种强烈的感动。由于著者您是有深造的语言学家和文献学者，又是道地的本地人，用了将近三十年的工夫，屡次易稿，所以大作从横纵两面把泰州方言的音韵分析得彻底无遗，可谓是尽了学问的能事。各方面创获良多，使人津津有味。如此内容塌实可靠而且多彩丰富的方言研究，我觉得是不多见的。像赵元任先生的《钟祥方言志》确实为一部名著，但其重点在于描述，不在说明事实，因此不能像大作这样叫人感到丰硕深入。我特感兴趣的是泰州话逐渐通过扬宁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具体情形，这足以使我们设想：过去音韵史上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渐变，产生文白异读，甚至使白话音完全消灭了，这表面上看来是发生了音变，其实就是语词读音的标准化。”(1988 年 9 月 12 日)近承平山先生同意刊出此函，谨致谢意。

周法高先生《记董同龢先生》文：“他曾经说：‘苏北如皋、东台、泰县一带的话，现在虽然属于下江官话区，可是底子是吴语，因为阳去声白话读阴平，文言读去声，入声分阴阳，可以看出具有七个调，和吴语的声韵系统相似。’董是在如皋生长的，虽然他的祖籍是武进。他的弟子丁邦新先生也是在如皋生长的，曾经写过一篇《如皋方言的音韵》，登在《史语所集刊》第三十六本(1966)。我是在东台生长的。魏建功先生是在如皋生长的，曾经写过《阴阳桥》一文，说明如皋方言里面的鼻化元音很多，鼻化元音是古代阴声和阳声对转的桥梁。而吴语里头鼻化元音也很多，甚至失去鼻音。在我的家乡有好些人家也传说是苏州一带搬去的。像董先生这个见解就很具有启发性。丁邦新先生也赞成此说，不过现在南京大学任教的鲁国尧先生(大概是泰县人)却主张泰县、如皋、东台一带的方言，是用客家方言做底子，并写成一文发表。究竟谁的说法对，还要详加考订。”(香港《中国语文通讯》第十三期，1991 年3 月)

有的师友怀疑通泰、客、赣方言同源说，因为该说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古全浊声母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皆送气，而事实上有些客方言并不送气。

平田昌司先生1988年2月12日赐函云："大作讨论通泰先史文化，利用考古学材料，使我十分钦佩。不过，最近三十年来的考古学收获好像相当丰富，五十年代的有些内容未免陈旧了。"

俞扬同志是最早发表研究泰州方言文章的学者，自与他在1960年订交以来，我一直得到他的无私的帮助。本文六十年代初期的几稿曾请他看过，1988年正式发表后，又请他赐阅，今以案语形式转录其1990年的批语，以谢畏友之助。我录胡立群同志1987年的读音和俞扬同志1990年的批语目的是记录语言的真实面貌。古语说："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我模仿说："方音不同，有如其面。"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尊重事实，记录方言的歧异现象，当然我们并无因差异性而否认共性的意思。现在的方言调查报告及论著多不能显示差异性，或因调查肤浅，或因主观"定则定矣"。好的方言报告、论著应显示不同的变体，而且要说明什么年龄的人、什么地方的人、什么文化的人发的音，我管它叫"三维"，应该提倡"三维调查"、"三维描写"。要说明这些歧异的音存在于什么样的语词里，犹如词典里不同的义项要有书证，那么不同的"音项"须有"词证"。例如泰州话的"泽泊潭社"的口语音存在于地名里，"宕贱暴欲"的口语音存在于少见的口语词或俗谚里。这俞扬同志比我了解得多，他是语言学名家方光焘先生的高足，除了在1962年大学毕业后在京陕工作过几年外，一直在家乡，现任《泰州地方志》主编，他的勤奋、严谨、研究条件都使他成为泰州方言的权威，他正撰写《泰州方言研究》的巨著，我相形见绌，只是在泰州方言的历史方面做了些研究工作而已。

在这里我要叙述一下"通泰方言"命名的由来。长江北岸的运河之东黄海之西的这一带的方言，《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名之曰"第三区"，六十年代初期我命名为"通泰方言"，因为通州和泰州是这方言区的最大的城市，是东西两极，东边保留方音古老的特征最多，逐渐向西倾斜，泰州话受普通话的影响最深。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叫"泰通方言"，泰州在西汉时就设县，叫海陵县，如今的这十个县市皆为古海陵县辖地，后来陆地向海延伸，生齿日蕃，于是历代陆续析置新县，似乎"泰"应在前。我答道，这有深层的文化背景，民

族英雄岳飞当时任“通泰镇抚使”，现在泰州城内的泰山(一名岳墩)相传为岳飞抗金时令军士负土，一夜而成，上置锅巴，以示粮足，迷惑围城的金军使之撤围而去，所以我取“通泰”二字命名。又，不自觉地符合汉语习惯：“通”平声，“泰”去声。“文革”后的命名“泰如片”只取西区和中区二地名首字，欠概括之意，而南通话是官话方言中最复杂的，也最具价值的方言。

汉语诸方言中，通泰方言及江淮方言是研究得较差的，我认为通泰方言很值得研究，1991 年顾黔同志从我念博士课程，她是泰兴人，我建议她以通泰方言作博士论文的题目，欣其能成文。通泰方言的兴化话，中区(如皋、泰兴话)，特别是东区(南通话)需要深入研究。

为保存历史原貌，这次在国内刊行时，本文只改正若干错字，加了俞扬 1990 年的批语若干条，遵责编叶笑春同志建议，在篇首加了提要，以与全书体例一致。近年读《汉书》、《三国志》及《三都赋》所得的几条史料都补在《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一文中。1989 年、1990 年我为撰写《切韵序史实考》、《长安论韵考》、《新切韵年表》，阅读了大量史籍，首次提出“南朝通语”“北朝通语”说，即自晋永嘉年间起的北人大规模南徙导致了黄河流域的北方方言伸展至江淮地区即原吴语区及楚语区的北部，历二百余年，至南北朝后期形成了以洛阳话为标准的北朝通语和以建康话为标准的南朝通语。1990 年、1991 年我在日本作学术讲演时，向学界提出了此说。归国后著于文字，写成《客家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1992 年发表于《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一书中，1994 年收于《鲁国尧自选集》中，文题更为《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较之《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我的学术观点有进一步的发展。

回忆 23 岁时起草此文，历六稿 26 岁时成文。当时在师、父的教导和支持下，研究家乡方言史如痴如迷，反复深入调查，穷辑文献资料，勇于提出假说，试作理论概括，真可谓少年气盛！三载寒窗，积成这 20 公分厚的一堆原稿及资料，手抚旧物，念而今“鬓垂素发”，已至花甲，能不感慨？

1997.12

书 影

1、《字音集義通考》目錄

字音集義通考

目錄

一序二凡例三內足即疑群為說定四[illegible]五知

聲等六內反明五七為基非為微八本精清從心邪

[illegible]十[illegible]照穿[illegible]十一[illegible]十二[illegible]十三

論中[illegible]十四來日十五全

卷上

東　眞　江　京

雲　閒　干　天

卷下

支　朱　歧　灰

須　來　高　嘉

州　而

二、《字音集義通考》卷之上

字音集義通考卷之上

濂恕軒主人茂哉氏編訂

東部

(平)涷 瀧｜沾漬也 苳 州名 𡍮 地名 鶇 ｜鳥名海青 瘷 惡氣所傷病 菄 菜名

東 四方之首 冬 四時之末 零 雨兒 娻 東方國名 夷 狄 鰊 魚名似鯉

蝀 蝃｜虹之兒 也 崠 山脊 䍶 獸名 似羊 一角一日

似有 西而 愚不 意也 各 古字 冬 鶇 鳥名 似鳥而小 棟 髮亂兒 鬆白

(上)董 薡董 姓 州名 蝀 東朝 石声 鼕 鼓声 爞 女字 㜵 走兒 ｜封 埬 心 蠢 蓳 草名 蓳 蒲州而名

細以 懂 心亂 悸 恫 也 墥 ｜ 嚨 多言也 膧 肥也 箽 竹器 揀 似｜擊也 鼕 鼓聲｜｜

去 棟 屋柱 洞 深也 朋 引山也 凍 夏雨 月 暴 湩 乳汁 涷 冰｜

動 作搖 ｜也 峒 山也 硐 ｜穴 酮 泠也 湩

入 督 正也 ｜考 竹 石落 鸐 獨 ｜ 鸐 礑 嬻 韣 毒 害也 讀 ｜誦 篤 厚 犢 牛也 黷 ｜ 瀆 溝 嬻 慢也 讟 痛也 怨

讀 亦音豆

東 部 東 風

二

都龍切 涷 声又去 㑂 ｜偽 錬 釘軸 蝀 頭兒 鰊 鯛 駷 馬也 名 魗 醜 趚 走兒 腖 傢

多貢切

凡物自動則上声 使物動則去声

琮 瑹 多 徒 讀 亦音豆

三、《字音集義通考》卷之下

字音集義通考卷之下

懷想軒茂之主人編

支部

四、「湆」

五、作者利用账簿背面书写《通考》，账簿之一页「周二房」

新附：魏建功先生手泽

1961年秋鲁国尧自泰兴回京携示其乡人搜集旧书所得"字音集义通考"稿本。稿用泰州国（?）翻肯书，题"情怨轩主人茂戬氏细订"，有"兰畦"长印。首列目录：

一序 二见溪 三晓匣群疑 端透定泥四 澄娘彻五知 帮滂六内并
明並七方整 非敷微八奉 精清从九归 心邪十内审 照穿床十一
审禅行十二 晓匣影十三 喻母居十四 来日十五宜

盖曾计划依三十六字母排声序，列韵字而仅具目，尚无正文，其序文亦缺。次列韵目：

卷上
东 真 江 京
寒 南 干 天
卷下
支 朱 歧 交
须 来 高 嘉
州 而

共计十八韵，是按苏北方言归成韵类，其地域当是泰兴范围。以注音字母试对照之，得其分类：

东附入 ㄨㄥ 东风熏宗飒春弓雍翁嵩聪翁空功琼崩戎迥通
(ㄥ)
ㄩㄥ

真附入 ㄣ 真 敦 人 吞
ㄥ 陞 称 能
(ㄨㄣ)

江附入 ㄧㄤ 江 央 当 方 厖 臧 姜 忙 香 杭 荒 良 卬 庄 康 狭 汪 匡 邦 商
ㄤ 壤 纲 光 窗 昌 汤 霜
ㄨㄤ

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

提要 本文论述自永嘉起的北人大规模南徙导致了黄河流域的汉语北方方言伸展至江淮地区即原吴语区及楚语区的北部，历二百余年，至南北朝后期形成了以洛阳话为标准的北朝通语和以建康话为标准的南朝通语，本文首次明确地提出这一新说。笔者认为，客家方言导源于南朝通语，继而考证现代江淮方言的东支——通泰方言是南朝通语在原地的嫡系后裔，又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论证通泰、赣等方言与客家方言同源。本文还建议从现代客、赣、通泰方言对南朝通语语音的某些特质作尝试性的探讨。

一

关于客家及其语言的研究，据文献记载，实自清代嘉庆（1796—1820）初年徐旭曾、黄钊起，1933年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将这一研究推上了高峰。[①]

罗常培在其1942年所作《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中写道："我尝说，如果有人把客家问题彻底的研究清楚，那么，关于一部分中国民族迁徙的途径和语言演变的历程，就可以认识了多一半。从事这件工作，一方面固然可以拿语言的系统去推迹民族迁徙的途径，一方面也可以拿民族迁移的历史去联络语言的关系。"[②] 若是用现在的术语说，罗常培在这儿既强调了研究客家及其语言的重要性，也提出了研究的方法论。近五十年来，中外的后续者们多是按照这一"语文发展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③] 的方法进

---

① 张卫东、王洪友《客家研究·前言》，《客家研究（第一集）》，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②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③ 吴玉章《〈语言与文化〉题词》，上书书首。

行研究的。

客家迁移运动的五期说已为学界所公认,其源始于公元4世纪的"永嘉之乱"时北方汉人的大迁徙。公元220—280年的魏蜀吴三国分裂时期结束后,中国统一于西晋王朝。公元291年,爆发了司马氏皇族内部的"八王之乱",长达十六年,生灵涂炭,引起了农民的起义,也使居住于中国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各族纷纷起事。公元304年,匈奴族刘渊在今山西离石举兵,从此开始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公元311年(晋怀帝永嘉五年)4月,羯人石勒追击晋军于东郡,"王公已下死者十余万人",[①] 六月,刘曜攻入晋都洛阳,"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②] 俘晋怀帝。公元316年刘曜攻陷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中国北方长期陷于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状态,像走马灯似的出现了十七个政权。中原大乱,黄河流域的汉人如潮水般南逃,《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公元317年,晋宗室琅玡王司马睿在南逃的北方士族的拥戴下于建康(今南京)即位,是为晋元帝,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史称东晋,此为南朝之始。经刘宋、南齐、梁、陈,历273年,直至隋王朝统一中国。

4世纪初,中原汉人都把建康的司马睿当作正统,因此南逃的主要路线是渡过淮河,有些人定居下来,有些人以及后来者则进而渡过长江,首都建康及其周围地区自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云:"至南来北人之上层社会阶级本为住居洛阳及其近旁之士大夫集团,在当时政治上尤其在文化上有最高之地位,晋之司马氏皇室既舍旧日之首都洛阳,迁于江左之新都建业,则此与政治中心最有关系之集团自然随司马氏皇室,移居新政治中心之首都及其近旁之地。王导之流即此集团之人物,当时所谓'过江名士'者也。"[③]

何止建康及其周围?当时长江中下游两岸遍布北人。罗香林云:"客家先民东晋以前的居地,实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

① 《晋书·怀帝纪》。
② 《晋书·怀帝纪》。
③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0页。

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换言之，即汉水以东，颍水以西，淮水以北，北达黄河以至上党，皆为客家先民的居地。……客家先民虽未必尽出于这些地方，然此实为他们基本住地。……客家先民第一次迁移运动的途径，远者自今日山西长治起程，渡黄河，依颍水，顺流南下，经汝颍平原，达长江南北岸；或者由今日河南灵宝等地，依洛水，逾少室山，至临汝，亦经汝颍平原达长江南北岸。要之，客家先民第一期的迁移，大抵皆循颍、汝、淮诸水流域，向南行动，这是可从该地自然地理推证出来的。"[1] 为了安置自北方南迁的士民，东晋及其后的刘宋大量设侨州郡，罗香林根据侨州郡的历史记载及客家家谱，指出客家先民流徙的足迹，"东起今日安徽当涂，西达今日江西九江，南达吉安以至赣县"。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的民族迁徙》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淮域诸支流皆东南向，故河南人大都东南迁安徽"，"安徽省境内侨民之来自北方诸省者以河南占极大多数"，河南山西移民也有不少进入今江苏地区，或迁至武汉、黄梅甚至襄阳地区。[2] 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也论及北方士族集团的南迁路线及新居留地问题，兹不赘述。

可以说，西起江陵东至镇江的长江中下游的两岸布满了大量的南迁北人，当然也包括"客家先民"在内。实际上就是北方的汉人逃到吴地、楚地，他们把北方的先进文化、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对于长江中下游的开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南北朝时特别是梁时，南方的经济、文化远胜北方。对我们研究语言史的学人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这批南迁的汉人把汉语北方方言由黄河流域带到了长江中下游，使公元 4 至 6 世纪的汉语方言地图大为改观。《晋书·元帝纪赞》："经略区区，仅全吴楚。"从方言学来说，淮河以南、长江下游本为吴语区，长江中游本为楚语区。南朝时期"扬州"的建康原是三国时期的吴都，另一重镇号称"西府"的荆州的江陵则是先秦时期的楚都。楚文化和楚语的影响绵亘之久世所周知，此不赘言。现在着重讨论吴语区的范围。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指出，永嘉之乱前今南京地

①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第一集）》第 39 页。

②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的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 15 期，1934 年。

区本操吴语。此已成定谳。但吴语范围究竟如何？有的专家如张琨先生只泛言吴语范围比现在大，而未确指。[①]根据鲁国尧的研究，吴语区原北抵淮河。[②]《左传》襄公三年（前570）："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认为"淮上"乃吴地，"当在临淮、泗州之境"。《左传》襄公五年（前568）："孟献子、孙文子会吴于善道。"高士奇引阮胜之《南兖州记》："盱眙本吴善道也。"《春秋》哀公十二年（前483）："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杜预注："郧，发阳也。广陵海陵县东南有发繇口。"海陵即今江北淮南的泰州市、泰县。《左传》哀公十二年："卫侯会吴于郧，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卫出公竟在拘留地——今泰州以东一带——学会了"夷言"即吴语。鲁哀公二十二年（前473）越灭吴，将吴原有的淮河以南领土并吞，将吴所扩张的淮北地放弃。《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勾践所以只取吴地，正如《吕氏春秋·贵直论·知化》所云："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楚威王灭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战国策·楚策》载苏秦说楚威王语：楚地"东有夏州海阳"，元吴师道重校鲍彪校注本对"海阳"的注释是，"卢藏用云，在广陵东，今扬州海陵县"（按，即今之泰州、泰县）。越虽并于楚，但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仍是与楚不同的地区。《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楚"、"越（含故吴）"、"夏"鼎立，可见三者的文化及语言各具特色。秦以后，江淮之间仍与江南为一体。汉高祖封刘贾为荆王，"王淮东"。贾死，复立刘濞为吴王，尽得吴越故地，都广陵（今扬州）。景帝时平七国之乱后，"徙汝南王非王吴故地，为江都王"。从国名、都城皆可见淮之南为吴地。《汉书·枚乘传》载枚乘说吴王刘濞辞，有"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

① 张琨《论吴语方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6本，1985年，台北。

② 鲁国尧《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日本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アジア·アフリカ語の計數研究》第30号，1988年。

仓”,“深壁高垒,副以关城,不如江淮之险”。海陵,今泰州,在江淮之间。从枚乘之语可见淮为吴之界河。从《史记》、《汉书》有关吴楚七国之乱的诸篇可见吴王渡淮方为出境作战。扬雄《方言》中“吴扬越”连言,这地区的方言早已该是汉语方言的一支了。《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载,曹操征令江北居民内移,“民转相惊”,广陵户“皆东渡江”,因为他们是吴人。又,《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注引袁准劝曹爽捐淮汉以南的一段话:“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对抗。……当今宜捐淮、汉以南,退却避之。”此有力地证明了淮以南为吴人地盘。《宋书·州郡志》“扬州刺史淮南太守”条:“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居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故复立焉。”可见西晋时江淮之间是吴语区。晋左思《三都赋·序》:“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吴都赋》:“覵海陵之仓,则红粟流衍。”海陵,今泰州,三国、晋时人都视作吴地。

历史性的转变就发生在永嘉之乱后的北方汉人的大迁徙,汉语的主要三支——通语、吴语、楚语——长期三足鼎立的稳定局面被打乱了。北方汉语地域广袤,使用人口最多,文化发达,具有标准语的地位,我们借用扬雄的术语,谓之“通语”,吴语、楚语乃是南方的两支汉语方言。由于战乱,成千上万的北人涌进了吴语区和楚语区的北部,“喧宾夺主”,历南朝近三百年,西起江陵东至镇江的长江两岸成了通语的“占领区”。

汉语北方方言在跨进江淮新区以前,其内部就没有地域性的差异吗?《宋书·州郡志》:“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西起雍凉,东至海,这么一大片地区肯定有方言的差异,但大同超过小异。自东周以来,洛阳长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话具有权威地位,而使其他方言臣服。若说永嘉之乱前的一段时期,各方言的相互稳定状态已由于内乱而受到一定冲击,那么永嘉之乱则是高强度的冲击力,成百万的北方流民在混乱的逃亡过程中,必然相互“交流”方言;渡过淮河或长江以后,固然有的是同乡聚居,因而南朝政府设置侨州郡,但是这些侨州、侨郡、

侨县都是混杂交错的，尤其是今镇江、常州一带的南徐州和以扬州为中心的南兖州。《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载永明元年（483）柳世隆语："凡诸流寓，本无定憇，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显然这是普遍情况。流民们在犬牙交错式的新居留地，既要接触土著居民的方言，也要与先后到达的其他北方人交际，这都促进了新区的北方方言的融合，如同一只筛子的平面上各色豆子原本各居一区，一经外力的激烈颠簸，各色豆子就要混处杂陈了。

近三百载的分裂，人为的隔绝使得原本一源的黄河流域的北方方言与淮南、长江中下游的北方方言二者间的分歧逐渐加大。颜之推（531—597）《颜氏家训·音辞篇》："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自颜含随晋元帝渡江，至颜之推，已历九世，若至颜思鲁、颜愍楚，则为十世。这么长时期，南方一支必然受原地方言的影响；而北方，少数民族的各种语言尤其是匈奴、鲜卑的阿尔泰语作为统治者的语言对北朝汉语的作用自不在小。到了南北朝后期，即梁与北齐、北周鼎峙时，中国已形成了两个通语，黄河流域以洛阳话为标准，而江淮地区则以金陵话为标准。《颜氏家训·音辞篇》指出"帝王都邑"的语言具有权威性："独金陵与洛下耳。"在建康，百姓说吴语，而士族与官员则说南方通语。即以颜氏家族而言，自九世祖南渡后一直居于金陵，颜之推父亲颜协晚年居于江陵，之推本人生于江陵，长期随湘东王萧绎（即后来的梁元帝）居江陵，只在551年为侯景军俘至金陵，约一年左右，此后再也未至金陵，但他十分坚持、强调金陵话的正宗地位。又如沈约（441—513），吴兴武康人，是吴地士族，但他与北方士族的后裔陈郡谢朓、琅琊王融、汝南周颙共同提倡四声论，这"四声"肯定不是就吴语而言的。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的杰出学者，556年他奔北齐都城邺，577年周武帝平齐，他入北周都城长安，此后仕隋，这一特殊经历成就了他的名著《颜氏家训》，这是一部比较文化学的著作，比较了北朝和南朝的思想、礼俗、文学、书法等等，持论公允，实事求是。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南朝通语和北朝通语的论述："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𫐐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

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至邺以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词,少为切正,李季节著音韵决疑,时有错失;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疏野。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颜之推在邺二十余年,只见崔氏叔侄、李氏兄弟语音标准,他指责北方学者李季节、阳休之的音韵学著作的失误。他认为冠冕君子,南方为优,就是说南朝通语优于北朝通语。另一位南北朝末期的学者陆德明(550—630)在其《经典释文》中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沉浊。"也指出两个通语的差异。

罗香林所说的"客家先民",自中原地区迁至长江流域,生息繁衍,子孙后代操的就是南朝通语。唐末黄巢大起义,迫使客家人作第二次迁移运动,罗香林云:"当时全国云扰,民无宁居,惟江西东南部(即上饶以南,赣水以东),福建西南部(即旧日汀州所属各县)及广东东部东北部,侥幸未受灾害,比较堪称乐土。其在东晋第二支派逃难汉族即客家先民之栖息于河南西南部、江西中部北部,及安徽南部西南部的,至是遂有一大部分很幸运地得迁于上述的乐土居住,盖他们前此已分处大江南北,易入鄱阳湖平原、溯赣江而至赣南,更折东,经石城而至闽西南如宁化等地。"[①] 他们进入大山区,易于保留语言的原有的古老的成份;但是"即使是自花授粉的植物,近亲繁殖的动物和克隆化的微生物,在长期生活和繁殖过程中,也会累积自然的突变。"[②] 语言也是这样,即使在颇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本身也会缓慢地变化。与留在长江流域的姐妹方言(也在时间的长河中经历着遗传与变异的衍化过程)分道扬镳以后,客家人的语言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色彩的客家话。

①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第一集)》第19页。
② 沈大稜《遗传学基础》(化学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160页。

二

除了客家话导源于南朝通语外,现代江淮方言也是南朝通语的嫡系后裔。前面我们已论证东晋以前,吴语本北抵淮河,4世纪初北方流民浪潮越淮而南。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的民族迁徙》根据南朝侨州郡的记载,按照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研究这次大移民的路线,论及今江苏省的移民时说:"侨民麇集之地,则江南以今之江宁、镇江、武进一带为最,江北以今之江都、淮阴诸县地为最。"安徽地区,"侨在江南者都聚于下游芜湖附近一隅,江北则散处江淮间,自滁、和以至于颍、亳所在皆侨置郡县。"湖北则汉水流域之襄阳,长江则自江陵直至黄梅皆满布北来流民。我们再次指出,江陵是仅次于建康的另一重镇,直至梁元帝覆灭,它是北方士庶的又一聚居地。这样一个范围特别是东部大致与今日江淮方言区相当,江淮方言实奠基于此,但在西部大为缩小。兹述现代江淮方言的大致范围:湖北省的东北部自应山、安陆、应城起向东直至黄梅十余县市;江西省的九江、瑞昌;安徽、江苏两省的江淮之间大致皆是,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江淮方言的东支通泰方言区,西近运河、南临长江,东濒黄海,包括今泰州市、泰县、兴化、东台、大丰、海安、泰兴、如皋、如东、南通市、南通县共十一个点;皖南的青阳、南陵、芜湖、马鞍山、当涂,苏南的南京、江宁、句容、溧水、镇江也是。苏皖二省的方言地理与当时何其相似乃尔!历1600余年只有小的变化,可见4世纪的大移民对于中国历史和语言的影响何等巨大。当然江淮方言在西线是大大地退缩了,如今湖北大部分地区说的是西南官话。

客家方言与赣方言关系密切而且同源,自罗常培之论出,天下翕然从之。我们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方言与江淮方言也有同源关系。现将客家方言的梅县话、陆川话,赣方言的临川话、南昌话,江淮方言东支通泰方言的南通话、泰州话在语音上的重大相同之处叙述于下:

第一,它们都有两个入声调,而且阳入调值高于阴入调值(南昌除外):

调值 \ 方言	客方言		赣方言		通泰方言	
	梅县	陆川	临川	南昌	南通	泰州
阴入	21	2	43	5	4	4
阳入	4	4	5	21	5	5

第二,古代汉语的全浊声母,在这三个方言里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都是送气清音,现举古全浊声母字“田”、“跪”、“旧”、“白”四字为例,看它们在现代各方言中声母演变的情况:

	梅县	陆川	临川	南昌	南通	泰州	北京	西安	广州	厦门	长沙	苏州
田	tʻ	tʻ	tʻ	tʻ	tʻ	tʻ	tʻ	tʻ	tʻ	t	t	d
跪	kʻ	kʻ	kʻ	kʻ	kʻ	kʻ	k	k	k	k	k	g dʑ
旧	kʻ	ȶʻ	tɕʻ	tɕʻ	tɕʻ	tɕʻ	tɕ	tɕ	k	k	tɕ	dʑ
白	pʻ	pʻ	pʻ	pʻ	pʻ	pʻ	p	p	p	p	p	b

古全浊声母字在上边六个方言里完全一致,无论平声“田”字,仄声“跪”、“旧”、“白”字都是送气声母开头(不妨简称作“全送气”),北京、西安、广州则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厦门、长沙平仄声都不送气,苏州话则仍保留浊声母。

从这个表也可见客、赣、通泰三个方言的一致是反映了同源关系。

在这里,我们承认,客、赣两大方言里有些点古全浊声母字,今音逢塞音、塞擦音并不送气,或某些字并不送气,有些点阳入调值并不高于阴入调值。我们暂且借用生物学的“遗传”与“变异”的术语解释这一现象,一般地说,在生物的种的繁衍中亲代的性状要遗传给下一代,但各个个体也可能产生性状差异,就是变异。现代通泰方言十一个点毫无例外地阳入调值高于阴入调值,古全浊声母字逢塞音、塞擦音无论平仄皆送气。但是深入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今泰州话上述“跪”、“旧”、“白”等仄声字,白读时声母送气,而文读则不送气,后者

跟北京话、南京话、扬州话一致，我们完全可以证明白读送气是亲代性状的“遗传”，而文读则是“变异”，是受普通话和江淮方言中支——宁扬方言——的影响所致。泰州话阳入字(如“毒”)白读时比阴入字(如“笃”)调值高，但是文读时，跟阴入一样，这也是受宁扬方言的影响造成的(扬州话入声只有一个)。其所以如此，因泰州话处于通泰方言的最西缘，跟扬州话紧邻，泰州、扬州历史上长期在一个行政区内，扬州在文化、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也促进了泰州话的变异。如今在上述两点泰州话的文读较之白读数量上占了优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几百年以后，泰州话就会变得只剩一个入声调、古全浊声母仄声字变成不送气清音，就是说在通泰方言里将由于变异而出现一个“例外”的“新种”。似乎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待上述的今天的个别的或少量的例外。

为什么现代通泰方音显出与客、赣方言的一致性呢？鲁国尧在《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一文中，根据史籍考证出：西晋时沿江北岸只有广陵(今扬州)、江都、舆(今仪征)、高邮、海阳(今泰州、泰县)五县，海阳是最东的一县。东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将广陵郡分为三郡：山阳郡在淮南，广陵、海陵二郡在长江北岸。宋时的海陵郡领六县，南齐时领八县，皆在今泰州以东的东台、如皋、泰兴、南通一带。据《宋书·州郡志》，广陵郡领四县，人口7744户，45613口，新置的海陵郡领六县，3626户，21660口，海陵郡虽不及广陵郡人口的一半，但须知西晋时只是海阳县的部分辖地，地广人稀，而永嘉后至东晋末一百年间人口陡增，以致为之立郡置县，可见大批北方人迁徙至此。

客、赣方言在南方山区连成一片，而通泰方言孤悬于长江以北、运河之东、黄海之滨，相距遥远，而如此一致，不能不引起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再看看赣方言北边的徽方言，古全浊声母，大多数地方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都念送气清音。看来这四个“全送气”的方言形成了对古老的吴方言与闽方言的包围圈。史载皖南的黄山山区本是山越人的聚居地，六朝时期不少汉人进入，现代徽方言与这段历史应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地质学家的板块构造学说可以从非洲与南美洲海岸曲线的吻合得到印证一样，这个包围圈看来不是偶然的，

这四个方言"板块"正是4世纪北方方言南下进逼吴、闽方言的结果，当然不是同一时期形成的，例如客家人经过不止一次的迁徙才进入粤东北。

我们不讳言，这个包围圈在扬州、南京、芜湖一线有个缺口，这正是江淮方言的中支——宁扬方言区，宁扬方言入声只一个，当然谈不上阳入调值比阴入高的问题，古全浊声母变今音的规律同于北京话，迥异于通泰方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又要考察历史：公元589年隋文帝派次子杨广率大军平定陈国，结束了273年的南北分裂的局面。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征发淮南十几万民工开凿了自今淮阴至扬州的运河，一千多年来这条运河成了北中国与南中国之间的主要通道，历代定都于北方的王朝都靠运河汲取长江三角洲的财富。和平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使处于南北之交的宁扬方言区成了交通要道；战乱时则是兵家必争之地，城市往往遭到严重的甚至毁灭性的破坏，人口变动很大。在明代，南京话是当时的标准语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①] 明清时代江淮方言区产生了不少杰出的文学作品，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对近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所以千余年来宁扬方言发展较快，采取了与北方的其他官话方言协同的发展步调。江淮方言的西支——黄(冈)孝(感)方言地处信阳之南、武汉之北，当华中要冲之地，夹于现代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之间，所以古全浊声母仄声字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也变成清音不送气。

比起宁扬方言来，通泰方言保存了古老的方言特点，这是由于僻处濒海的东隅，一直是比较落后的地区，每逢战事，运河沿线的城市如淮安、扬州、镇江、南京多是鏖战之地，[②] 通泰一带则是传檄而定，相对稳定。众所周知，凡是闭塞、动乱少的地区语言变化较慢，所以

① 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② 如清灭明时的扬州十日大屠杀。清初淮安的破败可从孙廷铨《南征纪略》见一斑，孙氏顺治八年(1651)途经淮安时云："淮城南北之会，陆海津梁。客至此者，欲南则舍策登舟，欲北则停帆命驾。盛时驿使星飞，亭长舣船待，夕停晓发，无弗给者。……势处要害，兵火相寻。……水国萧萧，棹歌稀发。予抵淮五日，尚未得船也。"近者如1937年日军侵华，南京大屠杀，死者三十万人。

黄海之滨的通泰方言可以直接跟南海之滨的客家方言认起“亲”来，它们“一千七百年前是一家”。

客家方言虽环布于东南沿海，甚至远及台湾、海南二岛，但导源于南朝通语；通泰方言则是南朝通语在原地东隅的直系后裔，我们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论证了它们的同源关系。它们在分离以后，长时期的自身发展变化再加上各自所处的环境，受邻近方言以至通语的影响，发展到现代，变成既共同具有亲代的某些重要性状，又各自具有差异的个体性状的不同的方言。

如果我们关于客家、赣、通泰等方言同源于南朝通语的论点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它们共有的性状对其祖语的某些特质，作尝试性的探讨呢？现代方言入声分阴调、阳调是与其祖语的声母的清浊有关：清声母入声字今音为阴调，浊声母入声字今音为阳调，通泰、赣、客方言阳入调值高，当与其祖方言的浊声母的特质有关；至于古全浊声母字，现代客、赣、通泰、徽方言无论平仄逢塞音、塞擦音全变成送气清音字，这“全送气”也应与其祖方言的浊声母的特质有关：二果同因。古代汉语有浊声母，现代汉语除吴、湘方言外，大多变成了清声母。在现代多数北方官话中，古代浊声母变清音时，逢平声是送气音，而遇仄声(即非平声，仄者不平也)则不送气。是否可以说，南朝通语的浊塞音、浊塞擦音是送气的，也许这送气很强。后来这些浊声母发生变异、变成清音，亲代的送气性状则遗传下来，即使在仄声里亦然，而且波及后裔方言阳入调值的音高，使其超乎阴入。但是怎样遗传变异呢？

语言、方言的发展、衍化与生物物种的繁衍、变异当然不是一样的，但也有其类似之处，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显然受了达尔文(1809—1882)生物进化论的巨大影响，但是达尔文的学说是“融合遗传论”。[①] 关于语音的历时的变化，现在人们基本上还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即只是陈述变化前和变化后的事实，比如任何一种汉语史论著都说，古汉语的浊声母在宋元清化，平声送气，仄声则不送气。如果读者进一步问：为何平声就送气？为何仄声就不

① 沈大稜《遗传学基础》第2、3页。

送气？就我浅闻，还没有众人都满意的回答。现在有些学者引进了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讲历时音变的原因，但那还是外因。能不能透析语音本身的"遗传"及"变异"的机制来讲内因？科学的遗传学在当代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语言学家可否借鉴其成果，分析语音本身的特性和结构方式，从而找出"遗传物质"、"遗传信息"、阐述"遗传的变异"等等，使历史语音学前进一步？

1991 年

本文原题为《客家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发表于《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 年 8 月)。

我在 1964 年写成的《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追溯了通泰方言之源。1990 年阅读了大量南北朝史籍后，我进而正式提出"南朝通语"、"北朝通语"说，并于 1990 年在日本、1992 年在美国访学时，就此做过数次演讲。1991 年老友命我就客方言史著文，于是两个通语说，正式见诸文字。南北朝语音史专家蒋希文先生见到此文后，赐函云："惠赐大著已拜读。《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一文说'南朝通语浊塞音、浊塞擦音是送气的。'的确如此，六朝经师为经籍注音，很多切语都反映了这种现象，稍暇当走书相告。"(1995 年 12 月 9 日)我拟两年后对南北朝语言史及语言学史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证明或否定我的两个通语说和全浊塞音、塞擦音送气说。

1996.12.15

谢留文先生批评此文观点，见《方言》1999 年 3 期页 167。我的答辩见《通泰方言研究史脞述》，载《方言》2001 年 4 期页 309—311，又见本论文集页 207—209。

2002.12.6

“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

提要　音韵学之经典名文《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就笔者浅闻，古往今来，称引斯言者众，深究其义者鲜。此语精粹在于“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四句，惜乎在昔学人累千载而不悟，笔者揭明并命名为“颜之推谜题”，并进而力图破解此千古之谜。本文征引大量典籍，逐次证明“颜之推谜题”的可靠性、确定性及内涵，以传世文献与现代活方言相互发明，深考“谈”、“覃”、“寒”、“桓”四韵之今音，兼采通泰、吴、赣方言，以窥4世纪前南朝通语与古吴方言接触、感染之一斑。本文的研究方法是新“二重证据法”，即将“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相结合。

笔者重申1961—1964年间所撰《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及1992年《客家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之假说：西晋末年之北方移民南徙至淮南与长江中下游两岸，其语言形成南朝通语，此南朝通语乃江淮方言之源，南朝通语之流并非现代吴方言。

---

* 本文初稿成于2001年4月，本文部分内容曾先后在台北（2001年5月）、杭州（2001年9月）、扬州（2001年11月3日中国语言学会第11次学术年会）等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承好几个学科几十位先生指正，谨统致谢忱。

本文自创几个汉语史的专门用语："颜之推谜题"、"语言入侵"、"声韵谐接原则"。

成语有"一知半解"，而我"知"不足"一"，却求"半解"颜之推谜题，是"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史记·滑稽列传》语），其结果最多只能破解其一隅而已。

楔　子

在数学史上，有许多数学名题与猜想，名题即难题、谜题，著名的有古希腊几何三大难题（three problems in Greek geometry）、费马大定理（Fermat's last theorem）又名费马猜想（Fermat's conjecture）、哥德巴赫猜想（Goldbach's conjecture）、四色问题（four color problem）、柯克曼女生问题（Kirkman's girl students problem）、黎曼猜想（Riemann's conjecture），等等。这些在历史长河中提出的众多名题与猜想，几乎每一个都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都引得无数数学家和数学爱好者竟折腰，为之苦思冥想、呕心沥血，大大地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凡能破解这些难题的都成了数学名家，有些难题至今未获解决。其中最为中国人熟知的是哥德巴赫猜想，而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则是费马猜想，它的提出、发表以及破解都堪称数坛佳话。法国数学家皮埃尔·费马（Pierre de Fermat，1601—1665）在 1637 年（一说约在 1630 年）阅读梅齐利亚克 1621 年翻译的丢番图（Diophantus，希腊代数学家，活动于 250 年前后）所著《算术》（Aritmetika）一书拉丁文译本第二卷第八个命题"将一个平方数分为两个平方数"时，用拉丁文写下了被称为"千古之谜"的批语："不可能将一个立方数分成两个立方数，或者将一个四方数分成两个四方数，而且一般说来，不可能将任一个高于二次幂的方幂数分成两个同次幂的方幂数。我对此找到一个真正妙不可言的证明，但这页边空白太窄，无法写下。"费马去世后其子萨缪尔找遍了父亲的遗书、笔记，也未能找到这个证明，1670 年费马的笔记、批注及书信被汇集成《数学论集》出版，第一卷包含丢番图《算术》的拉丁文译本以及费马的批注。从此费马猜想闻名于世，费马是否真的找到证明法，成了悬案。但是费马猜想几百年来引得很多数学家殚精竭虑去证明，法国和德国的科学研究机构曾分别

于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悬赏征求费马猜想的证明。直到1995年费马大定理才由一位英国数学家最终证明，所以英国人西蒙·辛格(Simon Singh)出版了一本叫做《费马大定理——一个困惑了世间智者358年的谜》。[①]

我们的目的不是研究数学史，到了这儿，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没有跟'费马猜想'的传奇色彩类似的难题、谜题？"回答是响亮的："有！而且如果论时间之长，远远超过费马猜想。""是什么？""就是'颜之推谜题'。"

一、颜之推及《颜氏家训》

南北朝后期的杰出学者颜之推，祖籍琅邪。其九世祖颜含在西晋末年追随琅邪王司马睿，《晋书·颜含传》："元帝初镇下邳，复命为参军。"《晋书·诸葛恢传》："元帝为安东将军"，"于时王氏为将军，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刘超以忠谨掌书命，时人以帝善任一国之才"。晋怀帝永嘉元年(307)琅邪王司马睿渡江移镇建邺(今南京)，316年晋愍帝为刘曜所俘，此后中国北方基本上为各少数民族的政权所占领。司马睿于317年在建康(因避晋愍帝司马邺讳改名)即帝位，是为东晋元帝，偏安南方，颜含在东晋王朝历任要职。颜之推晚年著《观我生赋》述其家世："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551年颜之推为侯景军所俘，《观我生赋》言及此段经历云："经长干以掩抑(自注："长干，旧颜家巷。")，展白下以流连(自注："靖侯以下七世坟墓皆在白下。")，深燕雀之余思，感桑梓之遗虔。"赋中所云"长干"，在今南京中华门南，"白下"，今南京西北幕府山南麓。"靖侯"即颜含。据其自述，颜之推应为建康人，他生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卒于隋文帝开皇后期(590年后)。[②]

颜之推出身于南朝士族，生当南朝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梁书·武帝纪》赞："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

① 见《数学百科全书》第二卷页457—460、《数学家传》页200、《自然科学大事典》页34。
② 缪钺《颜之推年谱》、《读史存稿》页207—228。

千。……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颜之推年轻时博览群书,故有十分深厚的文化修养、学术造诣。24岁时(554年)被俘至北方,26岁(556年)起仕北齐,47岁(577年)入周,581年杨坚建立隋王朝,之推仕隋十余年。他历仕南朝、北朝,晚年著成《颜氏家训》,分裂的年代、动乱的年代造成了他的特殊经历,他的特殊经历成就了他这本名著。这本书在旧时士人中流行甚广,奉为“家训”之祖。其实,依照鄙见,应该如此定性:这是一部比较文化学的著作。中国从317年起分裂,已历二百余年,在《颜氏家训》中,他胪陈了南朝、北朝的风俗、民情、经学、书法、音韵等诸多方面的情况,比较其异同,间下己见,或褒美,或指摘,难能可贵的是,不偏不倚,不主一方。

宋人沈揆认为此书“辞质义直”,“辩析援证,咸有根据”。明人张璧云:“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盖《序致》至《终篇》,罔不折衷今古,会理道焉,是可范矣。”[①] 今人范文澜先生评论颜之推说:“他是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颜氏家训》二十篇就是这些见解的记录。《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言。”[②] 王仲荦先生说:“由于他经历南北,饱经忧患,深知南北俗尚的弊病,政治的得失,南学北学的短长,因此在《家训》里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时,往往非常中肯。”[③] 周一良先生指出《颜氏家训》所述的若干事情与词语都可以从史籍得到证明。[④]

这些是历史学家对颜之推其人其书的公允评价。不过,我认为,我们还应该自己去认真读书,看看《颜氏家训》的可信度究竟如何,目的在求一个是字。限于篇幅,仅举语言学人所关心的民族语的一例:《颜氏家训·教子篇》:“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

① 转引自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页612、614。
② 《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4版,页525。
③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页922。
④ 周一良《〈颜氏家训〉札记》,《周一良集》第一卷页366—371。

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颜氏家训·省事篇》又云："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天文、画绘、棋博，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为银，如此之类，略得梗概，皆不通熟。"我们看看他那个时代的其他文献，对鲜卑语有否记载？如何记载？在北朝，皇帝是鲜卑人或者鲜卑化的汉人，自然鲜卑语占有特殊地位，当时叫作"国语"，《隋书·经籍志》"小学"类序云："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又"孝经"类序："魏氏迁洛，未达华言，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国语孝经》为《隋志》"孝经类"所著录，《隋志》在"小学类"著录了以"国语"为名的书籍九种，如"国语十五卷"、"国语物名四卷(原注：后魏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杂物名三卷(原注：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杂文十五卷"、"国语号令四卷"等，值得注意的是《隋志》另著录有"鲜卑号令一卷(原注：周武帝撰)"。其后还有"杂号令一卷"，"杂"字不知何解，但是此书殿于鲜卑语类书籍之末，当有鲜卑语的内容。《隋志》又著录两部以"鲜卑语"为名的书："鲜卑语五卷"，又"鲜卑语十卷"。北朝流行鲜卑语这一事实，也可从正史中得到印证。《北史·祖珽传》："元康因荐珽才学并解鲜卑语。乃给笔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内成，其文甚丽。"《北齐书·高昂传》："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北齐书·孙搴传》："搴援笔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悦，即署相府主簿，专典文笔。又能通鲜卑语，兼宣传号令。当烦剧之任，大见赏重。"《北史·王昕传》："尝有鲜卑聚语，崔昂戏问昕曰：'颇解此不？'昕曰：'楼罗楼罗，实自难解。时唱染干，似道我辈。'"《周书·长孙俭传》："时梁岳阳王萧詧内附，初遣使入朝，至荆州。俭于厅事列军仪，具戎服，与使人以宾主礼相见。俭容貌魁伟，音声如钟，大为鲜卑语，遣人传译以问客。"《隋书·虞庆则传》："庆则幼雄毅，性倜傥，身长八尺，有胆气，善鲜卑语。"《隋书·李德林传》："武帝尝于云阳宫作鲜卑语谓群臣。"

我们还应该了解颜之推的治学态度如何，他在"音辞篇"写道："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仓颉训诂》反稗为逋

卖,反娃为于乖;《战国策》音刎为免;《穆天子传》音谏为间;《说文》音戛为棘,读皿为猛;《字林》音看为口甘反,音伸为辛;《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声类》以系音羿;刘昌宗《周官音》读乘若承:此例甚广,必须考校(尧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前世反语,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诗音》反骤为在遘,《左传音》切椽为徒缘,不可依信,亦为众矣。今之学士,语亦不正;古独何人,必应随其讹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为兄侯,然则兄当音所荣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在《颜氏家训》一书中,这种批评性的文字俯拾皆是,表现了他的不盲从的精神,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颜之推又说:"玙璠,鲁之宝玉,当音余烦,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祇之祇。江陵陷没,此音被于关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浅学,未之前闻也。"可见他是一位多么诚实的学者!

至此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语:《颜氏家训》关于学术的所见所闻、所述所论,可信度是很高的。有了上面的认识,我们可以进一步细读《颜氏家训·音辞篇》。

二、《颜氏家训·音辞篇》与"颜之推谜题"

《颜氏家训》共二十篇,比较了中国南方、北方的文化、礼俗的诸多方面,我们语言学人最重视的是其《音辞篇》,周祖谟先生《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云:"考家训此篇专为辨析声韵而作,斟酌古今,掎摭利病,具有精义,实为研求古音者所当深究。"在下斗胆补充一句:跟其他诸篇的宗旨一样,《音辞篇》比较了南朝和北朝语言的差异,也多处叙述了南北语言学者观点的分歧,忠实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定时段的语言的状况和语言研究的状况,是中国语言学史上一篇经典性的文字。

《颜氏家训·音辞篇》论道:"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推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

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

古往今来，特别在20世纪，许许多多学人都乐于称引颜之推的这段话，以论证当时南北语言的歧异，但是恕我不恭，有些理解有误；至于作深刻的体味，得其精髓的，则更付阙如。学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这最后八句。其实，此八例，颜之推明明确确地冠以“其谬失轻微者”六字，又明明确确地殿以“如此之例，两失甚多”八字。试问：颜之推所说的“谬失轻微者”若此，那么，“谬失”重大者呢？请看紧踞其上的文字，也是颜之推他自己说的：南语北语“皆有深弊”！请注意，是“深弊”！我们这些1400多年后的读者不禁急切地盼望他将“深弊”讲个分明，至少也举些例子哪怕两三个例子也好，那就能使我们知道当时南北语言的比“甚多”的“轻微”“谬失”更“深”层级的特点。然而令人大为失望的是，颜之推只肯说四个字：“不可具论”，他就把这个千斤重的命题了了！遗憾之至！遗憾之至！颜之推这位大学者就这样给中国语言学史留下了一道谜题！道道地地的千古之谜！

不过，从我们后人看来，还有“不幸”中之“幸”，那就是，亏得颜之推还是多说了两句八字，他指出了南语、北语的“深弊”之“污染源”，即“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因此，“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四句十六字就是颜之推设定的千古之谜。本文价值之一在于：揭明并命名为“颜之推谜题”或曰“颜之推难题”。这谜题或难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整个中国语言史以及汉语方言史。

进一步的问题来了：这“颜之推谜题”能够破解吗？答曰：“也能，也不能。”按，这是仅就笔者而言，高手也许全能。

三、释“北”“南”兼“吴越”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颜之推所说的“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两句

中的“北”、“南”二字，含义是什么？

我们需要体认广阔的背景，从而来确定其确切意义。笔者勾稽了《颜氏家训》一书中相关用语，加以排比。在颜书中，“北”、“北方”、“北土”、“北间”、“河北”、“江北”、“邺下”、“山东”、“中原”指北方；“南”、“南方”、“南间”、“江南”、“江东”、“江左”指南方。“北人”指北方人，“北俗”指北方风俗；“南人”、“江南人”指南方人，例句甚夥，文繁不录。

兹摘一些二者对言的文例于下：

《风操篇》：“今南北风俗，言其祖及二亲，无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省事篇》：“吾自南及北，未尝一言与时人论身分也。”（以上“南”“北”兼言）《归心篇》：“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两万斛船。此实验也。”《音辞篇》：“江南至今行此分别，昭然易晓；而河北混同一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以上“江南”“河北”对言）《治家篇》：“河北妇人，织纴组紃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河北”“江东”对言）《文章篇》：“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山东风俗，不通击难。”（“江南”“山东”对言）《书证篇》：“今中原苦菜则如此也。……江南别有苦菜。”（“中原”“江南”对言）《治家篇》：“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此“北土”“江南”对言）《治家篇》：“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齐整；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顇奴，仅充而已。”（以上“江东”“邺下”，“南间”“河北”彼此对言）

经常以“南”、“北”对言，是那个时代的习尚。如《世说新语·文学》：“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故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隋书·儒林传》：“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魏书·崔浩传》：“假令国家弃恒山以南，裕必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争夺河北也。”还有当时

两位杰出的语言学家陆德明、陆法言的用例，更为显明，请见后第五节。

我们应该体味到《颜氏家训》的这一特点：颜之推罗列、比较的多是上层人物即士族阶层的文化与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和问题，如上举的邺下妇女，“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走后门，行贿、腐败，岂是民家女子所能为？“江南文制，欲人弹射”，“山东风俗，不通击难”，那绝对是文人学士的事儿。具备这一认识对理解《音辞篇》必有帮助，详见后文。

现在我们将使用“内证法”的语域缩小到《音辞篇》本身，以考察其“南”、“北”二字的真义。“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的上文是：“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铫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连珠般的方位词！我们可以从颜氏这段言论，从《颜氏家训》全书，先作出初步推断：这“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中的“南”是指南北朝时期的南方的语言（语音），“北”是指北方的语言（语音），这该不会引起什么争论吧！

接着要讨论的是，“吴越”意指什么？我们还是来查找典籍吧，例证浩繁，不胜枚举，略举数例，也兼及其同义词语和相关词语，这是为了准确地理解“吴越”的词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宋书·礼志三》：“晋武帝平吴，混一区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寔、张华等奏曰：‘圣德隆茂，光被四表，诸夏乂清，幽荒率从。神策庙算，席卷吴越，孙皓稽颡，六合为家。’”《晋书·苻坚传》：“顾谓安曰：‘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整六师而巡狩，……泛长江，临沧海，不亦乐乎！’安

曰:‘……且东南区区,地下气疠,……苟文德足以怀远,可不烦寸兵而坐宾百越。’……先是,群臣以坚信重道安,谓安曰:‘主上欲有事于东南,公何不为苍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谏。”《晋书·王猛传》:“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魏收《檄梁文》:“唯彼吴越,独阻声教,侯景竖子,本无土业,以金陵逋逃之薮,江南流离之地……”(《艺文类聚》卷五八)《隋书·史祥传》:“晋王兵马即入建业,清荡吴越,旦夕非远。”我们还可采用“内证法”,即以颜之推证颜之推,其晚年所著《观我生赋》述其家世:“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颜氏此赋单用一个“越”字是照顾平仄,此字之义,不释自明。[①] 而《三国志》中孙权则单用一个“吴”字。

总之,大量文献例证都表明“吴越”只有一义,即指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六朝所统治的南方区域。因此颜之推所讲的“南染吴越”的“吴越”,本义与上述并无二致,借代以指吴越地区即南方地区的语言(方言)。

不少人讲解《颜氏家训·音辞篇》,泛泛而言:颜之推在这篇文章中叙述了他那个时代的南北语言的差异,“北杂夷虏”好懂好讲,“南染吴越”呢,仔细一推敲,就把人搞糊涂了:“南”指南方的语言或方言,“吴越”也指南方的语言或方言,岂非二者同指一物?可是颜之推明明说的是“北杂夷虏”、“南染吴越”。现在让我们来分析句子:“杂”“染”都是动词,动词的前面是A项,后面是B项,任何一个粗通汉语的人都知道绝不可能A=B,只能得出A≠B,即“北”≠“夷虏”,“南”≠“吴越”的结论。“北”≠“夷虏”意思是汉语的北方话跟少数民族的语言不同,这容易明白。可是“南”≠“吴越”,怎么理解?“南”指吴方言,“吴越”就不能指吴方言,那么“吴越”指什么?“吴越”指吴方言,“南”就不能指“吴方言”,那么“南”指什么?二者必居其一。

---

① 清人卢文弨《颜氏家训注补》:“金陵本吴地,后越灭吴,其地遂为越有,故称越也。”今人严式诲《颜氏家训补校注》:“案,迁越疑是迁流播越之义,注非。”今人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今案:严说是。”但是王利器先生在《颜之推传》正文“越”左侧标专名号,中华书局点校本《北齐书》亦标专名号,则是认“越”为地名。尧按,卢文弨说为是,单称越,乃以越涵吴也,因为平仄的关系,故用越字而不用吴字。

面对这一难题,会有人说,“南”指吴方言,那“吴越”就指南方的某种或某几种少数民族语言,显然这解释是比附“北杂夷虏”的结果。可是这与颜之推的原意相符吗? 这就值得思考了。在彼时,许多强势少数民族在中国北方相互杂处,战争不歇,密切的接触使他们的语言必然相互影响,还有,它们也必和汉语交流,都是情理中事。我们可以在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里看到一节“南方各族人民的融合”,其中提到自东而西散处的山越,荆、雍州蛮,傒人,俚人,僚族,爨族,论其实,全是弱势民族,是的,其中有些民族的语言会跟汉语吴方言有接触。不过,我们读《颜氏家训》,应该细细咀嚼,根据颜之推的经历,我们可以推测他也许会对鲜卑语和汉语吴方言有一定的了解,不过以他的价值观衡量,“夷虏”之语和吴越方言都位居次等,至于吴方言与东南某些弱势民族语的关系则未必会引起像他这样的士大夫的留意,作为南方高等士族的文化代表人物,颜之推写《家训》,注意的中心是南方、北方的大事,他写“音辞篇”,评点的是南、北士人的主要语言即强势语言,例如“至邺已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词,少为切正”。他十分严格:“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如果熟谙两晋南北朝史,就更不会错误地理解“南染吴越”了:永嘉之乱使北方大批士族逃跑至江淮地区,他们面对的主要是土著居民吴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吴人,绝非南方的弱势少数民族。详后。

认真阅读《家训》,要准确理解“南染吴越”,只能指向第二选择:“吴越”指吴方言,“南”就不能指“吴方言”。那么“南”指什么?

笔者认为,只有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以及语言史背景下,讨论才会有意义,才会有结果,在这儿有必要重申拙见。我在拙文《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1961—1964 年写成,1988 年方发表)中说:“我们认为吴方言在古代是北抵淮河的,江淮之间本为吴语的地盘,4 世纪永嘉之乱,北方汉族人民的大批南迁,江淮之间以至江南的今南京、镇江甚至常州、常熟一带为北方话所占领。”我在《客家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一文(1992 年发表)中进一步说:“4 世纪初,中原汉人都把建康的司马睿当作正统,因此南逃的主要路线是渡过淮河,有些人

定居下来,有些人以及后来者则进而渡过长江,首都建康及其周围自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西起江陵东至镇江的长江中下游的两岸布满了大量的南迁北人,……他们把北方的先进文化、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对于南方中下游的开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这批南迁的汉人把汉语北方方言由黄河流域带到了长江中下游,使公元4—6世纪的汉语方言地图大为改观。""三百年的分裂,人为的隔绝使得原本一源的黄河流域的北方方言与淮南、长江中下游的北方方言二者间的分歧逐渐加大。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自颜含随晋元帝渡江,至颜之推已历九世,若至颜思鲁、颜愍楚,则为十世。这么长时期,南方一支必然受原地方言的影响;而北方,少数民族的各种语言尤其是匈奴、鲜卑的阿尔泰语作为统治者的语言对北朝汉语的影响自不在小。到了南北朝后期,即梁与北齐、北周鼎峙时,中国已形成了两个通语,黄河流域以洛阳话为标准,而江淮地区则以金陵话为标准。《颜氏家训·音辞篇》指出'帝王都邑'的语言具有权威性:'独金陵与洛下耳'。"①

我所以不惮烦地引述自己多年前的见解,是因为我坚持认为,要想正确解读颜之推的"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二语,这是惟一正确的途径。

四、述四五世纪江淮地区的"语言入侵"

本文的重点在试破解"颜之推谜题"或"颜之推难题"。颜之推谜题的表述就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本质就是"南北语深弊论",可减之为"深弊论"。关于"北杂夷虏"而致成的"深弊"问题,在汉魏时,已有很多少数民族移居内地,西晋王朝的"八王之乱"(291—306)导致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纷纷起事,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3)、晋愍帝建兴年间(313—317)整个黄河流域遍地战火。公元316年匈奴人刘曜攻破长安,西晋王朝覆灭,中国北方进入

① 鲁国尧《客家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丘权政主编《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页43、44、47。

了十六国时期，各个民族的政权像走马灯似的忽兴忽灭，大战不已，达百余年之久。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此后是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都是鲜卑族或鲜卑化的汉人为主建立的王朝，当时的"国语"就是鲜卑语(前有简要叙述)。在北方，二百多年来匈奴语、鲜卑语等阿尔泰语作为统治者的语言对北朝汉语的影响自不在小，这是可以想见的，然而要论证，却非易事，我承认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颜之推谜题"的这一半我没有能力去破解。[①]

现在较详细地阐释"南染吴越"，追迹其前前后后。

非汉语的古吴语和其后的汉语的古吴方言，其区域本北抵淮河，古文献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条极其珍贵的记载：《左传》哀公十二年："卫侯会吴于郧"，"吴人藩卫侯之舍"，"太宰嚭说，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左传》所述的"夷言"即古吴语，"郧"地在江淮间，今江苏省海安县境。前473年越灭吴，但《吕氏春秋·贵直论·知化》："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原来吴国和越国同种同语，前333年楚威王击杀越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可见自淮以南至于浙江皆为楚属地，越从此溃散，余众散处东海之滨。[②]而战国后期的荀子(约前313—前238)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儒效篇》)可见"越"地的文化、语言还保持特色，足以与"楚"、"夏"鼎峙。至此汉语史上的又一个大难题横亘在我们面前：本为非汉语的古吴语什么时候变成汉语的古吴方言？也就是说，自淮河以南至浙江的居民何时放弃吴语，而改说汉语，从而形成汉语的古吴方言？这个问题不容回避，但是难以回答，有人说是在汉代，我思索过，猜测大概是在秦代稍前，只是猜测而已，容以后专文叙述猜测的"根据"。《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

---

① 民语专家孙宏开先生告诉我："匈奴与现在的突厥系民族关系密切，而鲜卑与现代的蒙古系民族关系密切，但二者是否有亲缘关系，包括阿尔泰学说在内，学术界有不同看法。"

② 此从《史记》说。但有一些历史学家如蒙文通、李学勤、陈桥驿以及《江苏史纲》著者等勾稽文献，认为楚未灭越。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页311："史实表明，截至楚被秦灭之年，越国君统未绝，境土尚存。……进入战国以来，楚国虽曾一再侵夺越地(主要是故吴地)，又占领过琅玡与吴，诛杀过越王，但始终未曾灭越。"笔者之见：越王无强被杀以后，越即使未灭，也成了弱国，不得与于七雄之列。

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可见语言也是诸侯立国的要素。汉高十二年又封侄刘濞为吴王，尽得吴越故地，值得注意的是，春秋吴王夫差的都城是姑苏（今苏州），而汉代吴国国都是广陵（今扬州）。吴楚七国之乱削平后，此地区的统治者在汉景帝、武帝时是江都王刘非、广陵王刘胥，都城仍是广陵。扬州今属江淮方言区，而古广陵则是吴地。《晋书·华谭传》：“华谭”，“广陵人”，“博士王济于众中嘲之曰：‘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晋书·祖逖传》：“会朝廷将遣戴若思为都督，逖以若思是吴人，……意甚怏怏。”《晋书·戴若思传》：“戴若思，广陵人也。”《隋书·李密传》：“密复说让曰：‘昏主蒙尘，播荡吴越。’”昏主指隋炀帝，其时正在江都（今扬州），可见到隋代，今扬州还被北人看作吴越之地，据《旧唐书·李密传》，李密是京兆长安人。

淮河以南历来是吴语区的状况持续到4世纪时发生重大变化。近来生物科学、环境科学有一术语“生物入侵”[①]，我想借用其意，将“语言（方言）入侵”引进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语言（方言）入侵”是指由于人群的大规模的迁徙，一种语言（方言）由原所在地“侵入”、“扩张”到另一新地区，其结果或者被原土著语言（方言）同化了，或者在新区“打败”了当地语言（方言），“喧宾夺主”、“反客为主”。在中国语言史上，4世纪开始，同时发生两场“语言入侵”，一是逐渐进居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大举进入中原，成为统治民族，当然其语言也成了具有特殊地位的语言。另一是黄河流域的汉语北方方言大举“入侵”吴方言区，迫使吴方言全线退却，丧失自淮河至今常州地区的地盘，本文研究的是后者。

人，可以说是语言的载体，“语言入侵”只能由大规模人群迁移引起。自永嘉之乱起，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首领相继在北方建立了许多王国，彼此争战，并经常南侵，从永嘉至刘宋末一百多年间，多次发生南迁的移民狂潮。《宋书·州郡志》序：“自夷狄乱

① 《狙击生物入侵》：“生物入侵是指生物由原生存地经自然或人为的途径侵入到另一个新环境，对入侵地的生物多样性、农林牧渔业生产以及人类健康造成经济损失或生态灾难的过程。通俗地说，就是外来物种‘入侵并打败’当地物种，‘反客为主’，导致当地生态失衡，进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光明日报》2002年7月18日）按，在科学史上一个学科借用另一学科的术语时，多是取其精义，并非完全套用，笔者亦师其义罢了。

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晋书·王导传》云:“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颜之推云:“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观我生赋》“畴百家之或在”自注)北人被迫南迁不是散户、个体的或小规模的动作,而是聚族迁徙,是有坚强领导、严密管理的大规模的集体运动,一个官员或士族首领任宗主或被推为行主,带领宗亲、乡党、部曲、门徒、义附、奴婢,少则数十家,多则数千家上万人。如《晋书·郭璞传》:“郭璞”,“河东闻喜人也”,“惠怀之际,河东先扰”,“于是潜结姻昵及交游数十家,欲避地东南”,“行至庐江”,“璞既过江,……”。《晋书·郗鉴传》:“郗鉴”,“高平金乡人”,“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后由郗鉴带至江东。东晋、南朝为了安置、管理南来的北方士庶,按照其原籍建置,设立侨州郡县制度,《隋书·食货志》:“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这种大规模的集团移民,到达新居住地后,也是聚族而居,原来同县、同郡的家族聚居在一起。从今黄河中下游地区南逃的皇室及卿相等上等士族迁居于首都建康及其附近,如琅玡王氏、琅玡颜氏、彭城刘氏、汝南周氏、太原王氏,次等士族则居于今南京的两翼:东侧镇江、武进一带,还有镇江对岸的扬州地区;西侧的当涂、芜湖、宣城一线,还有和县、滁州以西地区。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江苏省所接受之移民,较之其他各省为多,以帝都所在故也。……则江南以今之江宁、镇江、武进一带为最,江北以今之江都、淮阴诸县地为最。”“安徽省境内侨民之来自北方诸省者,以河南占极大多数,河北次之,山东、山西又次之……江北所接受之移民较江南为多,……侨在江南者都聚于下游芜湖附近一隅,江北则散处江淮间自滁、和以至于颍、亳,所在皆侨置郡县。”史籍明载移居京口(今镇江)者如《晋书·徐邈传》:“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晋书·祖逖传》:“范阳遒人也”,“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达泗口,元帝逆用为徐州刺史,寻征军谘祭酒,居丹徒之京口”。迁至广陵者,如《晋书·苏峻传》:“苏峻字子高,长广掖人也。”“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

于本县。""峻惧,率其所部数百家泛海南渡,既到广陵。"至建康西侧定居的有:《世说新语·德行》:"桓常侍"条引《桓彝别传》:"彝字茂伦,谯国龙亢人,汉五更桓荣十世孙也。""避乱渡江,累迁散骑常侍。"《晋书·桓彝传》:"彝上疏……但以坟柏在此郡,欲暂结名义,遂补彝宣城内史。"《北齐书·裴英起传》:"裴英起,河东人。其先晋末渡淮,寓居淮南之寿阳县。"《梁书·裴邃传》:"裴邃字渊明,河东闻喜人,……祖寿孙,寓居寿阳。"寿阳在今安徽寿县。从以上所引,可见今江苏、安徽两省的江淮之间和长江南岸是北方来的难民奔逃的居住地。

现在我们来着重考察彼时的"南徐州"和"南兖州":《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序:"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移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割扬州之晋陵、兖州之九郡侨在江南者属焉。故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则云:"《宋志》:'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南徐州今镇江武进一带),实查则又有司州之广平郡,后省为县,豫州之南鲁郡,领鲁县,并隶南徐州。五方杂处,无远勿至,盖以此州为最。""南徐州共有口 42 万余,是侨口且超出于本籍人口 2 万余。有史以来移民之盛,迨无有过于斯者矣。"至于设在今扬州的南兖州,清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郡县表卷二"东晋广陵郡"云:"既侨立兖、青、并及幽、冀五州于江淮间,故广陵与晋陵互有五州之号。"周一良先生《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1938)文中有一统计表:侨人对全州人口百分数:南徐州 53.63%,南兖州 31.87%。[①]

但是有一现象值得注意:在今江苏省之苏州(彼时之吴郡)、宜兴(彼时之义兴郡),浙江省之湖州(彼时之吴兴郡)、绍兴(彼时之会稽郡)四地区没有设置侨治单位,虽然勾稽史籍,也有北人居住在这些地区,但是比较零星。这四郡吴人众多,势力深固,大批北人南迁,不

① 《周一良集》第一卷页 50。

可能在此地生根，否则势必引起冲突，影响安定。[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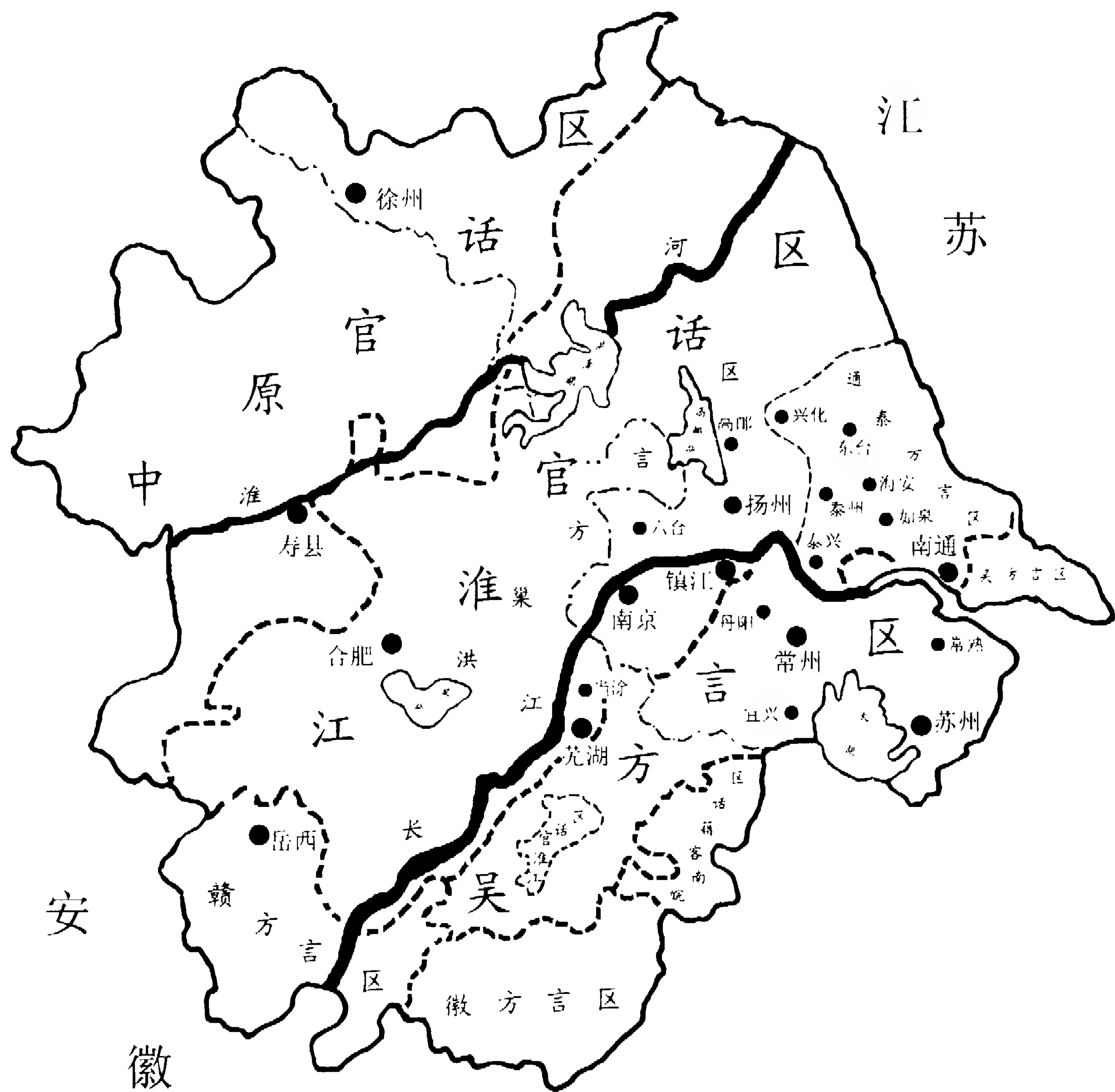
现代历史地理专家对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的建置记载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勾勒出一幅彼时北方移民自淮至江南的分布图：今安徽的江淮之间和皖南东部满是南下流民，江苏的江北是“南兖州”、江南的北部是“南徐州”，南线直抵常州、常熟。当时的难民寄居江淮地带，怀有临时观点，然而现实粉碎了他们的美梦，乡土难复，只得定居下来，人众滋生。他们是集团性的迁徙，原同县、同郡，甚至同州的难民基本上仍旧集团式地定居，因此他们的语言没有被原地方言所融化，反而“定居”下来，“生存”下来，繁衍开去，喧宾夺主，竟达二百余年之久。如此长时间，这支“入侵”语言自身必然演化，当然也不可能不受当地原土著语言的影响，从而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自然也包括吴语的成分），到了颜之推、陆德明、陆法言的时代，这支淮南至江南的汉语就形成了南方通语。

我们只要略略看一下今日的江苏、安徽两省江淮方言和吴方言的分野图就会惊讶：竟跟东晋南朝江淮地区侨州郡县建置图，亦即南迁难民及其后裔分布图何其相似乃尔。只是今日的两大方言的分界线比起彼时的侨州郡县的分界线略略北抬，拙文《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曾经讲过：“总之，永嘉之乱后百余年间，北方人民纷纷迁徙南下，……淮河以南的吴语区涌进大量中原流民，在江南，自今南京而东，直深入至今丹阳、武进、常熟诸县内。江淮之间，本是渡江南迁的必由之地，因此同样有大量北方居民聚集，从此以后北方话占领了江淮间和江南的北部地区，迫使吴语撤退到江南中部。后来二者又反复斗争，吴语‘反攻’，取得了今丹阳、武进、常熟，然北方话则固守于今丹徒、句容一线。”我所谓的“吴语反攻”，可举一例，前面说过，东晋、南朝没有在吴人势力深固的吴、义兴、吴兴、会稽四郡设置过侨州郡县，但是有一例外，即晋元帝年间在吴郡北境滨海地区的海虞县境内设南东海郡，立郯、朐、利城三侨县，《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南东海太守”序：“晋元帝初，割吴郡之海虞北境为东海郡，立郯、朐、利城三县，而祝其、襄贲等县寄居曲阿。穆帝永和中，郡移出京

① 见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页399—400。

口,郯等三县亦寄治于京。"海虞,今常熟境;曲阿,今丹阳;京,今镇江。这就是说,仅仅三十多年后,在吴人麇集的海虞县设立的侨郡、侨县统统北移至京口。①

事情如此明显:永嘉之乱,促使在中国东南方发生一场"语言入侵",北方话鸠占鹊巢,盘踞于吴方言的北域,反客为主,也接受了"客"的影响,最终成了南方通语。



据《江苏省志·方言志》、《安徽省志·方言志》绘制

图1 现代江苏安徽方言分区示意图

我们要继续探究"染吴越"三字,上段说:"如此长时间,这支'入侵'语言自身必然演化,当然也不可能不受当地原土著语言的影响,

① 见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页399-400。

从而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自然也包括吴语的成分),到了颜之推、陆德明、陆法言的时代,这支淮南至江南的汉语就形成了南方通语。”这“不可能不受当地原土著语言的影响”就是“染吴越”的现代阐释。

“吴越”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占据很为重要的地位,唐宋以后是著名的文化之邦,其前民风却是剽悍好斗。《史记·吴王濞列传》:“上患吴、会稽轻悍。”《晋书·华谭传》载吴人华谭答晋武帝语:“吴阻长江,旧俗轻悍。”这多少透露出一点历史传统信息:吴越故地一直是一块具有离心倾向,甚至是野心家如刘濞、刘胥等借以制造分裂的地方。到了东汉末年,吴人孙坚起事,195年孙策进兵江东,营建割据之地,229年孙权称帝,直到280年孙皓为晋所灭。《晋书·周处传》:“及吴平,王浑登建邺宫酾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戚乎?’”然而吴人心怀不满,《晋书·华谭传》:“吴人趦睢,屡作妖寇。”历史就是这样揶揄人:司马氏灭吴,曾几何时,仅仅三十七年后,司马氏又逃到吴地立国,如今他们的立足之地是故吴地,他们的统治中心是故吴都。只不过“建业”改名“建康”。

在这次空前的大灾难中,从黄河流域逃难到江淮地区的北人,首先面对的是原土著居民,即有历史传统的,刚失国不久但有强大潜势力的吴人,绝不是南方的人口稀少的什么弱势少数民族。[①] 晋元帝司马睿的偏安政权其主要支柱是南迁的北方大族如琅玡王氏,《晋书·王敦传》:“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请看这段文献记录,《世说新语·言语》:“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这反映了司马睿的真实心态,也是来自北方的最高统治者在试探吴人的反应,这位顾骠骑即顾荣,吴郡吴人。在东晋南朝政权中,北方士族始终占绝对优势,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考东晋、南朝虽立国江左,然其庙堂卿相,要皆以过江中州人士及其后裔任之。尝统计《南史》列传中人物,凡七百二十八人(后妃、宗室、孝义不计),籍隶北方者五百有六人,南方但得二百二十二人。”司马睿自移镇江

① 文献中偶有少数民族的记载,如《初学记》卷十九引《乔道元与天公笺》:“小婢从成,南方之奚,形如惊獐,言语喽厉,声音骇人,唯堪驱鸡。”详见王仲荦先生书。

东之日起，他及南逃的北方士族，最棘手的内政问题是如何对待吴人。《晋书·周勰传》：“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在江南，吴人势力盘根错节，《世说新语·赏誉》“吴四姓旧目”条注引《吴录士林》：“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世说新语·德行》“顾荣在洛阳”条注引《文士传》曰：“荣字彦先，吴郡人。其先越王勾践之支庶，……世为吴著姓。大父雍，吴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晋书·陈敏传》：“顾荣等并江东首望。”《晋书·陆晔传》：“陆晔字士光，吴郡吴人也。伯父喜，吴吏部尚书。父英，高平相。”陆晔与其弟陆玩都被东晋王朝任命为高官。北来的统治者对吴人采取的是两手政策，一方面笼络、争取：《晋书·王导传》：“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又如《晋书·陆晔传》：“时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晔以清贞著称，遂拜侍中。”但是吴人的对立情绪是很严重的：《世说新语·方正》：“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世说新语·政事》：“陆太尉诣王丞相咨事，过后辄翻异，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曰：‘公长民短，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此陆太尉乃陆玩，陆晔之弟。《南齐书·丘灵鞠传》：“丘灵鞠，吴兴乌程人也。”“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另一方面，掌握大权的北方士族对吴人实际上是猜忌、压制，兹举例说明之。《晋书·周札传》：“札一门五侯，并居列位，吴士贵盛，莫与为比，王敦深忌之。后筵丧母，送者千数，敦益惮焉。”周氏是义兴的武力强宗，《晋书·王敦传》：“敦又忌周札，杀之而尽灭其族。”《晋书·颜含传》：“除吴郡太守。王导问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将何先？’答曰：‘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

年之间，欲令户给人足。如其礼乐，俟之明宰。’含所历简而有恩，明而能断，然以威御下。导叹曰：‘颜公在事，吴人敛手矣。’”颜含，颜之推的九世祖，本是晋元帝的心腹，丞相王导的同乡，他被任命为吴郡太守，任务是整治这块吴人势力最深厚的地盘。

晋灭吴后，南人大受挫折，特别是永嘉之乱时北方的世家大族迁移到吴地，成了东晋和南朝时期的主要统治者，在语言上，主导者的语言必然占主导地位，成为优势语言，得到普及和推广。这一段时间的文献关于语言的记载却极为稀少，我们只能从蛛丝马迹中寻觅、分析，前辈如陈寅恪、周祖谟等先生都有权威性文章垂世，不揣浅陋，略作补充发挥。西晋灭吴后，在威逼利诱之下，吴人中的上层分子如吴郡的陆机、陆云（吴名将陆逊之孙、陆抗之子）、顾荣、张翰等北上洛阳，寻求在中央王朝谋求官职。胜利者的语言自然在被占领区成了效仿的对象，另一方面也遭到当地一些旧势力的抵制，从葛洪的著作中可以体察到这两点。《晋书·葛洪传》：“丹杨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鸿胪。”葛洪《抱朴子外篇·讥惑》：“况于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他讥笑吴人学北语显然是其立场决定的。永嘉之乱后，皇室卿相、世家大族为避战乱，涌至江淮吴人地区后，自然也带来了汉语的北方方言，这支南下的北方话是主导语言，其推行的速度、覆盖的广度必然远远超过葛洪所讽刺的时代，待到南朝后期，颜之推说：“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可见在南方，是个双语社会，官员和士人（即使是南方士族）都说北方方言，而下层民众是当地土著，则操吴语。颜之推所说的南方庶族是指土著吴人中的下层民众。而吴人中的上层士族和官员绝大多数改说北语。《宋书·顾琛传》：“顾琛”，“吴郡吴人也”，“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渊之字思玄，吴兴乌程人也”。吴郡、吴兴、会稽三郡吴人传统势力深厚，所以有极少数士族坚守吴音，显得十分突出，才被载诸史册。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云：“史言江东贵达者，唯此数人吴音不变，则其余士族，虽本吴人，亦不操吴音，断可知矣。”周一良先生《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说：“宋齐南士贵达者多弃其吴语，易言之，即求贵达必先与侨人士大夫同流

一气，虽语音末节，亦相模仿。”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记录出自《宋书》，而《宋书》的作者也是道地的吴人，而且是丘渊之的同乡，就会益发体认到这一记录的可贵了。《宋书》，沈约(441--513)所撰，沈约，吴兴武康人。据《宋书·自序》，汉光武帝时沈约先祖迁至吴地，其后人“显于吴朝”，一直仕宦显赫，吴兴沈氏本是武力强宗，至沈约时转化为文化士族。[①]《昭明文选》收有沈约的《奏弹王源》，可知他维护士族名声的立场很为坚定，他在南齐时文名颇著，梁时是文坛领袖。作为吴地的著名士族，沈约特别记录了顾琛等四人“吴音不变”，可见吴地的士族绝大多数已经改操当时上层人士使用的南方通语了。我们还可从沈约为首的发现汉语“四声”的群体来观察，梁钟嵘《诗品》：“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南史·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梁书·庾肩吾传》：“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在这个发现四声群体中，王融、谢朓、周颙都是北方士族的后裔，唯有吴兴沈约是南人，他们发现四声，根据的只能是“士”阶层的语言即南方通语，而不可能是南方“庶”阶层的语言即吴方言，《家训》说：“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按照南方士大夫心目中的语言标准，南方庶人的吴方言是地位最低的。《切韵》分平、上、去、入四声，当然依据的是通语。颜之推指出，南方的士族和官员的语言较之北方士族和官员标准、规范，《颜氏家训·音辞篇》：“冠冕君子，南方为优。”史书也有一则记载，《梁书·卢广传》：“卢广，范阳涿人”，“广少明经，有儒术。天监中归国”，“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祥、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在南人的眼里，北方学者如崔灵恩辈多音辞鄙拙，只有卢广清雅，这是南人的高标准。所以南方学者沈约、王融、谢朓、周颙发现四声，提倡在文学创作中充分利用四声，成了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界的大事，沈约自傲：“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梁书·沈约传》)周祖谟先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文人用韵有宽有严，而谢

① 见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

朓、沈约都是用韵较严的，这正是从齐永明起文人精于审辨音韵的表现。……沈、谢所以能用韵细，也正是语音有别的表现。”① 从用韵也可见南方士族沈约和北方士族的语言是一致的。

显然南方通语占了优势，但是它跟南方的土著语言即吴方言长期接触、交流，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这是意理中事，颜之推指出“南染吴越”，可以说是文献中惟一的确切记录，价值之高，毋庸置疑。古籍也曾记载有个别北人学吴语：《世说新语·排调》：“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淘！’（注：吴人以冷为‘淘’）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世说新语·德行》“刘尹在郡”条注引《刘尹别传》：“惔字真长，沛国萧人也，汉氏之后。”《晋书·刘惔传》：“与母任氏寓居京口。”可见他是南迁京口的北方士族。王导在说吴语，正好被他撞见了，王导此举，大概是出于他奉行的拉拢吴人的政治目的。《隋书·五行志》：“炀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帝又言习吴音，其后竟终于江都。”《资治通鉴》卷一八五述隋炀帝，“帝自晓占候卜相，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胡注：吴人率自称曰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胡注：长城公，陈叔宝，叔宝后沈氏。），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因引满沉醉”。杨广是北人，589年任灭陈的统帅，钱穆先生《国史大纲》：“隋文帝平陈，以炀帝为扬州总管，镇江都，置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成书万七千余卷。在此时期，炀帝殆已深深呼吸到南方文学的新空气。”炀帝即位后于大业元年、二年、六年、十二年四次巡幸江都，所以钱穆先生说：“帝好吴语，正见其染南风之深。”隋代初年的《颜氏家训》记录了江淮地区“南方士庶”语言有大差异，到隋代末年，吴语并没有彻底退出江淮。如果我们放眼作更广范围的观察，就可以发现，中国东晋南朝时期北方话“入侵”江淮后的原地士族和庶民使用语言的状况，跟欧洲的一段语言历史竟惊人地相似！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大师梅耶（Antoine Meillet）说：“拉丁语为罗马帝国整个西部地区所接受，就是因为它具有一种比罗马所征服的各个民族更高的文化。……在高卢，贵族阶级自罗马征服高卢

① 周祖谟《问学集》页465—466。

以后就从事研究拉丁语。从帝国初期起,高卢贵族的文化就已经是十足的拉丁文化。但是高卢语并没有因此而消灭,人民还把它保持着并使用了许久。"当然最终高卢地区的民众还是放弃了高卢语。梅耶讲得何等的正确:"一种更高的文化权威使一个民族改变了它的语言。"[①]《三国志·魏志·齐王芳传》注引袁淮劝曹爽放弃淮汉以南的一段话:"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所以借永嘉之乱的契机,北方权威文化遂得以席卷江淮,而使江淮人民最终改变了自己的方言。

至唐时,天下统一,首都在长安,北语取得优势地位,吴语的地位日益低下,可从下例中看出:《旧唐书·王伾传》:"伾阘茸,不如叔文,唯招贿赂,无大志,貌寝陋,吴语,素为太子之所亵狎。"丑化人,"吴语"也成了原料。

我们的目的固然在考证南北朝时代的语言地图,但是我们也要研究彼时的语言和方言跟现代的语言和方言的关系,亦即它们往后的发展史,语言史家的兴趣也许更在乎此。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一个轮廓,4 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语言入侵",经两百多年后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北方的少数民族不少被同化,其语言就逐渐消失了,北魏孝文帝禁断胡语厉行汉化的政策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隋唐自北统一中国,阻断了南语、北语分裂趋势,而且使北朝通语占了上风,在江淮流域的南朝通语其平分秋色的地位则逐渐削弱,它的"血缘"后裔是今江淮方言或称下江官话。自古即存在的吴语,虽然在 4 世纪以后失去了北域江淮地区,但是仍然延续下去,直到今日,仍然是中国的一支很重要的方言。在今天的中国东部,汉语方言呈三分局面:淮北是北方官话方言,自淮至长江南北岸为江淮官话,其南吴方言,完全可以说,这局面在南北朝时已经形成。如今汉语方言史的研究是汉语方言学中的薄弱环节,很多方言的来龙去脉讲不清楚,或者出主入奴,呶呶不休,但是江淮方言却是原委分明,毋庸置疑。现代江淮方言应该称作江淮官话,它确是官话方言中的一支,因为它在一千六百多年前源于北方通语。有人仅仅把江

---

①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页 16、17。

淮方言看作吴方言与官话方言之间的过渡地区，这是对方言史重视不够、知之甚少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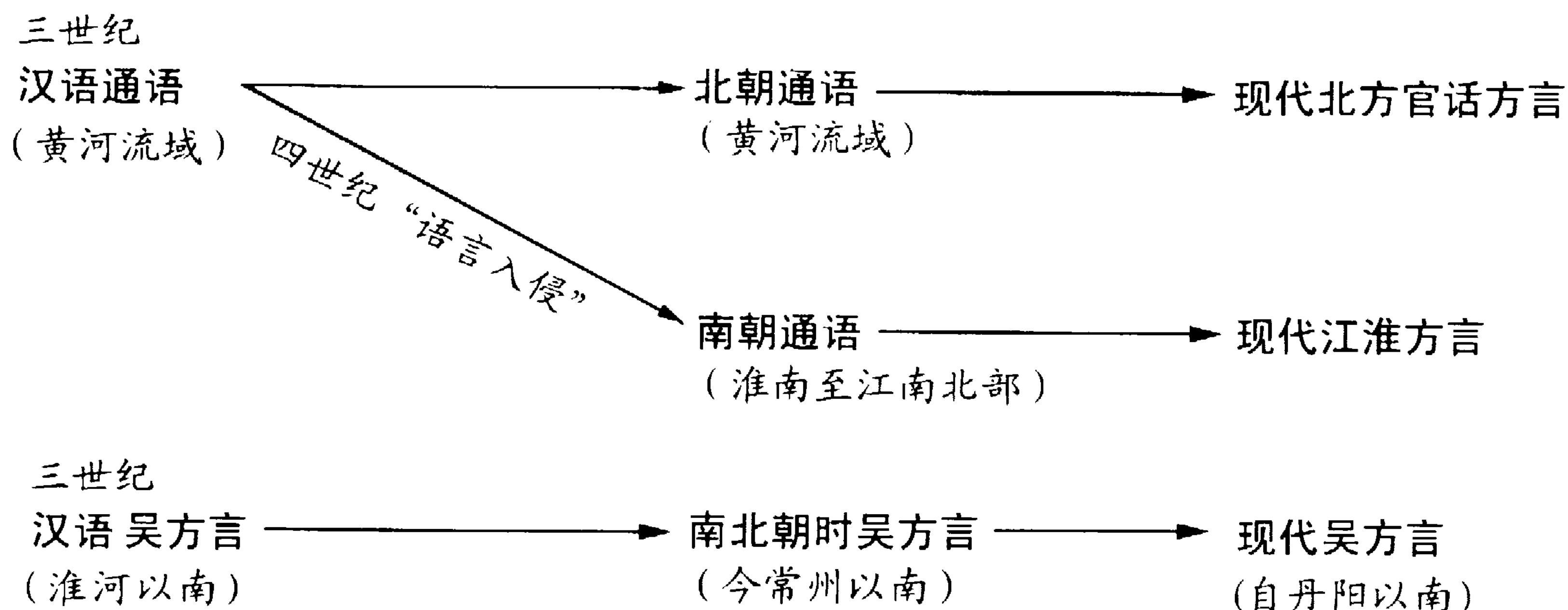


图 2 南朝通语、北朝通语、吴方言源与流示意图

我们还要提到一个在海外很有影响的学术观点。丁邦新先生在1988 年发表的《吴语中的闽语成分》一文，先撮述陈寅恪先生的学说，“由于北方士族南来，使北语在南方成为士族语言，只有一般老百姓才用吴语”。丁先生接着说：“经过东晋到隋代差不多三百年的演变，可能中原北语势力渐大，成为一般人用的语言，而原来的吴语则经由移民带到福建一带慢慢演变为今天的闽语。”丁先生的结论是：“南北朝时代的吴语就是现在闽语的前身，而那时的北语则是现在吴语的来源。”丁先生在 1992 年发表的《汉语方言史和方言区域史的研究》重申此说。① 丁先生 1995 年《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我们应该拟测两种切韵音系，一种代表北方的邺下方言，另一种代表南方的金陵方言。”“官话是从邺下切韵的系统演变而来，吴语则是从金陵切韵的系统演变而来。”② 拙文《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1988 年方发表）正与丁先生的看法相反：南下到江淮地区的北语是江淮方言，亦即下江官话的前身，4 世纪前本北抵淮河，东晋南朝后退居今常州以南的吴语与现代吴方言一脉相承，如今重申旧说，加密论证，以就正于丁先生和学界同仁。

①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页 252、192。

② 《中国语文》1995 年 6 期，页 416、417。

五、辩二陆与颜之推之同

现在我们可以来研读跟颜之推几乎同时的两位著名学者的类似的说法。陆法言(约559—?)[①]的《切韵》成于601年,《切韵·序》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陆德明(约550—630)的《经典释文》写定于王世充称帝期间(606—621)。[②]《经典释文·序录》:“楚夏声异,南北语殊。”“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浅,或滞于沉浊。”二陆以“吴楚、燕赵”、“江东、河北”、“河北、江南”各自对言,至此我们不妨回到本文第二节之首,那里列举了《颜氏家训》书中的对言词语:“南”对“北”,“江南”对“河北”,“河北”对“江东”,“江南”对“山东”,“中原”对“江南”,“北土”对“江南”,“江东”对“邺下”,“南间”对“河北”。我们可以再回味一下颜之推比较南语、北语优劣的一段话:“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𨱍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这段话和二陆的南北方音的“浮浅、沉浊”、“轻浅、重浊”何其相似乃尔!确实有很多论著同时引用三位先贤的话,可是都未能明确指出颜之推和二陆的评论都是就原本一源的北方通语和南方通语的歧异而言的,上文已经讲过,《颜氏家训》所述所论的对象多是士族即上层人士的社会与文化中的问题,士大夫阶层是不关心庶人,甚至鄙视庶人的,如《颜氏家训·风操篇》:“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音辞篇》:“闾里小人,北方为愈。”颜之推、陆德明、陆法言他们有共同的立场、共同的认识,他们各打五十大板的是士人讲的北方通语和南方通语,绝不是指摘北方话和吴方言二者。如将颜和二陆这三人的言论互勘,若合符节。

遗憾的是,可能是由于切身感受到的是现代北方官话和东南现代吴方言对峙的局面,这种现实的强烈的语言背景使得某些学人,例如陈寅恪先生,在不经意间理解出了偏差。陈先生的《东晋南朝之吴语》、《从史实论切韵》二文是研究4—6世纪汉语史的两篇权威性文

---

① 李荣《陆法言的〈切韵〉》,《音韵存稿》,1982,商务印书馆。

② 孙玉文《〈经典释文〉成书年代新考》,《中国语文》1998年4期。

章，对后来者沾溉良多，笔者为写此文，再次拜读。《从史实论切韵》云："颜黄门乃以金陵士族所操之语音为最上，以洛阳士庶共同操用之语音居其次，而以金陵庶人所操之语音为最下矣。"在引述"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后说："乃就士族所操之音辞而比较言之。盖当时金陵士族操北音，故得云'南染吴越'也。"又说："金陵士族与洛下士庶所操之语言，虽同属古昔洛阳之音系，而一染吴越，一糅夷虏，其驳杂不纯，又极相似。"陈先生的这些阐述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陈先生有些理解则可以商榷："所谓'洛下书生咏'，殆即东晋以前洛阳之太学生以诵读经典之雅音(此'音'字指语音而言，非谓音乐也。)讽咏诗什之谓也。此种都邑雅音，较之时伤轻清之吴越方音，顾相悬殊。"他引述了《颜氏家训·音辞篇》的"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的话后说，"乃就庶人所操之音辞而比较言之"。陈先生在抄录了二陆的吴楚轻清(尧按，陈文如此)，江南浮清(尧按，陈文如此)的话后，加按语道："是吴音之特点为轻清，斯即南方庶人所操用者。此种语音，既与洛阳旧音大相悬殊，宜颜黄门目之为最下矣。"其实在《颜氏家训·音辞篇》的这一段名言里，"南"、"南方"都是借代指称当时的南方通语，南音清举而切诣，或浮浅，是指的南方通语的特点，颜之推行文是一以贯之的，而陈先生却误析。为了推进学术，笔者指出陈先生的豪芒之失，不过我们绝不能便起骄矜之意，以己之寸长苛求前人。

至此，根据南北朝时代三位大语言学家的论著，可知当时为人们所注意的，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语言和方言不过数种，我们可以勾画出南北朝时期中国语言和方言的地图，自北而南，在黄河流域，存在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鲜卑语，还有汉语的北方通语，在淮南及长江的中下游(至少是长江下游)两岸，是汉语的南方通语，它是4世纪北方方言"入侵"、占领吴方言区北域的产物，在南方通语之南是汉语的吴方言区。

六、"颜之推谜题"之半解

以上的考证使我们明了"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

论”这一“颜之推谜题”命题的确定性，现在我们据此追迹汉语通语和吴方言的中古史。“南染吴越”一语中的“吴越”，亦即南朝时期的吴方言，其情况如何？时隔已一千多年，能不能考寻？至于受当时吴方言“感染”的南朝通语（即“南”），其“深弊”如何？由于颜之推未能“具论”，遂成千古之谜，如今可否窥其一斑？

这两个问题，自然十分棘手。在下不揆梼昧，试作此文。拟采取二重证据法，即以“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相结合，力图做些破解工作，哪怕破解些许。关于历史文献的考证，上面已经做了许多，下面还要做。但是现在先把重点移到“历史比较法”上，用这种方法来破解颜之推谜题。

（一）

破解，从何处下手？我们找到一个切入点，即中古音系的“谈”、“覃”、“寒”、“桓”四韵。

现存《切韵》及“王韵”的若干敦煌残卷如S2071、P2011等等，宋跋本“王韵”，《唐韵》残卷都有“覃感勘合”、“谈敢阚盍”八韵，凡是有这八韵的，次序均为“覃（按，举平以赅上去或上去入，下同）”在先，“谈”居后。早期韵图《韵镜》和《七音略》列图时也都是“覃”前而“谈”后。

在上述韵书里也多有“寒旱翰末”四韵，但是《刻本韵书残叶》（列TiL1015）在寒韵诸字后，明列“二十七桓”，《唐韵》残卷去声则有“翰”、“换”二韵，入声则有“曷”、“末”二韵，至《广韵》则明确分立，载有“寒旱翰曷”和“桓缓换末”八韵。李荣先生说：“切韵和广韵，韵的数目不一样，广韵的韵数比切韵多，可是切韵和广韵韵母的系统一样。”“广韵把切韵的寒韵分成寒桓两韵，桓韵包括全部合口字及唇音声母字。切韵是一个韵两个韵母，广韵是两个韵两个韵母，切韵广韵韵的数目虽然不同，韵母的数目却是一样的。”①

研究音韵学的学人都知道：在诸家的切韵音系的学说里，“覃”、“谈”、“寒”、“桓”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一等韵；至于两两之间的关系则大异，“覃”、“谈”为咸摄的一等重韵，“寒”、“桓”是山摄的一等

① 李荣《切韵音系》第82页。

开合韵，从这一点说，“覃”、“谈”和“寒”、“桓”是不具备平行性的两组韵。迄今为止的各种关于汉语中古音的论著，对“覃”、“谈”和“寒”、“桓”的性质和关系，并无异辞，也就是说，以上是共识，是定论。

这只是切韵系韵书的情况。可是，如果我们以切韵音系为参照系，考察并比较在现代汉语诸方言中这四韵的详情，就会另有发现。我们先观察“谈”、“覃”、“寒”、“桓”四韵在下列诸方言中的表现，这里我们将“谈”调到“覃”的前面，自有其道理在，说详后。

表1　古谈覃寒桓四韵今音韵母表(一)

	谈韵		覃韵		寒韵		桓韵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双唇	舌齿	牙喉
北京	an	/	/	/	/	/	/	uan	/
济南	æ̃	/	/	/	/	/	/	uæ̃	/
西安	æ̃	/	/	/	/	/	/	uæ̃	/
太原	æ̃	/	/	/	/	/	/	uæ̃	/
成都	an	/	/	/	/	/	/	uan	/
扬州	iæ̃、æ̃	æ̃	iæ̃、æ̃	æ̃	iæ̃、æ̃	æ̃	uõ	/	/
长沙	an	/	/	/	/	/	õ	/	/
双峰	æ̃	/	/	/	/	/	/	ua	/
梅县	am	/	/	/	an	ɔn	an	ɔn	uɔn
铜鼓	an	/	/	/	/	ɔn	an	ɔn	uɔn
陆川	am	/	/	/	an	uan	an	uan	/
香港	am	/	/	/	an	ɔn	an	ɔn	/
广州	am	ɐm	am	ɐm	an	ɔn	un	yn	un
阳江	am	ɐm	am	ɐm	an	ɔn	un	/	/
南宁	am	ɐm	am	ɐm	an	ɔn	un	yn	un

续 表

	谈韵		覃韵		寒韵		桓韵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双唇	舌齿	牙喉
厦门	am	/	/	/	an	/	uan	/	/
福州	aŋ	/	/	/	/	/	uaŋ	/	/
建瓯	aŋ	ɔŋ	/	/	uɪŋ	/	/	uɪŋ、ɔŋ	uɪŋ

注:凡与左音相同者,则以"/"号表示,后同。本表方音资料:铜鼓据《客赣方言比较研究》,陆川、香港据《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南宁见《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其余据《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

从北京至成都都是官话方言,"谈"、"覃"、"寒"韵表现一致,此三韵不因声纽的类别(即是舌齿还是牙喉)而有所区别;桓韵是寒韵的合口。作为江淮方言的代表点的扬州方言,略有变异:"谈"、"覃"、"寒"三韵韵母,舌音为 iæ̃,齿音是 æ̃,牙喉音也是 æ̃,三韵的平行性仍然是很强的;桓韵显然也是合口,但是主元音却与寒韵不同,是后半高圆唇元音,这一点近于其东邻通泰方言。在湘语里,"谈"、"覃"、"寒"三韵韵母具有一致性,只是桓韵的主元音亦有异。客家方言梅县、铜鼓、陆川、香港四点,"谈"、"覃"两韵完全一致,寒韵的主元音,舌齿为前低元音,梅县、铜鼓、香港牙喉音则为后半低圆唇元音;桓韵为合口。粤语广州、阳江、南宁三点,谈韵舌齿音和牙喉音的主元音有别,覃韵并无二致;寒韵桓韵是另一路子。闽南、闽东方言"谈"、"覃"、"寒"、"桓"四韵主元音均相同,桓韵多一个合口 u 介音而已,建瓯稍复杂些。

(二)

但是,在通泰、吴、赣三方言内,"谈"、"覃"、"寒"、"桓"四韵的今音和上述诸方言大为不同,此三方言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揭示这一特点,是本文的重心所在、价值所在。

吴方言、赣方言尽人皆知,通泰方言需作介绍。在分区上,通泰方言是江淮方言下属的次方言,其地域西近运河,南临长江,东濒黄海,自泰州、兴化、大丰至南通十个县市,人口约一千万,通泰方言在

官话方言中最为复杂。吴方言区东北与通泰方言区接壤，西邻赣方言区，就是说，这三个方言地理上连成一片。

既然是本文重点所在，所以我们对此三方言的情况列表时就较前表详细。

表 2　古谈韵字今音韵母表

	胆	毯	篮	三	甘	敢	酣
兴化	ɛ̃	/	/	/	/	ũ、ɛ̃	ɛ̃
泰州	ɛ̃	/	/	/	ʊ̃、ɛ̃	/	
如皋	ẽ	/	/	/	ʊ̃	/	
南通	ɑ̃	/	/	/	ʊ̃	/	
常州	ɛ	/	/	/	ɤ	/	
无锡	ɛ	/	/	/	o	/	
常熟	ɛ	/	/	/	ɤ	əŋ	
苏州	E	/	/	/	ø	/	
宜兴	A	/	/	/		e	/
上海	E	/	/	/		ø	/
嘉兴	Eɛ	/	/	/		ɤə	/
绍兴	æ̃	/	/	/		ĩ	/
宁波	E	/	/	/		i	EI
温州	ɑ	/	/	/		ɵ	/
衢州	æ̃	/	/	/		ə	/
金华	ɑ	/	/	/		ɯə	/
庆元	ɑ̃	/	/	/	ã	/	
南昌	an		an		ɵn	/	
乐平	an		an		ɛn	/	

续　表

	胆	毯	篮	三	甘	敢	酣
高安	an		an		on	/	
临川	am		am		om	/	
萍乡	ã		ã		ɔ̃	/	
岳西	an	/	/	/	on	/	

注：本表方音资料：兴化据《兴化方言志》，泰州至苏州诸点据《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宜兴至金华诸点据《当代吴语的研究》，庆元据《吴语处衢方言研究》，南昌至萍乡据《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岳西据《安徽岳西方言的同音字汇》。

古谈韵字在通泰方言中，舌齿音字韵母，兴化、泰州是 ɛ̃，如皋是 ẽ，南通是 ɑ̃，而牙喉音字均为 ʊ̃，二者迥然不同。兴化、泰州牙喉音字之所以有两个韵母，其实 ʊ̃ 是白读，ɛ̃ 是文读，白读的时间层次当然早于文读，是该方言原来的读音。自常州至庆元是吴方言，自南昌至岳西为赣方言，谈韵字也因声纽之别一分为二，今音主元音音值纷异，但音类的分化则与通泰方言一致。

再看古覃韵字在今音中的表现。

表 3　古覃韵字今音韵母表

	贪	探	男	堪	含	暗
兴化	ũ、ɛ̃	ɛ̈	ũ、ɛ̃	/	ũ、ɛ̃	/
泰州	ɛ̃	/	ʊ̃、ɛ̃	ɛ̃	ʊ̃、ɛ̃	ʊ̃、ɛ̃
如皋	ʊ̃	/	ʊ̃、ẽ	ẽ	ʊ̃	ʊ̃、ẽ
南通	ỹ	/	/	ʊ̃	ʊ̃	ʊ̃
常州	ɤ	/	/	/	/	/
无锡	o	/	/	/	/	/
常熟	əŋ	/	/	/	/	/
苏州	ø	/	/	/	/	/

续 表

	贪	探	男	堪	含	暗
宜兴	e	/	/	/	/	/
上海	ø	/	/	/	/	/
嘉兴	ɤə	/	/	Eε	ɤə	/
绍兴	uɵ̃	/	ɵ̃	æ̃	ĩ	/
宁波	EI	/	/	E	EI	/
温州	ɵ	/	/	/	/	/
衢州	ə	/	/	æ̃	ə	/
金华	ɯə	æ̃	ɯə	æ̃	ɯə	æ̃
庆元	ã	/	/	/	/	/
南昌	uɵn	/			ɵn	an
乐平	ɛn	/			ɛn	/
高安	on	/			on	/
临川	am	/			om	/
萍乡	ã	/			ɔ̃	/
岳西	on	/	/	/	uon	on

古覃韵字在通泰方言中,有两读的,前者为白读,是方言原有音;文读是受近现代通语影响的结果。这项音变程度较深,如"探子"一词中的"探",笔者是泰州人,笔者的父亲念 t'ʊ̃,而笔者从来都念 t'ɛ̃。"勘"从无 k'ʊ̃ 音,这表示此字音变已完成。以上表首字"贪"字而论,从兴化、泰州、如皋三点比较即可知,-ũ 是兴化原有的音,-ʊ̃ 是泰州、如皋原来的音。综观六字今音,完全可以得出如下论断:古覃韵全韵今音韵母兴化本为 ũ,泰州、如皋本为 ʊ̃。至于南通方言,在舌齿音声母之后,韵母为 ỹ,而在牙喉音声母后,ʊ̃ 自较 ỹ 和谐,笔者名之曰"声韵谐接原则",说南通方言古覃韵字今音韵母亦为一,是能成立的。因此从白读的层次看,古覃韵字在通泰方言里,全韵一

致。而吴方言、赣方言也大致如是。

我们接着考察山摄寒韵字。

表 4 古寒韵字今音韵母表

	单	摊	难	散	干	寒	安
兴化		ɛ̃	/	/	/	ũ、ɛ̃	/
泰州	ɛ̃	/	/	/	ʊ̃、ɛ̃	/	/
如皋	ẽ	/	/	/	ʊ̃	/	/
南通	ɑ̃	/	/	/	ʊ̃	/	/
常州	ɛ	/	/	/	ɤ	/	/
无锡	ɛ	/	/	/	o	/	/
常熟	ɛ	/	/	/	ɤ	/	/
苏州	E	/	/	/	ø	/	/
宜兴	A	/	/	/	e	/	/
上海	E	/	/	/	ø	/	/
嘉兴	Eɛ	/	/	/	ɤə	/	/
绍兴	æ̃	/	/	/	ĩ	/	/
宁波	E	/	/	/	i	EI	/
温州	ɑ	/	/	/	ɵ	y	/
衢州	æ̃	/	/	/	ɔ	/	/
金华	ɑ	/	/	/	ɯə	æ̃	/
庆元	ɑ̃	/	/	/	uɑ̃	/	/
南昌	an	/	/			ɵn	an
乐平	an	/	/			ɛn	/
高安	an	/	/			on	/
临川	an	/	/			on	/
萍乡	ã	/	/			ɔ̃	/
岳西	an	/	/	/	on	uon	on

关于通泰方言的文白异读问题，前已叙述，不赘。古寒韵字在通泰、吴、赣三方言中，表现相同：因声纽之异，今音韵母分为二。观表4和表2，古山摄寒韵和古咸摄谈韵在此三方言中，如此一致，能不令人瞩目？

表5　古桓韵字今音韵母表

	半	满	短	暖	宽	换
兴化	ũ	/	/	/		ũ
泰州	ʊ̃	/	/	/	/	/
如皋	ʊ̃	/	/	/	/	/
南通	ʊ̃	/	ỹ	/	ʊ̃	/
常州	ɤ	/	/	/	uɤ	/
无锡	o	/	/	/	/	/
常熟	ɤ	/	/	/	u	uɤ
苏州	ø	/	/	/	uø	/
宜兴	e	/	/	/	ue	/
上海	ø	/	/	/	/	/
嘉兴	ɤə	/	/	/	uɤə	/
绍兴	ɵ̃	/	/	/	uɵ̃	/
宁波	u	ø	/	/	u	/
温州	ɵ	/	/	/	ɑ	/
衢州	ə	/	/	/	uə	/
金华	ɯə	/	/	ɔ	uɑ	uæ̃
庆元	ã	/	/	/	uã	
南昌	ɵn	/	/	on	uɵn	/
乐平	ɛn	/	/	/	uɛn	/

续 表

	半	满	短	暖	宽	换
高安	ɛn	/	on	/	uɛn	/
临川	on	/	/	/	uon	/
萍乡	ɔ̃	/	/	/	uɔ̃	/
岳西	on	/	/	/	uon	/

观察上表,舌齿音后接前元音,唇音及牙喉音后接后元音,是语音的自然拼合,这也是"声韵谐接原则"的体现。在有些方言里,牙喉音与主元音之间有介音 u。切韵音系的山摄合口桓韵字跟咸摄覃韵字在通泰、吴、赣方言里的表现何其相似乃尔!

(三)

水到渠成,现在该是我们做小结的时候了,列表如下:

表 6　古谈覃寒桓四韵今音韵母表(二)

	谈韵		覃韵		寒韵		桓韵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双唇	舌齿	牙喉
兴化	ɛ̃	ũ、ɛ̃	/	/	ɛ̃	ũ、ɛ̃	ũ	/	/
泰州	ɛ̃	ʊ̃	ʊ̃、ɛ̃	/	ɛ̃	ʊ̃、ɛ̃	ʊ̃	/	/
如皋	ẽ	ʊ̃	ʊ̃、ẽ	/	ẽ	ʊ̃	/	/	/
南通	ɑ̃	ʊ̃	ỹ	ʊ̃	ɑ̃	ʊ̃	/	ỹ	ʊ̃
常州	ɛ	ɤ	/	/	ɛ	ɤ	/	/	uɤ
无锡	ɛ	o	/	/	ɛ	o	/	/	/
常熟	ɛ	ɤ、əŋ	əŋ	/	ɛ	ɤ	/	/	u、uɤ
苏州	E	ø	/	/	E	ø	/	/	uø
宜兴	A	e	/	/	A	e	/	/	ue

续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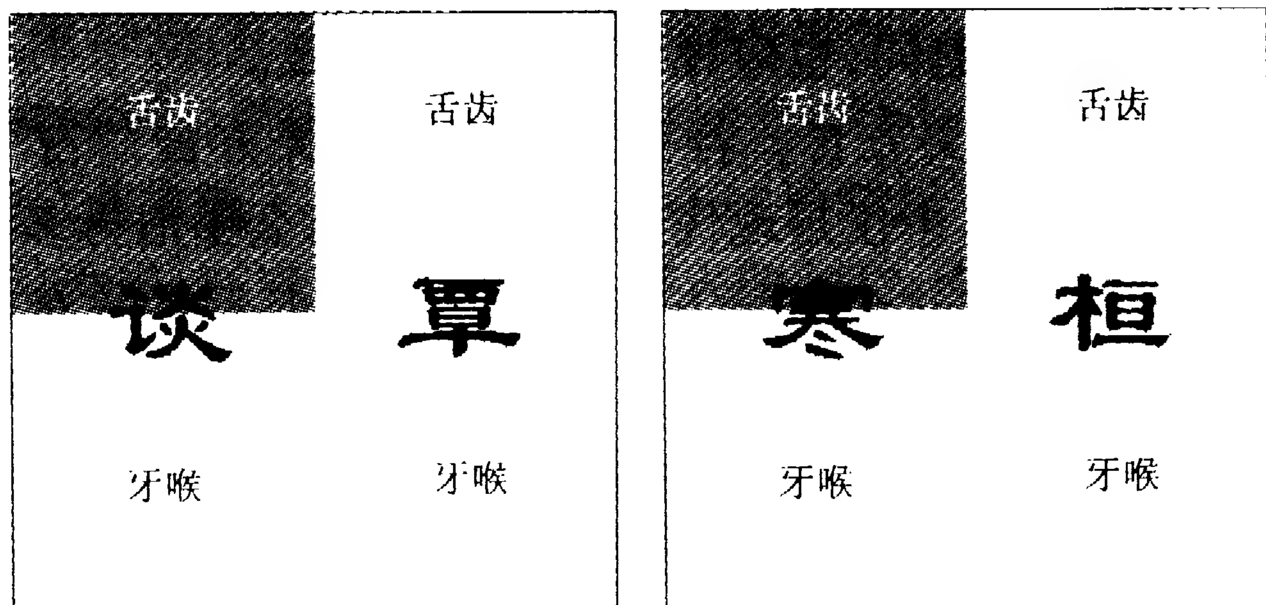
	谈韵		覃韵		寒韵		桓韵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舌齿	牙喉	双唇	舌齿	牙喉
上海	E	ø	/	/	E	ø	/	/	/
嘉兴	Eɛ	ɤə	/	ɤə、Eɛ	Eɛ	ɤə	/	/	uɤə
绍兴	æ̃	ĩ	uɵ̃、ɵ̃	æ̃、ĩ	æ̃	ĩ	ɵ̃	/	uɵ̃
宁波	E	I、EI	EI	EI、E	E	i、EI	u、ø	ø	u
温州	ɑ	ø	/	/	ɑ	ɵ、y	ɵ	/	ɑ
衢州	æ̃	ə	/	ə、æ̃	æ̃	ə	/	/	uə
金华	ɑ	ɯə	ɯə、æ̃	/	ɑ	ɯə、æ̃	ɯə	ɯə、ə	uɑ、uæ̃
庆元	ɑ̃	ã	/	/	ɑ̃	uã	ã	/	uã
南昌	an	ɵn	uɵn	ɵn	an	ɵn、an	ɵn	ɵn、on	uɵn
乐平	an	ɛn	/	/	an	ɛn	/	/	uɛn
高安	an	on	/	/	an	on	ɛn	on	uɛn
临川	am	om	am	om	an	on	/	/	uon
萍乡	ã	ɔ̃	ã	ɔ̃	ã	ɔ̃	/	/	uɔ̃
岳西	an	on	/	on、uon	an	on、uon	on	/	uon

从上表可以得出一个公式。

四韵公式

谈韵舌齿音:(谈韵牙喉音+覃韵)=寒韵舌齿音:(寒韵牙喉音+桓韵)

也可以图表示:



这就是通泰、吴、赣三方言的共同特色。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对于官话方言、湘、粤、闽等方言来说,覃韵和谈韵的位置,孰先孰后,全无关系,即按照《切韵》、《广韵》的序次,并无不可。但是对于通泰、吴、赣方言,必须谈韵居前,此其特点使然。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将表6古谈覃寒桓四韵今音韵母表(二)与表1古谈覃寒桓四韵今音韵母表(一)作一对比,就可发现,表(一)上的官话方言、湘方言、客方言、闽方言,其表现一致而简单,至于粤方言"谈"、"覃"二韵今音均以声母为条件,形成a: ɐ的对立,即两韵的分化是平行的;"寒"韵则以声母为条件,形成a: ɔ的对立:山摄和咸摄并不同步。比较起来,以上这些方言的今音,和切韵音系的分韵切合许多。而通泰、吴、赣方言的分派显然与切韵音系距离甚远。

(四)

我们进一步讨论,切韵"覃"、"谈"、"寒"、"桓"四韵在通泰、吴、赣方言何以如此一致?从逻辑上说,这有多种可能:1. 偶然一致;2. 其一或其二具有这种特性,另一或另二受其影响;3. 本同一源,三者的今音是相同发展的结果。这要结合古史来探讨。笔者在旧作《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长文中曾考证古吴语本北抵淮河,江淮之间包括今通泰方言地区在4世纪前本为吴语区的一部分,可

为定谳，此处不赘论。江西古称豫章，《隋书·地理志下》："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宋祝穆《方舆胜览》："豫章之地，楚尾吴头。"至今赣东北的上饶还操吴语。通泰方言保存古吴语的底层，这是必然的推论。赣语区的很多地方本来也是吴地，赣方言的"覃"、"谈"、"寒"、"桓"四韵的今音与吴方言趋同，也应视作同根衍化所致。

这"根"就是古吴方言。若有人问，这"古吴方言""古"到何时？如果在上列表2—6中仅是现代吴方言的点，那么哪怕再多举几十个吴方言点，也难以给这个古吴方言断代定时。但是在通泰、吴、赣三方言中"谈"、"覃"、"寒"、"桓"四韵今音呈现平行性，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这吴方言是公元4世纪前的古吴方言，因为今通泰地区古代一直是吴语区，永嘉之乱后方有大量北方流民迁入，方言的转型才有可能，胜利的方言里就保留了原方言的底层。

通泰地区，汉代是海陵县，即今泰州。从海陵之得名，可知古时该县是海边之高地，地广人稀，海安以东尚未成陆。《左传》哀公十二年(前483)吴王夫差拘留卫侯于郧，后来"卫侯归，效夷言"，夷言就是古吴语，这应该是非汉语的古吴语。郧在今通泰方言区海安镇东附近。通泰地区在西汉初是吴国的领地，后来属江都国。汉武帝元狩六年(117)起属新置之临淮郡。《汉书·地理志》临淮郡领二十九县，其一为"海陵县"，今为泰州。东汉、晋时属广陵。4世纪前淮河以南(包括海陵县)通行吴语，永嘉之乱后情况大变。北方难民涌入淮南，东晋、南朝政府在淮南设立很多侨州郡县。幽、冀、青、并、徐、兖、司七州都曾侨置于今高邮、扬州、泰州一带。《宋书·州郡志》"南兖州"序："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立南兖州，……，文帝元嘉八年，始割江淮间为境，治广陵。……宋末领郡十一，县四十四。"郡之一为秦郡，宋志云："晋武帝分扶风为秦国，中原乱，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今江苏六合，处扬州和南京间。北淮阳郡、北济阴郡、北下邳郡、东莞郡则侨置在高邮、扬州、泰州一带。据《宋书·州郡志》广陵郡领四县：广陵、海陵、高邮、江都。据宋志"广陵郡"序注，东晋曾侨立辽西郡于境内。值得重视的是，海陵县是古县，属广陵郡。但是又出现了个"海陵郡"，这是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分广陵郡而立的新郡，领六县，建陵县是侨县，在今东台县境，其他临江县、如皋县、宁

海县、蒲涛县，还有宋明帝时立的临泽县都是新县。这新郡新县在今泰州以东至南通一带，宋明帝时泰始七年(471)立新平郡，统二县：江阳县、海安县。《南齐书·州郡志》“海陵郡”、“海安县”注：“永明五年罢新郡，并此县度属。”今之如皋县、海安县的建置即源于晋宋。从古代地理文献可知，高邮、扬州、泰州特别是泰州以东至海边，在晋宋时代侨郡侨县纷置，新郡新县增立，我们不禁要问：“何以致此？”答案只能有一条：“北方流民涌入之故也。”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今日之通泰地区，大至淮南、江南能不发生“语言入侵”吗？能不使这片地区的方言转型吗？

在这儿我还要讨论一个问题：《颜氏家训·音辞篇》云：“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陈寅恪先生在《东晋南朝之吴语》引用后加按语道：“江左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又说：“士人皆北语阶级，而庶人皆吴语阶级。”① 鄙见，颜之推和陈先生都就其大体而言，到了刘宋时代，吴地士族仍有个别顽固分子坚持“吴音不变”，这前已申述。而下层民众操北语者，则比例必较之前者为高，永嘉之乱南迁的人岂能是清一色的士族？平民就不逃难？而且世家大族从北方带来的私附、奴仆、部曲就不说北语吗？《晋书·殷仲堪传》载殷仲堪致桓玄书云：“胡亡之后，中原子女鬻于江东者不可胜数，骨肉星离，荼毒终年。”《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我们应该认识到，四、五世纪发生在淮南江南的“语言入侵”，其势猛不可当，北方的士族支配了东晋、南朝政府，挟其政治、文化的优势，其北语也席卷南方，南方士族很快靡然而从，这样就形成了“南朝通语”。这一地区的下层民众在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后，也放弃了自己的吴方言。最终形成了近现代江淮方言的祖方言。

现代江淮方言的中支是洪巢方言，地处江苏、安徽两省的淮南、江南。和平时代这一地区是北中国和南中国的最重要的经济通道；一千多年来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使这一地区的人口成分经历了多次的变动，这都促使洪巢方言跟其紧邻的北方方言采取共同协调的发展步骤，因此今日的洪巢方言比较接近于北方的中原官话、冀鲁官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68—269。

话。而江淮方言的东支即通泰方言则保存了很多古老的方言特点，这是由于僻处东隅的缘故，尽人皆知，凡是闭塞、动乱少的地区语言变化较慢，相对稳定。可以说，通泰方言是南朝通语的嫡系后裔，虽然经历了千余年的变化，然而它还是保存了南朝通语的若干特点。

现代通泰方言是江淮方言的下位方言，当然与吴方言不同，但是它在“谈”、“覃”、“寒”、“桓”四韵的表现上却与吴方言相同，以此溯论，这就是南朝通语的特点之一，其分韵与次序和切韵系统大相径庭，当即颜之推所指责而未“具论”的“深弊”之一，其根源就在于“南染吴越”。梅耶的名言：“两种语言间相符合的事实越特殊，它们的证明力量就越大。”① 通泰方言、吴、赣方言“谈”、“覃”、“寒”、“桓”的平行性就是这种特殊的事实，它说明了南朝通语与吴方言的接触与交融。著名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周一良先生凭其历史学家的敏感也讨论到南方语言接触、影响的问题，在其早年名文《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1938)中特立“从语音推测侨旧之同化”小节：“扬州之侨人不自觉中受吴人熏染，于中原与吴人语音以外，渐形成一种混合之语音。同时扬州土著士大夫求与侨人沆瀣一气，竞弃吴语，而效侨人之中原语音。然未必能得其似，中原语音反因吴人模拟施用，益糅入南方成分。”“窃疑亦惟在扬州此种侨吴混合之语音最盛行，然文献难征，姑著愚见以待宏达之教正。”② 惜乎拙文方于此时写成，而周先生已仙逝，“疑惑之所，质问无从。亡者则生死路殊，空怀可作之叹”。

七、结语

凡研究必有方法，而且方法往往不止一种。研究汉语史当然也有其方法，自然方法也多，笔者以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历史文献考证法”对研究汉语史确有大效，这是经过千百年实践检验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历史比较法”在近百年来的汉语史的研究中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主张二者的结合、融会。在中国人文学术史上，王

①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页22。

② 《周一良集》第一卷页103、104。按，周先生文中所云之“扬州”非今之“扬州”。

国维 1915 年《三代地理小记》提出“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是光辉的典范。[①] 步武前修，本文笔者在这篇习作中，就是力图将“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结合起来，可谓之新的“二重证据法”，或者汉语史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笔者以之探究南朝通语受当时吴方言感染的这一历史语言事实。

《颜氏家训·音辞篇》中的名言：“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历来征引此段的很多很多，然而津津乐道，加以申述的集中在前一部分和后面的八句，独于“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十六字却不措意，其实颜之推精义在兹，笔者为此殚精竭虑多年，今特为表而出之，命名为“颜之推谜题”，并以新的“二重证据法”加以论证，其中现代通泰方言可以说是破解“颜之推谜题”的钥匙。

“颜之推谜题”的精髓在于“南北通语的深弊论”，洞悉此义，则可接近音韵学上的老大难问题即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了，此不具论。

最后我再引用颜之推的话：“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在下，江南人也，此文写作过程中曾请几十位专家弹射。十一年前《中国语文》主编侯精一先生传达吕叔湘先生之命，令我为《中国语文》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专号撰稿；去年侯精一先生又令我为《中国语文》创刊五十周年纪念专号撰稿，此文承蒙惠允发表，如今借此机会，更请天下学者弹射。

《中国语文》杂志极少连载论文，十年前拙文《〈卢宗迈切韵法〉述论》得在《中国语文》分两期连载，如今历史又重复一次，《中国语文》编辑部给我如此殊荣，令我十分感激。

① 一般说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1926 年出版)中首次提出二重证据法，其实这一思想早在 1915 年就形成。此承周勋初教授赐教。

主要参考文献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世说新语》，中华书局影印宋绍兴八年本。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　《安徽省志·方言志》，方志出版社。

鲍明炜　1998　《江苏省志·方言志》，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989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

曹道衡　刘跃进　2000　《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曹志耘等　2000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东京好文出版社。

陈昌仪　1991　《赣方言概要》，江西教育出版社。

陈寅恪　1980　《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0　《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程章灿　1998　《世族与六朝文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储诚志　1987　《安徽岳西方言的同音字汇》，《方言》第4期284—293页。

丁邦新　1998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杜瑞芝　2000　《数学史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

范文澜　1964　《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修订本)。

房德里耶斯　1992　《语言》(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葛剑雄　1997　《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　《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胡阿祥　2001　《六朝疆域与政区》，西安地图出版社。

江苏社会科学院《江苏史纲》课题组　1993　《江苏史纲》。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　1960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

蒋赞初　2001　《长江中下游历史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李　荣　1956　《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

李如龙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

李晓杰　1999　《东汉政区地理》，山东人民出版社。

林家骊　1999　《沈约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

刘纶鑫　1999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汝霖 1987 《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中华书局。

鲁国尧 1988 《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アジア·アフリカ語の計数研究》第30号。

——— 1990 《长安论韵考》(手稿)。

——— 1992 《客家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丘权政主编《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页42—55。

——— 1994 《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

——— 2001 《“谈”“覃”与“寒”“桓”》,《声韵论丛》第11辑,台北学生书局。

——— 2001 《通泰方言研究史脞述》,《方言》第4期。

陆侃如 1998 《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梅　耶 1924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语文出版社,1992年。

缪　钺 1963 《读史存稿》,三联书店。

钱　穆 1994 《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钱乃荣 1992 《当代吴语的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邵荣芬 1995 《经典释文音系》,台北学海出版社。

数学百科全书编译委员会 1995 《数学百科全书》第二卷,科学出版社。

谭其骧 2000 《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王利器 1993 《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

王小莘 1998 《颜氏家训》词汇语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王仲荦 1979 《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西蒙·辛格 1998 《费马大定理——一个困惑了世间智者358年的谜》,上海译文出版社。

解延年等 1987 《数学家传》,湖南教育出版社。

徐芳敏 1999 《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苏北淮南地区与楚方言有关的楚文化问题》,《张以仁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页479—519,台北学生书局。

许辉等 2001 《六朝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

张丙钊 1995 《兴化方言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张南等 1994 《简明安徽通史》,安徽人民出版社。

张文彦等 1992 《自然科学大事典》,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赵元任 1928 《现代吴语的研究》,科学出版社1956年重印本。

周法高 1993 《颜氏家训汇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一。

周一良 1998 《周一良集》,辽宁教育出版社。
周振鹤 1987 《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
周祖谟 1966 《问学集》,中华书局。
——— 1983 《唐五代韵书集存》,中华书局。

2001 年 4 月—2002 年 9 月于颜之推故里

本文发表于《中国语文》2002 年 6 期、2003 年 2 期。
本文中的诸图为吴葆勤同志绘制,谨致谢忱。

关于“谈”、“覃”、“寒”、“桓”四韵的平行性问题,我在 1961—1964 年所写的《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文末即有讨论,见本论文集页 97—98,但是那是不正确的。

请见本论文集第二序。

2003.2.21

关于“颜之推谜题”和“黄宗羲定律”请见本论文集跋语。

2003.8.8

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

——兼议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

提要 “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都是传统的方法，如今都应该珍重、继承、发扬。褒此抑彼，或只取其一，都有碍于学术发展。笔者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将“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结合、融会，这是新的“二重证据法”，笔者提倡此法，也运用此法，写成《“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

笔者还提出语言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指出“鬼魅犬马化”和“犬马鬼魅化”都是值得警惕的现象，实事求是是语言研究的基石，是语言学人的灵魂。

一

凡研究必有方法，而且方法往往多种多样。汉语史作为一个有悠久传统的成熟的学科，当然也有其研究方法，方法也必然多种多样，笔者以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特别声明，笔者并无摈弃其他方法之意，任何方法只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行之有效，都是可取的。

先谈“历史文献考证法”。

不仅是研究汉语史，凡是做有关中国的各种学科的历时研究，几乎都要使用“历史文献考证法”，而且无不取得显著成效，这说明“历史文献考证法”是锋利的武器。为什么？当代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

---

* 此文本系拙作《“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的最末一节，兹独立成文发表。本文的基本思想曾在中国语言学会第11次学术年会（2001年11月3日，扬州）宣讲。文中自创术语“犬马—鬼魅法则”，曾向科学技术哲学专家林德宏教授请教，得其首肯。谨向林先生和赐教的多位先生统致谢忱。

说:“中国历史在世界史上有很特殊的地位。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像我们中国这样长,由古至今五千年一脉相承、延绵不绝。其他国家不是这样,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曾经是中心,那些地方的国家却是有古无今。惟有黄河和长江流域孕育的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没有中断过。所以讲历史,只有我们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美国就不行,历史课一年就可以讲得很充分,而且再讲就讲到欧洲去了。”① 我们中国还有一个“惟一”,我们的先人特别重视文化的记录,所以三千多年来历史文献延绵不绝,异常丰富,当代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在世界所有古代语言中,梵语文献的数量仅次于汉语,远远超过希腊语和拉丁语。”② 我国历代学者十分懂得充分利用这笔宝贵的遗产,撰写了大量鸿文巨制,考证大家无代无之,最近即2001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收缪荃孙、孙诒让、章炳麟、王国维等160多家的考证文章,都350万字。可见在中国学术界,考证法也是延绵不绝的。“历史文献考证法”是我们的传统,考证就是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千百年来的考证成果其作用都使我们趋向真理,逼近真理。我们中国学人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传世文献汗牛充栋,而且地不爱宝,出土文献大量涌现,最近轰动国际学术界的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湘西里耶古城的二万枚秦简等等出土古文献也同样是我们研究古代汉语史的极为珍贵的资料。本文所提出的“历史文献”涵盖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二者,这是必须明确的。在论述汉语史的研究方法的时候,我们中国研究汉语史的学人应该扬己之长,理直气壮地将“历史文献考证法”列入,而且置于首位。要研究汉语几千年的历史,如此辉煌、如此丰富的文献,如果我们不高度重视、不充分利用,就难免遭“数典忘祖”之讥。汉语史,其最简洁的定义就是,研究汉语历史的学科,因此汉语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的状况都应该是研究对象,不只是史前时期、原始时期的状况,也不只是为了“重建”原始形式,诚然这些是重要的,但它也只是汉语史研究的部分内容,或者说,内容之一。粗略地说,

① 任继愈《重学史才能强“立志”》,《光明日报》2002年1月29日。
②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页75。

历时研究应该包括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对任何时代语言状态的研究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平等的重视,语言史家不应有所轩轻。而且,汉语史(包括其各个分支学科)上任何一个时段的研究都不能称作整个汉语史(包括其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而研究有文字记录以来的汉语史,无论是什么时期的,当然要首先利用我们中国特多的传世文献和源源而出的出土文献。即令是研究语言的史前史,也不能不依赖古代文献特别是上古文献的支撑。文献,只要不是伪书,给汉语史提供的史料都是确凿的,可信的。[①] 比如《颜氏家训》,这是一本比较文化学的专著,历代学者公认它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它对中国南北朝后期语言、方言的地域特点和社会使用状况的记述,其诚信度是非常高的。《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颜氏家训》的这段话,引用率很高,“南人”、“北人”的“谬失轻微者”数语尤其受到重视,研究者如过江之鲫,这就是文献的“启示”力量。至于“南方”“其辞多鄙俗”,“北方”“其辞多古语”,似乎还没有人就此作出充分的阐述,可能因为中古汉语的词汇研究尚未深入到地域差异的层面的缘故,其实这是高难课题之一。笔者认为“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四句是颜之推对南北朝时期语言情状论述的“重中之重”,南语、北语竟然到了“皆有深弊”的严重地步!至于“谬失轻微者”,那更是“两失甚多”!可见两百多年的战乱和分裂使得3世纪的汉语通语到了6世纪分裂为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朝通语和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朝通语。南朝通语和北朝通语的“深弊”为何?颜之推只肯用“不可具论”四字了之,令人深为遗憾;他虽然也讲了“深弊”之源,可是只有八字:“南染吴越,北杂夷虏。”惜哉语焉不详。因此笔者认为

① 按,伪书如果考得其作伪年代,可以作为该时代的研究资料。

“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四句，这就是颜之推留给我们后人的千古之谜，道道地地的千古之谜！我命名为“颜之推谜题”。[①] 既然历史上有此谜题，我们后人就应该殚精竭虑，以破解这对汉语史和方言史都极有意义的谜题，犹如众多数学家破解历代的数学谜题和数学猜想一样。在推进学术发展的过程中，大哉历史文献的作用！

我们再举一个个案，说明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历史文献考证法”的“微观”作用。江淮官话的东支通泰方言的泰州点“二”、“儿”、“耳”，今音[ɚ]或[ə]，但是据故老相传，本来并非如此，一百多年前念作[zʅ]。是否如此？如是，又如何断代定时？只得求证文献了，李汝珍（清直隶大兴人）《李氏音鉴》：“即如‘儿’字，古皆瓤移切，以近时南北方音辨之，读昂移切，吴音或读娘移切，惟泰州方音读瓤移切，音与古同。”早在李汝珍之前，广大官话方言“儿”“二”等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已经念成[ɚ]，李汝珍以零声母的“昂移切”表示之，他又指出惟独泰州方音特殊，可见其时读[zʅ]。到了怀恕轩主人（清江苏泰州人）《字音集义通考》，却未将“儿”、“二”、“而”等置于“支部”，却独立为“而部”，说明其时它们已经变为[ɚ]或[ə]了。《李氏音鉴》刊印于嘉庆十五年（1810），《字音集义通考》作于同治年间（1862—1874），那么泰州方言[ɚ]或[ə]音的产生当在其间，在这么短的时距内能确定音变的时间，全赖文献为依据。[②] 这是其他方法办不到的。

那么，“历史文献考证法”既然如此有效，我们汉语史学人仅仅掌握这一种方法就行了吗？不行！因为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万能的，都有不足和缺点。一种语言，没有文字，当然就无所谓历史文献，那么要研究这种语言的历史，“历史文献考证法”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这时必须依赖“历史比较法”。有很多语言虽有文字，但是要研究其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即所谓史前史，也要着重采用“历史比较法”。即使在有史时期，文献也不可能将任何时期的语言状况纤微毕现，这

① 详见拙文《“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中国语文》2002年6期、2003年2期。
② 见《通泰方言研究史脞述》，《方言》2001年4期页306—307。

也需要结合使用“历史比较法”。“历史比较法”目的是通过现代语言或方言的比较，证明亲属关系，进而推究原始母语或者母方言的形式。“历史比较法”有其西方学术的背景，是在印欧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滥觞于18世纪，大盛于19世纪，取得重大成绩，这是西方学者对人类语言学史的贡献，这笔宝贵遗产我们也应该珍视、继承、发扬。笔者研读《颜氏家训》，揭明“颜之推谜题”，并企图部分破解此谜题，颜之推明确说“南染吴越 ”，这启发我们运用“历史比较法”，探索现代吴方言、通泰方言、赣方言的共同点，进而研究6世纪南朝通语和吴方言的接触与相互影响，提出了假说。

“历史比较法”作为一种方法，同样也有其缺点、不足，例如法国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语言》说：“不过，从本身的能耐看，比较法有时是无能为力的。比较法假定语言的发展总是有规则的、连续的，没有任何外部的事故。比较法虽然是历史的延伸，却反而轻视历史，因为它只利用理论上的资料，假定出一种简化的历史，把它归结为一系列因果的有规则的衔接，缺乏构成历史的真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人说，这是出于无奈：比较法正是要用语言学的方法重建语言的史前史，不问语言发展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它踩的这块土地是坚实的，因为经验表明语言的传授具有连续的性质。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关于历史发展条件的确切资料，人们从比较法可能得出的有关确定语言亲属关系的结论就会大大减弱。”① 关于“历史比较法”的缺点，《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指出：“对在所有子语言中都无残存表现的母语特征，比较方法是无法揭示出来的。同时，它也很难确定某一特征到底是原始母语的特征，还是在分化后的子语言中独立发生的平行性变化。再有，历史比较方法偏重于语言的前后相继，忽略了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根据这套方法所拟定的原始母语，是一个内部无差别的语言系统。……现在一般看法是，把原始印欧语看做单一性的，规律绝对严格的、内部无分歧的语言，未免理想化。”②我

① 房德里耶斯《语言》，商务印书馆，1992年，338页。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上海，1988）页256。

从另一个角度来补充几句，在中国，如果说，先秦的“雅言”是通语，那么汉语至少有二千多年的通语史，历代通语的状况如何？其基础方言为何？通语移迁的情况又如何？等等，这是不是汉语史的研究内容，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内容？我想没有谁能否认，而要研究上述种种问题，看来“历史比较法”无能为力，还是得靠文献。在汉语史中，通语史这么一个重大的课题却很少有人去研究，例如，先秦和两汉的通语状况如何？南北朝又怎样？南北朝的通语之后，唐代通语是否以长安方言为基础方言？宋代通语如果以汴洛方言为标准，那么怎么后来又出现明清官话？明清官话是以南京音为标准还是以北京音为标准？等等，诚然通语的问题在很多语言中都存在，但是在汉语史上，却显得非常突出和重要，因为汉语有这么长的历史！汉语通语史的重大特点是两千多年来其基础方言的移迁。可是汉语学界对通语史的研究显得十分薄弱，其原因在，一研究的难度特大，二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它处。中国学者应该重视，应该带头，努力研究汉语史的这一重大课题。

徐通锵先生《历史语言学》指出：“历史比较法也有严重的缺点和局限。”“就历史比较法本身来说，所重建的原始形式属于哪一个时代，无法确定。”“语言发展的情况是复杂的，有分化，有统一，也有相互影响，但是历史比较法只适用于语言的分化。”“运用历史比较法所能取得的成果是与材料的丰富性、可靠性成正比例的。”[①] 最后一句话尤为精到，如何搜集材料，甄别材料，读懂材料，并正确运用材料，这是材料的可靠性问题；材料的丰富性即通常所说的“充分占有材料”，鄙见，应该对学人有更高的要求，就是尽可能使用穷尽法。笔者拟就方法和材料的关系试作阐述如下：方法是毛，材料是皮，皮有疤瘢，毛将焉附？材料是否可靠和丰富，这对“历史比较法”的运用者的成败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上面关于材料的观点，也完全同样适用于“历史文献考证法”。可以说，汉语史的任何成功的论著都与材料的精审和全面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我们必须廓清一种说法：“历史文献考证法”是中国古人的陈旧

①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页99—100。

方法，“历史比较法”是从西洋传来的新方法，自然新胜于旧，洋胜于中。其实到了20世纪，历史比较法也已风光不再，20世纪的语言学的显学不是历史比较语言学，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如果说“旧”，历史比较法也是“旧”，但是我们从来都重视历史比较法，我们认为这个方法虽然也已经成为传统，今天仍旧管用，仍旧是好武器，正如“历史文献考证法”今天在人文学科的历时研究中依然大放光彩一样。我们评价一个理论、一个方法，就看实践，也只能看实践，当代中国无人不知的格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我们模仿说：“实践是检验方法的惟一标准。”“历史文献考证法”对研究汉语史确有大效，这是经过千百年实践检验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历史比较法”在近百年来的汉语史的研究中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认为，不可将“历史比较法”和“历史文献考证法”对立；我们主张，最好的办法是将二者结合，相得益彰。某些场合需要使用文献考证法或更依赖文献考证法；有些则需要多利用历史比较法。岳飞说过：“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一位古代的杰出军事家不肯搬用阵图而主张灵活作战，一个现代的有头脑的汉语学者当然也不会依据方法的分类死守某种现成的教条。我们主张“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二者的结合。在中国人文学术史上，王国维1915年的《三代地理小记》提出“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是光辉的典范。[①] 他在殷商古史的研究中所取得的空前成就至今仍有震撼的力量。步武前修，我们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应该将“历史文献考证法”（按，“历史文献”含“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材料”）和“历史比较法”结合起来，甚至“融会”，这是新的“二重证据法”，或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

确实，历史比较语言学兴起时，曾激烈地否定过欧洲的以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语文学”，大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的气势，历史比较语言学家说：“比较研究是语言学家用来建立语言史惟一有效的

① 一般说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1926年出版）中首次提出二重证据法，其实此思想早在1915年就形成。此承周勋初教授赐教。

工具。”[①]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用省察的眼光纵观学术史：大凡一个“新”的学派、学说孕育、诞生之际往往要大嚷大叫，猛烈攻击、批判“旧”的学派、“旧”的学说，视之如寇仇，弃之如敝屣，只有自己才是真理的化身，在学术史上这屡见不鲜，几乎是一个通则，可谓之“欲立先破”或“不破不立”现象。但是经历过一段长时间后，特别在“新”学派、“新”学说已经立稳以后，对对立面的批评就会缓和下来。再过若干年之后，情况又会发生喜剧性的变化。历史是经常揶揄人的：“昨日犹为‘新’，转眼亦成‘旧’。”在往日的“旧”、“新”两派都成了历史的过去的时候，亦即都是“旧”的时候，没有卷入当时辩争，不带什么感情倾向的后代学人自会以冷静的态度细察前代的两派，洞烛其长处和短处，其必然的趋势是，取二者之长，折衷之，调和之，结合之，融会之，这融会体自然能上升到一个更新的层级。本文笔者在《“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论文中，就是力图将“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结合起来，以探究南朝通语受当时吴方言感染的这一历史语言事实。

历史比较语言学大盛于19世纪，20世纪初年已是余波。如今已经进入21世纪，如果我们再效仿19世纪的先辈们的偏执，那就近乎“寿陵余子，学步邯郸”。我们怎能再对“历史文献考证法”有任何轻视和偏见？汉语学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汉语作为人类语言的一种，自然具有语言的共性，也须知，它是一个具体的语言，当然具有民族的特色，从这个角度看，汉语学跟物理学、数学、计算机技术是不一样的。本文开始就说过，汉语有延绵不绝的丰富辉煌的历史文献，中国的汉语史学者，更应该理直气壮地将“历史文献考证法”列为汉语史研究方法的首位，我们绝不排“外”，我们有强健的吞吐能力，我们将“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都视作前人的宝贵遗产，我们坚定地主张将二者调和、结合、整合，运用于具体课题的研究中，产出精品、甚至传世之作，这是汉语历史语言学的必由之路。中国是汉语学的中心，这是绝无疑义的，中国学者跟域外学者，都应尊敬对方，

①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语文出版社，1992年，页11。

珍重自己,彼此交流,相互促进,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所有研究汉语的学者应该具有的学术品德。

我们还想将汉语史研究方法的讨论置于中国文化史的背景之下。只要纵观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就必然会发现:外来的东西,只要是有益的,中国必然会吸纳消化以强健自己、壮大自己;但是外来品,只有与中国的固有传统相结合,亦即必须中国化,才能生根。现在让我们将中国佛教史作为借鉴对象,中古时代,佛教的各种学说纷纷传入中国,中国的佛教徒随之相继开宗立派。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赴外访学者玄奘(600—664),游学印度十七年归国,他创立了慈恩宗,亦称法相宗,或唯识宗,玄奘是一位具有极高学识又极其勤奋的佛学专家,他受到唐太宗、高宗父子的极高礼遇,在僧俗两界都有极高的声望,翻译、传教的条件极好,但是他创立的法相宗却数传即止。其原因是,"在隋唐佛学的各个宗派中,慈恩宗被看作最接近于印度佛学的。"[①]"唯识宗,基本上是玄奘照搬印度的一个佛教宗派。……尽管由于太宗、高宗父子两代的大力支持,由于玄奘、窥基师弟二人的积极努力,唯识宗得以创立,并曾盛极一时,但是,窥基去世之后,唯识宗实际上也就随之而衰微了。在中国佛教史上,它是继三论宗之后的第二个短命的宗派。……这就再一次地清楚地表明了:任何宗教(以及各个宗教的任何教派),不管它们如何把自己高悬于太空之上,而归根结底,它们却始终是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社会的土壤之中的,一旦脱离了这一土壤,它们也就必然地要自身难保了。"[②] 可是岭南樵夫、身为文盲的慧能(638—713),他创立的禅宗却能发展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绵亘千余年,并且泽流东瀛。"翻译佛经,是移植;创立宗派,是改造。唐代宗派佛教的创建过程,也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国僧侣地主阶级对于佛教进行改造的过程,也就是完成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因此,'中国化'程度越高的宗派(例如禅

---

① 《吕澂佛学论著选集》(齐鲁书社,1991 年第一版,1996 年第二次印刷)卷五,页 2716。

② 郭朋《中国佛教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一版,1993 年第二次印刷)页 234—235。

宗),生命力就越强;反之,就将是短命的(例如三论宗、唯识宗)。"[①]"以史为鉴",所以我在学习"历史比较法"、运用"历史比较法"的时候,我认为要将这种西洋的传统方法移植到中国语言学中来,必须与中国的传统方法即"历史文献考证法"相结合,以臻谐振、共鸣的境地。

这就是我的主张,我深深知道,与其托诸空言,不如见之实践,所以我以十七个月的时间,殚精竭虑,写成《"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以就正于学界。

二

既然是讨论方法,笔者以为在汉语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犬马—鬼魅法则"。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韩非子·外储说》云:"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我以为,现代汉语就是"犬马",而汉语史则是"鬼魅"。我的专业是汉语史,我坦率地承认,我的研究对象是"鬼魅",我就是画鬼魅的。而且在汉语史中,越近于近代,"犬马"的成分越高;越是到上古、远古,乃至史前,"鬼魅"的因素越多。我想,只要是懂得汉语的人,都能理解我从二千多年前的典籍中引申出的这一"犬马—鬼魅法则"。我读过不少淮河到浙江地区的考古文章,我看过若干关于春秋时期吴国的历史的论著,读后感是:读毕第一篇,我很相信,因为有道理;读另一篇,又发现,也有它的道理;读完若干篇,觉得篇篇有道理,但是篇篇道理都不能完全服人。其所以篇篇有道理,因为是"鬼魅";其所以篇篇道理都不能完全服人,因为是"鬼魅"。令人不肯信其是,不愿言其非。何以如此?不肯信其是,因为是"鬼魅";不愿言其非,因为是"鬼魅"。我在这里要郑重声明,我绝无取消古代史、远古史、史前史研究的意思,我不是虚无主义者,我自己为了研究古吴国、古吴语的历史,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研读多

① 郭朋《中国佛教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1993年第二次印刷)页234—235。页218。

种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报告。人们为了求真求美，当然需要对上古、远古史作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应该受到鼓励，只是研究者的心里必须有这"犬马—鬼魅"法则垫底，譬如说，我在《"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一文中指出，古"谈韵"、"覃韵"和"寒韵"、"桓韵"在现代吴方言、通泰方言、赣方言中，具有平行性，这是"犬马"，因为在当今好几千万活人的口语中确是如此，"铁证如山"。而据此推论出一千五百年前南朝通语受吴方言的影响，以此半解谜题，这只是假说，这是我在此要特别说明的。虽然正史明载梁齐周隋时确有颜之推其人，传世文献中确有《颜氏家训》其书，且非赝品，但是这"谈"、"覃"和"寒"、"桓"的平行性现象是否就存在于一千多年前的江南江北（包括今苏中东南地区）的上百万人的口语中，"南染吴越"的情况是否真的如此，这是无法验证的，古人不能复生，回溯时空而使古代某一时期的场景和人物对话得以再现，那是科幻小说或者时尚杂志的内容，将过去真实地再现是不可能的，即不可重复的。语言是人说的，古人已死，岂能复活？因此研究古代的语言状况是必要的，但都是假说，正因为如此，时间越古，假说越多，"篇篇都有道理，篇篇道理都不全"，这就是"鬼魅性"。

我还要在此指出，似乎在汉语研究中存在"鬼魅犬马化"现象和"犬马鬼魅化"现象。此话怎讲？有些研究古代特别是研究上古、远古汉语史的论著认为其中的结论就是上古、远古汉语的实际，非此莫是，这可就有点"鬼魅犬马化"的意味。与之相反，据几位诚信度很高的现代汉语专家讲，有些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论著，特别是某些海外的理论著作，洋洋×万言，甚至××万言，可是其中作为证据，甚至赖以为基础的若干汉语例句，却是中国人不说的！名之曰"犬马鬼魅化"，岂不确当？对于当今学坛上的形形色色的学说、论著，我们中国学人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其善者则从之，其不善者则正之。[1]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争鸣是学术繁荣的途径，中国语言学者应该一改长期怯于争鸣、很少争鸣的状况，要敢于参加、踊跃参加国际学坛的

① 朱德熙先生指出"美国语言学有重理论轻事实的弊病"（见《语文研究》2002 年 4 期，页 1—3），这是我们的典范。

争鸣，积极开展批评和反批评，特别在汉语学的领域，因为汉语学的中心在中国。20世纪下半叶初始的十七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是十年荒漠使中国的汉语学研究遭受重创，但是从复苏至今，也已有二十六年了，如今的中国的汉语学已经走在自立和复兴的大道上。在今日，汉语学者约一千人的队伍正在全方位、多层级地对汉语及其历史作深入的研究，已经有很可观的积累了，我们今后应该重视数量，更重视质量，多出精品，甚至传世之作，以奉献给国际汉语学学坛。

我认为，2002年将作为中国汉语学走向完全自立和伟大复兴的标志性的一年而载入史册。

2002年9月中旬定稿

本文发表于《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

本论文集跋语关于“黄宗羲定律”、“颜之推谜题”，“创新”问题及“不崇洋、不排外”二原则的论述，可参看。

2003.8.8

通泰方言研究史脞述*

提要 在学术史上，关于汉语方言研究史的论著寥若晨星。本文将从清初康熙十二年起迄今329年的通泰方言研究的历史勾勒出一个轮廓，分成传统方言学时期和现代方言学时期两个阶段，在20世纪前半叶二者交错。本文夹叙夹议。叙则有漏，议必有谬，敬请方家刊谬补缺。

壹 发端辞

方言，作为语言的地区变体的地域方言，何时产生的？实在难以回答，只得模仿古人的话说道："其来也远，不可得指名其时。"我们中华民族的先贤早就说过："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①]可见古代学人早就觉察到方言差异的存在，在汉语有文字记载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关于方言的记录，无代无之。在公元1世纪初即出现了方言专书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彰彰昭著，彪炳青史。其实其后尚有刘昞的《方言》和王浩的《方言》，惜乎湮没不传。[②]至于经传注疏笔记小说，往往述及当时的方言，虽然零星片断，但是数量不可谓少。从来都是先有学术，而后才有学术史，汉语方言的记录和方言研究，史不绝书，但是称得上方言研究史的文字却很匮乏。看来大概是清代方开方言研究史的先河。在中国悠久的学术史上，清代学者多博综群书、博闻强记，其特点是凭个人的大脑，

---

* 本文初稿承俞扬、石汝杰二先生赐阅，提供了很多观点、资料和修改意见，谨致谢忱。承吴葆勤同志为绘地图，谨表谢意。

① 《颜氏家训·音辞篇》。

② 见拙文《"方言"和〈方言〉》。

极大限度地占有学术资料,他们的学术视野开阔,用时下流行的行话说,他们真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地研究了很多科学问题,任何人只要翻开他们的学术笔记的目录,就会叹服:"何异百科全书?"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其所涉及,包罗经史子集,睿智的火花不断跃现,令人惊眩。《日知录》卷29"方音"条,列举记载方言语音的书证十多条,上自春秋战国,下至南北朝。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卷5也列举古代方音记载若干条,这些读书札记虽然还算不上方言学史,但是可称为汉语方言学史研究的滥觞。

中国第一篇研究方言学史的文章应该是1934年罗常培先生的《中国方音研究小史》,它是由在其前发表的《西洋人研究中国方音的成绩及其缺点》、《明清学者对于方音研究的贡献》、《方音研究之最近的进展》三文汇总而成,罗先生于1954年重订。载于1963年出版的《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易名为《汉语方音研究小史》。此文重点在挖掘、搜集近代中西文献中关于方音的记载,如明张位《问奇集》、清潘耒《类音》、李汝珍《李氏音鉴》、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威妥玛(F. Thomas Wade)《语言自迩集》、柏克尔(E. H. Parker)《翟尔士大字典》等书皆在网罗之列,该文特别叙述了新方言学研究汉语方音的成果。1984年问世的何耿镛先生的《汉语方言研究小史》可称为第一部汉语方言研究通史,不足之处在于简略,但是所叙述的时段从古代直到"文革"后的1983年,所涉及的内容则不限于方音研究史,书中高度评价了扬雄的《方言》,也花了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了清人关于方言词汇的著作。王力先生为该书所写的序说:"方言学的历史是很难写的,因为中国古代关于方言的著作不多。"王先生认为这本书"可以由此窥见汉语方言史发展的轮廓"。许宝华、汤珍珠先生的《略说"五四"以来的汉语方言研究》、王福堂先生的《二十世纪的汉语方言学》可以称作断代的汉语方言学史,叙述了现代方言学的崛起、成长、挫折、复兴,后文尤为详尽。

以上都是关于汉语方言研究史的全面性的通史或断代史性质的论著;而论述某个方言的研究史的文字,就笔者浅闻,似乎更寥若晨星,在下不揣浅陋,拟写一篇这样的文字。如果需要打个比方,罗常培、何耿镛、许宝华、汤珍珠、王福堂五位先生的论著仿佛是史学上的

“通史”或“断代史”、目录学上的“总集”,它们讲的是全局的问题,而个别方言的研究史则是“国别史”、“别集”,它所涉及的是局部问题甚至是细部问题。

若干年前我悟到一个道理:对某一方言而言,其研究的多数成果,还是由说这种母方言的学人做出的。当时我在学校图书馆里翻阅一部从台湾买来的影印的明清手稿的大型丛书,翻到了清代张澍的《秦音》。我以前就知道,张澍是语言文字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发现西夏文的功臣。因为他是甘肃人,所以只有他,才会努力去从古籍中辑录西北地区还存在的方言词汇。后来想想,黄侃的《蕲春语》、杨树达的《长沙方言考》、《长沙方言续考》不都是这样的嘛。何人不爱家乡?既然熟悉、热爱自己的母方言,也就必然带着罕见的热忱去搜集、研讨,以著于竹帛,这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对某一方言来说,研究成果多由本地人做出,这在该方言研究史的早期如此,在小方言尤其如此。再举个例子,客家方言的研究,最初发轫于客家人黄钊、温仲和、杨恭桓等人的著作,后来客家方言逐渐为世人所重,研究的专家就不限于客家人了,如章炳麟、罗常培、董同龢等,[①] 甚至于外国学者如桥本万太郎、沙加尔也都有成本的著作,但是当今研究客家方言饮誉学界的黄雪贞女士就是客家人。

我这篇文章企图给我的母方言——通泰方言的研究史画一个轮廓,主要叙述通泰地区学人记录和研究自己方言的论著。实事求是地说,通泰方言是一个小方言,在最近若干年崭露头角之前,知道它的人很少。通泰方言区的范围并不大,地处运河之东,南临长江,东濒黄海,含泰州、兴化、姜堰、东台、大丰、海安、泰兴、如皋、如东、南通等县市,[②] 约有1000万人口。这个地区西汉时已设县,名曰海陵,其时东部地区尚在海中,后来逐渐成陆。这一地区,长期以来,经济

---

① 《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第146—148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

② 按,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行政区划上,江苏省政府陆续将大量县升格为市,于是有地级市、县级市两种名目。1996年将原扬州市东部的县级泰州市和兴化市、姜堰市、泰兴市、靖江市设置地级泰州市,原县级泰州市为海陵区。2001年又有一些县和县级市变为县级区。对方言学来说,为免视听混淆,一般还是用原称为宜,还是不在地名后直接加“县”或“市”为宜。

上文化上都算不上发达地区，当然比不上江南，也不如西邻扬州，因此在全国声名不显。但是其方言，却颇有学术价值：通泰方言面对吴语，处于广袤的官话方言区的最东南，在整个官话方言区中，通泰方言是最复杂的一支，这该是没有疑义的。

贰　传统方言学时期的通泰方言研究史

通泰方言研究的历史，大概要从清初说起，至今329年。至于明代，甚至宋元，有没有史料，不敢说。就笔者所知，最早记录通泰方言特异语音现象的是康熙年间的安丰人王大经。安丰，当时属泰州，乾隆时析置东台县后属东台。康熙十二年(1673)，王大经主编《淮南中十场志》，所谓“淮南中十场”是指当时泰州所属的濒海的十个盐场，东台场，安丰场，富安场等，都在泰州的东面和东北面，今分属东台、海安等县市。《淮南中十场志》卷一“风俗附方言”说：“至于以‘稻’为‘滔’，以‘豆’为‘偷’，以‘咸’为‘寒’，以‘学’为‘鹤’，以‘地’为‘梯’，以‘丈’为‘昌’之类，则声之转也。”王大经此处是以通泰方言和其他官话方言比较，这一则资料六对例子记录了通泰方言的三个特点：

1. 古全浊声母今音塞音塞擦音上去声字为送气清声母阴平字：“稻”为“滔”，“豆”为“偷”，“地”为“梯”，“丈”为“昌”。这是涵盖整个通泰方言的重大特点。

2. 古外转二等牙喉音字今音声母不变为舌面前塞擦音、擦音，韵母不变为齐齿：“咸”为“寒”，“学”为“鹤”。

3. 寒韵字韵母由ʊ̃变ɛ̃：“咸”为“寒”，今泰州“咸”白读为 xɛ̃；“寒”白读为 xʊ̃，文读为 xɛ̃。以“咸”[xɛ̃]为“寒”[xɛ̃]，表示了古寒韵由[-ʊ̃]变[-ɛ̃]这一项向通语靠拢的音变被王大经记录下来了。

通泰方言区学人所著的第一部研究自己方言的专著是姜日章的《天然穷源字韵》，姜日章，约生于康熙二年(1663)，卒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是当时如皋县北部李堡人，李堡现隶海安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学类存目一”著录《天然穷源字韵》九卷，云：“是编成于康熙丁酉，分日月水火木金土七部。……日月二部为字书，……水火木金四部为韵书，并为天星风山官上地支郊阶州波夫下十四韵，每韵

分为中平上去入五音。土部则古文奇字也。”四库馆臣诋之甚力:“自明以来字书莫陋于《字汇》、《正字通》,而日章遵以讲字画;韵书莫乖于《洪武正韵》,而日章执以分韵等;收字之妄滥无稽莫甚于《篇海》,而日章据以谈奇字。其余偶有援引,不过从此四书采出而已,宜其不合于古义也。”而在《四库全书》之前,乾隆十五年(1750)序刻的《如皋县志》卷二十“艺文志下”则赞誉有加:“其言韵也,统之以天星风山官上地郊阶州波下十有二韵,别之以额喉腮舌牙齿唇七声,中平上去入五声,亦为标射字母等字反切之法,悉本《字汇》而扩充之。济之以言叶,证之以《诗》、《易》二经,限之以六十二韵,区之以日月水火木金土七册,而《天然穷源字韵》之书以成。夫《正字通》之为书也,引据甚详,而字不若此书之备;《字汇》之为书也,标射甚妙,而韵不若此书之全。盖探喉而出,天然中节,无丝毫强勉。其字能该天下之字,其韵能该天下之韵。”看来四库馆臣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针对性很强。如此评价,两个极端,依我愚见,过与不及也。四库馆臣尊清抑明的意识强烈,其贬低姜书的原因还在,《天然穷源字韵》是穷乡僻壤的一个无名文人所著的带有浓重方言色彩的辞书,与正统观念距离颇远。而如皋志的褒辞则显然是同乡人的认同心理的表现。我虽然各打板子,还是认为县志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将上引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如皋县志》所述的韵系的分部(十二韵或十四韵)与今如皋方音作比较,可知此书确实反映了如皋方言的韵母系统。[①] 四库提要著录的为当时两江总督采进本,十四韵,而县志称十二韵,是否又一版本?近年齐鲁书社出版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闻之欣然,即查找《天然穷源字韵》,结果却大失所望:这存目丛书并不全哪!姜书不知天壤间还存在否?

泰兴人何萱(1774—1841)著有《韵史》八十卷,然生前未得刊行,直至1936年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洋装十四本。何萱长期居于如皋石庄,晚年归泰兴。罗常培先生曾撰《泰兴何石闾〈韵史〉稿本跋》,论析精详,但未能道出此书的症结所在,即何著的韵学体系实源于通泰方言的中区即如皋、泰兴方言。何萱批评了传统的三十六字母后说:

① 见拙文《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

"萱之所拟二十一字母曰,见起影晓,短透乃赉,照助耳审,井净我信,谤并命匪未也。"此与今泰兴方音的声母系统相符。罗先生是方言学大家,之所以未能触及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通泰方言在三十年代无甚名声,彼时新方言学刚刚兴起,怎会有泰兴话这一小方言的资料呢?

竹枝词可视作民间文学的一种,它反映了许多民俗民情,也采用了许多方言俚语。难得的是清代泰州人赵瑜(嘉庆至同治间人)的《海陵竹枝词》一百首,其中有五首描写了当时的方言:"五方水土由来异,八属乡音自不同。唯有东台最神似,期期艾艾是家风(自注:东邑系泰州分出)。""眼(自注:叶音俺)睛耳刀鼻(读平声)子嘴(叶音举),字字方言笑杀人,会义谐声都不讲,单余肉韵最清真。""娇儿弱女语牙牙,有客敲门访阿爹。一个答应在(叶音钗)家里,一个摇头回在(叶音采)家。""偶来酒肆欠坛(读上声)酒,更向书坊借部(读上声)书,长将一字代两字,世上省文俱不如。""东路人来买稿子(犹言物件也),南路人邀过瓦家(犹言我处也),忽逢西北乡农到,醒得(犹言知道也)连称笑语哗。"本文所引的第一首竹枝词,"乡音自不同"的"八属",是指清乾隆三十二年以后的扬州府所属的二州六县,即江都、甘泉、仪征、高邮州、兴化、宝应、泰州、东台。[①] 赵瑜所记的"嘴=举",今泰州话,撮口与合口游移不定,读[ᶜtɕy]或[ᶜtsui]。赵瑜还形象地描绘了泰州城里与四乡方言的差异。这五首竹枝词可视作以通俗诗歌为载体的方言史记录。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方音韵书《字音集义通考》,这是一部手稿,题作"怀恕轩主人茂哉氏编订",经我考证,此书大概是清同治年间泰州东北溱潼镇北部的某乡村的文人所著。该书韵分"东真江京云闲干天支朱岐灰须来高嘉州而"共十八部,下册又增入戈部,与泰州方音相符。分析结果,该韵书音系的声母应为十九,亦合于今泰州话。《字音集义通考》反映了一个半世纪以前的泰州方音的很多特点。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著有《〈字音集义通考〉解析》,附于拙文《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之末,兹不赘述。

---

①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第1987—1989页。

南通人孙锦标(1856—1927)著《南通方言疏证》四卷(1913年刊行),是一部传统方言词汇学的专书。此外他还著有《通俗常言疏证》,中华书局2000年6月出版了该书的标点本。孙氏《南通方言疏证》的“例言”述及“标目词”云:“多取古字古义,俾知吾通俗语本于古语者甚多。”可见其宗旨在于溯古,以古文献证今方言,字字皆有来历。兹举数例:卷二“诳祸”:“《集韵》‘诳音窕。’《广雅》‘诳,戏也。’《玉篇》‘诳,弄也。’《史记·吴王濞传》‘使中大夫应高诳胶西王’,今俗所谓诳祸者,当是此字。”卷一“今朝、明朝”:“按,‘今朝’之‘朝’、‘明朝’之‘朝’、‘外后朝’之‘朝’,皆当读若‘昭’,通俗并读若刀,《诗·河广》‘朝’、‘刀’连韵,故‘朝’可转为‘刀’也。且‘今朝’之‘今’多读若‘庚’,‘今’‘庚’亦一音之转,犹‘三更’之‘更’北省多读若‘今’耳。又西北乡之俗语,则以‘今朝’为‘今儿’,‘明朝’为‘明儿’,殊无意义矣。”又卷一“地理鬼”:“《元曲选》马致远《青衫泪》曲有‘地头鬼’语,今俗以熟悉道路及地方之事者,谓之‘地理鬼’。”

泰州人陈启彤(1882—1926),字管侯,著《广新方言》二卷,自序于1911年,至1928年方在北平锓版。该书主要辑录、考证泰州方言俚语,也兼及芜湖方言,因为他曾经在芜湖住过一段时间,这本书是章太炎《新方言》一派的著作。其自序云:“中国员舆广博,地势区分,风尚各异,方言庞杂。甚至同省之人觌面相语,句格不通,感情因以不洽,界限亦用此而分,各各自营,于国事之进行,窒碍实多焉,是皆言语不能统一之故也。”这一段话中最有价值之处在,方言的差异造成种族群体的隔阂,使操不同方言的同族人产生不认同的心理,江苏的苏北人和苏南人即然。陈氏声明,其著书的目的在,“通俗之言,明其出处,乡僻之语,述意加强”。兹举数例于下:卷二“寇”:“扬子《方言》:‘凡物盛多谓之寇。’注:‘今江东有小凫,其多无数,谓之寇。’《说文》:‘寇,暴也。’段注云:‘暴是本部之暴,暴疾之字引申为暴乱也。’由暴乱之意引申之则有甚盛之意。泰州亦属江东旧地,故谓人之有膂力者曰寇。”卷一“蹲”:“《说文》:‘蹲,居也。徂尊切。’泰州谓居处,音读若登;州之乡人则读若神,皆蹲之转也。”可见这也是一部属于传统方言学范畴的著作。

在陈启彤之前,泰州人高尔庚亦从事泰州方言的搜辑、研究工

作,高尔庚是清光绪己亥(1899)岁贡,其书分天、地、人、物四部,未刊行,宣统初年,高尔庚参与编写《续纂泰州志》,将其研究成果编入续州志卷三《方言》中,共 122 条。其从弟高裕瑞(1877—1961),亦研究家乡方言,其著作成于 1927 年左右。两高的成果皆被采入 1930 年的《泰县志》中。值得表彰的是泰州地方文献的搜集者和研究家夏兆麐(1885—1948),字绍侯,著有《泰县方言补》,亦分天、地、人、物四部,收词语 479 条。书前有 1936 年程小可序,书后附《吴陵语录》,收民谚等,其中《乡谈杂述》指出:"吾泰土音去声字呼作阴平者极多","上声字有讹为去声因而呼作阴平者","泰音有当世认为土俗而实与古音合者",所举诸例皆是研究泰州方音史以至通泰方音史的佳证。

南通人徐昂(1877—1953),晚年将其生平著作汇为《徐氏全书》,线装,1944—1953 年间陆续印梓,共十三册,收其著作三十七种。徐昂是一位治学面甚广的国学专家,他关于语言学的著作有《马氏文通刊误》、《声韵学撮要》、《诗经声韵谱》、《说文音释》、《音说》等。《音说》是《徐氏全书》的第十八种,1948 年自序,同年由南通翰墨林书局刊印。兹摘录其"乡音"章数语:"《诗·郑风·遵大路》篇'掺执子之手兮',吾通邑方言携手谓'掺手'。"又云:"尝闻人述吾乡土语云:'他的大侯拿了大钱,走到大圣桥下,买了一本大学。'四个'大'字读音各别:第一'大'字音如'惰',第二'大'字音如'泰'上声,第三'大'字音如'代'(读阳去声,古音泰读阴去声),第四'大'字读普通音。亦一字而有四音也。"

以上这些清代及民初的通泰方言区学人的研究通泰方言的著作都属于传统的语文学的范畴。最近发现了一篇 1936 年的清华大学的毕业论文,葛兆光选编的《学术薪火——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毕业生论文选》(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收有陈昌年《泰州方言正字》,"编者按"云:"陈昌年,男,江苏泰县人,1911 年生,1936 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本论文经杨树达先生批改,评定成绩为 80 分。"清代的泰州至民国时,改称泰县,辖区甚广,相当于 1996 年以后的地级泰州市所属的海陵区、姜堰市和海安县西半部。陈昌年《泰州方言正字》共 95 条,兹举一例,"谖"条:"《新方

言》云:'今保定、真定、河间、天津皆谓大言不可任信曰谖,读去声。'按《汉书·艺文志》班固云:'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师古曰:'谖,诈言也,许远切。'泰州谓诈言亦曰谖,与保定等处相同也。"① 虽然是当时的新学堂——清华大学的毕业论文,《泰州方言正字》还是属于旧方言学的范畴,旨在为现代方言词语寻求古老的文献根据,以古证今。

中国语言学界的这一传统大概延续到四十年代。② 尽管按时间说,中国语言学(含方言学)远在1936年以前即进入现代语言学时期,可是旧学和新学之间的变革不是"一刀切",而是有一个交错的过程。传统方言学作为国学的一部分,三四十年代在大中学校,特别在社会上仍旧有相当大的影响,可能过于新方言学。这类旧方言学的论著,缺点和不足之处甚多,但是在今日仍有其参考价值,它为现代方言学的学人提供了方言词语的古证,不少还是正确的。说实在的,这种溯古的本事,今天很多学人已不太具备,到宋元明白话小说中搜寻些古证还行有余力,至于佶屈聱牙的三代两汉之书,则敬谢不敏,连自己方言的这一类溯古著作都读不懂,断不了句的现象不是没有的。"不薄今人爱古人",传统方言学的论著是遗产,时至学人读古书稀少、读古书能力低下的今日,似乎更要珍视这份遗产,这类书中记录的方言词语和方音现象,有若干已经不存,这就越发显得宝贵。因为我们要作历史比较,不能仅仅依据当代学人所调查所掌握的现代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形式,这些充其量最早也不过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语料,时下有些方言论著的调查对象竟是三四十岁的人!方言也生生不息,其中已经死亡的成分,必然很多,我们怎能知道?怎能进而研究?只得一靠故老相传,二靠故书载记了,例如泰州方言"二"、"儿",今音[ɚ]或[ə],但是泰州地方文献夏兆麐《耐庵丛著》(约著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二集之七《吴陵野纪》"扬人讥泰音"条记录了这几句话:"泰州有个南门,南门有个高桥,高桥底下有个坛子,

---

① 《学术薪火——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毕业生论文选》第223页。

② 其实,在"文革"后还有这类方言词语溯古的著作出版,如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坛子里头有条蛇，蛇有二丈二尺二寸长。”按，在扬州人听来，泰州话“南”、“坛”、“蛇”、“二”的音都很土，其中的三个“二”都音[zɿ]。20世纪上半叶的泰州老年人也说，“耳朵”、“儿子”的“耳”、“儿”在以前确实是说成[zɿ]的。果真如此吗？如果读到李汝珍（清直隶省大兴县人）的《李氏音鉴》（刊印于1810年），就会坚信这一说而无疑了，其“凡例”云：“即如‘儿’字，古皆瓤移切，以近时南北方音辨之，读昂移切，吴音或读娘移切，唯泰州方音读瓤移切，音与古同。”李汝珍之兄汝璜曾任泰州东北的东台县草埝场盐课司大使，[1] 汝珍曾赴草埝场省兄，因此泰州的“儿”音瓤移切，必是李汝珍亲闻，《李氏音鉴》所言不啻铁证！《字音集义通考》的第十八部为“而部”，所收字为“而”、“耳”、“尔”等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这类字不隶“支部”之下却独立成部，可证此时已经变为[ɚ]或[ə]。[2] 如前所云，《字音集义通考》的著者是清同治年间泰州东北部某乡村的文人，此乡村据草埝不远。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定时工作：泰州的[ɚ]或[ə]这一新音位由通语引进、输入的时间在《李氏音鉴》和《字音集义通考》之间，即在清嘉庆十五年（1810）至同治（1862—1874）之间。如此推理，如此断代定时，绝非武断之辞。如果不靠故老相传，这一重要的音变史何从知道？如果不发掘、利用文献资料，单纯靠历史比较法，怎能如此精确断代定时？所以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拥有如此丰富的文献，是手持金饭碗，为何不重视而利用之？

地方文献中记录的以往的方言词语，如今有些已不复存在，例如陈启彤《广新方言》“谓人之有膂力者曰寇”，现在的泰州话无此俗词。徐昂引俗谚云，南通“大”有四音，其中“大钱”之“大”音“泰”上声，我为此特地查了《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中的“南通音系”、“南通同音字表”，这位置无字。[3] 要搜寻方言的古代资料，很是艰难，因为这些材料太少太散，这就需要我们方言学人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有爬罗剔抉资料的技能。除了上述的溯古的方言词语的著作外，其他笔

---

① 东台县逾北境有草堰镇，今属大丰县。大丰县系解放后割原东台县北部、兴化县东北部新建之县。

② 《アジア·アフリカ語の計數研究》第30号（1988），第216页。

③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第1982页。

记小说以至竹枝词等也应在搜罗之列，比如赵瑜（清嘉庆至同治间人）的《海陵竹枝词》第九十六首："娇儿弱女语牙牙，有客敲门访阿爹。一个答应在（按，原注：叶音钗）家里，一个摇头回在（叶音采）家。"[①] 于此可见，在19世纪前半叶的泰州话里，动词"在"的肯定形式为，声调不变，tsʻe阴平（"在"，古全浊从母上声字，在泰州话里依规律变为送气清音声母阴平字）；否定形式不前加副词"不"，而只是动词的声调变化，tsʻe上声。这是十分有价值的方言史记录，但是在今日泰州话中，后者形式已经不存。赵瑜《海陵竹枝词》第九十七首："偶来酒肆欠坛（读上声）酒，更向书坊借部（读上声）书，长将一字代两字，世上省文俱不如。"[②] 此首说明赵瑜时的泰州话，"数词'一'+量词"的结构，可以省略"一"，但是量词必须变为上声。今泰州话"一个人一个"可说成"个人个[ᶜkɤɯ꜀ zəŋ ᶜkɤɯ]"，也只是老人和文化低的人这样说，但是"欠坛（读上声）酒"、"借部（读上声）书"的说法是没有的。[③]

我想，如果各方言的专家将自己方言的溯古著作所收录的方言词语作一有目的的统计，不无意义。例如《南通方言疏证》记载了近千个词语，《广新方言》记载了上百个泰州话词语，现在的南通、泰州学人不妨统计一下，哪些词语还保存，哪些词语已消亡，哪些词语在音义形上有变化，研究、统计的结果不仅对作历史比较起作用，而且这种在多长时间内消亡比率的统计也许有普通语言学的意义，可深化语言变异的研究。

叁　现代方言学时期的通泰方言研究史

20世纪初年是西学东渐的关键性的时期，表现在方言学领域，则是20世纪二十年代现代方言学的建立。三位亲至西方觅求语言

---

① 《江苏竹枝词集》第268页。

② 同上。

③ 此段观点和例子皆俞扬同志提供。海安人王韫佳同志阅拙文后指出："您在研究《海陵竹枝词》时注意到19世纪前半叶泰州话里用上声变调的屈折手段表达语法意义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我所了解的海安话中也存在，在'一+量词'的结构省略'一'的情况下普遍存在（不论是哪一个量词，我父亲至今还时有流露）。表完成的副词'曾'的否定式也是声调变上，但不用'不'。"

科学的先贤的名字应该铭刻在中国现代方言学史上,他们是赵元任、林语堂、刘复,他们都对新方言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其中以赵元任之功最大。他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在1928年出版,标志着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建立。

在20世纪前半期,通泰方言区出了很多语言学家,而且有大家多位,如董同龢、周法高二先生,然而他们的论著中似乎没有对母方言研究的文字。但是魏建功先生对通泰方言的研究有其不可泯没的贡献。魏建功先生(1901—1980),海安县西场镇人(民国时西场镇属如皋县李堡区),少年时在南通求学,师从孙锦标、徐昂,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师从钱玄同、刘复,他是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和兴盛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专家之一,他是杰出的音韵学家、语文运动的积极活动家。他的名著《古音系研究》多次提到如皋方言、南通方言。去年我读了魏先生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若干论文,他经常引证如皋、南通方言,精妙之处甚多,也对方言作出分区,多次指出这一地区方言的特点。魏先生所引用、所讨论的若干方言现象是研究通泰方言史的上乘资料,兹举一例:古麻韵三等章组字喻四母字,今泰州音韵母白读a,文读为e,有些字兼具二音。一些很文的字只读e,如文言虚字"者"、"也",我推测它们韵母原本读a,但是"者"字即使泰州老知识分子也决不念[tsa],要证实这个推想,只能从空间上寻找支持性的例证。我在《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中说道:"1961年5月,泰州耆老年近古稀的仲一侯先生告诉笔者:'在泰州东乡里,读书人念"南冥者,天池也"(《庄子》)这类句中的"者、也"时,是读成tsa、ia的,这是我三十几年前在曲塘亲耳所闻。最近问姜堰人曹伯丹老先生,也是如此说法。'"① 魏建功先生《与人论方音的由来》云:"'这',皋音实为'者'之旧作'乍',tza。"② 魏先生的所谓"皋音",我们假定就是其家乡西场镇音。那么文言虚字"者"字的韵母,泰州绝对念e,而20世纪初,泰州之东均读作a。泰州—姜堰—曲塘—西场,由西往东,泰州距姜堰约25公里路程,姜堰距曲塘约17公里路

① 《アジア·アフリカ語の計數研究》第30号(1988),第161页。
② 载《语丝》五卷八期,1929年4月29日。

程，曲塘距西场约 37 公里路程。[1] 于此可印证赵元任先生的名言："从地理上横断面一看，就看出有好些相当于历史上纵断面的变化出来。"[2] 我们通过这一典型事例，可以看到，通泰方言东存古而西趋新的倾斜式的坡性特点。

当今研究如皋、泰兴、南通方言的学者可否将魏著中的方言资料做一次穷尽式的辑录，并与今日方言作一纵向对比？借此可窥百年方言史。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郝懿行《尔雅义疏》，他们都经常引用当时的方言作例证，段玉裁除了引证其母方言吴语以外，甚至言及京师语、四川话。令人惋惜的是，研究方言的学人，并不太重视利用这类宝贵史料。[3]

近几十年来，对通泰方言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推 1960 年出版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为首，此书是 20 世纪五十年代汉语方言普查的突出成果。此书将江苏和上海方言分为四区，其中的第三区即我命名的通泰方言区，亦即八十年代《中国语言地图集》所说的泰如片，此书对通泰方言的辖区尤其是特点作了详尽的描述，可称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从此方言学人都知道这一事实：在大官话方言区中的最东南有这么一个最复杂的"第三区"的存在，可以说，是《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把通泰方言推向了国内外语言学界。隔了近四十年，同样是"总集"性质的《江苏省志·方言志》于 1998 年出版，这是 20 世纪江苏方言研究的最后总结，其中当然包含了通泰方言。同年问世的《江苏方言总汇》，语音部分水平参差不齐，所搜集的俚语、黑话较为丰富。

俞扬在学生时代即发表了《泰州话里的文白异读》(1961)，它是通泰方言研究史的重要文章，该文详尽地叙述了泰州方音文白异读的类型，而文白异读涉及泰州方言以至通泰方言的很多项语音特点，

---

① 据《中国城乡交通旅游图册》，哈尔滨地图出版社，1999 年；《江苏省地图册》，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7 年。

② 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130 页。

③ 日本学者古田惠著有《〈説文通訓定聲〉の蘇州語の語匯》(自印本，1954)。又，古田惠、石汝杰、森贺一惠《〈说文通训定声〉中苏州方言词语汇释》，《均社论丛》17 号(京都，1991)。此系石汝杰先生提供。

可谓若网在纲。

我读研究生期间，在袁家骅、魏建功二先生的影响下，热衷于家乡方言的调查研究，从1961年5月起，整三年内，写了六稿，成《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十万余字。我将《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中的第三区命名为通泰方言区，这一地区在汉代本为一行政区，即海陵县，南朝时期人口大增，此后陆续析置新县，陆地亦向海延伸。如今这一方言区，泰州和南通是东西两个端点，南通方言保存的古音最多，泰州方言则受民族共同语的影响较重，以"通"、"泰"二字概括，是为得之。此文从方言史的视角描述方音的各种现象，勾稽了大量故书载记的文献资料，努力搜集了许许多多故老相传的鲜活的语料；立足于泰州方音史，而所作的历史比较则涵盖了整个通泰方言；既在方法上有创新，也作了理论上的概括。该文最后提出了两个假说："吴方言本北抵淮河说"，"通泰、客、赣方言同源论"。这是一篇颇具原始创新性的论文。但是所引用的考古学资料是五十年代后期的成果，后来就显得陈旧了。1964年5月文成之日，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即之时，只得束之高阁。

1966年丁邦新先生在台湾发表了《如皋方言的音韵》，使用音位学方法对如皋方音作了全面的描写，强调如皋方言和吴方言的密切关系，这是通泰方言研究史上很重要的一篇名文。

大陆的"文革"使学术研究包括方言研究中断。八十年代学术复苏，但是我的方言论文《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因过长，仍然无法在国内发表。1986年9月我赴美出席国际汉藏语学会，得与桥本万太郎先生交流学术，应桥本先生之约，1987年我将拙文誊抄，并加上当时对南大学生胡立群（他讲一口道地的泰州话）的调查记录，最后得岩田礼和中岛干起二先生之助，终于在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アジア·アフリカ語の計數研究》第30号（1988）发表。可是国内学者很少能见到，我的论文集不久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此文，那就获得一个向国内学人求教的机会。

1990年秋至1991年春我在日本访学作学术演讲时，明确提出了北朝通语、南朝通语说，认为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归国后即写

了一篇《客家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正式形诸文字，刊在《中国客家民系研究》(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 年 8 月出版)中，1994 年编自选集时更名为《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较之六十年代的“通泰、赣、客方言同源论”，此文前进之处在：第一、在学术史上是该文首次提出了南朝通语和北朝通语说，4 世纪起的北人大规模南徙导致了黄河流域的汉语北方方言伸展至江淮地区即原吴语区，历二百余年，至南北朝后期形成了以洛阳话为标准的北朝通语和以建康话为标准的南朝通语，通泰方言是南朝通语在原地的嫡系后裔；第二，该文还指出通泰、徽、赣、客四方言形成了对古老的吴方言、闽方言的包围态势，“正如地质学家的板块构造学说可以从非洲与南美洲海岸曲线的吻合得到印证一样，这个包围圈看来不是偶然的，这四个方言‘板块’正是 4 世纪北方方言南下进逼吴、闽方言的结果”。①

对我的关于通泰方言古史的假说，谢留文先生持不同意见。②我提出了现代方言的两项资料作为这一假说的支持点：第一、《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指出，第三区(按，即通泰方言)跟吴方言明显对立的一个特点是，阳入调值比阴入高，我扩而广之，客方言的梅县、华阳凉水井，赣方言的临川等点亦然；第二、古全浊声纽，在今通泰、客、赣三方言中，逢塞音、塞擦音，一律清音送气。谢先生判定第一项“不足为凭”，但是未作任何申说。他认为第二项“主要是类型学上的问题，也就是说，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塞擦音，在通泰方言中的演变情况与客赣方言一致，只是演变类型相似，说明不了它们之间有同源关系”。兹就谢先生的这一申说阐发如下：类型上的一致确实不等于发生学上的同源，但是类型上的一致也不是不可能是，也许更是，发生学上的同源所致。同源的语言(含方言)确是有在若干语言格式上类型不一致的情况，但是在较多的语言格式上却存在类型上的一致。一致的类型如果作散点式的分布而被视作同源，自令人生疑；可是通泰、徽、赣、客方言一致的类型却构成“板块”式的包围态势。最近李如龙、辛世彪先生的《晋南、关中的“全浊送气”与唐宋西北方音》

① 《鲁国尧自选集》第 76—77 页。

② 见《方言》1999 年 3 期第 167 页。

的论断是:"现今南北方言中的'全浊送气'的特点都应该说是有源流关系的。"① 此文只凭一项类型上的一致即导出同源的结论。但是关于"源"点的观点,我的看法与他们相左。② 谢先生说:"历史上人口迁徙与语言、方言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即使是一个客家先民迁徙的问题,……几十年来也未必就能说已经完全搞清楚了。讨论方言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观察语言现象,用语言事实来讲话。"研究语言,当然要用语言事实来讲话,我在六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的文章中都提出了两项语言事实。研究语言,同时充分利用文献考证,吸收历史学的成果,形成合力,岂不美哉!一些历史问题讨论了几十年,也形不成共识,这在学术史上是常事,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下更大的功夫去钻研呢?我仍然认为,"永嘉之乱"这一段历史尤其值得花力气研究,因为它对中华民族的融合至关重要,它也促成了汉族历史上最大的也最有影响的一次种族迁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现代方言绝大多数是从南北朝的音演变下来的。"③ 这话的周延性也许可以讨论,但至少江淮方言导源于此时,绝无疑义。④ 更重要的是,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前辈学者的治学途径:对历史学和语言研究的密切关系十分看重。谢先生说:"南北朝后期是否存在南朝通语,现在还提不出十分有力的证据。"确是如此,完全同意。南朝通语和北朝通语说只是假说而已,假说,假说,其前景极有可能被证明是假的说法。但是科学的进步还是欢迎提出假说的,有趣的是,邵荣芬、丁邦新先生跟我差不多时间不约而同地提出类似的假说。邵先生《经典释文音系》:"《切韵》音系是以洛阳话为基础的音系,南北朝时期洛阳音系是北方地区的标准语音系。陆氏音系是以金陵话为基础的音系,南北朝时期金陵音系是南方地区的标准语音系。这种两个标准语音系南北对峙的局面是当时的和历史

---

① 《中国语文》1999年3期,第302页。

② 见旧作《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最近我为顾黔《通泰方言音韵研究》写的序文作了进一步的申说。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176页。

④ 我再重申旧说:公元4世纪汉语北方方言南下江淮,江淮方言即导源于此。这支南下的北方方言的后裔是今江淮官话,而绝非现代吴方言。

的政治、文化因素造成的。虽然隋统一以后金陵话作为标准语之一的地位逐渐衰落,但在南北朝时期它跟洛阳话差不多具有对等的权威。"[①] 丁先生《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我认为我们应该拟测两种切韵音系,一种代表北方的邺下方言,另一代表南方的金陵方言。""把切韵音系分成邺下切韵和金陵切韵两大方言来拟测。"[②]看来只是我的提法即两个"通语"说比两个"音系"说显豁些罢了。我现时还不打算放弃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这一假说。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通泰方言的调查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汪如东写成《海安方言调查报告》(硕士论文,1989),俞扬的《泰州方言同音字汇》(1991),顾黔的《泰兴方言同音字汇》(1990)、《泰兴方言本字考》(1990)、《通泰方言韵母研究——共时分布及历史溯源》(1997)等文先后发表。2001 年顾黔在其以前诸文的基础上写成专著《通泰方言音韵研究》,即将出版,此书既对通泰方言语音作了全面的共时描写,也作了历史比较。《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对苏沪的方言分出个第三区以后四十年,顾书进一步对这第三区作了下位的分区。谈到分区,我以为,如果借用句法学的层次分析法来说,应该是首先析出南通方言,然后再将其余分为两部分,最后得出的结果是东区、中区、西区。顾书中 1900 个字的十个方言点的对照表也为学界研究通泰方言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汉语现代方言学的传统做法是,涉及某一县的方言时,一般以城关镇为代表点,因此无论是《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省志·方言志》,还是《通泰方言音韵研究》所列通泰诸点的声母表,都是根据城关话,因此齿音只有 ts、ts'、s 一套,这是无可非议的。顾黔对中区如东、如皋、泰兴的农村作了密集的调查,发现在很多乡、村,除了 ts、ts'、s 外,还有 tʂ、tʂ'、ʂ 一套,真是应了一句古话,"礼失而求诸野"。这样,她在"早期通泰方言声母系统"的构拟中就列出了 ts、ts'、s、z 与 tʂ、tʂ'、ʂ、ʐ 两套,这做法也是正确的。我想,如果能进一步寻觅到通

① 《经典释文音系》(台北学海出版社,1995 年)253 页。该书前载邵先生 1991 年 5 月写的序,同样明确地表述了上述观点。

② 《中国语文》1995 年 6 期,416、418 页。丁先生的这一假说始于 1992 年 6 月,见 414 页脚注。

泰地区存在 tʂ、tʂʻ、ʂ、ʐ 的有关的文献史料，那么我们就可以作断代工作，推求这一套卷舌声母在城区存在和消失的时间，当然这一工作难度很大。

肆　续语和结语

纵观 329 年通泰方言的研究史，其成功之处在于，其不足之处也在于，重于语音和词汇的研究。在传统方言学时期，方言研究基本上就是音韵和溯古式的词语研究二项；到了 20 世纪，由于在很长时间内整个现代方言学研究的主流在方音，其次是词汇，通泰方言自不能例外。

但是通泰方言语法的研究在 20 世纪中期即已经开始，李人鉴先生的《泰兴方言中动词的后附成分》(1957)、《泰兴方言中的拿字句》(1962)可谓嚆矢，说明语法研究的起步不比其他方言晚。俞扬《泰州话名词后缀“儿”和“子”的语法特点》(1986)、《泰州方言的两种述补组合》(1991)于绍继中出新加密。不过，在通泰方言研究的诸领域中，语法还是薄弱的一环，研究者至今人数稀少。这颇滞后于学术潮流，因为近二十年方言语法的研究呈蓬勃发展的势头。这也说明方言研究分工太细，本区的方言学人成为多面手的不是太多。

在通泰方言的研究中，古史的追寻工作做得好一些。研究方言的历史，自然要重视调查研究活方言的材料，搜集得越多，对作历史比较研究越有利。但是仅凭自己掌握的第一手和第二手的材料，未免不够。现在有些方言描写的论著是为功利目的而赶出来的急就章，其材料的“诚信”度可疑；而且如今用现代方言学方法记录下来的语料，充其量早不过上世纪初。历史比较法是西方语言学的宝贵遗产，我们当然要接受，但是其局限性也不可讳言，比如说吧，用历史比较法求出的古代语言形式，难以断代，至少是难以精确断代。我们汉语有历时悠长而十分丰富的历史文献，这是我们中国学者的优势，这是我们的长处，我们应当扬己之长，十分重视文献的解读、研究。我以为，要进一步研究通泰方言的历史，就应该更详尽地调查，特别是抓紧向本地区的“故老”调查方言，更认真地研究邻近方言，特别是吴方言和江淮方言的“洪巢片”，我们特别提倡尽可能地发掘、利用乡邦

文献资源，与历史比较法相结合，如此可收相得益彰之效。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通泰方言三区的既有研究状况。在新方言学时期，通泰方言西区的成果略多些，除了俞扬和鲁国尧的论文外，值得推荐的是张建民主编的《泰县方言志》(1991)、张丙钊的《兴化方言志》(1995)，这是通泰方言区迄今仅有的两本方言志，方言志当然是对该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全面的描写，这二书有一鲜明的特色，即重视自己的方言和吴方言的对比，尤其是《兴化方言志》，列了三个专节："兴化方言和吴方言语音关系"、"兴化方言中的吴语词"、"和吴方言相似的一些语法现象"。

关于中区的研究，首先是丁邦新的《如皋方言的音韵》，九十年代顾黔的关于泰兴话的论著有继续之功。最近有一篇论文很值得推许，这就是王韫佳的《海安话轻声与非轻声关系初探》，将现代实验语音学的高科技手段引进方言的研究中，这在通泰方言研究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今后的研究方向之一。还应称道的是，该文"在对海安话轻声的特点及其连调形式的讨论中主要以北京话和上海话作背景进行对比，……更重要的是因为海安话与北京话同属北方官话，而在地理上又与吴语更为接近"。[①]

通泰方言东区即南通方言，魏建功先生1925年发表的《吴歌声韵类》，论江苏方言区划时就指出："南通系：这一所地方的语音甚为特别，既不与其东南方面苏松太系相同，又不与其西北镇扬系相同。"[②] 但是这个在通泰方言中甚至在整个官话方言中最具特色的方言，研究得不够充分，至少是公开发表、出版的有分量的成果不多：虽然早在1921年就有易作霖著《南通语音字母说明书》，[③] 用现代方言学方法描写南通方言的一般资料，也可以在"总集"性质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省志·方言志》中找到，另，《普通话基础

---

① 《方言》1998年3期216页。

②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年第1期。

③ 易作霖尚有三种论著：《国音学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国语文法四讲》，中华书局，1924年；《声论》文，1921年。《中国语文》1998年4期高更生先生著文表彰其《国语文法四讲》。易作霖大概是新派人物，高更生先生曾托我找南通师院易国杰、周远富同志了解其生平仕履，他们多方设法而无结果。

方言基本词汇集》内有卢今元“南通方言音系”。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状况将有改变，著名语言学家王均、鲍明炜二位先生主编的《南通地区方言研究》可望于明年出版。王均先生是地道的南通老人，侗台语专家，《普通语音学纲要》的执笔者，鲍明炜先生是《江苏省志·方言志》的主编，其他若干南通当地的方言学者参与合作。据悉，此书涵盖的范围，除了属于吴语的海门、启东的方音外，南通、如东、如皋、海安皆属于通泰方言。此书的出版必将使通泰方言的研究前进一步，方言学界引领以望焉。我总是想，论学术价值，南通方言在江淮官话中的地位似可相当于温州方言在吴方言中的地位，但是温州方言有许多位方言学家写了不少专论，我们相信，南通方言的专论今后也会不断面世的。

本文主要是记叙通泰方言区的语言学人对自己母方言的329年的研究历程，取材多源自学人的论著。而地方志中也有不少方言资料，老州县在清代和民国时期都有地方志，而且不止一部，有些方志将“方言”独立成章，有的附于“风俗”章内。新县（指解放前后设置的海安、如东、大丰）和所有老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都编了新的地方志，其中必有“方言”一章，只是过于简略，但有些是精心之作，如《泰州志》中的方言志。上世纪五十年代也编了若干本《某某（地名）人学习普通话手册》，虽是通俗读物，但是也有参考价值。

本文开头就说，通泰方言是一个小方言，知名度不高，因而在以往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有本方言区的文士研究它。可是它具有特色，也受到外方有识之士的注意。兹举三例于下：

一、李汝珍（清直隶大兴人，约1763—1830前）《李氏音鉴》（刊于1810年）“凡例”：“即如‘儿’字，……，唯泰州方音读瓤移切，音与古同。”此段记述具有高度学术价值，本文前已阐述，不赘。

二、胡垣（清江苏江浦人，1840？—1904？）《古今中外音韵通例》（1888年刊）“方言”：“扬州东乡读‘豆’为‘透’，‘病’为‘聘’。”胡垣所说的“扬州东乡”即泰州，他所指出的方言现象是古全浊塞音声母今变为送气清声母，这正是泰州以至整个通泰方言的重大特点。

三、劳乃宣（浙江桐乡人，1843—1921）《等韵一得》（1898印行）

"外篇":"戛类浊母,北音于平声,皆读透类之浊,上去入则仍读戛类。而江西、皖南有数处及江苏之泰州、如皋诸处则上去入亦读透类。"在通泰、徽、赣三方言中,古全浊声母今音逢塞音塞擦音无论平仄一律送气的现象,一百多年前的语文学者早就观察到了,并且作了记载,这不能不令我们由衷敬佩,古人之书是不可不读的。

我在前头说过,当一个方言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后,非本方言区的学者也就被吸引来作研究了,这是通则,通泰方言何能例外?兹举二例。台湾学者张光宇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大陆语言学杂志上发表的多篇论文及专著《闽客方言史稿》(1996),在讨论吴、湘、闽、客等方言的历史关系时,几乎都论及通泰方言。美国学者史皓元(R. V. Simmons)在《方言》1998 年 2 期发表了《南通话、杭州话跟吴方言的比较》。最近史皓元与中国学人合作调查、研究江淮方言与吴方言边界地区的状况,自然也包括通泰方言的南缘。

总而言之,通泰方言的研究已历 329 年,在清初康熙年间竟然有穷乡老儒著《天然穷源字韵》,到乾隆年间,被两江总督采进呈交四库馆,因它的方言性质颇强,而为馆臣所摒弃,以至湮没不传,殊为可惜。[①] 此后代有论著,不绝如缕。至现代方言学时期,尤其近四十年,关于通泰方言的论著,数渐加多,质亦提高,但是比起那些声名籍甚的方言如吴、粤、闽方言来,其研究成果,弗如远甚。其实通泰方言是个"富矿",在整个大官话方言中是最富有特色的方言,深厚的学术资源有待开采。我以为方言的深透研究,特别是方言的细致调查描写,更需要本方言区学人的努力。调查描写方言的,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非以该方言为母方言的专家,他们的优点是,没有先入之见,往往以他们自己的母方言为参照系作比较,能发现当地人难以发现的问题。但是其缺点在,到了深入细致的阶段,则难以为继,即使再努力,也只能得其形似,而难悉其神韵。第二种人是以该方言为母方言的人,但在外地工作。论调查,到了描写研究的深入层面,自较第

---

① 这位四库馆臣不知是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的初稿撰稿人也许是戴震,但是总纂官纪昀,可不像如今众多的挂名主编,他是要大加删改的,可参见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一种人为强，可是鱼儿离水，很多很“土”的、快消亡的、刚新生的方言因素，靠偶尔回乡调查是很难捕捉到的。比较理想的是第三种人，即具有较高语言学修养的在当地工作的当地人研究当地方言，朝朝夕夕浸淫其中，细微末节皆能尽收耳底。当然有可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我盼望通泰方言区每县都至少有一位高水平的方言学家，那通泰方言的研究可臻繁荣之境。也许这是奢望，不过，经济发展、文化发达之后，不是没有可能的。我要声明，绝无排外的意识，欢迎外地、外国专家开发这一宝贵的“富矿”，尤其在跨方言研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综合研究、利用科技手段的研究等方面，也许外地学者更能取得丰硕的成果。我想，使通泰方言的研究跃上一个新的层面，这是无论本地还是外方的方言学者的共同愿望，十分需要大家的合力。

如今学术界，有人为名利驱使，大至抄袭做假，小至粗制滥造，令人痛心。看看我们自身所处的语言学界，若论主要以古文献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可以说，作者读过的书绝大多数读者也能读到，可以检核，可以辨析；而方言调查则不然，其调查报告，特别是偏僻地点的资料，人们很难去重作调查以检验之。因此在此文最后，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我诚恳地希望使用现代方言学方法得出的通泰方言语料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这就需要研究通泰方言的学人怀着无可挑剔的“诚信”，从事调查、整理、研究，为学术而学术，不要为功利而学术。

笔者不自量力，在此为通泰方言史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肯定是挂一漏万，而所议论，更是谬误多多，敬请方家指正、批评。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 陈昌年．泰州方言正字[A]．葛兆光．学术薪火——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毕业生论文选[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217—231.

[2] 陈启彤．广新方言[M]．北平．1928.

[3] 丁邦新．如皋方言的音韵[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6．36下．573—6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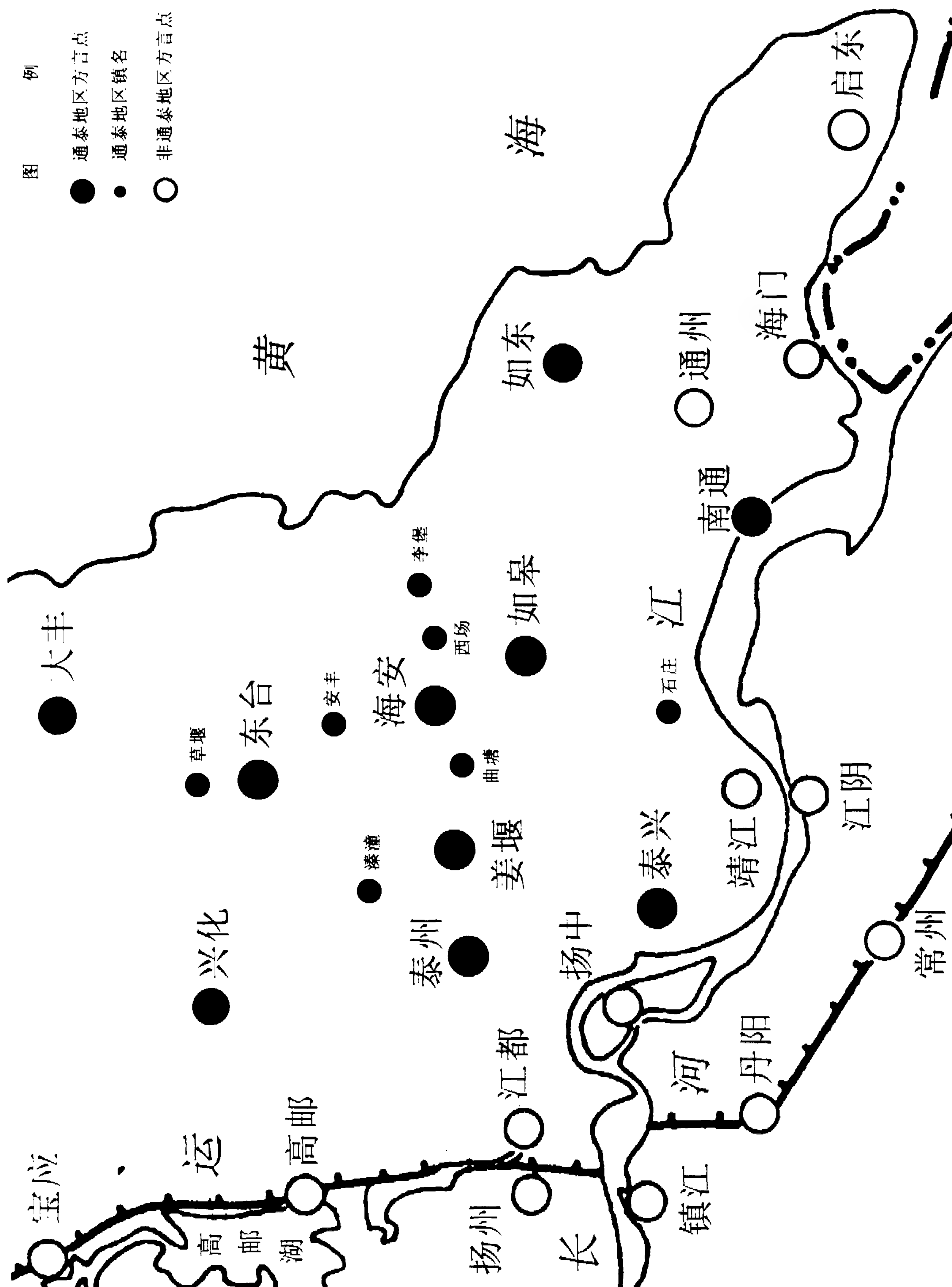
[4] 顾黔．通泰方言音韵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 何耿镛．汉语方言研究小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4.

[6] 江苏省公安厅《江苏方言总汇》编写委员会.江苏方言总汇[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7]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8] 卢今元.南通音系[A].陈章太,李行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C].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1977—2000.
[9] 鲁国尧.鲁国尧自选集[C].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
[10] 鲁国尧.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J].アジア·アフリカ語の計數研究.1988,(30):149—224.
[11] 罗常培.汉语方音研究小史[A].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C].北京:中华书局.1963.142—156.
[12] 邱权政.中国客家民系研究[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
[13] 孙锦标.南通方言疏证[M].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13.
[14] 王福堂.二十世纪的汉语方言学[A].刘坚.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07—536.
[15] 王韫佳.海安话轻声与非轻声关系初探[J].方言.1998,(3):211—217.
[16] 魏建功.魏建功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17] 徐昂.徐氏全书[M].南通:翰墨林书局、韬奋印刷厂.1944—1953.
[18] 许宝华、汤珍珠.略说"五四"以来的汉语方言研究[A].吴文祺: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87—406.
[19] 俞扬.泰州话里的文白异读[J].中国语文.1961,(5):41—43.
[20] 张光宇.闽客方言史稿[M].台北:南天书局.1996.
[21] 赵明、薛维源、孙珩.江苏竹枝词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2001.7.23 毕工,时气温摄氏 38 度

原载《方言》2001 年 4 期页 301—314。


图例
通泰地区方言点
通泰地区镇名
非通泰地区方言点
黄
海
启东
海门
通州
如东
南通
江
如皋
李堡
西场
海安
安丰
大丰
东台
草堰
曲塘
石庄
姜堰
溱潼
泰兴
靖江
江阴
兴化
泰州
扬中
常州
丹阳
河
江都
高邮
运
宝应
高邮湖
扬州
长
镇江

《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

提要　钱大昕云:“元人说部,莫善于《南村辍耕录》。”该书记载了很多吴方言的语音和词汇现象,本文作穷尽式的辑录与研究。从历史、助纽字系统、现代松江音等方面论证“射字法”条反映了元代松江音。汇辑了《辍耕录》中涉及吴方言的四十余条,寻溯其文献渊源,对其中的近六十条吴方言词语,援引宋元明清典籍加以疏证,又查阅多种近代吴方言区地方志及现代方言志,向二十多位吴方言区人士作了调查,宗旨在从语言史的角度观察这些元代吴方言词语的变化与发展。

一

陶宗仪是元明之际的著名学者,著述颇丰,《说郛》、《南村辍耕录》、《书史会要》、《南村诗集》等皆著称于世,尤以《南村辍耕录》对后世影响最大。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云:“元人说部,莫善于《南村辍耕录》。”今人张元济《涵芬楼影印元刊本南村辍耕录跋》说:“四库提要称其详于有元法令制度,考订书画文艺,足备参证。且不止此,戏剧之学至元极盛,是书于院本、杂剧、曲名、歌调考订极详。他如园林、建筑、书画、褾轴、制墨、斲琴、窯器、髹漆,无一不罗而列之,其有裨于时人之研习艺术者非浅。”全书三十卷,二十三万余字,涉及面之广诚如张说,但还可增加若干项目,“方言”即其一,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记录了元代吴方言的重要的语音现象和大量词语,对此本文作穷尽式的爬罗、搜辑,并根据宋元明清文献、吴方言区近代地方志、现代方言志和笔者近年对若干吴方言人士的调查结果作仔细的研究,探讨其变化发展。

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居士,(浙江)黄岩人。父陶煜,仕元为小官,母赵德真,“故宋宗室孟本女也”(据郑元祐《侨吴集·白云漫士陶

君墓碣》)。其友孙作《沧螺集·陶先生小传》称赵雍为其舅氏,《辍耕录》卷十七"崔丽人"条,陶氏亦自称赵雍为舅氏,赵雍之父乃元代著名诗人、书画家赵孟頫。孙作《南村辍耕录·叙》云,宗仪"少工举子业,晚乃弃去,阖户著书",邵亨贞《南村辍耕录·疏》称之为"南村田叟"。《辍耕录》卷十九"钱武肃铁券"条:"吾乡钱叔琛……尝出示所藏铁券。……时余就录券词一通,叔琛又出武肃当日谢表稿并录之。昨晚检阅经笥,偶得于故纸中,转首已三十余年矣。"其时当已是半百之人。《明史》本传云:"洪武二十九年率诸生赴礼部试,读大诰,赐钞归,久之卒。"陶宗仪《南村诗集》中的《己卯元日》诗,中有"风历新颁纪建文"句,是年为1399年,陶氏当已年过八十。

陶宗仪在元、明两代都曾生活过很长时间,那末《辍耕录》究竟在什么时期撰著的呢?据该书孙作叙可知,1351年红巾军起义后,陶宗仪"避兵"居于松江农村,以十年之力著成此书。孙叙结署"至正丙午夏六月",是为1366年。笔者曾钩稽此书载有时间的数十条,未见有超过该年的,如卷一"列圣授受正统"条有"至正今二十六年"之语,载明最后时间的一条是卷二四"天陨鱼"条,"至正丙午八月"。现存元刊本语涉元帝、后、太子,皆空格,称元顺帝为"今上",称元为"国朝"、"本朝"、"我大元"等。这是因为陶氏是在张士诚占领区内著书的缘故,张士诚1353年在江北起事,1356年占平江(今苏州)、松江等地,次年降元,封为太尉,1363年自立为吴王,均奉元正朔。[①]至正二十六年八月朱元璋下令讨张士诚,十一月徐达大军围平江,偏将俞通海在此前攻克松江(见郎瑛《七修类稿》卷九"本朝取天下先后"条),所以陶宗仪不得不停止写作。可以说,《辍耕录》结集成书不能晚于1366年冬,所记载的吴方言语音和词汇现象亦如是。

陶宗仪是吴方言区南部的黄岩人,中年以后定居于吴方言区北部的松江,直至老死。除了在元时到过江汉和大都,[②] 入明后去过

---

① 《明史·张士诚传》载士诚降元后,"邀王爵,不许"。自立为吴王后,"元征粮不复与",参军俞思齐谏曰:"向为贼,可无贡;今为臣,不贡可乎!"

② 见《南村诗集》卷二二《熟食日有怀》、卷三二《长安市》。

都城(今南京)外,其生平行踪基本不出吴方言区。他所记载的吴方言现象,所作的论述有很高的价值,若干条目六百年来一直为学人所重视,所征引。

笔者研究时所使用的是1923年武进陶氏影元刻本,1936年上海涵芬楼影印吴县潘氏滂熹斋藏元刊本及1959年中华书局铅字排印本。有歧异处择善而从。

二

《辍耕录》中涉及吴方言语音处不少,以卷十九"射字法"条最有价值。

南宋赵与时(吴兴人? 1175—1231)的《宾退录》卷一云:"俗间击鼓射字之技,莫知所始。"他记述了三种"射字之技",第一种乃是利用"切韵之法"的射字法:在分析了某一方言音系的声母、韵母、声调系统之后,编成易于记诵的歌诀,实际是将汉字字音的三要素分解,编成数码,然后按要求击鼓,以鼓点的先后和点数逐码传送信号,听者接受信号后,又依声母诗、韵母诗的歌诀译码,复原成汉字。这与现代电报的汉字四位数码传送法原理近似。

《宾退录》的这则射字法为陶宗仪抄录,但它反映的是宋代语音,本文不予讨论。

陶氏所录的第一则,反映了元代某地方音,周祖谟先生早就作过论述,[①] 笔者谨再作较详细的说明。兹录陶氏原文于下:

> 有教予射字法,必须彼我二人俱聪明,熟于翻切,优于记问者,方乃便捷。倘遇人以诗词或言语示我,彼在隔坐,不及知闻,我则拊掌,彼便说出,与所示同。然片段文章皆可成诵,非特一句一字而已。用拊掌代击鼓,殊无勾肆市井俗态。此天下太平,优游无事,谩以取一时之笑乐耳;使鼙鼓之声震天,干戈之锋耀日,又能留情于此耶? 其法:七字诗十二句,逐句排写。前四句括定字母,后八句括定叶韵。诗曰:
>
> 轻轻牵兵兵边平平便明明眠逢〇〇兴兴掀征征煎,

---

① 周祖谟《射字法与音韵》,《问学集》下册,中华书局,1966年。

经经坚迎迎年俜俜偏停停田应应烟成成涎声声羶，
清清千澄澄缠星星鲜晴晴涎丁丁颠檠檠虔盈盈延，
能能○称称千非○○精精煎零零连汀汀天橙橙缠。
东蒙钟江支兹为，微鱼胡模齐乖佳，
灰咍真谆臻匡亏，元魂痕寒欢关山，
先森萧宵爻豪歌，戈麻阳唐耕斜荣，
青蒸登尤侯车侵，潭谈盐添横光凡。

如欲切“春”字，清谆，清清千春。“清”字在第三行第一字，“谆”字在第七行第四字。拊掌则前三后一，少歇，又前七后四。“夏”字平声为“霞”，盈麻，盈盈延霞。“盈”字在第三行第七字，“麻”字在第十行第二字。拊掌则前三后七，少歇，又前十后二。少歇，又三，盖“夏”字去声，所以又三也。若入声，则四矣。余仿此。但字母不离二十八字，而叶韵莫逃五十六字，此为至要。

这一条的写作时间需要考定。孙作《南村辍耕录·叙》云：“余友天台陶君九成，避兵三吴间，有田一廛，家于松南。作劳之暇，每以笔墨自随。时时辍耕，……遇事肯綮，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去则埋于树根，人莫测焉。如是者十载，遂累盎至十数。一日，尽发其藏，俾门人小子，萃而录之，得凡若干条，合三十卷，题曰《南村辍耕录》。”陶氏“避兵”居松江农村，得一时之安，故有可能学习这种“无勾肆市井俗态”的高雅游戏，但思及战乱，不免系之感慨：“此天下太平，优游无事，谩以取一时之笑乐耳；使鼙鼓之声震天，干戈之锋耀日，又能留情于此耶？”学习射字法一事，不可能是在明王朝建立，天下统一之后，前已论证整本《辍耕录》成书于 1366 年。也不可能是在 1351 年全国范围的红巾军起义之前，一介书生即使“居安思危”，也不可能设想将有大规模的内乱，也不敢形诸笔墨。陶宗仪是在战乱时期于松江学习这则射字法的，松江距黄岩甚远，而当时又群雄割据，张士诚统治区南只及杭州、绍兴，方国珍（黄岩人）长期占今宁波、台州，朱元璋据有浙东之金华、诸暨，交通梗阻如此，故《辍耕录》卷十五“隐趣”条：“余家天台万山中，……虽行江海上，而泉石草木之胜，未尝不在梦寐时见也。……风尘澒洞，豺虎咬人，几赋归与之诗，计无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此时在松江教陶宗仪射

字法的不大可能是黄岩人。利用音韵分析的射字法有强烈的地域性即方言性,依据甲地方音的射字法不能施之于乙地,"倘遇人以诗词或言语示我,彼在隔坐,不及知闻,我则拊掌,彼便说出,与所示同",而且要达到"片段文章皆可成诵,非特一句一字而已"的程度,必须紧密依据方音,才能如此。而且今松江方言,属吴语太湖片即北吴语片,黄岩方言属台州片,[①] 差异较大,谅元时未必不如此。这种射字法反映的当为元时松江方音,下将剖析其音韵系统,作进一步论证。

其声母诗"四句括定字母",这二十八字主要是梗摄、曾摄字,每个字下另出两个助纽字,其第一字与声母代表字相同,其第二字全是山摄开口三四等字,两字声母全同,且皆为平声字。需要说明的是"非"、"逢"、"能"三个代表字及其下的圆圈(涵芬楼影印元刊本不用圆圈,而是空缺无字)。f、v 二母在梗、曾摄字中找不到代表字,只好以"非"、"逢"代之,其后应加的助纽字也无法按通例觅得,只得各以两个小圆圈标志。"能"是曾摄登韵字,泥母,而山摄开口四等字中的泥母字"年"另有安排,于是第二个助纽字只好空缺。

研究这些助纽字是确定《辍耕录》射字法性质的一把钥匙。这个助纽字系统很有特色,与其前后的助纽字作历史比较便可知道。现存的载有助纽字的早期文献有涵芬楼影印元本《玉篇》卷首的"三十六字母切韵法",《切韵指掌图》检例的"三十六字母图",《四声等子》的"七音纲目",《韵镜》前的"归纳助纽字",都是宋时之物,大同而小异。与此四者有一定区别的是上述元刊本《玉篇》卷首的"切字要法",只有三十母,其中"四字无文":"非微"二母无助纽字,以"－ －"表示。元至顺间(1330—1333)福建建安椿庄书院刊刻的《事林广记》后集卷九幼学类的"切字要法·六十字诀"几与之全同。《辍耕录》射字法的助纽字则属于这个系统。下面列一比较表,第一类助纽字系统取《韵镜》为代表,紧接《辍耕录》的是《并音连声字学集要》的二十七对助纽字,陶承学于明万历二年(1574)得之于吴中,反映的是苏州音,末附《声韵会通》"二十八声",昆山人王应电撰于嘉靖十九

① 见《吴语的边界和分区》,《方言》1984 年第 4 期。

年(1540)。①

字母	帮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端
韵镜 归纳助纽字	宾边	缤篇	频蠙	民眠	分蕃	芬翻	汾烦	文樠	丁颠
玉篇 切字要法	宾边	娉偏	平便	民眠	－－			－－	丁颠
事林广记 切字要法	宾边	娉偏	平便	民眠	－－			－－	丁颠
辍耕录 射字法	兵边	俜偏	平便	明眠	○○		○○		丁颠
字学集要	宾边	娉偏	平便	明眠		分番	坟烦		丁颠
声韵会通	兵	丕	弼	明	法			文	等
字母	透	定	泥	知	彻	澄	娘	见	溪
韵镜 归纳助纽字	汀天	廷田	宁年	珍邅	獭山	陈廛	纫㹙	经坚	轻牵
玉篇 切字要法	汀天	亭田	宁年			陈缠		经坚	轻牵
事林广记 切字要法	汀天	亭田	宁年			澄缠		经坚	轻牵
辍耕录 射字法	汀天	停田	能○			澄缠①		经坚	轻牵
字学集要	汀天	亭田	迎妍			澄廛		经坚	轻牵
声韵会通	天	同	宁			丞		教	坤
字母	群	疑	精	清	从	心	邪	照	穿
韵镜 归纳助纽字	勤虔	银言	精煎	亲千	秦前	新仙	饧涎	真毡	瞋燀
玉篇 切字要法	擎虔	迎妍	精笺	清千	秦前	新鲜	饧涎	真毡	称燀
事林广切 切字要法	擎虔	迎妍	精笺	清千	秦前	新鲜	饧涎	真毡	称燀
辍耕录 射字法	檠虔	迎年	精煎	清千		星鲜	晴涎	征煎	称千
字学集要	擎虔		精笺	清千	饧涎	新鲜		征毡	称川
声韵会通	乾	乂	子	清	字	恤	是	哲	昌

① 引自赵荫棠《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1957年)143—148页。《字学集要》中的助纽字按其所注的字母列入本文表中,如"饧涎"列入从母项下,而不列入邪母项下。

续　表

字母	床	审	禅	影	晓	匣	喻	来	日
韵镜 归纳助纽字	榛潺	身羶	辰禅	殷焉	馨祆	礥贤	匀缘	邻连	人然
玉篇 切字要法		声羶	神禅	因烟	兴掀	刑贤	寅延	零连	人然
事林广记 切字要法		声羶	神禅	因烟	兴掀	刑贤	寅延	零连	人然
辍耕录 射字法		声羶	成涎	应烟	兴掀		盈延	零连	
字学集要		声羶		因烟	兴掀	刑贤	匀缘	零连	人然
声韵会通		圣		英	兴		月	礼	日

注：① 另有"橙缠"，与之相同，后有专论。

从上表可知，《韵镜》等的三十六对助纽字代表了三十六母。元本《玉篇》卷首的"切字要法"三十对，缺"敷奉知彻床娘"，而且与《韵镜》等相比，其助纽字的第一字表现了一种倾向：臻摄字减少，梗、曾摄字增多。《事林广记》的"切字要法"几乎是照抄前者，但是将"陈缠"改成"澄缠"，梗、曾摄字的助纽首字又多了一个。至《辍耕录》射字法，助纽首字全部统一为梗曾摄字，是这一趋势的继承与最后完成，而且影响及声母代表字，几乎全部采用梗曾摄字。表的下三栏显示了，《辍耕录》射字法的声母字和助纽字系统反映了一个吴方言的声母的若干特点，与《字学集要》、《声韵会通》的助纽字系统和声母非常近似，把《辍耕录》射字法放在这历史背景下，再结合现代松江音[①]加以考察，就易于理解它是反映的元代松江音。

这个方言的声母系统有如下特点：

（一）塞音、塞擦音、擦音清浊对立。众所周知，汉语中古音是有浊声母的，而在1324年的《中原音韵》音系里，浊音清化，可是在成书于1366年的《辍耕录》里，这则射字法的声母系统保留有浊声母。按照赵元任提出的"三级分法"，即闭塞音声母分为清不送气、清送气和

① 据《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和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浊音三套，是现代吴语的决定性特征的标准，[①]这则射字法的字母诗反映了六百年前吴方言的特点。“兵”、“俜”、“平”为 p、pʻ、b；“丁”、“汀”、“停”为 t、tʻ、d，余类推。

（二）轻唇音只剩两个：非、逢，即 f、v。《字学集要》的二十七声中只有“敷奉”二母，兹录该书的《切字要法》有关内容如下：

分番　　芳芫切芳分番　　敷敷分番

坟烦（即文構 構音凡）　　父勇切父坟烦　　奉奉坟烦

其中的“分番”、“坟烦”是助纽字，芳芫切“敷”，父勇切“奉”。“分”是非母字，“番芳敷”都是敷母字，可见非敷相混。“坟烦父奉”皆奉母字，“文構”均微母字，注明“坟烦”即“文構”，“構音凡”，表明奉微相混。《声韵会通》以“法”、“文”二字表示。这些实际上都反映了古“非”、“敷”二母，吴方言并为 f，古“奉”、“微”二母并为 v。今松江话唇齿音只有 f、v。

（三）从、邪合一，以“晴”作代表字。“晴”下两助纽字为“晴涎”，“晴”是古从母字，“涎”乃古邪母字，按照通例，两字代表一母，说明从、邪相并。据《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从、邪合并的方言点有苏州、无锡、上海、嘉定、松江；从、邪分立的方言有常州、常熟、海门。据《现代吴语的研究》，黄岩从、邪二母（今开合）为“dzʻ；z”，从、邪二母（今齐撮）是“dʑʻ；ʑ（作 dzʻ；z 者少）”（黄岩籍民族语专家王敬骝同志认为今音犹是）。《字学集要》切字要法中的这条作：

饧涎（音情全 即秦前）　　墙容切墙饧涎　　从从饧涎

可见明代的苏州音，古从、邪二母已合并，该书标“从”而舍“邪”。《声韵会通》以“字”表从母（该书《论声》云“‘仕’、‘墙’同归‘字’字”可证），“是”表邪母，今昆山话尚有 dzʻ、z 两母。《辍耕录》射字法所表示的显然是松江话而非黄岩话。这个字母诗于齿头音只有四个代表字，“晴”下两助纽字又为“晴涎”，考虑到现代从、邪合一的吴方言里

---

① 见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和《吴语的对比情况》一文（《国外语言学》1980 年 5 期）。

有 z 无 dz，而且这则射字法中“晴”、“成”的助纽字第二字相同，所以我们把这四字排列为“精”、“清”、“星”、“晴”，拟音当为 ts、tsʻ、s、z。

（四）这个声母系统里，还有一组“征称澄声成”。“澄”是古澄母字，其余四字是古照穿审禅四母字。以三十六字母的系统衡量，缺知彻床娘。元刊本《玉篇》卷首的“切字要法”、《事林广记》的“切字要法”早就如此。这说明知、照两组的合并，至于合并后总是以原澄母字表示第三位即浊塞擦音，娘归泥，都是传统使然，《辍耕录》射字法和《字学集要》皆承袭了这个传统。

这组声母与“精清星晴”对立，但助纽字有部分重复：

甲、精精煎	清清千		星星鲜	晴晴涎
乙、征征煎	称称千	澄澄缠	声声羶	成成涎

还有另一组声母：

丙、经经坚	轻轻牵	檠檠虔	兴兴掀

在现代黄岩话里，黄岩人王敬骝同志云：甲乙丙三组字完全同音，五纵列分别为：꜀tɕiŋ　꜀tɕʻiŋ　꜁dʑiŋ　꜀ɕiŋ　꜁ʑiŋ。现代松江话三组字分别为：

꜀tsiŋ	꜀tsʻiŋ		꜀siŋ	꜁ziŋ
꜀tsəŋ	꜀tsʻəŋ	꜁zəŋ	꜀səŋ	꜁zəŋ
꜀tɕiŋ	꜀tɕʻiŋ	꜁dʑiŋ	꜀ɕiŋ	

则是甲乙二组声母相同，丙组异。《辍耕录》既然分立为三组，现代松江话显然比黄岩话更近于这个系统。

据《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现代北部吴方言中这三组声母能分立的是无锡与常熟，分别为 ts、tʂ、tɕ，这两点位于苏州、松江之北而毗邻，可以设想在古代吴方言（至少是北部吴方言）精组、知照组与见组原本是鼎足而立的，在元、明时期的苏州话、松江话也基本如是，《辍耕录》射字法和《字学集要》的二十七声母都反映了这种状况。

可是从《辍耕录》的助纽字看来，甲乙两组又有密切的关系，“煎”、“千”、“涎”分别同为“精、征”、“清、称”、“晴、成”的第二助纽字。陶宗仪记述这则射字法的拼音规则时说：“如欲切‘春’字，清谆，清清千春。”可见“清千（古清母字）春（古穿母字）”三字声母相同。似可认

为，在元代松江方言里，甲乙两组分立，助纽字不全混；但又有部分字相混的现象，或许反映了乙组字（古知照组）向甲组字（古精组）过渡的历史演变。

（五）禅、日相混，在《辍耕录》的声母诗里，古日母无代表字及助纽字。据《现代吴语的研究》，松江话古日母的白音与泥、娘的齐撮混，日母的文音与禅、床、澄、从、邪混。征之古文献，《字学集要》切字要法：

人然即神禅　石质切石人然　日日人然

《声韵会通》“论声”：“故旧字母……‘时’、‘日’同归‘日’字。”二者可作为《辍耕录》射字法有禅无日的旁证。

（六）“经轻檠兴”即古“见溪群晓”，现代吴方言依开合与齐撮的条件分为 k、tɕ 两组（个别点分为三组）。在元代松江方言里还是 k、k‘、g、h 一组。

（七）匣、喻合一。这则射字法以“盈”、“延”两个古喻母字同作助纽字，表一母，可是拼法规则举例之二：“霞、盈麻，盈盈延霞。”而且又指明“霞”的去声字为“夏”。据此，“霞”、“夏”、“盈”、“延”四字声母相同，其中“霞”、“夏”乃古匣母字。匣喻合一的现象在《字学集要》里也存在：

刑贤即寅延　以一切以刑贤　逸逸刑贤

《声韵会通》亦云：“旧字母……‘辖’、‘喻’同归‘月’字。”现代吴方言里，匣喻相混，很多同为 ɦ。

（八）“能”与“迎”的分立问题。“迎”是射字法字母诗的二十八字之一，代表古疑母，其下助纽字为“迎”和“年”，“年”为泥母四等字，按通例，二者同表一母。《字学集要》：

迎妍即银言
宁年　年题切年迎妍　泥泥迎妍

这说明了泥母的细音与疑母的细音合并了。《辍耕录》里另有“能能○”，“能”是泥母洪音的代表字，为何缺第二助纽字？按通例只有山摄开口四等字如“年”才能填入此空，可是“年”已作为“迎”的第二助纽字。《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的字音对照表所载八个今吴方言点（包括松江）“迎”、“年”、“女”、“牛”声母同为 ȵ。

因射字法中泥母已有"能"代表,而无疑母洪音字,《玉篇》卷首和《事林广记》两个《切字要法》均以"迎"表疑母,所以我们把"迎"排在见溪群这一组内,代表疑母。

(九)"明"、"零"、"应"分别为 m、l、Ø。

最后,二十八个代表字中既有"澄澄缠",又有"橙橙缠",为何犯复?一载思索方悟:这个元代松江方音只需二十七字即能表示其声母系统,但必须以四句七言诗的形式表示,只得在最后添一个赘物"橙橙缠"。

总之,《辍耕录》记载的这则射字法字母诗四句二十八字基本上摆脱了三十六字母的传统形式,按一定标准选择代表字和助纽字,反映了六百年前松江方言的声母系统:

p 兵	p' 俜	b 平	f 非	v 逢	m 明	
t 丁	t' 汀	d 停			n 能	l 零
ts 精	ts' 清		s 星	z 晴		
tʂ 征	tʂ' 称	dʐ 澄	ʂ 声	ʐ 成		
k 经	k' 轻	g 檠	h 兴	ɦ 盈	ŋ 迎	
Ø 应						

现代松江音声母系统的格局,元时已经具备。所不同者有二:一、元代的 k、k'、g、ŋ、h 尚未在细音前分化出 tɕ、tɕ'、dʑ、ȵ、ɕ 这一套来。但是泥母细音字"年"偏离洪音字"能",而与"迎"共居以表疑母,即是一个征兆:可能受前高元音的影响,有部分字舌根声母发音部位前移。二、与 ts、ts'、s、z 相对立的还有一套 tʂ、tʂ'、dʐ、ʂ、ʐ,像现代常熟、无锡方言那样。但是后一套已有部分混入前者。这两种音变继续前进,便是现代松江音了。

而其韵母诗八句五十六字基本上按《广韵》这样的传统韵书的平声五十七韵目排列,但也更换了若干字。看来有道理在,如变"支脂之"为"支兹为",当是前三字已同音;在"文欣"的位置上另立"匡亏"占之,因已有"真谆臻";已有"先"和"尤",所以不再出现"仙"和"幽";为"唐"的合口韵母立了"光",相应地"阳"的合口呼是"匡";"寒欢"与"山关",犹如"咍灰"与"佳乖";"侵"外立"森"当是无 i 介音之故;"模"与"胡"今松江音分别为-o、-u;"齐"与"兹支"的并列或许显示了

i和ï的并存等等，这些该都反映了实际语音。有些难以索解，如"为亏"均为《广韵》支韵合口字，今松江音韵母同为 ue，"蒙东"均为《广韵》东韵一等字，今松江音韵母同为 oŋ，何以各自分立为二？须知韵母系统的复杂性及其变化远较声母为甚，因此较古时期的韵母总是与后代距离很大，而《辍耕录》的记载所能提供的韵母方面的材料又是如此之少，实在难以据现代音逐一辨认。

试将"括定叶韵"的五十六字作如下排列："麻车斜 歌戈 模胡鱼 齐兹支微为亏 咍灰佳乖 豪爻宵萧 侯尤 潭谈盐添凡 寒欢山关元先 森侵 痕魂真谆臻 登蒸 青荣耕横 江 唐光阳匡 蒙东钟。"现以之与明代昆山音比较，《辍耕录》早于《声韵会通》，但松江与昆山距离颇近，从其异同处以觇《辍耕录》射字法韵母的若干特点，《声韵会通》"论韵"云："一声统摄四十五韵，如用'月'字声，则有'刑恒荧横容红寅痕云魂言玄寒桓闲还淫〇盐含咸〇阳降杭黄兮〇〇于河湖耶〇牙遐华谐孩怀回尤侯爻豪'凡四十韵，'簪谈资之靴'，于'月'声不可通，则空其目。"二者异同在于：-m、-n、-ŋ 三个阳声韵系列在二书中仍成鼎足之势，《辍耕录》的"森侵"相当于《会通》的"簪淫"；"潭谈盐添凡"一组相当于"含谈盐咸"一组（《辍耕录》多一韵）；"痕魂真谆臻"一组相当于"痕魂寅云"一组（《辍耕录》又多一韵）；"寒欢山关元先"即《会通》的"寒桓闲还言玄"；"江"均不并于"阳唐"；"蒙东钟"相当于《会通》的"红容"；"齐兹支"即"兮资之"；均有"尤侯"而无"幽"，等等。但是《辍耕录》"蒸登"未融入"耕青"，所以不像《会通》只有四个韵母；"阳唐"合口尚未混；"萧宵肴豪"仍分为四，不像《会通》并为二；《会通》有"华"，乃麻韵合口二等字，《辍耕录》无此韵（今松江音"华"韵母同于"麻"）；等等。总的来说，元代松江音的韵母系统比明代昆山音复杂。

最后，从"射字法"条可知，这个元代松江音声调有四个：平上去入。

三

《辍耕录》里还有几条反映了吴方言的某些语音现象：

卷八"双砚堂"条："周待制白岩先生仁荣买地于府城之郑捏儿

坊,……筑础时,掘地深才数尺,……获双砚,砚有款识,乃唐郑司户虔故物。……虔字弱齐,俗讹为'捏儿'云。"按《元史·周仁荣传》谓仁荣为台州临海人,则陶氏所云"府城"为台州府城无疑。《新唐书·郑虔传》不载郑虔字,仅云"贬台州司户参军事","后数年卒",则是郑虔死于台州。其所居里弄,后人名为"郑捏儿坊",陶宗仪是台州人,认为"捏儿"乃虔之字"弱齐"之讹,是必"捏"与"弱"音近,"儿"与"齐"音近,方可讹转。民国《临海县志稿》关于郑虔及其居住遗址有以下记载:卷二十七"寓贤":"郑虔字若齐。"卷四"坊乡":"宋嘉定时十四坊五巷",中有"户曹巷","在州东一里,以唐郑虔为户曹日居此,故名"。"清康熙十九坊","广文坊""在城东旧户曹巷,以郑虔为司户居此,故名,有巷五",第五"曰荸泥,即尼巷,又曰若齐"。(按,康熙志未若如此详细。)则是"捏儿"又讹转为"荸泥"。("荸泥"二字因声母相同,韵母近似,"荸"又脱落。清时此巷俗名"荸泥"与正名"若齐"、简名"尼"三者并存。)

那么这些字音的时代关系为:

唐:弱("若"同音)齐　元:捏儿　清:荸泥

今黄岩话"弱[ʑiɛʔ꜇]——捏[ȵieʔ꜇]——荸[ȵie꜅]","齐[꜁ʐi]——儿[꜁n̩]——泥[꜁ȵi]"。从唐至元,大概是声母从 ʑ 至 ȵ 的转变。问题在"弱"与"捏",今音韵母相距较远,而陶宗仪言之凿凿,说明元代台州话可能较近。

卷二九"字音"条:"吾衍子行《闲居录》云:舜生诸冯及冯妇等,皆音皮冰切,古不音符容切也。冯妇与徐夫人皆男子,三国时,有暨艳,乃吴人,附陆抗传,当音结,不音暨也。"按,"冯",《广韵》房戎切,《集韵》符风切,《增韵》符中切,都是东韵三等字。而吾衍音符容切,容是钟韵字,说明吾衍之音,东钟合一。"暨"在《广韵》有四音:去声至韵其冀切;去声未韵居豙切;入声质韵居乙切,"姓也,吴尚书暨艳";入声迄韵居乞切,"姓也,吴有尚书暨艳"。南宋俞德邻《佩韦斋辑闻》卷一:"元丰五年,廷试进士有暨陶者,胪唱久不应。上顾左右,苏丞相云:'恐当呼讫,吴有既艳,造营府之论,恐其后也。'上命以讫音呼之,果出应。"从吾衍的话可知,作姓的"暨"有人读成去声,他说应读入声"结","结"是屑韵古屑切,这证明在吾衍的语音中,质韵或迄韵与屑

韵音相同。吾衍是钱塘人，元代著名学者、书家，陶宗仪的师辈。

卷三十“屦舄履考”条引毛晃《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履”字注，中有“草曰扉(原注，芳未反)”之语。覆检《增韵》，“扉”的反切是父沸切，《集韵》、《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并同，《广韵》作扶沸切，皆为奉母字。芳未切乃陶氏自作的反切，“芳”乃敷母，此乃以敷切奉。按，今吴方言敷、奉有别。

卷十八“靸鞋”条：“西浙之人，以草为履而无跟，名曰靸鞋。……靸，悉合切，在飒字韵下。今俗呼与翣同音者，误。”按，《广韵》、《集韵》、《增韵》，“靸、飒”皆合韵字；“翣”在狎韵。陶氏指出元代西浙“俗呼”同音，“西浙”指今松江、苏州一带。① 靸，今松江音 sɛʔ˒。

卷一“江南谣”条：“汲郡王公《玉堂嘉话》云：宋末下时，江南谣云：‘江南若破，百雁来过。’当时莫喻其意，及宋亡，盖知指丞相伯颜也。”此条抄自元人王恽《玉堂嘉话》卷四，则是彼时江南“百雁”、“伯颜”谐音，今杭州话“伯”有二音，其一与“百”同；“颜”、“雁”只是声调之别。

《辍耕录》记述的吴方言词汇，有些涉及到字音的声调问题：

卷二八“嘲回回”条录杭州人王梅谷下火文，内有“氁丝脱兮尘土昏”句，注曰：“氁上声，”“其服也”。卷十一“贤孝”条：“杭州有郑万户者……母诞日垂至，预市文绣氁段。”二者所述皆杭州事。卷十一“写象诀”条言及“调合服饰器用颜色”时有“氁子”、“氁绫”二词。“氁”字，宋俞琰《席上腐谈》卷上“音‘模’”，金韩道昭《改并四声篇海》引《俗字背篇》作末胡切，明梅膺祚《字汇》“莫胡切，音模”。而陶宗仪自注“上声”。饶以和老先生曾为我向杭州的一位老丝绸工调查，答曰不知。

卷三十“髹器”条：“凡造碗碟盘盂之属，其胎骨”，“炀牛皮胶，和生漆，微嵌缝中，名曰梢当去声”。又，“车磨糙漆，绢帛挑上声去浆迹”。又，“然后用揩光石磨去漆中颣雷上声”。

元明时代，浙西盛产漆器，嘉兴斜塘杨汇尤著，名家辈出。而陶宗仪兴趣极为广泛，此条及“鎗金银法”条当为陶氏采访后的记录。

---

① 《元史·地理志》：江浙行省浙西道肃政廉访司辖平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诸路及松江府。《辍耕录》卷二六“浙西园苑”条、卷三十“银工”条，亦可证“西浙”指平江、松江一带。

今人王世襄《髹饰录解说》云：现代“北京匠师，……周身上漆灰一道，亦即是胎子上的第一道漆灰，名曰‘捎当(读如扫荡)灰’。这个名称说明了‘梢当’两字还保留在北京漆工的术语中”。[①] 王氏所述正合《辍耕录》注音。

“挑”是多音字，《广韵》、《集韵》皆录上声一音，然与此“使之去”义不尽合。明末嘉兴漆工杨明为黄成(隆庆时人)《髹饰录》加注，亦屡提及“挑”字，[②] 当为漆工常用词，陶氏特录其音，注其声调。

“纇”，《辍耕录》后，黄成《髹饰录》及杨明注多次提到“纇”、“纇点”，王世襄云：“纇是丝上所形成的结节。……本书拿它来形容漆面极小的点粒。”[③] “纇”，《广韵》、《集韵》并去声队韵卢对切，《中原音韵》齐微韵去声。但陶宗仪特别注明“雷上声”，当是依据吴方言区髹漆工人的语音。

卷三十“鎗金银法”条载“嘉兴斜塘杨汇髹工鎗去声金鎗银法”(文繁不录)。按，黄成《髹饰录》云：“鎗金，鎗或作戗，或作创，一名镂金，……。”今人王世襄说：“关于漆工鎗金的记载，据已知材料，最早见于陶宗仪《辍耕录》。”“鎗金或戗金，其源当始自鸧金。”[④]《诗·周颂·载见》“鞗革有鸧”，陆德明《释文》：“鸧，七羊反，本亦作鎗。”是则陆音平声，而陶特注明去声。元史浩《两抄摘腴》引毛诗郑笺后云：“疑今世所谓抢金者，以平声为去声呼耳。”明方以智《通雅》：“今之谓抢金宣盒”，“作去声”，史、方之语可为陶氏佐证。字书至清吴任臣《字汇补》始据《辍耕录》载“鎗”之去声音，“青向切，锵去声”。《康熙字典》仍之。

陶宗仪、王世襄对“鎗”的工艺有明确叙述，“鎗”之义即如明杨慎《丹铅总录》所云之“镶嵌”，关于“鎗金”一词，杭州饶以和先生为我向一位老年油漆工调查，答曰不知。但是在吴方言中有一普通动词叫“鎗”，去声。陆学海同志云：杭州话中，指“在某一物中渗入另一物”，如某种颜色的漆水加入另一颜色的漆水，叫鎗。“渗入”，杭州话

① 王世襄《髹饰录解说》第169—170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② 同上，第51—54页。
③ 同上，第35页。参见第53、55、161页。
④ 同上，第136—137页。

叫“鎗进去”。还有一种食物叫“鎗蟹”,即置小蟹于器皿内,渗入盐水制成,其他吴方言点甚至北邻的江淮方言亦然,看来,吴方言早就有表“镶嵌、渗入”义而为阳韵去声的动词“鎗”,诸书不载,陶宗仪首先记录了专门术语“鎗金、鎗银”,今虽漆工亦难晓,但用于通常意义的“鎗”今仍在吴方言中普遍存在。

四

陶宗仪是吴方言区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吴方言区,所以他对吴方言词语有浓厚的兴趣,《辍耕录》中常列专条录述,并考证某词的出处,列举古代的用例。这部分内容颇为后代珍视,明清以来的笔记,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的专著如明胡震亨《唐音癸签》、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清陈棠《知新录》、钱大昕《恒言录》、翟灏《通俗编》、赵翼《陔余丛考》等直至今人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元曲释词》等无不录引之。

这些有高度价值的材料应予重视。笔者的工作是:一、将《辍耕录》中有关吴方言词语的条目加以辑录。二、陶氏博综群书,“尝览杂传记一千余家,多士林所未见”(宋濂《书史会要叙》),编有笔记丛书《说郛》,因而《辍耕录》中有若干条目是抄摘或源于前人笔记,但未明言。此于陶宗仪未足为病,因为此书系辍耕之时,摘叶书之,最后萃录而成,容或不载出处。时贤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的论著在追寻某词语的出处或早期记载时,往往至《辍耕录》而止,而未能再进一步溯源,今就笔者阅读所及,特为补出,如源自《宾退录》、《能改斋漫录》、《困学纪闻》、《容斋随笔》、《老学庵笔记》、《续释常谈》等皆有数条。值得注意的是,陶氏所摘引者多是吴方言区学人的笔记,因吴方言词语是其兴趣所在;多数不是简单的抄录,或在其前加释义,或在其中加例证,或改写。三、援引唐宋元明清典籍(吴越学人著作为多)、吴方言区近代地方志和现代方言志的记载,还有近两年的调查结果,目的不止是对这些词语作一般的疏证,而力图从语言史的更广角度探赜其千百年来的变化与发展。

上节论及语音时,已涉及到一些吴方言词。本节专门论述词语。

卷五“发烛”条:“杭人削松木为小片,其薄如纸,熔硫黄,涂木片

顶分许，名曰发烛，又曰焠儿，盖以发火及代灯烛用也。……宋翰林学士陶公谷《清异录》云：'夜有急，苦于作灯之缓，有知者，批杉条，染硫黄，置之待用，一与火遇，得焰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货者，易名火寸。'按此，则'焠寸'声相近，字之讹也。然引光奴之名为新。""引火奴"、"发烛"皆是雅名，此物当于近代消失，今一位八十四岁的杭州老人亦不知。但云南方言词"洋发烛"就是"火柴"。从此条可知宋初杭州话的"火寸"至元末已谓之"焠儿"。现代学者指出，浙江、安徽、江苏地区的吴方言、徽州方言都曾有过或存在有表指小爱称的儿尾或儿化韵，其特点是 n 或 ŋ 自成音节表儿尾，或充当韵尾与前面的元音形成阳声韵，则为儿化韵。[①] "火寸"在当时为新奇的发明，故陶谷《清异录》"器具门"特加记载，以"寸"为名必甚短，符合心理上的指小爱称的特点，而"寸"字以 n 收尾(元代松江音 n 尾与 m 尾、ŋ 尾兼存，宋初杭州话谅亦然，今杭州话"寸"收 n 尾)。《清异录》中的"火寸"是以汉字形式表现的，却引起我们的推测：最后的 n 有可能是吴方言的儿化韵或儿尾。可是"南宋建都杭州达一百四十八年(1128—1276)，越中方言受了北方话(中州音)的影响，明显地反映在今日带有浓厚'官话'色彩的杭州话里。……儿尾词很发达……"[②] "浙江有些地方有'儿'尾，大概是南宋以后受了杭州话的影响。杭州话'儿'尾自成音节。"[③] 由于南宋时期中原方言的影响，杭州话"火寸"的 n 尾脱落，代之以同部位的前元音 i，[④] 加上了中原方言的表指小爱称的词尾"儿"，于是"寸"变成了"焠儿"("寸"与"焠"声母，声调本来就相同)。"焠儿"是双音节词，因此原来的词素"火"也被抛弃。到了陶宗仪，这项音变的结果就被记录在《辍耕录》里了。

---

① 见李荣《温岭方言的变音》(《中国语文》1978 年 2 期)，郑张尚芳《温州方言儿化词的语音变化》(《方言》1980 年 4 期、1981 年 1 期)，平田昌司《休宁音系简介》(《方言》1982 年 4 期)，徐通锵《宁波方言的"鸭"[ɛ]类词和"儿化"的残迹》(《中国语文》1985 年 3 期)。

② 《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第 57 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年。

③ 《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第 57 页、97 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年。

④ "焠"，中古音为去声队韵七内切，但是灰贿队韵字及泰韵合口字在唐后期及宋代已与支脂韵的合口字合流，韵母主元音变成次高元音。据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第 41 页和 43 页，杭州话"焠"、"寸"的韵母为 ɥəi、ɥən。上述两点可为推测南宋时期杭州音变的参考。

现代杭州话儿尾词甚多,如"纸儿"、"画儿"、"帕儿"、"凳儿"等等。《辍耕录》此条至少可以看作杭州话具有北方话式的儿尾词的一项早期记录,是颇有价值的一条。

卷八"长年"条:"吾乡称舟人之老者曰长年。长,上声。盖唐已有之矣。杜工部诗云:'长年三老歌声里,白昼摊钱高浪中。'《古今诗话》谓川峡以篙手为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耳。因思海舶中以司舵曰大翁,是亦长年三老之意。"按,宋人江休复《江邻几杂志》、陆游《入蜀记》卷五、赵与时《宾退录》卷四、戴埴《鼠璞》都言及川峡、海壖呼篙手为长年,陶氏此条较近于《鼠璞》,戴曰"海壖",陶曰"吾乡",黄岩近海,则是"长年"、"大翁"皆为元末黄岩话。今黄岩县七十五岁老人尤伯翔先生云:"长年之长读上声,年读去声,音如涨念,指船夫。如二字均平声,则为地主之雇工。"作船工义的"长年"在明清文献中屡见,如明沈周(吴县人)《石田杂记》:"长年同至山下。"明清之际的吴伟业(太仓人)《避乱》:"长年篙起舞,扁舟疾如箭。""大翁"一词今似已不存,黄岩掌舵者名"老大","大"读"渡"音。《越谚》(光绪会稽范寅著)下:"撑弹船者名老大,(大)呼平声。"乾隆、光绪、民国《崇明县志》并收"老大",释义为"呼舵工曰老大,以一船之司命也"。今松江话亦为"老大",这在吴方言区是通用词。

卷十七"丫头"条:"吴中呼女子之贱者为丫头。刘宾客寄赠小樊诗:'花面丫头十二三,春来绰约向人时。'"按,此条源自宋龚颐正(遂昌人)《续释常谈》"丫头"条,但首句为陶氏所加。宋人王洋《弋阳道中题丫头岩》:"不谓此州无美艳,只嫌名字太粗生。"自注:"吴楚之人谓婢子为丫头。"陶宗仪所述与此注颇相合。宋刘昌诗《芦浦笔记》卷十"丫头岩诗"条:"岩前壁间,题者甚多,予独爱乡人彭仲衡,思致高而无著。其诗云:'……世间景幻语未真,说著丫头便痴绝。'"清张南庄(乾嘉时上海人)《何典》卷四、卷七中的"委尿丫头"、"骚丫头"皆指婢女。吴方言区地方志多收此词,仅举嘉庆二十二年《松江府志》为例:"呼女子之贱者曰丫头。"今松江话、天台话及很多吴方言点仍存此词,指旧时的婢女丫鬟;有人认为尚指女孩子,或是对女儿和小辈

女子的昵称，或是骂詈语，区别在于语调。[①]“丫头”一词在清代小说如《红楼梦》等中普遍使用，今非吴方言区也常用。根据王洋及陶宗仪的话，宋元时代“丫头”本为南方方言词，但后来就进入了官话，成为普通词。

卷八“温暾”条：“南人方言曰温暾者，乃微暖也。唐王建《宫词》‘新晴草色暖温暾’，又白乐天诗‘池水暖温暾’，则古已然矣。”按，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四抄引后注：“又李商隐诗‘疑穿花逶迤，渐近火温黁’，亦暖气之意。”唐宋习见此词，如白居易《别毡帐火炉》：“婉软蛰鳞苏，温燉冻肌活。”皮日休《奉和鲁望玩金鸿鹅戏赠》“温黁飘出麝脐熏”，宋吕本中《轩渠录》述京师营妇托一教学秀才写书寄夫云：“不要吃温吞蠖托底物事。”《朱子语类》卷六十：“利与善之间，不是冷水便是热汤，无那中间温吞暖处也。”则是唐宋时期通语中同一叠韵词有三种不同的写法（第二字音近）：一、温暾（《广韵》他昆切）；二、温吞；三、温黁（《广韵》奴昆切）。

此词可上溯至汉代：大徐本《说文》：“䨓，安䨓，温也。”又“㬮，墀地，以巾㧌之。……读若水温䨓也。”同一“䨓”字，孙愐音异：

安䨓（奴案切），则二字叠韵，元部字。

温䨓（乃昆切），则二字叠韵，真部字。[②]

“安温”均影母字，“奴乃”均泥母字，至于韵母，东汉河南地区真、元二部音同或音近，许慎自己的《说文解字后叙》即以元部之“传藩山”叶真部之“门濒神申”等，[③]南阳西鄂人张衡、陈留圉人蔡邕均有元真二部通押例。[④]在《说文》中一词出现两种形式原因即在此。此词由汉而唐宋，韵母的真部读音定型化，即全为魂痕韵字。“温黁”上继“温䨓（乃昆切）”，只是字形有别。但又新生歧异形式“温暾”、“温吞”。

这通语之词，至元缩小了范围，陶宗仪明确指为“南人方言”。此后用例甚多，如明末苏州人冯梦龙编《山歌》卷五《茶注》“冷热温燉待子多少人”，《何典》卷四“吃得温暾耐得热的精胖小伙子”，胡文英（武

---

① 同是松江人，顾树兴同志认为“丫头”有二义，而谈池平师傅认为只指丫鬟。

②③④ 见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第198页、206页、103页、205页、206页。

进人)《吴下方言考》(乾隆四十八年刊)卷四:“温暾(原注:下音吞),今吴谚谓水微暖曰温暾。”康熙、嘉庆《松江府志》,乾隆、道光《苏州府志》,民国《吴县志》,光绪《杭州府志》等皆收此词。今吴方言中普遍存在,杭州、绍兴亦作“温吞吞”,黄岩尤伯翔老先生于拙稿上批云“温暾今亦读温能。”则是东汉与唐代泥母音的“温黁”、“温黁”仍保存于现代口语中。此词还用来形容性情或言辞不爽利:范寅(会稽人)《越谚》(光绪四年刊)中:“温暾水,谓微热水也。”同书上“借喻之语”:“黁暾水(温吞史),懦弱无刚也。”鲁迅《并非闲话(三)》:“不过是温暾之谈,两可之论。”

卷十二“拗花”条:“南方或谓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诗:‘试问酒旗歌板地,今朝谁是拗花人。’又古乐府‘拗折杨柳枝’。”按,所引唐诗出自李贺《酬答》诗之二。吴方言中普遍有此词,乾隆《象山县志》、道光《苏州府志》、民国《吴县志》、光绪《镇海县志》等皆收此词。今松江、杭州、无锡、宁波、东阳、天台、黄岩皆有此词。但绍兴叫“捉花”,云和叫“掏花”。无锡采棉花叫“捉花”。

卷十八“靸鞋”条:“西浙之人,以草为履而无跟,名曰靸鞋。”其引用书证直至宋初人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所载唐人包贺“船为水靸鞋”,前已指出,元代的“西浙”指平江、松江、常州、杭州一带。冯梦龙编《古今小说》卷三三:“有个妇女”“脚下拖双靸鞋”,清咸丰《鄞县志》收有“靸鞋”。但今松江、苏州叫“拖鞋”,杭州叫“踢拖鞋”,据《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吴方言区诸点都叫拖鞋,反而是江淮方言区的句容、南京、扬州、高邮、淮阴,中原方言区的邳县、徐州叫“靸鞋”或“靸鞋子”,再往北也有叫“靸鞋”的。老南京话“靸靸鞋”中的前一“靸”是动词。比较《辍耕录》与今吴方言,可见“靸鞋”一词在北部吴方言中逐渐消失。

卷二八“废家子孙诗”条:“秀之斜塘,有故宋大姓居焉。……子孙多不肖。……郡人金方所,谈辞滑稽,……因摭其事,成近体一律云:‘宅眷皆为撑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夫兔撑目望月而孕,则妇女之不夫而妊也。”按,元代“秀之斜塘”即今浙江省嘉兴市所属之嘉善县西塘镇,“撑目兔”“缩头龟”为元代浙地方言词无疑。

卷十一“贤孝”条:“国朝妇人礼服:达靼曰袍,汉人曰团衫,南人

曰大衣,……然俗谓男子布衫曰布袍,则凡上盖之服或可概曰袍。”元代统治者管华北地区的汉族人叫汉人,管原南宋统治区的汉族人叫南人。因此“大衣”是元代吴方言词。今吴方言区的“大衣”一词则指较长的西式外衣,与元代的南方妇人礼服了不相干,云和称妇女的结婚礼服为大通。至于“袍”,则长期存在,松江叫袍、长衫,杭州则有长袍、夹袍、棉大袍之别。解放后,“袍”几乎不复存在。

卷七“屈戌”条:“今人家窗户设铰具,或铁或铜,名曰环纽,即古金铺之遗意。北方谓之屈戌,其称甚古。”既下言“北方”,则上之“环纽”或为南方词,朱慧娟同志云:苏州旧式木窗尚有此物,名曰环纽。

卷二七“金甲”条:“嘉定州大场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一日,自番中还,先报家信有云:‘番船今到何处,发金甲先回。’金甲者,碓坊甲头也。后因逐一干仆,仆出此书首告,以为玉印未到,金甲先回。沈厚赂官府,得理。”这是利用方言词制造的政治诬陷案。“甲头”、“金甲”当是嘉定地区的吴方言词,因是碓坊用具,今颇难调查。《辍耕录》涉及许多专门技艺,内有若干吴方言专业词,兹不赘论。

以上基本上都是陶宗仪明言为吴方言词者。

以下诸词,陶宗仪只是用“俗呼”、“今人指”、“世言”之类的话领起,但后代吴方言区学人的笔记、小说、戏曲中使用之,地方志中还收录,或现在还保存,可证这也是14世纪吴方言词,或在当时的吴方言区常使用。

卷十四“妇女曰娘”条:“‘娘’字,俗书也,古无之,当作‘孃’。……今乃通为妇女之称。故子谓母曰娘,而世谓稳婆曰老娘,女巫曰师娘,都下及江南谓男觋亦曰师娘,娼妇曰花娘,达旦又谓草娘,苗人谓妻曰夫娘,南方谓妇人之无行者亦曰夫娘,谓妇人之卑贱者曰某娘,曰几娘,鄙之曰婆娘。”接着引书证若干条(文繁不录)。按“达旦”即“鞑靼”,指蒙古人,苗人指元末在江浙作战的苗军。《说文》段注:“孃”:“《广韵》阳韵孃,女良切,母称。娘,亦女良切,少女之号。唐人此二字分用画然,故耶孃字断无有作娘者,今人乃罕知之矣。”

“娘”、“娘子”作为妇女的通称,中古已然,陶氏举例甚多。吴方言区一直使用,冯梦龙编《挂枝儿》杂部十卷《乡下夫妻》“俏娘儿遇清明”,《山歌》卷五《大人家阿嫂》“花花轿里个娘娘弗比得跟轿个好”,

明末凌濛初(吴兴人)《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一"店家娘子不必发怒",《何典》卷四"娘娘们都掉他不落"。又,康熙、嘉庆《松江府志》:"孃子,妇女之通称。"光绪《川沙厅志》:"称妇人曰娘娘。"等等,以"娘"为词素构成的许多词,均指女性,详见《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子谓母曰娘",吴方言区一直如是,《辍耕录》卷十二"贞烈墓"条述天台妇郭氏持子痛哭之语:"汝爷行且死,孃死亦在旦夕。"《何典》卷七:"你今替娘烧香,是一团正经。"乾隆、道光、民国《象山县志》:"母曰娘。"咸丰《鄞县志》:"称母曰娘。"今无锡、苏州、丹阳、杭州、绍兴,"母亲"的称呼之一是"娘"或"娘娘"。

"世谓稳婆曰老娘",陶氏未举例。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七:"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试馆职。一日,谒晏丞相,晏语之曰:'君久从吏事,必疏笔砚,今将就试,宜稍温习也。'振率然答曰:'岂有三十年为老娘,而倒绷孩儿者乎?"元曲《灰阑记》一"赚煞"曲:"现放着剃胎头收生的老娘,则问他谁是亲娘,谁是继养?"吴方言区常用此词:《越谚》中:"老娘婆,即收生妪。"卷上:"多年做老娘婆,错剪脐带。"康熙、嘉庆《松江府志》:"谓稳婆为老娘。"乾隆、道光、民国《象山县志》:"世谓稳婆曰老娘,……则江浙皆有此称,不独象邑。"今无锡、吴江、天台、黄岩仍谓收生婆为"老娘",但绍兴叫"收生婆",云和叫"洗囡囡"。谈池平师傅说:松江指替人非法打胎,为人所鄙的接生婆叫"老娘",为良家妇女合法接生,备受礼待的接生婆为"茶婆",后者命名似有寓意。今多医院接生,此词行将消失。汪维辉先生说,宁波骂人话有"多老娘钿"(意谓本来就不该生下来)。又,非吴方言区也有管接生婆为老娘的。

"女巫曰师娘,都下及江南谓男觋亦曰师娘。"按,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三九:"男巫女觋……汉时谓之下神,唐世呼为见鬼人。"明时苏州"男称太保,女称师娘。"康熙、嘉庆《松江府志》,民国《太仓州志》、《金山县志》、《崇明县志》均谓女巫为师娘。上述《崇明县志》谓男巫为童子。今松江、苏州、无锡、吴江谓女巫为师娘,绍兴曰巫婆,云和曰讲花。男巫特少,好多调查对象不知,绍兴叫灵菩萨,云和叫问神。

"娼妇曰花娘",按"花娘"原指歌舞伎,李贺《申胡子觱篥歌序》:"命花娘出幕,徘徊拜客。"梅尧臣《花娘歌》:"花娘十二能歌舞,籍甚

声名居乐府。”至元代陶宗仪明言为娼妓之名。《水浒》第五十一回：“那花娘的父亲被雷横打了。”吴方言至清代尚保存此词：乾隆、道光《象山县志》：“娼妇曰花娘，则江浙皆有此称，不独象邑。”咸丰《鄞县志》亦然，咸丰《宝山县志》：“花娘，骂妇人之贱者。”[①] 笔者调查的吴方言区各点，“花娘”一词已不存。又《辍耕录》卷二八“醋钵儿”条：“猆子，总贱娼滥妇之称。”明代周祈《名义考》卷五：“俗谓倡曰表子。”《金瓶梅词话》第十五回：“如何一向不进来看看姐姐儿，想必别处另叙了新婊子来。”《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一：“便思量淫荡起来，接着两个表子。”下一事实可见语词之嬗变：乾隆、道光《象山县志》叫“花娘”，民国十五年的《象山县志》则曰“猆子”，今无锡、吴江、天台、杭州、绍兴、云和等地皆曰“婊子”，今苏州、松江叫“野鸡”，则是受上海话的影响。在明清吴方言区，娼妓还有“小娘”一名：《挂枝儿》杂部第十《妓》“小娘们就是活强盗”，《山歌》卷五《瘦妓》“嫖小娘儿没嫖个胖婆娘”，《何典》卷五“也有领他去闯花门嫖小娘的”。但是近百年来吴方言词“花娘”、“小娘”都让位于通语词“婊子”。

“南方谓妇人之无行者亦曰夫娘。”乾隆十五年《宝山县志》“夫娘，俗骂妇女之淫贱者曰夫娘，盖本元末苗寇平江、松江，以妇人艳而皙者畜为妇，曰夫娘，今遂成此语，作骂词。”此乃倒因为果，其误源于《辍耕录》此条之叙述欠明，《辍耕录》卷八“志苗”条记述元末杨完者率领的苗军在江浙地区横行时的若干专门词，多数为借自汉语的词，其一为“妇人艳而皙者，畜为妇，曰夫娘”。汉语吴方言以“娘”为词素的表女性的词很多，“夫娘”当为这支苗军吸收自吴方言的“外来词”，而非吴方言从苗语吸收的词。笔者调查的吴方言区人士，皆云不知此词。

“南方”“谓妇人之卑贱者曰某娘，曰几娘，鄙之曰婆娘”，陶氏举例甚多。此数词吴方言区一直使用。如《古今小说》卷三八：“婆娘无礼。”《挂枝儿》欢部二卷《眼里火》：“是那一个有福的婆娘也，独自受用得你好。”《何典》卷六：“就到外边吃花酒，偷婆娘。”康熙、嘉庆《松江府志》：“又曰某娘曰几娘，鄙之曰婆娘。”咸丰《鄞县志》：“骂妇人为婆娘。”民国《金山县志》亦然。今吴江、松江、无锡、绍兴、台州皆有婆

① 《拍案惊奇》卷三一：“这花娘吃不得这一棍子”，被骂者并非娼妓，此乃骂詈语。

娘一词，苏州话“婆娘”指泼妇之类的女人。解放前苏州有为富家丧事助哭之“哭娘”。“婆娘”一词，非吴方言区也一直使用，如《窦娥冤》、《水浒》三二回，民国《云阳县志》及今很多方言皆如是。

卷七“客作”条：“今人之指佣工者曰客作，三国时已有此语，焦光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按，此例出于《三国志·魏书·管宁传》注引《魏略》。又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下：“夏馥”“入林虑山中为冶工客作，形貌毁悴。……留赁作不归。”《北齐书·邢邵传》：“邢家小儿尝客作章表，自买黄纸，写而送之。”值得注意的是，《高士传》中的“赁”与“作”二动词并列，“客作”当是偏正词组（“客”乃名词作状语），至多也只是个动词。《北齐书》亦然。唐王梵志诗《鸿鹄尽飞扬》：“他家求官宦，我专慕客作。”方为名词。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俗骂客作”条：“江西俚俗骂人，有曰客作儿。按陈从易《寄荔枝与盛参政》诗云：‘……橄榄为下辈，枇杷客作儿。’……凡言客作儿者，佣夫也。”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九“俗语有所自”条录吴曾语后曰：“斥受雇者为客作。”亦可证。陶宗仪也是以“客作”作名词来解释的。嘉庆《松江府志》：“诟人佣工曰客作。”乾隆、道光《苏州府志》，乾隆、民国《吴县志》并云：“骂佣工曰客作。”乾隆、民国《吴江县志》，光绪《青浦县志》，民国《象山县志》皆收此词。今黄岩无此词，佣工有“长（平声）年”、“帮月”之分。松江话城里的佣工则叫佣人，农村的则叫长工、短工。云和则叫长年、零工。

卷十“鏖糟”条：“俗语以不洁为鏖糟。”按，宋庄绰《鸡肋编》中：“许昌至京师道中……有大泽，弥望草莽，名好草陂。而夏秋积水，沮洳泥淖，遂易为‘鏖糟陂’。”元剧《铁拐李》四“醉春风”：“一个鏖糟叫化头出去。”本为通语之词，元明至今遂为吴方言词：《山歌》卷一《娘打》“汗衫累子鏖糟拚得洗”，《古今小说》卷三“如何容得这等鏖䵴的在此住”，《何典》卷一“鏖糟弥陀佛”，卷二“懊躁弥陀佛”。嘉庆《松江府志》：“言不洁曰鏖糟。”光绪《黄岩县志》、道光《苏州府志》、乾隆《崇明县志》皆收此词。今吴方言普遍有此词，杭州话尚可加形容词尾，如“鏖糟刹了”。无锡、黄岩、松江、苏州的调查对象说，此词尚有不惬意、不悦义，此源于“鏖糟”的另一义，《吴下方言考》卷五曰：“吴中谓执拗生气曰鏖糟。”宁波北仑区（旧属镇海县）引申为倒霉晦气义，可

加形容词词尾，如“鏖糟不赖”。

卷十一“不快”条：“世谓有疾曰不快。陈寿作华陀传，已然。”按，此条系抄自《宾退录》卷九，陶宗仪仅加一“世”字。元曲《窦娥冤》二：“我身子十分不快哩。”《西厢记》四之一：“猛见他可憎模样，早医可九分不快。”明郎瑛（杭州人）《七修类稿》卷二四“谚语始”条：“有疾曰不快，见三国华陀传。”嘉庆《松江府志》、乾隆《震泽县志》、光绪《杭州府志》等皆收录，这是吴方言的通用词。今松江老年人叫“勿快”，六十岁以下者叫“勿好”或“勿舒服”。苏州叫“勿适意”。黄岩叫“勿爽快”、“勿舒服”。

卷十九“经纪”条：“今人以善能营生者为经纪。唐滕王元婴与蒋王皆好聚敛，太宗尝赐诸王帛，敕曰：‘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韩昌黎作柳子厚墓志云：‘舅弟卢遵，又将经纪其家。’则自唐已有此言。”按，唐太宗语出于张鷟《朝野佥载》卷三，《三国志·魏书·朱建平传》“经纪其门户”，王梵志诗“经纪须平直”，这些早期用例都说明是动词，即《辍耕录》卷二四“结交重义气”条“吾辈若不为之经纪”，元蒋子正《山房随笔》“赵经纪棺殓且致祭”，明郑晓（海盐人）《今言》卷二“吴文恪公力为经纪”均系动词用法，可能是仿古。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经纪语”条：“江西人以能干运者为‘作经纪’。”吴自牧《梦粱录》“夜市”条：“又有经纪人，担瑜石……。”《辍耕录》卷十二“阴德延寿”条：“妾之夫作小经纪。”还有陶氏于此条所下的定义，均可证宋元时“经纪”已变成名词，沿用至今：《古今小说》卷三八：“城边无数经纪行贩，挑着盐担。”《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一：“他是个做经纪的人”，“张善是个经纪人”。《越谚》中：“经纪，习商贾谋利者。”嘉庆《松江府志》：“营生曰经纪。”笔者所查阅的收有“经纪”的十九种清代和民国的吴方言区地方志中，有十一种指明此词带贬义，如乾隆《宝山县志》：“俗鄙人营生曰经纪。”今天台、东阳仍有此词。松江叫“经纪人”。苏州亦然，但更多说“生意人”。云和叫“生意经”。

卷十一“牙郎”条：“今人谓驵侩者为牙郎，本谓之互郎，谓主互市事也。唐人书互作牙，互与牙字相似，因讹而为牙耳。”按，此条抄自宋孔平仲《谈苑》卷四。宋刘攽《贡父诗话》有类似说法，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四“牙郎”条误《谈苑》为《贡父诗话》。《旧唐书·安禄山传》、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并作“牙郎”。此词又作“牙人”、“牙侩”：变文《庐山远公话》“牙人闻语”，《辍耕录》卷七“雇仆役”条“命牙侩雇一仆役”。民国《象山县志》收有“牙侩”、“市牙”、“牙郎”、“牙子”。黄岩今称“牙行先生”，松江、苏州的调查对象云：这种人叫“掮客”。非吴方言区也有“牙人”一词，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十“善谑”条：“京师有市猾某者，本骡马行牙人。”

卷十一“暖屋”条：“今之人宅与迁居者，邻里醵金治具，过主人饮，谓曰暖屋，或曰暖房。王建《宫词》‘太仪前日暖房来’，则暖屋之礼，其来尚矣。”宋周辉《清波别志》“暖屋”条：“里巷间有迁居者，邻里醵金治具过之，名暖屋。”元施惠《幽闺记》：“明日再取一樽酒与你暖房。”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四“谚语始”条亦收“暖房”一词。现代松江盖新房、新婚时有暖房的仪式，无“暖屋”一词，尤伯翔先生说：“黄岩解放前尚流行‘暖房’，但指新婚前夕。”天台新婚前夕要暖房、暖屋，头顿饭叫“暖房饭”。绍兴有“暖屋”，天台、无锡“暖屋”、“暖房”二词皆可，云和叫“暖灶”。

卷十三“太公”条：“今人谓曾祖父曰太公，此盖相承之谬，当称祖父为是。”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六“太公”条谓古代亦有称曾祖父为太公者。汉语各方言的亲属称呼本来就十分复杂，从《辍耕录》可知，从元代起吴方言“太公”指曾祖父，今犹如是。民国《崇明县志》：“曾祖父曰太公。”今黄岩称曾祖父为太公，元代也统称太公，如祭祖叫拜太公。临海、天台、云和、宁波、绍兴、杭州、无锡、苏州均管曾祖父叫太公。吴江一般叫太公，有的地方叫老太公。松江人多数叫太公，少数叫大大。

卷六“家翁”条：“世言家之尊者曰家主翁，亦曰家公。唐代宗谓郭子仪曰：‘鄙谚有云：不痴不聋，不作家翁。’”按，唐代宗语系出唐赵璘《因话录》卷一，原末句为“不作阿家阿翁”，《隋书·长孙平传》作“未堪作大家翁”，《通鉴》卷二二四作“不作家翁”。本通语词，吴地亦通行，有“家公”、“家主公”、“家主”、“主翁”几种说法：《辍耕录》卷十三“释怨结姻”条：“吾所仇者，其家公也。”《水浒传》第二十回：“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时疫死了。”《山歌》卷八《求老公》：“别寻一个好家公。”明袁于令（苏州人）《西楼记》第十出：“客人弗知家主公要见弗要见。”

《拍案惊奇》卷三二："叫两个使婢在床前相伴家主。"《二刻拍案惊奇》卷五"主翁多曾看见榜文赏帖的"。民国《金山县志》："家之尊者曰家主翁。"今绍兴有文化者尚有此称。松江亦有称"家公"者。

与此相对的称呼有"家婆"、"家主婆"，《山歌》卷五《姹量》："思量家公真难做，弗如依旧做家婆。"《拍案惊奇》卷六："那春花丫头见家主婆睡着，……"《现代吴语的研究》第110页：苏州、常熟、昆山、宝山、青浦，"妻"的名称之一是"家主婆"。

卷十七"点心"条："今以早饭前及饭后、午前、午后、晡前小食为点心。唐史：郑傪为江淮留后，家人备夫人晨馔，夫人顾其弟曰：治妆未毕，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则此语唐时已然。"按，此条源于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点心"条，庄绰《鸡肋编》："上至院，微觉馁，孙(卖鱼)出怀中蒸饼云：可以点心。"可见"点心"本为动词，吃小食义。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有卖烧饼……等点心者"，吴曾的界说是"世俗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这两语的点心才是名词，陶宗仪将吴曾词义范围扩大，当是据元时习俗。点心是吴方言中的通用词，《拍案惊奇》卷三一"我拿些点心，下饭与他吃。"明李诩(江阴人)《戒庵老人漫笔》卷五："午前午后小食谓上昼点心，下昼点心。"光绪《镇海县志》引《俗呼小录》同之。光绪《杭州府志》："言日间小食曰点心。"光绪《川沙厅志》："食半饱曰点心。"光绪《嘉定县志》："俗谓清晨及午后小食也。"今黄岩、天台、东阳、云和、绍兴、无锡皆通用此词。陆学海同志云：杭州指非三次正餐的随意小吃，但吴江中南部则专指中午饭。松江白天的小食叫点心，夜宵则叫半夜饭。但苏州晚上八九点吃的也叫点心。现代吴方言中尚有"点点心"、"点心点心"的说法，则为动词用法。

卷八"利市"条："利市之说，到处皆然。《易·说卦》'巽，为利市三倍。'"按，此实本宋王应麟(宁波人)《困学纪闻》卷十九："俗语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说卦》。"钱大昕《恒言录》卷四"利市"条指出，"《说卦》实以'近利'为句，'市三倍'为句"，利市始见于《左传》、《易林》。中古以后常用此词，如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谓夏侯孜曾为时人号曰"不利市秀才"，《快嘴李翠莲记》"花红利市多多赏"。吴方言区尤常用：《梦粱录》"嫁娶"条："房门前先以彩帛一段，横挂于楣上，碎裂其下，婿入门，众手争扯而去，谓之利市。"《戒庵老人漫笔》卷五"喜事

为利市”，明沈璟(吴江人)《博笑记》：“老爹昨日才到任，你说这般不利市的话。”《何典》卷六“走到一个大人家去发起利市来”。范寅《越谚剩言》收“利市”。乾隆、道光、民国《苏州府志》：“喜事曰利市。”民国《太仓州志》：“得财曰利市。”今黄岩、无锡等处皆有此词。陆学海同志云：今吴江农村做生意还讲“利不利市？”今苏州尚有“利市弄”。

卷十四“上头入月”条：“今世女子之笄曰上头，……花蕊夫人《宫词》：‘年初十五最风流，新赐云鬟使上头。’又天癸曰月事。……然入月二字尤新，王建《宫词》：‘密奏君王知入月，唤人相伴洗裙裾。’”按，女子及笄曰上头本为通语词，梁萧纲《和人渡水》诗“婉娩新上头”，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清明节”：“子女及笄者，多以是日上头。”乾隆《震泽县志》：“男女冠笄曰上头”，光绪《宝山县志》、民国《吴江县志》并同。今东阳人尚知有此词，云和旧时称女子结婚笄头为“渊主客”(音)。解放后无此习俗，此词亦消失。

范寅《越谚剩言》：“月头，妇女经期”，“讳言月头上”，“又取当曰赶月头”。今黄岩说月经，文人尚说月事。松江老人叫“龌龊”，月经来叫“龌龊来”，中年人说“月经”，宁波老人叫“鏖糟”。“入月”一词未能调查到。

卷七“课马”条：“俗呼牝马为课马……”按，此条抄自孔平仲《谈苑》，当作“骒马”，本通语词。宋王禹偁《小畜集》“记马”有“不幸而骒”句，自注“牝马为骒”，《元朝秘史》卷二“与了他一个……不生驹的骒马”，明张自烈《正字通》：“骒，俗呼牝马。”范寅《越谚》中：“课马，牝马也。”则是吴方言中亦有此词。但清初萧山人毛奇龄《越语肯綮录》：“马之牝者曰骍马。”此词早见于《尔雅·释畜》郭注、《颜氏家训·书证篇》。咸丰《鄞县志》、民国《新昌县志》皆曰：“畜之牝者曰骍。”今黄岩、温州叫草马，绍兴、新昌则叫雌马。有趣的是，今沿海由南而北，大致上南部吴方言叫骍马，北部吴方言叫雌马，江淮官话叫母马，中原官话的徐州和北方官话的济南及其北叫骒马。

卷十七“方头”条：“俗谓不通时宜者为方头。陆鲁望诗云：‘头方不会王门事，尘土空缁白纻衣。’”按，此条源于宋赵令畤《侯鲭录》卷八。罗隐《堠子》“只是恨头方”，宋苏辙《唐相二绝》之一：“已得惠妃欢喜见，方头笑杀曲江去。”吕南公《寄邓师厚》“方头言论易乖违”，皆

强项、耿直之意，故吴越诗人陆、罗喜用之。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七“方头”条：“今人言不通时宜而无顾忌者曰方头。……今读陆鲁望《苦雨》之诗，又曰：‘有头强方心强直，撑住颓风不量力。’……方头亦是好称。”至元明时变成贬义，观陶、郎释义可知。元曲中亦用，见《绯衣梦》、《冤家债主》。“方头”一词后在吴方言中似已不存。光绪《杭州府志》：“言人不通时宜者曰方头……按以上谚语昔有今无。”今似只有近义词，如松江的“硬头颈”，指坚持歪理，有贬义。

卷七“咸杬子”条：“今人以米汤和入盐草灰以团鸭卵，谓曰咸杬子。按《齐民要术》，用杬木皮淹渍，故名之，若作圆字写，则误矣。”按，晋左思《吴都赋》刘注：“豫章有之(指杬)”。《齐民要术》卷六述及咸杬子，注：“吴中多作者。”宋洪迈(波阳人)《容斋续笔》卷十六“咸杬子”条：“今吾乡处处有此”，“至藏鸭卵，则又以染其外，使若赭色云。”杨万里(吉安人)《野店》：“深红杬子轻红鲊，难得江西风味美。”从《辍耕录》可知，元时吴人腌咸蛋并不以杬木皮，故多写作“咸圆子”，陶氏考证词源而特为正之。今似已不存。现松江人以盐、稻草灰、烧酒加少量水，叫腌咸蛋，云和叫咸蛋罐。

卷十七“传席”条：“今人家娶妇，舆轿迎至大门，则传席以人，弗令履地，然唐人已尔。……”此条源于宋龚颐正(遂昌人)《芥隐笔记》“转席”条。清初金埴(绍兴人)《巾箱说》引陶文后曰：“今吾越彩舆将迎之时，其兄若弟一人，于闺中抱之而升，迨至门，则自中堂及室，步致花烛，铺列一带红毡，转辗更番以达于新妇之居。……杭俗不以毡，而用米袋，名曰传袋，又曰袋袋相传。”清初王棠《知新录》卷三二“传代”条云：“令新妇步袋上，谓传袋，代袋同音也。”光绪《镇海县志》收“传代”一词，引《知新录》。是则《辍耕录》所记者为吴越习俗，“传席”、“传代”至清代犹存。宁波农村解放前尚存“传代”。天台二词皆有。

卷六“奴材”条：“世之鄙人之不肖者为奴材。郭子仪曰：子仪诸子，皆奴材也。”按，所引郭语见赵璘《因话录》卷二。“奴才”一词，古籍常见，如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北史·尔朱荣传》等；近现代小说、戏曲中也常见，如《儒林外史》第二七回：“倒运的奴才，没福气的奴才。”当是通语词，然吴方言中也常用，如咸丰《鄞县志》、民国十五

年《象山县志》皆收有此词。

卷八“汉子”条:“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按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按,此条源于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陶宗仪所举第一例即为陆书原有,但新增一例。唐人用例如寒山《诗》之二五三:“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由“汉”构成的表人的词如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六“举贤”中的“好汉”,《辍耕录》卷一“大汉”条中的“大汉”都是褒义,而陆游与陶宗仪都明言在他们的时代“汉子”有贬义,元曲《墙头马上》、《鸳鸯被》亦然,大概是词尾“子”的缘故。光绪《杭州府志》:“贱丈夫曰汉子,……按以上谚语今多仍之。”嘉庆二十二年《东台县志》:“长工谓之汉子。”东台邻吴方言,旧社会长工地位低下。此词现似已不用。

卷十八“书手”条:“世称乡胥为书手,处处皆然。……盖唐时已有此名。”按,此条源自宋龚颐正《续释常谈》“书手”条,首二句为陶氏所加。唐元稹《同州奏均田状》:“又令里正、书手等傍为稳审。”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支诺皋中》:“其案下书手蒋古者,忽心痛暴卒。”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开成四年二月廿日:“但得廿日雇廿书手写文疏等。”朗瑛《七修类稿》卷四十四“俞鸣玉”条:“钱唐俞衡,……弘治初,投身入镇守府,为私房书手。”民国十八年《金山县志》:“称乡胥为书手。”时代变迁,今此词无闻。

还有些条目,如卷十二“乞求”条:“世之曰乞求,盖谓正欲若是也。然唐时已有此言。”卷十七“改常”条:“今人谓易其所守者为改常。”卷十九“庞居士”条:“世斥贪利之人,必曰:‘汝便是庞居士矣。’”等,就笔者见闻,后世文献及今语似难以证为吴方言词或在吴方言区常用之词,故不具论。

以下诸条,陶宗仪未明言是吴方言词语,也无“俗曰”、“今人谓”之类领起,但从元明载籍、清代地方志及现代吴方言推测,可能是吴方言词语或在吴方言区通用的词语。

卷十一“夜航船”条:“凡篙师于城埠市镇人烟凑集去处,招聚客旅装载夜行者,谓之夜航船,太平之时在处有之。”此条源于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四:“夜航船,惟浙西有之。……”《能改斋漫录》卷七“夜航船”条述略同。唐代已见记载,如皮日休、韦庄诗。元郭畀《客

杭日记》:“九月十六日晴,晚趁吕城夜班,作钱唐之行。”明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述海虞吴讷曰:“记得《韵府群玉》秀才,犹如趁夜航船听人说话者。”《二刻拍案惊奇》卷六:“趁着西兴夜航到得绍兴。”清袁枚《续子不语》卷六《夜航船二则》:“杭州夜航船,夜行百里,男女杂沓。”今人朱自清《航船中的文明》:“第一次乘夜航船,从绍兴府桥到西兴渡口。”阿英《夜航小引》:“夜航船是昼伏夜行的。”无锡人陈瘦竹老先生云:“小火轮之前有夜航船。”黄岩尤伯翔老先生云:“解放前黄岩至临海、海门有夜航船,夜里开的木船。”陆学海同志提供了一则有趣的语言事实:现由苏州(17:30始发)至杭州,吴江县城(晚七八点发)至平望(镇名)的机动火轮,当地人叫“夜航船”,也叫“夜航班”。

卷八“阿谁”条:“阿谁二字,见三国志庞统传。”按,此条抄自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九“俗语皆有所本”条,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四“谚语始”条亦抄录,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阿谁”条已早述及。“阿谁”本为前代通语词,如汉乐府诗《十五从军征》、《百喻经·妇诈称死喻》、《晋书·沈充传》、刘竦《隋唐嘉话》下、王梵志《借物索不得》诗中均有。大概宋元以后,“阿”只存于吴方言等南方方言中,所以吴、王、陶、郎等南方人都对“阿谁”这个俗语感兴趣。明黄尊素《说略》:“有掌科过孟尝处士处,题壁云:‘说甚么鸡鸣,说甚么狗盗,于今亦有虎狼秦,阿谁共走函关道。’”洪升(杭州人)《长生殿·定情》:“借问从此宫中阿谁第一?”宋代“阿某”常见,如《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阿区以一妇人,三易其夫。”地方志中,嘉庆《松江府志》:“小名冠以阿。”光绪《青浦县志》有“阿爹”、“阿伯”等,范寅《越谚剩言》中有“阿大”、“阿三”、“阿五”、“阿六”等。但未见载“阿谁”一词。今松江、苏州有“阿大”、“阿二”、“阿猫”、“阿狗”,小名如“阿芳”等,但无“阿谁”,“阿”亦不能置于姓氏前。天台有“阿爹”、“阿伯”,无“阿谁”。

卷十一“分疏”条:“人之自辨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疏。疏,平声。《汉书·袁盎传》‘不以亲为解’,颜师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矣。’《北齐书·祖珽传》: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领军,并与广宁王交结。珽亦见帝,令引入。自分疏。”按,此条实抄自《宾退录》卷三:“世俗谓自辨解曰‘分疏平’。(引例同,略)则北朝暨唐已有是言也。”唐张鷟《游仙窟》:“娘子莫分疏。兔入狗突里,知复欲何如。”敦煌变文《燕子

赋》："雀儿语燕子，何用苦分疏？"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二："许公他日有会，乃谓顾曰：'阁下何太谈谤？'顾乃分疏。因指同席数人为证。"据云今东阳尚有此词。

卷十八"宣发"条："人之年壮而发斑白者，俗曰算发，以为心多思虑所致。盖发乃血之余，心主血，血为心役，不能上荫乎发也。然《本草》云：芜菁子压油涂头，能变蒜发，则亦可作蒜。《易·说卦》：'巽，为寡发。'陆德明曰：'寡，本作宣，黑白杂为宣发。'据此，则当用宣字为是。"按，此条实本宋张淏《云谷杂记》（张宗祥校录本）补编卷二"蒜发"条。[①] 洪迈《容斋随笔》卷六"宣发"条亦曾论及。《北齐书·慕容绍宗传》："吾自年二十已还，恒有蒜发，昨来蒜发忽然自尽。"方以智《通雅》卷十八："宣发，蒜发也。升庵曰：'宣读第三声为蒜，今少年白发曰蒜发。徐文长则谓'劳心计算则发易白，曰算发'。"章炳麟《新方言·释形体》："淮西、淮南、吴、越谓黑中有一二茎白者为宣发。"光绪《镇海县志》引清初姜宸英《湛园札记》"人头发早白谓之蒜发，即宣发之讹也。"张淏，侨居婺州（今金华），姜宸英，慈溪人，还有陶宗仪，他们都将"宣发"、"蒜发（算发）"列为专条，可见吴方言中有此词。民国《定海县志》、《象山县志》皆收此词。今东阳有，而松江、黄岩无。

卷十"不中用"条："不中用，不可用也。"其前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九："俗语皆有所本，如不中用出史记外戚世家、王尊传。"此自古及今当为通语中词语。近代用例如元盍西村小令《小桃红》："古今荣辱转头空，都是相般弄，我道虚名不中用。"清初李玉（苏州人）《清忠谱》："就把辱骂神象为题么？不中用。"吴方言区地方志常载此词：乾隆《吴门补乘》"言人无用曰不中用。"光绪《宝山县志》："不中用，俗语不堪用。"咸丰《鄞县志》、民国《象山县志》及范寅《越谚剩言》皆收此词。今吴方言中普遍有之，但杭州、绍兴、云和说"无用"。松江主要说"没用"，也说"没用场"。苏州说"勿中用"。

卷八"不耐烦"条："不耐烦三字，见宋书庾登之弟仲文传。"按，此条抄自《宾退录》卷七，行文更数字而已。《宋书·庾炳之传》："炳之为人，强急而不耐烦。"刘希夷《秋日题汝阳潭壁》："幽人不耐烦，振杖闲

① 陶珽《说郛》以"蒜发"等二十五条别标名东斋记事，署宋许观撰。

步寂。”《古今小说》卷一：“主人家小厮，伏侍得不耐烦。”《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二：“公子连押字也不耐烦了。”范寅《越谚剩言》收此词。嘉庆《松江府志》：“谓惮烦曰不耐烦。”光绪《杭州府志》：“谓心不悦意曰不耐烦。”等等。此乃吴方言的通用词，绍兴话说“勿耐烦”、松江话说“讨厌”（或加“煞”、“煞哉”）、“烦煞”（或加“哉”）。

卷六“发膱”条：“妇人头发有时为膏泽所黏，必沐乃解者，谓之膱。按《考工记·弓人》注云：‘膱，亦黏也。音职。’则发膱之膱，正当用此字。”此条抄自《老学庵笔记》卷十，惟书证与诠解相倒而已。毛奇龄《越语肯綮录》：“《周礼》注：今人头发有脂膏者谓之膱，音职。今越人亦有称发腻为发膱者，《广韵》作昵，又作䐈，音同。”乾隆《象山县志》：“妇女发为膏泽所黏谓之膱。”道光、民国《象山县志》、乾隆《震泽县志》、道光《苏州府志》、民国《吴江县志》并同。今人蒋礼鸿先生《义府续貂》：“今嘉兴谓黏为膱，如云黏膱膱，音为致。”

卷八“关节梯媒”条引唐苏鹗《杜阳杂编》云，唐时元载宠姬薛瑶英与其父、母、兄及吏卓倩勾结，恃载权势，“以搆贿赂，号为关节”，天下求官者“指薛、卓为梯媒”，又引李肇《国史补》、牛轲《牛羊日历》，“以此推之，则谚所谓‘打关节，有梯媒’者，不为无祖矣。”按，陶以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已有“关节”条。“梯媒”亦唐代通语，如李商隐《为东川崔从事谢辟及聘钱启》“某早辱梯媒”，杜荀鹤《投江上崔尚书》“仰天无处认梯媒”等。《辍耕录》特别记载了“打关节有梯媒”是元代俗谚。《辍耕录》卷二八“非程文”条：“柯理以梯媒而得中，对策何长?”元徐元瑞《吏学指南》“赃私”：“关节。《漫录》曰：‘下之所以通款曲于上者，曰关节。’又《唐摭言》云：‘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汉曰关说。”元剧《谢天香》二“贺新郎”白：“怎么在我行打关节那?”明徐充《暖姝由笔》：“今人求贵宦关节者，谓之钻人情。”《二刻拍案惊奇》卷四：“张廪生世事熟透，便寻个巡道梯已过龙之人与他暗地打个关节。”今杭州话叫“打关节”，云和话叫“赖（音）关节”。

卷二九“井珠”条：“人欲娶妻而未得，谓之寻河觅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谓之担雪填井；男婚女嫁，财礼奁具，种种不可缺，谓之投河奔井。凡纳婢仆，初来时，曰擂盘珠，曰不拨自动。稍久，曰算盘珠，言拨之则动；既久，曰佛顶珠，言终日凝然，虽拨亦不动。此虽俗谚，实

切事情。”按，“担雪填井”乃是俗语，如顾况《行路难》：“君不见担雪塞井徒用力”。“算盘珠”亦是常用之喻。明郎瑛(杭州人)《七修类稿》卷四十九“谚语至理”条：“未娶时，越河跳井。既娶，则担雪填井。娶久多生，不能养育，则投河奔井。此言虽戏，皆深致于理也。”无锡陈瘦竹老先生云，《辍耕录》河井一段未曾听说，而算盘珠一段则尝闻，唯“擂盘珠”为“走盘珠”。

卷十一“阿癐癐”条：“淮人寇江南日，于临阵之际，齐声大喊阿癐癐，以助军威。”引张鷟《朝野佥载》郭胜静被打呼痛，口唱阿癐癐。按，考之文献：《古今小说》卷十三入话诗：“但闻白日升天去，不见青天走下来。有朝一日天破了，人家都叫阿癐癐。”“这四句诗，乃国朝唐解元所作。”清胡文英《吴下方言考》卷四：“阿癐癐(下音回)：吴中凡孩稚作痛声曰阿癐癐。”今或表示惊奇，今音 aʔ ɦue ɦue。看来此为吴方言词。然陶宗仪所云：“淮人寇江南”，系指在淮南起事的张士诚率部南下取平江事，今苏北之泰州话，扬州话也有此词，音 a˺ io˺ ꜀ue，如写成汉字，似作“阿哟癐”痛楚声或表惊讶，可见陶说渊源有自。

以上对《辍耕录》的四十多条所涉及的近六十个吴方言词语，征引文献记载，依据近年调查作了疏证、阐述。我们还应从语言史的角度观察这些词语的变化发展。

有些在宋元时代是通语词，但当时吴方言中也常用，如“娘”、“老娘”、“奴才”、“汉子”、“不中用”等。有些本是通语词，后来进入了吴方言，而保存于其中，如“温暾”、“拗”、“鏖糟”、“花娘”、“点心”、“利市”、“关节”等。有些词是吴方言与别的方言均有的，如“长年”是川峡与东南海壖皆有的，“咸杬子”是江西方言和吴方言皆有的(但至元时，吴方言区一般人已不知其词源)。“阿瘖瘖”为淮人和江南人共有。有的是道地老吴方言词，如“夜航船”(吴越水乡使然)、“火寸”、“焠儿”、“师娘”、“方头”、“蒜发”、“发脂”等。有的是吴方言词，后来进入了通语，如“丫头”、“梢当”。个别吴方言词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而“输出”至当时在江浙活动的苗军中，即“夫娘”。这是从吴方言与通语及其他方言(或语言)的关系而言。

如果研究其存在与消失，那么直至今日还在吴方言的某些点或

很多点还保存和使用的词,如“长年”、“丫头”、“温暾”、“拗”、“师娘”、“婆娘”、“麼糟”、“不快”、“太公”、“经纪”、“暖屋”、“暖房”、“蒜发”、“发脑”、“关节”等,有意思的是千百年来“夜航船”都是木船,多数地区此词消失,但在个别地区,夜里开的机动客轮承袭了这个古老的名词。有的在行业语中消失,但在普通词汇中仍存,如“鎗”。有的让位于通语词,如“花娘”让位于“婊子”。有的词北移,如陶宗仪明确指出当时为西浙之词的“靸鞋”,后来换了另一说法“拖鞋”。陶宗仪明言“江南男觋曰师娘”,凌濛初之时则曰太保。有的词已经消失,如“方头”、“夫娘”、“阿谁”,“梯媒”、“大衣”;其中有的是由于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使然,如“焠儿”、“书手”、“传席”;有的将灭亡,如“老娘”,如今妇女都在医院生产,“袍”中年以下的人就没穿过,女子成年何须“上头”。然而说有易,说无难,笔者见闻有限,而吴方言范围如此之大,很可能上述有些词仍保存于某地。

根据《辍耕录》,结合古代典籍,可以发现有些词语由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变为名词的过程,如“客作”、“经纪”、“点心”。

陶宗仪记载了宋初杭州的“火寸”在他的时代叫“焠儿”,可视作杭州方言由吴方言儿尾词(或儿化韵)向具有官话式儿尾词变化的一项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总之,陶宗仪这位吴方言区的卓越学者记录下的丰富的吴方言语音和词汇现象,是汉语史上的宝贵资料,值得大力研究,本文只是一次尝试。所述所论必有谬误,敬希方家指正。

后　记

向笔者提供方言资料的吴方言区人士主要有下列先生:尤伯翔、王敬骝、孙家叙(以上黄岩),饶以和(云和人,长期在杭州工作),严伯广、严起翎(绍兴)、饶文倩(杭州)、汪维辉(宁波)、包忠文(东阳)、裴显生(天台)、陆学海(浙江人,长期在吴江工作),朱慧娟(苏州)、陈瘦竹、程曾厚(无锡),顾树兴、谈池平(松江),吴新雷(江阴)。除一人外,年龄都在五十至七十六岁间;除少数人外,多数是有高度文化者。饶以和、陆学海、王敬骝、饶文倩诸先生帮助尤多。某一名称有时甲知而乙不知,故文中往往特别指明被调查者。

王镆同志、祝鸿杰同志建议、鼓励笔者做词语的疏证工作，王镆同志多次惠寄大量资料。本文二稿曾得到杨耐思先生、宁继福同志赐阅。本文的写作始终得到周祖谟先生、唐作藩先生的鼓励，最后承王均先生审阅全稿，惠予教诲。统致衷心的谢意。

1985年12月六稿

此文原发表于《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主编为王均先生，商务印书馆，1988）。我于八十年代前几年穷尽地研究陶宗仪著作，发现其中论列吴方言的材料甚多，遂单独成此文，蒙王均先生赏识，此文得在《中国语言学报》发表。而《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著作与元代语言》延至1996年始发表，今夏整理时将其中与此文重复处尽量删去。

1996.12.8.

游汝杰先生《古文献所见吴语的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一文云："敝见以为'括定叶韵'的五十六字不一定反映当时松江音有此五十六韵。"详列四条理由。（见《桥本万太郎纪念中国语学论集》页248，东京内山书店，1997）

平田昌司《徽州方言研究》序

绝代有佳人，
幽居在空谷。

徽州方言这位绝代佳人千百年来一直深居在黄山幽谷里。

清代徽州及其周边地区曾涌现出数以百计的学者，名震海内，但只有少数几位音韵、训诂专家偶或引述自己的方言，多是一鳞半爪。[①] 纵有几本方言韵书，也流传不广，不足与闽方言的《戚林八音》、《汇音妙悟》比拟。徽州山区，重峦叠嶂，绝巘危崖，外人很难进入，也很少进入。徐霞客的足迹虽曾两至徽州，但只留下了"奇峰错列，众壑纵横"，"五色纷披，灿若图绣"的名句。曾国藩曾率军驻于祁门、休宁，幕僚文士如云，然而他们并不是著《岭外代答》的周去非，他们都没有留意方言。

到了二十世纪初年，现代科学的晨曦终于耀现在莲花峰上。徽州方言，其地理区域颇小，但是复杂的内部歧异，深厚的文化背景，却使它闻名遐迩，百年来多少优秀的语言学家为之竞折腰，这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罕有俦匹。首先是二十年代中期，从当时世界语言学中心巴黎留学归来的刘复博士在北大提倡"调查各地的方音"，"还希望按照法国语言地图的办法，编成一部方言地图"，指导一位徽州学生类辑方言同音字，[②] 于是后来有由魏建功先生完成的《黟县方音调查录》，这是嚆矢。三十年代赵元任、罗常培、杨时逢先生为实施中央研究院的徽州方言调查计划，从南京赴徽州调查，遗憾

---

① 段玉裁、王念孙、郝懿行、朱骏声诸家之著亦然，这是那个时代的学术风尚，还没有现代语言(及方言)描写的观念。

② 见魏建功等《黟县方音调查录》，载《国学季刊》第四卷第四期，1935 年。

的是罗先生只零星地公布了少量资料，而未及作全面整理。[①] 五十年代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方言普查，安徽省的语言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惜乎发表的成果不多。六十年代赵元任、杨时逢二先生的关于绩溪岭北方言的文章成了研究徽州方言的经典论文，诸家竞相征引，然而岭北只是徽州府的一村而已。张琨先生的《谈徽州方言的语音现象》旨在从总体上把握徽州方音，然而资料很少，张先生在文题前冠以“谈”字，自谦也，亦不得已也，这是“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去年李荣先生在《我国东南各省方言梗摄字的元音》一文中还呼吁道：“希望徽州方言有更多的详细报告发表。”[②] 可见学界期望之殷切。

中国大陆经过十年“文革”浩劫后，好不容易迎来了学术研究的复苏，近二十年来徽州方言再度引发若干学者的重视，相继发表了一些文章，但是逐鹿群雄中成绩最大者，当推平田昌司先生，他的多篇论文，特别是他主编的这本《徽州方言研究》便是最好的证明。徽州方言这位绝代佳人终于显现了她的芳容。一个世纪以来多少学人企盼、追求，终于由平田昌司先生为首的一班少壮派精英了了世纪愿，圆了世纪梦！

如今中国好多出版社正在推出涵盖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的总结性的书，有的已捷足先出，不过我禁不住要喝一声：“且慢！”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史、中国方言学史，若是缺少对《徽州方言研究》的评介，是难以辞其咎的。因为此书是徽州府六县七点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的首次全面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总结，仅凭这一点，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桥本万太郎先生说过：“汉语的发展在东亚大陆有几千年的比较稳定的历史。所以现在我们从东北到岭南能够发现渐变的语言构造的类型推移。世界上没有一个别的语言能提供给语言学家这么大规

① 关于赵、罗的徽州之行，见赵元任《绩溪岭北音系》，又见罗常培《自传》：“调查了徽州六县四十六单位的方言。”罗常培《我是如何走上研究语言学之路的》：“第四本书是《徽州方言调查》，共调查了六个县四十六个点的材料，稿子尚未整理。”见《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14页、432页。

② 见《方言》1996年第1期。

模的、这么丰富的类型的推移的资料。”① 是的,汉语各方言都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徽州方言自是其中的佼佼者。汉语方言,特别是南方方言,分布极为复杂,而徽州方言区占地不足13 000平方公里,使用人口仅176万左右,但是两千年的发展使得徽州方言呈现出纷纭多彩、歧异复杂的面貌。在这本《徽州方言研究》里,绩溪、歙县、屯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等七个点(按,特立“屯溪”一点,与六县并列,是创见,亦是高见)都报告了方音、词汇、语法,尤以方音为密,方音下大多分七或八栏叙述,堪称周详。我们以前在各刊物上看到的某些方言学文章只有声韵调表或音节表,那是难以展现方音面貌的,读者也难以利用。赵元任、杨时逢二先生的《绩溪岭北方言》,虽有同音字表,而收字不多,难惬人意。此书有七个点的比较详细的同音字表,那是会令学人额手称庆的,必争相引用。因为不是某一点的单刊,所以不再专列“与普通话的比较”、“与古音的比较”这样的章节,而是以“音韵特点”概括之,如此可收到执简驭繁、提要钩玄的作用,这一节颇具特色,是各个著者研究的心得,所以各自多所申述阐发,高论迭见,不乏思想的闪光。

读者如将此书的绩溪、休宁两部分与其著者在《方言》杂志上早先发表的论文作一比较,可见更改非少,他们精益求精的精神,认真严谨的态度,能不令人叹服?我认为语言描写尤其是方言描写的生命在于“精确”,它不像古籍的钩稽与考证,作者看到的书,读者也多能看到,作者的疏漏以致硬伤,认真的读者自能发现。而大多数方言特别是偏僻地点的方言,读者哪有条件核查?因学风不正或水平不高而造成的错误描写,如被引用,甚至据以搭建理论,岂非以讹传讹?罪过罪过!近年来,每当看见或听到某些论著是为某种功利目的而赶出来的,我不免心怀疑惧,古谚说得好:“急趋无好步。”而这本《徽州方言研究》却是“慢工出细货”,经得起推敲和检验。

全书冠以“概说”一章,这一章最重要。读了此章,对徽州方言的形成、概貌特别是共同特点和内部差异就会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这

① 桥本万太郎《现代吴语的类型学》,《方言》1979年第3期。

一章是建筑在七点方言研究的牢固基础上的巨厦，是理论上的总结和升华。“徽州方言和严州方言”一节文虽不长，而内涵颇丰，立足徽州方言，旁涉严州方言、吴方言等，参伍比较，材料丰赡，议论深切，是为卓见，乃当今方言学的新成果，值得重视。

还令人佩服的是该书对徽州及其方言的历史、研究史的材料的钩稽，就此点而言，我所见的上百种方言专书，无出其右。当今学术分工的过细，也无庸讳言，当代专家学养的不足，造成这样一种普遍现象：重今者常常忽于古，考古者往往昧于今。平田昌司先生却十分重视将今古贯通，因为他是京都学派的传衣人之一，当行出色。众所周知，京都学派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国古籍的整理有着悠久而光辉的传统。

徽州方言很为繁杂，学界亟盼睹其全貌，因此更负盛名。若以一人之力调查研究，则旷日持久，河清何日？若有一位高见卓识、且具组织能力的学术带头人挂帅，组织一班志同道合的专家分头调查，相互切磋，众擎则易举。这本《徽州方言研究》可以说是集体创作的范例。七个点的五位作者都是风华正茂、成果累累的汉语方言专家，如冯爱珍先生之于闽方言，刘丹青先生之于北部吴语与南京方言，木津祐子先生之于浙江吴语都有很多论著，赵日新先生本人就是绩溪人氏，八年前就发表过绩溪方音的专文。多次参与调查、研究、讨论、编辑的曹志耘教授对浙南吴语、严州方言、山东方言的研究蜚声海内外，刘祥柏先生对于方言语法，谢留文先生对于客、赣语，都有精到的研究。以上诸位专家“皆一时之选也”，和衷共济，众志成城，终于在世纪末著成了这本城砖式的专著。这种集体创作的范式值得在学术界尤其是方言学界推广。

这本专著的出版无疑是徽州方言研究史上的大事，但是徽州方言的研究是个跨世纪的工程，平田先生今年七月给我的信中说：“完成各县城、市区部分后，还要进行乡镇部分的调查。”他和曹志耘等先生主持的“新安江流域语言文化调查研究计划”将继续实施。何等振奋人心！请看《国外语言学》杂志今年第三期《注意语言事实的描写——〈语言〉杂志征求语言描写报告》，该文云：“对语言与语言用法进行描写，是描写语言学的一项中心任务。关于人类

语言能力、交流信息能力、语言历史的更高层次的概括，无不依赖于语言描写。又因为多种多样的语言现象正在急剧减少，语言描写更加迫在眉睫。”本月初我的朋友汪维辉的十岁的儿子由宁波转来南京上小学，我担心小孩不会说普通话，但汪先生的答话是：“小孩们在学校里，连打打闹闹都说普通话，他们的方言不行了，宁波话变了样了。”我惊得几乎要高呼：“抢救方言！”我要敦促平田昌司、曹志耘等先生，赶紧到新安江去！记得多年前读裴特生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① 上一世纪的某些欧洲学者为一种语言或一专题竟能写出多卷本的巨著，我佩服不已。西方学者能做到的，东方学者一定也能做到，在此我预祝新安江流域语言与文化的系列丛书不断问世。

今年五月七日平田昌司先生来信说：“您和徽州的缘分很不浅”，因此他和全体合作的专家要我写个序。我没有推辞，原因就在他这句“缘分不浅”的话。以前我读过唐孟棨《本事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清厉鹗《宋诗纪事》，直至今人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纪事》、王文才的《元曲纪事》，每每慨叹学术史上却缺少这种类型的著作，诸位专家既然命我写序，我想应该把我所知道关于如何成就这本书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以备他日好事者采摭入《二十世纪方言学纪事》。

先从我与徽州的“缘分”说起。我是江苏泰州人，小时候就知道，街上有徽州人开的茶叶店，而且已历数世，“子孙遂家焉”②。在大学三年级，袁家骅先生的方言学课深深地吸引了我，讲到徽州方

① 此书有钱晋华女士（袁家骅先生夫人）的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58年。多年前朱德熙先生令我兼读英文本，我发现英文本好几处述及俄国扩张的语句，中文本皆无译，当是出版社避触时忌删去，此可为治中国校勘史、翻译史、出版史、文化史的学者添一资料，故赘此数语。

② 泰州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俞扬先生应我之请来信述及历代由徽州及其附近迁入泰州的大姓，摘要如下：宋初许姓由黟县、査姓由休宁迁入泰州。明中叶纪姓由歙县迁泰州。万历八年叶姓（盐商）由歙县迁扬州，再迁泰州。吴姓于明代由新安迁泰州。清初程姓由休宁迁江都，又迁泰州。另一程姓由休宁直接迁泰州。清初汪姓由旌德迁泰，洪姓（茶商）由歙县迁来。康熙时吕姓由新安迁来。乾隆时吴姓由休宁迁高邮，再迁泰州。咸丰时又有洪姓由皖南迁姜堰，再迁泰州城。清代姚姓（经营香业）由旌德迁泰州，胡姓由皖南迁泰州，二者入迁具体时代均不详。又，清代及民初泰州有新安会馆（今体育场附近）、旌德会馆（可能在今五一路，大林桥西）。按，绩溪胡氏约于清季迁入泰州，子孙遂家焉，其后裔某某近大显于国。

言时，他说，徽州方言学术价值很高，其所以如此复杂，可能有山越人语言的底层。“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我做研究生的时候，迷恋于通泰方言史的研究，同时对徽州方言也产生兴趣，请孙文光同学帮助索得合肥师院编的徽州几个点的方言音系，油印本，有详细的同音字表。不久，“文化大革命”发生，偷偷地看一点古书念一点外文都要挨批，更哪敢明目张胆地去研究方言？星移斗转，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一九七九年秋昌司来到南京大学进修，他的聪颖、勤奋、朴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举一例，结业时他用准确而流利的汉语讲“切韵音系的研究”专题，两次，每次两个多小时，听讲的中国师生赞不绝口。他来校不久，即欣然愿意研究徽州方言，这使我非常激动，我知道他能做这个课题，我相信他能做好这个课题。他是京都学派研究现代汉语方言的第一人，他一直以徽州方言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锲而不舍，于今十九年矣。我曾与他三下徽州，协助他做些工作，他的刻苦，我所深知，休宁人也有口皆碑，子夜以后他的工作室仍旧泛出灯光，县委办公室主任说他是休宁县睡得最迟的一个人。县外办胡名丽同志某次来宁时曾对我说，这十几年休宁县知识竞赛总有一道题：“第一个到休宁来的外国人是谁?”他从东瀛西赴徽州总有八次之多，他和他的同志们多次在徽州各县调查，聚会讨论，为了让我分享喜悦，每次都给我来电话或书信。记得有次他说，他和木津祐子及建筑学家沟口正人先生到了白岳齐云山，准备调查民居文化及方言，为漫山的红桃花和遍野的黄菜花所陶醉，他的喜悦而激动的声音使我神驰方腊洞和戴东原墓所在的九山头。十九年来，从独自撰述到组织一班同志集体攻关，从筹措经费到笔削成书，辛苦备尝，如果没有殉道的精神，没有坚韧的毅力，不可能“有志者事竟成”！这本《徽州方言研究》就是“事竟成”的标志。

我相信这本书一旦出版，必定成为徽州方言的经典著作，必定在学术界不断引起反响。我由于缘分不浅，也是福分不浅，成了第一个读者，拜读定稿之后，有所思考，作为第一个“反响”，现在简述一下我的读后感。我曾经写过《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及《客、赣、

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① 都提到徽州方言与客、赣、通泰三方言有“血缘”关系,共同形成对吴、闽方言的包围圈,但对徽州方言,因欠于资料,所知有限,不敢多言,如今读了《徽州方言研究》,我越发相信徽州方言和我的母方言通泰方言神合之处颇多。乍听起来,一居黄山,一濒黄海,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是请听我仔细道来。一位将军的眼睛总是盯住作战地图,一个方言学者的脑海总要浮现方言地图,通泰方言与徽州方言都背负江淮官话,面对吴语,它们处于东西两翼,成犄角之势。我曾经根据古史考证,提出吴语本北抵淮河,今通泰地区原是吴地。② 现在据《徽州方言研究》“概说”章可知,在东汉时,班固、许慎称新安江流域为“南蛮夷”地区,吴晋之时,吴语当伸展到这一山区。四世纪永嘉之乱使得大批中原流人涌过淮河,侨居于长江中下游两岸,自此北方话迅速入据江淮之间,并由长江南岸地区进而逐渐渗进皖南山区,今日的通泰方言和徽州方言的神似当是渊源有自的,兹述三点如下:

第一、跟吴方言保留全浊声母不同,在通泰方言与徽州方言,全浊声母都清化,而且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都送气,只有少数点例外。对于这种例外,我曾试作解释,③ 此处不赘,当然还有待深入研究。但就总体而言,这两个方言在较早的某个时期全浊声母都清化送气的说法当是能成立的。

第二、古平上去入四声因声母的清浊而产生分化,在通泰和徽州,如果某一点方言在某一声存在阴调和阳调对立的话,总是阳调的调值高于阴调,吴语正反是:两军壁垒分明。先说阳平高于阴平,通泰的所有点及徽州的绩溪、歙县、黟县、祁门皆然,只有婺源例外。再谈阳入比阴入高,二区无例外。通泰方言无阴阳上的对立,徽州下列点的阳上与阴上的调值是:屯溪24:32,休宁 13(据休宁节“说明”实际调值接近 24):31,婺源 31:2。最后,关于阳去和阴去调值的高低

---

① 前文著于 1961—1964 年,发表于东京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アジア·アフリカ語の計數研究》第三十号(1988 年 3 月),后文写于 1991 年,载于《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 年 8 月)和《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 年)。

② 见上二文。

③ 见拙文《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

问题得加点讨论。徽州阳去和阴去的调值是：歙县 33:313，祁门33:213，婺源 51（据婺源节“说明”应是 41）:35，婺源江湾镇55:214，[①] 绩溪 22:35。至于通泰方言，西部和中部的泰州、东台、大丰、海安、泰兴、如皋六点古浊去连同古全浊上字并入阴平，西北的兴化和东部的如东、南通、通州有阳去与阴去的对立，阳去调值较低，但值得注意的是，其调值近似阴平，[②] 可见趋于西中部的归并模式，英雄末路，非复昔日之盛了。

如将上述第一点、第二点联系起来观察，这都跟“祖方言”的浊声母特质有关，我曾推测它们的祖语即南朝通语的浊塞音、浊塞擦音是送气的。[③] 著名的南北朝语音史专家蒋希文老先生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九日赐函云：“‘南朝通语浊塞音、浊塞擦音是送气的。’的确如此，六朝经师为经籍注音，很多切语都反映了这种现象，稍暇当走书相告。”

第三、吴语连调规律复杂，徽州、通泰二方言则简单，如泰州几乎没有什么变调。

还有两个问题，我想在此提出，一并就教于《徽州方言研究》的诸位作者及海内外方家：

一、古全浊去（及全浊上）如果不独立为阳去的话，则并入阴平，在通泰，多数点既成事实，少数点大势所趋，徽州之屯溪、休宁两点亦然，[④] 甚至客家话也有部分古全浊上混同阴平，这是偶合呢，还是某种内在机制造成的类同呢？“冥冥之中若有主宰焉”。

二、阴声韵蟹效流摄的韵母多为单元音，阳声韵尤其是古侈音（按，这里借用清儒的弇侈概念）的咸山宕江摄多无鼻音尾，或主元音鼻化，徽州方言如此，通泰方言如此（南通尤突出），这一点吴方言亦然。是同源的特点吗？如果不是，那么谁影响了谁？吴方言历史悠久，所在地区人口众多，文化发达，所以多以为吴方言影响了通泰和徽州二方言。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永嘉之乱迫使北人大量南

① 见叶祥苓《赣东北方言的特点》，《方言》1986 年第 2 期。
② 见《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第 20、21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年。
③ 见拙文《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
④ 见平田昌司主编《徽州方言研究》第 87 页。

徙，从晋宋侨州郡的建制可见北人挺进至今丹阳、武进、常熟地域，逼进今无锡。历史学家指出，有一批北方士族绕过吴人势力强固的今苏州、宜兴地区而去今浙东绍兴开发新区。现代北部吴语，地域广，一致性强，与浙南吴语相较，带上了相当的北方话色彩，看来不是没有缘由的。再看蟹效流摄的韵母，今浙南吴语有若干点是复元音，而非单元音，也似应值得注意。学界往往从共时，从南向北看，把通泰方言以至江淮方言看作过渡性方言；我则异于是，从历时，从北向南看上述的涵盖几个方言的"区域性特征"，这也许是我这个"北人"的立场所致。

以上是想入非非，不值一哂。

郑张尚芳先生是温州人，他从东南的浙南吴语的角度看徽州方言，举出了二者的很多共同点；[①] 我是泰州人，从东北的通泰方言兼从考古的角度看徽州方言，提出了几点看法和问题，算是对郑张先生的补充。我们都是从自己看徽语，越看越像，越看越爱，大概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我以为，我二人之见离之则两伤，合之则双美，美可美到《徽州方言研究》结论的高水平，这结论是，徽州方言是一种混合性方言。

在我刚刚步入老年之时，昌司说我"跟徽州的缘分很不浅"，一句话过早地激发了我的老年综合症，一是絮语难休，二是固执己见，三是怀旧益甚。说到怀旧，我脑际屏幕清晰地现出一组画面：一九八一年四月下旬的某日，在黄山北海，昌司和我观罢日出后，到了排云亭，席地而坐，背负百尺峰，俯看千寻谷。不久，谷底稀疏的树影由清楚而稍模糊，原来淡云缕缕露现，俄而冉冉上腾，渐渐漫满深谷下部，越漫越浓，且复姗姗跻升，片刻工夫直欲迫近足下，不意仙境迎我若是！我看呆了。忽然微侧过头来看昌司，只见他上身前倾，双眼直勾勾，一脸痴迷迷，我轻轻地问："你在想什么?"只听得慢悠悠的答语："我想跳下去。"

有分教，这一念，八渡黄海，黄山山谷觅知音；众七星，再聚北斗，北京京郊成伟著。后一句怎地解释？七月昌司来信告诉我，八月要

① 郑张先生也指出徽语声母系统与赣语接近。平田之"前言"已引，不赘。

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召开《徽州方言研究》定稿会议，我素依北斗望京华，欣闻佳讯，忽地联想到《水浒》的天垂星象东溪村，“七宿光芒动紫微”。只是这千年后的北斗中有两位是东京人氏，[①] 其一乃托塔天王是也。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于颜之推萧该故里

附记：

1. 平田昌司先生见拙序后说：“愧不敢受！”我答道：“‘纪事’内容我不写，没人写了；非纪事内容，也是实事求是。我只怕挂少漏多。”

2.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我今斗胆妄作引申，“道以文载”，语言学之道若以文载，则可行远，故试写了《“布文”辨识本末及其他》、《话说江苏语言学家》，又酝酿五月，草成此文。然心有余而才不足，可叹！

本文载于《徽州方言研究》（平田昌司主编，日本东京好文出版社，1998），又载于《学术集林》卷十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页293—305。

① 典有古今之分，用今典者莫如魏武（155—220），作诗云：“郑康成（127—200）行酒，伏地气绝。”千载之后，书生效颦：忆去年《扬子晚报》载纪实短文一则云，某青年纵论《水浒》：“武松如果不去日本，武大郎不会被毒死。”我现倒用今典。又，此处云“七”者，概数也。

词典史上的一座丰碑

——祝贺41卷本《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出版

方言,在远古时期就已存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杰出学者颜之推(531—590后)在其名著《颜氏家训》里说:“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现代中国幅员辽阔,在广大的官话方言区,北起满洲里,南至昆明,相互通话没有困难;而在云贵高原以东,长江以南的区域内方言分歧复杂。中国有重视方言调查研究的传统,相传周代即已有搜集歌谣和调查方言的举措。西汉末著名学者、文学家扬雄(前53—后18)在长安向晋京的外地人士调查方言,历时27载,成《方言》十五卷,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比较方言语汇集,被誉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此后十六国时期(304—439)敦煌人刘昞著《方言》三卷,南宋前人王浩撰《方言》十四卷,惜乎不传。明清以来不少地方志都立“方言”卷,记录了很多方言词语。本世纪二十年代,现代方言学兴起,重点在方音的调查。建国后不久的大规模的方言普查大大地推进了方言学的发展,然而“文革”的长期动乱使整个学术研究完全停顿。可堪庆幸的是,近二十年汉语方言学得到了蓬勃发展,终于在九十年代诞生了这套41卷本《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套分卷本词典的出版是我国优良的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国运中兴的体现。

这项重大工程1988年开始酝酿。1991年初正式启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六十位专家奋战十年,由全国优秀出版社之一的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终于在1998年底将41册分地词典付梓出齐。在这套分卷本词典里,各大方言甚至次方言都有自己的代表点分卷:哈尔滨、济南、牟平、徐州、洛阳、西安、万荣、银川、西宁、乌鲁木齐、成都、贵阳、柳州、武汉、南京、扬州(官话方言区),太原、忻州(晋语),丹阳、崇明、苏州、上海、杭州、宁波、金华、温州(吴

语)，南昌、黎川、萍乡(赣语)，长沙、娄底(湘语)，建瓯、福州、厦门、雷州、海口(闽语)，广州、东莞(粤语)，梅县、于都(客家话)，南宁(平话)。这41本总字数约2200万字，累计厚度达113厘米，这是我国语文词典史上的一座丰碑。

编纂、出版这部方言大词典是积无量功德的善举。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1767—1835)《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说："语言就其真实的本质来看，是某种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的事物。"方言亦然，是不能像古建筑、古器物那样可以固定下来，保护起来的，尤其近年在中国，由于经济发展迅速，人员交往频仍，通语大力推广，汉语方言变化的速度大大加快。美国语言学会的《语言》杂志1996年第3期发表编辑部的一篇征稿文章指出，由于多种多样的世界语言继续以惊人的速度日益减少，描写语言，把重要而罕见的语言特点记录下来并形成文献，这种需要越来越紧迫。如今中国已经站在现代化的门槛之上，早在十年前，我国的语言学家和出版家就充分意识到，全面调查、记录现代化前的反映千百年来文化积淀的方言事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这一代语言学人必须承担起这一历史任务，也只有我们这一代学人才能承担！利在当代，功存千秋。这部41卷本《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正表现了这一代方言学者和出版家的勇气、毅力和水平，每个分卷本收词都在8000条以上，《广州方言词典》收近1.2万条词，《哈尔滨方言词典》收词近万条。41本词典收词总量达30多万条。词典的收词范围极为广泛，举凡天文地理，时令时间，农业生物，房舍器具，称谓亲属，身体疾病，衣服饮食，红白喜事，日常生活，讼事交际，工商交通，文化教育，动作行为，位置数字等等，方方面面的词语无不网罗。《牟平方言词典》在例证中引用记录了谚语989条，俗语278条，歇后语86条，歌谣45条，谜语15条，合计1413条。《银川方言词语》特收回民的宗教礼俗词语347条，《乌鲁木齐方言词典》记载了不少受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影响的方言词。这部分卷本词典不啻是一本本当地风情的百科全书，犹如一幅幅当地的"清明上河图"。多谢方言学家的努力，抗日战争后即在柳州消失的"糊辣"一词也被"发掘"出来。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在很早的古书中就出现的"鰲"字，居然还在现在的柳州口

语中保存着，真可以称得上语词的活化石。又如“叛”(及其通假字“畔”)，义为“背叛”，引申为“逃遁”，引申为“躲避”“躲藏”。《汉书·冯奉世传》：“以将军材质之美，奋精兵，诛不轨，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敌之名，大为中国羞。”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不敢当敌攻战，为畔敌也。”这是躲避义。《隋书·五行志》：“陈后主造齐云观，国人歌之曰：‘齐云观，寇来无际畔。’”清赵翼《陔余丛考》卷四三：“畔，吴语谓躲避曰畔。”清乾隆《崇明县志》：“避曰躲曰叛。”光绪《宝山县志》：“叛，俗言避。”光绪《嘉定县志》：“畔，俗呼隐迹也。”一百多年后如何呢？我们可以在《上海方言词典》第 101 页，《苏州方言词典》第 120 页、《崇明方言词典》第 52 页找到这个词，而在丹阳、杭州、宁波及其他卷中则不见，可见这个动词现在只在狭小地区的口语中保存着。这部大规模的词典真是我们从事语言研究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词典的难处在于释义，方言词典尤然，因为方言词的许多微妙之处往往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这部词典的编者们煞费苦心，善于用准确而传神的语言来解释，因此博得了当地人的认可：“纤细毕现”，“烛幽显微”。这些词典的例句也多精彩，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时时让人发出会心的微笑。我还要特别指出词典前的“引论”的学术价值，它集中叙述了方言的音系、内部差异、特点。可别小看那单字音表下面的一条条短短的注释！谁都知道，每个方言里都有很多有音有义而无字的土词儿，这需要调查者下死功夫发掘，发现得多，注释才能多，对于不是本地人的调查者来说，更是“得来不易”啊。“特点”和“内部差异”二节论及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我们只要看看福州、广州、济南诸本，就会惊叹该方言的复杂，同时也会佩服编撰专家的学识。

这套 41 卷本《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充分显示了我国方言学的水平，它将不仅推动整个汉语学的研究，也将为词典学、方志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等学科甚至公安侦破、司法审讯、语言识别、语言信息处理工程提供大量资料和可靠证据。词典所拥有的巨量新鲜的、权威的语言事实，对于近年我国正在兴起的语料库建设，也必将起到重大作用。

人们不禁要问，何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依我之见，首先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江苏教育出版社的胆略，敢于在世纪之末编写、出版这样一部大型词典，其次在于擘画的精善细密，请看主编李荣先生的《方言词典说略》(《方言》1992 年 4 期）和《分地方言词典总序》，发凡起例，何等精到！何等周详！如此，方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第三、精锐的写作队伍是这部词典成功的重要保证，主编是众望所归的主帅，副主编都是知名专家，分册的著者多是五十年代方言大普查时期的健将，有些则是语言学界的中青年骨干，他们有长期的调查研究方言的经验，写过专书，他们都满怀献身精神，请看雷州、柳州两本的后记，这些专家为了调查、研究方言，到了“通宵达旦，不能自已”，“梦绕魂牵，如痴如醉”的地步，能不令人感动？第四、广大群众的支持，请看《方言》杂志 1997 年 1 期、1998 年 4 期等所发的读者、编者的多篇文章就会知道这六十位著者的身后站着成千的热情的当地群众，他们是方言词语的使用者，更是积极的提供者。第五、还应该归功于优秀的编辑队伍，《苏州方言词典》的责编是老苏州人，《丹阳方言词典》的责编是丹阳人，与作者堪称珠联璧合。众多编辑的辛勤劳动成就了这部高质量的大词典。最后从《方言》杂志所发的二十几篇编者和读者的文章，从诸本后记，可以感到还有个高效的管理制度在，还有个良好的管理秩序在。

若问我对这部大词典有什么建议，敢不尽言？看来存在个方言代表点的平衡问题，我的看法是，不厌其多，唯恐其少，建议至少补加第 42 本，即徽语代表点本，如果再有本《北京方言词典》，那就更好了。

我们即将跨入 21 世纪，我们预祝这部大词典的第二期工程，即 1200 万字的综合本《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在 21 世纪初年诞生，我们感到欢欣鼓舞的是，我国的语言科学将登上一座更高的山峰！

原载《方言》杂志 1999 年第 2 期。

“多元”“争鸣”“创新”的音韵学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11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6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是2000年8月18日，2000年是千年闰龙年，逢六千年一遇，在这大吉大利的日子，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11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6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了。

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

如果以东汉末年服虔、应劭使用反切作为音韵学的滥觞时期，那么汉语音韵学已经有1900年的悠久历史。在那漫长的古代，最富学术意义的，也最为人称颂的是隋代开皇年间的长安论韵。我们今天举行的学术讨论会是开皇以来最大规模的音韵学人的集会，1400多年前在陆府论韵的学者只有颜之推、萧该和陆爽、陆法言父子等南北精英十人，而今天出席音韵学研讨会的是三大洲五个国家120多位汉语音韵学家，有名震遐迩的老专家，也有初试锋芒的青年学人；有多次与会的老会员、老朋友，更有首次光临的贵宾，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共聚于这有2600年悠久历史的古彭城，研讨这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音韵学。我们也将像我们的先人一样，在这东部的历史名城“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剖析毫厘，分别黍累”，但是当前我们的徐州音韵学研讨会具有我们自己时代的鲜明特色，当今世界各种学术理论、学术方法、学术成果就将在这里互通、切磋、交融，我们的学术讨论是多元化、世界性、争鸣式的，我们立足现在，总结过去，目的是以创新的精神拼搏出个辉煌的未来。我们处在两个千纪之交，在这科学越发昌明的时代，前人做过的，我们要继续做，做得更好；前人没有做过的，我们更要去做，做得要好。我们要无愧于我们的祖先，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的

未来。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也是庆祝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二十周年,1980 年 10 月在王力、周祖谟、严学窘等前辈学者的倡导和主持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在武汉成立,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汉语音韵学的学术团体,而且是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大多数省市区都有学者参加。二十年来,经过全体会员的艰苦奋斗,我们的学会茁壮成长,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科学内方向正确,学风正派,成果累累的重要学术团体,在国内、国际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二十年来,老会长严学窘先生、邵荣芬先生、唐作藩先生为学会的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历届秘书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理事和顾问都尽心尽力,有些先生已经作古,有些先生已经退休,有些先生仍在奋斗不息,他们为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所做的卓越贡献,我们永远铭记。

回顾汉语音韵学的历史,面对令人神往的未来,我们认为,“多元”、“争鸣”、“创新”是我们音韵学的特色,它使音韵学永远充满活力,滔滔不息,奔腾向前。汉语音韵学植根于中华大地,由于一代一代学人的辛勤耕耘、栽培,音韵学成为“国学”、“语言文字之学”的基本学科、基础学科。同时,汉语音韵学也受到异域学术的滋润,在古代长期受梵语语音学的影响,十六七世纪,利玛窦、金尼阁带来了欧洲语音学,二十世纪初历史比较法的传人更使音韵学揭开了新的篇章,接着音位学、音系学、声学语音学都对音韵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训诂学、文字学、古文献学、史学、现代方言学、汉藏语学等等都从汉语音韵学吸收了充足的营养,也有力地促进了音韵学的繁荣。长期以来千百位中外音韵学家著书作文,务求创新,各骋己说,百家争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财产。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历史上,也贯穿了“多元”、“争鸣”、“创新”这一主线。近二十年来,适逢国运中兴,许许多多老专家焕发青春,中青年学人奋发图强,在古音学、今音学、北音学、等韵学、方言语音史、音韵学与汉藏语、音韵学与文学和史学、音韵学与现实语言生活诸多领域内,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出版了几百本专著,汉语音韵学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各个分支学科都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对学术而言,“多元”、“争

鸣”、“创新”是生命之源，繁荣之本，恒久之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音韵学这一古老的科学也紧跟时代的步伐，迈进了现代化的殿堂。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末，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二十一世纪更是信息革命、生命科学的时代，是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世纪，我们国内外的音韵学人已有几十位热衷于音韵学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北京大学、深圳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分别将音韵学的经典《广韵》输入计算机，深圳大学将《集韵》、《龙龛手镜》录入了计算机，香港中文大学将《广韵韵图》输进计算机，1999 年、2000 年内地和香港的十几所大学的音韵学人与计算机专家联手，先后在武汉、深圳召开了两次音韵学与信息现代化的研讨会，交流了计算机辅助音韵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并且筹划超大型的工程，这是汉语音韵学迈向现代化的可喜的开端。每位音韵学人都已置身于时代发展的大潮之中，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携手共进，为音韵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最大的努力。

这次会议的胜利举行应该归功于徐州师范大学、徐州市政府、徐州华润电力有限公司、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南京大学的大力支持，请让我代表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我们向光临徐州会议的日本、韩国、美国、法国的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台湾、香港、澳门、大陆的诸位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徐州师范大学副校长、语言研究所所长杨亦鸣教授和他的同事、学生为本次大会的胜利召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为了编辑会议的论文集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们为会议作了认真、仔细、周到的安排，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十分感谢的。我们还要感谢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董事长兼总编辑田小琳教授，她的支持使这届会议论文集得以顺利出版。

众所周知，《广韵》颁行一千年来，一直被学人奉为音韵学的经典，今天也是《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版首发的日子，余迺永博士的这部新著将《广韵》之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向余迺永先生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虞万里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余迺永博士将其售书所得的一万元全数捐献给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黄耀堃博士也捐款数千元，我们衷心感谢余、黄二位先生。薛凤生教授的又一精心杰构《汉语音韵史十讲》最近问世，薛先生将售书所得尽数捐赠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诸位朋友、诸位同道,在这千纪之交的吉日良辰,我们济济一堂,聚首彭城,共议韵学,这将是我们毕生永怀的大事。徐州,古称彭城,文献记载首见于《春秋》经成公十八年,即纪元前 573 年。公元前三世纪,在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大地上,英雄们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悲剧,一千年前大文豪苏东坡在这儿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放鹤亭记》,在历史的沧桑岁月里,帝王将相、骚人墨士留下了太多的遗迹,最近江苏省政府决定将徐州建成与南京、苏州、无锡并列的四个特大城市之一,徐州将阔步前进,一日千里。徐州的北邻曲阜,那是人类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故里。诸位女士,诸位先生,大家不远万里、千里而来,如今置身于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氛围中,一定有特别的感受,一定有难忘的印象,请诸位同道在论韵之余,参观名胜古迹,抒思古之幽情,发时代之强音,留下元气淋漓、迈越千古的诗篇吧。

如果说,六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精英的长安论韵给后世留下了一部音韵学经典,那么,我们期望,2000 年的徐州国际音韵学研讨会能够开启一个音韵学的新时代。

最后,请允许我在这音韵学研讨会上,引用先哲梁启超的韵语,作为对我们热爱的毕生从事的音韵学、我们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颂辞和祝辞:"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万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出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祝诸位女士、诸位先生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祝我们的音韵学研讨会圆满成功。

谢谢诸位。

本文发表于《古汉语研究》2000 年第 4 期。

谈“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

——序刘晓南《宋代闽音考》

我是刘晓南同志的《宋代闽音考》的初稿、二稿……直至现在的定稿的最早的读者之一，因为这个缘分，晓南同志要我作序，端在知交，义不容辞。正好今秋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中文系邀我作短期学术访问、京都大学的平田昌司教授也发来 E-mail，要我去作一次关于传统音韵学方法的演讲，东北大学的花登正宏教授也邀我去与仙台的汉语学者交流。因此这两个月一边在读晓南同志的书稿，酝酿写序的事；一边在思索如何向花登、平田教授交答卷，两股线自然拧成一根绳，用二三十年前的老话说，就“合二而一”了。

现将我 1998 年 11 月 6 日、11 月 17 日在日本东北大学、京都大学的所谓“讲演”写成文字，以序晓南同志的《宋代闽音考》。

我谈的题目是“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这里先得交代一下，加个状语“主要”是有意为之，文中会谈到。

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方法，自然不止一种，可以从现代亲属方言或亲属语言运用历史比较法，上溯其源；可以从不同语言或方言的接触来研究相互间的影响；可以根据理论演绎推阐；可以从传世的历史文献考证；可以用考古新获得的文献来印证……方法可以多种多样，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所说“殊途同归”，要是用西谚“条条大道通罗马”，似乎更形象些。如果议论方法的高下、新旧，我以为是不太合适的。近二十年来，在中国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成了格言。在这里我仿造一句“实践是检验方法的唯一标准”。用某种方法能出成果，这方法就是好方法。但是，如果“成果”像青霉素，瓶子上印着“有效期 × 月 × 日止”，那就令人失望了。

现在着重谈“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方法。

我以为这种方法有四个特点。

特点之一是冷。如今通行讲层次，我就按层次讲吧。近十几年中国大学的校长多是理科专家，于是在文科中“重理轻文”的怨声四起。可是到了中文系，执政者多是文学教授。而在“语言”层次里，现代汉语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则热得多，音韵学注定是冷门。在音韵学中，比起其他方法来，“从文献来研究”的方法似乎“低人一头”，冷中之冷，真是到了冰箱中了。

何以处之？只有二途，一是趋利避害，趋热避冷；一是认了，“板凳甘坐十年冷”。“书生事业真堪笑，忍冻孤吟笔退尖。”这九百多年前天才诗人苏东坡的诗句可真嘲笑了当今的一小撮书生。

特点之二是难。难有四。

首先是读文献难。且不论“佶屈聱牙”的“殷盘周诰”，就是明清笔记，对今人来说，也不全是好懂的，北京、上海两地出版了好些当代专家整理过的新校点本，可是我们在古籍整理刊物上不是常常看到对它们纠谬的文章吗？谁都得承认：当今中国的作家、学者、政治家、公务员的语文水平整体滑坡，读古书的能力亦然，语言学家也不例外。

其次，寻找文献资料难。我们东方人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有上千年的连续不断的文献纪录，中国人喜欢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古书之多。在这么多的文献中搜集专题研究所需的资料，谈何易？“沙里淘金”、“大海捞针”并不是夸张的语言。“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很多书生的亲身经历。

第三，与其他学科会通难。如果就熟知的韵书、字书、韵图继续作深入的研究，当然会有收获。如果我们想扩展，想开拓新的领域，搜集材料的范围就得扩大，就需要有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根底，就要深入到戏剧学、诗学、地理学、人口学、民族学、民俗学、科学技术史等等学科的领域，在那些学科里寻觅与汉语史有关的资料，区分年代，辨别真伪，敏锐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非易事。

第四，立说难。一个人只要不是伪学者，著书总是为了能立说，说能立。众所周知，有些学科立说不难，因为其说难以验证甚至无法

验证，读者不敢信其是，亦难以辨其非。可是从文献研究，立说特难，为什么？因为著者读过的书，读者也多能读到，除非在日本的古寺里发现秘本、孤本。而严酷的事实是，读者读的书往往比著者多，因此著者辛辛苦苦所立之说不免被攻破，这就是说，从文献研究而得的结论很容易被检验，很容易被看出罅漏，甚至“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古人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读天下书未遍，不敢妄下雌黄。”可见为学之难。

就说这四点吧，其实还有第五难，就是赚稿费难。才华横溢的高手，振笔疾书，滔滔不绝，书厚盈寸。而从文献研究，一年半载方得一文，数千字而已。不过，能坐冷板凳的多安贫乐道，故第五难不与焉。

“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特点之三是笨。读千卷万卷书，抄千张万张卡片，做数不尽的统计，这方法难道不笨吗？看晓南的这本书，他从上万首（篇）诗文里竟搜出反映宋代闽音的确切信息六百条，不下死功夫，不用笨办法，能行吗？我常打这样的比喻：有些文章，洋洋洒洒，动辄万言，有如写意画；而从文献来研究汉语语音史，则如工笔画，孔雀的一根翎羽，要耗多少时辰啊！

特点之四是实。中国民间有句俗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甘坐冷板凳，迎着困难上，按照笨办法做去，总能结实（jiē shí 读阳平）的，这“实”是结实（jiē shi 轻声）的，实在的，不会像有效期短暂的青霉素，不会像带着幻彩的肥皂泡。它虽无轰动效应，但可保“平实”。“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在中国、在日本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我想这与环境、条件、传统、师承、爱好等等都不无关系。试想，某个地区，文献资料少，那怎能从文献入手来研究呢？汉语中有个四字格“扬长避短”，近二十年可谓家喻户晓。“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扬长避短”则是人类理性的升华。中国和日本的研究汉语音韵学的专家可以夸口：我们拥有祖先传下来的大量的文献；我们的历代的文献学家在文献的辨伪、辑集、校勘、注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我们的汉语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于有传统，我们中日学者具有较强的阅读、搜集、研究古书的能力。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这就是长处，我们应该“扬长”！

可以说，从文献研究，是语音史研究的基石。在牢固的深厚的基

础之上才能建筑高楼巨厦,反之则否,这是常识,毋庸多言。

中国二十世纪杰出的历史学家陈寅恪的《从史实论切韵》一文出,《切韵》的长安音系说即告歇息。索绪尔在1878年提出的关于原始印欧语元音的假说在希太特铭文(按,也是一种文献)发现后得到证实。由于有了宋代福建文士的大量诗、词、文用韵的研究,闽方言史才得以上推到10—13世纪。……文献之功可谓伟哉!

浩如烟海的典籍(包括传世文献和考古文献)是我们研究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的古代学者,我们的师辈并没有开采完。韩愈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王念孙、王闿运都说过非汉唐之书不敢观的话。他们看过的书,我们要重看,他们没看过的书太多了,我们更要看。我们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觅搜新的研究材料,使用新的研究手段,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若问什么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近在眼前,这宋代闽音史的研究就是其一。

我们注重"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方法,是不是守旧,或者是复旧呢?让我们回顾一下本世纪初的学术史吧,那时新学与旧学的斗争很激烈,一方面是饱读诗书的旧派学者,一方面是接受西学熏陶的新派学者,我们可曾注意到,赵荫棠氏的《等韵源流》之末有"旧声韵学家"、"新声韵学家"的提法,而且列有名单。而在现在的音韵学教科书和论著中却看不到"新"、"旧"这样的形容词,原因何在?本世纪下半期"新音韵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一统天下。现在还在从事音韵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全是"新音韵学"派的传人。这二十年出版了十几种音韵学概论的书,都跟旧式的音韵学入门书迥不相同,便可证明。

再说,我们主张"主要从文献研究",绝非"惟一从文献研究"(按,即使是"惟一从文献研究",只要出结实的成果,也是应该称道的),我们也提倡研究方言和方言史,试看今日活跃在学坛上的音韵学家,很多都同时从事共时方言和历时方言的研究,请注意,这可不是传统的方言语汇的溯古考释,而是运用"新方言学"的方法和手段。我们比以共时描写为主要园地的新方言学更注意方言史的开拓,比如以两宋福建路文士的诗、词、文等大宗文献为资料,寻求其用韵的特点,就

使方言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说是重大突破,毫不过分。可以说,研究方言史,主要是依据文献,要精确地断代,非得依靠文献不可,舍此别无他路。我们还应该学习音系学和声学语音学,关心国内外对于语言接触和融合的研究,注意历史语言学的新进展,……对于各种新说辨别、扬弃,以丰富自己的研究方法,甚至要密切注意考古学、分子遗传学的最新动态。据报载,中国三峡地区发现了二百万年前的"巫山人"的化石;中国人的DNA的研究可以显示中国人种的来源,这些研究成果当然与汉语的起源、分化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现代学者不可能死守一种方法,因为我们生活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都在迅猛发展的时代,一个学者的思惟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可能是单一的。

方法多种多样,每个学者各有其长。当然,最理想的是"全能",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每个领域都有重大建树,诸种方法都运用自如,然而这是可望而难即的。纵观以《马氏文通》问世为标志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时期的一百年内,"样样都拿得起"(按,这是我的老师朱德熙先生1991年3月16日给我的信中的用语)的学者不过两三人而已。可以各有侧重,也势必有所偏重,使用各种方法的学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形成一个我们所向往的"百家争鸣"的局面,那是皆大欢喜的。

最后,我们要说,时至今日,"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方法,应该受到重视。本世纪初年,新学冲击了旧学,应该承认,这些新派学者的国学根柢也很深,如今这些学者都已凋零。一段时间传统文化跌入低谷,"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当今名学者、名作家文理不通的现象比比皆是,传统文化到了亟须维护、继承之时。说到这里,我要"节外生枝":五十年代初中国到处有城墙,不几年间拆毁殆尽,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古城墙也终于在梁思成的哭声中被拆了,曾几何时,今日欲求古城墙而不可得,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该是重视文献研究的时候了。充栋汗牛的传世典籍,不断发现的考古文献,都是我们的金饭碗,祖宗留下了偌大基业,子孙的责任不仅在继承,而且要发扬光大。

我们要"扬长",可是我们不能"避短",我们要"取(他人之)长补

(己之)短”。别的方法长处很多很多,是我们学也学不尽的。因为命题关系,我的答卷就只能谈“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方法,不敢离题。妄论之处,敬请仙台、京都的学者及海内外同道指正。

汉语有个成语,叫“因缘际会”,我发这番议论的际会是平田、花登二教授的试题,而因缘则是刘晓南同志的《宋代闽音考》。读文学的文章,知道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多有“原型”,那么我上述的想法的“原型”就是晓南同志的著作。

对于晓南同志的书的评价,我不再饶舌了,“尽在不言中”。

不过,还是不能已于言:今年五月上旬,我参加了北大期颐之寿的庆典,庆典之一是母校举办了国际汉学研讨会。我在会上见到了著名的文献学家孙钦善学长,我问他:“《全宋诗》北宋部分 25 册都出了,下面还有多少本?”“南宋部分都已交稿了,总共 72 本。”我希望数年之后,《全宋诗》,还有《全宋文》一百多本都出齐后,晓南同志的《宋代闽音考》的增补本即定本也接踵而至人间,晓南同志能做到吧。

1998.11.29.

原载刘晓南著《宋代闽音考》页 3—9,岳麓书社,1999。

评《上古音手册》

1982年9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作藩先生编著的《上古音手册》。这本手册是专供从今音查检上古音之用的。今音即现代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上古音指以《诗经》音为代表的周秦时期的汉语语音系统。《手册》（以下皆如此简称）今音以汉语拼音字母的顺序排列，声、韵、调相同的字列于同一音之下，再按上古音的异同分条。在上古音里声纽、韵部、声调三项中只要有一项不同即分开排列。每条后注以古音，首列韵部，次标声纽，末为声调，以·号隔开，十分醒目。

上古音不像中古音那样，有《广韵》的反切作为根据，上古音的声母、韵部、声调是靠后人根据《诗经》用韵、谐声、异文等材料归纳、分析出来的，因而学说很多，有的问题渐趋一致，有的问题则仍聚讼纷纭。《手册》的编著者持什么样的观点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有很大的决定性。譬如上古音韵部问题，自顾炎武分十部以后，三百年来诸家蜂起，研究加密，创获甚多。现在从事中国古代语言、文化研究及古籍整理的人一般取下列说法：江有诰的二十一部说，王念孙的二十一部说，夏炘的二十二部说，董同龢的二十二部说，黄侃的二十八部说，王力的《诗经》二十九部、战国三十部说，罗常培、周祖谟的三十一部说。也有人仍遵用段玉裁的十七部、朱骏声的十八部，这是因为他们的两部名著至今仍有影响的缘故。《手册》以高等学校教科书《古代汉语》（王力主编）的十一类三十部为准，这是比较允当的。这套古代汉语教科书在全国高校使用已达二十年，在国内外影响深广，古韵三十部说已为人们（特别是文科的教师和历届毕业生、在校学生）所熟知。再者，韵部数目的少与多反映了分部的疏与密，研究家和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见解与爱好遵从某家之说，但查检上古音的工具书的编者则宜从多不从少，从密不从疏。何以言之？工具书应该有广泛的适应性，尽可能符合各种读者的需要，而不能只适合部

分和少数使用者的要求。假如《手册》的编者采用江有诰的二十一部,于每字下注上部名,例如“丝才丘直力伏”都是之部字,那么取黄侃、王力学说的人就深感不便。相反地按三十部的学说给每字注上归部,那末“丝才丘”为之部字,“直力伏”为职部字,而信守江氏二十一部的人只要按《手册》“例言”中的诸家分部异同表,将两部合并就行。为了文字学和训诂学的目的查段玉裁、朱骏声著作的同志也可依此法利用《手册》。这是由于上古音分部距今音甚远,使用者合部易而分部难。

关于上古音的声母,迄今尚无一个公认的系统的结论,《手册》只把传统三十六字母中的轻唇音非敷奉微并入重唇音帮滂並明,舌上音知彻澄娘并入舌头音端透定泥,以及喻分为二,其喻三归匣(此数者可谓已成定论),另照穿床审分为二,暂定为三十二母。《古代汉语》(1981 年修订本)与《手册》相同。《古代汉语》的第一版定上古声母为二十八母,还有黄侃的古本声十九纽、史存直的二十六类皆为《手册》所未取,《手册》的三十二母的分类法丝毫不影响遵信其他学说的同志的查检,理由亦如上述。

对于上古音的声调问题,《手册》采取了王念孙、江有诰诸人的古有平上去入四声说,没有接受前人的古无去声或古无上、去声等说。这样的取舍也是恰当的。关于具体字的归调问题,编写者参考了以前专家的研究成果,定“庆化振颡”等中古非平声字为上古平声,“树寿茂狩”等中古非上声字为上古上声,这类字为数不多,是根据它在上古韵文中的押韵情况,实事求是地定其字调归类的。编者还把一批与入声字互相押韵或有谐声关系的中古去声字定为上古入声。

众所周知,在上古,无论谐声与用韵,原中古的去声字与入声字牵连很厉害,关系很密切,如按王念孙、江有诰等人的分部,这些去声字与入声字共居一部,自不成问题。《手册》的编写者是取的十一类三十部说,也就是说按字的韵尾阴、阳、入三分,把那批与入声字关系密切的原中古去声字划归上古入声,这样阴、入二部(如之部与职部,幽部与觉部)厘然清楚。那些与入声字无牵连的原中古去声字仍定为上古去声字。这样,《手册》基本上采取了上古有平上去入四声说,而又吸收了上古无去声说的合理内核。

上古音的研究绵历数百年，争论颇多，近数十年来中外学者又异说纷起。《手册》对上古声纽、韵部、声调的处理采取了有定论的，或基本一致的，或为多数人所可接受、理解的观点，既不循旧说，亦不尚新奇。博采众长而不专主一家，取舍有方而定夺得当，这就使得这本书既适合语言学专业工作者，也适合广大从事文、史、哲研究及古籍整理的同志的需要。

上古韵部的划分固然是众说纷纭，具体字的归部也许分歧更大。《手册》对于归部有争论的字在正文取一说，而又在同页脚注栏里注明"有的古音学家归某部"。例如"玷坫阽"等字及其声符"占"字，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孔广森的《诗声类》、严可均的《说文声类》、王念孙《古韵谱》、王力《汉语音韵》皆认为属侵部，江有诰的《诗经韵读》、《谐声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夏炘《诗古韵表集说》、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周祖谟《诗经韵字表》、王力《诗经韵读》则定为谈部字。《手册》页 29 认为是侵部字，但加注："凡从'占'声的字，有的古音学家归谈部。"又如"凯闿铠"等从"岂"得声的字，王力《汉语音韵》归脂部；王力《上古韵母系统研究》、《汉语史稿》、《诗经韵读》，董同龢、周祖谟及《古代汉语》教科书(1981 年修订本)定为微部。《手册》页 69 认为是微部字，同时加注："凡从岂得声的字，有的古音学家归脂部。"这样的处理办法也体现了编著者的兼取诸家而不专主一家的精神。对读者也颇为方便，并非专攻古音学的使用者当发现《手册》某字的归部与自己熟悉的某家学说不同时，不致疑为失误；而研究者则可从正文与脚注了解异同，这不啻为进一步考察提供了线索。

《说文声类》、《说文谐声谱》这类书的作者有一个毛病：拘守《说文》，收字范围不出《说文》，凡《说文》所无者概被摒弃。而这本《手册》的收字标准是以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常见字为主，也酌收了一些不常见字，如"畐戈"等，因为这些字是声符(或叫"声首"、"音符")，大量的合体谐声字就是从这些声符孳乳派衍出来的，不仅古音学专著，就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史、哲的考证性论著在运用古音学作为论证手段时，也往往提到这些声符，它们的今音怎么读，现代许多人念不出来，更不用说它们的上古音的声纽、韵部、声调为何了。《手册》着重注意收了若干这类声符字，实具苦心。这书未收《说文》的冷僻字和方言

字，却收了一批不见于《说文》而已见于传世的先秦两汉文献的常用字。总计共收八千字左右，传世的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常见字略备于此矣。

这本《手册》还收了 145 个上古的复音词（主要是联绵词），这也是个特点。众所周知，先秦典籍中的联绵词甚多，由于时代、地域、传抄等关系，同一联绵词而字形歧异之大甚至使人误认为是两个词，往往读不准它们的音。《手册》给所收的每个双音词都注出今音，同时分别标出上下两字的上古韵部、声纽和声调，如“睚眦 yázì”，据今音，声、韵、调全然不同，但依上古音，则是叠韵词，因为《手册》载明，二字都是支部字。又如“昳丽 yìlì”，据今音则为叠韵词，但《手册》载其上古音，“昳”是质部喻母入声，“丽”是支部来母去声，了不相干。《手册》还把一些双音词的异形字也用括弧注出，如“旁（般）礴（魄）”等。

查检便利，不能不说是《手册》的一个优点，以今音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多数常见字一索即得。那些不常见字和声符字可以依据后面的部首检字索引来查找，翻到《手册》正文，除查出上古音的声、韵、调外，而且可以读出该字的今音。这个作用不可小视，这本《手册》不妨看作是一本古代汉字今读表。

向来的音韵学著作大都以古大厚重的面孔出现的，但这本《手册》，只要一打开，那工整清秀的笔迹，疏朗有致的行距，整齐划一的款式，便跃入眼帘，给人以一种美感，这种美的形式在音韵学书中实为罕见。在此我们不能不赞誉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和领导同志。

读完这本书，掩卷而思：自本世纪初起，历史比较语言学传入我国，关于汉语上古音的构拟重建，中外学人纷起研究，成果甚夥，为何《手册》不在每条后注出构拟的符号？我想，这绝非因为如某本《楚辞选注》所云，“‘古音重建’早已被公认为不科学”。大概是由于古音构拟的学说比古代音类的研究分歧更大，迄今尚未有一个比较一致的或为较多人可接受的系统，《手册》不能像专著那样只立自己的或某人的一家之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不像在国外，在国内传统音韵学的势力仍旧很大，他们只重视音类的区分；而且当前中国从事古籍整理和古代各学科研究的同志所关心、所熟悉的更多是关于上古音的音类区分问题。“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所言恐属谬误，尚希

编著者指正。

就笔者管见,《手册》堪称美善,然亦有不足。如"代岱"被定为月部,而前人多认为是职部(或之部)字。"尔迩沵弥祢"等字定为支部字,在页85下注"从'尔'得声的字,有的古音学家归入脂部",而多数古音学家如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王力、周祖谟认为是脂部字,正文和脚注的部名似可对换。《部首检字》页26有"洂"字,正文漏收。"钉"字见于《说文》,且为常用字,应该收录。"沧浪"这个联绵词见于《孟子》、《楚辞》,而且"浪"今音应为 láng,一般人误读成 làng,似应收入。

个别误字:页81今音 lù,古音"觉·来·入"条的"夫"当为"六"之误,页82luó条的"羸"当为"蠃"之误,页29脚注"'甸'《广韵》堂练切,已属去声线韵","线"为"霰"之误。

最后,提一点建议:《手册》认为上古有平上去入四声,同时又将与入声字相互押韵或有谐声关系的原中古去声字定为上古入声字,如页161"浴欲慾裕鹆"同条,定为"屋·喻·入",这样做,确有道理,前已论述。可是假若有些同志不同意这样处理,认为那些字在上古也是去声字,这些同志的母方言如有入声,自能区别上条第四字"裕"为去声字;但一般北方人就较难辨别了。如果《手册》在入声条中将这些中古去声字下加符号,作特别标志,那就清楚而易辨识了。

全书虽仅"例言"、"正文","部首检字"三大部分,还是应该有个总目录为好。

这本以"手册"命名的书,"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若非对音韵学有精深研究深得独造的专家,不能为此书;若无普度在学术阴霾荡除后嗷嗷待哺的众学子之心,不能为此书。忝为学子,合十敬礼。

此文原发表于《语文研究》1983年第3期。

读《论章系归端》谐声表书后

提要　《论章系归端》文中有一张谐声表，经过认真查核，该表错误约 90 处，缺漏约 150 处，这既有作者和主编的责任，也有出版社的责任。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册（1982 年）内有《论章系归端》一文。该文第一节为“就形声字的谐声关系证章系归端”，主要是一张由二十七个主谐字组成的谐声表，共七页。该文云：“这张表的材料取自大徐本《说文》，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一、依据《说文》确定形声字。……二、依据大徐本《说文》，是因为大徐本的反切采自孙愐的《唐韵》，《唐韵》据陆法言《切韵》，其音读较古，我们通过他来观察古音面貌，可以据此较有把握地探求古声类。”

笔者读毕此表，发现此表虽仅 7 页，而谬误缺漏甚多，具体数字见本文之末。

隋代陆法言著《切韵》，功垂史册，唐朝王仁昫为之“刊谬补缺”，成为学坛佳话。笔者不揆梼昧，效法先贤，为此谐声表刊谬补缺于下。这里要说明的是，“缺”下分“缺项”、“漏字”两小类，计数原则：缺项视同漏字。该表前有说明：“这张表选定了二十七个主谐字，就被谐的三系归类来看，其中有十九个是二系互谐的，……八个是端系和章系互谐而知系无字的，……”例如“寺”字被认为是二系互谐的，然而查其表，端系的“端”“透”“定”“以”四项下均空白，查核后知其表疏舛，定母项下应有字而亏缺。又如“石”字被认为是端系和章系互谐而知系无字，实际情况是，该表缺知母项。所以为该表补项、添字

是同等重要的。

某字是否谐声字，谐何声，依从该文的原则，即依据大徐本《说文》（中华书局 1963 年影印陈昌治一篆一行本），必要时方引用其他版本或其他书。

主谐字一"亶"（主谐字及被谐字字头皆繁体，余悉简体。下同）

谬 1 章母"颤（之善切）"，按切语应为"之缮切"。

缺 1 定母项下漏"儃（徒干切）"。

主谐字二"多"

缺 1 昌母项下漏"誃（尺氏切）"。

主谐字三"詹"

谬 1 端母"瞻（都敢切）"，按"瞻"音应为"职廉切"，故端母下当删此字。

2 禅母"赡（时艳切）"，按此"赡"字是《说文》"新附字"，乃徐铉所增，非许慎原有，依例不当作为考证上古声类的材料。如需利用，应加考证。该表对于"新附字"或收或不收，如"專"声的"溥（度官切）"、"童"声的"橦（徒红切）"、"召"声的"迢"（徒聊切）"、"勺"声的"韵（都历切）"等皆未收；另一方面，谐声表中又收录了不少"新附字"，未作任何说明，是自乱其例。

缺 1 端母漏"儋（都甘切）"。

2 端母漏"膽（都敢切）"。

3 缺定母项。

4 定母漏"澹（徒滥切）"。

5 定母漏"憺（徒敢切）"。

6 以母漏"檐（余廉切）"。

7 章母漏"瞻（职廉切）"。

8 缺昌母项。

9 昌母漏"襜（处占切）"。

主谐字四"尚"

谬 1 端母"鄌（多郎切）"，按切语应当为"多朗切"。

2 彻母"瞠（醜庚切）"，按切语应为"丑庚切"，"醜"是昌母字，"丑"是彻母字。

缺 1 端母漏“諻(丁浪切)”。

2 端母漏“黨(多朗切)”。

3 定母漏“堂(徒郎切)”。

4 缺书母项。

5 书母漏“赏(书两切)”。

6 禅母漏“嘗(市羊切)”。

7 禅母漏“常(市羊切)”。

8 禅母漏“裳(市羊切)”。“裳”为“常”之或体,按,如利用《说文》谐声字研究上古声类,重文应视同正篆。该表于主谐字六“者”下收“睹”,复收其古文“覩”。然不收重文的情况反多,故为补出。

主谐字五“勺”

谬 1 端母“杓(都了切)”,按“杓”音应为“甫摇切”,端母项下应删此字。

2 端母“馰(都历切)”,按“馰”字大徐本《说文》:“从马,的省声。”非勺声,于例不应收。

3 禅母“汋(市著切)”,按应为“市若切”。

4“其他”项下“杓(甫遥切)”应为“甫摇切”,大徐本“从木从勺”。

缺 1 端母漏“扚(都了切)”。

2 禅母漏“妁(市勺切)”。

3“其他”项漏“尥(力吊切)”。

4“其他”项漏“箹(北角切)”。

5“其他”项漏“肑(北角切)”。“肑”为“箹”之重文。

主谐字六“者”

谬 1 端母“褚(同都切)”,按切语上字“同”为定母字,故端母项下应删此字。

2 端母“屠(同都切)”,按此字也应删。

3 端母“赌(当古切)”,按此乃“新附字”。

4 澄母“绪(除吕切)”,按应为“徐吕切”,澄母项下应删此字。

5 书母“署(舒吕切)”,按应为“常恕切”,书母项下应删此字。

缺 1 端母漏“陼(当古切)”。

2 缺定母项。

3 定母漏“瘏(同都切)”。

4 定母漏“屠(同都切)”。

5 知母漏“箸(陟虑切)”。按“箸”大徐本:“陟虑切,又迟倨切。”

6 章母漏“诸(章鱼切)”。

7 章母漏“鬻(章与切)”。

8 章母漏“煑(章与切)”。

9 章母漏“鬻(章与切)”。按8、9二字为7字之重文。

10 书母下漏“暑(舒吕切)”。

11 书母漏“書(商鱼切)”。按“書”本为“箸”,从聿,者声,岂可因只识其隶楷之形而弃之?

12 缺“其他”项。

13“其他”项漏“绪(徐吕切)”。

主谐字七“真”

谬1知母“镇(陟邻切)”,按切语应为“陟刃切”。

讨论1章母“真(职邻切)”2章母“禛(职邻切)”。按《说文解字》四部丛刊影印宋本、孙星衍校刻宋本、陈昌治一篆一行本,“真”并为侧邻切;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四部丛刊影印述古堂影宋写本、祁寯藻翻刻影宋抄本“真”皆为止邻反。“禛”,大徐本上述三本皆侧邻切,小徐本上述二本皆职邻反。宋跋本王韵、敦煌切韵残卷S2071“真”“禛”、《广韵》韵目“真”并为职邻切,而《广韵》正文“真”、“禛”是侧邻切。总之上述诸书“真”“禛”二字有庄母字与章母字之别,笔者认为,该谐声表于此取舍应加说明为宜。

缺1端母漏“颠(都年切)”。

2 透母漏“䡩(他甸切)”,此字为“瑱”之重文。

3 缺昌母项。

4 昌母漏“瞋(昌真切)”。

5 昌母漏“謓(昌真切)”。

6 昌母漏“瞋(昌真切)”。

7“其他”项漏“寘(即夷切)”。

主谐字八“是”

谬 1 端母“鍉(都兮切)”,按应为“匙(都兮切)”。

2 透母“隄(他计切)”,按应为“都兮切”,透母项下当删此字。

3 定母“禔(杜兮切)”,按应为“市支切”,定母项下应删此字。

缺 1 透母漏“睼(他计切)”。

2 定母漏“褆(杜兮切)”。

3 禅母漏“媞(承旨切)”。

4 禅母漏“匙(是支切)”。

5 禅母漏“寔(常隻切)”。

主谐字九“石”

谬 1 定母“宕(徒浪切)”,按此误系只看字形而不查书所致。《说文》大徐本明载:“宕”,“从宀,碭省声”,小徐本亦然,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无异辞。既非石声字,则定母下应删“宕”。

2 定母项下既无字,该项应删。

缺 1 透母漏“橐(他各切)”。

2 缺知母项。

3 知母漏“磔(陟格切)”,《说文》云:“从桀,石声。”

主谐字十“壽”

此处谬误、缺漏甚多。按照谐声关系,这里有三个层次:“𠷎(直由切)”是第一主谐字,所从得声的字有“𠳋”、“𣪌”。“𠳋”,严可均《说文声类》云:“今《说文》无𠳋字,偏旁有之,《广韵》引‘𠳋,谁也’。”张成孙《谐声谱》云:“《说文》多𠳋声字而无𠳋字。先子云:‘盖脱阙,当从口,𠷎声。’”“𠳋”作为第二主谐字,所从得声字颇多,“壽”是其一。“壽”作为第三主谐字,又衍派出许多字。楷书将三个层次得声的字,除个别外,都写作以“寿”为声符的字。而该谐声表却排除了第一层次的字,将从“𠳋”、“𣪌”、“壽”得声的字混成一团,兹缕述如下。

若以第三层次即《说文》明确指出的真正从“壽”得声的字来衡量该谐声表,则:

谬 1 端母“禱(都皓切)”,按切语应为“都浩切”。

2 端母“擣(都皓切)”,按此字本“从手,𠳋声”,非“壽”声字。

3 端母“壔(都皓切)”,按此字本𠷎声字。

4 定母“濤(徒刀切)”,是“新附字”。

5 定母“擣(徒刀切)”,切语应为“都皓切”,“都”系端母字,擣乃𠷎声字。

6 定母“翿(徒到切)”,按此字本設声字。

7 禅母“醻(市流切)”,按此字本𠷎声字。

8 禅母“𢿋(市流切)”,按此字《说文》作“𢿋”,从“攴”不从“支”,声符为“𠷎”,非“壽”。

9 禅母“壽(殖酉切)”,按据《说文》,此为𠷎声字。

10 禅母“璹(殊六切)”,按此字“𠷎”声字。

缺 1 定母漏“燾(徒到切)”。

2 缺澄母项。

3 澄母漏“儔(直由切)”。

4 澄母漏“籌(直由切)”。

若以第二层次即从“𠷎”得声的字来衡量该表,则:

谬 1 端母“禱(都皓切)”,按此字乃壽声字。

2 定母“翿(徒到切)”,按此字乃設声字。

3 定母“擣(徒刀切)”,按切语应为“都皓切”,此字非定母字。

4 知母“譸(张流切)”,按此为壽声字。

5 章母“鑄(之戍切)”,同上。

6 禅母“鄯(市流切)”,同上。

缺 1 定母漏“檮(徒刀切)”。

2 定母漏“犪(徒刀切)”。

3 澄母漏“幬(直由切)”。

主谐字十一“單”

谬 1 端母“㲸(丁可切)”,按此字应为“鞞”。

2 章母“樿(脂膳切)”,按切语应为“旨善切”。

3 禅母“嬋(市连切)”,按此是“新附字”。

缺 1 端母漏“襌(都寒切)”。

2 端母漏“匰(都寒切)”。

3 定母漏“僤(徒案切)”。

4 定母漏“彈(徒案切)”。

5 定母漏“鼉(徒何切)”。

6 章母漏“戰(之扇切)”。

7 昌母漏“繟(昌善切)”。

8 昌母漏“幝(昌善切)”。

9 禅母漏“墠(常衍切)”。

10 禅母漏“蟬(市连切)”。

主谐字十二“兑”

谬 1 端母“兑(大外切)”,按切语上字“大”乃定母字,故端母项下“兑”字应删。

2 端母下既无字,该项当删。

3 透母“棁(他括切)”,按切语应为“他活切”。

4 以母“说(弋雪切)”,大徐本《说文》:“说”,“从言兑”。则“说”非形声字,故应删。(虽然段玉裁、朱骏声皆主张“兑亦声”,然该文规定,悉遵大徐本《说文》。)

5 以母“阅(弋雪切)”,按大徐本《说文》:“阅”,“从门,说省声”,则非兑声字,应删。按“鴳(弋雪切)”亦是“说省声”字,该表未收,则是该表或从大徐本,或不从,自乱其例。

6 书母“蜕(输芮切)”,按大徐本《说文》:“蜕”,“从虫,捝省”,则是书母项下应删去此字。

7 书母“说(失爇切)”,按大徐本《说文》:“从言兑”,此字应删。

缺 1 定母漏“敓(徒活切)”。

2 定母漏“痥(徒活切)”。

3 定母漏“兑(大外切)”。

4 缺章母项。

5 章母漏“棁(之说切)”。

6 书母漏“餟(输芮切)”。

主谐字十三“周”

谬 1 透母“倜(他历切)”,按此是“新附字”,徐铉注曰:“从人从周,未详。”当删。

2 透母项下既无字,此项当删。

3 彻母“惆(敕救切)”，按切语上下字皆误，应为“敕鸠切”。

4 澄母“啁(陟交切)”，按“陟”是知母字，澄母项下应删“啁”字。

缺 1 端母漏“鵰(都僚切)”，“鵰”为“雕”之籀文。

2 定母漏“錭(徒刀切)”。

3 缺知母项。

4 知母漏“啁(陟交切)”。

主谐字十四“隹”

谬 1 神母“谁(示惟切)”，按切语应为“示隹切”。

2 神母“睢(示惟切)”，按切语应为“许惟切”，故神母下“睢”字当删。

缺 1 端母漏“陮(都罪切)”。

2 澄母漏“椎(直追切)”。

3 神母漏“脽(示隹切)”。

4“其他”项漏“雖(思允切)”。

5“其他”项漏“趡(千水切)”。

6“其他”项漏“崔(胙回切)”。按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陈昌治本《说文》：“从山，隹声。”但四部丛刊影印宋本和孙星衍校刻宋本无“声”字。

主谐字十五“冘”

谬 1 端母“躭(都感切)”，按《说文》无此字。

2 知母“炈(知深切)”，按切语应为“知朕切”。

3 章母“枕(章荏切)”，按切语应为“章衽切”。

4 章母“煩(章荏切)”，按切语应为“章衽切”。

缺 1 端母漏“紞(都感切)”。

2 缺透母项。

3 透母漏“肬(他感切)”。

4 澄母漏“鸩(直禁切)”。

主谐字十六“召”

谬 1 端母“蛁(都潦切)”，按切语应为“都僚切”。

2 端母“貂(都潦切)”，按切语应为“都僚切”。

3 定母“髫(徒聊切)”,按此乃“新附字”。“迢(徒聊切)”亦为新附字,该表未录,甚是。

4 彻母“怊(敕宵切)”,按此乃“新附字”。

5 章母“招(止遥切)”,按切语应为“止摇切”。

6 章母“招”,陈昌治本作“从手召”,故应删。

7 章母“鉊(止遥切)”,按切语应为“止摇切”。

8 章母“柖(止遥切)”,按切语应为“止摇切”。

9 昌母“䪾”,按《说文》无此字。

10 书母“沼(水招切)”,按《说文》载“沼(之少切)”,此处“沼”字应删。

11 书母项下既无字,该项当删。

12 禅母“袑(市绍切)”,按切语应为“市沼切”。

13“其他”项“卲(甫沼切)”,按《说文》该字切语为市沼切,则此处应删之。

14“其他”项下既无字,该项当删。

缺 1 章母漏“沼(之少切)”。

2 昌母漏“弨(尺招切)”。

3 禅母漏“韶(市招切)”。

4 禅母漏“卲(市沼切)”。

主谐字十七“屯”

谬 1 章母“邨(此尊切)”,按因切语上字“此”乃清母字,章母项下应删此字。

2 昌母“春(昌纯切)”,该表云“从屯”,误,《说文》明言“屯声”。

缺 1 缺端母项。

2 端母漏“顿(都困切)”。

3 定母漏“軘(徒魂切)”。

4 定母漏“钝(徒困切)”。

5 缺彻母项。

6 彻母漏“杶(敕伦切)”。

7 禅母漏“奄(常伦切)”。

8 缺“其他”项。

9“其他”项漏“邨(此尊切)”。

主谐字十八“至”

谬 1 定母“耋(徒结切)”，按大徐本《说文》：“从老省，从至。”(虽然有些说文家主张是至声字)此字当删。

缺 1 定母漏“絰(徒结切)”。

2 知母漏“窒(陟栗切)”。

3 知母漏“銍(陟栗切)”。

4 知母漏“挃(陟栗切)”。

5 缺澄母项。

6 澄母漏“咥(直结切)”。

7 澄母漏“荎(直尼切)”。

8 章母漏“郅(之日切)”。

9 缺“其他”项。

10“其他”项下漏“咥(许既切)”。按“咥”有二音，此为其一。

主谐字十九“耑”

谬 1 章母“剬(旨衮切)”，按切语应为“旨兖切”。

2 章母“惴(之流切)”，按切语应为“之瑞切”。

3 禅母“敞(市缘切)”，按该字应为“歂”。

缺 1 缺昌母项。

2 昌母漏“諯(尺绢切)”。

3 昌母漏“喘(昌沇切)”。

主谐字二十“蜀”

谬 1 昌母“蜀(尺玉切)”，按“蜀”音“市玉切”，不应置于昌母下。

缺 1 定母漏“髑(徒谷切)”。

2 知母漏“斀(竹角切)”。

3 章母漏“斸(之欲切)”。

4 昌母漏“歜(尺玉切)”。

主谐字二十一“童”

谬 1 定母“曈(徒红切)”，按此为“新附字”。又，“橦”亦为新附字，而该表不收，甚是。

2 澄母“幢(宅江切)”，按亦为“新附字”。

3 禅母“廱(时动切)”,按《说文》无此字。

缺 1 缺端母项。

2 端母漏“董(多动切)”。

3 缺透母项。

4 透母漏“疃(土短切)”。

5 昌母漏“衝(昌容切)”。

6 禅母漏“瘇(时重切)”。

主谐字二十二“甚”

谬 1 透母“歁(他感切)”,按切语应为“苦感切”,故透母项下应删之。

2 彻母“湛(宅臧切)”,按切语应为“宅减切”。“湛”实为澄母字,不当置于彻母下。

3 彻母既无字,则该项当删。

缺 1 透母漏“黮(他感切)”。

2 缺澄母项。

3 澄母漏“湛(宅减切)”。

4 禅母漏“葚(常衽切)”。

主谐字二十三“重”

谬 1 彻母“憧(丑陇切)”,按切语应为“直陇切”,故此字不当置于此。

2 彻母项下既无字,该项当删。

缺 1 定母漏“逋(徒总切)”,系“動”字之古文。

2 澄母漏“憧(直陇切)”。

3 章母漏“踵(之陇切)”。

4 章母漏“踵(之陇切)”。

5 章母漏“種(之陇切)”。

主谐字二十四“叀”

谬 1 定母“團(徒官切)”,按切语应为“度官切”。

2 定母“摶(徒官切)”,按切语应为“度官切”。

3 定母“篿(徒官切)”,按切语应为“度官切”。

4 章母“竱(旨兖切)”,按切语应为“脂兖切”。

5 章母“䡴(旨衮切)”,按切语应为“脂兖切”。

缺 1 缺澄母项。

2 澄母漏“縳(持沇切)”。

3 澄母漏“傳(直恋切)”。

4 禅母漏“腨(市沇切)”。

5 禅母漏“膞(市沇切)”。

主谐字二十五“炎”

谬 1 昌母“緂(充之切)”,按切语应为“充三切”。

缺 1 定母漏“谈(徒甘切)”。

2 定母漏“惔(徒甘切)”。

3 以母漏“剡(以冉切)”。

主谐字二十六“占”

谬 1 透母“䩞(他协切)”,按切语应为“他叶切”。

2 透母“帖(他叶切)”,按此系“新附字”。

3 知母“砧(知林切)”,按此系“新附字”。

4 彻母“钻(敕敕切)”,按切语上下字并误,应为“敕淹切”。

5 书母“䩇(舒瞻切)”,按切语应为“舒赡切”。

6“其他”项“觇(勅艳切)”,按此乃彻母字,不应入“其他”项。

缺 1 端母漏“𦝬(都念切)”。

2 端母漏“耂(丁念切)”。

3 透母漏“沾(他兼切)”。

4 彻母漏“觇(救艳切)”,按中华书局影印陈昌治本以及孙星衍本、四部丛刊本《说文》皆音救艳切,“救”为“敕”之误,应正。

5 书母漏“苫(失廉切)”。

6 书母漏“笘(失廉切)”。

主谐字二十七“寺”

谬 1 禅母“恃(时吏切),按切语应为“时止切”。

2“其他”项“寺(详吏切)”,按切语应为“祥吏切”。

缺 1 缺定母项。

2 定母漏“待(徒在切)”。

3 定母漏“特(徒得切)”。

4 澄母漏"踦(直离切)"。

5 澄母漏"痔(直里切)"。

6 书母漏"郝(书之切)"。

总结:《论章系归端》谐声表经查核后,谬99,缺159。因为我自己可能有错误,或有些问题还可争议,所以"谬"、"缺"数字可以各减10。我认为,应该公允,应为著者和主编者辩护,有若干"谬"、"缺"当由"手民"、校对员、责编负责。

近读伍铁平《语言学评论集》、东方善霸《丑陋的学术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遂取十余年前旧稿,请江学旺君为我审阅一过,我再亲自复阅、誊抄。这里要特别声明:文中的谬误概由我负责,决不诿过于江君。近二十年来很多名人和不名之人做书编书,谬误多多,一旦被批评,则诿过于合作者。请问:"你不是主编或第一作者吗?"在这为自己、为领导所造成的急功近利的时代,凡为文者可不慎欤?

本文必有错误和缺漏,敬请诸公为我的"刊谬补缺"刊谬补缺。

参考文献

丁履恒 《形声类编》,清光绪倭汉斋丛书本。

管燮初 1982 《从说文中的谐声字看上古汉语声类》,《中国语文》1期。

沈兼士编 1985 《广韵声系》,中华书局。

严可均 《说文声类》,民国渭南严式诲刻本。

张惠言、张成孙 《谐声谱》,民国武林叶氏石印本。

本文发表于《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2期。

初读《敦煌音义汇考》

二十世纪只剩有限的时光了。现在许多出版社纷纷推出涵盖整个世纪的总结性的书，有的已捷足先登。然而二十世纪之末并非“世纪末”，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最后几年的发展势头肯定会比以往更强劲，是“加速运动”！在学术上还会有重要论著问世的。刚刚问世的《敦煌音义汇考》就是这样的论著。这是现知全部的而且经过精心整理的敦煌音义写卷和注音写卷的第一次汇集，仅凭这一点就不寻常，语言学家、敦煌学家、古籍整理与研究的专家都会为这本书的出版而感到欣喜。

一提及“敦煌”，就得回溯到本世纪初，王国维向伯希和索得《切韵》残卷三种的照片，即抄录刊布，揭开了中国音韵学史的新篇章。此后历经刘复、魏建功、罗常培、姜亮夫、潘重规诸家，至上田正《切韵残卷诸本补正》(1973)、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1983)，敦煌韵书的资料几近全备，敦煌韵书的研究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在敦煌的语言学文献中，除了韵书残卷外，尚有音义书亦当视为珍宝。虽然《毛诗音》(斯 2729)、《楚辞音》(伯 2494)、《文选音》(伯 2833)等自披露以来，也曾有中外学者加以研究，但是许多音义写卷或默默无闻，或被误解，甚至连标名也不副实，音义书的整理状况及研究成果总的来说较韵书逊色，人们往往把诸种韵书残卷视作敦煌语言文献的代表，而音义书却从无人汇集。现今我们得感谢张金泉、许建平二位先生，《敦煌音义汇考》(以下简称《汇考》)的出版使我们了了世纪愿，圆了世纪梦。[①]《汇考》对敦煌音义写卷和注音写卷作了全面的汇辑与认真的整理，洋洋大观一巨册，证明了敦煌音义写卷作为语言文献足可以与韵书残卷比肩方驾，使学术界一新耳目。

---

① 《敦煌音义汇考》，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 年 12 月。

关于敦煌音义书的价值,容举数例: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在五代末和宋初方始有印本,但删改不少,而敦煌《周易释文》(斯 5735、伯 2617)系唐玄宗开元年间写本,“传本无而残卷有的条目达 72 条之多”(《汇考》页 2,以后径省书名),《尚书释文》(伯 3315)“写本有而传本无者 158 条”(页 61)。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的敦煌写卷,“用以校勘今之传本,每每证其讹漏”,“保留了不少古本经文之文字,当有助于古经之整理”(页 857)。《佛本行集经难字》(伯 3506)“写卷存古经旧字”(页 1181)。这些只是一斑。

将这些具有高度价值的文献,搜罗齐全,汇为一编,是项大工程。张、许二位板凳甘坐六年冷,逐卷审读敦煌遗书,钩沉辍佚,辨妄存真,终于获得音义写卷 643 号,汇为 33 种;又爬罗剔抉,纤细不遗,将片音只注集为《四部书散音汇录》和《佛道经散音汇录》两种,分编为四部书、字书、佛道经音义三大部分,敦煌音义的全部蕴藏从此呈现于学界。这本汇集,其特点在“汇”,难点在“考”。例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唐释义净译于长安三年(703 年),敦煌写卷近千号,但多为残帙,《汇考》分别有注音与无注音、音义专书与经文卷末附音义及字里行间的注音,汇为二类三种编入(页 1198)。伯 3823,诸家敦煌韵书汇集皆未收录,《汇考》拟名为“韵书摘字”(页 526)。《杂集时要用字七种》“自遗书发现以来,未有摹录和整理”(页 745),《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残卷四号“发现至今,尚无应有的整理和研究”(页 834),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张义潮变文》各只有一个反切注音(页 501),凡此皆不遗漏,可见用力之勤,用心之细。众所周知,殷商甲骨片有缀合问题,敦煌残卷亦然。姜亮夫《敦煌碎金导言》:“敦煌卷子往往有一卷损裂为三卷、五卷、十卷之情况,而所破裂之碎卷又往往散处各地:或在中土、或于巴黎,或存伦敦,或藏日本,故惟有设法将其收集一处,方可使卷子复原。而此事至难,欲成不易。”而《汇考》所做的缀辑工作在在皆是。如考辨伯 3971、伯 2948、斯 5508、李 39、斯 3553 五个卷子皆为释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的抄卷,可洪之书早佚于中土,传世唯见高丽藏本而已,“写卷所据本比高丽本古”,更显珍贵(页 1006)。

《汇考》于每种写卷都有题解、照片、校记三部分。题解含标题、

年月、作者、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以及重要研究论文的简要评述，校记除考录异文，重在明俗字和辨字音。即以拟名而论，力克以前敦煌学者的误拟、泛拟、分拟三病。如将《庄子释文残卷》改为《庄子集音》（页362），更《字宝碎金》为《字宝》（页545），将伯2901的泛拟名《残佛经音义》定为玄应《一切经音义》节抄（页914），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分拟的五个卷子归在《随函录》一名之下。该书辨正前人之失的地方也很多。如否定徐邈著作一种，又确认徐邈著作一种：斯2053，“王重民认为是东晋徐邈之《礼记音》，其说不确。残卷非徐邈所作之《礼记音》，乃是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另外一种《礼记音》。……不仅为研究南朝音系提供了宝贵资料，而且其所用《礼记》为六朝之本，在校勘上亦有很高价值”（页210）。伯3602，“王重民定为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残卷，学界宗之，今经详细考证，定为东晋徐邈《庄子集音》残卷。《庄子集音》残卷之发现，……对于我们考证两晋音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通过残卷所集诸家之音，与《释文》比照，钩沉辑佚，得司马彪、郭象、李轨、李颐等训释《庄子》的音义佚文二十余条”（页362）。《注音本开蒙要训》（伯2578），罗常培先生曾充分研究此卷及其他资料，而成名著《唐五代西北方音》，“然所据《敦煌掇琐》录文多讹误，虽有校正，犹未尽”（页531），《汇考》作者又复补正若干则。重视文字的考辨是《汇考》“校记”的特色，《字宝》（伯2717）平声“相倿倚乌皆反”，《汇考》校记：“‘倿’，俗字，字书未见。白居易《岁除对酒》诗‘醉依乌皆反香枕卧，慵傍暖炉眠’曾借‘依’字代之。至《龙龛手镜》始用‘挨’字，‘挨，乌皆反，倚也’，见卷二手部。”（页559）这则校记令人击节叹赏。白居易的做法是训读，《字宝》则用民间俗字“倿”，1986年《汉语大字典》未收此字。校记的重点之一是辨字音，“辨字音主要引《广韵》注音作声、韵、调对比”，如《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音义》“咎”的注音是“旧”，校记：旧，“《广韵》在宥韵，‘巨救切’；‘咎’在有韵，‘其九切’。浊上字与去声字互注。”（页1127）显然，只有工于音韵者才能作出这样的校记。

敦煌韵书是语言学的富矿，敦煌音义书同样也是语言学的富矿。

首先是音韵学的富矿。例如东晋徐邈《庄子集音》（伯3602）等

保存了许多《切韵》前或同时的反切，为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语音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至于可洪的《随函录》则对研究晚唐五代语音具有重要意义。唐代的音义写卷和注音残卷与切韵系韵书比较，互异的反切俯拾皆是，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若干语音现象。兹举其荦荦大端于下：

1．清浊声母字互注：见于《注音本开蒙要训》（页531）、《妙法莲华经音》（页1187）等。

2．泥来不分、娘日相混：《注音本开蒙要训》（页531）。

3．歌麻互注：《金光明最胜王经音》（页1198）。

4．佳麻互注：《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音义》（页1111）。

5．泰队相混：同上，“最注‘子内反’，‘内’《广韵》在队韵；‘最’在泰韵，‘祖外切’。”（页1126）。

6．止摄字遇摄字互注：《大般涅槃经音》（页1032）、《诸杂难字》（页1272）。

7．齐混入止：《金光明最胜王经音》（页1198），又如《菩萨布萨法》“底”注丁里反，《广韵》底为荠韵字，里乃止韵字《页1261）。

8．齿头音四等混入正齿音：《注音本开蒙要训》（页531）。

9．梗摄字齐韵字互注：《大般涅槃经音》（页1032）、《佛经难字》（页1210）。

10．阴入相通：《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页834），又如《俗务要名林》之伯5001卷“髻”注“即”，前者为《广韵》去声霁韵字，后者乃入声职韵字（页738）。

11．浊上变去：见于《注音本开蒙要训》（页531）等。

南北朝时期韵书蜂起，陆法言《切韵》出，定于一尊。唐代是切韵系韵书繁荣的时代，周祖谟先生《唐五代韵书集存》是研究切韵系韵书演变史的名著，魏建功先生遗著《韵书研究纲目》将在明年出版。如果我们要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继续研究韵书流变，《汇考》所搜集的音义写卷643件的大量注音是绝好的资料。如《字宝》序称“援引众书：《翰苑》、《玉篇》、数家《切韵》”（页547），《字书（伯3016）》，“谈韵居阳韵之前，蒸韵在侵韵之后，俨然李舟以前之《切韵》次序”（页

504),《韵书摘字(伯3823)》"观其分韵、字次及注音,颇同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但以其收字有超出王韵而见于《广韵》者,推测当是王韵以后唐代末年韵书,将有助于考溯《切韵》系统在唐代之流变"(页526)。而伯3823卷,姜、潘、上田、周诸敦煌韵书汇集皆未收录,益显珍贵。

敦煌音义书内也有唐代语言情况的记载,《字宝·序》:"今天下士庶同流,庸贤杂处,语论相接,十之七八皆以协俗。"(页545)于此可知唐代语言的统一和口语的优势。该《汇考》也提到"吴音",《观世音菩萨咒(斯6978)》"吴音呼第(按,当为底)张第反"(页1268),此系吉光片羽。这批音义资料是研究唐五代词汇的宝库。《俗务要名林》,按义类分类,辑录当时日常用语并加注音义,凡此残卷共存语词1200余条(页645),《杂集时要用字七种》"可视为《俗务要名林》之无注简本或条目表"(页745)。《字宝》"全书辑录当时口语词480余条,逐条注音,唯很少释义,寓口语词闻音知义之意"(页545),《字书(伯3016)》"多收日常用字与口语"(页504)。《汇考》诸敦煌音义卷的数千条语词也足资考证唐代生产、经济、社会生活等状况。

敦煌音义更是研究唐代文字所必须利用的大宗资料,诸卷俗字可谓车载斗量,很多未为本世纪八十年代的《汉语大字典》所采入。再者,斯388残卷是郎知年于贞观年间所撰的《正名要录》,佚失多年,今幸得重现人间(页790)。又如《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页834),其书名即揭示当时字样书之多,该书以"时要"为重,"正俗"并行。字样即规范字之意,可见唐代自初年就有不少有识之士重视文字的规范化。《汇考》收敦煌音义写卷分三大部分,字书是其一,为数甚夥。

对于研究中国书籍史及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的专家来说,敦煌遗书是道道地地的宝藏。这本《汇考》所收诸卷及其所涉自六朝古籍,下至宋初,内容既有一般汉籍,又有佛道经;这都是辑佚的渊薮,意义巨大。

这本《汇考》以其搜辑的齐备、题解校记的精彩必将得到相关学人的重视,而杭州大学出版社的胆识也应受到赞赏:竟然肯出这样一本具有学术价值却不能赚钱甚至要赔本的厚书。

敦煌韵书几次汇集，虽然《唐五代韵书集存》后出转精，然而不少图版印得模糊不清，实为憾事，这是由于当时经济水平、技术力量不足之故。不意十三年后的这本《汇考》仍有很多图版模糊难识！如同甲金文有识字问题，敦煌俗字必然也存在多人多年不断辨识的过程。他年若出第二版，建议首先在图版和录文上大加改进，再将著者自己的进一步研究的成果和其他学者的高见充实进第二版的题解和校记中去，第二版即修订本、增补本、提高本，学人翘首以望焉。

杭大是敦煌学中心，建议张、许二先生再接再厉，将世界各国所藏的敦煌文献中的语言学资料全部辑录出来以飨学界。

我系初读《汇考》，初读者，粗读也，所言挂一漏万，望外即在引玉。

原载《语文研究》1997 年 4 期。

关于《广韵》和《韵镜》

——《宋本广韵·永禄本韵镜》合刊影印本弁语

文化，古代和现代不同，表现在辞书上，古代也和现代不同。为了文化的传与承，为了语文的教与学，辞书应运而生。古代的辞书，在字书出现之后，又有韵书，韵书是按韵（韵是汉语语音的要素）编排、依韵检字的辞书，在现代辞书中，韵书只占极小的比例。而在古代则不然，“唐人盛为诗赋，韵书当家置一部，故陆、孙二韵，当时写本当以万计。”（王国维《书吴县蒋氏藏唐写本唐韵后》）唐宋是韵书的兴隆时期，溯其原始，南北朝时期，韵书和音义书已臻发达，诸家蜂起，隋文帝开皇（581—600）初年，南北精英，即当时的音韵学家、人文学者、诗人共十人参与的长安论韵是中国音韵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导源于此，仁寿元年（601）陆法言的《切韵》成书。《切韵》很快为世人接受，封演（唐玄宗至德宗时人）《封氏闻见记》卷二：“隋朝陆法言与颜、魏诸公定南北音，撰为《切韵》，……以为文楷式。而先、仙、删、山之类，分为别韵，属文之士，共苦其苛细。国初，许敬宗等详议，以其韵窄，奏合而用之。”《旧唐书·许敬宗传》：“高宗嗣位，代于志宁为礼部尚书。”“六年，复拜礼部尚书。”可见《切韵》至唐时成了官府用于科举考试的标准韵书，而前此诸家韵书遂逐渐佚失。毫不夸张地说，《切韵》是中国音韵学的经典，唐宋的韵书绝大多数都是它的支裔，数以十计的增订本统统被称为“《切韵》系韵书”。在“《切韵》系韵书”中最享盛名的是宋真宗颁行的《大宋重修广韵》。

宋代在统一中国后，偃武修文，为了科举考试的需要，宋初诸帝很重视韵书、字书的规范工作。王应麟（1233—1296）《玉海》卷四五“艺文·小学”的“雍熙《新定广韵》”条云：“太平兴国二年六月丁亥，诏太子中舍陈鄂等五人同详定《玉篇》、《切韵》。”是年为公元977年。“景德《新定韵略》”条云：“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诏颁行《新定韵略》，

送胄监镂版。先以举人用韵多异，诏殿中丞丘雍重定《切韵》。”王应麟用“先”字追溯，说明丘雍重定《切韵》一事较早。《玉海》“景德《校定切韵》、祥符《重修广韵》”条云：“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崇文院上《校定切韵》五卷，依九经例颁行（本陆法言撰），祥符元年六月五日改为《大宋重修广韵》。”现在我们可以打开《广韵》，卷首载景德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公历 1007 年 12 月 27 日）牒文，云：“爰命讨论，特加刊正。”这牒文中的“十五日”即玉海中的“戊寅”，可见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准备、试验，以前此的《切韵》某本作为蓝本，修订而成《校定切韵》，终于在景德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皇帝命令颁行。但是《广韵》卷首又有第二道牒文即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五日（公历 1008 年 7 月 10 日）牒文，云：“爰择儒臣，叶宣精力，校雠增损，质正刊修，综其纲条，灼然叙列，俾之摹刻，垂于将来，仍特换于新名，庶永昭于成绩，宜改为《大宋重修广韵》。”显然这是对上年底的《校定切韵》的又一次“刊修”，年中告成，皇帝赐以新名。宋人章如愚《山堂考索》前集卷十一“诸子百家门·韵书类”的“广韵”条云：“景德四年刊正，大中祥符元年命儒臣增损，改为《重修广韵》。”据《金华贤达传》卷七，章如愚乃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进士，著名学者。《广韵》经两次修订，两次命名，宋人章如愚、王应麟所言当为可信。《广韵》本身没有标明作者，据《玉海》卷四五，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官修《集韵》成书，其“韵例”云：“先帝时令陈彭年、丘雍因法言韵，就为刊益。”只有三十一年的时距，其言毋庸置疑。《广韵》的功用从宋人笔记可见一斑：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方大驾南渡，典章一切扫荡无遗，甚至祖宗谥号亦皆忘失，祠祭但称庙号而已。又因讨论御名，礼部申省言：‘未寻得《广韵》。’”

历史似乎又重复一次，由于《广韵》带有集成的性质，前此的《切韵》系韵书遂逐渐散佚不传，到了二十世纪，发现了若干敦煌韵书残卷，1947 年发现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全本，但一般学人皆难以获睹，所以千年来，《广韵》也被奉为韵学的经典著作。周祖谟先生说：“从音韵学方面来说，《广韵》既因承切韵而来，其声韵的类别所代表的就是中古音的系统。”（《广韵略说》）可以说，欲研究汉语中古音必须研究《广韵》。陈澧作《切韵考》，高本汉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依

据的都是《广韵》。以《广韵》音系为参照系，可以上推古音，下连今音。调查和描写现代汉语方言，也离不开《广韵》音系。《广韵》的注文引用了大量的古代典籍，对文字学、训诂学、辑佚学、文化学都有宝贵的文献价值。

据朴现圭、朴贞玉《广韵版本考》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广韵》自纂成至今，刻本钞本达百种左右。如果按照注文的详略来划分，可以分成详本和略本两大类。如果按照刊刻的源流来看，详本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福建私刻的“钜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于1983年影印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福建路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刊本，名为《钜宋广韵》。原藏本缺去声一卷(按，日本藏本为全帙)，取南宋巾箱本补足。另一大类是临安国子监刊刻的“大宋本”(因为书名是《大宋重修广韵》)，此类版本目前存有高宗本、宁宗本和巾箱本，另外尚有二十世纪发现的俄藏北宋末年本残卷。迨至清代，校刻《广韵》者甚众，这些刻本中比较通行的可分为三系。一系是康熙年间张士俊校刻的泽存堂本，张氏取宋本，自加校改，是者固多，非者亦复不少，所以褒贬不一。周祖谟先生《广韵校勘记》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六，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8年影印出版，《广韵校本》原作为史语所专刊之十九，1951年作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60年北京中华书局出合刊本。余迺永先生有《校正互注宋本广韵》(台北连贯出版社，1975。其2000年第四版，改名为《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辞书出版社)。周、余二先生的书都是以泽存堂本为底本，1982年北京市中国书店曾以1934年来薰阁印本为底本重加影印。因此泽存堂本在目前的学术界使用者最多，影响也最大。另一系是光绪年间黎庶昌刻《古逸丛书》本，黎庶昌取杨守敬在日本访得的宋宁宗年间本，参照泽存堂本，作了校勘，收入《古逸丛书》。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又将此本收入《四部备要》，1998年中华书局编辑《小学名著六种》，又将《四部备要》本收入。张刻本和黎刻本都是以宋本为底本，经过校改而成，尽管和宋本相较，互有优劣，但也因此失去了宋本的本来面目，至为可惜。第三系是南宋巾箱本，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曾影印出版，不像泽存堂本和《古逸丛书》本经过校改，因而能保存宋本的原貌，这是可贵

之处。但是巾箱本缺页甚多,商务印书馆配以泽存堂本,使真正的宋本打了些许折扣,也未免让人有些遗憾。

据屈万里、昌彼得先生《图书版本学要略》考证,巾箱本是南宋孝宗间婺州(今浙江金华)浙刊本。原书四周双栏,版框高 13.4 厘米,宽 10.7 厘米,版心为白口,单黑鱼尾,题款格式为"韵几/页几/刻工人名"。每半叶十行,注文为小字,双行排列,行小约 24 字。新韵目接上文直排而不改行。宋帝讳避至"眘"(孝宗讳)字止,光宗以下"惇"、"擴"等皆不缺笔。(据《广韵版本考》)巾箱本原为明毛晋汲古阁旧藏,押"宋本"印,后来辗转于张元济涉园、蒋祖诒密韵楼,现藏于中国台湾中央图书馆。原书五卷五册,缺页依本次影印本页码,缕述如下:

卷首:一上至三下(《广韵》牒、序)

上平:六上、一九上、三一下至三四下

下平:三六下、三七上、六四上至六六下

上声:八六上、九七上

去声:九七下

入声:一五四上至一五九上

卷末:一五九下至一六〇下(附录《切韵法·文字常识》共六种,按,《广韵版本考》谓之"六则")

巾箱本于民国八年(1919)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张元济先生主编的《四部丛刊初编》,民国十八年(1929)出第二版。黄侃先生手批本《广韵》用的就是这个版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将版式拼缩为一册,是为第三版,题记曰:"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海盐张氏涉园藏宋巾箱本"。在中国台湾省,此缩印本曾多次影印。缩印本为节省版面,删去版心,每面含原本两叶,四周双栏改为四周粗黑单栏,缺页以泽存堂本补配,并补卷首六叶,即自"大宋重修广韵一部"至"论曰"等序文。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亦曾影印过巾箱本。上世纪下半期巾箱本在中国大陆地区总是作为《四部丛刊》之一印行的,没有出过单行本,大多数学者手中没有这个本子,因此巾箱本也鲜为学界所重视。

目前广大学者使用的《广韵》其实都是经过校改或补配的宋本,

并非原本。即使如上海影印的《钜宋广韵》,第四卷缺,只得配以巾箱本,但是该卷首页巾箱本也缺,于是不得不用泽存堂本配齐。这次江苏教育出版社影印《广韵》,选择巾箱本为底本,其目的:一方面提供给学术界一个异于以往的版本;一方面还原一个比较真实的宋本。《四部丛刊》所收巾箱本,缺页配以泽存堂本,但由于泽存堂本经清人校改,实际上已经不能算作完全意义上的宋本了。这次影印,把补配缺页的泽存堂本抽换成南宋高宗绍兴浙刊本和孝宗乾道钜宋本,如此就可当"宋本"之名而无愧了。南宋高宗本过去被认为是北宋本,后经研究,非是。该本全帙现藏日本内阁文库。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缺上声和入声卷,此本原为文徵明所藏,后经毛晋父子、季振宜父子、陆费墀、张岱等,最终为傅增湘购得,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捐赠北京图书馆,此藏本被收入日本1994年影印的《临南寺学术研究资料集成》第三辑。这样处理过的巾箱本实际上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南宋高宗、孝宗两朝的刻本,比目前市面上所能见到的《广韵》刻本更近于宋本原貌。

当然,即便如此,巾箱本也并非完美无缺,因为任何一个善本都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刊刻错误。如上平声韵目"齐"字反切"徂奚切"误作"但奚切",冬韵"户冬切"小韵首字"碚"右边误从"官",钟韵"重"字反切"直容切"误作"宜容切",之韵"之"字反切"止而切"误作"上而切",支韵"疵"误作"疪"。还有一些字形相近的误刻,如反切上字"士"常刻作"土",甚至漏刻,如七五页下七行"丶"字竟留白不见。这些都是我们在使用这个版本时必须注意到的。巾箱本和其他版本比较起来,还是有其长处的。限于篇幅,笔者将上平、下平两卷内小韵首字下所载字数和泽存堂本有出入的列举对勘,也顺带检查一下其他几个版本的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字	牺	低	携	鍫	驼	阳	亡	唐	黄	霙	浜	颈	承	腾	覃
韵	支	齐	齐	宵	歌	阳	阳	唐	唐	庚	耕	清	蒸	登	覃

续　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反切	许羁切	都奚切	户圭切	七遥切	徒河切	与章切	武方切	徒郎切	胡光切	於惊切	布耕切	巨成切	署陵切	徒登切	徒含切
正确数字	十八	二十三	二十三	七	二十三	三十一	十一	四十	三十二	十	二	四	三	十二	二十
巾箱本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三十三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五	正确	正确	正确
高宗本	十九	二十二	正确	十	正确	三十二	十二	四十一	三十三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十九
泽存堂本	十九	二十二	二十四	十	正确	三十二	十二	四十一	三十三	七	三	正确	二	十一	十九
钜宋本	十九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四十一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元泰定本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三十三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正确

上表共举出十五处平声小韵的统计数字，巾箱本错二处，高宗本错八处，钜宋本错二处，元泰定本错一处，而泽存堂本竟错达十三处（“携”小韵泽存堂本和楝亭五种本收录二十四字，比其他版本多出“鸏”字，此字待考），凡是高宗本错的，泽存堂本也跟着错。从这些统计数字，我们也可看出巾箱本的可靠之处并不逊于比它刊刻早的高宗本。周祖谟先生曾于《跋张氏泽存堂本〈广韵〉》一文中指出：“故宋刻之中，当以巾箱本为最善”，信哉斯言。当然，在其他处，诸本各有千秋，需要具体分析。

《四部丛刊》缩印本为长32开本，这次影印放大成国际16开本，在书眉上增加韵目，在正文前添上广韵韵目表，便于学者翻检。张元济先生补巾箱本的缺页，是把泽存堂本的内容按巾箱本的版面剪切拼拉，因此补页的版面疏密不一。这次重补没有这样做，而是让不足的版面空缺，这并不是为了省事，而是要让读者一眼能看出哪些页是配补的，我们觉得这样做似乎更忠实于原貌。

要利用《广韵》，就要会使用《韵镜》。

《广韵》之类的《切韵》系韵书，先分四声，次分韵，再据声分小韵，然后列字，秩序井然。然而其间关系如何，若要深究，必须依赖切韵图，《韵镜》是重要的切韵图。我们在学习音韵学，研讨语音史，或以音韵学为武器攻治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甚至文献学、历史学、文学等等时，就需要同时使用《广韵》、《韵镜》，可收彼此印证，相互发明之功。

众所周知，唐代是中国古代史上最辉煌、最繁荣的时期，唐代的中国富有旺盛的创新精神、极强的吞吐能力，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境外的新鲜事物，凡是有益的，都毫不犹豫地"拿来"，吸收、消化，使自己越发健壮、更加强大，而且播及友邦。即以文化方面而言，音乐、舞蹈，无不如是，另一典型事例是，印度佛教的各宗派陆续传入中国，但是到了唐时，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出现了，而且成了中国佛教的主流，绵亘达千余年之久，这就是禅宗。与之类似，在唐五代，汉语音韵学中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在悄然兴起，这就是切韵学，它借鉴梵语悉昙学，但是立足汉语，面向汉语，可以说，它是彼时的汉语语音学。切韵学及其后身等韵学如玉泉汩汩，延续、发展达千余年之久，而且东传扶桑，这再一次证明中华民族的博大兼容的胸怀，强健的吸纳辐射能力。切韵学的内容可以大别为二：其一，诠释术语，阐发音理，或以文字胪陈，或列表以显，这就是切韵法。《广韵》卷末的附录，计六则，其中的"双声叠韵法"、"辩字五音法"、"辩十四声例法"、"辩四声轻清重浊法"四者即切韵法，宋孝宗时人卢宗迈所传切韵法更形丰富，《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刊本《大广益会玉篇》卷首，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成化十四年(1478)叶氏南山精舍刻本《广韵》卷末，都有《玉篇广韵指南》，收录切韵法超过十则。其二，将韵书的声、韵、调的配合

系统,逐个音节(即逐字)地展示在图表之上,令读者一目了然,豁然开朗,这就是切韵图,切韵图是切韵学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唐、五代、宋、辽、夏、金、元的文献都只有"切韵"、"切韵法"、"切韵之法"、"切韵图"、"切韵家"、"切韵之学"等专门术语,《韵镜》卷首的张麟之韵鉴序例,有"切韵诗"名目,述及神珙著《切韵图》,杨倓得《切韵心鉴》,亦是铁证。自唐至元从无"等韵"和以"等韵"为定语的词语,而这些到明代才出现,沿用至现代,术语先后的历史阶段性是不可不了解的。

在唐宋,切韵图颇为流行,惜乎唐代的切韵图已经失传,宋代的切韵图也所存无几,《韵镜》、《七音略》是其中最著名的,它们是以图表的形式表现《广韵》的音系。这类韵图,"其来也远,不可得指名其人",著者无从考知。这类切韵图著作犹如民间文学作品,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经人们心血的不断浇灌,逐渐改进而成的。我们特别要指出,韵图是层累地造出来的复合性的产品,具有多层级的积淀,利用切韵图研究语音史不可不具有这一认识。

《韵镜》,在现存的中国古代的目录书上都未见著录,卷首有传刻此书的张麟之的识语,撰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序作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张麟之的《韵鉴序例》就是宋代若干切韵法的汇集。《韵镜》大概在南宋末年传至日本,在日本很为流行,日本学者关于它的研究著作很多。直到清代光绪初年,中国学者杨守敬、黎庶昌在日本发现此书,刻入《古逸丛书》,于是方始回归祖国。《韵镜》从此受到海内外汉语音韵学人的高度重视,被视作研究汉语中古音的重要资料。

《韵镜》的版本较多,这次影印的是《古逸丛书》之十八《覆永禄本韵镜》,是日本正亲町天皇永禄七年(1564)的重校本,为了在版面上和巾箱本《广韵》求得一致,我们也采用了两叶并为一面的办法。跟《广韵》一样,《韵镜》也存在讹误衍夺的问题,上世纪中国学者做了校勘工作,读者可参看龙宇纯先生的《韵镜校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李新魁先生的《韵镜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

读者诸君如果要想了解关于《广韵》和《韵镜》的更多信息,请阅读音韵学通论类的书籍和有关二书的专著。

几点技术问题在这里交代一下。扉页书名九字和《韵镜》页首“永禄本韵镜”，封底印记，都是集宋高宗赵构《草书礼部韵略》的字，可以说是“御题书名”，当然这是假冒的了。封面四角的“平上去入”四字，是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看来这本书真是姓赵了。“平上去入”四字的位置是根据中国古代汉字标调的圈发法安排的。

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得到很多先生赐教，谨致谢忱。

我们为出版这个合刊本所做的工作，还有这篇弁语，都必有失误，敬希诸君赐正。

企足东望，我们竭诚呼吁上海图书馆和藏有宋本《广韵》的日本诸图书馆，早日将全帙宋本《广韵》影印出版，以飨学界。

二零零二年炎夏鲁国尧、吴葆勤属稿于颜之推故里

主要参考文献

李荣　1982　《音韵存稿》，北京商务印书馆。

鲁国尧　1992　《卢宗迈切韵法述评》，《中国语文》第 6 期。

———　1993　《卢宗迈切韵法述评》，《中国语文》第 1 期。

朴现圭、朴贞玉　1986　《广韵版本考》，台北学海出版社。

王国维　1959　《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

余迺永　1999　《俄藏宋刻〈广韵〉残卷的版本问题》，《中国语文》第 5 期。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　1989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

周祖谟　1966　《问学集》，北京中华书局。

———　1988　《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宋本广韵·永禄本韵镜》，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年。

本文是与吴葆勤同志合写的，刊于《宋本广韵·永禄本韵镜》卷首，又发表于《古汉语研究》2002 年 4 期。

《集韵》——收字最多规模宏大的韵书

《集韵》是一部收字最多，规模宏大的韵书，“自李登《声类》以来，音韵书之该博，无有及之者”（孙诒让《集韵考正·跋》）。

宋代初年，全国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也相应地发达起来，纂修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大书。为了科举取士的需要，真宗时修成《韵略》及其详本《广韵》，颁行于世。至仁宗景祐元年（1034），宋祁、郑戬等向皇帝奏言，奉命考校御试进士时，发现举人诗赋多误使音韵，考官们也各执一见，以致要请皇帝亲自裁定，原因是“《广韵》、《韵略》所载疏漏，子注乖殊，宜弃乃留，当收复阙，一字两出，数文同见，不详本意，迷惑后生”，请求“重撰定《广韵》，使知适从”。于是宋仁宗命令宋祁、郑戬、王洙、贾昌朝刊修，以丁度、李淑为负责人（见《集韵》卷首修书本末）。至宝元二年（1039）书成，皇帝赐名为《集韵》，颁行天下，立于学官。

《集韵》共十卷，平声分一二三四（不像《广韵》那样分上平声、下平声）计四卷，上、去、入三声各分上下，计六卷。前有“韵例”，讲编撰缘起，列“十二凡”（即十二条凡例），说明编书的总原则是“务从该广，经史诸子及小学书更相参定”。我们可以说，“集韵”的“集”字就是“务从该广”精神的概括。

这是部韵书，即按韵编排的字典。先分四声，再分韵（共206韵），每韵内再排列若干组声母、韵母、声调全同的同音字（叫做“小韵”），这些是与《广韵》的相同之处。但是各小韵的排列次序不像《广韵》那样杂乱无章。以东韵为例，一等的各个小韵排列在前，三等的在后；声母同类的小韵一般聚在一起，如前四小韵分别为舌音端、透、定、来四母字，第五、六小韵为唇音並、明两母字。这样的排列对使用者来说，方便多了。

现举卷六上声养韵的一个小韵来看看《集韵》的列字、注音、释义等的体例，并具体解释有关的凡例。

○网罔 網冈罔宀𡆧圞 文紡切說文庖犧所結繩以漁或作罔網冈籀作网古作宀𡆧圞一曰無也俗作冈非是文二十一 菵 艸名 㒺誷 誣也或作𧫍 惘 惘憮失志 蝄蛧魍方 說文蝄蜽山川之精物淮南王說蝄蜽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引國語木石之怪夔蝄蜽或作蛧魍方 輞棢 車輞或从木 [illegible] 耳[illegible]疾[illegible]也 [illegible] 水名

“○”号表示以下诸字是一个小韵。一个字的不同写法都汇聚在一起，如开头的八个字形实际上是一个“网”字。双行小字是注解，开头的三字“文纺切”表示整个小韵的读音，最后四字“文二十一”意为这个小韵收了二十一个不同的字形。中间的若干字才是对“网”的注释。“网”这个字形是见于《说文》的，《集韵》编者以之为正体，第二、三、四字形被认为是或体，第五字形是籀文，最后三个字形是古文。卷首《韵例》第二凡云：“凡古文见经史诸书可辨识者取之，不然则否。”就是说，《集韵》所收的各种字形都是有根据的。当我们看到“蝄”的第四个字形是“方”时，也许觉得奇怪。如果看到《周礼·夏官·方相氏》“以戈击四隅，殴方良”，郑玄注“方良，罔两也”，陆德明《经典释文》“方良，上音罔，下音两”，就会了解《集韵》编者是如何广收异体字的了。但是《集韵》编者排斥“俗体”，这在第十一凡里有明确声明，所以“网”的注释之末有“俗作冈，非是”的话。

第一凡：“凡字训悉本许慎《说文》，慎所不载，则引它书为解。”上举“网”字的双行小注里“庖犧所结绳，以渔”是抄自《说文》的训释，“一曰无也”是《集韵》编者加的另一解释。读者要注意的是，“一曰……”大多数是《集韵》加的义项，但有些是《说文》原文的，如上声豏韵“㺝”字注“《说文》：犬容头，进也。一曰贼也”便是。古代无精确标点符号，后人读书不易知道引文在何处截止，这最好能查检一下《说文》原书。《集韵》的释义可谓要言不烦，这远胜《广韵》。

一组不同形体的字中，如有见于《说文》的，即以之为正体，《集韵》的206韵的韵目用字，有三十个不同于《广韵》，而且比较“怪”，原

因主要在此。如上声四十九韵目用字,《广韵》是“敢”,《集韵》换成“敢”,是根据《说文》的,《集韵》把“敢”作为第四个字形,注明“隶作敢”。(有少数是换另字,如《广韵》入声八“物”,《集韵》作“勿”。)

《集韵》的收字和训释首先根据《说文》,但《说文》只收字 9353,重文 1163。而《集韵》收字至 53525 字之多,几达五倍,凡《说文》所无者,则以他书为据,《集韵》把经史诸子,前代字书、韵书的字尽量搜罗,《集韵》比《广韵》新增 27331 字,“自宋以前群书之字略见于此矣”(顾广圻《补刊集韵序》)。

异体字特多,是《集韵》的一个重大特点。举例见前。

“又音”多,是《集韵》的另一重大特点。第三凡说:“凡经典字有数读,先儒传授,各欲名家,今并论著,以稡群说。”如“倚”有六音:居宜切、于宜切、巨绮切、隐绮切、卿义切、於义切(平上去三声各两读),第二和第三音便是“先儒”徐邈、王肃读《书经》、《易经》的音(《广韵》只收第四、六两音)。

又如“松”有祥容切、思恭切二音(《广韵》只有祥容切一音),《集韵》载明思恭切音是“关中语”。搜录方言异音是《集韵》又音增多的原因之一。

又如“拢”字,《广韵》上声董韵力董切,《集韵》也承袭此音。此外,《集韵》平声东韵卢东切小韵,共四十二字,僻字居多,可是最末一字却是“拢,理也”,像是补上去似的,何以如此?看看宋代词人用韵即可明白个中道理,如苏轼《南乡子·裙带石榴红》词押的平声韵:“红依逢通工空拢胸”,晁端礼《望海潮·高阳方面》词以“雄虹空鸿中戎风功衷忽拢”押韵,足证“拢”在宋代也是平声字。如爬梳宋代文献,以与《广韵》、《集韵》相比较,将会有更多的发现。吸收当代读音而不拘守前代韵书,这该是《集韵》的特点之一吧!

有若干字又音很多,如“圈”甚至有八音:去爰切、驱圆切、逵员切、苦远切、窘远切、巨卷切、具愿切、逵眷切,分隶于有关韵下(《广韵》只收三音)。“又音”有的是音义俱别的不同词儿,有的是义同音别的多音词,《集韵》广泛搜罗,按其声韵调分置于各韵。但是在《集韵》里,某字有没有又音,有多少又音,很难查检,因为它在各个反切下没有互注又音。

南宋人李焘说,《集韵》颁行,列于学官,《广韵》势力就衰微了(见《说文解字五音韵谱自序》)。但在宋亡以后,元明两代,浩繁的《集韵》几乎湮没无闻,清初博学如顾炎武,在《音论》中也说它不存在。直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曹寅刻本出后,才陆续有人利用它,研究它,虽然如此,看来《集韵》的价值迄今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兹试述其作用如下:

一、后世字典辞典的编撰,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集韵》的成果。《康熙字典》于每字下都录载前代主要字书、韵书的反切与义训,这部大型字典首次吸收了《集韵》的成果。《中华大字典》收字四万八千多,反切全用《集韵》,"《集韵》所无,乃别采《广韵》以下各韵书为用"。日本学者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台湾省出版的《中文大辞典》基本上都收录了《集韵》的反切与义项。目前正在编纂的《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都无不重视《集韵》,将更准确、更全面地吸收《集韵》的成果。

二、《集韵》是一部规模宏大的韵书,它虽沿袭《广韵》的体例,但有很多改革,因而它是研究音韵学的一份重要史料。与《广韵》相异之处这里不能缕述,仅举数例于下。隋唐之际汉语只有双唇音声母,而无唇齿音,所以陆法言《切韵》的反切系统里二者是不分的,《广韵》仍然沿袭,以唇齿音字切双唇音字,其实宋代语言已有唇齿音,《集韵》反映了实际语言,作了改革,以双唇音字切双唇音字。

再看下列一类字反切用字的变化:

	敲	嫌	见	鸡
《广韵》	口交切	户兼切	古电切	古奚切
《集韵》	丘交切	贤兼切	经电切	坚奚切

反切的原则是反切上字取声母,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拼合所得就是被切字的音。《集韵》对上述字换用了反切上字,就使得拼合和谐,更切合语音实际。要研究宋代语音,《集韵》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三、《集韵》收字达 53525 个之多,异体特多,因此研究碑刻、古籍时,要辨识文字,探究意义时应该充分利用这部韵书。如北齐宋显伯造像的"斛"字,《集韵》列为入声屋韵"斛"的或体。《吕氏春秋·重己篇》:"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勯"字,《说

文》、《广韵》未收,《集韵》寒韵多寒切:"力竭也。"音义悉合。

四、要了解汉字纵的发展历史,《集韵》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横断面。如《广韵》职韵收"職,又收"軄",注明是"職"的俗体,但在《集韵》,二字并列,注曰"或从身",不认为是俗字。又如《说文》十三上"總"字注:"臣铉(按,徐铉,宋初人)等曰:今俗作摠,非是。"而在《集韵》则不认为是俗体,《集韵》认为俗体的是"捴",现存的元刊本《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正是用"捴"字。

五、《集韵》"今所撰集,务从该广,经史诸子及小学书更相参定",因而它引用了大量的在编纂时代仍流传的古书,其中有若干后来散佚了,也有若干虽然至今仍存,但在流传过程中文字有讹夺错误。自《集韵》在康熙年间重现后,清代学者纷纷利用它从事校勘、辑佚。如《说文》(大徐本)五下"冘":"淫淫,行貌。"《集韵》平声侵韵"冘"字注:"《说文》:'冘冘,行貌。'"段玉裁以此作为根据之一,改正了今本《说文》的这一误处。

六、近年来,唐宋时期汉语的词义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规模宏大的《集韵》是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重要资料书,如敦煌变文的《舜子变》:"从项决到脚脙,鲜血遍流洒地。""脙"的读音与意义为何?在《集韵》平声尤韵中即可查到"脙",雌由切,股胫间。

七、《集韵》广泛搜集了当时通语和方言的词汇,其中有若干保存至今天。如上声果韵"没",母果切,"不知而问曰拾没",这就是今天的"什么"。又如上声马韵:"搲",乌瓦切,"吴俗谓手爬物曰搲"。这词仍活在今江淮方言、吴方言、赣方言、粤方言里。平声盐韵"挦",徐廉切,摘也。今南昌、江淮方言仍存。所以方言学者十分重视《集韵》,如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编《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凡例":"方言单字条目加注《集韵》反切。"

《集韵》是一部韵书,如果懂得音韵学常识,查检自不成问题,它比《广韵》好查,因为它的小韵次序是按声母的类别排列的,前已述及。如果只懂得诗韵(106韵)的人要查《集韵》,那就要知道诗韵的一韵相当于《集韵》的一至三韵,如二冬相当于《集韵》的冬钟两韵,次序则是相同的。《集韵》广泛搜罗又音,可是在字下一概不互注出来;而异体字特多,其中一般人不识的怪字必多,这就需要从字形的角度

来查了,南宋李焘早就指出可以利用《类篇》查阅《集韵》,《类篇》是在《集韵》成书后按丁度等的建议官修的按字形编排的字典,是《集韵》的姐妹篇。需要注意的是,它与《集韵》也不全同,如"蜎"字《集韵》列了十一音:先韵圭玄切、縈玄切,仙韵隳缘切、萦缘切,铣韵於泫切,狝韵馨兖切、葵兖切、下兖切、以转切、巨卷切,线韵逵眷切。《类篇》收十音,缺葵兖切。《类篇》收字31319,《集韵》的好多异体字它未收。大型字典也可被利用来查检《集韵》,他们的字数虽近五万,但皆不及《集韵》多,可见《集韵》有些怪字没有被搜罗进去。这些大型字典各字下载《集韵》音,但不全,举"圈"字为例,《康熙字典》只录《集韵》六音,失载巨卷切、逵眷切二音,《中华大字典》失收具愿切、苦远切二音,《大汉和辞典》只收五音,《中文大辞典》录七音,失收逵员切音。但是在《集韵》的字形索引还没出版前,这些字典在查检《集韵》时仍有作用。

《集韵》现存宋刻本一种及影宋抄本数种,以汲古阁影宋抄本最为有名。朱彝尊曾以此本属曹寅刊刻。是为楝亭五种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1936年曾据此排印。另有清顾广圻重修本,1937年商务印书馆曾据此影印。曹、顾二本错讹都不少,后有不少订误者。据悉中华书局已决定整理出版《集韵》,若能以诸本对勘,吸收前人的校勘成果,将是有功于学林的一件大好事。

1983年北京中国书店影印了曹刻本《集韵》。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了述古堂影宋抄本《集韵》,并制了四角号码索引,这是学人们企盼已久的事,但索引偶有讹误,如元韵孚袁切的"反"据抄本字形(第一画为横)编为1024,这样就跟7124的四个"反"字分开了。1985年中华书局影印了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孝宗时潭州刻本,列为《古逸丛书》三编之十一,线装十册一函,精美异常。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这个宋潭州刻本的缩印平装本,附有四角号码索引,此索引也偶有失误,如侵韵渠金切的"澟"(从冫,廪声),误看作"瘭"(从疒,禀声),编为0019。《古籍新书目》报第76期(1995年12月28日)载:"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96年选题规划":"《常熟翁氏世藏宋本丛书》,常熟翁同龢家藏宋元刊本珍贵古籍十余种,我社征得翁氏后人同意,将其中在古文献整理、校勘学、版本学等方面有极高学术价值

的八种宋版书首次影印出版，其中有《集韵》、《邵子观物内外篇》等。”翁氏所藏宋本《集韵》乃明州刻本。承刘晓南同志示我宋人林之奇《拙斋集》卷二“记闻下”关于明州《集韵》的一段话，兹录其前几句：“韩倅城云：‘明州《集韵》，煞有理会，得音韵真来历处。’”又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丁未田氏刊本（又称安康金州军刻本）《集韵》，缺卷一，存卷二至卷十，1990年我在日本访学时有幸见到此本。又，四川大学赵振铎教授和夫人董理《集韵》多年，学界翘首以盼其大著问世。

此文原发表于《文史知识》1984年第11期，最后一段是此次结集时加的。

1996年12月5日

翁氏藏宋刻明州本《集韵》已于2000年4月28日转让给上海图书馆收藏（见《扬子晚报》2000年4月29日《翁氏藏书归国记》）。

2001年9月13日

日本宫内厅藏宋安康金州军刻本《集韵》已在中国影印出版。

2002年12月12日

请见本论文集跋语。

2003年6月

沈括《梦溪笔谈》所载切韵法绎析

汉语等韵学发轫于唐，迄民国仍有撰著，前后历一千余年。学人欲了解宋代前期的切韵学（详见本文第二节）的状况，主要依据《七音略》、清光绪年间返国的《韵镜》、六年前返国的《卢宗迈切韵法》三书及其他零星材料推阐。然而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卷十五“艺文二”第一条“切韵之学”条对研究11世纪甚至其前的切韵学史有着很为重要的意义，《笔谈》“切韵之学”条内涵颇丰，记述了当时流传的多种切韵法，惜乎这些切韵法在后代失传，遂使《韵镜》、《七音略》一系切韵图处于独尊地位。我们应该打开这一库藏，绎析探究，使北宋时期相当繁荣的等韵学的面貌重现于学界。

一、沈括与王宗道、卢宗迈

《梦溪笔谈》“切韵之学”条：“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以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如𩔝字文从而犬，亦切音也。殆与声俱生，莫知从来。今切韵之法，先类其字，各归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齿音十，半齿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为五音，天下之声总于是矣。每声复有四等，谓清、次清、浊、平也，如颠天田年，邦胮庞厖之类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为之。如帮字横调之为五音，帮当刚臧央是也。（帮宫之清，当商之清，刚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纵调之为四等，帮滂傍茫是也。（帮宫之清，滂宫之次清，傍宫之浊，茫宫之不清不浊。）就本音本等调之为四声，帮牓傍博是也。（帮宫之清平，牓宫清之上，傍宫清之去，博宫清之入。）四等之声多有声无字者，如封峰逢止有三字，邕胸止有两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

亦然,滂汤康苍止有四字。四声则有无声亦有无字者,如萧字肴字全韵皆无入声,此皆声之类也。所谓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切须归本母,韵须归本等。切归本母谓之音和,如德红为东之类,德与东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轻中轻。本等声尽,汎入别等,谓之类隔。虽隔等须以其类,谓唇与唇类,齿与齿类,如武延为绵、符兵为平之类是也。韵归本等,如冬与东,字母皆属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声,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韵也,以其归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声。东字乃端字中第三等声,故德红切,红字第三等韵也,以其归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声。又有互用、借声,类例颇多。大都自沈约为四声,音韵愈密。然梵学则有华竺之异,南渡之后又杂以吴音,故音韵庞驳,师法多门。至于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乐家所用,则随律命之,本无定音,常以浊者为宫,稍清为商,最清为角,清浊不常为徵羽。切韵家则定以唇齿牙舌喉为宫商角徵羽,其间又有半徵半商者,如来日二字是也,皆不论清浊。五行家则以韵类清浊参配,今五姓是也。梵学则喉牙齿舌唇之外,又有折摄二声。……为法不同,各有理致。虽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其理,历世浸久,学者日深,自当造微耳。”(据元大德九年东山书院刻本抄录。按“宫之清平”当为“宫清之平”。)

在宋代文献中可以见到一些与《笔谈》内容甚或文字相同相似的记载。衢本《郡斋读书志》的《切韵指玄论》提要:“右皇朝王宗道撰。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其学本出西域。今其法,类本韵字,各归于母:帮滂並明非敷奉微唇音也,端透定泥知彻澄娘齿音也,见溪群疑喉音也,照穿床审禅精清从心邪舌音也,晓匣影喻牙音也,来日半齿半舌也:凡三十六,分为五音,天下之声总于是矣。切归本母,韵归本等者,谓之音和,常也;本等声尽,汎入别等者,谓之类隔,变也。中国自齐梁以前此学未传,至沈约以后始以之为文章,至于近时始有专门者矣。”此提要当系撮录王书文字而成。据《宋会要辑稿》,王宗道在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官大理评事、崇文院检讨,在仁宗景祐四年(1037)任祠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王氏早于沈括约半个世纪。

又,《卢宗迈切韵法》:“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

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以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殆与声俱生，莫知从来。今切韵之法，先类其字，各归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齿音十，半齿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为五音，天下之声总于是矣。每音有四等，谓全清、次清、全浊、不清不浊，如颠天田年是也。字有平上去入四声，如帮榜谤博是也。字有四等轻重，如高交骄骁是也。字字有此理，皆得之自然，非人可为也。"此段文字与《笔谈》大同，但有小异。据笔者《〈卢宗迈切韵法〉述评》一文考证，卢宗迈，江西大庾人，生于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卢氏在跋记中自称"集切韵法"，可见其书不是自著，而是其前的若干切韵法的汇辑。

"挖掘"这些早期的切韵法文献，并加以比较，可见《笔谈》"切韵之学"条当亦有所承继，即沈括是"述"而非"作"。

二、"切　韵"

在《梦溪笔谈》中，未见"等"、"韵"二字连言，但屡见"切"、"韵"二字连言。卷十五第一条"切韵之学"条有"切韵之学"、"今切韵之法"、"所谓切韵法，上字为切，下字为韵"，"切韵家"，第二条"幽州僧行均"条有"幽州僧行均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号龙龛手镜"。拙文《〈卢宗迈切韵法〉述评》举《梦溪笔谈》等五十余证论断唐辽宋西夏金元皆称"切韵学"，明清始言"等韵学"，可为定谳。

藤原佐世在日本宽平年间（889—898）所辑《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内有《切韵图》一卷，就我浅闻，这是"切韵学"之"切韵"最早见于文献者。而这与周颙《四声切韵》（这是"切韵"二字最早见于韵学文献者）、陆法言《切韵》之"切韵"同义否？若不同，如何产生出这"上字为切，下字为韵"的"切韵"？祈通人赐教。

三、某种切韵图复原

《笔谈》："帮字横调之为五音，帮当刚臧央是也。（帮宫之清，当商之清，刚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纵调之为四等，帮滂傍茫是也。（帮宫之清，滂宫之次清，傍宫之浊，茫宫之不清不浊。）就本音本

等调之为四声，帮牓傍博是也。”“五音亦然，滂汤康苍止有四字。”此必系据某种切韵图而作的描述文字，我们据此描述，可将其图复原如下。

<table>
<tr><td colspan="5">音　　五</td><td colspan="4" rowspan="2"></td></tr>
<tr><td>清之羽</td><td>清之徵</td><td>清之角</td><td>清之商</td><td>清之宫</td></tr>
<tr><td>央</td><td>臧</td><td>刚</td><td>当</td><td>帮</td><td>平</td><td rowspan="4">四
声</td><td rowspan="4">清</td><td rowspan="16">四
等</td></tr>
<tr><td></td><td></td><td></td><td></td><td>牓</td><td>上</td></tr>
<tr><td></td><td></td><td></td><td></td><td>傍</td><td>去</td></tr>
<tr><td></td><td></td><td></td><td></td><td>博</td><td>入</td></tr>
<tr><td></td><td>苍</td><td>康</td><td>汤</td><td>滂</td><td>平</td><td rowspan="4">四
声</td><td rowspan="4">次
清</td></tr>
<tr><td></td><td></td><td></td><td></td><td></td><td>上</td></tr>
<tr><td></td><td></td><td></td><td></td><td></td><td>去</td></tr>
<tr><td></td><td></td><td></td><td></td><td></td><td>入</td></tr>
<tr><td></td><td></td><td></td><td></td><td>傍</td><td>平</td><td rowspan="4">四
声</td><td rowspan="4">浊</td></tr>
<tr><td></td><td></td><td></td><td></td><td></td><td>上</td></tr>
<tr><td></td><td></td><td></td><td></td><td></td><td>去</td></tr>
<tr><td></td><td></td><td></td><td></td><td></td><td>入</td></tr>
<tr><td></td><td></td><td></td><td></td><td>茫</td><td>平</td><td rowspan="4">四
声</td><td rowspan="4">不
清
不
浊</td></tr>
<tr><td></td><td></td><td></td><td></td><td></td><td>上</td></tr>
<tr><td></td><td></td><td></td><td></td><td></td><td>去</td></tr>
<tr><td></td><td></td><td></td><td></td><td></td><td>入</td></tr>
</table>

此图与现存之《韵镜》、《七音略》结构差别较大，且用字亦有歧异：“刚”（《七音略》作“冈”）、“央”（二书皆作“鸯”）、“牓”（二书皆作“榜”）、“傍”（二书皆作“螃”），“康”（二书皆作“穅”）、“苍”（二书皆作“仓”）、浊之“傍”（《七音略》作“旁”）。尤可注意的是，清之去为“傍”，而《广韵》、《集韵》去声宕韵帮母补旷切均无“傍”字。

这一种切韵图亡佚,《笔谈》记述的这则资料,可谓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彼时的切韵学不是单一色调,原也是绚烂多姿的。

四、影 晓

传世韵图及其他切韵学文献中,喉音四母的次序有两派:一是影晓匣喻,《韵镜》、《七音略》、《卢宗迈切韵法》、《切韵指掌图》皆如此;二是晓匣影喻,王宗道《切韵指玄论》、《四声等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如此。《笔谈》同前者,此系据"横调之为五音,帮当刚臧央是也","邕胸止有两字"论断。

五、"等"、"平"与"不清不浊"

《笔谈》:"每声复有四等,谓清、次清、浊、平也。"与《韵镜》、《七音略》大异,这"等"指声的发音方法,共开列了四个术语,这属于下述A型切韵法。下文在"帮滂傍茫"四字后夹行小注也开列了四等的术语,为"清"、"次清"、"浊"、"不清不浊",这属于下述B型切韵法。二者体系不同。若无此认识,将会以为沈括自相矛盾,或以为其中之一为传抄、传刻之误。

六、"五 音"

就五音的排序言,仔细观察《笔谈》,它记载了三种切韵法。

A. 唇舌牙喉齿,半齿半舌。此论断系据"今切韵之法,先类其字,各归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齿音十,半齿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为五音,天下之声总于是矣"。

B. 唇舌牙齿喉。此据"帮字横调之为五音,帮当刚臧央是也","滂汤康苍止有四字"。

C. 唇齿牙舌喉。此据"切韵家则定以唇齿牙舌喉为宫商角徵羽,其间又有半徵半商者,如来日二字是也"。

上述A、B、C三型切韵法在其他文献中也有记载,兹搜辑于下,以收相互印证之效。

《广韵》卷末"辩字五音法"、元刊本《大广益会玉篇》卷首之《玉篇广韵指南》内"辩字五音法"皆有"序":"凡呼吸文字即有五音:唇声、

舌声、牙声、喉声、齿声等。"《笔谈》A 型同之。

敦煌守温韵学残卷、《韵镜》、《七音略》、王宗道《切韵指玄论》(据其三十六母名称)皆以唇舌牙齿喉为序,《笔谈》B 型同之。

至于《笔谈》C 型,王应麟(1223—1296)《小学绀珠》卷一"四声"所载第二则(即"一曰")"五音"资料与之相同。

《笔谈》三型切韵法的共同点是悉以唇音起始,可见 11 世纪流行这种唇音起首的切韵法。除了《笔谈》的 A、B、C 型外,早期文献还有另两种唇音居首的切韵法:一是《广韵》(泽存堂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高宗绍兴间浙刊本)卷末"辩字五音法"和元刊本《大广益会玉篇》卷首所载类书《玉篇广韵指南》内"辩字五音法"都有"一唇声并饼(唇声清也),二舌声灵历(舌声清也),三齿声陟珍(齿声浊也),四牙声迦佉(牙声浊也),五喉声纲各(喉声浊也)",则其次序为唇舌齿牙喉;二是宋人张麟之《韵鉴序例》"调韵指微":"五音定于唇齿喉牙舌。"

值得注意的是,载籍中还有一种以牙音为首的切韵法:《卢宗迈切韵法》,《切韵指掌图》前之"辨字母次第例"、"三十六字母切韵五音乐律五音旁通图",《四声等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均以牙音起始,即牙舌唇齿喉为序,这些书都流行于 11 世纪以后。

另外还有一种喉音起始的切韵法,《笔谈》:"梵学则喉牙齿舌唇。"神珙(?)《五音声论》:"东方喉声,西方舌声,南方齿声,北方唇声,中央牙声。"王观国(北宋南宋之际人)《学林》卷八"双声叠韵"条"古人以四声为切韵,……必以五音为定",次序与上同。宋本《切韵指掌图》卷首"辨五音例"则以喉齿牙舌唇为序。

以上是笔者从《梦溪笔谈》及现存的其他文献中勾稽出来的多种切韵法,并加以归纳、分类。乍看起来,可能令人产生错觉:唇音起始的切韵法流行于前,牙音为首的切韵法则在后,其实不然。"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这是宋人的共识,汉语切韵学仿自梵语悉昙学,俞敏先生《等韵溯源》认为始于唐代实质是巫术的密宗经典之流入中国,译咒语时须精熟悉昙学,并模仿应用以分析汉音结构,切韵学遂得以产生。因此以牙音开始和以喉音建首的汉语切韵法自可理解,梵文悉昙体文 ka 组,汉译名称"牙声"、"喉声"、"喉中声"、"舌根声"、"舌

本声”不一，异名而同实。观《大正藏》所载空海、安然、淳祐、明觉诸人的悉昙学著作，梵文体文均以 ka 组为首，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很早时期的切韵法必有以牙音为首的一系，只是资料佚散罢了。12 世纪的那些牙音起始的切韵法是渊源有自的。

又一问题接踵而至：既然梵文悉昙学体文以 ka 组建首，汉语切韵法怎么会以唇音起首？而且有好几种型式，仅《笔谈》就录载了三型。似可这这样解释：声以 k 开始，即口腔发音器官从最里面的舌根音排序；声以 p 开始，即从最外面的双唇音列次，以唇音建首的切韵法是中国人创造性的体现。晚唐的守温韵学残卷即如此，可见这种创造时间之早；广韵系韵图（详《鲁国尧自选集》第 94 至 99 页）《韵镜》、《七音略》皆始帮终日，可见其应用之广。可否有其他解释？唇音起始是否另有所本，祈方家赐教！

七、切韵五音参配乐律五音

《笔谈》记载了三则切韵五音参配乐律五音的体系：(一) 见“帮当刚臧央”的夹行小注，(二) 据“精徵音第一等声”、“匣羽音第三等声”，(三) 据“切韵家则定以唇齿牙舌喉为宫商角徵羽，其间又有半徵半商者，如来日二字是也”，兹列表于下：

	宫	商	角	徵	羽	半徵	半商
(一)	唇	舌	牙	齿	喉		
(二)				齿	喉		
(三)	唇	齿	牙	舌	喉	来	日

八、切韵门法

董同龢先生《等韵门法通释》指出，今传等韵门法见于《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等，“可是事实上门法并不是从等子的作者才创设的”，并举敦煌守温韵学残卷的“类隔”、“寄韵凭切”为例。《笔谈》也述及门法，首为“音和”、“类隔”，与王宗道《切韵指玄论》字句几乎一致。又云“又有互用、借声，类例颇多”，但未阐述。“互用”在《卢宗迈切韵法》等书中可见到（详见《鲁国尧自选集》页 111），“借声”则不知何指，从“类例颇多”可见 11 世纪切韵门法之

繁夥，惜乎《笔谈》只寥寥数笔。

九、“重中重，轻中轻”

“字有重中重，轻中轻。”因此语前后文皆论声，故可推断“重中重”、“轻中轻”系指声而言，显然这与《七音略》的“重中重”、“轻中轻”不同。《笔谈》讲罢“音和”之后，即云“字有重中重，轻中轻”，下文是“本等声尽，汎入别等，谓之类隔。虽隔等须以其类，谓唇与唇类，齿与齿类，如武延为绵、符兵为平之类是也。”那么，“重中重，轻中轻”是指类同而等隔，用现在的语音学术语说，是发音部位同而发音方法异，下举的两例即通常所谓的重唇、轻唇之别。按，今人标点有作“重、中重、轻、中轻”者，待研。

十、“韵归本等”

“韵须归本等”。“韵归本等，如冬与东，字母皆属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声，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韵也，以其归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声。东字乃端字中第三等声，故德红切，红字第三等韵也，以其归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声”。

韵也有等，有第一等韵，有第三等韵，前者如宗字，后者如红字。同等韵与同等声相配，声也有第一等声，有第三等声，前者如冬字，后者如东字，而且其切下字的声也有相应的等。这些跟流传至今的切韵法迥不相同。

十一、结　语

沈括《梦溪笔谈》“切韵之学”条，共800余字，除去170字叙“梵学”（梵语悉昙学）外，皆是述“汉学”（汉语切韵学）。其内容甚丰，但后世学者不太重视这一库藏，有些论著虽引用此条若干词语，然未能洞其症结。笔者体味、抽绎多年，自谓得其觾理：A. 关键在于认识其多元性，此条所载切韵法不止一种，否则或视作瞀乱，或疑为版本之误，或只录其中一种，而舍其余。B. 此条当前有所承，乃11世纪流行的切韵法的资料汇辑，各种体系、术语竞列纷陈，沈括结集于一条之内，未曾厘别标识，疏理阐发，也许因为这些在当时人看来都是

寻常之物,其理自明的。但是其中大多在后代失传,以致不能悉其奥旨。C. 11 世纪甚或其前,切韵蜂起,诸家争鸣,“师法多门”,具此宏观的学术史认识,方能寻绎,董理,故就力之所及,或区而别之,或阐而明之,或予以复原,或略加引申,亦遵先圣之教:“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1998 年撰

参考文献

晁公武　《衢本郡斋读书志》,宛委别藏本。

陈　澧　《切韵考》,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84。

董同龢　《等韵门法通释》,《董同龢先生语言学论文选集》,食货出版社,1974。

胡道静　《梦溪笔谈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李新魁　《汉语等韵学》,中华书局,1983。

鲁国尧　《〈卢宗迈切韵法〉述评》,《中国语文》1992 年 6 期、1993 年 1 期;又《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

罗常培　《汉语音韵学导论》,中华书局,1956。

潘文国　《韵图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影印本,1984。

沈　括　《元刊本梦溪笔谈》,文物出版社 1975;又扬州广陵古籍刊行社,1997。

俞　敏　《等韵溯源》,《音韵学研究》第 1 辑,1984。

赵荫棠　《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1957。

原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字卷)页 443—4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卢宗迈切韵法》述论

提要 百余年前，黎庶昌、杨守敬使《韵镜》返归故土，中国语言学界奉为等韵学的经典。无独有偶，《卢宗迈切韵法》这一宇内孤本也藏于东瀛，由于日本学者的大力帮助，笔者有幸获睹。我们认为，只有把宋代音韵学史和宋代语音史作为广阔的背景，才能对《卢宗迈切韵法》进行深入的研究，了解其珍贵的学术价值。所以笔者穷廿月之功，读逾万卷书而成此文。卢宗迈辑《切韵法》，在中国自宋以来的目录书与音韵学书皆不见记载，本文对卢宗迈的生平仕履、"切韵法"的来龙去脉作了尽可能详密的研究，证明了其在中国语言学史和汉语音韵学史上的重要的学术地位与价值；还阐述了宋代韵书、字书编纂史、三代"篇韵"的变迁，指出宋代既有广韵系韵图，又有集韵系韵图，特别提出了"切韵图是层累地造出来的"观点，而这与流行的韵图音系说相对立。此文还讨论了切韵图的门法、指掌图、宋代语音等问题。

一

在宋代(960—1279)语言学史中，音韵学占有主导地位。魏了翁[①]《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潘舍人昌年集篆韵序》："韵书既作，学者趋便就简，……徐鼎臣兄弟著书以行于世，可谓许氏功臣，乃亦分类韵谱以从世好，岂势之所趋不得不然邪？潘侯之书集韵也，依楚金部叙而加详焉。"可见韵学是当时的"大势"和"世好"。

隋陆法言《切韵》出而前此诸家韵书尽废。唐代是切韵系韵书的繁荣时期，述作蜂起。到宋代初期，虽然也有私家著作行世，如曾致

① 若无必要，宋人姓名前不冠以朝代名。

尧(947—1012)《四声韵》五卷,[①] 但是韵书多是皇帝下诏令儒臣文士编纂而后颁行的,如作为科举功令的多种《韵略》(包括官定增订本),集前此韵书大成的《广韵》,具有宋代文化创新特色的《集韵》,这都是中央集权国家推行语文规范化政策的体现。

宋代音韵学的繁荣还表现在古音学的发端。众所周知,经学史上有宋学时期,宋学健将吴棫既著有《书裨传》,是怀疑古文经的先行者之一,吴棫又在诗经学上别开生面,著《毛诗叶韵补音》和《韵补》,此二书实是古音学的开山著作,笔者将有专文论述。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切韵学(唐宋西夏金元都叫"切韵学",明清以来方名"等韵学",此须辨明,详后)到宋而臻大盛,可用沈括的"音韵庞驳,师法多门"[②] 来形容,没有官定的印记,倒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大多数被湮没,只在宋代目录学著作等书中留下了一些书名,这是由于受到标榜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儒者的歧视的缘故。如周麟之《海陵集》卷三《论乞进读本注音切》:"乞于进读本内间注音切,臣非不知帝王之学志于治道,初不问此区区之言,可谓矜小节而暗大体矣。"欧阳修《居士集》卷四二《韵总序》:"儒之学者信哉远且大而用功多,则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为学,儒者之所用也。其为精也,有声形曲直毫厘之别,音响清浊相生之类,五方言语风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则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学者莫肯舍其所事而尽心乎此。"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〇《答杨元范》指出在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观点:"字画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洪迈《容斋五笔》卷七:"小学琐琐。"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二《起请科场札子》:"是致举人……诘之以圣人之道,瞢若面墙,或不知句读,或音字乖讹。"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五载北宋人李新《取士札子》也指出当时举人"至于所专之经,句读不知,音切不识。"[③] 凡此皆可见宋代士大夫的一般心态,还

① 见曾巩《元丰类稿》卷一二《先大夫集后序》。王偁《东都事略》卷四八谓致尧"好纂录",《宋史》本传亦如是云。其《四声韵》当是编纂而成。

②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五。

③ 《历代名臣奏议》所录李新二札子不见于李新《跨鳌集》,李集系据《永乐大典》辑出。如此,可据杨书增补。

是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序》说得一针见血："今学者以利禄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弃捐不省。"[①]

现在能见到的宋代"等韵图"屈指可数：《七音略》，它是郑樵巨著《通志》的二十略之一；《切韵指掌图》的盛名则是由于传为司马光所著的缘故；《四声等子》的流传跟佛门有关；《韵镜》在前清光绪年间方才回归：如此而已。至于邵雍《皇极经世》中的"声音倡和图"和祝泌《皇极经世解起数诀》中的准韵图那是为其象数易学服务的。历来只能靠这些资料来了解宋代"等韵学"史，因而有些见解未能中的，甚至不乏错误。

如今我们又发现了宋代的一本等韵著作——《卢宗迈切韵法》。笔者于 1990 年秋应日本学术振兴会之邀，与东京大学平山久雄教授合作研究宋元语音史，赖平山久雄、远藤光晓二位先生的帮助，得以获睹这一宇内孤本，经研究后特作述论于下。

二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汉籍目录》(昭和六十二年即 1987 年发行)载有"卢宗迈切韵法　一卷　宋卢宗迈撰　室町写　一册　二十五糎　线"。

此抄本原为粘叶装，[②] 共五张纸，每张纸的左上方分别有"一二三四五"的字样，也有胶的痕迹，可知为粘接处。每张纸折成两叶，即共十叶。后来改为线装，即现在所见装订形式。原抄本纸高 25 厘米，半叶宽 15.6 厘米(改作线装时，右端加了一点纸，所以宽度扩为 16.7 厘米)。四周单栏，高 21.3 厘米，宽 12.8 厘米。书皮题"卢宗迈切韵法"，右下题"东寺(小字)观智院(大字)"。书皮后半叶即为正文，此半叶上端钤朱文大方印"帝国图书馆藏"，右下角有朱文圆记"明治三三·三·三一购求"。日本国会图书馆可溯源至明治八年(1875)的东京书籍馆，明治十二年(1880)改称东京图书馆，明治三十

① 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序》，见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一六及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

② 1990 年 11 月、1991 年 2 月我两次去日本国会图书馆阅读《卢宗迈切韵法》，1993 年秋又请远藤光晓先生专程查阅此书的版本及装订情况，今据远藤先生复函作一概述。

盧宗邁切韻法

年(1897)改称帝国图书馆,昭和二十三年(1948)设置国立国会图书馆。《卢宗迈切韵法》抄本正文每半叶一般十行,也有十一行或八行的,行十八至二十二字不等。第八叶后半叶、第九叶前半叶为“跋”,第九叶后半叶只有“一交了”一行三字。第十叶前半叶为三十六字母指掌图和调四声例字图,第十叶后半叶空白。

还有第十一叶,纸张显然与前十叶不同。第十一叶前半叶是二纸片粘成,右宽 8.7 厘米,左宽 8 厘米。此半叶首行题“延享三年岁舍丙寅孟春廿二日加缮装了”,次行下方署“僧正贤贺(大字)春秋六十三岁(双行小字)”。此二十七字与书皮之“东寺观智院”同为贤贺手笔。延享乃江户时代(1603—1867)樱町天皇年号,延享三年为 1746 年。承平田昌司先生见示《密教大辞典》(密教大辞典编纂会,1931 年出版,1979 年京都法藏馆增订版)“贤贺”条,兹撮其要:贤贺(1684—1769),东寺观智院第十三世,俗姓藤原氏,贞享元年生,十岁在观智院剃度。观智院金刚藏的古书几乎都经他亲手装缮过。宽保元年(1741)任观智院僧正,明和六年圆寂。又,大正藏第五十册第 2052 号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一卷,系据平安时代写观智院藏本,末有跋记“……遂缮装毕”,次行写“延亨(笔者按,‘享’之误字也)四(原注:丁卯)岁六月廿五日僧上(笔者按,系‘正’之误字)贤贺(原注:行年六十四岁)”,可资参证。

第十一叶后半叶空白。

《卢宗迈切韵法》长期深藏于京都东寺观智院,大概在明治年间流出,1900 年为当时的帝国图书馆购得,帝国图书馆于二次大战后改称国会图书馆,收藏此书至今。

书皮上的书名“卢宗迈切韵法”六字与书内字同出抄写者之手,书法较劣。日本图书馆学家定为室町时期(1393—1573)写本,那么这书名当不晚于该时期。我想书名本来当不致如此,因为迄今所知的宋代切韵学著作并不冠以编著者的姓名,绍兴年间的《秘书省续编

到四库阙书目》著录"僧守温述三十字母图一卷","僧守温"三字并不在书名中。此书卢宗迈跋,自称"集切韵法",他辑集的资料中有"三十六字母切韵法"等,又屡言及"切韵法",也许卢氏汇辑以后,自己命名为《切韵法》,也许其后的人如此命名。现存宋人书目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以及《通志·艺文略》、《玉海·艺文部》、《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等不见此书名,但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一二昃字号第一厨"韵书"中著录有"切韵法,一部一册,阙","五音切韵法,一部一册,阙"。遗憾的是,《文渊阁书目》既未注明时代,也未载编著者,因此我们无法确指《卢宗迈切韵法》与《文渊阁书目》所载二书是何关系。卢宗迈既是辑集者,又撰序跋,所以后人把他的姓名放进了书名里,这也许是传入日本以后的事,因与日本室町时期大致相当的中国明代(1368—1644),等韵著作也不冠编著者的姓名,不像清代有李汝珍的《李氏音鉴》、徐师臣的《徐氏等韵捷法》,即令如此,也只冠以姓氏。因为此书书皮是作"卢宗迈切韵法",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汉籍目录》也如此著录,所以我们也就姑且仍之。

日本书目定卢氏为宋人,系据书序:"宗迈自僮时悟此,今四十年矣,鲜闻晓者,故书而传之同志,岂曰小补哉?淳熙己亥孟春涿郡卢宗迈撰序。"跋尾有"淳熙丙午岁四月壬午卢宗迈因叙所见,附于所集切韵法后。"淳熙己亥是南宋孝宗淳熙六年即 1179 年,"今四十年",可能是举其成数,姑认作整数,则上推至高宗绍兴十年即 1140 后,他自称"僮时悟此",《说文》:"僮,未冠也。"《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因此可推知卢宗迈当生于徽宗宣和(1119—1125)后期。书中所能提供的关于辑集者的信息仅此而已。

卢宗迈何许人?宋史无传,哈佛燕京学社的《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朱士嘉《宋元方志传记索引》、昌彼得等《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李国玲《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皆未列其人。我们终于在地方志和类书中找到他的传记,卢宗迈与其从父汝舟密切相关。清同治七年(1868)《南安府志》卷一三《选举·诸科表·武干科》:"卢汝舟,大庾人。"卷一四《选举·封荫表》:"卢宗迈,以从父汝舟荫,官至武翼大夫。"明天顺五年(1416)李贤《大明一统志》卷五八《江西布政司·南安

府·人物》有二人的简传,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白潢增修《西江志》卷九三、雍正十年(1732)谢旻《江西通志》卷九三的汝舟、宗迈传全袭明一统志。明万历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一一有汝舟、宗迈传,廖用贤《尚友录》卷二也有宗迈传。同治七年《南安府志》卷一六《宦迹》、卷一七《武略》,同治十三年(1784)重刊同治十年《大庾县志》卷一二《人物·乡贤》则颇详细,二书仅文句略有差异,兹录同治《大庾县志》于下:

> 卢汝舟,字仲济,博综群籍,留心世务。政和间以陆藻荐,隶御史府,廉约守正,不事刻深。绍兴中地震,上疏推本刘向、京房之意,无虑数千言。先是宣和时卢中等出使高丽国,与其国王论中国及其国与女直战陈之事甚悉,汝舟得其详于中等,又得钟邦直所记使女真行程。建炎三年编为十卷,上闻。复奏赵鼎论战守之具,意在恢复。秦桧恶之,以武翼大夫领宫祠。

"女直"、"女真"并见,原书如此。同书卢宗迈传:

> 卢宗迈,字绍先,汝舟从子也。性聪明,务博览,尤精武艺。年十三,隶御史府。枢密使汪彻临边视事,檄之随行,宗迈知险厄,画城守屯戍之地,陈攻战之法,彻深嘉之,拜武阶,既而列馆职,文雅练达。两朝日历成,一岁五迁,官至武翼大夫。宗迈自以性好文史,遭时建武,晚益藏书,多至数万卷,盖终耻言致身武阶云。

案,"汪彻"应作"汪澈",字明远,生于徽宗大观三年(1109),卒于孝宗乾道七年(1171)。据《宋史》汪澈传与高宗纪、孝宗纪、宰辅表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〇、一九一、二〇〇,汪澈任湖北京西宣谕使和参知政事时,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三十二年(1162)两次临边荆襄。王明清《挥麈录·第三录》卷三亦记载汪明远为荆襄宣谕使抗击金将刘萼获胜事。《宋史·孝宗纪》载,乾道二年(1166)进呈《钦宗日历》,淳熙三年(1176)上《太上皇日历》。《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五所载孝宗隆兴元年(1163)八月三日御史台的一文书中提及卢宗迈,职衔为"成忠郎六察点检文字"。地方志中卢传所涉,多可按稽史籍。

卢宗迈虽出身武职世家,但性聪明,故僮时便悟韵学;从父博综

群籍,本人性好文史,藏书多至数万卷,这在当时颇为不易。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一:"仕宦稍显者,家必有数千卷,然多失于雠校也。"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一四《万卷堂记》述庐陵欧阳汇藏书万卷,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九《洪氏天目山房记》载洪舜俞藏书13000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自序藏书24500卷。因此卢宗迈之集切韵法是与其家庭的文化背景和本人的学术修养密不可分的。

承邓瑞教授见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杂艺类:"《增广射谱》七卷,淳熙中诏进士习射,书坊以此为射利。末二卷为卢宗迈《射法》,亦简要可观。"(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五六子部杂艺术抄录陈振孙语,唯略去末三字)方志称卢宗迈文武全才,《切韵法》、《射法》二书是实证。

既是大庾人,何以自署"涿郡卢宗迈"? 卢联桂等编《江西卢氏通谱》(民国十年石印本,封面题"江西全省卢氏通谱")推始祖为东汉末范阳涿人卢植。南北朝时范阳卢氏为北方著名的世家大族,由北齐入隋的著名诗人卢思道和陆爽、陆法言父子等九人参与了开皇六年(686)的长安论韵,因而也是《切韵》纲纪的制定人之一。[①] 唐时卢氏一支迁入江西,此后子孙繁衍于各县。"集切韵法"的卢宗迈也名列于这家谱中,他自称涿人,述郡望也。在隋、宋两代各有一位卢氏对"切韵"之学做出了贡献,可说是汉语音韵学史上的佳话。

《卢宗迈切韵法》之为宋代书籍,尚有一证。此存于日本的抄本内有涉及宋帝名讳之字:宣祖弘殷(太祖太宗父)之"殷"两见,首见缺笔,再见不避;仁宗之嫌名"徵"、钦宗之名"桓"、理宗嫌名"匀"均不缺笔。我们考察了下列四本韵书:日本静嘉堂文库藏高宗绍兴间浙刊本《广韵》、日本内阁文库和上海图书馆藏孝宗乾道己丑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刊《钜宋广韵》、北京图书馆藏孝宗时潭州刻本《集韵》(中华书局影印收入《古逸丛书三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藏淳熙丁未田氏刊本《集韵》,四书并于"殷"字缺笔。宋版书的避讳问题并

---

① 鲁国尧《长安论韵考——切韵序史实考之一》,中国声韵学国际研讨会(香港,1990年6月)宣读。

不像一般版本学、避讳学著作所说的那么简单。上述四种韵书对徽宗之“佶”、钦宗之“桓”皆不避。对高宗之“构”,绍兴《广韵》、乾道《钜宋广韵》缺笔(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影印之《钜宋广韵》缺去声一册,故去声字据日本藏全本),两《集韵》则否。孝宗之“慎”,乾道《钜宋广韵》居然不缺笔,但两《集韵》避讳。因此,抄本《卢宗迈切韵法》“殷”字再见不缺笔,也许是所据底本“避讳不尽”,也许是“避讳经后人回改未尽”(用陈垣《史讳举例》语)。这在其他古籍中也有类似现象,如铁琴铜剑楼藏宋理宗时刊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韵略条式》第 23 至 27 页详列宋代诸帝讳字,缺笔者 15 字,但英宗之“曙”、宁宗之“擴”竟忘了缺笔(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本缺笔,但仁宗之“祯”忘了缺笔),《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影宋写本《切韵指掌图》跋”:“宋讳惟‘匡贞朗’等尚减笔,余不尽然,盖转写失之。”抄本《卢宗迈切韵法》“殷”字首见时缺笔,当是抄手照录的结果,可见所据底本为宋本。考《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韵略条式》第六一、六二叶载绍熙五年(1194)十一月二十三日,孝宗神主祔庙,宣祖“皇帝忌及讳依礼不讳不忌”,《宋史》卷三七宁宗纪绍熙五年、同书卷一〇七“礼志十”庆元二年(1196)礼部太常寺奏议亦载此事。如果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猜测,现存日本的抄本《卢宗迈切韵法》所据底本的抄刻的时间下限是绍熙五年(1194)十一月二十三日,上限当然是卢宗迈著“跋”的时间淳熙丙午(1186)四月壬午。这底本未尝不可能是卢氏晚年的稿本或抄本。

《韵镜》自返归故土后,中国学者对它的重视,超过《七音略》,主要原因在于前有刊行者张麟之作的《韵鉴序例》,张序于嘉泰三年(1203),称年二十得《韵镜》,研究《洪韵》五十载,设二者相接,则张年稍幼于卢宗迈。一百年前中国音韵学界始知有张麟之(但其人之生平仕履至今尚未能考得),无独有偶,如今又得卢宗迈,可谓南宋初年“切韵学”的双璧,他们不仅年相值,而且所传述的“切韵法”、“切韵图”各为一系,相映生辉;为我们提供了宋代音韵学史和宋代语音史的宝贵资料。

众所周知,汉语“切韵学”与梵语的悉昙学有密切关系,佛教由中国东传日本,二者也随之流入扶桑。北宋年间的书禁政策和日本藤

原氏的闭关政策影响了两国的文化交流，但熙宁五年(1072)日僧成寻来宋，后令其弟子携归佛经四百余册，内即有《天竺字源》七册。1167年(孝宗乾道三年)在日本代表武士利益的平清盛执政，大力发展日宋间的贸易，中国书籍大量传入日本。南宋间入宋日僧，史乘可考者八十余人，南宋末宋僧道隆等赴日倡导禅宗。据前贤考证，《韵镜》传入日本当在13世纪中叶左右，即宋理宗年间前后。卢书可能也在南宋或稍后传入日本。但《韵镜》大显，而卢书一直深藏于佛寺，可谓有幸有不幸。

三

《卢宗迈切韵法》(此后一般简称"卢书")是宋代切韵学的一个派系的资料的汇集，原无目录，兹按原书次序述如下(序号系笔者所加)：

(一) 音释切韵法难识字·淳熙己亥卢宗迈序
(二) 三十六字母切韵诀
(三) 三十六字母分清浊
(四) 三十六字母五音旁通图
(五) 三十六字母切韵法
(六) 切三十六字母法
(七) 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字图
(八) 知照、非敷、彻穿字母同呼图(案，此图名称系笔者所拟)
(九) "切韵之学"概述(此名称亦系笔者所拟)
(十) 淳熙丙午卢宗迈跋
(十一) 三十六字母指掌图及调四声例字图(此亦笔者所拟)

序跋自是卢氏手笔。(二)至(九)当为所"集"之"切韵法"，其中有些也可能是卢氏所作或加工过，某些按语和小注更有可能，但很难定。如(九)"切韵之学"概述，大部分与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五"切韵之学"条的前百余字相同，但其后的"全清、次清、全浊、不清不浊"的名称跟沈书并不同，似为自增。首先要揭明的是，(一)至(十)体系、术语是内部一致的，如三十六字母的排列始见终日，四处悉同；清浊之名、浊上变去，前后无异。(十一)居于跋后，但中间隔了半叶，即第

九叶下半叶，只有一行三字“一交了”，余为空白，据此，似可认为，这（十一）恐系后人或抄手所附益；且“指掌图”中三十六字母排列顺序虽同于（三）、（四）、（六），但有一点歧异，图之“晓匣影喻”，卢书作“影晓匣喻”，此变可作为佐证。

卢书开卷就是“音释切韵法难识字”，是因为后面的“三十六字母切韵法”中列有 72 个助纽字，其中有 14 个“难识字”，加以音释。紧接着的是序，移录于下：

> 切韵之难易尽见，昔人之诗有云：“字母唯三六，相生百万名。当家疑是客，别国却为亲。”又有云：“的当尘毛现，参差海岳倾。世间难会法，影响误聪明。”又有云：“未明须得旨，及晓不关心。验人端的处，下口便知音。”人谓其难学者，乃切韵法百八字中有难识者字，而又有音声偏僻远，罕人传授，是以难学也。今以难识者字或直音，或反切，或调声，并集于前，使人人可识。可识则易于口诵，口诵通熟则归母甚易，既能归母则可反切，既能反切则字无不识，是使难学之事而终归于易学也。宗迈自僮时悟此，今四十年矣，鲜闻晓者，故书而传之同志，岂曰小补哉？淳熙己亥孟春涿郡卢宗迈撰序。

玩文意，音释难识 14 字恐亦系卢氏所为。序首引“昔人之诗”三首，当即其时泛称之切韵诗，张麟之《韵鉴序例》“横呼韵”：“故古人切韵诗曰：‘一字纽纵横，分敷十六声。’”卢序所引第一首见于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P2012 卷）：“诗云：‘在家疑是客，别国却为亲。’”刘复据纸色及字迹，断此卷为唐季写本。潘重规《瀛涯敦煌韵辑别录》说：“此尤足明诗语乃守温以前所传之歌诀。”“验人端的处，下口便知音”亦见于宋本《切韵指掌图》“辨双声叠韵例”之“歌”。卢跋为：

> 世传切韵四十四图，用三十六母与集韵中字，随母所属，次第均布于图间。而有声有形与有声无形，万一千五百二十声，该括世之所有字，并在其中。揣其声数，乃易之大衍，六十甲子，五行之数，若布万一千五百二十筭，以六除之，则筭无余数。其有用二字云切，或云反者，其理则一，亦五行相生，自然之理，非人意可强为之。若按图调切，则有平上去入四法；横念则有随清浊归韵法；随平仄四声念，则有四等重轻法；又有两字反切归其字

者，为之切韵法：相为表里，则是切韵有四法也。详此四法，乃是前古通晓易数之智士作而成之。每字左右上下各有一字，声声皆别，如中央之视四方，各有定位；若周天之列宿，各有分野。四十四图字字皆然，其非通幽悟微之人，焉能造是？而后学者未有能为言其所自之详者也。淳熙丙午岁四月壬午卢宗迈因叙所见，附于所集切韵法后，而作颂曰：

满空世界字音容，图局包含尽在中。

若人明了个个意，豁然如海与天通。

原抄“若人明了个个意，豁然如海与天通”为一行，其下有双行小字“三百三十六字”，大部伸入地脚，恐系抄手所记抄写的字数。“若人明了”一行后低三字另写一行“集韵字八万八百五十六”。按，《集韵》卷首“韵例”末叙字数为“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注“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所谓“新增”是与《广韵》的26194字比较而言，此80856乃是误将二数相加的结果，当亦非卢跋原有的内容。

综观序跋，卢氏特别强调“切韵法”，指出使用办法，熟练掌握后可达到字无不识的地步。请参看卢书(二)“三十六字母切韵诀”：

欲尽识世间字者，当熟诵切韵法(原注：一百八字)，必呼吸端的，无一字差讹，则反切若有神助，如磁石吸针，似子之见母。且以东德二字归母，东字则云，东丁颠端；德字则云，德丁颠端，是东德二字皆归端字母也。且如德红切，则云，德丁颠东，红字与东字同韵，故切归东字也。字字用此为例，则无所不通，无所不识。

这些跟张麟之《韵镜识语》的话何其相似乃尔：“读书难字过，不知音切之病也。诚能依切以求音，即音而知字，故无载酒问人之劳。”“遂知每翻一字，用切母及助纽归纳，凡三折，总归一律。”借用助纽字熟习反切，是宋人的通用方法。

“切韵法”，卢跋界定为“两字反切归其字”，卢书(六)“切三十六字母法”云：“切脚，如德为父，红为母，德红反切即生东字，此乃切韵(原注：‘上一字为切，下一字为韵。’)相生，天然混成。”衢本《郡斋读书志》于“切韵指玄论三卷，四声等第图一卷”下解题云：“右皇朝王宗道撰，论切韵之学，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沈括《梦溪笔谈》卷



傎 音顛 倒也

羶 尸連切 羊臭 羶字平聲

延 丑延切 安步延 [illegible]字平聲

蜎 [illegible]

榛 鋤臻切 木叢生

[illegible] [illegible]字平聲

[illegible] [illegible]

音釋切韻法難識字

祆 馨煙切 胡神名 祆 [illegible]字平聲

[illegible] [illegible]切 [illegible]字平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字平聲

[illegible] [illegible]切

[illegible] [illegible]字平聲

[illegible] [illegible]字平聲

切韻之難，易盡見前人之詩有云字母唯三十六相生百萬名當家疑是云云。切國却爲親，又有云的當塵毛現參差海山嶽傾翻。關難會，當法影響，誤聽明文有云未必須得旨反，眊不開口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人謂其難，字者乃切韻法，百八字中有難識者字而又有音聲偏旁遠近，千人傳授是以難學也。今以難識者字或直音或反切或調聲並集于前，使人人可識，可識則易於口誦，口誦通熟則歸母甚易，既能歸母則可反切，既能反切則字無不識，是使難學之事而終歸於易學也。宗邁自僮時嗜此，今四十年矣，鮮聞曉者，故書而傳之，同志豈曰小補哉。淳熙己亥孟春涿郡 盧宗邁撰序

世傳切韻四十四圖用三十六母與集韻中字
隨母所屬次第均布於圖間而有聲有形與有
聲無形萬一千五百二十聲該括世之所有字
並在其中揣其聲數乃易之大衍六十甲子五
行之數若布萬一千五百二十算以六除之則
算無餘數其有用二字云切或云反者其理則
一亦五行相生自然之理非人意可強為之若
按圖調切則有平上去入四法橫念則有隨清
濁歸韻法隨平仄四聲念則有四等重輕法又
有兩字反切歸其字者為之切韻法相為表裏
則是切韻有四法也詳此四法乃是前古通曉
易數之鄉士作而成之每字左右上下各有一
字聲聲皆別如中央之視四方各有定位若周
天之列宿各有分野四十四圖字字皆然其非
通幽悟微之人焉能造是而後學者未有能為
言其所自之詳者也淳熙丙午歲四月壬午盧
宗邁因叙所見附於所集切韻法後而作頌曰
滿塞世界字音容　圖局包含盡在中
若人明了箇箇意　豁然如海與天通　三百三十二字
集韻字八萬八百五十六

一五亦云:"所谓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四声等子》的"辨音和切字例"和宋本《切韵指掌图》"检例下"都说:"凡切字,以上者为切,下者为韵。"可见这是宋人的普遍观点。"切韵"二字连言,《广韵》卷首载《唐韵序》后,有一段话,内有"切韵者本乎四声,纽以双声叠韵"之语,不知出自何处,可能是唐人语,至于宋代韵学文献在在皆是,《卢宗迈切韵法》出现 14 次,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五有"切韵之学"、"切韵之法"、"切韵家"、"幽州僧行均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等词语,袁本《郡斋读书志》于"四声等第图"下解题有"切韵之诀也"之语。张麟之《韵鉴序例》中有"切韵诗",述及神珙著切韵图,杨倓得《切韵心鉴》。洪迈《容斋五笔》卷八:"为四声切韵之学者,必强立说。"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一四:"古人文字但取其声音之协,初无切韵之说。""详究古人切韵之始,至简易而切当。"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序》:"铉苦许氏偏旁奥密,不可意知,因令锴以切韵谱其四声,庶几检阅力省功倍。"宋人书目及《玉海》、《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柳曜《五音切韵枢》、王宗道《切韵指玄论》、僧鉴言《切韵指玄疏》、谢晖《切韵义》、邱世隆《切韵搜隐》、佚名《切韵内外转钤》。值得提出的是一本宋初的韵图,刘熙古(唐昭宗天复三年即 903 年—宋太祖开宝九年即 976 年)的《切韵拾玉》,《宋史》卷二六三本传、卷二〇二艺文志皆著录;王应麟《玉海》卷五五"小学下"两次著录,一次次于托名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后,可见其为切韵图。此外有杨中修《切韵类例》,还有《切韵指掌图》。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来自中国晚唐及其以前的多种书,中即有《切韵图》一卷,卢跋内有"切韵四十四图",甚至有西夏文韵图《五音切韵》,由此可以断言:宋代只有"切韵"、"切韵之学"、"切韵图"等名称。金元亦然,金韩道昭《五音集韵自序》:"夫切韵者,盖以上切下韵,合而翻之,因其号以为名。"《五音集韵》"韩"字注,叙述韩孝彦注《切韵指玄论》,撰《切韵澄鉴图》,作《切韵满庭芳》,述《切韵指迷颂》。元初类书《居家必用事类》甲集"切韵"类有"切韵捷法诗",首句为"切韵先须辨四声"。后至元二年(1336)刘鉴《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后附"辨开合不伦":"今之切韵者多用因烟、人然、经坚、丁颠之类,此法极是浮浅,乃前贤训蒙诱引切韵入门之法耳。"至正十六年(1356)翠岩精舍刻《广韵》牌记,右直格内

刻“五音四声切韵图谱详明”十字。[1] 甚至明初人邵光祖《切韵指掌图检例》跋语云：“按广韵凡二万五千三百字，其中有切韵者三千八百九十文正。”其中“切韵”二字仍然符合沈括、卢宗迈的定义，明益庄王朱厚烨《重修广韵序》(嘉靖二十八年即1549年)：“我先考端王……以广韵附于正韵，复增入玉篇，凡切韵七音谐协而分为二韵者，更入本韵，字各分属于母。”总之，凭上述五十余证，可断狱矣：唐宋夏金元只有“切韵”一名，“等韵”一名始于明代，“必也正名乎”：宋元切韵学，明清等韵学。本文对宋代的切韵学、切韵图，不使用“等韵学”、“等韵图”的名称。卢宗迈等宋代学者所言的“切韵之学”、“切韵法”可以说是宋代的汉语音系学。《卢宗迈切韵法》是留给我们这些后世“同志”的一份珍贵文献。

卢书其他部分将在下面各专节的研究中涉及，此处不赘。

四

《卢宗迈切韵法》的发现使我们力图对宋代切韵学、切韵图作深入的研究。

首先要指出的是图例相辅这一特点。现行《韵镜》前有张麟之“韵鉴序例”，《四声等子》前有七音纲目和九“辨”(如“辨音和切字例”)，《切韵指掌图》前有“检例”上下等等，最典型的是杨中修一人同时著例10条，为图44，名曰《切韵类例》。如果发现时只有图，也会有人补作例，如张麟之：“因撰字母括要图，复解数例，以为沿流求源者之端。”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五的“切韵之学”条即具有依所见韵图而言例的性质，我们可据以复原出那类韵图的大致轮廓来(与现存诸图颇有差异)。卢宗迈的切韵法诸表及序跋，内容体系及所用术语如此一致，显然有所依托，当即据“切韵四十四图”立言，遗憾的是此图迄今未发现。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借助卢书所述诸“例”“挖掘”出与之配合的这一系切韵图来。

汉语音韵学者无不知《韵镜》、《七音略》，罗常培《〈通志·七音略〉研究》曾做过详细的比较，二书小异大同，其结语云：“《七音略》所据

① 李致忠《古籍版本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图版三十。

之《七音韵鉴》与《韵镜》同出一源”,“要之,皆于原型有所损益,实未可强分先后也。”张麟之《韵镜识语》:“不出四十三转,而天下无遗音。其制以韵书自一东以下,各集四声,列为定位,实以《广韵》、《玉篇》之字。”据李新魁《〈韵镜〉研究》,《韵镜》一书所用的字共 3700 个左右,其中仅有 172 字不是使用《广韵》小韵首字,① 可见张麟之语不诬。《七音略》列字也近于《广韵》。因此从列字所据韵书而言,《韵镜》、《七音略》都是广韵系的切韵图。

卢书跋云:“世传切韵四十四图,用三十六母与《集韵》中字,随母所属,次第均布于图间。”可见这韵图列字的根据是《集韵》。卢书(六)“切三十六字母法”的按语中论及门法时说:“若《广韵》、《玉篇》、《集韵》、《类篇》中切脚皆容易反切,便得其字分明者,并名音和切。”孙觌《鸿庆居士文集》卷三〇《切韵类例序》:“昔仁庙诏翰林学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韵学,自许慎而降,凡数十家,总为《类篇》、《集韵》,而以贾魏公、王公洙为之属。治平四年司马温公继纂其职,书成上之,有诏颁焉。今杨公又即其书科别户分,著为十条,为图四十四,推四声子母相生之法,正五方言语不合之讹,清浊重轻,形声开合。梵学兴而有华竺之殊,吴音用而有南北之辩。解名释象,纤悉备具,离为上下篇,名曰切韵类例。……具见于一图二篇之中。”孙觌《内简尺牍》卷三《与致政杨尚书中修》:“序引纳上,……大意言《类篇》、《集韵》,数巨公更两朝而能成,公因之作类例。”可见宋代确有集韵系韵图在,而且不止一种。

何以有广韵系韵图,又有集韵系韵图?何以张麟之《韵镜识语》以《广韵》与《玉篇》连言,孙觌、卢宗迈二人在各自文章中将《集韵》与《类篇》连言?这就需要了解宋代的韵书、字书编纂史。

《文献通考·经籍考》经部小学类序:“宋三朝艺文志② 曰:“自齐梁之后,音韵之学始盛,顾野王《玉篇》、陆法言《切韵》尤行于世。”这是第一代“篇韵”。由五代入宋的郭忠恕(? —977)《汗简》卷首:“《切

① 《语言研究》1981 年第 1 期第 133、156 页。

② “宋三朝艺文志”即“三朝国史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二》著录:“吕夷简宋三朝国史一百五十五卷”,晁公武、陈振孙、马端临并曰一百五十卷。

韵》、《玉篇》，相承纰缪。”可见宋初学术界即对二书表示不满。宋代在统一后，偃武修文，连续编了《太平御览》等几部大书，为了科举取士的需要，宋初诸帝十分重视韵书、字书，据王应麟《玉海》卷四五“小学”：“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六月丁亥诏太子中舍陈鄂等五人同详定《玉篇》、《切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二年（1005）七月丙子，龙图阁待制戚纶与礼部贡院上言：“今请除官《韵略》外，不得怀挟书策。”可见景德四年的《韵略》（通称《景德韵略》）之前已有用于科举的《韵略》，只是其名不显。真宗修定的三书规模大，且配套，体现了繁荣、稳定的封建帝国的语文规范化政策，故为世所重。据《玉海》卷四五，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戊寅，诏颁行《新定韵略》和《校定切韵》，章如愚《山堂考索》前集卷一一“诸子百家门韵学类”述及后者云：“景德四年刊正，大中祥符元年命儒臣增损，改为重修广韵。”这是笔者所发现的关于《广韵》经一次修订、还是两次修订问题的重要史料。关于《景德韵略》，王应麟《玉海》引《崇文总目》云：“略取《切韵》要字，备礼部科试。”按，这《切韵》当为《校定切韵》，即《广韵》的景德四年实未刊行本。《宋会要辑稿》选举八之三一：“仁宗天圣五年（1027）三月十八日诏……韵略官中至日给散。”此《韵略》是《景德韵略》。《广韵》依音查字，那么“字之有形而未审厥声者，岂不愈难于检阅乎”？[①] 鉴于前代《切韵》、《玉篇》并行，于是在祥符六年（1013）编成《大广益会玉篇》。这是第二代“篇韵”。二者连言，是宋人的习惯，不独张麟之如此。王观国《学林》卷二“吴吴”条、卷四“黵黵”条，卷四“牙衙”条、卷五“叒”条、“餂”条、卷九“趣趋”条等皆《玉篇》、《广韵》连言，王楙《野客丛书》卷一二“痟消二义”条亦然。甚至迳以二字简称，如《玉海》卷四五载祥符三年邱雍上《篇韵筌蹄》三卷，杜从古《集篆古文韵海序》：“又爬罗篇韵所载。”[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平兴国七年六月“乃召（王著）令详定篇韵。”又，景德二年载戚纶与贡院上言：“旧敕止许以篇韵入试。”《切韵指掌图》“辨匣喻二字母切字歌”：“当今篇韵少相逢。”赵叔向《肯綮录》：“篇韵皆无饀字”、“吙字篇韵皆所不载”、“薷

---

① 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序》。

② 收于《宛委别藏》。

字不见于篇韵。”叶大庆《考古质疑》卷三：“古字音义，有出于经史之通用，而篇韵或不能尽载，亦不可不知也。”后人不察宋代篇韵连言的习惯，就产生误解。金人韩道升《五音集韵序》推崇其叔、其弟于“篇韵”有精湛的研究，仍然简称连用。《广韵》与《景德韵略》皆是韵书，有详略之别。加上形书《大广益会玉篇》，都是官颁的，可谓第一代的“三位一体”。

据淳熙十四年田氏刊本《集韵》跋记，仁宗景祐元年(1034)宋祁等陈述《广韵》、《韵略》的缺误，奏请修订。于是景祐四年(1037)《礼部韵略》成，宝元二年(1039)《集韵》成，[1] 较之《广韵》，《集韵》革新之处(包括音韵)甚多。[2]《广韵》是在《唐韵》及唐五代某些《切韵》修订本等韵书的基础上改编的，而《集韵》才是宋人自己纂修的，所以王观国《学林》卷九“敕”条先言“许氏说文、玉篇、广韵”，继言“集韵本朝所修”。李焘说：“切韵、广韵皆莫如集韵之最详”，“度等复奏，集韵添字极多，与彭年、邱雍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参协，乞别为类篇”，“集韵、类篇两者相须”。[3]《类篇》迟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方成。这是第三代“篇韵”，王柏《正始之音》：“大中祥符，有诏刊正《玉篇》、《广韵》，而《说文》复衰，又有丁度《集韵》、司马《类篇》之属……”[4]李焘说：“自《集韵》、《类篇》列于学官，而《广韵》、《玉篇》微矣。”[5] 司马光《名苑序》：“窃以为备万物之体用者，无过于字；包众字之形声者，无过于韵。今以集韵本为正。”吴棫《韵补》卷首：“右韵补凡书五十种，其用韵已见集韵诸书者皆不载。”李焘自己的《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定稿时

---

① 《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三九有“景祐元年所修集韵”语，是就其始修年而言，此与淳熙田氏刊本《集韵》跋记合并观之，《集韵》并非如通常所言，景祐四年所修。

② 见白涤州《集韵声类考》、邱棨鐊《集韵研究》。《集韵》胜于《广韵》处甚多，兹举一例，如“攽”，《广韵》只收于真韵，《集韵》真删两韵并收。阮阅(元丰进士)《诗话总龟》前集四〇卷“诙谐门”：“内朝晨入庭内错立，至驾欲坐，即御史台知班唱班，欲依班立也，王彦和汾与刘贡父攽同趋朝，王戏刘曰：‘内朝日日须呼汝。’刘应声曰：‘寒食年年必上公。’”《集韵》逋还切小韵“班”、“攽”同音。孔平仲《孔氏读苑》卷二亦载此事。

③ 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序》。

④ 见元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二，四库全书本《鲁斋集》未收《正始之音》。

⑤ 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序》。

也改从《集韵》,“起东终甲”。[①] 熊忠《古今韵会举要》“公”字“案语”:“惟司马文正公诸儒所作集韵,重定音切,最为简明。……今从集韵,后皆仿此。”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宋理宗时刊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韵略条式》中的“淳熙重修文书式”,这一官颁文书详列宋代诸帝的讳字,遵《集韵》而不依《广韵》。凡此可见《集韵》之影响,时代之趋尚。

宋代的切韵学实际上是当时的音系学,多采用图表形式,尤为重要的是音节表,如杨中修“一图二篇”中的“一图”。造出这种音节表就需要依傍韵书,如“《七音略》以覃、谈列阳、唐之前,实沿陆(法言)、孙(愐)旧次”,“至于《韵镜》转次则显依李舟一系重加排定,惟殿以蒸、登,犹可窥见其原型本与《七音略》为同源耳”。[②] 宋真宗颁行《广韵》后,切韵家就旧瓶装新酒,拿旧的韵图骨架,按新的御定韵书填字,当然有可能对原骨架作些改变,如《七音略》“以列图方便而升盐添咸衔严凡与覃谈为伍”,[③] 也许即是,但终留下了些旧痕迹,如《韵镜》之蒸登殿后。这种广韵系韵图论韵图骨架,或可溯自宋前;论列字,也在祥符元年(1008)后,编者名声不显,又是在民间悄悄流传,所以张麟之在嘉泰三年(1203)说:“其来也远,不可得指名其人。”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实以《广韵》、《玉篇》之字”,就是说,《指微韵镜》是广韵系的韵图。《七音略》的原型当也是在《广韵》颁行后另一切韵家赶时尚的成品。待到仁宗朝《集韵》列于学官,司马光、李焘都遵奉不违,自然也会有新的切韵家据以列字编出新的韵图,杨中修《切韵类例》之图即是,卢宗迈跋所说的“世传切韵四十四图”也是。

这里也要讲一下第二代“三位一体”中的景祐《礼部韵略》,王之望《汉滨集》卷五《看详杨朴礼部韵括遗状》:“礼部韵止为场屋程文而设,非如广韵集韵普收奇字,务为该洽,故谓之韵略。”新的功令颁行,景德《韵略》当归废弃。此后虽有修订意见,“然每有陈奏,必下国子监看详,再三审定,而后附刊韵末”,“故较他韵书特为谨严”。[④] 景祐

---

① 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序》。
② 罗常培《通志·七音略研究》。
③ 同上。
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

《礼部韵略》和淳熙监本《礼部韵略》(《中兴馆阁书目》和《宋史艺文志》均著录)皆佚亡。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附释文互注韵略五卷,以监本增注而释之。”可见是“嫡传”,今尚存。《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二:“孝宗淳熙元年八月九日礼部言,昨福州进士黄启宗上表,礼部韵内有经典所载之字,举人所常用而礼部韵不收入者,各逐本韵次为条目,一一收附。绍兴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指挥许礼部韵后别项刊具,令士子通知。自后场屋士人指为续降补韵,往往径行压用,有司以非正员,尽行黜落。乞将启宗所类字,各随声韵添入,令士人通压,自淳熙二年省试日为始,从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五:“绍兴中黄启宗又取六经诸子史常用字为献,元降指挥,今附于礼部韵略之后,令学者通知,淳熙重刊韵略则分入于逐韵之末。”今存宋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正是“分入于逐韵之末”,可见承自淳熙监本《礼部韵略》。试以之与理宗时欧阳德隆、易有开原纂,郭守正增修之《增修校正押韵释疑》比较,后者将启宗所补 245 字“别项刊具”。另南宋初毛晃、毛居正父子私人增订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增加了 4166 字,这是为了满足士人求繁的需要,但有吴音化的倾向。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吴铉献《重定切韵》,多吴音。后“诏尽索而焚之”。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毛晃进《增韵》,虽有吴音,但印行不衰,至元犹然。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可见个中消息。

五

我们说卢跋中的“世传切韵四十四图”是集韵系韵图,除了根据原文中的“用”“集韵中字”“次第均布于图间”外,还得有语言内部的证据,这也许更重要些。卢书述及的切韵图虽不传,但仍可窥其一斑。

(一)

卢书(七)“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字图”,依次列“群定澄並奉从邪床禅匣”十母的 47 组字,上、去声字皆以朱笔书写,平、入声字列于两头,如无字则标以“○”。这 47 组四声相承的字当系从韵图中摘出的,我们把它和《广韵》、《集韵》、《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铁琴铜剑

楼藏宋刊本，本文此后简称《礼韵》）、《增韵》的相当的小韵首字相比较。下面“群$_1$”表示群母第一组，“○”号表示此位无字。同一组异体字《集韵》以见于《说文》者居首，如“辻徒”，但切韵家取韵书小韵首字列图时往往仍取常用字形，故异体字皆视作相同。

1．卢书同于《集韵》而异于《广韵》者 18 组。

	群$_1$	群$_3$	定$_3$	定$_4$	澄$_3$	並$_2$	並$_3$	並$_4$
广韵	强㢮弶噱	裘舅旧○	徒杜渡○	屯囤钝突	晁肇召○	酺簿捕○	便楩便○	盘伴叛跋
卢书	彊强弶噱	求臼旧○	徒杜度○	屯笔钝揬	晁赵召○	蒲簿步○	便楩便敝	盘伴畔跋
集韵	彊强弶噱	求臼旧○	徒杜度○	屯笔钝揬	晁赵召○	蒲簿步○	便楩便敝	盘伴畔跋
礼韵	彊彊倞噱	求臼旧○	徒杜度○	屯盾钝揬	晁赵召○	酺簿步○	便○便○	盘伴畔跋
增韵	彊彊强噱	求臼旧○	徒杜度○	屯盾钝揬	晁赵召○	酺簿步○	便○便○	盘伴畔跋

	从$_1$	从$_2$	床$_2$	床$_3$	匣$_1$	邪$_3$	匣$_5$
广韵	裁在载○	摧罪○○	潺戬栈○	巉巉镵○	魂混恩搰	旋○淀援	豪晧号○
卢书	裁在在○	罪啐○	潺蛈栈○	巉嵁镵礁	魂混圂搰	膔漩踅	豪皓号○
集韵	裁在在○	摧罪啐○	潺蛈栈○	巉嵁镵○	魂混圂搰	旋膔漩踅	豪皓号○
礼韵	裁在在○	摧罪○○	潺彪栈○	巉巉谗○	魂混恩鹘	旋○旋○	豪晧號○
增韵	裁在在○	摧罪○○	潺彪栈○	巉巉谗○	魂混恩鹘	旋○旋踅	豪晧號○

“囤笔”，《集韵》为异体字，《广韵》非异体字。

定$_4$ 下的卢书每组字四声相承，若该位无字则标以“○”，但从$_2$、邪$_3$ 平声位空白，可能是抄手漏写。

床$_2$ 组当是删潸谏黠四声相承，但《广韵》、《集韵》删韵崇母无字，而山韵、仙韵的崇母皆有“潺”字，《韵镜》、《七音略》外转 23 图皆以“潺”配其后上、去声字。

邪$_3$ 此表《集韵》的上去入三声字均非其小韵的首字，但《广韵》无此三字，卢书当取自《集韵》。

匣$_5$ 这是一组匣母字，《广韵》胡老切小韵有“晧”无“皓”，而《集韵》下老切小韵有“晧”（首字）和“皓”等，《类篇》“皓”字有二音，首列下老切，因此亦可谓卢书之“皓”合于《集韵》。

应予重视的是，卢图床母的三组字都是床二母即崇母字，而禅母五组字却显示了床三母（即船母）与禅母的相混，《集韵》即具有这种倾向，下面对拟予讨论的字在括弧内注出反切。

	禅$_1$	禅$_2$	禅$_3$
广韵	常上尚妁(市若)	纯盾(食尹)顺(食闰)術(食聿)	铤善缮折(常列)
卢书	常上尚杓	纯盾　顺　術	铤善缮舌
集韵	常上尚杓(实若)	纯盾(竖尹)顺(殊闰)術(食律)	铤善缮舌(食列)
礼韵	常上尚杓(实若)	纯盾(竖尹)顺(食闰)術(食律)	铤善缮舌(食列)
增韵	常上尚杓(日灼)	纯盾(乳尹)顺(食闰)術(食律)	铤善缮舌(食列)

"常上尚"三字,诸韵书均以禅母字作切语上字,毋庸讨论。《集韵》实若切小韵有"杓妁"等字,是合船禅为一。《增韵》日灼切小韵有"杓勺弱"等,是船禅日混同。卢图四声相承字当系依据《集韵》。

"纯"字,四韵书皆以禅母字出切。《广韵》后三字均船母字,绝不能与"纯"构成一组四声相承字。而《集韵》"盾顺"皆以禅母字作反切上字,"術"虽以"食"作切语上字,但船禅相混,故构成一组四声相承字。卢书显然同于《集韵》。可堪注意的是《增韵》"盾"以日母字出切。

《广韵》"折",常列切,禅母字;"舌",食列切,船母字。《集韵》食列切小韵有"舌折"等字,船禅合一,故可用首字"舌"承上三字。卢图从之。

2. 卢书与《广韵》、《集韵》互有异同者一组:群$_2$。

3. 卢书同于《广韵》而异于《集韵》者一组:定$_1$。

	群$_2$	定$_1$
广韵	权　圈　倦　○	同　动　洞　独
卢书	权　圈　倦　嶡	同　动　洞　独
集韵	权　圈　券　嶡	同　动　洞　牍
礼韵	权　圈　倦　○	同　动　洞　牍
增韵	权　圈　倦　○	同　动　洞　牍

其余27组,卢图与《广韵》、《集韵》悉同:群$_4$琴噤矜及、定$_2$唐荡宕铎、定$_5$坛但惮达、[①] 定$_6$团断段夺、定$_7$陶道导○、澄$_1$长丈仗著、澄$_2$厨柱住○、澄$_4$俦纣胄○、澄$_5$沈朕鸩蛰、並$_1$皮被髲○、奉$_1$逢奉

① 《广韵》此四字在寒旱翰曷韵中,四声相承。《集韵》"但"(荡旱切)在缓韵,"惮"(徒案切)在换韵,此由于《集韵》将少数开合韵的归字两两移乱,但反切系统不紊。于此亦可见卢书所据的切韵图,仍沿用原来的骨架,详后。

俸幞、奉$_2$ 汾愤分佛、奉$_3$ 凡范梵乏、从$_3$ 曹皁漕〇、从$_4$ 矬坐座〇、从$_5$ 情静净籍、邪$_1$ 词似寺〇、邪$_2$ 邪灺谢〇、床$_1$ 鉏龃助〇、禅$_4$ 韶绍邵〇、禅$_5$ 雠受授〇、匣$_2$ 寒旱翰曷、匣$_3$ 桓缓换活、匣$_4$ 玄泫县穴、匣$_6$ 何荷贺〇、匣$_7$ 遐下暇〇、匣$_8$ 侯厚候〇(以上少数组中,《礼韵》、《增韵》有异,如从$_5$ 入声字,《增韵》为“席”,邪$_2$ 上声字,《增韵》为“苴”,皆显示从邪无别,不赘)。

可见卢书“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字图”跟集韵系韵书关系密切,尤近于《集韵》。《集韵》和景祐《礼部韵略》是详略的关系,《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和《增韵》都是景祐《礼部韵略》的“后裔”(虽然《增韵》歧异之处甚多),所以我们称之为集韵系韵书。总之,这位宋代的切韵家为进行专题考察,从集韵系的“世传切韵四十四图”中摘取47组字而列出了“全浊声母下上声去声同呼字图”。

(二)

卢书(六)“切三十六字母法”给每个字母注了反切,兹依卢书次序移录于下,并与四韵书比较:

	见	溪	群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彻	澄	娘
广韵	古电	苦奚	渠云	语其	多官	他候	徒径	奴低	陟离	丑列	直陵	女良
卢书	经电	牵奚	衢云	鱼其	多官	他候	徒径	年题	珍离	敕列	持陵	女良
集韵	经电	牵奚	衢云	鱼其	多官	他候	徒径	年题	珍离	敕列	持陵	尼良
礼韵	经甸	牵奚	渠云	鱼其	多官	他候	徒径	年题	珍离	敕列	持陵	〇
增韵	经电	牵奚	渠云	鱼其	多官	他候	徒径	年题	珍离	敕列	持陵	女良

	帮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从	心
广韵	博旁	普郎	蒲迥	武兵	甫微	芳无	扶陇	无非	子盈	七情	疾容	息林
卢书	博旁	普郎	部迥	眉兵	匪微	芳芜	父勇	无非	子盈	七情	墙容	思寻
集韵	逋旁	铺郎	部迥	眉兵	匪微	芳无	父勇	无非	咨盈	亲盈	墙容	思林
礼韵	〇	普郎	部迥	眉兵	匪微	芳芜	父勇	无非	子盈	七情	墙容	思寻
增韵	〇	普郎	部迥	眉兵	芳微	芳无	父勇	无非	子盈	七情	墙容	思寻

	邪	照	穿	床	审	禅	影	晓	匣	喻	来	日
广韵	似嗟	之少	昌缘	士庄	式荏	市连	於丙	馨皛	胡甲	羊戍	落哀	人质
卢书	徐嗟	之笑	昌缘	仕庄	式荏	时连	於境	馨鸟	辖甲	俞戍	郎才	人质
集韵	徐嗟	之笑	昌缘	仕庄	式荏	时连	於境	馨鸟	辖甲	俞戍	郎才	人质
礼韵	徐嗟	之笑	昌缘	仕庄	式荏	○	於景	馨杳	辖甲	俞戍	郎才	人质
增韵	徐嗟	之笑	昌缘	仕庄	式荏	时连	於丙	馨杳	胡甲	俞戍	郎才	人质

注：①《礼韵》仙韵无"禅"。线韵"禅",时战切,"〔释〕又时连切,仙字韵不收。"
②"○"号表示无字。

这三十六字母的反切用字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广韵》、《集韵》、《礼韵》、《增韵》和《卢宗迈切韵法》五者之间关系的随机统计资料。五书全同者六母：端透定微穿审。此下的统计数字是就其余30字母作出的：

《集韵》同于《广韵》者1母,异于《广韵》者29母;《礼韵》同于《广韵》者4母,同于《集韵》者18母,均异于二者5母,无字者3母;《增韵》同于《广韵》者8母,同于《集韵》者17母,均同于二者1母,皆异者3母,无字者1母。可见《集韵》系韵书彼此间的相近以及它们各自与《广韵》的距离。《增韵》的"返祖"现象与"变异"现象(如上一小节所指出的船禅日母的相混,从邪的相混,当与吴音有关)兼有,《礼韵》距《广韵》较远,而《集韵》更甚。这是因为景祐《礼部韵略》成书后两年《集韵》方竣工,编者们改革的主张贯彻得更彻底。

卢书"切三十六字母法"的切语同于《广韵》者5母,同于《集韵》者23母,同于《礼韵》者24母(其中的"滂精清"3母,《礼韵》同于《广韵》,卢书亦然,故统计数字高,而《集韵》与《广韵》于此迥别),同于《增韵》者22母(其中的"娘滂精清"4母,《增韵》同于《广韵》,卢书亦然,故统计数字高)。

诚然卢书与《集韵》最近,与《礼韵》关系也密(特别是"敷心"二母的切语仅与《礼韵》同),但也应看到另一面,它们并不尽合,卢书还有同于《广韵》者,何以致此?

我们在上节曾指出切韵图的原型可溯至唐代,因须依傍韵书列字,宋代也就有了广韵系切韵图、集韵系切韵图之别。我们现在所见

的韵图只是基本上根据某种韵书列字，一则因为韵书间有继承关系，对原韵图的列字似乎没有铲除净尽的必要和可能，二是韵图在传抄刊刻的过程中不断遭到修改，如郭守正《增修校正押韵释疑序》："欧阳先生押韵释疑一书，惠学子至矣。书肆板行，漫者凡几，一漫则一新，必增数注释，易一标题，以快先睹。"《韵镜》共有字 3700 个左右，其中仅有 172 字不是《广韵》小韵首字，因此《韵镜》是广韵系韵图。但据李新魁研究，《韵镜》中不见于《广韵》而见于《集韵》的有 84 字。[①] 此外，还有受《集韵》甚或集韵系韵图影响之处，如《韵镜》、《七音略》都以"纯"、"顺"相承，二图皆列"雄"于匣母下，但"雄"，《广韵》羽弓切，《集韵》胡弓切。可见切韵图无论从框架结构上或是列字上都是在时间的长流中不断增删修改的，都有前面韵书韵图的或多或少的成分、痕迹，又有可能渗进同时代其他韵书韵图甚或后代韵书韵图的因素。我们认为，切韵图是层累地造出来的。《卢宗迈切韵法》这一派切韵学、切韵图，基本上依据《集韵》，但又与《广韵》有若干相合之处，至于和《礼韵》的密切关系更是不足为奇的。

李新魁先生《〈韵镜〉研究》认为，《韵镜》系据景德《韵略》而作，我们的看法是，切韵图不可能主要依据韵略（无论是景德《韵略》或景祐《礼部韵略》及其各种修订本）列字。且看绍兴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国子监对黄积厚要求礼部韵增字的"答复"："礼部韵专谓约束举人程文，只得押韵内字，庶几便于考校，故名《礼部韵略》。若广引训释及添入不紧要字，即与《广韵》无异。"[②] 岂止如此，礼部韵也不收那些不登科举之堂的表示俗语词的字。如现存《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增修校正押韵释疑》都不收"帮"字，缺此小韵。《礼部韵略》原只有 9000 多字，[③]毛氏父子的《增韵》竟增加了 4166 字，但也未增"帮"字。王韵无"帮"，《广韵》于唐韵末列"帮"字，注曰："衣治鞋履"，增加了一个小韵。《集韵》才把它安排到"滂"小韵前，但是诸本韵略仍然拒收。韵图是音节表，每个音节只要有字，即令是"不紧要字"、俗字，也缺不

① 《〈韵镜〉研究》，《语言研究》1981 年第 1 期第 152、156 页。
② 见宋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所附之《韵略条式》。
③ 熊忠《古今韵会举要》"凡例"："礼部韵略元收九千五百九十字。"

得，满足这种要求的只能是详本韵书如《广韵》、《集韵》，而不可能是缺了不少小韵的《韵略》，否则我们熟悉的三十六字母代表字就剩了三十五了，这只是一例而已。①

（三）

《卢宗迈切韵法》同《集韵》的紧密关系还在于开卷的“音释切韵法难识字”。卢书（五）“三十六字母切韵法”，列三十六字母加七十二助纽字，卢氏序云：“切韵法百八字中有难识者字”，“或直音或反切或调声并集于前”。兹录其十四字原文，并与韵书比较（韵书中无关的文字从略）。《广韵》每字下先释义后反切，《集韵》反是，卢书同后者。

祆　卢书：馨烟切。胡谓神为祆。显字平声。
　　广韵：呼烟切。胡神。
　　集韵：馨烟切。胡谓神为祆傎。

傎　卢书：音颠，倒也。
　　广韵：（“颠”小韵下）倒也。
　　集韵：（“颠”小韵下）倒也。

邅　卢书：张连切。屯邅。哲字平声。
　　广韵：张连切。迍邅也。
　　集韵：张连切。屯邅。

羶　卢书：尸连切。羊臭也。设字平声。
　　广韵：式连切。羊臭也。
　　集韵：尸连切。说文，羊臭也。

侲　卢书：痴邻切。欲仆也。与獭同音，趁字平声。
　　广韵：侧邻切。字林云，养马者。（獭，丑人切）。
　　集韵：（“獭”小韵内）痴邻切。欲仆也。

延　卢书：抽延切。安步延延。彻字平声。
　　广韵：丑延切。说文曰，安步延延也。
　　集韵：抽延切。说文，安步延延也。

① 敦煌文献三十字母无“帮”字，仁宗时王宗道三十六字母有“帮”字，沈括《笔谈》也有，但都在《广韵》颁行之后。

缤　卢书：纰民切。纷乱也。匹字平声。
　　广韵：匹宾切。缤纷。
　　集韵：纰民切。缤纷乱也。

蠙　卢书：蒲眠切。珠名。与玭同。辫字平声。
　　广韵：部田切。蠙珠。（玭，部田切。蚌珠。或与蠙同。）
　　集韵：玭蠙，毗宾切。说文，珠也。（玭，蒲眠切。珠名。）

硍　卢书：下珍切。难也。
　　广韵：下珍切。鞭也。
　　集韵：下珍切。难也。

榛　卢书：锄臻切。木丛生。
　　广韵：蓁，士臻切。木丛生。
　　集韵：榛，锄臻切。木丛生曰榛。

樠　卢书：武官切。晚字平声。（按，反切与调声矛盾。如在《广韵》，据反切，当为桓韵明母字；据调声，则为元韵明母字。若兼指二音，则悖于其他字的叙述通例。）
　　广韵：母官切，武元切，莫奔切。
　　集韵：谟官切，模元切，莫奔切，里党切。

旃　卢书：诸延切。撚毛也。浙字平声。
　　广韵：诸延切。席也。周礼曰，秋敛皮，冬敛革，供其毳毛为旃。
　　集韵：诸延切。说文，撚毛也。

纫　卢书：尼邻切。昵字平声。
　　广韵：女邻切。
　　集韵：尼邻切。

嫰　卢书：此不是字，系有声无形，借用女联为形，又借女联为切，吶字平声为嫰字。吶，女劣切。
　　广韵：吶，女劣切。
　　集韵：吶，女劣切。

总之，卢书所列 14 个难识字，除“樠”外，尚有 13 字（包括“吶”字）。合于《广韵》者二字（也合《集韵》），合于《集韵》者 12 字。《礼韵》无“傎延”，《增韵》无“祆延”。卢书合于《礼韵》者三字：“蠙硍纫”；

合于《增韵》者二字："䆮纫"。这更可证明卢书和《集韵》关系密切。

六

卢书反映的切韵图其依据既已证明，那么其特点如何？

1. 三十六字母，分二十三行，始见终日。何以知之？卢书（六）"切三十六字母法"首四纵列列牙音四母；其后四列，上为舌头音四母，下为舌上音四母；再后四列，上为唇音重四母，下为唇音轻四母；再后五列，上为齿头音五母，下为正齿音五母；最后六列为喉音影晓匣喻，半徵半商音来日。宋元切韵图三十六字母大多"以一纸列二十三字母为行，以纬行于上，其下间附一十三字母"。唯杨倓《韵谱》（已佚）、《切韵指掌图》变为线性排列。守温韵学残卷、"辩字五音法"（载于《广韵》卷末及《玉篇广韵指南》内）均唇音居首，王宗道《切韵指玄论》、沈括《梦溪笔谈》、《七音略》、《韵镜》皆始帮终日。卢书相反，始见终日，其同系统的《居家必用事类·切韵》、《玉篇广韵指南》的"三十六字母五音五行清浊旁通撮要图"、"三十六字母切韵法"自然雷同，其后的《切韵指掌图》、《四声等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亦然。

2. 喉音四母的排列顺序是影晓匣喻。其前的王宗道是晓匣影喻，但沈括所传述的一种切韵图①、《七音略》、《韵镜》和《切韵指掌图》都是影晓匣喻；卢书后附的指掌图、《四声等子》和《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则为晓匣影喻。

3. 沈括说："每声复有四等，谓清、次清、浊、平（按，其后的小注又叫'不清不浊'）也。"《韵镜》为清、次清、浊、清浊，卢宗迈则云："每音有四等，谓全清、次清、全浊、不清不浊。"《切韵指掌图》、《四声等子》同之（但"邪禅"为半清半浊），《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则为纯清、次清、全浊、半清半浊。

4. 切韵家喜将切韵五音和乐律五音相配，但如沈括所云，"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卢书是逆向换位型：牙—角、舌—徵、唇—羽、齿—商、喉—宫，此以牙音开头，其前切韵图如《七音略》以唇音领先，

---

① 《梦溪笔谈》卷一五"帮字横调之为五音，帮当刚臧央是也"，"多有声无字者，"“邕胸止有二字"，可证其喉音四母影居晓前

牙音第三,则乐律五音自后向前秩序整齐,可谓之逆向齐序型。详见本文第十节。

5. 卢书(九)“切韵之学概述”中有“字有四等轻重,如高交骄骁是也”。卢跋述及的切韵四法之三为“随平仄四声念,则有四等重轻法”,溯其源,当为敦煌守温韵学残卷的“四等重轻例”,惜乎卢书语焉不详。

6. 未言及摄。

7. “实以《广韵》、《玉篇》之字”的《韵镜》和《七音略》都是 43 转,尽人皆知,而杨中修的《切韵类例》,孙觌序明确指出其图 44,因是孤例,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如今《卢宗迈切韵法》被发现,其跋云:“世传切韵四十四图,用三十六母与集韵中字,随母所属,次第均布于图间。”可谓无独有偶,那么多出了哪一图?

自陆法言《切韵》直至景祐《礼部韵略》的各种修订本总有尤侯幽三韵。《韵镜》内转第 37 开,《七音略》内转 40 都列侯韵于一等,尤韵三等、幽韵四等,合为一图。尤和幽在韵书中分居侯的前后,这次序就有点怪。本世纪以来的切韵家几无不认为幽韵也是三等韵,董同龢《汉语音韵学》的话具有代表性:

> 幽韵字韵图都摆在四等,可是实际上他们都是三等字。因为:
>
> (1) 这个韵只有唇牙喉音,反切上字都用“居方”等见于三等韵的那些类的字,而不用“古博”等见于一二四等韵的那些类的字。
>
> (2) 有群母字,这是三等韵的特点之一,而四等韵是绝对不会有群母字的。

我们再作补充:《韵镜》、《七音略》里,幽黝幼只有“帮滂並明见溪群疑影晓来”11 母列字。按切韵学的规定,除群母外,其他 10 母可以四等俱全。群母虽只限三等,但该图四等有空位置,既然三等的位置全给尤韵占了,因此硬将幽韵 11 母字统统按捺到四等,这已属不妥。如将韵书诸小韵逐一核查,就会发现《韵镜》、《七音略》隐瞒了重要事实:韵书幽韵还有齿音精母字和生母字。这种韵图的特点如张麟之所言,“一纸列二十三母为行,以纬行于上,其下间附一十三字母。”因为假二等庄组和假四等精组的位置也全给尤韵占了,幽韵的

齿音字只得被牺牲。现将韵书尤有宥和幽黝幼的“群精生”三母的小韵对立情况列表于下：

	群母						精母				生母	
	尤	幽	有	黝	宥	幼	尤	幽	有	黝	尤	幽
王韵	裘	虯	舅	蟉	旧	趴	遒	稵	酒	愀	搜	犙
广韵	裘	虯	舅	蟉	旧	趴	遒	稵			搜	犙
集韵	求	虯	臼	虬	旧	趴	筸	稵			搜	犙

唯一合理的办法是恢复幽黝幼的三等韵的地位，再列一图，这样的切韵图就必然是44图了。

8．关于图的次序，《韵镜》和《七音略》即有差异。卢书述及的44图，其次序可以考证出一点：卢书“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字图”列47组字，细排各字母下的次序（本文第五节列有序号）大多合于韵书，只是阳韵字在群澄禅母下均居首，唐韵字在定母组列于东韵后模韵前，当系江韵牵动阳唐移前，项跋本王韵江与阳唐相次，此时或已合流。与《韵镜》比较，或许这是韵图打乱韵书次序的嚆矢。《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江阳唐悉合图，而《切韵指掌图》的列图次序尤与韵书相悖。

七

切韵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门法。其渊源甚早，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即出现“类隔”一词三次。《广韵》前四卷卷末有“新添类隔（今）更音和切”。衢本《郡斋读书志》著录了王宗道的《切韵指玄论》，提要云：“切归本母，韵归本等者，谓之音和，常也。本等声尽泛入别等者谓之类隔，变也。”按，此实为王宗道语，王氏当是仁宗时人，与贾昌朝同时。[①]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五“切韵之学”条也叙述了音和、

① 戴震《声类考》卷一“反切之始”条、章太炎《国故论衡·古双声说》、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声母发音部位异名表”皆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云，皆因不知王宗道生平。《宋会要辑稿》“仪制三”载仁宗景祐四年诏贾昌朝与“祠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王宗道”“并兼允天章阁侍讲”，《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卷二八五贾昌朝传载王宗道于景祐元年（1034）为崇政殿说书，《切韵指玄论》作者当即此王宗道，另文专论。

类隔，而且说："又有互用借用，类例颇多。"

卢书也述及门法，较上述为详。其(二)"三十六字母切韵诀"："……德红名音和切，而尚有互用、往来等切。"(六)"切三十六字母法"按语说："若《广韵》、《玉篇》、《集韵》、《类篇》中切脚皆容易反切，便得其字分明者，并名音和切。此外有类隔、互用、往还等切，如端字母下字为切，却切知字母下字，为类隔；又如精字母下字为切，却切照字母下字，为互用；又如匣字母下字为切，却切喻字母下字，为往还切。"

音和类隔，毋庸多言。这里先讨论互用切，上段引文明确指出是指精照互用，推其原始，敦煌《守温韵学残卷》已有详细叙述(文繁不录)，只是未立其名罢了。元刘鉴《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内的"门法玉钥匙"有"精照互用门"。但是卢书(六)"切三十六字母法"末的双行小注云："明字，《韵略》中作眉兵切，以眉字用明字为母，则是音和。《广韵》中作武兵切，以武字合归(微)字母，则是互用。其他类隔、往还等切，各似此推之。"[①] 这里的"互用"，跟常说迥异，录以待考。《广韵》卷一上平声末"新添类隔今更音和切"所举八字全是唇音字。《集韵》卷首《韵例》："凡字之翻切，旧以武代某，以亡代茫，谓之类隔，今皆用本字。"

卢书往还切(按，"往"为喻三，"还"为匣，拈此二字较"往来"为胜)以匣喻为例，宋本《切韵指掌图》内有"辨匣喻二字母切字歌"："匣阙三四喻中觅，喻亏一二匣中穷，上古释音多具载，当今篇韵少相逢。"董同龢《等韵门法通释》："切韵指掌图的'辨匣喻二母切字歌'既说到反切，也说到字母等第，历来却不算为门法。"但卢书三次提及"往还切"，这失去的一环终于重现。卢说提供了切韵学门法的早期史料。

八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一"云："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皆可援易以为

① "微"字原抄夺。据《玉篇广韵指南》补。

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宋代邵雍的《皇极经世》和祝泌的《皇极经世解起数诀》是象数易学利用切韵学的典型,而《卢宗迈切韵法》则“援易以为说”的色彩较浓,是其特点。

卢跋说:“世传切韵四十四图,用三十六母与《集韵》中字,随母所属,次第均布于图间。而有声有形与有声无形万一千五百二十声,该括世之所有字,并在其中。揣其声数,乃易之大衍,六十甲子,五行之数,若布万一千五百二十筭,以六除之,则筭无余数。”“切韵有四法也,详此四法,乃是前古通晓易数之智士,作而成之。”“四十四图,字字皆然,其非通幽悟微之人,焉能造是?”所谓万一千五百二十声,合于周易的万物之数,《周易·系辞传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①

卢书(四)“三十六字母五音旁通图”将切韵五音与乐律五音和五行相配。就现有文献言,切韵五音和五行挂钩似以卢书为较早。②卢跋云:“其有用二字云切或云反者,其理则一,亦五行相生,自然之理,非人意可强为之。”其具体的阐述见于卢书(六)“切三十六字母法”的按语:“麻衣道者云,纳音、切脚,其理则一。纳音如甲为木,子为水,甲子交合即生金;切脚如德为父,红为母,德红反切即生东字。此乃切韵(原注:上一字为切,下一字为韵)相生,天然混成,非人意可为也。”纳音切脚同理说是宋人流行的观点,如罗泌《路史·余论》卷三“纳音五行说(婚历妄)”:“甲乙木,丑未土,子水而午火,六者无一金。而风后妃合,乃以甲子、乙丑、甲午、乙未为之金,此出乎数者,然也。数之所合,变之所由生也。乾为天,坤为地,乾坤合而为泰。德为父、红为母,德红合而为东。干为君,支为臣,支干合而纳音生。”

平田昌司说:“用掌图形式表示诀要的,主要是术数家。”卢书在

① “大衍之数五十”,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引金景芳《易通》:“当作‘大衍之数五十有五’,转写脱去‘有五’二字。”金先生近著《周易讲座》亦如是说。但宋人沈作喆《寓简》卷一引陆秉曰:“此脱文也,当云‘大衍之数五十有五’。”

② 王观国(北宋、南宋之际人)《学林》“双声叠韵”条也将五音与五行相配,然与卢书有歧异。

跋后有一指掌图,左手,但与宋本《切韵指掌图》的指掌图颇异。小拇指写“见溪群疑”;无名指写两行:端组四母、知组四母;中指写帮组四母、非组四母;食指为精组五母、照组五母;大拇指为“晓匣影喻”;掌心下方为“来日”。(见下书影)次序同于卢书(三)(五)(六),只是后三者喉音是“影晓匣喻”。

关于宋代切韵学和术数学的关系,平田昌司和黄耀堃二先生已有专文,兹不赘论。卢书的发现提供了新的资料,可以解决若干疑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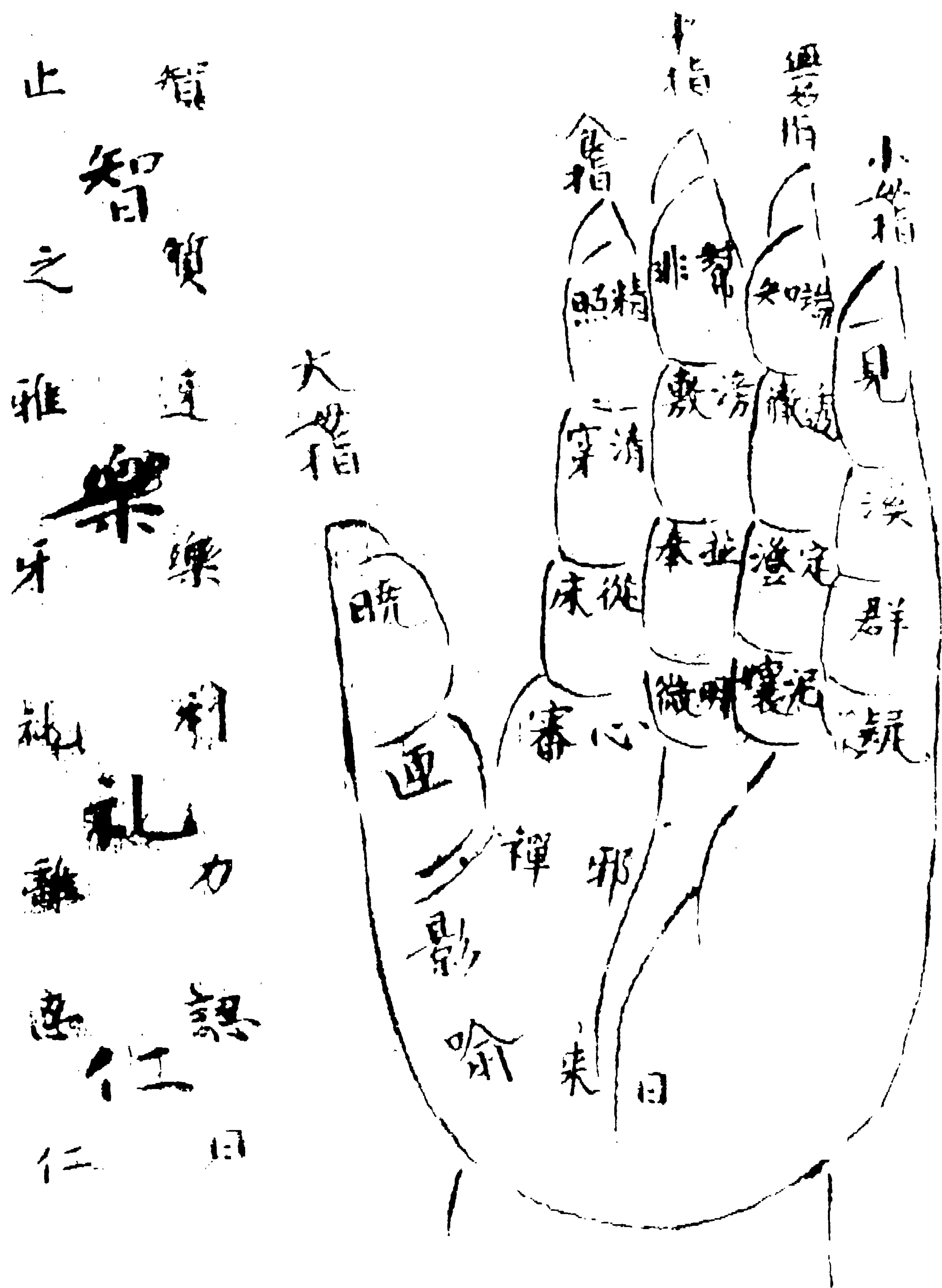
九

《卢宗迈切韵法》的手抄本长期藏于日本古寺,但在中国行世的古代典籍中有它的部分痕迹。

卢书(九)“切韵之学概述”:“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以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殆与声俱生,莫知从来。今切韵之法,先类其字各归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齿音十,半齿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为五音,天下之声,总于是矣。每音有四等,谓全清、次清、全浊、不清不浊,如颠天田年是也,字有平上去入四声,如帮榜谤博是也,字有四等轻重,如高交骄骁是也,字字有此理,皆得之自然,非人可为也。”从“切韵之学”至“总于是矣”系抄自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五,唯中间删去二句。[①]

此下则见于《居家必用事类》甲集“切韵·总论”。关于《居家必用事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载历代名贤格训及居家日用事宜,以十干分集,体例颇为简洁。辛集中有大德五年吴郡徐元瑞《吏学指南》并序。圣朝字俱跳行。又永乐大典屡引用之,其为元人书无疑。”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 1984 年影印宽文十三年(1673)松柏堂和刻本,其出版说明云:“就其刻工与内容推定,其成书

① “以西域二合之音”之“以”,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以光绪番禺陶氏爱庐刊本为底本,作“似”,今据《卢宗迈切韵法》和文物出版社 1975 年影印元大德本,“以”为是。



当在元初到世祖皇帝时代之间。"

《居家必用事类》在其后，还有一段话类似卢书(二)"三十六字母切韵诀"，如"加以熟读诵，自然通悟，如磁石引针，母唤其子"之类，只是文句有点窜。其"三十六字母五音清浊旁通图"全同卢书(四)"三十六字母五音旁通图"，只是上端有"全清、次清、全浊、不清不浊""以

纬行于上”，又补了“半舌半齿音”五字，五字皆较卢书为强。误置“心审”，脱“来日”，当是刻印粗劣所致。《居家必用事类》还有“切三十六字母总括”，属于卢书（六）“切三十六字母法”的系统，更换了几个字：卢书助纽字“丁偵、廷田、分蕃、芬番、亲千”，此作“丁颠、庭田、分番、花蕃、清千”。彻母助纽字卢为“侲延”，是；此作“辰辿”，误。

《居家必用事类》甲集“切韵”下之“总论”和“切韵捷法诗”亦见于瞿氏《铁琴铜剑楼书目》卷七著录的影元抄本《切韵指掌图》，此二者宋本《切韵指掌图》所无。[①]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建德周氏藏元刊《大广益会玉篇》卷首《新编正误足注玉篇广韵指南》（下简称《指南》）内有下列四物：

甲 《指南》“三十六字母五音五行清浊旁通撮要图”就是以卢书（四）“三十六字母五音旁通图”为主体，加上卢书（三）“三十六字母分清浊”，合二而一，比卢书和《居家必用事类》精致得多，制图颇费匠心。命名中加了“五行”二字，更为切合。

乙 《指南》“三十六字母切韵法”的内容就是卢书（五）“三十六字母切韵法”（次序凌乱不堪）和（六）“切三十六字母法”，但制图井然，紧凑美观远胜卢书。只有一点差异：照母的助纽字“征氈”，卢书原作“真氈”。拙文《〈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曾研究了宋元直至《辍耕录》“射字法”条的七种助纽字系统，指出存在着助纽字的后字逐渐全变为山摄三四等字，前字逐渐全变为梗摄三四等字的倾向，[②]因此易“真”为“征”，不无意义。

丙 《指南》“切韵内字释音”脱胎于卢书“音释切韵法难识字”，卢书原有 14 字，被删去“邅氈缤蠙氈纫”六字，很对，此六字是可不算“难识字”。《指南》有误字，其“侲”字下注；“与联同音，趂字同音。”卢书作“与獜同音，趂字平声”，卢是。

丁 《指南》在“切韵内字释音”后低二格有一段话：“切韵之法以音和为正，若《广韵》、《玉篇》中切脚容易反切，便得其字分明者，谓之

① 参见陈操《切韵指掌图重印后记》（附于中华书局 1962 年影印之《切韵指掌图》后），二者几经辗转保存在四库全书本内。

② 《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第 110—112 页。

音和切。又有互用切,如明字,《韵略》中作眉兵切,则是音和,《广韵》中作武兵切,则是互用,盖武字合归微字母下也。其他类隔、往还等切,各以此推之。”显然这是节抄卢书(六)“切三十六字母法”按语及小注中语,联缀得宜。惟卢书在“《广韵》、《玉篇》”后尚有“《集韵》、《类篇》”,被删,也许因书名为“玉篇广韵指南”的缘故吧。又,卢书手抄本夺“微”字,可据以校补。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成化十四年(1478)叶氏南山精舍刻本《广韵》附《玉篇广韵指南》,承陈慕勤先生复印见示,取以相校,知与上述元刊《新编正误足注玉篇广韵指南》几无二致。这是一本小型类书,所以常被书贾取来置于小学书卷首或作附录。

明王圻(上海人,1530—1615)《续文献通考》(万历刻本)卷一八五“六书考·韵学”收有“三十六字母切韵法”,与卢书相校,更动了十几个助纽字,有的反映了语音之变,如“彻穿”的助纽字同为“称烊”;“娘”的助纽字改成“宁年”,则与“泥”同;“床”的助纽字改为“秦前”,显示“床从”相混;“禅”的助纽字为“辰然”,当是“禅日”合一的反映。

明张位(隆庆、万历时人)《问奇集》(宝颜堂秘笈本)内收“三十六字母切韵法”,取与《卢宗迈切韵法》的“切三十六字母法”相较,前者有手民之误数字,另“澄”,时陵切,卢书为持陵切,其他相同。张著还有“切韵内释音”,列七字,注释也多了些字。

清丁人可(宁都人)《字音正讹》(乾隆乙亥刊)据《问奇集》改编而成,内亦有《三十六字母切韵法》和《切韵内字释音》,几与张全同(此承储泰松先生见告)。

可见《卢宗迈切韵法》这一套切韵法“泽远流长”。

卢书在跋后有一页,指掌图左边自下而上大字书写“仁礼乐智”四字,每字四角有四小字,如“仁”自左下角顺时钟方向写四小字“仁忍认日”。这种调四声法渊源有自,空海《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四声谱”即是,但不是这种四角环列法。宋末陈元靓《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后集卷九幼学类“字有四声”,列图如卢书,四大字为“仁礼义乐”。这不是《卢宗迈切韵法》的内容,但是也可借以考证某些音变,兹不赘。

宋代印刷术的发达促进了出版事业的繁荣。书商们雇文人编辑

各种实用类书,如《事林广记》、《玉篇广韵指南》即是,而且常出修订本,于是冠以“新编”等字。岳珂《愧郯录》卷九“场屋编类之书”:“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二七:“今郡至棘闱,日未及中,残编散帙,盈于阶戺,甚者以经史纂辑成类,或赋论全篇刊为小本,以便场屋。”陈善《扪虱新语》下集卷四:“编次文字或是或非”条:“今市书肆,往往逐时增添改换,以求速售,而官不禁也。”所以我们得以从宋元明的类书中发现《卢宗迈切韵法》的痕迹。也许它们源于卢书,也许抄自更早的祖本,但它们后出转精,卢书早于它们则是可以断言的。

十

如今我们可以肯定,南宋初至少有两本同一性质的切韵学著作、切韵图流行。一是杨中修的《切韵类例》,已佚,据赵荫棠考证,杨书编于绍兴八年(1138)左右;一是《卢宗迈切韵法》,卢跋在淳熙丙午年(1186)。两者的共同点是显著的:皆以《集韵》为根据,据孙觌的《切韵类例序》知杨书有“例”十条,图 44,卢书所集切韵法也是十条左右,两次言及 44 图。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十五,卢宗迈隆兴元年(1163)在京城做官,据方志本传,他是位“性好文史”的藏书家,孙觌(1081—1169)官高名大,卢宗迈不可能不知,而卢跋只言“世传四十四图”,只字未及孙杨,因此我们没有证据说卢书承自杨书。孙觌是文章老手,这篇序写得有气势,但不无夸张的色彩,他说杨中修“著”“作”类例,用现代话说,实是“编”,最多是“编著”,[①] 因为切韵学、切韵图均前有所承,而又代有更革,层累地造出来的,不可能全部自我作古,卢宗迈自称“集”切韵法,实事求是。既共有所据,同有所承,杨、卢的“例”图当有很多相同和相近之处。

自清同治元年(1862)邹伯奇《切韵指掌图跋》指出《切韵指掌图》的司马光序系抄自孙觌《切韵类例序》,此后大矢透、赵荫棠、董同龢、

① 张麟之《韵镜序作》述及杨倓“撰韵谱”,引杨自序:“得历阳所刊《切韵心鉴》,因以旧书手加校定,刊之郡斋。”可见据底本校定亦谓之撰。

姚荣松诸家继续证明，已成定谳。既然序可抄孙觌，那些“检例”、九“辨”、图表就毫无抄袭的可能吗？杨书已佚，但是我们却发现了卢书与《切韵指掌图》的若干相同之处。

宋绍定刻本《切韵指掌图》今存，其例与图有矛盾，例与例有矛盾。例如“辨分韵等第歌”：“见溪群疑四等连/端透定泥居两边/知彻澄娘中心纳/帮滂四等亦俱全/更有非敷三等数/中间照审义幽玄/精清两头为真的/影晓双飞亦四全/来居四等都收后/日应三上是根源”这歌所表现的韵图是，三十六母，始见终日（广韵系韵图始帮终日），分23行，知组4母、非组4母、照组5母各自夹插于同类音中，这种“夹心式”的结构与卢书及《韵镜》等全同。而《切韵指掌图》二十图中的三十六母虽也是始见终日，但一线排列，不产生“居两边”“中心纳”的问题。

在切韵五音和乐律五音相配的问题上，《切韵指掌图》例有三套系统，按出现先后，A．“辨五音例”，B．“辨字母次第例”，C．“三十六母切韵五音乐律五音旁通图”（宋本第十一叶上半叶，此名乃笔者所拟）。A和《守温韵学残卷》的“辨宫商徵羽角例”、神珙《四声五音九弄反切图》、安然《悉昙藏》、韩鄂《四时纂要》所载大致相同（歧异处不具言，参看黄耀堃文）。其乐律五音整齐有序，姑名曰齐序型。C系统“牙—角”跃前，谓之逆向换位型，与《卢宗迈切韵法》、《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的“总括五姓分配例”相同。B系统则进一步，唇和喉所配者互换，谓之换位更配型。王应麟《小学绀珠》的甲、乙式分别同于此处的A、B型。今列表，并与其他切韵文献相比较，表中的阿拉伯数字是原书中的出现顺序。

类　型	切韵法文献	唇	舌	牙	齿	喉
齐　序　型	A 七音略	5 羽 1 羽	4 徵 2 徵	3 角 3 角	2 商 4 商	1 宫 5 宫
逆向换位型	C、卢书、经史正音切韵指南	3 羽	2 徵	1 角	4 商	5 宫
换位更配型	B、四声等子	3 宫	2 徵	1 角	4 商	5 羽

上述A、B、C三型是各不相同的，《切韵指掌图》的例不管龃龉与否，兼收并纳，这倒像《玉篇广韵指南》、《事林广记》、《居家必用事类》，具有类书的性质。

卢宗迈序言中引的切韵诗有“验人端的处，下口便知音”，《切韵指掌图》“双声叠韵例”的“歌”也有此二句。本文第五节曾经指出，卢书反映的切韵图船禅相淆合于其所依据的《集韵》，《切韵指掌图》船禅亦混，如二者都将“纯盾顺术”列为禅母四声相承的一组字。董同龢、姚荣松二文都列举了很多《切韵指掌图》源于《集韵》的字，兹不赘述。《切韵指掌图》在宋代韵图中无疑是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它根据宋代韵部的简化，归并成20图，任何韵图都是层累地造出来的，都有所因革，《切韵指掌图》与《集韵》和集韵系韵图关系密切。图前总要有个例，也许是其后的切韵家或书肆主人纂例时就胡抄乱凑，成为杂烩，以致或自相矛盾，或与图相背。邹伯奇发现了序的抄袭痕迹，我们从“例”的矛盾中发现的不协调的因素，其中有些恰恰都跟卢书相同或相近。

宋本《切韵指掌图》在诸例之末即十一叶后半叶有一掌图，闻名遐迩。也是左手，所列三十六母顺序是唇音居首(按，唇音领先是《韵镜》、《七音略》和王宗道《切韵指玄论》、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五所传述的“切韵之法”的特点)，但其后二十图皆为牙音置前。而且大拇指上所写的唇音八字居然帮组四母殿后，更属瞀乱。董同龢因为此图同意其友张政烺的推测，《切韵指掌图》是南宋时江西和尚做的，而其例中有与卢书相同的成份，平田昌司先生提醒我，卢宗迈是淳熙年间的江西人。

十 一

《卢宗迈切韵法》不仅在汉语音韵学史上有珍贵的学术价值，而且也为汉语语音史提供了若干宋代的语音资料。

1．全浊上变为全浊去。韩愈《讳辨》、李涪《刊误》都是中晚唐全浊上变去的史料，张麟之《韵鉴序例·上声去音字》：“凡以平侧呼字，至上声多相犯。古人制韵间取去声字参入上声者，正欲使清浊有所辨耳。或者不知，徒泥韵策，分为四声，至上声多例作第二侧读之，**此**

殊不知变也。若果为然,则以士为史,以上为赏,以道为祷,以父母之父为甫,可乎?今逐韵上声浊位并当呼为去声。”卢宗迈“三十六母分清浊”表将十个全浊字母及其右下角小字“全浊”都用朱笔书写,而且在该表左下空处大书“全浊字母下字并上去声同呼”。卢书(七)“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字图”,列47组四声相承字,按语:“以上十个字母并属全浊,所以上去二声字同呼。今录出者并上声去声皆有字者,庶明未晓切韵人。以全浊上声字,例调作次清或全清字母下上声字呼之(原注:如“常上尚杓”却云‘常赏尚杓’,若用‘赏’字为上声,则合云‘商赏饷烁’,是审字母下字也,非禅字母下字也),其误远矣。”卢宗迈和张麟之都指出南宋时人调声的普遍错误,把全浊上声字调作清上字,而变同全浊去才是对的。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〇:“范应辰为大理评事,(胡)旦画一布袋,中藏一丐者,以遗范,题云‘袋里贫士’也。”“士”,崇母上声止韵;“事”,崇母去声志韵,则是浊上变去。同上:“有张献图者,应举久不第,好嘲戏,以五举推恩,得三班奉职,以诗寄其妻云:‘吾今为奉职,子莫怨鸾孤。’”“奉职”谐“凤隻”、“奉”,奉母上声肿韵;“凤”,奉母去声送韵,是浊上变去。陈叔方《颍川语小》:“‘父辅妇道抱’数字皆上声也,而以去声读之,其杭浙之音欤?”这也是一则浊上变去的史料。

2. 非敷合一、知照合一、彻穿合一。卢书(八)知照、非敷、彻穿字母同呼图,列若干字,按语云:“以上六个字母下字,若切脚上一字是本母下字,即切归上六字母也。以知照字、非敷字、彻穿字母下字,呼吸相同,故录出以辩切字时,归母无差。”

先录非敷两字母图:

非文	芳	夫	甫府	仿匪风分弗
敷虞	方	孚	抚	

原抄“夫”误作“天”,而且在“芳方”、“夫孚”、“甫府抚”三组同音字间误以线隔开。“方”为非母字,“芳”为敷母字,两字颠倒正说明非敷相混的深入人心,连切韵家都糊涂了。罗常培先生《唐五代西北方音》指出唐五代时非敷为一类,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指出《说文系传》

的朱翱反切系统非尠合一。

知$_{\text{支}}$	中	张	猪株	珍	冢	徵	陟	知	屯展竹卓追
照$_{\text{笑}}$	钟	章	朱诸	真	肿	止旨	职	之	菑征庄专邹臻争阻主煮质侧札簪斩

“札”原抄误作“礼”。上列照母字中照二(即庄母)字为“菑庄邹臻争阻侧札簪斩”,余为照三即章母字。

彻$_{\text{薛}}$	痴笞摛	忡	椿	耻	楮	敕	抽丑
穿$_{\text{仙}}$	蚩	充	春	齿	处	尺赤	窗枢初刍昌叉车称楚敞创测察姝(音枢)

上列穿母字中穿二(即初母)字为“窗初刍叉楚创测察”,余为穿三(即昌母)字。

据卢图,当是庄章先合,再与知合;初昌先合,再与彻合。仁宗嘉祐元年黄河决口,《宋史》卷九一《河渠志》:“宦者刘恢奏:……河口乃赵征村,于国姓、御名有嫌。”则是仁宗之名“祯”(知盈切)与“征”(诸盈切)同音,又岳珂《桯史》卷一三“冰清古琴”条,为避宋仁宗讳,将“贞元”写作“正元”,都可见宋时知照已合一。辛弃疾有首药名词《定风波·山雨风来草木香》内有一句“故应知子草玄忙”,“知(知母字)子”谐“栀(章母字)子”足证知章合一。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认为朱熹反切系统里三组合并。卢宗迈和朱熹为同时人。于此可见,现存宋代韵图都是三十六母,无论是一线排列或二十三行,都不反映语音事实,都是保守的,如知彻或单列或与端透相次,实已与照穿合并。

3. 未言澄床“呼吸相同”,卢书(七)“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字图”列十个全浊声母,其床母字实为床二(即崇母)字,床三(即船母)并入禅母,详见本文第五节。卢书未言浊音消失,但朱熹反切系统浊音清化。《居家必用事类》和元刻本《切韵指掌图》所收的《切韵捷法诗》有“难呼语句皆为浊,易纽言辞尽属清”、“字母贯通三十六,要分清浊重和轻”,这说明浊音的清化给切韵家们带来了难题,所以反复叮咛。

4. 鱼虞合一。知照同呼图列“猪$_{\text{鱼}}$株$_{\text{虞}}$朱$_{\text{虞}}$诸$_{\text{鱼}}$”为同音字。秦

少游词名句“杜鹃声里斜阳暮”的末字，宋人范温《潜溪诗眼》、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因讳改字”条、王楙《野客丛书》卷二〇“少游斜阳暮”条、元人黄溍《日损斋笔记》皆曾论及，或以为本作“曙”、“树”，因避英宗讳，而改作“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〇：“庙讳同音，‘署’字常恕反，‘树’字殊遇反，然皆避讳，则以为一字也。……而今学士大夫乃不能辨，方嘉祐、治平之间，朝士如宋次道、苏子容辈，皆精于字学，亦不以为言，何也？”宋刻《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韵略条式》第25叶载英宗讳字，列“曙（常恕切）署”等9字、“树（殊遇切）竖”等18字，则是宋代鱼虞混一的铁证。又，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五：“鲁直为礼部试官，或以柳枝来，有法官曰：‘漏泄春光有柳条。’鲁直曰：‘榆条准此。’盖律语有‘馀条准此’也。一坐大哄，而文吏共深恨之。”按，“榆馀”同音表示虞鱼二韵混。

5．支脂之微相混。非敷同呼图于“非”下注小字“支”，意为“非”是支韵字，而“非”在切韵系韵书中是微韵字。知照合一图列“徵$_{止}$止$_{止}$旨$_{旨}$”同音，“知$_{支}$之$_{之}$”同音。彻穿同呼图列“痴$_{之}$笞$_{之}$摛$_{支}$蚩$_{之}$”同音。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七：“俗语借与人书为一痴，还书与人为一痴，予每疑此语近薄。”后知“古语：借书一瓻，还书一瓻”，“盖俗误以为痴也”。（周辉《清波杂志》卷四、吴坰《五总志》均有一则类似）“痴”，之韵字，“瓻”，脂韵字，可证二韵混。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二“王洙侏儒”条：“林瑀、王洙同作直讲，林谓王：‘何相见之阔也？’王曰：‘遭此霖雨。’瑀云：‘今后转更疏阔也。’王曰：‘何故？’答云：‘逢这短晷。’盖讥王之侏儒。”因“晷”（旨韵字）与“鬼”（尾韵字）同音。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〇：“（刘）贡父晚年鼻既断烂，日忧死亡，客戏之云：‘颜渊、子路微服同出，市中逢孔子，惶怖求避，忽见一塔，相与匿于塔后，孔子既过，颜子曰：‘此何塔也？’由曰：‘所谓避孔子塔也。’”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五亦载此事。这是利用和“鼻孔子塌”同音开恶性玩笑，可见“避”（寘韵字）“鼻”（至韵字）同音。文莹《湘山野录》卷中：“高副枢若讷一日召姚嗣宗晨膳，忽一客老郎官者至，遂自举新诗喋喋不已。……姚亦关中诗豪，辨谑无羁，潜计之，此老非玩不起。……又举秋日峡中感怀曰：‘猿啼旅思凄。’姚应曰：‘好对“犬吠王三嫂”。’”“旅思凄”同音为“吕四妻”，“四”是至韵字，“思”是志韵

字,可见至志二韵之并。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五:“昔年有一大臣,留守北京,方暑,至上关,因得诗句云:‘河上荷花何处好。’坐上幕客,河朔人也,应声对云:‘市中柿子是谁甜。’”据此可知北宋时河朔地区“市柿是”三者同音,则是止纸二韵混,崇禅二母混。宋词即以支脂之微齐祭废诸韵为一部押韵。如柳永《看花回·屈指劳生百岁期》叶“随$_{支}$飞$_{微}$为$_{支}$稀$_{微}$眉$_{脂}$枝$_{支}$归$_{微}$”,晏几道《临江仙·身外闲愁空满》叶“稀$_{微}$诗$_{之}$时$_{之}$知$_{支}$归$_{微}$枝$_{支}$”,详见拙文《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下三条同)。

6．昔职相混。彻穿同呼图列“敕$_{职}$尺$_{昔}$赤$_{昔}$”为同音字。《渑水燕谈录》卷一〇:“有张献图者,应举久不第,好嘲戏,以五举推恩,得三班奉职,以诗寄其妻云:‘吾今为奉职,子莫怨鸾孤。’”“奉职”同音字为“凤隻”,“隻”是昔韵字,可见昔职二韵混。其相配的阳声韵“清”与“蒸”亦混,可为佐证。《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韵略条式》载宋帝讳字,仁宗名“祯”(陟盈切),讳字有“徵”(知陵切)。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二:“仁宗庙讳祯,语讹近蒸,今内庭上下皆呼蒸饼为炊饼。”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六“蒸饼”条:“本朝读蒸为炊,以蒸字近仁宗庙讳故也。”按,“徵蒸”都是蒸韵字,前为知母,后为照母,据卢宗迈书,知照合一,则二字同音,宋代定“徵”为仁宗的嫌名,则是宋代“徵蒸祯”三字同音。

7．东钟混一。知照同呼图列“中$_{东}$钟$_{钟}$”为同音字。张麟之《韵鉴序例》有三处反映了当时东冬钟合并,例如“归字例”中的归难字法,如得“千竹反”,“取嵩字横呼,则知平声次清是为樅字”。按,“嵩”是东韵字,“樅”是钟韵字,因为实际语音已混,张氏才如此说。

8．江阳合流。卢书(七)“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字图”列47组字,各组次序合于切韵系韵书,唯阳韵字在群澄禅母组中居首,唐韵字在定母组中位于东韵字后,模韵字前,当系江阳合流牵动阳唐趋前。《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都是江阳合图。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刘丞相沆为士人时,携一仆赴礼部,夜卧忽惊起哭。丞相怪问,……再三诘之,曰:‘梦主君为人斫去头。’丞相曰:‘此乃吉证,斫去头留得项,我当为第二人。’果于王拱辰榜第二人赐第。”按,“刘留”同音,“沆项”同音,是荡韵讲韵相混。

9. 值得注意的是，知照同呼图中列“知之”同音，彻穿同呼图列“耻齿”同音。而在元代的《中原音韵》里，“知耻”隶齐微韵，“之齿”属支思韵，并不同音，明代的《韵略易通》亦然。何以解释？俟他日以专文讨论。

十　二

卢宗迈裒集的这个《切韵法》是宋代切韵学的某个派系的资料的汇辑，这个派系是以《集韵》为宗的，这套切韵法的匹配物是某种集韵系切韵图，惜乎此图至今尚未发现，但是我们仍能依据《卢宗迈切韵法》考证出这种集韵系韵图的若干情况。这里我们想考察一下这套切韵法产生的时间，上限当然是《集韵》颁行之年即仁宗宝元二年（1039），卢宗迈“书而传之同志”的时间是南宋孝宗淳熙己亥（1179），但这不能是下限之年，因为卢氏自述：“自僮时悟此，今四十年矣。”就是说，他在高宗绍兴十年（1140）前即熟悉这套切韵法。看来说它是北宋之物，估计不会遭到反对，（九）“切韵之学”概述一章多半与《梦溪笔谈》同，即是一证。这套切韵法长期在文士中流传，源远流长。它可能是比较早的东西，理由是这套切韵法粗糙了些，一种学说，愈早则愈粗糙原始，愈晚则愈精致完善，这是通则。第一，请看《卢宗迈切韵法》中的（五）《三十六字母切韵法》所列三十六字母的次序是：“心晓端知见审精非帮清溪穿透彻敷滂並奉群邪匣定澄从禅床明微来喻日疑照影泥娘”，最多只能勉强说，似乎以“全清、次清、全浊、不清不浊”四类为序，然而“照影”夹于“疑泥”之间，四类各母毫无相应之处，相当紊乱，连相传为唐末人的守温的《韵学残卷》也不至如是。第二，《卢宗迈切韵法》涉及到的门法不算复杂，个别术语名称不一致，如（二）《三十六字母切韵诀》提出的一种门法是“往来切”，（六）“切三十六字母法”却言“往还切”，如果统一起来就不给人粗糙之感。第三，《卢宗迈切韵法》（四）《三十六字母五音旁通图》依“牙舌唇齿喉”、“角徵羽商宫”、“木火水金土”给自“见”至“喻”的三十四字母逐个定位，而“来日”二字母只标了“半徵半商”音、“半火半金”音，（六）《切三十六字母法》列牙音四母，舌头音八母，唇音八母，齿头音十母，喉音四母，最后却是“半徵半商音”二母。如果按照类推律，定

名为“半舌半齿音”，简直呼之欲出！然而始终未见这一术语出现。元刊《大广益会玉篇》卷首的《玉篇广韵指南》却清清楚楚地列“半舌半齿音”，《韵镜》在来日二字母位置上冠以“舌音齿”，王宗道《切韵指玄论》、沈括《梦溪笔谈》都谓之“半齿半舌音”。于此一端，亦可见《卢宗迈切韵法》比较粗糙原始，借用张麟之的话，“其来也远”。如果这一看法能成立的话，《卢宗迈切韵法》中的“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知照字、非敷字、彻穿字母下字呼吸相同”所反映的不能看作是南宋初年的语音现象，当是北宋时期的语音现象，其他类此。

《卢宗迈切韵法》是宋代切韵学著作中的一种，它在第（八）部分明确指出“知照字，非敷字、彻穿字母下字，呼吸相同”，可是在（一）（二）（三）（四）（五）（六）中不厌其烦地讲述三十六字母及其助纽字问题，占了全书过半的篇幅。张麟之也特为《韵镜》“撰字母括要图”，《四声等子》和《切韵指掌图》的例也屡屡言及三十六字母。传世的宋元韵图及已佚的《洪韵》、《切韵心鉴》、杨倓《韵谱》都牢牢死守三十六字母。大凡难题才会再三解释，三十六字母早已过时，但又要拘守，所以切韵家反复强调，唯恐不周。至于韵母系统，广韵系韵图、集韵系韵图与宋代实际语音距离颇远，自不必言；即令《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接近从宋词用韵归纳出的韵部系统，它们都未必尽合时音。“全浊上归去”已是宋人共识，但韵图仍然拘泥旧的四声系统不变，张麟之云：“古人制韵间取去声字参入上声者，正欲使清浊有所辨耳。”可谓曲说，还是卢宗迈书（七）“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符合事实。总之，韵图是层累地造出来的，有或多或少的因袭，有或多或少的更新，所以对研究汉语语音史的学人来说，就存在一个如何利用切韵图的问题。

十　三

清代末年，杨守敬在日本获得《韵镜》，黎庶昌收入《古逸丛书》，其《刻古籍丛书序》：“古书之不亡，古人之精神自寄之，岂予所能增重？而独至搜辑之责似若有默以畀予者，固不敢不勉也。”百余年后，我得平山久雄先生及其高足之助，游学扶桑，获睹此沉埋八百余年之古籍，可谓大幸。平山先生嘱我著文公布此宇内孤本，以飨学界，不

敢不勉。平山先生殷切关怀，赐教良多，理应同署，请之再三，却之再三，先生高风，令我愈加钦敬。

限于篇幅，有些问题未及讨论，俟之他篇。虽时及廿月，地历三国，勉强成文，误谬必多，祈请方家教正。

1992 年 6 月 10 日结稿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1993 年 6 月修改，1994 年 3 月再次修改

主要参考文献

白涤州 1931 集韵声类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三本第二分。

陈垣 1962 史讳举例，中华书局，北京。

董同龢 1974 董同龢先生语言学论文选集，食货出版社，台北。

1977 汉语音韵学，文史哲出版社，台北。

方孝岳 1988 广韵韵图，中华书局，北京。

冈井慎吾 1933 初版，1969 再版，玉篇の研究，东洋文库发行，东京。

何九盈 1985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

黄耀堃 1982 试释神珙《九弄图》的“五音”——及“五音之家”略说，均社论丛，第 11 期，京都。

1982 有关“五音之家”资料初编(一)，同上，第 12 期，京都。

1983 有关“五音之家”资料初编(二)，同上，第 13 期，京都。

1991 试论《归三十字母例》在韵学史上的地位，均社论丛，第 17 期，京都。

姜亮夫 1990 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

李孟晋 1981 宋代书禁与椠本之外流，宋史研究集第十三集，台北。

李荣 1956 切韵音系(新一版)，科学出版社，北京。

李新魁 1981 韵镜研究，语言研究 1981 年第 1 期。

1983 汉语等韵学，中华书局，北京。

刘伯骥 1971 宋代政教史，中华书局，台北。

鲁国尧 1988 《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

1991 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同上，第 4 期。

罗常培 1963 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北京。

宁继福 1987 金代汉语语言学述评，社会科学战线第 1 期。

潘重规 1974 瀛涯敦煌韵辑新编·瀛涯敦煌韵辑别录，文史哲出版社，台北。

朴现圭、朴贞玉 1986 广韵版本考，学海出版社，台北。

平田昌司 1984 《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与《切韵指掌图》——试论语言神秘思想对宋代等韵学的影响，东方学报第五十六册，日本京都。

邱棨鐊 1974 集韵研究（稿本影印发行），台北。

邵荣芬 1982 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本春彦 1986 广韵切韵谱（第三版），京都均社，日本京都。

王力 1958 汉语史稿（修订本）上卷，科学出版社，北京。

1985 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薛凤生 1985 试论等韵学之原理与内外转之含义，语言研究 1985 年第 1 期。

姚荣松 1974 切韵指掌图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第十八号。

远藤光晓 1988 敦煌文书 P2012《守温韵学残卷》について，青山学院大学《论集》第 29 号。

赵荫棠 1957 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北京。

周宝珠 1985 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北京。

周法高 1968 中国语言学论文集，崇基书店，香港。

周祖谟 1966 问学集，中华书局，北京。

1983 唐五代韵书集存，中华书局，北京。

大宋重修广韵，周祖谟《广韵校本》，余迺永《互注校正宋本广韵》（台北联贯出版社，1975），日本静嘉堂文库藏高宗绍兴间浙刊本。

钜宋广韵，日本内阁文库藏孝宗乾道己丑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刊本（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本（缺去声一册）。

集韵，中华书局 1989 年影印北京图书馆藏孝宗时潭州刻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藏淳熙丁未田氏刊本（缺第一册）。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五卷附韵略条式一卷，四部丛刊续编影印铁琴铜剑楼藏宋理宗时刊本。

增修校正押韵释疑，四库全书本。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日本内阁文库藏元至正本，东京八木书店影印元至正本（1982）。

集篆古文韵海（杜从古），宛委别藏本。

校订五音集韵(韩道昭著,宁忌浮校订),中华书局,1992。

七音略,元至治本。

韵镜,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55),龙宇纯《韵镜校注》(艺文印书馆,1976),李新魁《韵镜校证》(中华书局,1982)。

切韵指掌图,宋绍定刻本(中华书局影印,1986),渭南严氏音韵学丛书本。

等韵五种,艺文印书馆(台北,1981)。

玉篇广韵指南,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刊《大广益会玉篇》卷首,明成化十四年叶氏南山精舍刻本《广韵》附。

史书十余种,如《宋会要辑稿》、《东都事略》、《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路史》、《宋史》、《续资治通鉴》、《宋史纪事本末》、《宋名臣奏议》、《历代名医奏议》等。

宋人文集396种(单刊本、点校本、校注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共计8442卷,如周麟之《海陵集》(海陵丛刻本、四库全书本),孙觌《鸿庆居士集》、《内简尺牍》(常州先哲遗书本、四库全书本),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刻本),王之望《汉滨集》(四库全书本)等。

宋元明类书数十种,如王应麟《玉海》(元后至元三年庆元路儒学刊本),陈元靓《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元刻本),章如愚《山堂考索》(四库全书本),佚名《居家必用事类》(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年影印宽文十三年即1673年松柏堂和刻本),凌迪知《万姓统谱》(四库全书本),廖用贤《尚友录》(光绪刊),陈继儒《宝颜堂秘笈》,宛委别藏等。

宋元笔记百种,如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文莹《湘山野录》、王观国《学林》、刘攽《贡父诗话》、龚鼎臣《东原录》、朱翌《猗觉寮杂志》,许观《东斋记事》、白珽《湛渊静语》、刘壎《隐居通议》、俞成《萤雪丛说》、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等。

宋以来书目近百种,如《四库阙书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中兴馆阁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述古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另藤原佐世《日本见在书目》、《日本国会图书馆汉籍目录》等。

地方志数种,如天顺五年《大明一统志》,康熙《西江志》,雍正《江西通志》,

同治《南安府志》,同治《大庾县志》。

卢联桂:《江西卢氏通谱》(民国十年石印本)。

《大正藏》

索引、引得多种

1990年9月我应日本学术振兴会之邀,赴日与东京大学平山久雄教授合作研究,在平山久雄、远藤光晓先生的帮助下,发现了《卢宗迈切韵法》,在研究和撰文的过程中得到平山久雄、平田昌司、岩田礼、远藤光晓诸先生的热情帮助。初稿也曾请薛凤生、侍建国先生赐阅,陈慕勤先生为我提供了若干资料。为写此文,我先后在日、中、美读了与课题有关的大量论著,又发奋翻阅了396种宋人别集,近百种古代书目。承《中国语文》破格,将拙文连载于1992年6期、1993年1期。1993年春河南教育出版社约我出自选集,于是又翻阅了数十种宋元明类书,1993年6月对拙文作了第一次修订。承查道元先生允许,我在读了百种宋元笔记后,于1994年3月再作修改,在修改的过程中还承唐作藩、胡双宝、何九盈、远藤光晓、黄耀堃等先生赐教、赐助,鼓励良多,谨于此向诲我、助我的诸位先生统致谢忱。

1994年3月

这两年来很多先生鼓励、赐教,特别是邓瑞、黄笑山、储泰松先生告诉我若干资料,我非常感谢这些先生。这次结集,我又作了若干修改、增补,并将原题"述评"改为"述论"。

1996年12月10日3时6分

1993年春我回母校,见到北大出版社编审胡双宝学长,他主动建议将《卢宗迈切韵法》影印出版,并附上拙文,我深为感动,因为在当今,出版这种绝对不能赚钱的生僻古籍和绝学文章,只有具慧眼的学者编辑才能如是。于是我请何九盈学长赐序,他在11月从澳门寄来了序文。我总想把拙文改得好一些,兼之拖拉成性,以致迄今也不

敢跟胡双宝学长联系,也愧对何兄。值此编集拙集之时,先把何兄序文抄录于下:

卢宗迈《切韵法》的被发现,是等韵学上的一件大事。国尧学兄对此书的述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切韵法》篇幅不长,除了卢氏自己写的前序后跋,从“音释切韵法难识字”到“指掌图与调四声例”,共计十个专题。没有音系图表,也没有其他背景材料。应该说,内容是相当简略的,要弄清楚这部《切韵法》所反映的音系和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是很不容易的。国尧功底深厚,精于考证,又善于把微观研究与宏观考察结合起来。据片言只语能做出妙手文章,从蛛丝马迹可看到大千世界。许多结论发前人之所未发。值得称道的有以下六点:

一、《切韵》和《玉篇》相配,《唐韵》和《大广益会玉篇》相配,《集韵》和《类篇》相配,这是人所共知的。而明确划分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篇韵,这是前所未有的。至于指出“宋代确有集韵系韵图在,而且不止一种”,这种韵图和广韵系韵图的根本区别是有四十四图,卢宗迈《切韵法》所依据的韵图就是反映《集韵》音系的四十四图,这都是崭新的发现。

二、《韵镜》、《七音略》都是四十三图,为何卢宗迈等人都谈到切韵有四十四图呢?这多出的一图是什么内容?国尧指出:《韵镜》、《七音略》不载幽韵精母字和生母字,故少了一图。这又是新的发现。

三、根据韵图与韵书的错综关系,又根据图与例之间所存在的种种矛盾,鲁文指出:“切韵图是层累地造出来的。”这个理论的提出,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有了这个理论作为指导,人们就可以更科学、更客观地分析韵图,剥离出其中的异质成分,判断其时代特点和音系特点。

四、“等韵”这个术语产生于何时?“等韵”这个词产生之前与之相当的名称是什么?鲁国尧断言:“等韵”二字连言,不见于宋代典籍,至明清方见。宋代只有“切韵之学”、“切韵图”。老吏

断狱，毫厘不爽，令人叹服。宋之“切韵法”、“切韵图”，即明清之等韵学，名异而实同。明清弃“切韵”而立“等韵”，概念更为清楚，名称更为得当，这是一个进步，彻底揭示了韵图不同于韵书的本质特征。

五、将杨中修的《切韵类例》与卢宗迈的《切韵法》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是属于同一系统的韵图，这一结论也相当重要。因为既然《切韵类例》的性质同于《切韵法》，所依据的音系相同，那么我们就更有理由对前人将《切韵指掌图》的著作权归在杨中修名下的结论进行彻底否定。杨的《类例》有四十四图，《指掌图》只有二十图，这是很不相同的。杨书已佚，但从卢宗迈的《切韵法》中可以看出：四十四图的入声配置与《指掌图》的入声配置完全不同。前者只配阳声韵，后者可阴、阳相配。《切韵法》的“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字图”列举47组从韵图中摘出来的四声相承字例，其中有二十一组字例属阴声韵，均无相配之入声。《指掌图》反是，大部分配以入声。请看下面的对比，左栏为《切韵法》的材料，右栏为《指掌图》与之相应的材料：

求臼旧〇	求舅旧趷
徒杜度〇	徒杜度独
陶道导〇	淘道导铎
厨柱住〇	厨〇筯〇
晁赵召〇	晁肇召著
俦纣胄〇	俦纣胄秩
皮被髲〇	皮被髲弼
蒲簿步〇	酺簿捕暴
裁在在〇	才在在巀
罪啐〇	摧罪蕞捽
曹皁漕〇	曹皁漕昨
矬坐座〇	矬坐座柮
词似寺〇	词兕寺〇
邪灺谢〇	邪灺谢〇

鉏龃助〇	鉏龃助〇
韶绍邵〇	韶绍邵妁
雠受授〇	雠受授实
豪皓号〇	豪皓號涸
何荷贺〇	何荷贺曷
遐下暇〇	遐下暇黠
侯厚候〇	侯厚候劾

根据上面的对比，不仅可以肯定《指掌图》与杨中修的《类例》、卢宗迈的《切韵法》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就是在时代上也应晚于《切韵法》，但也不会相差太远。

张麟之《韵镜序》曾谈到杨倓撰《韵谱》，变二十三字母的行列为三十六字母一字排列。所谓"杨变三十六，分二纸，肩行而绳引"。又戴震《答段玉裁论韵书》说："上年于《永乐大典》内，得宋淳熙初杨倓《韵谱》，校正一过。其书亦即等呼之说，于旧有入者不改，旧无入者，悉以入隶之。"足见淳熙(1174—1189)初年问世的《韵谱》已定三十六母"肩行绳引"，一图"分二纸"；又以入声兼配阴阳。这两个特点与《切韵指掌图》相符合。只是张麟之并未谈到《韵谱》变四十三图为二十图。二十图的格局大概是对杨倓《韵谱》的改进吧，其时不得晚于十三世纪初年。

六、我们还得感谢鲁国尧的，是他从浩繁的资料中弄清了卢宗迈的一些基本情况。江西人，这一条最重要。从今以后，卢宗迈这个久已湮没的名字将要在古代语言学史上占一席之地。《切韵法》一书也将通过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由藏于东洋的宇内孤本而成为广大音韵学家都可研究的珍贵文献。

关于《切韵法》的研究，鲁国尧的述评，可谓"尽美矣，又尽善也"，"吾无间然矣"。只是还有一个疑团未能解开，写出来求教于国尧和海内外高明。

卢宗迈的跋文说："世传切韵四十四图，……而有声有形与有声无形，万一千五百二十声，该括世之所有字，并在其中。"卢氏所说的声数包括有形之字和无形之声，是否包括《韵镜·序例》中所说的"无声无形"呢？又，这"万一千五百二十声"的来历，是

否就是“合于周易的万物之数”而与韵图的格局全然无关呢？我计算了一下《切韵指掌图》的方格，包括有形之字和无字之圈（围），以及既无字又无圈的空格，二十图的总数正好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这是巧合呢？还是《指掌图》与《切韵法》之间还有某种联系未被揭示出来呢？抑或卢宗迈的表述有问题呢？海岛无书，亦无处求教，望国尧读此序后，不吝赐教。

何九盈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于澳门氹仔岛

何大学长的学问以精深著称，他的问题我至今也答不出，愧我不学。

不约而同，黄笑山同志也书面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兹撮其要于后：

据卢跋、卢书（九），知卢书所据的图亦是三十六字母、四声、四等，若依此推算，则：

44 图×23 行（字母）×4 声×4 等＝16192 有声有形与有声无形或：

44 图×36 行（字母）×4 声×4 等＝25344 有声有形与有声无形都不符卢跋中“万一千五百二十声”之数。即便考虑《韵镜》式的入声配阳声，不计阴声韵里入声四个等的地位，也得不出 11520 来。

“万一千五百二十声”与象数易关系密切，《易·系辞上·传》：“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据此似乎可说卢跋中“万一千五百二十”之数纯属跟术数色彩相关的数字借用，与韵图的“有声有形与有声无形”无直接关系，正如《指掌图》董南一《序》中“以三十六字母总三百八十四声”一样，384 跟图中 572 格不符。但是，正是这个 11520 跟《指掌图》的格子正相符。《指掌图》三十六字母线性排开，与三十六这个神秘数字正同，因以四个等，再因以四声，再因以二十图，正好是卢跋所谓“有声有形与有声无形万一千五百二十声”：

36 字母×4 声×4 等×20 图＝11520 声

这是否说明卢跋虽两次提到44图，但他所依据的却可能不止此一种韵图？《指掌图》是三十六字母一式排开，而仅依《检例》中“辨分韵等第歌”判断，我们也许会说它是三十六母排成23行。同理，依卢书(六)“切三十六字母法”判断，我们就会作出23行的推论，但却无法得出11520声来。《韵镜序》谓杨倓于宋淳熙间撰《韵谱》，“变三十六，分二纸，肩行而绳引”，卢宗迈《切韵法》之序、跋亦在淳熙间，是时除了“世传切韵四十四图”外，《指掌图》那种三十六字母为行的二十图韵图想必也已盛行，所谓“杨变三十六”或许只是代表。卢书既然是“集切韵法”，所据所辑会不会既有44图者，又有20图36字母线性排列者？

我十分感谢何九盈、黄笑山等同志对我的帮助！

何九盈先生序文刊于《古汉语研究》1999年1期(其末段本集未引)。我想对《卢宗迈切韵法》加深研究，想对整个切韵法的历史(如《梦溪笔谈》所传述之切韵法)作全面研究，所以拟著之书迄今未得毕工。

南京的吴葆勤先生和东京的宫纪子小姐今年先后各自告诉我：“和刻本《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戊集卷之三讲射箭的“前后手法”时提到“宋朝太尉卢宗迈释(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本页379右上)。”谨此表示谢意。

原题为《〈卢宗迈切韵法〉述评》，现改今题。

2002年12月

学术是链

——序《宋辽金用韵研究》

如果翻开我们的先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论著，我们就会叹服、钦敬他们的开辟之功。魏建功先生《古音系研究》(1935)一书的《开宗明义(引言与总纲)》中声明，“凡是在今日国音以前的音韵的研究皆属于‘古音系’中”，因此“古音系的研究成为语音史的意味”；又说，“凡是中国语言文字所表示的音的内容都是古音系研究的东西”，因此“古音系的研究成为语言史的意味”。这说明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青年语言学家已经具有建立汉语语音史和汉语语言史的自觉意识。罗常培先生《中国方音研究小史》(1934)在叙述了成就卓卓的周秦古音和隋唐韵书的研究后云：“如果近人关于历代韵文的实际研究状况，切韵以前的反切系统，及《中原音韵》以后的韵书流别，都能分头次第整理出来，那末，关于全部汉语音韵史的完成，或者也就为期不远了。”建立汉语语音史是罗先生一生的追求目标，罗先生对韵文用韵研究尤其热心倡导，这是由于，清代学者只是对诗经音作了充分的研究，虽然也有少数人如王念孙、洪亮吉也曾将目光移向汉魏音，但只是做了若干材料的纂录、排比工作。罗先生想继清人之后，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所有韵文资料，其目的在于填补从诗经韵脚归纳出的周秦音和自《广韵》及敦煌韵书等的反切研究出的隋唐音之间近千年的一整片空白。罗先生又拟撰写《唐五代宋金元词韵谱》，旨在隋唐音之后再接出一条链，抵达《中原音韵》音系。如此规划，诚为高见卓识。此后王力、于安澜、罗常培、周祖谟、丁邦新、何大安、李荣等先生将前汉至隋的有韵资料作了仔细的研究，数十年间他们的论著终于将周秦到隋末的语音史(韵部演变史)连成了一条完整的长链。

对音韵学家来说，从中古到近代语音的发展，《切韵》和《中原音韵》无疑是最有价值的材料，但是《切韵》音系(《切韵》成书于公元

601年)和《中原音韵》音系(《中原音韵》序于公元1324年),由于时代悬隔,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无法直接接轨。这七百多年的前半期是唐五代,除了韵书、域外译音等的研究外,大量的诗文用韵仍然是汉语音韵史的宝贵资源,这也早为学人所重视,但是这一领域的成就比起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研究来,似乎略有逊色,因为尚无《全唐五代诗用韵研究》、《全唐五代文用韵研究》这样的著作面世,应该说,资料数量过多是主要原因。平心而论,唐五代用韵研究也堪称成绩斐然,张世禄、鲍明炜、唐作藩、蒲立本、马重奇、李维一、荀春荣、储泰松、朴柔宣等等先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全唐五代诗文用韵的全面而穷尽的这一总结性的大型工程,还有待完成。

而从唐五代至元的这一段汉语语音史,前后时代衔接的问题如今显得更为突出,绵亘于其间的辽、两宋、金,长达三百多年,这一时期对汉语语音实现从中古到近代的转变举足轻重。研究清楚这个时代的汉语语音的衍变,可以有效地解读作为近代语音代表点的《中原音韵》的历史渊源。这个时期可供研究语音史的资料很多,但是大宗有韵资料仍然是研究宋辽金语音史的极为宝贵的资源:不仅有诗赋和散文里的若干韵语,而且有词、有诸宫调、有曲,而总体数量之巨则远非前代所可比拟。由于语文学时期普遍存在的厚古薄今的风气,清代及其以前偏重于周秦之音的研究。至二十世纪前期,现代语言学家的注意力首先倾注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音韵,因而论著迭出,不数十年,成就辉煌。相较之下,从整体上说,宋辽金诗词文用韵的研究取得显著成绩的时间显然慢了一大步。但是起始并不算晚,应该说,它开始于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惜乎难以为继,在中断了三十多年后,到了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始得复兴,渐由附庸蔚为大国。

1936年魏建功先生利用辽代石刻哀册文考辽代入声韵,开始了这个领域的探索,是这条链的开端。1942年周祖谟先生发表《宋代汴洛语音考》,在解析邵雍《皇极经世书》的“天声地音”图的同时,首次提出可以通过宋代韵文用韵来考求宋代语音。步武前修,1979年起鲁国尧《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等一系列论文面世,此后,汉语史上10到13世纪用韵研究得到广泛的拓展,从而使处于从中古音向近代音演变转折关键的宋辽金语音在汉语语音史上的重要地

位愈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宋辽金语音史的断代研究已发展成为汉语语音史的一个重要领域。

宋辽金用韵研究的成就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从诗文用韵中考证了宋辽金时代实际存在的通语韵系——18 部系统。这是承接唐五代的语音简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形成的音系,填补了由《切韵》音系发展到《中原音韵》之间的过渡阶段的一大段空白,使得七百余年语音演变轨迹历历可考,形成了又一条链。二,揭示了宋代大江南北一些主要方言区的方言特征。用确凿的语言事实充分说明了,方言与通语并存乃自古而然,展示了历史上汉语存在的复杂性和层次性,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汉语语音研究,改变了围绕《中原音韵》研究北音的单一局面,这是就音韵学范畴而言。值得特别提出的,它还有另一重要意义,即表明了汉语方言史的宋辽金段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这一点似乎要超迈汉魏晋南北朝用韵研究和唐五代用韵研究两个领域,这是由于研究宋辽金段的学人在近二十年不仅从事作家的个案研究,而且更重视大区域研究的缘故。这大大地推动了汉语方言史的研究,因为目前的方言学界还偏重于共时的描写,利用文献资料研究方言史的意识不强,须知我们中国语言学家的一大优势是,拥有历时悠久而又十分丰富的文献资源,这是我们手中的金饭碗。

近二十多年的宋辽金用韵研究的成果大多数是单篇论文,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和论文集。为了充分展示这些成果,给汉语音韵学家和汉语方言史专家提供相关文献,我们选编了这本《宋辽金用韵研究》论文集。凡属宋辽金用韵研究的都是我们选编的范围,但限于篇幅,又不得不有所取舍,某些篇幅过长的作品,作了适当的摘要节录的加工处理。首选魏建功、周祖谟两位先生的文章,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前辈语言学大师,更由于他们的论著是本领域的开山之作。鲁国尧和刘晓南的两篇文章,综述宋辽金用韵研究,可以使人从中获取整体印象。其他单篇文章的编辑按专题分组,共分八组:1. 中原语音,2. 山东语音,3. 江浙语音,4. 四川语音,5. 福建语音,6. 江西语音,7. 湖南语音,8. 入声研究。这些文章的作者,魏建功、周祖谟、唐作藩三位先生是海内外知名专家,他们是开创者和领路人。多数却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长的新一代学人,其中还有一些外国学者,他们近年

来在汉音语音史和汉语方言史领域崭露头角，成为一支有活力的生力军。宋辽金用韵研究已由滥觞之水，历七十年，而成奔腾的江河，此足以告慰魏、周二位先生之灵和学界同仁。

我们希望本书的选编、出版能推动宋辽金语音的探讨，希望能对汉语语音史和汉语方言史的研究作出应有的奉献。

要说明的是，在宋辽金用韵研究领域，已经出版两本专著，一是朱晓农《北宋中原韵辙考》，一是刘晓南《宋代闽音考》，其突出特点在，前者使用数理统计法，后者将闽语的有文献可考的历史从明末清初提前到北宋初。本书当然不能将这两本专书整本收入，然而《宋代闽音考》之要点已散见于本书所收刘晓南的三篇论文内，读者从中可得梗概；为使读者了解宋辽金用韵研究的全部情况，我们将朱晓农《北宋中原韵辙考》一书摘其要，收入本书中。

我们认为，今后的任务是要继续拓展和加深研究，也可以同时做些总结工作。至少有两本书应该写出：一是《全宋词用韵研究》，这鲁国尧拟在近几年完成；另一是超巨型工程《全宋诗文用韵研究》，因为《全宋诗》有 72 册，《全宋文》计划 180 册，已出 50 册，其浩繁非《全唐诗》、《全唐文》所能望其项背，面对如此巨量的材料，需要先分时代、分地区完成若干本专著，如杜爱英将完成《宋代江西诗文用韵研究》，像这样的论著多多益善，我们热忱欢迎。到了适当时候，由学识精深且精力旺盛的学者总其成。当然金代诗文用韵的研究也不能忽视，本书中也收有相关论文。

总而言之，从清儒系统考察古音直至二十世纪，几百年来学人前赴后继，艰苦探索，逐渐揭示了可以代表上古、中古和近代等不同时期的汉语音系，构建起了鸟瞰上千年的宏大框架，使得汉语语音史初具规模。把这些由代表音系所显示的“时点”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条反映实际语音持续演变的历史长链，需要填补一环一环的空白，这已经有很多学人做了，其中自然包括本书中的所有作者。当然，持久的努力更需要！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汉语史学界通常把公元十至十三世纪的历史以“宋代”概言之，但是我们将本书定名为《宋辽金用韵研究》，则是为了跟历史学界接轨。

学术是链。

2001年8月毕工

本文系鲁国尧与刘晓南合写。原载于刘晓南主编《宋辽金用韵研究》,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载于《古汉语研究》2002年1期。

[附录] 《宋辽金用韵研究》目录

主编 刘晓南 张令吾 **副主编** 杜爱英 刘青松 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

鲁国尧、刘晓南:学术是链——序《宋辽金用韵研究》
魏建功:辽陵石刻哀册文中之入声韵
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节选)
鲁国尧: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
刘晓南:宋代文士用韵与宋代通语及方言
朱晓农:北宋中原韵辙考(节选)
丁治民:北京地区辽宋金用韵考
王恩保:吴淑《事类赋》用韵研究
王韫佳:王禹偁、杨亿用韵考
张令吾:北宋诗人徐积用韵研究
鲁国尧:元遗山诗词曲用韵考
鲁国尧: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
李爱平:金元山东词人用韵考
白钟仁:宋代晁补之诗用韵研究
白钟仁:北宋李之仪诗词用韵研究
唐作藩:苏轼诗韵考
鲁国尧: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
鲁国尧:宋代福建词人用韵考
刘晓南:从宋代福建诗人用韵看十到十三世纪闽方言的若干特点
刘晓南:从宋代福建诗人用韵看历史上吴语对闽语的影响
刘晓南:南宋崇安二刘诗文用韵与闽北方言
鲁国尧:宋元江西词人用韵研究
程朝晖:欧阳修诗词用韵研究
罗德真:王安石诗词用韵研究
杜爱英:“清江三孔”用韵考
林　亦:黄庭坚诗文用韵考
杜爱英:北宋诗僧德洪用韵考
杜爱英:杨万里诗韵考
裴宰奭:临安词人用韵中所反映的宋代语音
胡运飚:南宋浙江词人用韵及其所反映的语音演变现象
冯志白:陆游古体诗的用韵系统
冯志白:陆游诗的入声韵系
张令吾:范成大诗词赋辞用韵研究
田范芬:宋代湖南方言初探
鲁国尧: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
姜聿华:宋代北方籍词人入声韵尾考
刘晓南:宋代福建文士用韵中的阴入通押现象
刘青松:宋元时期入声韵尾的消变
林长伟:陆游诗用韵中“浊上变去”的考察

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

提要 本文作者对两万首宋词的用韵作了穷尽式的研究，又下探至金元词韵，旁及部分宋金元诗韵和元曲韵。本文首先指出宋人填词并无词韵书可循，清人编的多种词韵书均有不同程度的错误，也批评了毛奇龄、纪昀等的宋人词韵漫无定纪、不足推求的观点。继而对宋词用韵的一般规律和纷繁复杂的通叶现象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指出宋词韵十八部类植根于宋代通语。进而研究元好问、白朴等金元词人的用韵，并与元好问的近体诗韵、白朴曲韵相比照，说明金元词韵不循两宋旧轨，建立了新的用韵模式。本文旨在对自北宋初至元末的近四百年的词韵作历时的研究，以揭示词韵随语音之变而变的客观规律。

从元好问、白朴词韵与其前的宋代词韵、金代前期词韵比较可以推测，13世纪乃是北方汉语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元白师弟的词韵及时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性的语音变化，因而早于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约百年之久，其在北音史以至汉语语音史上的价值弥足珍贵。

一

清代著名学者焦循曾云："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宋专录其词"。"晚唐渐有词，兴于五代，而盛于宋，为唐以前所无。故论宋宜取其词，前则秦柳苏晁，后则周吴姜蒋，足与魏之曹刘，唐之李杜

本文初稿在中国语言学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1987年底，广州）的小组会与全体会上宣读，1988年4月修订，承《中国语言学报》第四期主编俞敏先生审阅，教正多处，令我十分感激。在修改过程中得到吕叔湘、周祖谟、杨耐思等先生的鼓励，文中引用了很多友人的手稿，统致谢忱。

相辉映焉。其诗人之有西昆、西江诸派,不过唐人之绪余,不足评其乖合矣”。(《易余籥录》卷一五)焦循对宋诗的评价是否偏低,自当别论,但是说宋词因为具有重大特色而且成就辉煌,所以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确为不刊之论。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时代,词家辈出,群星灿烂,其作品万象毕陈、五彩缤纷。现存宋词过两万首,唐圭璋先生编的《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第一版,1980年第二次印刷)五巨册录入词人一千三百三十余家,词作一万九千九百余首,残篇五百三十余首。孔凡礼先生的《全宋词补辑》(中华书局,1981年)辑得一百四十余人的四百三十余首词。宋词数量之巨,可谓洋洋大观。

众所周知,宋词与音乐有密切的关系,它是韵文,必须押韵。宋人填词是不是像作诗赋那样要根据某种韵书押韵呢?《宋史·选举志》:“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御试之日,诗赋文论共为一场,……或音韵中一字有差,虽生平苦辛,即时摈逐;如音韵不失,虽末学浅近,俯拾科级。”诗赋押韵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官韵,南宋宁宗时人胡柯的《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记载欧阳修初次应举时,“坐赋逸官韵,黜”。“官韵”为何?《宋史·选举志》:“凡就试,唯词赋者许持《切韵》、《玉篇》。”《宋会要辑稿》“选举四”载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诏书,原注:“自来举人许带《礼部韵略》入试院。”虽至元代,仍旧遵用。《元史·选举志》:“乡试、会试,许将《礼部韵略》外,余并不许怀挟文字。”延及明清,对官韵依然不敢越雷池一步。

宋代文士填词有无众所遵循的词韵书?他们怎么用韵?

第一种看法以明万历时的著名戏曲理论家王骥德《曲律》为代表,该书《论韵》云:“韵书之夥也”,“作近体则用今韵,始沈约《韵谱》,今裁于唐而为《礼部韵略》”,“宋词尚沿用诗韵,入金未能尽变”。这种观点对后世(如纪昀)有一定影响,但显然是错误的。

第二种看法以清人毛奇龄、纪昀、焦循为代表。毛氏《西河词话》:“词本无韵,故宋人不制韵,任意取押”,“词则无不通者”。“至如入韵,则信口揣合方音俚响,皆许入押”,“是一入声而一十七韵展转杂通,无有定纪”,“词韵之了无依据,而不足推求”。《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集部词曲类《仲恒〈词韵〉提要》云："考填词莫盛于宋，而二百余载作者云兴，但有制调之文，绝无撰韵之事。核其所作，或竟用诗韵，或各杂方言，亦绝无一定之律"，"当日所讲，在于声律，抑扬抗坠，剖析微茫。至其词则雅俗通歌，惟求谐耳。所谓有井水吃处都唱柳词是也，又安能以《礼部韵略》颁行诸酒炉茶肆哉？"焦循《雕菰楼词话》云："毛大可（按，即毛奇龄）称词本无韵，是也"，"按唐人应试用官韵，其非应试，如韩昌黎赠张籍诗，以'城堂江庭童穷'一韵，则庚青江阳东通协，不拘拘如律诗也。至于词，更宽可知矣"。他举秦观《品令》，柳永《迎春乐》等为例，云："凡此皆用当时乡谈里语，又何韵之有？"毛奇龄、纪昀、焦循对清人编的词韵书都持否定态度。他们是极端派，认为宋词用韵无章可循。

而大多数词学家认为应该有词韵书。本世纪的词学家论及此事时无不认为宋人即编有词韵书，如现代著名词曲专家吴梅的《词学通论》："韵书最初莫如朱希真作应制词韵十六条，其后张辑释之，冯取洽增之，至元陶宗仪，曾讥其混淆，欲为更定，而其书久佚，无从扬榷矣。"[①] 夏承焘、吴熊和《读词常识》云："北宋末年朱希真尝拟应制词韵十六条，而外列入声韵四部。"[②] 唐圭璋、金启华《历代词学研究述略》认为"这当是最早的词韵著作"，[③] 此说辗转相传，在现代词学界几成定谳，其实此论实抄自清人戈载《词林正韵·发凡》。进一步追溯其源，最早见于清康熙时沈雄的《古今词话》（1688 年刊），其《词品》卷上《详韵》："陶宗仪《韵记》曰：'本朝应制颁韵，仅十之二三，而人争习之。户录一编以粘壁，故无定本。后见东都朱希真，复为儗韵，亦仅十有六条。其闭口侵寻、监咸、廉纤三韵，不便混入，未遑校雠也。鄱阳张辑，始为衍义以释之。洎冯取洽重为缮录增补，而韵学稍为明备通行矣。值流离日，载于掌大薄蹄，藏于树根盎中，湿朽虫蚀，字无全行，笔无明画，又以杂叶细书如半菽许。愿一有心斯道者详而补之。然见所书十六条与周德清所辑，小异大同，要以中原之音，而列

① 吴梅《词学通论》，第 15 页，商务印书馆，1932 年。

② 夏承焘、吴熊和《读词常识》，第 68 页，中华书局，1962 年。

③ 《词学》第一辑，第 7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年。

以入声四韵为准。南村老人记。'"陶宗仪为元明之际的知名学者，著述颇丰，其《南村辍耕录》影响明清迄今。沈雄引录的所谓《韵记》语，玩其内容及体制，似为《辍耕录》中的一条。据拙文《〈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篇首的考证，《辍耕录》集结成书之时，当为 1366 年秋朱元璋令徐达、俞通海率军攻克张士诚占领的松江之后，陶宗仪本人亲自定稿。① 现存元刊本有二：1936 年上海涵芬楼影印吴县潘氏滂熹斋藏元刊本，1923 年武进陶氏影元刻本，明本则更多，皆为完帙，并无残缺。笔者曾在南京、北京查阅了陶氏的现存著作及存目，均未见此条。《辍耕录》卷一七"哨遍"条录其友钱抱素的套数，末加按语："乐府中押'逐赎菊'字韵者，盖中州之音轻，与'尤字韵'相近故也。"却不使用周德清书的"尤侯韵"这一术语。元代是否有"应制颁韵"事，此"颁韵"与词韵是何关系，都大可怀疑，而且朱敦儒《樵歌》词的用韵亦与十六条不合（见第四节表）。跟沈雄的《古今词话》同年刊行的徐钪的《词苑丛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为"采摭繁富，援据详明，足为论词者总汇"。徐氏之编此书曾得其友朱彝尊、陈维崧参订，其卷二"音韵"毫未言及所谓朱敦儒草创词韵事。沈雄另一同时代人毛奇龄《韵学要指》云："宋人亦并无有造词曲韵者。"《西河词话》："词本无韵，故宋人不制韵。"毛奇龄"淹贯群书"②，"著述之富，甲于近代"③，朱彝尊亦博极典籍，是《词综》的编者，二人均是一代学人，对前代著名学者陶宗仪的著作安有不知之理？跟沈雄同时的沈谦编《词韵略》，仲恒著《词韵》（1679 年刊）也未提及此事。纪昀之渊博尽人皆知，曾为沈雄《古今词话》撰提要，评价甚低，④他坚决否认宋人有词韵书。⑤ 今人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云："康熙间吴江沈雄，

---

① 鲁国尧《〈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第 108 页，商务印书馆，1988 年。

② 《四库全书总目》之《〈古文尚书冤词〉提要》。

③ 同上书《〈西河文集〉提要》。

④ 同上书《〈古今词话〉提要》云："是编所述，上起于唐，下迄康熙中年，杂引旧文，参以近人之论，亦间附己说。……征引颇为寒俭，又多不着出典，所引近人之说，尤多标榜，不为定论。"

⑤ 同上书《〈词韵〉提要》："考填词莫盛于宋"，"绝无撰韵之事"。

亦著《古今词话》八卷，其书芜陋不足道。”唐圭璋先生亦曾屡加批评。[①] 可见沈雄所录陶宗仪语实令人生疑，而当今词学家未能考镜源流，因迷信戈载书，遂转相抄录，众口一词。

真正的词韵书则自明胡文焕《文会堂词韵》始。清初词学复兴，填词成为风尚，词韵书也就“应运而生”。何以宋人无词韵书，而清人却迫切需要？“金元以来，南北曲行而词律亡。作是体者，不过考证旧词，知其句法平仄，参证同调之词，知某句可长可短，某字可平可仄而已。当时宫调已茫然不解。”[②] 清人对宋词既如此“依样画葫芦”，岂能在押韵上独依清代语音，那成何体统！故也必须亦步亦趋。自清初迄道光末年，约有十五六种词韵书问世，除个别外都是归纳或基本是归纳宋词用韵而成。这类词韵书虽然遭到毛奇龄、纪昀等极端派的反对，[③] 但还是盛行不衰。

清代词韵书大致可分三个时期。清代初期沈谦著《词韵略》，吴绮著《词韵简》，赵钥亦著词韵书。“沈氏词韵出，而四方翕然宗之”[④]，然有错误，仲恒据沈书而参以吴绮、赵钥二书，编成《词韵》二卷，刊于康熙十八年（1679 年）。康熙年间刊行的还有曹亮武的《词韵》和李渔的《笠翁词韵》，李书分词韵为二十七部，显然受曲韵的影响，其余诸书皆分为十九部，其中舒声十四部，促声五部，仲书较通行。此为第一时期。乾隆三十年（1765 年）吴烺、江昉、吴镗、程名世等人的《学宋斋词韵》出，迄嘉庆末，“填词家”“奉为圭臬，信之不疑”[⑤]，该书舒声分十一部，促声分四部，共十五部。其后郑春波的《绿漪堂词韵》，还有叶申芗的《天籁轩词韵》（刊于道光十四年即 1834 年），也分十五部。这一时期尚有吴应和《榕园词韵》（1784 年

① 唐圭璋《词学论丛》第 69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② 《四库全书总目》之《〈填词名解〉提要》。

③ 毛奇龄《西河词话》反对其友沈谦之《词韵略》：“况词盛于宋，盛时不作，则毋论今不必作。万一作之，而与古未同，则揣度之胸，多所兀臬。从之者不安，而刺之者有间，亦何必然？”《四库全书总目》之《〈西河词话〉提要》云：“其论沈去矜《词韵》一条，尤为精核。”《〈词韵〉提要》批评沈谦“强作解事”，仲恒“沿讹踵谬，轇輵弥增”，并云“大抵作词之韵，愈考愈歧”，“必欲强立章程，不至于非马非驴不止”。

④ 仲恒《词韵·论略》。

⑤ 戈载《词林正韵·发凡》。

刊),舒声分十四部,入声分七部。许昂霄《词韵考略》(刊于嘉庆时),舒声分十七部(实为十九部),入声九部。《榕园词韵》虽得吴衡照《莲子居词话》(1818年)的颇高评价,但终不敌吴烺之书。此为第二时期。道光元年(1821年)戈载《词林正韵》刊行,力排李渔、吴烺、郑春波、许昂霄诸书,痛斥毛奇龄的否定词韵说:"毛氏论韵穿凿附会,本多自我作古,不料丧心病狂,败坏词学至于此极。"[①] 其实戈书是继承了仲恒《词韵》及《晚翠轩词韵》(附于嘉庆时的《白香词谱》后)的十九部,而于"发凡"中未明言。他自称"是书所分十九部,一以唐宋诸名家为据,无敢稍纵","是书入声所列五部,历观古人名词,无有出此范围者耳。"杜文澜《憩园词话》云:"戈顺卿""以词学提倡江南北者三十年,所著《词林正韵》三卷,取李唐以来韵书,以校两宋词人所用,博考互证,辨晰入微","永为词家取法"。况周颐《蕙风词话》:"《词林正韵》,则最为善本","倚声家圭臬奉之"。《詹安泰词学论稿》云:"戈书后出,为词韵之南董,近代名家,咸极重视,多所遵从。"[②] 当今的各种词学论著,以及涉及词学的文学史常识、古汉语知识之类的书,介绍词韵时,无不抄录戈氏十九部。甚至有的汉语语音史专著以《词林正韵》作为论列宋代语音的依据,[③] 可见影响之深远。戈书刊行后,某些词家不无微词,如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惟词韵初无一定,作者十数家,各持一义。宝士(本文笔者按,即戈载)之书,亦未必尽出诸家之上。"吴梅《词学通论》嫌戈书入声五部"未免过宽",厘为八部,则加舒声十四部,共为二十二部。[④] 这些批评或未搔着痒处,甚或以讹订讹。戈书错误不少,不足为典要,入声分五部即属不当,舒声部分亦有纰缪,详后。

清代诸种词韵书,其间颇有分歧,入主出奴,喧争不休。可以说,除了李渔的《笠翁词韵》(例如其"家假驾"、"嗟姐借"之分为二,"鱼雨御"、"夫甫父"之分为二,"甘感绀"、"兼检剑"之分为二之类,显然是受元明曲韵的影响),其他诸书都是归纳的。既然都同是采取归纳

① 戈载《词林正韵·发凡》。

② 《詹安泰词学论稿》,第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③ 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等56、57、112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④ 吴梅《词学通论》,第20—22页。

法，何以却有数种结论？答案是，诸家对宋词韵并没有作过穷尽式的研究，这是症结所在。他们择取名家词，甚或是名家的名篇，必然是见仁见智，各执一辞。宋词用韵之复杂，令人目眩，而词韵书的编者对若干出现频率较高的通叶现象未能作出正确的分析，遂导致反复争辩，主要是十五部词韵与十九部之争。还有一重要原因，编著者是词学家或是词人，受诗韵和曲韵的影响很深，音韵学造诣却很浅，对方言也只有些朦胧而肤浅的认识而已，他们不能从语音历史的观点来研究宋词韵，故其书均有较多谬误。简言之，未能从音韵学的角度对全部宋词用韵作穷尽的归纳与合理的分析，清人之失在于此。

至此，我们的结论是，宋代无人编词韵书，宋词用韵并无功令可遵循。清人十几种词韵书虽然都声称是依据(或主要依据)宋词编成，但皆不能反映宋词用韵的真实面貌。

真正拟从音韵学的角度来研究词韵的是罗常培先生。他打算著《唐五代宋金元词韵谱》，[①] 笔者亲闻邵荣芬、蒋希文两位先生云，罗先生生前只请人抄了资料，而未能着手进行研究即逝世，至为可惜，这些原始资料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因此长期以来宋词韵的研究在汉语语音史上是空白。

笔者不揣谫陋，从事于此前后二十余年(文革初、中期中断)，对宋词韵作了穷尽式的研究，又下探至金元词韵，旁及部分宋金元诗韵和元曲韵。谨先将对宋词韵的了解撮述其要点于下。

二

现存宋词数量甚巨，其用韵确是纷繁复杂，但笔者分地区研究宋词用韵[②] 以后认为，虽然有的词人(特别是闽、赣、吴地区词人)或以方音入韵，或有若干特殊用韵现象，但据其大体，可分为十八部：阴声七部，阳声七部，入声四部。

---

① 罗常培《我是如何走上研究语言学之路的》，见《罗常培纪念论文集》，第433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② 已刊者有《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第104—118页；《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语言学论丛》第八辑，第85—11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待发表者尚有数篇。

词的押韵要求是：平声字相押，上去声字相押，入声字相押。我们把平声字与上去声字统为一个韵部，这样做，既为了简化，也照顾了清代多数词韵书的传统，而且也有少数词调如《西江月》、《哨遍》、《殿前欢》等要求同部的平声字与上去声字通押。

下面列出宋词韵十八部，每部下指出含《广韵》哪些韵，除去声祭泰夬废四韵外，一概举平以赅上去。每部一般举一例。

阴声韵

（一）歌戈部（《广韵》歌韵戈韵）：张先《南歌子·蝉抱高高柳》一67叶“波柯和多酡歌”。（按，《　》号内前为词牌名，圆点后为首句。外右下角汉字为《全宋词》册数，阿拉伯数字为页数，下同。）

（二）家车部（麻韵，佳韵之“佳涯崖”，蟹韵之“罢”，卦韵之“挂画”，夬韵之“话”，歌韵之“他”，戈韵之“靴”，梗韵之“打”等）：柳永《二郎神·炎光谢》一29叶“谢洒挂驾泻雅价亚下夜”，蒋捷《女冠子》五3434叶“也画射挂夜要打借灺帕砑话下”。

（三）皆来部（咍皆佳夬韵，又灰泰韵的多数字）：欧阳修《南乡子·好个人人》一154叶“腮猜鞋来钗揍怀”，秦观《南歌子·愁鬓香云坠》一468叶“裁开猜灰回来”（“灰回”是灰韵字）。

（四）支微部（支脂之微齐祭废韵，又灰韵及泰韵合口字的少部分）：晏几道《临江仙·身外闲愁空满》一222叶“稀诗时知归枝”，李纲《渔家傲·木落霜清秋色霁》二903叶“霁碎水会至外泪意蕊醉”（“碎”是队韵字，“外”是泰韵合口字）。按，戈载《词林正韵·发凡》云：“即以词论，灰咍本为二韵，灰可以入支微，咍可以入皆来。”在该书韵谱里，他把灰韵字及泰韵合口字均与支脂之微齐同部，唯“外”字两收，一注“五会切”，一注“五泰切”。事实上，《广韵》灰韵字及泰韵合口字在宋词韵中，入皆来部较多，入支微部较少，有若干字兼入二部。这表示正处在音变的过程中，至元代方完成，详后。

（五）鱼模部（模鱼虞韵，又侯尤韵的部分唇音字如“亩母浮否妇负阜”等）：苏轼《谒金门·今夜雨》一311叶“雨暑浦去醑否许语”，辛弃疾《鹊桥仙·松冈避暑》三1899叶“暑雨度处妇女语露”。

（六）尤侯部（侯尤幽韵）：晁补之《蓦山溪·兰台仙史》一566叶“否后旧叟袖口”，辛弃疾《感皇恩·七十古来稀》三1917叶“有久妇母袖后

寿酒”。按，戈载《词林正韵·发凡》：“《中原音韵》诸书则以……尤韵之‘罘蜉’入鱼虞，此在中州音则然，止可施之于曲。词则无有用者，唯有借音之数字，宋人多习用之。”他举数例：“负”叶方布切，“否”叶方古切，“浮”叶房逋切，“亩”叶忙补切。该书韵谱于第四部（即本文的鱼模部）平声末“增补”“浮”字，上声末“增补”“缶否母某亩”字，去声末“增补”“妇负阜副富”字。戈载以这些《广韵》侯、尤韵的唇音字入第十二部（即本文的尤侯部）为本音。如此措置，表明他不明白这也是一种语音演变现象，词学家言词韵易于致误，于此可见一斑。

（七）萧豪部（豪肴宵萧韵）：周邦彦《忆旧游·记愁横浅黛》二599叶“宵潇摇销迢镳招桥桃”。

阳声韵

（八）监廉部（覃谈咸衔盐严添凡韵）：李之仪《天门谣·天堑休论险》一349叶“险占敛览滟滥槛点”。

（九）寒先部（寒桓删山元仙先韵）：朱敦儒《桃源忆故人·飘萧我是孤飞雁》二852叶“雁怨浅看院转遍见”。

（十）侵寻部（侵韵）：姜夔《一萼红·古城阴》三2176叶“阴簪沈禽临心寻金深”。

（十一）真文部（痕魂臻真谆欣文韵）：史达祖《阮郎归·旧时明月旧时身》四2328叶“身新人春尘魂温痕”。

（十二）庚青部（登蒸庚耕清青韵）：黄升《南乡子·万籁寂无声》四2998叶“声更清明凝成情瓶”。

（十三）江阳部（唐江阳韵）：吴潜《水调歌头·宛水才停棹》四2728叶“江阳湘乡苍量茫王”。

（十四）东钟部（东冬钟韵）：吴文英《燕归梁·白玉搔头坠髻松》四2936叶“松重东空逢风中”。

入声韵

（十五）铎觉部（铎觉药韵）：贺铸《玉京秋·陇首霜晴》一519叶“落漠昨作泊觉乐薄约”。

（十六）屋烛部（屋沃烛韵）：张元干《念奴娇·江天雨霁》二1074叶“绿曲促玉酥木足鹭”。

（十七）德质部（缉没栉质术迄物德职陌麦昔锡韵）：姜夔《暗

香·旧时月色》三2181叶“色笛摘笔席国寂积泣忆碧得”。

(十八) 月帖部(合盍洽狎叶业乏帖曷末黠辖薛月屑韵): 张辑《醉蓬莱·记澄湖抱练》四2558叶“节列雪怯叠歇鸩月”。

戈载分入声为五部。本文的第十七德质、十八月帖两部,戈氏分为三部: 第十七部质术栉陌麦昔锡职德缉,第十八部物迄月没曷末黠辖屑薛叶帖,第十九部合盍业洽狎乏(戈氏用《集韵》韵目名称,现改用《广韵》名称)。吴应和《榕园词韵》析本文的德质、月帖两部的入声字为五部,吴梅主张区分为六部,皆悖宋词用韵实际,即汉语中古音深、臻、曾、梗四摄(高元音为其主元音)的入声字混为一部,咸、山二摄(低元音为其主元音)的入声字混为一部,而词学家不明此理。

以上十八部是以两万首宋词为研究对象,据其大体归纳而得。我们也应承认宋词用韵确实歧异纷杂,颇令人目眩,然而如果只注视那些超乎常规的用例,是会走上词韵否定派的道路的,毛奇龄开其端,纪昀、焦循畅其说。杜文澜的话颇为简括,其《憩园词话》云:“宋词用韵有三病,一则通转太宽,二则杂用方音,三则率意借协。”戈载也屡言宋人误处,《词林正韵·发凡》评论吴烺、程名世等的《学宋斋词韵》时说:“其书以学宋为名,宜其是矣。乃所学者皆宋人误处,真谆臻文欣魂痕庚耕清青蒸登侵皆同用,元寒桓删山先仙覃谈盐沾严咸衔凡又皆并部,入声则物迄入质陌韵,合盍业洽狎乏入月屑韵。”(按,吴烺书的入声分部基本正确,但将没韵并入月帖部则不当。)

笔者对宋词韵中歧异纠杂的用韵现象作了详尽的研究。有些可依古代典籍对宋代方音的记载及现代方言直指为当时词人确是根据方音押韵,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鲁直(即黄庭坚)在戎州,作乐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爱听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予在蜀见其稿。今俗本改‘笛’为‘曲’以协韵,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韵,及居蜀久,习其语音,乃知泸戎间谓‘笛’为‘独’。故鲁直得借用,亦因以戏之耳。”①又如笔者十余年前研究辛弃疾词韵时,发现辛弃疾有一首俚俗词《南乡子》三1908,全词为“好个主人家。不问

---

① 据中华书局1979年版,校勘记曰:“‘谓笛为独’,‘独’何校、津逮本作‘曲’。”

因由便去嗏。病得那人妆晃了，巴巴。系上裙儿稳也哪。别泪没些些。海誓山盟总是赊。今日新欢须记取，孩儿。更过十年也似他。”按照韵律，此阕叶“家嗏巴哪些赊儿他”，“儿”是支微部字，何以与家车部叶？百思不得其解，但必须记录在案。[①] 过了十年，研究黄庭坚词时，发现一首《丑奴儿·济楚好得些》$_{\text{一409}}$“济楚好得些。憔悴损，都是因它。那回得句闲言语，傍人尽道，你管又还鬼那人吵。得过口儿嘛。直勾得，风了自家。是即好意也毒害，你还甜杀人了，怎生申报孩儿。”也是俚俗词，也是家车韵，无独有偶，辛弃疾的“孩儿”就是黄庭坚的“孩儿”。原来辛弃疾政治失意，在江西闲居多年，用江西话写俚俗词。今南昌话“小孩子”叫“细伢子”，“伢”音 ŋa，[②] 所以北宋江西乡贤黄庭坚，南宋寓公辛弃疾皆以江西方音入韵。有些通叶现象在某些地区比较普遍，就令人怀疑是方言的问题，但在另一些地区则是个别现象，可能是个人特点，也可能因游宦偶或以他地音入韵。有些现象较长时期存在，就有可能是语音发生变化所致，但也未尝不可能是用韵风尚，沿袭前辈名公的传统使然。我们发现百首左右的《念奴娇》，有些注明“用坡仙韵”，有的不注，这样的用韵只能记在苏轼一人的账上。还有个别现象，甚为特殊，何以如此，只得存疑，留待今后深入研究。下面论述时指出某些词人的时代或里贯。

兹述各部间的重要通叶现象于下，限于篇幅，多为举例性质。

阴声韵

（一）歌戈部与家车部通叶。这现象在辛弃疾词中比较突出：叶歌戈部十八次，叶家车部八次，两部合叶达十一次，如《玉蝴蝶·古道行人来去》$_{\text{三1921}}$叶“花遮麻多鸦家沙些何呵佳”（下有黑点的为歌戈部字），《鹧鸪天·水荇参差动绿波》$_{\text{三1943}}$叶“波蛙花多戈斜”。近人夏敬观《跋毛抄本稼轩词》云：“稼轩词往往以乡音叶韵，全集中不胜枚举。《江神子》‘博山道中书王氏壁’词，前结‘不争多’句，以‘多’字入佳麻韵叶，此其例甚夥。”但在宋代其他山东词人中，歌戈与家车通叶有李清照一首《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_{\text{二926}}$叶“纱吵涯□茶车花

① 《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79 年第 2 期，第 109 页。

② 俞敏先生在拙稿上批曰：“两湖某些地方亦如此”。“从《管子》‘吾子’变来”。

那”，该词末句为“如今也，不成怀抱，得似旧时那”，此“那”乃语气词。“那”字，见于《广韵》平声歌韵诺何切，去声个韵奴个切，后者释曰“语助”；《集韵》收于戈、哿、个三韵；在《中原音韵》里除入歌戈平声阳、上、去声外，又入家麻去声。也许在李清照时，“那”可读家车，[①]上举辛弃疾俚俗词《南乡子》的“哪”或许与之为同一物。夏敬观指歌麻相叶为辛弃疾乡音，尚欠确证。辛弃疾曾在江西铅山闲居多年，是否受江西话的影响？查宋代江西籍词人一百八十家约四千三百首词皆无此现象。

倒是四川籍词人有两例：苏轼《西江月·马趁香微路远》$_{一333}$叶“斜华挂波沙马”，魏了翁《眼儿媚·乃翁表里玉无瑕》$_{四2390}$叶“瑕多他家窠”。又吴方言区词人张先《菩萨蛮·藕丝衫剪猩红窄》（前片三四句）$_{一77}$叶“波家”，史浩《满庭芳·微霰疏飘》$_{一1263}$叶“纱花蓑涯沙家华车”。

唐韩愈、白居易、元稹，北宋河南人邵雍的诗皆有歌麻相叶的现象，[②] 那么苏、辛诸人歌与麻押可能是根据的汴洛音。但是北宋、南宋之交的洛阳人朱敦儒、陈与义、曾几的诗、词用韵却未出现歌麻通协例，[③] 苏、辛诸人或许是仿古。

（二）歌戈部与萧豪部相叶。福建词人用韵中出现此种现象达十一次，如黄裳《蝶恋花·水鉴中看尤未老》$_{一377}$叶“老过个到坐倒早道”，郑域《念奴娇·蕊宫仙子》$_{四2300}$叶“果□颗堕枣过破岛”。传为词坛佳话的是林外《洞仙歌·飞梁压水》$_{三1767}$叶“晓草老帽我过锁扫”，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高宗绍兴十八年编）前集卷五八录载此词，按语云：“近时吴江长桥垂虹亭屋山壁上草书一词，人亦以为吕仙作，其果然邪？”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三：“林外”，“泉南人，词翰潇爽，诙谲不羁”，“尝为垂虹亭词”，“人传为吕翁作”，后传入禁中，“惟高庙识

---

① 俞敏先生在拙稿上批曰：“语气词的读音常较保守，也许在李易安时，歌戈已向o流变，‘那’仍读a，可叶家麻。”

② 荀春荣《韩愈的诗歌用韵》，《语言学论丛》第九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鲍明炜《白居易、元稹诗的韵系》，南京大学《语文集刊》第一辑，1982年。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

③ 吴臻《陈与义诗词用韵研究》（稿本），1986年。程朝晖《宋代洛阳诗人曾几诗韵考》（稿本），1986年。

之,曰:‘是必闽人也,不然何得以锁字协扫字韵?’已而知其果外也”。宋杨湜《古今词话》则指为孝宗。宋人笔记如刘攽《贡父诗话》云:“五方语异,闽以高为歌。”陆游《老学庵笔记》:“四方之音有讹者,则一韵尽讹,如闽人讹高字,则谓高为歌,谓劳为罗。”歌豪相混,现代闽语仍然。

但南宋四川蒲江人魏了翁亦有一首:《卜算子·风雨满空霏》四2398叶“妙涴料笑”,“涴”《广韵》过韵字。《宋史》本传云:“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抚使。”此首是否与这一经历有关系,存疑。

(三)歌戈部、萧豪部与鱼模部通叶或歌戈部与鱼模部通叶。葛长庚《贺新郎·倚剑西湖道》四2580叶“道草抱老破坐那个过暮么帽”(下有△号者为鱼模部字),陈合《宝鼎现·神鳌谁断》四2989叶“造左枣报补藻到锁做老过考早”;仅为歌戈叶鱼模例:曾慥《临江仙·子后寅前东向坐》二919叶“鼍摩多弩和萝”,黄裳《霜叶飞·谁能留得年华住》一375叶“住处数过暮去舞聚主语故宇”(《全宋词》以“过”字非韵,然《词谱》卷三五定为入韵,所列其他诸体在相当于“过”的位置上的字均入韵,故从之)。以上皆福建人。张继先(张天师,居江西)《喜迁莺·深源密坞》二758叶“所路素苦护悟顾古火果负破”。此种现象当亦与方音有关。

(四)尤侯部与萧豪部通叶。这在福建、江西词人是较普遍的现象,如柳永《红窗回·小园东》一55叶“柳了走有逗后”(下有黑点者为萧豪部字),张元干《鹊桥仙·靓妆艳态》二1100叶“笑调瘦峭草”。江西人黄庭坚、张继先、杨无咎各有三首词两部通叶,赵长卿则有六首词两部相叶。如黄庭坚《洞仙歌·月中丹桂》一387叶“老草昼守棹斗”,文天祥《齐天乐·南楼月转》五3304叶“早袅透晓绕老笑草斗柳小”。江西文士不仅词,诗中也有这种现象,[1] 如黄庭坚《赣上食莲有感》诗叶“手枣”,文天祥《回京口》诗叶“留舟鞲艘”,按,“艘”在《广韵》、《集韵》兼入豪韵和萧韵,在《中原音韵》及明代的《韵略易通》、《韵略汇通》均入

① 见程朝晖《欧阳修诗词用韵研究》,《中国语文》1986年第4期,第305页。罗德真《王安石诗词用韵研究》(《南京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指出王诗《和吴冲卿鸦鸣树石屏》以“手”与“巧”叶,《幽谷引》将“漱”与“笑”共押。

萧豪韵。《西儒耳目资》音 saō、siaō、sēu,《现代汉语词典》(北京,1978)音 sōu,高树藩《正中形音义综合大字典》(增订一版,台北正中书局,1974)音 saō。在现代南昌、临川、高安、福州、厦门方言中,萧豪与尤侯有些字有相同韵母。[①]

但四川人吴泳有两首尤萧合用:《谒金门·将进酒》四2508叶“酒调峭透皱斗道又”,《鱼游春水·东里韶光早》四2509叶“早了皱少草扫抱啸老渺”。汴人曾觌《钗头凤·华灯闹》(前片首三句)二1316叶“闹照透”。吴兴人周密《水龙吟·燕翎谁寄愁笺》五3285叶“草峭酒后骤袖透勾否”。

(五) 支微部与鱼模部通叶。苏轼有两首,吴泳有一首,辛弃疾有一首。如苏轼《渔家傲·一曲阳关情几许》一287叶“许去住处雾雨絮路似度”(下有黑点者为支微部字),辛弃疾《祝英台近·绿杨堤》三1940叶“渡去睡雨苦误处语句”。

支鱼通押在赣、闽、吴地区词人中比较普遍。姜夔有三首,刘辰翁有两首,如姜夔《长亭怨慢·渐吹尽》三2181叶“絮户许树此暮数付主缕”(按,“此”是前片最末一字,必为韵字无疑。)闽人支鱼通叶达十余次,其中柳永即有三次,如《斗百花·煦色韶光明媚》一14叶“媚树絮绪户度处雨”。吴方言区词人张先(湖州人)有两首,[②] 史浩(鄞县人)有七首,蒋捷(阳羡今宜兴人)有五首。如史浩《千秋岁·吾乡我里》二1283叶“里比起戏字吕似侣醉纪”,蒋捷《贺新郎·甚矣君狂矣》五3446叶“矣去鬼子里铸水处气此取语”。但吴方言区的其他词人如周邦彦、范成大、陆游、仇远、王沂孙、张炎却不混。婺源(今婺源话属徽语区)人王炎支鱼相叶达十一次之多,如其《柳梢青·葭管风微》三1858叶“微雏池裾墀都”。如果把这些现象与现代方言联系起来的话,可知为词人用方音入韵的结果。

---

① 见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年;罗常培《临川音系》,科学出版社,1958 年;《厦门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 年;颜森《高安(老屋周家)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1981 年第 2 期。

② 清宋翔凤《乐府余论》:“张子野《庆春泽》‘飞阁危桥相倚,人独立,东风满衣轻絮’,以‘絮’字叶‘倚’,用方音也。后姜尧章《齐天乐》,以‘此’字叶‘絮’字,亦此例。”前人往往举例而已。

阳声韵

（一）监廉部与寒先部通叶。吴烺、程名世等的《学宋斋词韵》与其前的仲恒《词韵》、其后的戈载《词林正韵》的重大分歧之一正在于如何处理监廉部与寒先部的通叶问题。仲氏名之曰元阮韵、覃感韵，戈氏命名为第七部、第十四部，吴、程则合为一：第七部。

监廉与寒先的合韵现象在北宋和南宋，在各地区的词人中都确实存在。但因人而异，如苏轼押监廉部三次，押寒先部八十次，而混用者只一次，即《渔家傲·些小白须何用染》一320叶“染点箭厌贬敢忝冉渐减”（下有黑点者为监廉部字），而其他四川词人李流谦、程垓、魏了翁、李从周、吴泳、家铉翁概不相混。在江西词人中，北宋的晏殊、晏几道父子以及欧阳修、黄庭坚相混的很少，南宋的赵师侠、姜夔混用的就较多，姜夔无独押监廉部例，押寒先部仅一次，可是混押达四次之多，如《眉妩·看垂杨连苑》三2177叶“眼燕款感暖限散翰缆点远见”。与姜夔同时的郭应祥，临江军（今江西清江）人，押监廉三次，寒先二十三次，却无一次混用。北宋南宋之交的洛阳人朱敦儒使用监廉部一次，寒先部四十六次，混叶十五次，如《渔家傲·鉴水稽山尘不染》二851叶“染健漫扇劝散减转伴燕”。同时人汴人曾觌无单用监廉例，用寒先韵十四次，通叶只一次，即《减字木兰花·一声杜宇》三1315后片一二句叶“卷艳”。吴方言区词人周邦彦混用特多，达十次，其后的吴文英、周密、仇远、王沂孙也有不少通叶现象，但史浩、陆游却很少，蒋捷却无。鄞县人楼钥（1136—1213）的近体诗《送赵子固吏部师合肥》之二叶“惭凡山衔帆”。[①] 福建四十四家词人只有十家使用监廉部，共十四次；四十一家使用寒先部，押韵二百五十七次；七家混叶共九次。柳永、张元干各有两首混叶，但南宋末的陈德武词作甚多，却无一首互混。

监廉与寒先二部的混叶与否从空间与时间似乎都还不能找出其分布的规律。我们同意仲恒、戈载的分为两部的主张。何以在词里独押监廉部的很少？因为监廉部字少，而可作韵脚的字更少，须知词是文学作品，不是任何字都能进入词或充作韵字的，监廉部就成了险

① 夏文蓉《楼钥诗韵研究》（稿本），1987年。

韵。词人们往往与寒先部通叶，二者的区别在于一有 m 尾，一具 n 尾，主元音相同或相近。从汉语语音史看来，宋时 m 尾韵仍旧独立存在，《中原音韵》里闭口三韵依然保存。从《南村辍耕录》卷一九“射字法”条可知，元代吴方言松江方音仍有 m 尾韵。[①] 现代方言中保存 m 尾的仍很多，如临川、高安、厦门（文读尤然），这些都是不利于吴烺、程名世并部的有力理由。

（二）侵寻部、真文部、庚青部三部，或两部混叶，或三部合用。这是仲恒、戈载与吴烺、程名世分歧的又一要点所在。吴、程合之为第六部。此三部之分在于其韵尾分别为 m、n、ŋ，而主元音相同。词人很喜欢用真文、庚青二部韵，因为二者是宽韵，侵寻部虽然不像监廉部那样“险”，但使用频率还是逊于真文、庚青。宋代福建词人四十四家使用情况如下：侵寻三十五次，真文五十九次，庚青八十五次；侵真互叶二次，侵庚互叶三次，真叶庚四十五次，三部通叶七次。即独用一百七十九次，占 76%；合用五十七次，占 24%。其他各区情况类似，举此以见一斑。河南人朱敦儒三部间互叶甚多，而曾觌仅侵寻叶真文一次，真文叶庚青二次而已。吴方言区词人三部混叶情况最严重的是周密，仇远、王沂孙，张炎也很多；但是周邦彦、陆游、吴文英却很少，史浩与蒋捷却不混。周邦彦词监廉与寒先通叶特甚，而侵寻与真文，真文与庚青的通叶只各一首。《减字木兰花》八句，要求四换韵，两仄两平递转，周邦彦的“风鬟雾鬓”阕$_{二625}$前四句先押“鬓近”，后换“明成”，有意识地区分真文与庚青。鄱阳人姜夔监廉与寒先通叶多，此三部通叶亦多。看来三部间是否通叶，叶多叶少，因人而异。总之分为三部是对的。兹举通叶数例于下：朱敦儒《胜胜慢·红炉围锦》$_{二839}$叶“云纷尊巾人兴深平”（下有黑点者为侵寻部字，△号者为真文部字，余为庚青部字）。陈楠（广东博罗人）《望江南·形透日》$_{四2314}$叶“腾凝能清冰新”，李吕（福建光泽人）《临江仙·家在宋墙东畔住》$_{三1481}$叶“音沉春针心匀”。宋诗亦有三部混用例，如楼钥近体诗《送赵清臣宰姚江》之五叶“寻胜琴”，古体诗《寄题高汝一少卿识

① 鲁国尧《〈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第 116 页，商务印书馆，1988 年。

山堂》叶"城宾真人新心"。[1]

(三) 江阳部与庚青部通叶。吴文英(四明,今宁波人)有六首词如此,兹举三例:《法曲献仙音·风拍波惊》四2888叶"上浪冷向响荡唱帐"(下有黑点者为庚青部字),《还京乐·宴兰溆》四2888叶"响哽影冷竟整暝醒镜",《风入松·春风吴柳几番黄》四2906叶"黄窗香妆莺江量坊"。其宁波同乡多人特别是史浩,词作颇多,竟无一首江阳叶庚青例。其同乡楼钥的古体诗《朱季公寄诗有怀真率之集次韵》共有三十五个韵字,三十四字为江阳韵字,中夹一"卿"字。[2] 江阳与庚青相叶显然是吴音特点,今吴方言可证。

但是葛长庚《摸鱼儿·这身儿》四2573叶"障攘想俩广省壤两仰往强幌掌",也是江阳与庚青合叶。葛长庚,闽清人,家居琼州,后学道武夷山,但在宁宗嘉定(1208—1224)年间,曾被征召至京城临安,也许这是他在浙江时所作。

(四) 真文部与寒先部通叶。这在福建、江西地区也较普遍,不过要作具体分析。元魂痕三韵合用是六朝时期汉语的一种现象,陆法言《切韵》把三韵排在一起,在唐诗韵中这三韵也常同用,而在宋词韵中,元韵入寒先部,魂痕入真文部。但有若干例,它们仍相叶,如晏几道《两同心·楚乡春晚》一247叶"源尘门尊魂昏痕"(下有黑点的是《广韵》元韵字),刘克庄《沁园春·华发萧萧》四2596叶"门孙村魂阍樽言温蕃"。还有一种情况是,寒先部的字不只是《广韵》元韵字,真文部的字也不只是原魂痕韵字。如刘克庄《贺新郎·南国秋容晚》四2625叶"晚馆遍寸传见愿冕远算宴浅"("寸"是魂韵字)。前者可以视作诗韵(平水韵)叶法在词里的影响,后者是其扩大。在辛弃疾词中真文与寒先相叶共五例,一例是典型的元魂痕合用,其他四例也都含有这三韵字,如《六州歌头·西湖万顷》三1908叶"门云轩吞姗烟咽看军存勋坤韩边园"("门吞存坤"是魂痕韵字)。夏敬观《跋毛抄本稼轩词》认为"殆亦其乡音如此",此语颇可怀疑,除上述理由外,晁端礼、晁补之、李清照等山东人词里皆无此现象。

① 夏文睿《楼钥诗韵研究》(稿本),1987年。
② 同上。

(五) 寒先部、真文部与庚青部互叶。黄升(福建人)《鹧鸪天·天气清和仅两句》四2999叶“旬辰明贤龄人”(下有黑点者为寒先部,有△号者为庚青部)。吴泳(四川人)《贺新郎·一片湖光净》四2512叶“净镜韵鬓近进隽尽定印姓景”。关于吴泳,拙文《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曾指出他的合韵现象十分突出。查《宋史》本传,他是潼川人,长期在京城临安做官,也曾“知宁国府”,“知温州”,“知泉州”,从其词里,知其足迹所至有“宣城”、“温州”、“洪都”。这也许是他用韵复杂的原因。

(六) 寒先部与庚青部相叶。邓肃(福建沙县人)《菩萨蛮·廉纤细雨连天远》(前片一二句)二1107叶“远冷”(下有△号者为庚青部字),赵长卿(江西南丰人)《鹧鸪天·门外寒江泊小船》三1802叶“船前生灯眠边”,赵文(庐陵人)《莺啼序·初荷一番濯雨》五3326叶“卷远遍宴片婉扇见浅转恋脸箭染肯晚”(“脸染”是监廉部字,此处合韵)。

(七) 江阳部与监廉部,江阳部与寒先部合叶。刘学箕(福建崇安人)《渔家傲·汉水悠悠还漾漾》四2439叶“漾浪桨放上项盎唱缆傍”(下有黑点者是监廉部字)。惠洪(筠州,今江西高安人)《西江月·入骨风流国色》二713叶“香妆暗塘茫帐”。欧阳修《渔家傲·近日门前溪水涨》一151叶“涨访帐向帐萏上浪障往”。江阳与寒先叶例:吴泳《鹊桥仙·二童一马》四2507叶“伴望样半”(“伴半”是寒先部字)。

(八) 江阳部与真文部通叶。刘子寰(福建建阳人)《沁园春·长寿真人》四2707叶“裳春乡章翔方樯堂厖”(“春”是真文部字)。

(九) 江阳部与东钟部通叶。辛弃疾有三例,如《声声慢·停云霭霭》三1912叶“濛江窗从风容同翁”(下有黑点者为江阳韵字),《醉翁操·长松》三1939叶“松风公从中同江枫东重容封童翁龙忡逢钟”。《康熙词谱》卷二二“醉翁操”调注云:“辛词以东冬江三韵同用,犹遵古韵。”辛弃疾以“掉书袋”著称,在用韵上偶或沿用“古韵”,不无可能。其他山东人无此现象。又,刘学箕《水调歌头·三载役京口》四2437叶“江窗降撞矼双厖庞”,蒲寿宬(泉州人)《欸乃词·白头

翁》五3303叶"翁翁粮郎"(但"粮郎"在《广韵》是唐韵、阳韵字)。今厦门话东阳相混。

入声韵

(一) 铎觉部与屋烛部分用清楚,柳永、周邦彦、吴文英皆然。二部间相叶乃是少数现象,如赵长卿《瑞鹤仙·海棠花半落》三1784叶"落扑阁幕著恶昨索却约著削"("扑"是屋烛部字),兹不赘言。

(二) 铎觉部与德质部通叶。如姜夔《凄凉犯·绿杨巷陌》三2183叶"陌索角恶薄漠乐落著约"("陌"是德质部字)。

(三) 屋烛部与德质部通叶。如姜夔《疏影·苔枝缀玉》三2182叶"玉宿竹北独绿屋曲幅"(下有黑点者为德质部字)。周密《楚宫春·香迎晓白》五3267叶"白谷足国绿北曲屋宿玉",刘克庄《满江红·赤日黄埃》四2613叶"麓独竹北屋烛束玉读"。这种现象在吴、赣方言区词人作品中较多出现。毛奇龄《西河词话》:"若'北'之音'卜',则不特从来韵书无是读押,即从来字书,亦并无是转切。此吴越间乡音误呼,而竟以入韵。"

(四) 铎觉部与月帖部合叶。如欧阳光祖(福建崇安人)《瑞鹤仙·得毛韩经学》三2061叶"学业甲鹗塔洽惬鳘匝浃颊乏"("学鹗鳘"是铎觉部字)。

(五) 屋烛部与月帖部合叶。如黄人杰(江西南城人)《满江红·解语宫商》全宋词补辑62叶"曲馥宿玉淑绿说睦足"("说"是月帖部字)。

(六) 德质部与月帖部通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其数量远较前几项为多。如朱敦儒《念奴娇·见梅惊笑》二835叶"白客隔雪蝶月歇折"(下有黑点者为德质部字),赵鼎(山西闻喜人)《花心动·江月初升》二945叶"叶结雪册灭越阔色石",陆游《满江红·疏蕊幽香》三1581叶"绝叠说月发侧阙色折"。

(七) 三部或四部入声混叶。如苏轼《满江红·江汉西来》一280叶"碧色客说读惜瑟忽鹤"(下有黑点的是铎觉部字,有△号的是屋烛部字,。号的是月帖部字),姜夔《淡黄柳·空城晓角》三2181叶"角陌恻绿识寂食宅色碧"。

宋词入声韵颇为复杂,笔者在分地区研讨的诸文中都曾缕述,兹

不再赘。[①]

宋词押韵中有阴声韵与入声韵相叶的现象，万树《词律》、戈载《词林正韵》、王国维《人间词话》、夏承焘《词韵约例》[②] 等都讨论到这个问题，戈载较为详细。《词林正韵·发凡》云："曲韵不可为词韵也，惟入声作三声，词家亦多承用。"举晏几道、晁补之等九例。其词谱于阴声七部都有"入声作平声"、"入声作上声"、"入声作去声"三项，收列大量入声字，其归类同于《中原音韵》等曲韵书。如此处置，是《词林正韵》的大病之一，这是受曲韵书的影响太深，奇怪的是词学家们对此很少有微词，大概是由于他们未作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故人云亦云。笔者对现存宋词两万首作了穷尽式的搜辑，得阴入通叶约七十例，涉及的入声字仅一百一十六字，使用一百九十四次。而且戈氏所举九例中有四例可疑。词韵具阴入通叶现象的有北宋词人，也有南宋词人；有北人，也有南人，详见拙文《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③]。兹举两例如下：晁补之(北宋山东人)《西平乐·风诏传来绛阙》$_{一569}$叶"辅卜去绪驻睹举部诉住主"，(下有黑点的为入声字)，赵长卿(南宋江西新淦人)《醉蓬莱·正金风零露》$_{三2085}$叶"气瑞极外世比被醉"。

限于篇幅，还有些特殊押韵现象不再赘言，以上所列二十几项也是举例性质，容他日以专书缕述，以就正于语言学界和词学界。

总之，宋词用韵有其有规律的一面，又有因方音、仿古、取便等原因造成的若干纷繁复杂的通叶现象，这两方面我们都要充分认识到。经穷尽的研究后，"知其分而后知其合，知其合而后愈知其分"，宋词用韵有规律可求的一面是主要的，因此毛奇龄、纪昀、焦循的宋词用韵了无定纪，不足推求的观点不能成立。但是清代编词韵书的词学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及主观认识和所取方法的错误，诸书分部皆有不当。我们从汉语语音史的角度对宋词用韵进行了穷尽式

---

① 见笔者的分地区研究宋词韵诸文，笔者因德质部与月帖部合用颇多，曾主张合为一部，名为"德业部"，后接受师友建议，析为二部。

② 见夏承焘《唐宋词论丛》，中华书局，1962 年。

③ 鲁国尧《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音韵学研究》第二辑，第 140—147 页，中华书局，1986 年。

的研究，分为十八部，虽然有些词人的某些作品并不全合，但大多数词人的大多数作品符合我们所归纳、分析出的十八部。其所以如此，并非因为当时有一本大家遵循、人人翻检的词韵书，而是因为多数词人都是以当时的通语为准绳，例如闽音歌豪无别，林外据以押韵，但大多数福建人并不仿效；吴文英以庚青叶江阳，但其同乡史浩却依通语截然分用。北宋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汴洛的中州之音当即通语的基础，南宋虽偏安江左，并不以吴语为通语。词人按照通语押韵，相从成风，相沿成习，于是造成了宋词用韵十八部的模式。

两宋词韵的十八部模式，并不因南宋亡（1279 年）而止，那些由宋入元的南方词人如周密（吴兴人，生于宋理宗绍定五年即 1232 年，卒于元成宗大德二年即 1298 年），蒋捷（阳羡今宜兴人，宋度宗咸淳十年即 1274 年进士），王沂孙（会稽人，元至元间任庆元路学正），仇远（钱塘人，生于宋理宗淳祐七年即 1247 年，卒于元泰定三年即 1326 年），张炎（临安人，生于宋理宗淳祐八年即 1248 年，约卒于元仁宗延祐七年即 1320 年[①]），他们词的用韵仍然遵守十八部的传统。

在此我们也要指出，两宋长达三百余年，其词韵必有时代差异，如早期的欧阳修、王安石入声皆为七部：铎觉、屋烛、德昔、合叶、缉立、曷月、没迄，同于五代词人，而中后期则不然。但与金元词韵作比较，宋词韵的区分十八部的总体模式肯定是能成立的。

三

言词者必宗宋，然宋以后仍有词，词韵在宋以后如何发展这一颇有意义的课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②] 笔者研究宋词用韵后，认为有必要下探至金元词。其实金与南宋对峙，1234 年蒙古灭金，继而与南宋对峙。1279 年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1368 年元顺帝北遁。金元时期词的成就逊于两宋，但数量仍很可观，唐圭璋先生编《全金

① 张炎卒年据吴则虞校辑《山中白云词》的“序言”，中华书局，1983 年。

② 仅有李爱平《金元山东词人用韵考》，《语言研究》1985 年第 2 期。

元词》(中华书局,1979 年)两厚本,辑录金代词人 70 家,3 572首,元代词人 212 家,3 721 首,而有若干由宋入元的词人如仇远、张炎等人的作品如果计算入内,当更多。以上都是我们研究金元词韵的根据。

在金元两代,最杰出的词人当推元好问,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卒于蒙古宪宗七年(1257),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市)人,从幼年至老死,足迹遍北中国而居于中州时间颇久。“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独步几三十年”,[①] 在诗、文、词诸方面都有卓越成就,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 年)辑得元好问散曲九支,套数一套(残)。元人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评其词“清雄顿挫,闲婉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元人虞集以元好问与辛弃疾并称:“辛幼安自北而南,元裕之在金末国初,虽词多慷慨,而音节则为中州之正,学者取之。”(《中原音韵序》)所以我们把作为中州正音的元好问词作为金元词的代表,重点研究其词韵。现以彊村丛书本《遗山乐府》217 首为依据,此系朱孝臧据明弘治高丽刊三卷本校定,[②]唐圭璋《全金元词》第 71 至 108 页收录。

元好问词的用韵比起两宋词韵来有如下特点:

(一) 宋词韵的支微部,元好问词分为两部:支思部(所含相当于《中原音韵》的支思韵,但除去派入的入声字,此点下同)和机微部(所含为《中原音韵》的齐微韵除去《广韵》灰韵和泰韵合口字,因这些字在元好问词韵中均入皆来部)。元好问词押支思部韵 6 次,押机微部韵 12 次,此疆彼界,了不相涉,兹各举一例:《江城子·旗亭谁唱渭城诗》$_{金85}$叶“诗卮思枝姿儿丝辞脂时”(按,《 》号右下角“金”代指《全金元词》上册即金词部分,“元”代指下册即元词部分),《水龙吟·百年同是行人》$_{金78}$叶“地遂戏意坠味睡醉”。

---

① 元人郝经《陵川集·遗山先生墓铭》。

② 关于吴重熹石蓮庵刊《遗山新乐府》,《全金元词》“引用书目”云:“颇多混入他人之作,且多错误。”据笔者《元遗山诗词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86 年第 1 期),这部分词的用韵现象与元好问的诗韵及彊村丛书本的词韵颇相径庭,故不取为研究对象。

（二）宋词韵的萧豪部，元好问词分为豪高部（《广韵》豪韵）、萧遥部（《广韵》宵萧二韵）。前者押韵八次，如《水龙吟·按云千丈层崖》金78叶“好倒槁道抱草灶老”；后者押用五次，如《洞仙歌·青钱白璧》金82叶“绕少钓调照笑”；二者合用一次：《品令·西斋向晓》金99叶“晓悄照鸟老恼少了”。

（三）宋词韵的监廉部，元好问词分为两部：监咸部（所含相当于《中原音韵》的监咸韵），押用一次，《临江仙·试上古城城上望》金92叶“涵谈参三酣衫”；廉纤部（相当于《中原音韵》的廉纤韵），押用二次，如《临江仙·世故迫人无好况》金89叶“沾蟾严帘添髯”。

（四）宋词韵的寒先部在元好问词韵里应分为寒桓与先天二部。前者（相当于《中原音韵》的寒山与桓欢二部）共用韵二十次，另有两次是寒桓部中羼入监廉部字，各举一例：《水调歌头·相思一尊酒》金74叶“欢安寒宽冠还难看”，《鹊桥仙·梨花春暮》金93叶“挽眼残减”，“减”为监咸部字，这是寒桓与监咸合韵。元好问词的先天部（所含相当《中原音韵》的先天韵）使用二十二次，如《太常引·衣冠人物渺翩翩》金102叶“翩仙泉天言年传”。

（五）宋词韵中，侵寻、真文、庚青三部常相混叶，而在元好问词中此三部分用划然，毫不杂厕。侵寻部押用六次，如《八声甘州·许君祠》金83叶“深阴侵心锟金襟临”；真文部出现十次，如《南柯子·粉淡梨花瘦》金100叶“颦春人云尘真”；庚青部叶用十六次，如《三奠子·上高城置酒》金86叶“陵名灵争平生耕情”。

对于宋词用韵来说，元好问词的用韵不循传统，有破除藩篱的“改革”精神。不仅如此，他的近体诗用韵，也充分表现了这种革新精神。现存元好问近体诗1 050首。只有两首押仄声韵：《梁父吟扇头》叶“坐和”，《唐子达扇头》叶“玉屋”。余皆押平声韵，系联结果可得19部。现存元好问散曲甚少（其中的《人月圆》二首，《全金元词》因词里亦有此曲牌，故亦收录），使用了六韵。现将元好问的词韵、近体诗韵、曲韵列比较表于下。

元好问词韵、近体诗韵、曲韵比较表

<table>
<tr><td></td><td colspan="9">阴　声　韵</td><td colspan="10">阳　声　韵</td><td colspan="4">入声韵</td></tr>
<tr><td>词韵</td><td>歌戈部</td><td>家车部</td><td>皆来部（含灰韵） 偶叶</td><td>机微部</td><td>支思部</td><td>鱼模部（偶叶机微）</td><td>尤侯部</td><td>豪高部 偶叶</td><td>萧遥部</td><td>廉纤部</td><td>监咸部 偶叶</td><td>寒桓部</td><td colspan="2">先天部</td><td>侵寻部</td><td>真文部</td><td>庚青部</td><td>江阳部</td><td>东钟部</td><td>铎觉部</td><td>屋烛部</td><td>德质部 合计</td><td>月帖部</td></tr>
<tr><td>近体诗韵</td><td>歌戈部</td><td>家车部</td><td>皆来部（含灰韵）</td><td>机微部</td><td>支思部</td><td>鱼模部</td><td>尤侯部</td><td>豪高部</td><td>萧遥部</td><td>廉纤部</td><td>监咸部</td><td>寒桓部</td><td>元言部</td><td>先天部</td><td>侵寻部</td><td>真文部</td><td>庚青部</td><td>江阳部</td><td>东钟部</td><td></td><td>屋烛部</td><td></td><td></td></tr>
<tr><td>曲韵</td><td>歌戈部</td><td></td><td>皆来韵（不含灰）</td><td></td><td></td><td></td><td>尤侯韵</td><td></td><td></td><td></td><td></td><td></td><td>先天韵</td><td></td><td>真文韵</td><td></td><td></td><td>东钟韵</td><td></td><td colspan="4"></td></tr>
</table>

注："偶叶"指二部互叶很少，"合叶"指互叶较多。栏中空白者表示无此部（韵）。

元好问近体诗押支思部韵二十次，押机微部韵四十三次，互不相涉，应分为两部，与词韵同。①近体诗韵豪高与萧遥分用，也与词一致。监咸与廉纤二部之分亦然。但在近体诗中，《广韵》的元韵独用，当立元言部；而在词里，押先天部韵的二十二次中只有四次夹有"言远"等元韵字，此乃二者之异。如果把元好问近体诗用韵的部类与当时通行的官韵（传世的元刊本金王文郁《新刊韵略》可证）相比，我们会对元好问在叶韵问题上冲决罗网的精神既惊且敬。这既由于他对"音韵乖叶，尤切致恳"②，更重要的是他以当时的中州之音为依据，因而其词用韵也就必然与两宋词韵的十八部模式有相当大的差别。

但我们也应指出元好问的词韵与近体诗韵尚受习惯叶韵法的影响，即家车部未能像《中原音韵》那样，分为家麻与车遮二部。如果按家麻与车遮来衡量，词里前者使用四次，二者混用十三次；在近体诗里前者使用二十七次，二者混用十三次，故均不应分开。进一步的革新还有待于后来者。

① 拙作《元遗山诗词用韵考》论及元氏近体诗韵时，未能将支思与机微分开，兹特更正。

② 元人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遗山先生口诲》。

白朴，祖籍隩州（今山西曲沃），父白华，金代显宦，著名文士，是元好问的好友，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白朴生于汴京，1232年蒙古军侵金，1233年幼年的白朴为元好问携离汴京北渡，居聊城、济南、冠氏。蒙古太宗九年（1237）白朴由元好问送归其父，此后居真定（今河北正定），故为真定人。“遗山每过之，必问为学次第，尝赠之诗曰：‘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① 1280年白朴移居建康，1306年八十一岁游扬州，②卒年不详。白朴是元曲四大家之一，也是词人，自言“平生留意于长短句，散失之余，仅二百余篇”③，编为《天籁集》，现仅存104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朴词清隽婉逸，意惬韵谐，可与张炎玉田词相匹。”我们研究白朴词韵据唐圭璋《全金元词》下册所录现存《天籁集》中的词，参校以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附编《天籁集编年》。

白朴深得元好问的教诲，在词韵方面，他是元好问革新精神的继承者。白朴词韵的特点如下：

（一）宋词韵的家车部，白朴分为家麻部（所含相当于《中原音韵》的家麻韵）和车遮部（相当于车遮韵）。前者使用七次，如《沁园春·流水高山》$_{元635}$叶“牙葭涯家沙槎茶花佳”；后者使用一次：《沁园春·千载寻盟》$_{元635}$叶“车靴遮赊蛇嗟些奢耶斜”，如此长篇用韵，却无一例外。

（二）皆来部、灰颓部、机微部、支思部四者分立。皆来部（所含相当于《中原音韵》的皆来韵）共押三次，如《木兰花慢·渺高情公子》$_{元639}$叶“哉苔开埃阶台怀斋来”。在白朴词韵中，《广韵》的灰韵字不入皆来部，此与元好问有异；也不像《中原音韵》及白朴曲韵那样入齐微韵，而是独叶，故应立为一部，名之曰灰颓部，押用两次，如《风入松·使君高宴》$_{元635}$叶“梅雷魁枚杯回罍颓”。白朴的机微部（相当于《中原音韵》的齐微韵但除去灰韵字），使用五次，如《踏莎行·冻结南云》$_{元647}$叶“吹坠瑞地翠醉”。支思部出现两次，如《清平乐·箜篌朱

① 元王博文《白兰谷〈天籁集〉序》。

② 此依王文才《白朴年谱》说，《白朴戏曲集校注》，第3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③ 元王博文《白兰谷〈天籁集〉序》。

字》(上阕)$_{元646}$叶“姿时枝”。

（三）《广韵》宵萧二韵使用两次，而与豪肴合用达五次之多，因此应合为一部即萧豪部，如《烛影摇红·三尺枯桐》$_{元636}$叶“少了悄渺表晓老草好岛”。元好问词韵和近体诗韵皆分为二部，实为洪细之分，可能是他用韵偏严的表现，白朴并不仿从，但元代的姚燧、张翥、宋褧却与元好问同，详后。

（四）监咸部押用两次，不杂廉纤部字及寒桓部字，如《水调歌头·疏云暗雾树》$_{元627}$叶“潭龛昙探岚南谈骖”。现存白朴词未见使用廉纤部韵者。

（五）在白朴词韵里，《广韵》桓韵字押用两次，如《水龙吟·彩云萧史台空》$_{元629}$叶“伴馆莞换畔贯断半”，而寒山删韵使用两次，但有三次是上述二者的合叶，如《沁园春·自古贤能》$_{元634}$叶“闲残间山冠烦欢还看”，“冠欢”为桓韵字，“烦”为元韵合口唇音字(在《中原音韵》入寒山韵)。因此只应有一寒桓部，此与元好问同。白朴先天部韵使用十一次，无元韵独用例。

（六）白朴词韵侵寻部、真文部、庚青部分别使用一、七、四次，无通叶现象。

（七）入声韵中未见叶铎觉部者。叶屋烛部两次：《石州慢·千古神州》$_{元642}$叶“谷鹿哭屋独玉束绿菊”，《满江红·云鬓犀枕》$_{元632}$叶“物独曲续促绿卜玉复”，其中“物”本为德质部字，此首似为屋烛与德质合叶，但此词题为“庚戌春别燕城”，王文才《白朴年谱》系此词于1250年白朴二十五岁时，游燕京留别燕妓之作，[①] “物”与其他诸字叶韵，当是依据北音，《中原音韵》“物”收于鱼模韵“入声作去声”下，其他诸入声字也派入鱼模韵。

（八）入声月帖部与德质部分用，但是《满江红·云外孤亭》$_{元632}$叶“客别血歇结杰雪说”，“客”本为德质部字，其他为月帖部字，此首似为二部合用，但是在《中原音韵》里，“客”有二音，其一在车遮韵“入声作上声”项下，其他七字皆派在车遮韵。

若以《中原音韵》来衡量，上述两阕《满江红》各自独叶一韵，通合无

---

① 《白朴戏曲集校注》第326页。

室。白朴是元曲大家,周德清所尊崇的前辈名公,明王骥德《曲律·论韵》论及周德清,“其所谓韵,不过杂采元前贤词曲,掇拾成编”。今人陆志韦先生大畅其说,认为《中原音韵》是归纳诸大家北曲韵脚而成十九韵。[①]这种说法的严密性虽可商榷,[②] 但是白朴的曲韵确与以中原之音为准绳的《中原音韵》基本一致,而白朴词韵又与其曲韵颇相吻合,足证白朴词韵也是植根于当时的中原之音的,因而进一步发扬了其师元好问词韵的革新精神。

白朴现存《梧桐雨》、《墙头马上》、《东墙记》三杂剧全本及《流红叶》、《箭射双雕》两剧的残折,共得 235 支曲子,另有套数四套,含 23 支曲子,小令 37 首,计 295 支曲。现将归纳所得的白朴曲韵[③] 与白朴词韵比较于下,末附《中原音韵》十九韵,以资参照。

白朴词韵、曲韵比较表

	阴声韵										阳声韵										入声韵		
词韵	歌戈部	家麻部	车遮部	皆来部	灰颓部	机微部	支思部	鱼模部	尤侯部	萧豪部	监咸部		寒桓部		先天部	侵寻部	真文部	庚青部	江阳部	东钟部	屋烛部	德质部	月贴部
曲韵	歌戈韵	家麻韵	车遮韵	皆来韵	齐微韵		支思韵	鱼模韵	尤侯韵	萧豪韵		廉纤韵	寒山韵		先天韵	侵寻韵	真文韵	庚青韵	江阳韵	东钟韵	与阴声字互叶		
《中原音韵》	歌戈韵	家麻韵	车遮韵	皆来韵	齐微韵		支思韵	鱼模韵	尤侯韵	萧豪韵	监咸韵	廉纤韵	寒山韵	桓欢韵	先天韵	侵寻韵	真文韵	庚青韵	江阳韵	东钟韵	派入阴声		

注:白朴曲韵的若干互叶现象不列。栏内空白者表示无此部(韵)。

元代词人中,继白朴后有张可久,庆元(今鄞县)人,元顺帝至正初,年七十余,至正八年(1348)犹在世,则是当生于 1270 年前,长期在江南为吏,是著名的散曲作家,也写词,《全金元词》录其词六十六首。张可久的词韵堪为白朴之后的金元词韵的代表之一,其特

① 陆志韦《释中原音韵》,《燕京学报》第三十一期,1946 年。
② 见拙作《白朴曲韵与〈中原音韵〉》。
③ 同上。

点为:

(一)家麻部独用,如《鹧鸪天·一点芳春近破瓜》$_{元933}$叶“瓜瑕花鸦华家”。

(二)支思部、齐微部、皆来部分用划然。前者使用六次,如《绿头鸭·别来时》$_{元928}$叶“时思施姿脂祠枝差诗之丝儿”。齐微部使用七次,如《太常引·溶溶一叶不成衣》$_{元931}$叶“衣晖迟怡眉飞知”,“迟知”二字在《中原音韵》属齐微韵。与元好问、白朴不同的是,张可久词韵里,《广韵》灰韵字既不入皆来,也不独用,而是入齐微部,《青玉案·柳眠花困春如醉》$_{元935}$叶“醉悴被起翠睡讳臂碎泪”,其中“碎”为队韵字。所以在张可久词韵,应确立齐微部。张词皆来部不杂灰韵字:《太常引·霖铃秋雨打空阶》$_{元931}$叶“阶斋莱来苔怀开”。

(三)萧豪部使用三次,均洪细不分。如《凤栖梧·塔拥平山银瓮小》$_{元934}$叶“小道沼爪老草杪少”。

(四)廉纤部独用:《百字令·舣舟一笑》$_{元930}$叶“占滟崦厌掩酽点渐”。未见押监咸者。

(五)寒山部、桓欢部、先天部分开,各举一例:《木兰花慢·看红梅未了》$_{元930}$叶“兰鬟竿滩间攀干寒山斑玕闲”,《人月圆·西风吹得闲云去》$_{元926}$叶“盘团宽鸾”,《风入松·哀筝一抹十二弦》$_{元932}$叶“弦烟连莲天边钱年”。虽然桓欢部使用只一次,但押寒山的词中却绝不杂叶桓欢一字,故桓欢独立为部。

(六)侵寻、真文、庚青三部毫不杂厕,长篇如《六州歌头·灵鳝何物》$_{元928}$叶“阴深寻临襟森簪沉斟心音林”,纯为侵寻字。

(七)入声押屋烛部一次,月帖部三次。另有一首《霜角·淡烟微隔》$_{元927}$叶“隔翮索拍白客宅”,需加解释的是“索”字,该句为“千古澄江秀句,空感慨,有谁索”,按《广韵》“索”有三音:铎韵苏各切,“尽也,散也,又绳索”;陌韵山戟切,“求也”;麦韵山责切,“求也,取也,好也”(《集韵》麦韵色责切未收“索”)。张可久此词之“索”,义与陌、麦韵音相合,则非德质与铎觉通叶,实为纯叶德质。如依曲韵观察此词更属顺畅,“隔拍白宅”在《中原音韵》里皆派入皆来韵,“索客”有二音,其一亦皆在皆来,《中原音韵》未收“翮”,但收“鞨”,二字于《集韵》皆为麦韵下革切,因此“翮”也应为皆来韵字。于此亦可见曲家填词,

其词韵受曲韵的影响之深。

张可久之后有张翥(1287—1368),晋宁(今常州)人,清王士祯谓为元末大家,"以一身历元之盛衰","其词乃婉丽风流",[①] 有《蜕岩词》传世,共134首,他是南人,但长期在大都及河南为官,其词韵也颇有特点:皆来与齐微、支思分用,但皆来部杂有《广韵》灰韵字,如《水龙吟·水宫仙子归来》$_{元1007}$叶"背佩碎在外态采再"(按,"外"为泰韵合口字,《中原音韵》入皆来韵)。萧遥与豪高分用,家车不分,则同于元好问。其他监咸与廉纤,寒桓与先天,侵寻与真文、庚青的分部均同于元好问与白朴。

元好问、白朴、张可久、张翥时代依次相接,词韵小有差异,但正好反映了金元词韵的逐步发展,元好问家麻、车遮不分,而白朴、张可久分之。《广韵》灰韵字,元好问入皆来,白朴独用,二张入齐微。元好问、张翥严于用韵,洪细之别遂使萧豪分部,而白朴、张可久异趋。元好问还有若干两部偶叶现象:皆来与机微,机微与鱼模,监咸与寒桓,白朴、张可久则无此现象。至于监咸与廉纤之分,寒桓与先天之别,侵寻、真文、庚青三部概不相杂,则元、白、张可久皆然。只是张可久桓欢独用,此其异于他人者。张翥亦有些通叶现象。

元好问以大胆的革新精神,基本破除了宋词的十八部模式,根据实际语音用韵,白朴、张可久、张翥继承之,建立了金元词韵的用韵模式,其特点是,除了入声独叶(白朴、张可久在此问题上亦受曲韵影响)外,几与曲韵一致,这更加证明了他们的词韵是植根于金元时代的中原之音的。

金元时代的其他词人的用韵较之宋词用韵也有相当的变化,但也有因袭传统叶韵法的一面。限于篇幅,不再缕述,兹取九位词人的用韵列表于下,以见一斑。此表未列元好问、白朴、张可久、张翥,故须与第四节的两宋金元十一家词韵比较表对照阅看。

---

① 《四库全书总目》之《〈蜕岩词〉提要》。

金元九家词韵比较表(一)

蔡松年(1107—1159)真定(今正定)人	歌戈	家车		皆来(含灰韵)	支微(含灰韵)		鱼模	尤侯	萧豪	
李俊明(1176—1260?)泽州(今晋城)人	歌戈	家麻		皆来(灰)	支微		鱼模	尤侯	萧豪	
刘秉忠(1216—1274)邢州(今邢台)人	歌戈	家麻		皆来 ⋮偶叶⋮	机微 ⋮偶叶⋮	支思	鱼模	尤侯	萧豪	
卢挚(1235—1300)涿郡(今涿州)人	歌戈	家麻			机微	支思	鱼模	尤侯	萧豪	
姚燧(1239—1314)洛阳人	歌戈	家麻		皆来(灰) ⋮偶叶⋮	机微 ⋮偶叶⋮		鱼模 ⋮偶叶⋮	尤侯	豪高 ⋮偶叶⋮	萧遥
刘敏中(1243—1318)章丘人	歌戈	家麻 ⋮偶叶⋮		皆来(灰)	支微(灰)		鱼模	尤侯	萧豪	
蒋捷(1274年进士,入元不仕)阳羡(今宜兴)人	歌戈	家车			支微(灰) ⋮合叶⋮		鱼模	尤侯	萧豪	
虞集(1272—1348)崇仁人	歌戈	家车		皆来(灰)	支微		鱼模		萧豪	
宋褧(1292—1344)宛平(今丰台)人		家麻		皆来	支微		鱼模	尤侯	豪高	萧遥

注：① “灰”代指《广韵》灰韵字及泰韵合口字。
② “偶叶”表示两部间互叶次数少,“合叶”表示次数多。
③ 栏内空白表示无此部字独用。

金元九家词韵比较表(二)

蔡松年	监廉	偶叶	寒先			侵寻	真文	偶叶	庚青	江阳	东钟	附:《广韵》元魂痕同用一次
李俊明	监廉		寒桓	偶叶	先天		真文	偶叶				
刘秉忠			寒桓	偶叶	先天	侵寻	真文		庚青	江阳	东钟	
卢挚			寒先				真文		庚青		东钟	
姚燧			寒桓		先天	侵寻	真文		庚青	江阳	东钟	
刘敏中	监咸		寒先				真文		庚青	江阳	东钟	
蒋捷			寒先				真文		庚青	江阳	东钟	
虞集	监咸		寒桓		先天			偶叶	庚青	江阳	东钟	
宋褧			寒桓		先天		真文		庚青	江阳	东钟	附:《广韵》元魂痕同用一次

金元九家词韵比较表(三)

蔡松年	铎觉	屋烛		德质	合叶	月帖	
李俊明	铎觉（偶叶德质、月帖）			德质	偶叶	月帖	
刘秉忠	铎觉	屋烛		德质	偶叶	月帖	
卢　挚				德质		月帖	
姚　燧	铎觉	屋烛			偶叶	月帖	
刘敏中	铎觉	屋烛	偶叶	德质	偶叶	月帖	阴声韵、入声韵偶叶
蒋　捷	铎觉	屋烛		德质		月帖	
虞　集	铎觉			德质		月帖	
宋　褧		屋烛	偶叶			月帖	

从此表可见(请与元、白及二张对照)金元词人的用韵显得参差不齐,寒桓、先天,支思、机微,豪高、萧遥或分或合,但是侵寻、真文、庚青三部之分则几乎是诸家所同。我们将蒋捷列于此中,理由:一是由宋入元者应与由金入元者一视同仁,而不论其在元出仕与否,二是蒋捷的真文、庚青截然区别与其他人相同,也许与元之习尚有关(当然也可能是个人用韵特点)。值得注意的还有宋褧,他是宛平人,即今北京市丰台人,与周德清同时,他的《蝶恋花·门外红尘溪上竹》元1055叶"竹玉俗肉忽躅足续",其中七字为屋烛部字,"忽"按词韵,当为德质部字,然据《中原音韵》则亦派入鱼模韵。金元人亦有仿古之处。蔡松年、宋褧均有元魂痕相叶例。王恽(1228—1307)竟有《木兰花慢·怅居庸北口》元666、《鹧鸪引·簪缅潇然自谢林》元680以"林心深"等侵寻字叶"南"字,乃是仿《诗经》音的结果。①

尽管金元词人用韵有参差和复杂的现象,但其主流应以元好问、白朴、张可久、张翥为代表。

四

我们认为,将两宋词韵与金元词韵加以比较,最好列表显示。兹选择十一家:自柳永起,北宋三家,北宋、南宋之交一家,南宋三家,金元四家,迄于张翥,其卒年值元亡之时。他们知名度高,时代依次相接,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各具特色,生前身后均有较大影响,籍贯亦遍布全国,因此多具有代表性。

---

① 《广韵》、《集韵》"南"只入覃韵,宋高宗手书《草书礼部韵》、《五音集韵》(1212年)、王文郁《新刊韵略》(1229年)、张天锡《草书韵会》(1231年)、《蒙古字韵》亦然。唯毛晃父子的《增韵》(1162年)于侵韵内"增入""南"字,此系据沈重《毛诗音》。在《诗经》里,"南"入侵部,与"林心音琴"等叶韵。熊忠《古今韵会举要》(1297年)步《增韵》后,亦兼收入"金字母韵"。可见姚燧二词如此押韵是仿古的表现。

两宋金元十一家词韵比较表(一)

柳永 (978?—1053?) 崇安人	歌戈	家车		皆来（灰多）		支微（灰少）┆偶叶		鱼模	尤侯┆偶叶	萧豪	
苏轼 (1036—1101) 眉山人	歌戈┆偶叶	家车		皆来（灰多）		支微（灰少）┆偶叶		鱼模	尤侯	萧豪	
周邦彦 (1056—1121) 钱塘人	歌戈	家车		皆来（灰）		支微（灰）		鱼模	尤侯	萧豪	
朱敦儒 (1081—1159) 洛阳人	歌戈	家车		皆来（灰少）		支微（灰多）		鱼模	尤侯	萧豪	
辛弃疾 (1140—1207) 历城人	歌戈┆合叶	家车		皆来（灰多）		支微（灰少）┆偶叶		鱼模	尤侯	萧豪	
姜夔 (1155?—1220?) 鄱阳人		家车		皆来（灰多）		支微（灰少）┆偶叶		鱼模	尤侯	萧豪	
吴文英 (1200—1260?) 四明(今宁波)人		家车				支微（灰少）┆偶叶		鱼模	尤侯	萧豪	
元好问 (1190—1257) 秀容(今忻州)人	歌戈	家车		皆来（灰）┆偶叶		机微	支思	鱼模（偶叶机微）	尤侯	豪高┆偶叶	萧遥
白朴 (1226—1306?) 真定(今正定)人	歌戈	家麻	车遮	皆来	灰颓	机微	支思	鱼模	尤侯	萧豪	
张可久 (1270?—1348?) 庆元(今宁波)人		家麻		皆来	齐微（灰）		支思	鱼模	尤侯	萧豪	
张翥 (1287—1368) 晋宁(今常州)人	歌戈	家车		皆来（灰）	齐微（灰）┆偶叶		支思	鱼模	尤侯	豪高┆偶叶	萧遥

注：柳永生卒年据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载《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两宋金元十一家词韵比较表(二)

柳永	监廉		偶叶	寒先				侵寻		真文		庚青		江阳		东钟
苏轼	监廉		偶叶	寒先				侵寻	偶叶	真文	偶叶	庚青		江阳		东钟
周邦彦	监廉		合叶	寒先				侵寻	偶叶	真文	偶叶	庚青		江阳		东钟
朱敦儒	监廉		合叶	寒先				三部间彼此互叶甚多						江阳		东钟
辛弃疾	监廉		合叶	寒先（叶真文）				三部间彼此有互叶						江阳	偶叶	东钟
姜夔	监廉		合叶	寒先				三部间互叶多						江阳		东钟
吴文英	监廉		合叶	寒先				三部间互叶少					合叶	江阳		东钟
元好问	廉纤	监咸	偶叶	寒桓			先天	侵寻		真文		庚青		江阳		东钟
白朴		监咸		寒桓			先天	侵寻		真文		庚青		江阳		东钟
张可久	廉纤			寒山	桓欢		先天	侵寻		真文		庚青		江阳		东钟
张翥	廉纤（偶叶寒桓、先天）	监咸		寒桓		偶叶	先天	侵寻		真文	偶叶	庚青		江阳		东钟

两宋金元十一家词韵比较表(三)

柳　永	铎觉		屋烛		德质		月帖	
苏　轼	铎觉（偶叶德质、月帖）		屋烛		德质	合叶	月帖	四声入声有混叶
周邦彦	铎觉		屋烛		德质		月帖	
朱敦儒	铎觉		屋烛		德质	合叶	月帖	阴声韵、入声韵偶叶
辛弃疾	铎觉（偶叶德质、月帖）	偶叶	屋烛	偶叶	德质	合叶	月帖	阴声韵、入声韵偶叶
姜　夔	铎觉（偶叶德质）		屋烛	偶叶	德质		月帖	
吴文英	铎觉（偶叶德质）		屋烛	偶叶	德质	合叶	月帖	
元好问	铎觉		屋烛		德质	合叶	月帖	
白　朴			屋烛		德质		月帖	
张可久			屋烛		德质		月帖	
张　翥	铎觉		屋烛		德质	偶叶	月帖	

从上表可见，两宋词韵与金元词韵有很大差别。吴文英与元好问是同时代人，各处于分裂的中国的两端，而其词用韵大异，吴文英除以江阳通叶庚青显示其吴音特点外，余与其他宋代词人相同。元好问则有较大革新，白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发扬光大，张可久、张翥在某些方面又继续完善之。较之宋词用韵的模式，元、白、张建立了一套新的模式，亦即自己时代的用韵模式。元好问、张翥是有突出成就的诗人，白朴是《中原音韵》的作者极为尊崇的元曲四大家之一，张可久为朱权《太和正音谱》誉为"诚词林之宗匠也"。他们的词的用韵除了入声独叶这一点外，与《中原音韵》所代表的曲韵相当密合。这说明元代的词韵与曲韵都是植根于当时的"中原之音"的。

元好问与吴文英同时而不同地，白朴与蔡松年，张可久与吴文英，姚燧与朱敦儒同地而不同时，他们之间的词韵各自有较大差异，何以致此？可归结为空间与时间两大因素，简言之，至金元时代，北方汉语有较大变化，这促使词人，特别是"通权达变"的词人用韵也随之变化。较之友人李俊明（泽州人）和段克己、段成己兄弟（河东人），元好问是走在时代前列的词人，时人称他对"音韵乖叶，尤切致恳"，并非虚言。

金代占领北中国后，其前期的北方籍词人如蔡松年（真定人）、赵可（高平人）、王寂（玉田人）、党怀英（泰安人）、王庭筠（盖州人）、王特起（崞县人），以及那些山东全真道士，他们的词韵尚未有太多的特点，至元好问崛起，词韵始以较新的面目展现于世，我们揣测在十三世纪初年北方汉语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元好问的词韵（及其近体诗韵）是反映这种变化的较早的可靠证据，其晚年诸大曲家竞起，白朴以其词韵（及曲韵）进一步反映了这一变化。[①]他们的作品的用韵给汉语语音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献。至十四世纪终以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而集大成。

---

① 俞敏先生于拙稿上批曰："元人用当时音可能与演戏有关。'俗人'不能为文人之浅斟低唱也。"

总之，本文对宋词韵的有律可循的一面和它的纷繁复杂的通叶现象作了较详尽的描述，并以宋词韵与金元词韵作比较，旨在对自北宋柳永起至元末张翥止的三百多年的词韵史作历时的研究，揭示词韵随语音之变而变的客观规律。

最后，我们要引录一段白朴的话，因为颇能发人深省。白朴《满庭芳·雅燕飞觞》小序："屡欲作茶词，未暇也。近选宋名公乐府，黄、贺、陈三集中，凡载《满庭芳》四首，大概相类，互有得失，复杂用元寒删先韵，而语意若不伦。仆不揣狂斐，合三家奇句，试为一首。"①案，此序中"贺"指贺铸，当为秦观之误，贺集中无茶词，且白朴词首数句即袭用秦词亦可证。既然白朴不满的是"杂用元寒删先韵"，那我们就看看三家四词的具体韵字：

黄庭坚《满庭芳·北苑春风》$_{-386}$叶"关$_{删}$烟$_{先}$斑$_{删}$边$_{先}$贤$_{先}$山$_{山}$源$_{元}$前$_{先}$"

黄庭坚《满庭芳·北苑龙团》$_{-401}$叶"关$_{删}$烟$_{先}$凡$_{凡}$斑$_{删}$翻$_{元}$山$_{山}$边$_{先}$前$_{先}$"

秦观《满庭芳·雅燕飞觞》$_{-464}$叶"贤$_{先}$团$_{桓}$泉$_{仙}$圆$_{仙}$鬟$_{删}$莲$_{先}$阑$_{寒}$轩$_{元}$连$_{仙}$"

陈师道《满庭芳·闽岭先秦》$_{-586}$叶"间$_{山}$团$_{桓}$边$_{先}$潺$_{山}$阑$_{寒}$鬟$_{删}$寒$_{寒}$澜$_{寒}$斑$_{删}$"

确是"寒桓删山"与"元仙先"杂用，而且带上了凡韵字。我们再考察白朴词的韵字：

白朴《满庭芳·雅燕飞觞》$_{元642}$叶"欢$_{桓}$团$_{桓}$翻$_{元}$斑$_{删}$鬟$_{删}$寒$_{寒}$山$_{山}$鞍$_{寒}$残$_{寒}$"

果然与北宋三家不同，全是寒桓删山，加一元韵唇音字"翻"。

究其实，白朴押的是金元时代的寒桓部韵，而黄、秦、陈三家押的是宋代的寒先部韵，宋之寒先部至金元裂为寒桓、先天二部（见前

① 据《全金元词》及《白朴戏曲集校注》，歧异处择善而从。

表)。白朴站在自己时代的语音立场上,故对黄、秦、陈三家的寒桓与先天混叶啧有微辞,反其道而行之。

在我们看来,白朴的用韵,“此亦是也”;黄、秦、陈的用韵,“彼亦是也”。焦循所云“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语音何独不然?

黄、秦、陈的词韵与白朴的词韵何以皆“是”?“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故也。

黄、秦、陈的词韵与白朴的词韵何以歧异?“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故也。

参考文献

唐圭璋 《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第一版,1980年第二次印刷。

——— 《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

——— 《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

孔凡礼 《全宋词补辑》,中华书局,1981年。

施国祁 《元遗山诗集笺注》。

王文才 《白朴戏曲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隋树森 《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

吴　梅 《词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2年。

宛敏灏 《词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沈祥源 《唐五代词用韵考》,《研究生论文选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周祖谟 《宋代汴洛语音考》,《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

鲁国尧 《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 《宋元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语言学论丛》第八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

——— 《宋代福建词人用韵考》,《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9年。

——— 《宋元江西词人用韵研究》,《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

——— 《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音韵学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6年。
——— 《校辑本〈山中白云词〉之讹误》,《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第1期,上海古籍出版社。
——— 《元遗山诗词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 《白朴的词韵和曲韵及其同异》,《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
——— 《白朴曲韵与〈中原音韵〉》,《中原音韵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 《从曲律、曲韵查核诸家对白朴曲点校的失误》,《中华国学》创刊号,1988年3月,香港。
——— 《〈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商务印书馆,1988年。
朱晓农 《北宋中原韵辙考》,语文出版社,1989年。
程朝晖 《欧阳修诗词用韵研究》,《中国语文》1986年第4期。
——— 《宋代洛阳诗人曾几诗韵考》(稿本),1986年。
罗德真 《王安石诗词用韵研究》,《南京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
林　亦 《黄庭坚诗文用韵考》,《广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吴　臻 《陈与义诗词用韵研究》(稿本),1986年。
夏文蓉 《楼钥诗韵研究》(稿本),1987年。
王韫佳 《刘过诗词用韵研究》(稿本),1988年。
——— 《王禹偁、杨亿诗用韵考》,《古汉语研究》1992年第3期。
李爱平 《金元山东词人用韵考》,《语言研究》,1985年第2期。
刘青松 《王恽诗词用韵研究》(稿本),1988年。
何生荣 《姚燧诗词用韵研究》(稿本),1986年。
袁家骅 《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
罗常培 《临川音系》,科学出版社,1958年。
——— 《厦门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年。
颜　森 《高安(老屋周家)的语音系统》,《方言》1981年第2期。
纪　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此文发表于《中国语言学报》第四期(商务印书馆,1991年)。我自六十年代初期起即研究宋词韵,"文革"后陆续发表了若干论文,这篇文章是我二十多年研究工作的总结。

元遗山诗词曲韵考

提要 本文首次考察了金元诗韵，打破了近体诗牢守官韵的成说，证明元好问的近体诗韵也植根于口语，并订正了钱大昕和王力先生的“借韵”说。

本文指出了从元好问诗词曲用韵归纳出的韵系正处于《中原音韵》的前期阶段，是北方话语音史上的重要史料。

从元遗山诗词用韵的综合比较可见，吴重熹石莲庵刊《遗山新乐府》所收诸作的真伪须加甄别。

一、引　　言

元好问，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卒于蒙古宪宗七年（1257），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市）人，字裕之，因曾在遗山（在今山西定襄县城东北18华里）读过书，自号遗山山人。他是金、元两代最杰出的诗人、词人，生前身后都有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元人徐世隆云：“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雄顿挫，闲婉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遗山先生文集序》）清人施国祁曰：“遗山先生诗文大家，杰出金季，为一代后劲，上接杜韩，中揖欧苏，下开虞宋。”元好问是位雄视一代承先启后的大作家，他的诗词曲用韵具有代表性、典型性。

他的经历具有特殊性。元好问是山西人，5岁至14岁随继父（亲叔）元格在山东掖县度过童年。此后又随元格至山西陵川县任上，得从著名学者郝天挺学习6年。19岁至21岁时，元格调官陇城（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亦随往，因参加秋试，在长安（今西安）住过七八个月。元格死后，回家乡。因蒙古军南侵山西，元好问从27岁

(1216年)起便离开故土,直至44岁(1233年)蒙古军攻取汴京(今开封),一直转徙于今河南宜阳、登封、叶县,又在今河南镇平、内乡、南阳、开封任官。金亡后居今山东聊城、冠县。50岁时(1239年)回到故乡,专力著述,但不断外出,数至燕京(今北京),"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凡三十年"。(上引徐世隆文)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山西人,就假定他的诗词曲用韵以山西乡音为根据。他出身于文士门第,有高度的文化,其生平足迹遍于整个北中国,而居于中州的时间又颇长。其诗律切精深,其后辈王恽记述1254年春元好问对他的诲导一事,"而于体要工拙,音韵乖叶,尤切致恳"。(《秋涧集·遗山先生口诲》)无怪乎元末虞集云:"辛幼安自北而南,元裕之在金末国初,虽词多慷慨,而音节则为中州之正,学者取之。"(《中原音韵序》)所以元遗山的诗词曲用韵应该能反映金元中州话或北方话的语音现象,治汉语语音史的学人应予重视。

元遗山的晚年及身后正是北曲的鼎盛时期,关汉卿稍晚于他,白朴在幼年时曾得到元好问的抚养。汉语语音史的杰作《中原音韵》就是周德清所作的北曲韵书,元好问的诗词曲用韵是在《中原音韵》前的反映北方话语音的一项颇有价值的史料。音韵学界一直注重唐诗用韵,近三十年来对口语性较强的韵文如敦煌变文、曲子词、宋词、诸宫调、元曲的用韵也比较注意,论文亦夥,但对宋诗则关心不够,以为不能反映实际语音,更无论金元诗了。周祖谟先生1942年著《宋代汴洛语音考》,[①] 首次将宋代汴洛文士的用韵作了系统的归纳与分析。我们认为有必要探索更多的宋诗甚至金元诗的用韵,开拓新的领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研究汉语语音的发展,因此将遗山诗词作为研究宋金元诗词用韵的一次尝试。

唐宋金元科举基本上以诗赋取士,近体诗用韵需要遵守功令。例如,据刘钧杰同志的统计,杜甫近体诗用韵:韵脚字99.8%符合官韵(系指按功令可以"同用"的,基本上如后来的"平水韵"),不符合官韵的占0.2%。[②] 而正式的106韵的"平水韵"的确立是在金代,钱大

① 见《问学集》下册,中华书局,1966年。
② 刘钧杰《再说〈杜诗与唐代口语〉》,《中国语文》1984年第1期。

昕于黄丕烈处得见元刊本金王文郁《新刊韵略》(卷首有许古正大六年即1229年序)后,首倡此说。[①] 王国维又见金张天锡《草书韵会》,前有赵秉文序,署正大八年(1231年),二书分韵同为106韵,遂认为二书皆祖金人功令。[②] 元好问与王文郁、张天锡同时,兴定五年(1221)进士及第,三年后应宏词科,权国史院编修官,科场得意,岂能不深谙功令?因此可以以遗山近体诗的用韵与106韵的官韵比较,观察其异同。这也是我们研究元遗山诗词用韵的目的之一。

据郝经《陵川集·遗山先生墓铭》,元好问有诗约5800首,而现存仅1362首,笔者研究元遗山诗依据清人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③] 其例言云,遗山友人张德辉"类次,又将古今体分编",则是其中何者为古体诗,何者为近体诗是元人张德辉所定。个别错字则以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明弘治本《遗山先生文集》改正。研究遗山词则据唐圭璋先生编《全金元词》[④] 中的遗山词,可分为两类:甲类,第108页以前的218首,绝大部分源自彊村丛书本《遗山乐府》三卷本;乙类,158首,系据吴重熹石莲庵刊《遗山新乐府》五卷本,参校他本,剔除混入之作若干首而得。[⑤] 诗集卷一有古赋四篇,亦附入研究。隋树森《全元散曲》辑得元好问散曲九支,套数一套(残)。《西江月》一首、《人月圆》二首重见于词甲类和词乙类。《人月圆》二首又为《全元散曲》所收。

有些诗、词不换韵,但有些换韵,甚至达9次之多,因此一首诗词可能不止一个韵段。兹将现存元遗山诗、词及古赋的数目与韵段数统计于表中。

---

① 《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平水韵"条。

② 《观堂集林》卷八《书金王文郁〈新刊韵略〉张天锡〈草书韵会〉后》。

③ 施国祁注,麦朝枢校《元遗山诗集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④ 《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

⑤ 《全金元词》"引用书目"云:"遗山新乐府,吴重熹石莲庵刊五卷本,颇多混入他人之作,且多错误,兹据张家鼐南塘本及罗振玉殷礼在斯堂本校补。"又参见第135页案语。本文据用韵现象,疑其中尚有很多误收而剔除未尽者。

	首（篇）数	韵段数
古体诗	312	488
词	376	426
近体诗	1050	1050
古　赋	4	5
曲	11	11
总　计	1753	1980

二、古体诗和词的韵系

我们将元遗山的古体诗和词的用韵并合叙述。

以《广韵》206 韵为基准，元遗山的古体诗和词均有数韵同用，系联归纳应为一个韵部的现象。各部内诸韵的独用与合用数字，兹不赘录，仅举《广韵》庚耕清青蒸登六韵在元遗山古体诗和词中的押韵情况的统计数字为例：

广韵韵目	庚	庚耕清	庚清	庚清青	庚耕清青	清青	青	登	登蒸	登蒸清	登庚耕清	蒸庚清	蒸庚清青	蒸庚耕清青	蒸青
古体诗			6	11	1		1	1	1	1			1	1	1
词	1	1	6	10	2	3	3				1	1	2	1	

可见无论古体诗或词，青、登、蒸都不能各自成为一部，而必须与“庚耕清”合为一部，命名为庚青部。《寄赵宜之》五 246 叶“棱陵饧罾仍朋腾僧登鹰”，[1] 显然是有意仅押登韵和蒸韵字，但还是夹入了清韵的“饧”。其他诸部立部的根据和过程类此。

---

① 诗题若过长，则节录。右下角汉字为卷数，阿拉伯数字表页数。有些诗有几个韵段，只摘录其中某韵段的韵字为例。

元遗山古体诗和词的用韵共分 18 部：阴声 7 部，阳声 7 部，入声 4 部。先列阴声和阳声韵的部目表如下：

韵部	古体诗				词(举平以赅上去)
	平声	上去声			
		上声	去声	上声·去声	
东钟	东冬钟			董肿·送宋用	东冬钟
江阳	江阳唐	养	漾	荡养·宕漾	江阳唐
支微	支脂之微齐	纸旨止尾荠	至志未霁祭		支脂之微齐祭废
鱼模	鱼虞模	语麌姥 * 厚	御遇暮	语麌姥·御遇暮	鱼虞模 * 有
皆来	佳皆灰咍		卦怪队代泰夬	海·怪代队泰	佳皆灰咍泰夬
真文	真谆臻文欣魂痕 * 元	混很 * 阮	震稕	轸隐·震稕问	真谆文欣魂痕
寒先	元寒桓删山先仙	阮旱潸产狝铣	愿翰换霰线	阮产铣·愿	元寒桓删山先仙
萧豪	豪肴宵萧	皓巧小篠			豪肴宵萧
歌戈	歌戈		个过	哿果·个过	歌戈
家车	麻 * 佳	马	祃 * 卦		麻 * 佳 * 歌 * 卦 * 夬
庚青	庚耕清青蒸登	梗耿静迥拯	映诤劲径证	梗耿静迥·映劲证嶝	庚耕清青蒸登
尤侯	尤侯幽	有厚		有厚·宥候	尤侯幽
侵寻	侵				侵
监廉	覃谈衔盐添凡				覃谈衔盐添

注：前有 * 号者见下论述。

若干问题讨论如下：

（一）元遗山古体诗家车部除含《广韵》麻韵外，尚有佳韵之“佳涯”，卦韵之“画”。词之家车部，则有佳韵“涯”，卦韵“画”，夬韵“话”，歌韵“他”。

（二）《广韵》元韵的归属问题。古体诗中真谆欣文四韵常同用（偶有臻韵加入），魂韵独用2次，魂与真、文、真文、谆分别同用各1次，魂痕文同用1次，因此定六韵共居一部。但是魂痕又与元韵牵混4次；而元韵系字与寒先部韵字同用达12次，元韵无独用例。在词里，“元”不独用，与真文部诸韵亦不叶，而与寒先部相叶15次。因此元韵应归寒先部，而古体诗中魂或魂痕、混很（不夹“真谆臻文欣”）之与元、阮互叶当是受了传统诗韵习惯的影响，我们在表中真文部内“元”、“阮”二字上加上特别标志。

（三）在诗里，厚韵与语麌姥韵同用1次：《曲阜纪行》之七叶“谱亩鲁所武侮举庑卤古”，“亩”为厚韵字。在词里，有韵与鱼模部上去声互叶1次：《摸鱼儿·笑青山》75叶“举雨否怒苦土渡屦处树主去路”，[①]“否”为有韵字。《广韵》侯、尤韵系的其他唇音字则与尤侯部相押：元遗山古体诗中有“矛不谋复仆浮”，词里有“眸侔浮”，如《赠答刘御史云卿》之三－87叶“尤留仇羞矛柔由酬疣流不周俦优投欧”[②]，《南乡子·迟日惠风柔》123叶“柔稠眸浮侔头流侯”。《广韵》的侯、尤韵系唇音字在宋代词人用韵中押入鱼模的较元遗山的诗词为多。

（四）古体诗中，侵寻、真文、庚青界限清楚；监廉、寒先亦不相杂厕。元遗山词韵的一个重大特点是，侵寻、真文、庚青共使用58次，鼎足三分，概不相混。而宋代词人如欧阳修、晏几道、黄庭坚、朱敦儒、辛弃疾、姜夔、刘辰翁等人皆有不少合用之例，[③] 遗山则与之异

---

① 《 》号内首为词牌后，后为首句，如首句过长则截取前四字，右下角数码为《全金元词》页数。

② “不”有数音，其一见《广韵》尤韵：“不，弗也。……甫鸠切。”《五音集韵》亦然。

③ 见鲁国尧《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2期；《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语言学论丛》第八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宋元江西词人用韵研究》（稿本）。

趋。词中监廉部与寒先部有少量相混：监廉部独用 4 次，全在 108 页前，即全在甲类；寒先部独用 66 次；此外尚有 6 次主体押寒先部而杂入一监廉部字，如《烛影摇红·红叶翻阶》132 叶“暖宴远转软院脸伴劝见”，“脸”是监廉部字。（按，此相混的 6 首词内有 4 首出于乙类，即吴重熹《遗山新乐府》五卷本。）

（五）下列部有分组倾向：寒先部内二组的分用与合用次数如下：

	A 寒桓删山 元(合口三等唇音字)	B 先仙元	C 二者合用
古体诗	16	31	8
词 甲类	22	22	0
词 乙类	9	7	12

在诗里，元韵合口三等唇音字如“蕃返晚”不出现于 A 和 B 组中，仅出现在 C 组内。如《曲阜纪行》之十二 146 叶“间蕃年贤镌传篇言焉然”。而在词里，则出现于 A 组，如《朝中措·帘旌烘日》124 叶“翻寒班山间”；也出现于 C 组，如《点绛唇·连夜春寒》123 叶“暖断短管晚远满”。不论诗与词，C 组是 A 组与 B 组的相混，纵无元韵合口三等唇音字，也是相混的。

监廉部内二组分用与合用次数如下：

	A 覃谈衔凡	B 盐严添	C 二者合用
古体诗	2	2	0
词 甲类	2	2	0
词 乙类	0	0	0

凡韵只一“凡”字：《历下亭怀古》二 120 叶“谈三函潭嵌龛岚酣南凡芟探覃参”。

萧豪部也有分组倾向：

	A 豪 肴	B 宵 萧	C 二者合用
古体诗	8	4	3

词	甲类	8	5	1
	乙类	11	4	8

此三部的分组倾向都是广韵音系一、二等韵(加上合口三等的唇音字)和三、四等韵之别。而遗山词的乙类(即辑自《遗山新乐府》五卷本者)混用颇甚,我们揣测可能有些词并非元遗山词,而为吴重熹误采收入。

支微部的情况:

		A 支脂之(开口精庄章日组)	B 支脂之(非开口精庄章日组)微齐	C 二者合用
古体诗		9	33	13
词	甲类	6	12	0
	乙类	3	14	5

词甲类当可分为两部：支思与机微(后者不含灰韵系字,故不谓之齐微)。

(六)《广韵》灰韵系字及泰韵合口字在元遗山古体诗和词用韵中的情况：这批字在古体诗里全部押入皆来部,与咍佳皆同叶。在词里情况基本如是,但有例外:《千秋岁·玳筵晨启》124 叶"启绘邃脆喜至戏醉贵岁","绘"是《广韵》泰韵合口字,其他均为支微部字。而在宋代词人用韵中,这批字很多押入支微;在《中原音韵》中多数收入齐微韵。

(七)词里皆来部与机微部字相混 2 次:《江城子·春风花柳》84 叶"催梅开醿堆台崖苔杯来",其中"醿"是《广韵》支韵字,应为机微部字。《愿成双·绣帘高卷》134 叶"细开卮气比飞岁水",其中的"开",应为皆来部字。古体诗中无此现象。

(八)词里支微与鱼模相押 1 次:《玉楼春·烟炉不断》128 下片以"絮"与"岁"叶。

元遗山古体诗与词的入声韵可分为四部:

(一)铎觉部——《广韵》的铎药觉韵字。古体诗使用 3 次,词使用 5 次。

(二)屋烛部——《广韵》的屋沃烛韵字。古体诗使用 10 次,内

有1次《过晋阳故城书事》四201叶"秃没镞","秃镞"是屋韵字,但"没"为没韵字,非屋烛部。词使用4次。

(三)德质部——《广韵》的缉没质术物德职陌麦昔锡韵字。古体诗使用42次,词使用10次。如《满江红·元鼎诗仙》80叶"迹昔壁锡日质及缉夕昔戟陌敌锡笔质忆职",这说明广韵音系的p、t、k三种入声尾已混,很可能变成喉塞音尾。

(四)月帖部——《广韵》的叶帖曷末黠薛月屑韵字。古体诗使用11次,词使用2次。如《下黄榆岭》二267叶"铁屑缬屑叠帖绝薛阙月月月帖帖",说明p、t尾已混。

德质部和月帖部有合用,古体诗9次,词4次。如《郎文炳心远斋二首》之一二159叶"勃没物物发月月月"。二者与屋烛部合叶1例:《云岩》四209叶"祓沐物"。

德质部和屋烛部通叶2次:《后平湖曲》六297叶"物足",《解剑行》六301叶"没物犊","足犊"是屋烛部字。

月帖部和屋烛、铎觉部也有合叶现象:诗《后芳华怨》六293叶"药督活渴",词之《念奴娇·小山招饮》109叶"杰月复殁没阙发樾"("督复"为屋烛部字,"药"乃铎觉部字)。

值得重视的是,元遗山词里有一例是阴声韵字与入声韵字相押:《蓦山溪·梁州夏旱》125叶"媚世里地北岁","北"为《广韵》入声德韵字,此处与五个支微部字通叶(《中原音韵》齐微韵"入声作上声"收"北"字)。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元遗山的词韵,词甲类可分为22部:东钟、江阳、支思、机微、鱼模、皆来、真文、寒桓、先天、豪高、萧遥、歌戈、家车、庚青、尤侯、侵寻、监咸、廉纤、铎觉、屋烛、德质、月帖。词乙类其质不纯,纠葛甚多。若就乙类或甲乙类混言,分类当如本节表2,监廉部押韵字少,论音理,其内部之分与合当依寒先部平行类推。

附论元遗山古赋四篇的用韵。《元遗山诗集笺注》卷一收有古赋四篇,首篇为《秋望赋》一65,有两个韵段,第一韵段兼押《广韵》庚耕清青蒸五韵,第二韵段是入声t尾字与k尾字混叶:"激锡笔质食职室质瘠昔失质击锡"("笔室失"是t尾字)。《蒲桃酒赋》一67叶皆来部韵,灰韵字"媒梅杯回"等均在内。《新斋赋》一69叶真文部韵,有魂韵字

“门存”，而无元韵字。《行斋赋》一 71 叶江阳部。总之，此四篇古赋用韵悉与古体诗和词的用韵相同，无特殊现象。

三、近体诗的韵系

现存元遗山近体诗 1050 首。其中 2 首押仄声韵：《梁父吟扇头》十一 520 叶“坐和”（“和”为“唱和”之“和”，去声），《唐子达扇头》十一 523 叶“玉屋”。1048首押平声韵。如第一节所述，金时功令为 106 韵，其中平声 30 韵，元遗山除未押下平三肴与十五咸外，共押了 28 韵。

元遗山近体诗用韵的重大特点是颇多“借韵”和“出韵”。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借韵”条云：“五七言近体第一句借用旁韵，谓之借韵。唐诗：‘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始启其端。至皮陆《松陵集》，则举之不胜举矣。宋人借韵尤多，近代名家，以此为戒，此后生之胜于前贤者。”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继畅钱说：“盛唐以前，此例甚少，中晚唐渐多。谁知这样一来，竟成了一种风气！宋人的首尾用邻韵似乎是有意的，几乎可说是一种时髦，越来越多了。”“近体诗不得通韵，仅首句可用邻韵。”“以排列相近而音又相似的韵认为邻韵”。[①] 近体诗首句可押韵，也可不押，如首句押邻韵，即为钱大昕和王力先生所说的“借韵”，而元好问颇多。如《广韵》庚耕清青蒸登六韵，金王文郁《新刊韵略》定庚耕清为下平的“八庚”，青为“九青”，蒸登为“十蒸”，三者紧相邻接。《甲寅九日》之二十 490 叶“青明缨平声”，《前高山杂诗》之二十三 630 叶“凭生名”，这两首诗都押“八庚”，但前者首句“借”青韵，后者首句“借”蒸韵。又如《别张御史》九 413 叶“成冥庭经星”，是押“九青”而首句“借”庚。《胡寿之待月轩》之一十四 649 叶“生冰丞”，是押“十蒸”而借“庚”韵。

元遗山近体诗中的“借韵”也不一定是“借”邻韵，如下平的“七阳”竟超越多韵而“借”到上平的“三江”：《与同年敬鼎臣》九 442 叶“窗床觞藏忘”。上平的“四支”可以借到“八齐”：《京居辛卯八月六

① 王力《汉语诗律学》第 53、71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年版。

日作》八 379 叶“低移迟期虔”；反之亦有其例：《自赵庄归冠氏》之二叶“离齐啼”。这种“借韵”现象很值得探讨。

如果与“出韵”现象一并考察的话可得个中真谛。近体诗的偶句必须押韵，如不用“本韵”字而押其他韵字，即为“出韵”，王力先生说：“‘出韵’是近体诗的大忌。”“科场中，诗出了韵（又称‘落韵’），无论诗意怎样高超，只好算是不及格。”① 但是元遗山近体诗“出韵”也不少，如《独峰杨氏幽居》八 375 叶“晴青生屏平”，其中“青屏”是“九青”韵，“晴生平”是“八庚”韵，此首既“出”又“借”；《杏花杂诗》之二十一 536 叶“光窗郎”，是押阳韵而“出”江韵。《赠李文伯》十 509 叶“奇倪谁期迟”，“倪”为齐韵字，其余四字是支韵字，此首“出韵”。综合研讨“借韵”和“出韵”，可知绝非是诗人的标新立异。以上只是举例，现将元遗山近体诗的全部“借韵”、“出韵”统计于下，表中第一栏是本韵，不加括弧的字是王文郁《新刊韵略》平声韵的韵目，括弧内的字是该韵所包含的《广韵》的韵目。第四栏是根据这些“借韵”和“出韵”现象系联、归纳得出的韵部。

本韵	上平一东	二冬（钟）	三江	下平七阳（唐）	四支（脂之）		五微	八齐	六鱼	七虞（模）
“借韵”	冬$_{12}$	东$_5$		江$_3$		微$_9$ 齐$_1$	支$_6$	支$_2$ 微$_1$	虞$_8$	鱼$_6$
“出韵”	冬$_1$	东$_1$		江$_1$		齐$_2$	支$_1$		虞$_3$	鱼$_2$
归纳韵部	东钟		江阳		支思	机微			鱼模	

九佳（皆）	十灰（咍）	十一真（谆臻）	十二文（殷）	十三元（魂痕）	元	十四寒（桓）	十五删（山）	下平一先（仙）	二萧（宵）
灰$_1$	佳$_5$	文$_4$	真$_5$	文$_1$		删$_6$	寒$_3$		
灰$_1$	佳$_2$	文$_2$	真$_1$			删$_3$			
皆来		真文			元言	寒山		先天	**萧遥**

① 王力《汉语诗律学》第 48、49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年版。

四豪	五歌(戈)	六麻	八庚(耕清)	九青	十蒸(登)	十一尤(侯幽)	十二侵	十三覃(谈)	十四盐(添严)
			青$_{8}$ 蒸$_{2}$	庚$_{12}$	庚$_{1}$				
				庚$_{2}$					
豪高	歌戈	家车	庚青			尤侯	侵寻	监咸	廉纤

近体诗,五言的一般首句不押韵,七言的首句押韵为多。元遗山押平声韵的1048首中首句入韵的900首,"借韵"101次,"出韵"22次,这种现象尤其密集于若干韵之间。这显示了金代官定韵书中分开的某些韵,甚至是距离较远的某些韵实际上有亲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某韵与某韵主要元音和韵尾(如果有的话)相同,因而应该归为一部,这必然是植根于当时语音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

(一) 在元好问近体诗韵中,支思与机微应分部,分别押韵30次和43次。支思部与其他韵不发生"借"、"出"关系。

(二) "五微"、"八齐"所"借"、"出"的"支"均是机微部韵字。

(三) "豪"与"萧宵"截然分开。"寒桓"与"删山"间互有"借"、"出",从不涉及"先仙";"仙先"押韵112次,与"寒桓"、"删山"风马牛不相及。元好问的"覃谈"与"盐添"也无关系。广韵音系的效摄、山摄、咸摄一二等韵与三四等韵在元好问近体诗韵中无瓜葛可言。

(四) 元好问魂痕押韵23次,元韵独押3次,《示白诚甫》七344叶"萱源言轩",《哀武子告》十464叶"原辕园元源",《宗人明道老师》之一十三623叶"源轩元"。元与仙先也无关系,应立元言部。历来公认元韵从中古到近代的运动轨迹是:

魂痕元(《广韵》)→先仙元(《中原音韵》)

而元遗山近体诗元韵独立这一事实给我们以启发,元韵可否中经独立的过程,即:

魂痕元→元→先仙元

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与元韵有关的诸韵在两部韵书中的排列次序是:

《广韵》:真谆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

《五音集韵》：真(臻)谆文殷痕魂元寒桓山(删)仙(先)

看来金韩道昭《五音集韵》(写成于1212年)把“元”的次序挪后，置于“痕魂”之后，“寒桓”之前，是有其道理的，《五音集韵》卷首“入册检韵术”系统地叙述了16摄的名称，奇怪的是，独将“元”韵提出，游离于臻摄之外。[①]这些都可与元好问诗词用韵中元韵的地位相互印证，显示了当时的语音情况。

把从元好问近体诗的“借韵”、“出韵”表所归纳出的韵部与《中原音韵》19韵部相较，可以看出，二者相当接近。元好问，山西人，在汴京与中州的其他地方住过很长时间，足迹遍于整个北中国，多次去过燕京，他很重视“音韵乖叶”的问题，被誉为“律切精深”，为中州之正，他的诗词用韵植根于当时的北方话的基础上。《中原音韵》是反映的“中原之音”，二者都各自表现了北方话语音的一个历史横断面，而且是紧相接近的历史横断面。其间有一些差异，有的却是各自的材料本身的特点所决定，《中原音韵》是北曲韵书，元好问的诗词用韵受着习惯押韵法的支配，如“家麻”与“车遮”在12世纪确已分立，毛居正在《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微”韵后的案说指出，麻韵“一韵当析为二”，“以中原雅声求之，迥然不同”，但是二者相通之习惯，“施用既久”。又如诗、词规定入声韵必须单押，而在《中原音韵》的韵谱里，却可派入三声，附丽其后。

音韵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观点：古体诗的用韵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语音现象，而近体诗都是牢守功令的，于研究语音史无甚价值。其实不可一概而言，元好问虽然进士及第(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中宏词科(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但是他的近体诗用韵并不遵守金代功令，本节的近体诗用韵与王文郁《新刊韵略》韵目比较表便可证明，其近体诗韵颇能反映当时语音，接近《中原音韵》，这不能不令我们注目。

---

① 原文为：“通江止摄一，遇蟹新为二，臻摄载元三，山效果假四，宕梗曾须五，流深咸六次。”

四、曲　韵

《全元散曲》辑得元好问散曲 9 支,套数残曲 2 支,共 11 支。材料太少,但可以作为辅助资料使用。今将《元遗山诗集笺注》中的近体诗用韵、彊村丛书本《遗山乐府》中的词韵、《全元散曲》中的曲韵列表于下:

	阴声韵									阳声韵										入声韵			
近体诗韵	歌戈部	家车部	皆来部（合灰韵）	机微部	支思部	鱼模部	尤侯部	豪高部	萧遥部	廉纤部	监咸部	寒桓部	元言部	先天部	侵寻部	真文部	庚青部	江阳部	东钟部		屋烛部		
词韵	歌戈部	家来部	皆来部（合灰韵）┆偶叶┆	机微部	支思部	鱼模部（偶叶机微）	尤侯部	豪高部┆偶叶┆	萧遥部	廉纤部	监咸部┆偶叶┆	寒桓部	先天部		侵寻部	真文部	庚青部	江阳部	东钟部	铎觉部	屋烛部	德质部┆合叶┆	月帖部
曲韵	歌戈韵		皆来韵（不含灰）				尤侯韵						先天韵			真文韵			东钟韵				

注:"偶叶"指互叶很少,"合叶"指互叶多。空白者表示无此部(韵)。

五、若干韵字的讨论

我们研究诗词用韵,当然主旨在整个语音系统的探讨,但是某些韵字的使用,也应该观察。

兹讨论若干韵字如下:

"涯"字,早在唐代就有麻韵音,但《广韵》只有佳韵五佳切,支韵鱼羁切;《集韵》增加了麻韵牛加切;《五音集韵》麻韵五加切,"涘也",佳韵、支韵音亦收。王文郁《新刊韵略》麻韵"新添"栏目下有"涯",五加切,也注明另有二音。元好问古体诗 2 次,词 7 次,近体诗 8 次押入家车部,但是在古体诗中 2 次、古赋中 1 次押入皆来部,如《游泰山》五 282 叶"台哉阶垓谐荅哀涯回……"。可见金代麻车部音占优势,皆来部音还保存。而《广韵》鱼羁切音也在语言中有表现,如南宋福建词人曾以"涯"与支微部字叶:陈德武《望海潮·三分春色》叶"非知时诗期涯眉飞宜衣归"。只是在同时代的北方,此音似不存,《五音

集韵》、《新刊韵略》仍录鱼羁切音，只是抄旧书罢了。

“他”字，《广韵》歌韵托何切，《五音集韵》、《新刊韵略》只收入歌韵。连《中原音韵》也只收入歌戈韵。宋代山东词人与歌戈部叶，福建、四川词人则与家车部叶，江西词人两叶。元好问词出现 1 次：《鹧鸪天·姚宋光明》96 叶“家沙衙花华他”，末两句“新生黄雀君休笑，占了春光却被他”。“他”的口语音很迟被韵书采录，颇可注意，而遗山词则也较早使用此音入韵。

“涂”字，《眼儿媚·阿仪丑笔》102 叶“家涂鸦华涯”，首二句为“阿仪丑笔学雷家，绕口墨糊涂”，“涂”下注“音搽”。按，《广韵》麻韵：涂，宅加切，“涂饰”，《集韵》直加切，义同，《五音集韵》亦然，《新刊韵略》未收此字。“涂”音搽，恐当时已不通行，故特加注。

“大”字，《广韵》个韵唐佐切，泰韵徒盖切，《五音集韵》、《新刊韵略》亦然，《中原音韵》则歌戈、皆来、家麻三韵并收。宋代江西、山东、四川词人皆叶歌戈部。元好问古体诗和词皆只与歌戈部或皆来部叶，尚未有家麻部音。

“仆”字，《广韵》遇韵芳遇切，“偃仆”；宥韵敷救切，“前倒”；候韵匹候切，“倒也”；德韵蒲北切，“倒也”。《新刊韵略》遇韵，宥韵及其所附的候韵都收有此“仆”字，惟职韵所附的德韵未收。元好问诗使用“仆”两次，分押二部：《鹿泉新居二十四韵》四 232 叶“渡树路故去顾付父屦附聚仆……”该句为“泜水鼓旗纷偃仆”；《宝岩纪行》二 147 叶“瘦垢叩漱窦……覆仆……籀留岫”，该句是“诸峰出头角，随起随偃仆”。

“留”字，《广韵》尤韵力求切外，尚有宥韵力救切，“宿留，停待也”等等，《新刊韵略》亦然。上条引《宝岩纪行》诗，“留”与尤侯部上去声叶，该句为“僧夏容宿留”，与韵书切合。

“覆”《广韵》有四音，主要是宥韵敷救切，“盖也”；屋韵芳福切，“反覆，又败也，倒也，审也”等。《新刊韵略》亦然。元好问《宝岩纪行》诗“屹立柱图覆”，与尤侯部上去声字叶；《贺新郎·赴节金钗促》79 叶“促筑哭宿绿掬玉属谷覆曲烛”，该句为“人世事异常翻覆”。

《戊戌十月山阳雨夜》之二二 130 叶“坌润阵靳分趁晋鬓吝顺尽烬”，其中的“分”既然与其他仄声字相叶，当音去声。可是该句为“山

阳冬候暖，麦脚易滋分"，此"分"于义应为平声，元好问何以与仄声相叶？明弘治刊本此"分"下注"去"，为临时改读乎？

六、从诗律学观察元遗山诗词用韵

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云："依宽窄程度而论"，近体诗韵"大约可以分为四类"。

1．宽韵：

支　先　阳　庚　尤　东　真　虞

2．中韵：

元　寒　鱼　萧　侵　冬　灰　齐

歌　麻　豪

3．窄韵：

微　文　删　青　蒸　覃　盐

4．险韵：

江　佳　肴　咸

王力先生说："这种分类自然带多少武断性，未必能得人人的同意。再者，像微文删三韵，字数虽少，却是非常的合用，所以诗人很喜欢用它们。"①

如果这种分类能建筑在若干有代表性的诗人用韵统计基础上，就能具有较大的可靠性与说服力。兹将元遗山1048首押平声韵的近体诗按"诗韵"要求统计其使用次数列于下：

1．使用50次以上者(韵目右下角为使用次数)：

先$_{112}$　真$_{108}$　庚$_{103}$　尤$_{83}$　支$_{73}$　东$_{65}$

阳$_{58}$　寒$_{50}$

2．使用20次至50次者：

灰$_{46}$　删$_{41}$　麻$_{40}$　侵$_{30}$　文$_{27}$　元$_{26}$

虞$_{25}$　青$_{25}$　微$_{22}$　鱼$_{22}$　歌$_{21}$

3．使用20次以下者：

① 王力《汉语诗律学》第4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萧$_{15}$　豪$_{14}$　蒸$_{13}$　齐$_{11}$　冬$_{6}$　盐$_{5}$
佳$_{3}$　覃$_{3}$　江$_{1}$　肴$_{0}$　咸$_{0}$

元遗山"当德陵之末,独以诗鸣,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天才清赡,邃婉高古,沈郁大和,力出意外,巧缛而不见斧凿,新丽而绝去浮靡"(郝经《陵川集·遗山先生墓铭》),他"不使奇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见其巧,不见其拙;但见其易,不见其难。"(杜仁杰《遗山先生文集后序》),徐世隆也说他的创作"正大明达",总之,后人皆以"正"字许之,在用韵上,元遗山不逞才,不尚奇,力避险韵。他在金亡后,"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独步几三十年",是金、元两代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词用韵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应该是诗律学的研究对象。其近体诗诸韵次数与王力先生说大致相符。

古体诗 312 首 488 个韵段,所押诸韵部次数统计如下:

齐微$_{55}$　寒先$_{55}$　鱼模$_{49}$　真文$_{47}$
庚青$_{38}$　尤侯$_{36}$　东钟$_{33}$　江阳$_{26}$
皆来$_{17}$　萧豪$_{15}$　家车$_{12}$　歌戈$_{11}$
侵寻$_{11}$　监廉$_{4}$　(以上为舒声韵)

入声韵为: 德月$_{66}$[①]　屋烛$_{10}$　铎觉$_{3}$

古体诗 488 个韵段,四声分押情况如下:

平	上	去	上·去	入
290 (59.43%)	72 (14.75%)	23 (4.71%)	24 (4.92%)	79 (16.19%)

上、去、上·去合计: 119 (24.38%)

仄声198 (40.57%)

元遗山词 376 首 426 韵段,所押韵部次数统计如下:

寒先$_{72}$　尤侯$_{46}$　齐微$_{40}$　萧豪$_{37}$　鱼模$_{35}$

① 《后平湖曲》叶"物足",算在其内,故为 66 次。

江阳$_{33}$ 东钟$_{31}$ 庚青$_{31}$ 真文$_{21}$ 皆来$_{16}$
家车$_{15}$ 歌戈$_{13}$ 侵寻$_{6}$ 监廉$_{4}$（以上为舒声韵）
入声韵为：德月$_{17}$ 铎觉$_{5}$ 屋烛$_{4}$

七、结　语

本文首次考察了金、元诗词用韵。

元遗山诗词曲用韵所归纳出的韵系正处于《中原音韵》韵系的前期阶段，遗山韵系与《中原音韵》相当接近。遗山诗词用韵应该是北方话语音史上的颇有价值的史料。

元遗山诗词用韵某些方面，如元韵的使用可与其同时代人韩道昭《五音集韵》对元韵的处置相互参证。

元遗山诗词用韵与其同时代的诸宫调、略后的北曲的用韵及《中原音韵》音系有一定差异，这也与诗词用韵的习惯约束有关，如入声韵必须单押等。但是诸宫调的 m 尾韵与 n 尾韵混用特甚，而元遗山诗词用韵只在词里有少量的监廉部(-m)杂入寒先部(-n)，整个来说，鼎足三分，壁垒清楚，比较能反映当时语音。金元时代 m 尾尚未消失是语言史家都承认的，m 尾、n 尾、ŋ 尾的混押是词、诸宫调甚或元曲的用韵习惯。

元遗山之时，作为功令的 106 韵的诗韵已经确立，传世王文郁、张天锡二书可证，元遗山的近体诗并不遵守。钱大昕、王力的关于近体诗“借韵”、“出韵”的解释可以商榷，这是韵母语音变化造成的归并简化现象，诗人们也是企图以现实语音为根据而押韵的。

从诗、词用韵的某些项目的综合比较推测，吴重熹石莲庵刊《遗山新乐府》五卷本所收是否全是遗山所作大有可疑之处。

要了解某字在古代某个时期的读音，主要靠中古及其后的韵书、字书，但是这些书往往将不同来历的又音兼收并蓄，释义又简。而诗词用韵对确定某些字的读音来说，是有效的手段。如“论”，《广韵》平声卢昆切，去声卢困切，《集韵》、《新刊韵略》同，释义并为“议也”。《中原音韵》亦有平去二音。区别究竟何在？元遗山《临江仙·自笑》90“新诗凭寄取，憔悴不须论”，与平声字叶；《别覃怀幕府诸君》之一九406是七律，颔联“百年人物存公论，四海虚名只汗颜”，此“论”定是

去声。因此可知平声是动词,去声是名词,是四声别义问题。

本文还从诗律学的角度考察了元遗山诗词用韵。

本文原题为《元遗山诗词用韵考》,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现作删改,并增加了"曲韵研究"部分,故改为今题。为更好地了解宋词韵的实质,我研究了金元词韵、元好问诗韵、部分元曲韵,同时还指导校内外青年学人研究了温庭筠、韦庄、王禹偁、杨亿、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陈与义、曾几、楼钥、刘过、王恽、姚燧等人的诗词用韵,凡此皆可作为唐宋金元语音史及诗律学史的重要资料。

1996年

白朴的词韵、曲韵及其同异

提要　白朴既是大曲家，又是著名词人，所以考察白朴一人的作品可觇词韵与曲韵的同异。

白朴词韵近于白朴曲韵，而白朴曲韵又近于《中原音韵》韵系，说明它们都取源于元代通语。

白朴词韵较之宋人词韵模式有很大差异，说明词韵亦随语音之变而变。

一

词与曲都是中国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瑰宝，大盛于宋元两代。现存宋词过两万阕，金词3572首，元词3721首。现存元杂剧约160多种，小令计3853首，套数457套。如此丰富的资料岂止是文学史家的"禁脔"，对研究汉语语音史的学人来说，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词人、曲家创作时用韵，归根结底，总是要以当时的语音为根据的，所以词韵与曲韵无疑地是音韵学上值得开发的"富矿"。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词与曲不同，词韵与曲韵似乎也是截然二物，但实际上二者既有先后的历时关系，又有重叠的并时关系，既有同又有异。如果在对词韵与曲韵分别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以后加以比较，自然是理想不过的了。但若有一位作家既填词又作曲，我们比较其词韵与曲韵的同异，进而追寻其根源，也不失为一佳法。然而这样的作家颇难觅求，因为需有一定数量的作品可供研究，而且作家本人也要有相当的代表性。

白朴恰恰符合我们的要求。周德清《中原音韵》尊崇"关、郑、白、马"为元曲四大家，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云："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白朴亦擅词能诗，明初孙大雅《天籁集序》云："先生少有志天下，已而事乃大谬。……于是屈己降志，玩世

滑稽。徙家金陵,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日以诗酒优游,用示雅志,以忘天下,诗词篇翰,在在有之。"惜乎其诗已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惟以制曲掩其词名,故沉晦者越数百年。"幸而白朴词、曲尚有部分传世,可供我们研究。

白朴祖籍隩州(今山西曲沃),1226 年生于金之汴京,金亡后居真定(今河北正定),故又为真定人。1261 年辞中书右丞相史天泽之荐,南游,1280 年移居建康(今南京),1306 年 81 岁游扬州(此依王文才《白朴年谱》说,《白朴戏曲集校注》第 33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卒年不详。

白朴有词集《天籁集》。白朴自言:"平生留意于长短句,散失之余,仅二百余篇。"(王博文《白兰谷天籁集序》),明时又渐残佚,清初朱彝尊、洪升等为整理刊行,今仅存 104 阕。其友人王博文评白词"辞语遒丽,情寄高远,音节协和,轻重稳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朴词清隽婉逸,意惬韵谐"。其曲名更甚,周德清谓四大曲家"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誉其曲"如鹏搏九霄"。元人钟嗣成《录鬼簿》载白朴杂剧《秋江风月凤皇船》等 15 本,外加《李克用箭射双雕》(其残折收于《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等明代散曲、戏曲选集中),则为 16 本。现仅存《梧桐雨》、《东墙记》、《墙头马上》三杂剧全本及《流红叶》三折,疑属其四折残曲的[越调·酒旗儿]一支,《箭射双雕》残折;套数四套,小令 37 首,共 295 支曲子。我们研究白朴曲韵依据今人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并以《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影印之诸明本曲集校其个别误字。研究白朴词韵据唐圭璋《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 年 10 月)及上述王文才书的附编《天籁集编年》。

二

白朴词现存 104 首(王文才《天籁集编年》收有曲[小桃红],应除去),中有六首"清平乐",上下阕换韵,故共得 110 个韵段。白词的特点是长调多,一韵到底,含八韵字及八韵字以上的韵段数达 85,最长的一阕押 17 个韵字,即《摸鱼子·问双星》636 叶"许古户语处女度句

暮树诉浦渡苦雨驻路”(《 》号内,前为词牌名,后为首句。外边数字为《全金元词》页数)。白朴曲现存295支,曲子都是一韵到底,但白曲有十余支存在羼入他韵字的现象。

白朴现存词使用了21个韵部,下面将依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三大部分来叙述其词韵特点。现存白曲共使用了17韵,只有阴声韵与阳声韵,因中古入声字与阴声韵字同押。下面将白朴的曲韵与词韵并合缕述,一般各举一例,并加以讨论。

阴　声　韵

(一) 词—歌戈部:《秋色横空·儿女情多》641叶“多磨戈娥阿娑歌河他波娥何”。按,本部所含为《广韵》歌韵(举平以赅上去,下同)字及戈韵一等字。

曲—歌戈韵:套数[小石调·恼煞人幺篇]叶“寞破个”([ ]号内前为宫调名,后为曲牌名)。按,此韵所含除《广韵》歌韵及戈韵一等字外尚有若干古入声字(后面将集中讨论)。

(二) 词—家麻部:《木兰花慢·览香囊无语》640叶“纱他花家华沙瓜霞涯”。按,本部所含字为《广韵》麻韵开、合口二等字及佳韵之“佳涯”等。

曲—家麻韵:《梧桐雨》三折[双调·驻马听]叶“涯搭下家花洒纱瓦”。按,此韵所含多与词之家麻部同,惟增入若干入声字。

《广韵》歌韵之“他”字,《中原音韵》只收入歌戈韵,但在宋元即已有不少词人以“他”与家麻相叶,如苏轼《减字木兰花·琵琶绝艺》(下阕三四句)叶“家他”,张元干《满庭芳·三十年来》叶“沙华花涯家霞他差”,元好问《鹧鸪天·姚宋光明到此家》叶“家沙衙花华他”。白朴词使用“他”为韵字,一见于歌戈部(上举之《秋色横空》),一见于家麻部(上举之《木兰花慢》)。白朴现存曲中七次叶“他”,皆入家麻,不入歌戈,如《梧桐雨》三折[双调·落梅风]叶“花跨他下”。《中原音韵》于家麻韵漏收“他”字,是为失误。

(三) 词—车遮部:《沁园春·千载寻盟》635叶“车靴遮赊蛇嗟些奢耶斜”。按,本部均为《广韵》麻韵开口三等字,另“靴”为戈韵合口三等字。

宋代词韵家麻、车遮两部不分,如欧阳修《越溪春·三月十三寒食

日》叶“涯霞家车纱斜花”(下有黑点者为后世之车遮部字),杨炎正《水调歌头·踏碎九街月》叶“华家佳车花嗟遮鸦”。

曲—车遮韵:《墙头马上》三折[双调·驻马听]叶“杰阙烈车接谢别月”。按此韵大于词之车遮部,因很多古入声字进入,所含同于《中原音韵》之车遮韵。

(四) 词—皆来部:《江梅引·一溪流水隔天台》641 叶“台栽开来苔哀解崖怀台”。按,本部所含悉为《广韵》咍皆佳韵字。

曲—皆来韵:《墙头马上》二折[南吕·菩萨梁州]叶“钗客奶来乖债败改获”。按,此韵所含同词之皆来部,但纳入若干古入声字。

(五) 词—灰颓部:《风入松·使君高宴出红梅》635 叶“梅雷魁枚杯回罍颓”,《浣溪沙·世事方艰便猛回》647 叶“回培梅灰杯”。按,本部纯为《广韵》灰韵字。

在宋代词韵中,《广韵》灰韵字及泰韵合口字,与皆来部叶者多,如晏殊《采桑子·樱桃谢了梨花发》叶“催来开杯哀回”(下有黑点者为《广韵》灰韵字及泰韵合口字);也或与支微部字叶,如李纲《渔家傲·木落霜清秋色霁》以“霁碎水会至外泪意蕊醉”为韵;还有同一作家两叶的现象,如黄庭坚《绣带子·小院一枝梅》叶“梅开回杯来堆”,其《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叶“溪鹂霓衣徽杯为归”。灰韵字在中古音系里本为咍韵的合口字,在宋词韵中摇摆于皆来和支微二部间,在《中原音韵》里入齐微韵,可见这些字的语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变动中,而前于《中原音韵》的白朴词韵对灰韵字的处理办法是,绝不与皆来部牵混,然亦不阑入机微部,此颇发人深省,或许是这些字与机微部字尚有区别,或许是白朴用韵偏严。

(六) 词—机微部:《水龙吟·醉乡千古人行》630 叶“地寐蚁味翠里睡起”,《踏莎行·冻结南云》647 叶“吹坠瑞地翠醉”。按,本部含《广韵》支脂之微齐诸韵字(除去进入支思部的字)。

曲—齐微韵:《墙头马上》一折[仙吕·后庭花]叶“窥偎席期意已”(下有黑点者为《广韵》灰韵字),小令《中吕·阳春曲》叶“醉杯飞疾稀”。按,白曲之齐微韵所含字相当于白词之机微部加灰颓部,另纳入若干古入声字。

(七) 词—支思部:《清平乐·笠篌朱字》(上片)646叶“字是子事”,《清平乐·前村潇洒》(下片)646叶“姿时枝”。按,本部所含为《广韵》支脂之韵的精组、照组字。

宋人词,机微部、支思部及部分灰颓部字混而不分,故合称为支微部。如向子諲《水调歌头·天公深藏巧》叶“回梅支谁时奇衣飞”(下有黑点者为白朴词韵之灰颓部字,下有△号者为支思部字)。姜夔《江梅引·人间离别易多时》叶“时枝思携徊知题飞晖非萋衣”。

曲—支思韵:小令[中吕·阳春曲]叶“事词思儿时”,《流红叶》“四折残曲”[越调·酒旗儿]叶“至司肢事子市”。按,此韵内容相当于词之支思部。

(八) 词—鱼模部:《玉漏迟·睡香花正吐》641叶“土主所绪取语许女浦去苦雨”。按,本部所含为《广韵》鱼虞模三韵字。

曲—鱼模韵:《东墙记》楔子[仙吕·尝花时]叶“夫谋途步孤”,《墙头马上》四折[中吕·斗鹌鹑]叶“母女雨属祖”。按,此韵相当于词之鱼模部,但有古入声字叶入。

《广韵》侯韵、尤韵的唇音字如“母亩浮谋妇负否”等字在两宋词韵内或叶鱼模部、或叶尤侯部,如魏了翁《蝶恋花·早岁腾身》叶“路度母舞许数去举”,辛弃疾《感皇恩·七十古来稀》叶“有久妇母袖后寿酒”,也有同一词人两叶的现象,如姜夔《念奴娇·楚山修竹》叶“暑许趣苦遇亩处雨”,其《角招·为春瘦》叶“瘦柳岫手久亩首有袖秀溜候旧酒奏友”。可见这批字动摇于鱼模部与尤侯部之间。而至白朴词,尤侯部七首中只有一首内有“否”,即《水龙吟·绣衣揽辔西行》630叶“否酒九后昼首岫柳”。白曲的鱼模韵,除上举的“谋”、“母”外,尚有《墙头马上》四折的[中吕·十二月]中的“妇谋”,[上小楼]中的“妇”等均为韵字。

(九) 词—尤侯部:《沁园春·玉节星轺》634叶“优愁州流留稠筹游舟”。按,本部为《广韵》之尤侯两韵字。

曲—尤侯韵:《流红叶》三折[正宫·倘秀才]叶“柳沟久流头”。按,此韵同于词之尤侯部,唯有少数古入声字“遂烛”等叶入。

(十) 词—萧豪部:《玉漏迟·故园风物好》640叶“好倒草道觉抱

恼报捣闹晓老”。按,本部所含为《广韵》豪肴宵萧四韵字。

曲—萧豪韵:《梧桐雨》四折[正宫·呆骨朵]叶“庙朝熬高梆了”。按,此韵相当于词之萧豪部,但《广韵》铎觉药韵(入声韵)字派入若干。

阳 声 韵

(一) 词—监咸部:《水调歌头·疏云暗雾树》627 叶“潭龛昙探岚南谈骖”。按,本部字皆为中古音咸摄一等覃韵、谈韵字。

现存白朴曲无单独押监咸韵者。

(二) 曲—廉纤韵:小令[中吕·阳春曲]叶“俭甜钳严忺”。按,此韵所含为中古咸摄三四等盐严添韵字。

现存白朴词无单独押廉纤部者。

在两宋词人的用韵中,监咸部、廉纤部混而不分,如欧阳修《于飞乐·宝奁开》叶“蟾添鹣南男蚕兼帘”(下有黑点的字在白朴词韵里为监咸部字),郭应祥《西江月·碎影乱筛月地》叶“檐三淡嫌帘欠”。

(三) 词—寒桓部:《满庭芳·雅燕飞觞》642 叶“欢团翻斑鬟寒山鞍残”。按,本部为中古音山摄一二等寒桓山删韵字及三等元韵合口字(上例中的“欢团”为桓韵字)。

曲—寒山韵:《梧桐雨》二折[中吕·红芍药]叶“干弯珊鬟翻散寒残阑”。按,此韵所含为寒山删韵及元韵合口字。

在《中原音韵》里,另有桓欢韵,由《广韵》的桓韵字组成。白朴曲无单独押桓欢韵者。

(四) 词—先天部:《凤凰台上忆吹箫·笳鼓秋风》642 叶“边悬迁田轩筵前川烟”。按,本部所含为中古音三四等元仙先韵字。

两宋词人用韵,寒桓部、先天部混而不分,名之为寒先部。如晏殊《渔家傲·嫩绿堪裁红欲绽》叶“绽畔散乱万限恋面玩岸”(下有黑点者为《中原音韵》寒山韵字,有△号者为桓欢韵字),魏了翁《贺新郎·此别情何限》叶“限雁暖散万乱电划见泮眼免”。就是说,宋词的寒先部,白朴词韵析为寒桓、先天二部,而至《中原音韵》,寒桓更分为寒山、桓欢二韵,连同先天韵,计为三韵。

曲—先天韵:《东墙记》五折[五调·折桂令]叶“圆缘言浅娟悬迁

天”。按,此韵内容同词之先天部。

(五)词—侵寻部:《木兰花慢·倦区区游宦》639叶“阴心寻深吟襟临今林”。按,本部相当于《广韵》侵韵。

曲—侵寻韵:小令《越调·天净沙》叶“簪金阴愠襟”(内“愠”为真文韵字,可能与侵寻互叶)。按,此韵所含同词之侵寻部。

(六)词—真文部:《木兰花慢·记罗浮仙子》638叶“村樽痕根温论门昏魂”。按,本部所含为中古臻摄真谆臻文欣魂痕韵字。

曲—真文韵:《东墙记》一折[仙吕·油葫芦]叶“唇纷人信印魂问神”。按,此韵同于词之真文部。

(七)词—庚青部:《绿头鸭·黯消凝》642叶“凝清情荆亭名争灵青行生”。按,本部所含为《广韵》登蒸庚耕清青六韵字。

曲—庚青韵:《梧桐雨》一折[仙吕·金盏儿]叶“觥屏等赢轻程”。按,此韵所含同上,但有个别字,如“永”庚青韵、东钟韵两叶:《东墙记》二折[正宫·满庭芳]叶“影兵性明整名敬永盈”,《东墙记》四折《越调·斗鹌鹑》叶“空永风拢东钟”。

(八)词—江阳部:《沁园春·我望山形》634叶“康唐香妆江亡行乡凰榔”。按,本部所含为《广韵》江阳唐三韵字。

曲—江阳韵:小令[双调·驻马听]叶“肠娘梁上扬往”。此韵所含同上。

(九)词—东钟部:《秋色横空·摇落初冬》641叶“冬通容融风红浓拢逢重封中”。按,本部所含为《广韵》东冬钟三韵字。

曲—东钟韵:《东墙记》四折[越调·小桃红]叶“容重共穷送空胸”。按,此韵所含同上。

入 声 韵

词的押韵规律是:平声字互叶,上去声字互叶,入声字互叶。宋词有四个入声韵部:铎觉部、屋烛部、德质部、月帖部。

白朴词入声仍自互叶,但现存词作中未见押铎觉部(所含为《广韵》铎药觉三韵字)者,仅见下列三部:

(一)屋烛部:《石州慢·千古神州》642叶“谷鹿哭屋独玉束绿菊”。按,本部所含为《广韵》屋沃烛韵字,乃通摄入声字。

(二)德质部:《夺锦标·孤影长嗟》625叶“北德泣缉适昔迹昔湿缉

笔质夕昔息职”(右下小字为该字所属的《广韵》韵名),《满江红·过了重阳》633叶“日质泣缉湿缉觅锡橘术栗质寂锡笔质吸缉”。按,本部所含为中古深摄入(收p尾),臻摄入(收t尾)和梗、曾摄入(收k尾),如此众多的入声韵合叶至少可以说明三种入声韵尾已混同为一。

(三)月帖部:《念奴娇·露团渐冷》632叶“月月阙月雪薛睫叶别薛叶叶节屑说薛”。按,本部所含为中古咸摄入(收p尾)、山摄入(收t尾)。

古入声字在白朴曲里,与阴声字相叶,九个阴声韵除支思韵外,齐微、鱼模、皆来、萧豪、歌戈、家麻、车遮、尤侯八韵皆有古入声字,其如何分配同于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兹不赘述。至于具体字的派入,如“烛”分别见于鱼模韵和尤侯韵,“着”分别见于萧豪韵及歌戈韵,此与《中原音韵》同。但就现存白朴295支曲子观察,“客”和“额”只见于皆来韵,不见于车遮韵,“竹”只见于尤侯韵,不见于鱼模韵,此其异者。

在入声韵字问题上,白朴词韵与曲韵大相径庭。

三

两宋词人用韵侵寻、真文、庚青三部往往两部或三部互叶,如黄裳《瑶池月·扁舟寓兴》叶“姓认醒信影听冷问境定病径艇甚圣”(下有黑点的为侵寻部字,有△号的是真文部字),监廉、寒先两部亦常常通押,如谢逸《鹧鸪天·桐叶成阴拂画檐》叶“檐帘莲天传烟”(下有黑点者为监廉部字),德质与月帖二部亦然,如赵善括《满江红·三十年前》叶“月雪壁识屐石日液力”(下有黑点者为月帖部字)。而白朴词韵可分为21部,各自壁垒分明。然亦有可讨论者:

(一)《念奴娇·江山信美》631叶“物壁雪杰发灭发月”,其中“物壁”为德质部字,其他为月帖部字。但该词小序明言“用坡仙韵”,即袭用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韵。

(二)《满江红·云外孤亭》632、《满江红·行遍江南》632皆叶“客别血歇结月杰雪说”,其中“客”非月帖部,乃德质部字,是为二部混叶,但词序言“用冯经历韵”。犹有可言者:这两阕《满江红》如以曲韵衡量,后八字皆车遮韵字,“客”字在《中原音韵》里两属,一为皆来韵,一

为车遮韵,如是则通首皆叶车遮韵,“冯经历”原词以这种方式押韵可能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曲韵影响,白朴是曲家,依样和词自是情理中事。

(三)《春从天上来·枢电光旋》624 叶“旋乾燕莲前烟园联仙绵年天”,此从王文才《天籁集编年》,通首押先天部。唐圭璋《全金元词》“联”作“班”,“班”乃寒桓部字。

现存白朴曲共使用了 17 韵,无通首用桓欢与监咸二韵者,但此二韵中的个别字羼入他韵中。白朴曲韵有若干通叶现象,较重要的是:

(一)寒山、先天、桓欢偶叶。

《东墙记》五折[双调·沽美酒]叶“宣颜天殿见”,“颜”为寒山韵字,余为先天韵字。

《梧桐雨》二折[中吕·迎仙客]叶“甘绽间悭安践”,是为先天韵字“践”叶入寒山。

《梧桐雨》二折[中吕·普天乐]叶“限山盼雁鞍园安”,“园”是先天韵字,其他为寒山韵字。以《元曲选》、《元刊杂剧三十种》同曲牌作品排比,“园”的位置上或押韵或不押韵,白曲此首“园”字可能押韵。

《东墙记》五折[双调·梅花酒]叶“沿川原延鞭穿选銮边宣传”,“銮”是《中原音韵》的桓欢韵字,此处叶入先天。

《东墙记》五折[双调·水仙子]叶“喧缘怨然年断远圆”,“断”为桓欢韵字,排比同曲牌作品,“断”可能是韵字。

(二)廉纤偶叶先天,监咸偶叶寒山。

《东墙记》五折[双调·驻马听]叶“坚仙贱檐源眷选践”,“檐”为廉纤韵字。

《东墙记》五折[双调·得胜令]叶“前宣筵烟剑绵贤”,“剑”是廉纤韵字。

《梧桐雨》二折[中吕·迎仙客]叶“甘绽间悭安践”,“甘”为监咸字,排比同曲牌作品,“甘”可能入韵。

(三)庚青与东钟互叶。

《东墙记》四折[越调·秃厮儿]叶“东钟惊重”,“惊”为庚青韵字。

《东墙记》四折[越调·圣药王]叶“境中浓松重东溶”,“境”为庚青

韵字。

《东墙记》四折[越调·麻郎儿]叶“浓重萦弄”，“萦”为庚青韵字。

《东墙记》四折[越调·拙鲁速]叶“丛盈种共栊送梦”，“盈”为庚青韵字。

《东墙记》四折[越调·绵打絮]叶“庭风重拥逢中”，“庭”为庚青韵字。按，此曲首二句，《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作“深闺静悄，幽僻空庭”，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认为“庭”字失韵，改为“幽僻庭空”，是不明东钟与庚青通叶的韵例而误改。

《梧桐雨》一折[仙吕·金盏儿]叶“蒙盛敬卿情顶擎”，“蒙”乃东钟韵字。

《梧桐雨》一折[仙吕·混江龙]叶“兴醒鞓灯令拥呈”，“拥”是东钟韵字，排比同曲牌作品，“拥”可能入韵。

（四）其他。

《箭射双雕》残折[中吕·六幺令]似叶“士威议起欺随”，小令[仙吕·寄生草]似叶“思字事志非是”，“士”支思韵字，“非”齐微韵字，则是支思与齐微偶叶。《墙头马上》四折[中吕·耍孩儿]叶“诉古湖炉禄车福妻”，“妻”是齐微韵字。套数[小石调·恼煞人]叶“波索”，[小石调·恼杀人·伊州遍]叶“肚末苦着挫阁过锁”，据《中原音韵》，“索阁”是派入萧豪韵的入声字，“肚苦”为鱼模韵字。小令[越调·天净沙]似叶“簪金阴愠襟”，“愠”是真文韵字。

白曲的通叶现象多出于剧曲中。与小令、套数不同，剧曲多是长篇，现存白朴杂剧一折少则12支曲子（如《墙头马上》一折，《东墙记》一折），多则23支曲子（如《梧桐雨》四折），按规定，一折必须一韵到底，为了剧情的需要，故偶或采用邻韵，如寒山、桓欢、先天都是n尾韵；廉纤之与先天，监咸之与寒山都是主元音相同，而韵尾前为m，后为n。东钟与庚青的通叶可能与当时的北方方言有关，白朴是真定籍作家群的领袖，其他真定作家如李文蔚、尚仲贤、史九敬先的杂剧中也有这种现象，大都人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东平人高文秀、李好古的作品亦然。

四

宋代词人用韵总的来说,根据自己时代的通语,当然也有的词人偶或以方音入韵(福建、江西、浙江的词人尤其如此),或袭用前辈建立的用韵规范,或用韵有宽严之别,但宋词用韵有一个大致的模式,可分为 18 部。阴声 7 部:歌戈、家车、皆来、支微、鱼模、尤侯、萧豪;阳声 7 部:监廉、寒先、侵寻、真文、庚青、江阳、东钟;入声 4 部:铎觉、屋烛、德质、月帖。

白朴词韵较之宋人词韵有很大的差异。皆来、支微 2 部析为皆来、灰颓、机微、支思 4 部。至于家车、监廉、寒先各分为二,皆是洪细之别使然。

白朴曲韵的阴声与阳声两大类别与其词韵大致相同,唯词之灰颓与机微 2 部至曲合而为一,这与《中原音韵》完全一致。但在白朴剧曲中较多阳声韵的偶通和互叶现象,文学创作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可有一定的灵活性,而欲作为他人规范的韵书则不能如此。

在入声韵的问题上,白朴词韵仍承用传统的叶韵法,即入声独叶,而曲韵则与阴声通押。对白朴的创作用韵来说,这正是区分词韵与曲韵的分水岭。宋代词韵模式的阴声韵与阳声韵的叶法,白朴可以"改革",因那基本上是分部广狭的问题(当然有其深层根源);而入声韵的叶法,则是模式的核心所在,不得越雷池一步。如若认为当时已无入声,故白朴曲韵入声归并于阴声,那么词韵中的入声独叶法则是因袭传统。如若像另一派《中原音韵》研究家的说法,元代中原之音入声的喉塞音已削弱但仍能自成一调,周德清的"入派三声"的做法只是将与阴声相近的某些入声字暂时派入,"广其韵耳",那么白朴曲子用韵的实际情况与此相合。正由于它还是入声,所以在词里还是要独叶的。

兹列宋代词韵、白朴词韵、白朴曲韵、《中原音韵》分韵比较表于下。

	宋代词韵	白朴词韵	白朴曲韵	《中原音韵》
阴声	歌戈部	歌戈部	歌戈韵	歌戈韵
	家车部	家麻部	家麻韵	家麻韵
		车遮部	车遮韵	车遮韵
	皆来部	皆来部	皆来韵	皆来韵
	支微部	灰颓部	齐微韵	齐微韵
		机微部		
		支思部	支思韵	支思韵
	鱼模部	鱼模部	鱼模韵	鱼模韵
	尤侯部	尤侯部	尤侯韵	尤侯韵
	萧豪部	萧豪部	萧豪韵	萧豪韵
阳声	监廉部	监咸部	×	监咸韵
		×	廉纤韵	廉纤韵
	寒先部	寒桓部	寒山韵	寒山韵
			×	桓欢韵
		先天部	先天韵	先天韵
	侵寻部	侵寻部	侵寻韵	侵寻韵
	真文部	真文部	真文韵	真文韵
	庚青部	庚青部	庚青韵	庚青韵
	江阳部	江阳部	江阳韵	江阳韵
	东钟部	东钟部	东钟韵	东钟韵
入声	铎觉部	×	与阴声字互叶	派入阴声
	屋烛部	屋烛部		
	德质部	德质部		
	月帖部	月帖部		

注：×号表示无单独叶此韵者，或无此部韵字。

从上表可见：白朴曲韵与其后的曲韵专书《中原音韵》很为相似，而众皆公认《中原音韵》反映了元代的中原之音，因此白朴剧曲和散曲都是根据他自己时代的语音押韵的。白朴的词韵，除了在入声

韵字的措置上有异外，与其曲韵大体相同，这说明白朴词韵也是根据实际语言用韵的。白朴词韵对传统的宋代词韵既有同的一面，又有异的一面，而其同异的根源在于白朴时代的语音与宋代的语音，既有继承，又有变化。总之白朴词曲的用韵反映了语音的变化，它早于《中原音韵》数十年，是近代汉语语音史上的宝贵资料。

本文发表于《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 年。

白朴曲韵与《中原音韵》

提要 自本世纪初,《中原音韵》经钱玄同等名家表彰以来,中外研究论著蜂起,蔚为显学,然至本世纪末,就《中原音韵》而研究《中原音韵》,已至举步维艰的地步。须别寻蹊径,以元曲韵检核《中原音韵》的分部、归字、入派三声等举措,当为康庄大道。故笔者继廖珣英、曹正义二先生之后研究白朴曲韵,而作此文。

一

元代著名戏曲作家、戏曲理论家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韵》系戏曲学不祧之祖。而自本世纪二十年代起,经由钱玄同、赵荫棠、罗常培诸专家大力表彰,遂亦成为汉语音韵学的经典著作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日本、美国等国的学者竞相研究,论著以百计,时至今日,《中原音韵》之学已成为显学,可谓成果辉煌。

当然,《中原音韵》还有待作更深更广的研究,我们认为,从元曲用韵的角度来考察《中原音韵》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元代是北曲空前繁荣的时期,名家辈出,佳作迭现,洋洋大观,元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之一。周德清云:“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盛,则自缙绅及闾阎歌咏者众。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其难,则有六字三韵,‘忽听,一声,猛惊’是也。诸公已矣,后学莫及!”(《中原音韵序》)《中原音韵》的前半部分即是元曲韵谱,后半部分《正语作词起例》中很大部分内容也关乎曲韵。而元曲作品数量颇巨,今知有记载的元杂剧作家(包括金末和明初杂剧作家)在 120 人左右,现存杂剧有 160 多种;现存小令 3853 首,套数 457 套,残曲在外(据隋树森《〈全元散曲〉自序》)。按理,有如此可观的作品为依据,元曲用韵的研究应该得到充分重视,然而就笔者所知,仅有廖珣英《关汉卿戏曲

的用韵》(《中国语文》1963 年第 4 期)、曹正义《元代山东人剧曲用韵析略》(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1 年第 2 期)、杨耐思、蓝立蓂《元曲里的“呆”字音》(《语言学论丛》第十三辑,1984),因不揣冒昧,继诸贤之后研究元代大曲家白朴的用韵,并试图与《中原音韵》对比,显其同异。

二

白朴字太素,号兰谷,原名恒,字仁甫。祖籍隩州(今山西曲沃),其父白华为金朝官员,著名文人。1226 年(金哀宗正大三年)白朴生于汴京,1232 年蒙古军南下侵金,1233 年幼年的白朴为元好问抚养,被携离汴京北渡,居聊城、济南、冠氏。1237 年(蒙古太宗九年)白朴年十二,始由元好问送归其父,此后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县),故又为真定人。1261 年 36 岁南游,1280 年 55 岁居建康(今江苏南京),1306 年 81 岁游扬州(此依王文才《白朴年谱》说,见《白朴戏曲集校注》307—344 页),卒年无考。叶德均《白朴年谱》则止于“至元二十八年辛卯(1291),66 岁”,并云:“按朴之事迹可考者,已尽于此。”(见其《戏曲小说丛考》上册第 368 页,中华书局,1979 年)。

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载,白朴作杂剧凡 15 本。明正德十二年刊印的《盛世新声》收有白朴的《李克用箭射双雕》残折,则白朴剧作可知者共 16 种,遗憾的是现仅存《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裴少俊墙头马上》三杂剧全本,《韩翠颦御水流红叶》、《李克用箭射双雕》二杂剧的残折。白朴还作了若干散曲。笔者研究白朴曲子的用韵,系据今人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上述三杂剧的全本及两杂剧的残折皆被收录,第 143 页录载辑自《太和正音谱》的[越调·酒旗儿]一曲,《流红叶》残折缺[墙头花],《箭射双雕》残折缺[尾声],则是白朴现存剧曲实共 235 支曲子。《白朴戏曲集校注》又收有套数 4 套,含 23 支曲子,另小令 37 首,[仙吕·醉中天](疑是杨妃在),王文才断非白朴所作,我们仍置于研究范围内,故共 295 支曲子。现存白曲共使用了正宫、大石调、小石调、仙吕、中吕、南吕、双调、越调、般涉调共 9 个宫调。

王文才氏的《白朴戏曲集校注》(以下简称《戏曲集》)所录《梧桐雨》、《墙头马上》二剧系以明臧晋叔《元曲选》为底本,《东墙记》则基本据《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移录,皆曾参校他本,重要异文有校记。笔者研究曲韵时曾以《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继志斋《元明杂剧》、《古名家杂剧》、《新镌古今杂剧·柳枝集》等书中的有关内容参校,发现韵字的异文不多,且多与曲韵的研究宏旨无关。但亦有《戏曲集》因不谙曲韵而臆改致误,如《东墙记》四折[越调·络丝娘]作:“粉花笺写下更长漏永,专诉着瘦减香肌玉容。写罢了眉尖一皱,更教人悲痛。”“皱”,《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1939年商务印书馆覆排本《孤本元明杂剧》均作“纵”。而《元曲选》中使用[越调·络丝娘]的十剧《合汗衫》、《小尉迟》、《倩女离魂》、《丽春堂》、《举案齐眉》、《两世姻缘》、《赵礼让肥》、《㑳梅香》、《萧淑兰》、《望江亭》共11支,《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徐沁君校点,中华书局,1980年)中的6剧《疏者下船》、《汗衫记》、《东窗事犯》、《七里滩》、《周公摄政》、《衣锦还乡》共6支皆于第三句押韵,曲律要求押韵,故白朴用“纵”。又,元好问套数[双调·乔牌儿]:“病将愁断送,愁把病来弄。春山两叶愁眉纵,断肠诗和泪封。”马致远《汉宫秋》一折:“眉头一纵,计上心来。”此亦可证王文才先生臆改为“皱”之误。

研究白朴曲韵,第一步工作是确定韵字,这比勾稽诗韵和词韵的韵字要难得多,原因是曲的韵律十分复杂,尤其是剧曲里数量众多的衬字干扰了曲韵的辨认,而迄今尚无一本“完”而且“善”的曲韵书。笔者辨定韵字的主要方法是排比同曲牌的曲子。“正宫”、“大石调”、“仙吕宫”三个宫调的多数曲子,王玉章的《元词斠律》(商务印书馆,1936年)据《元曲选》作了排比,故尽量利用其成果。惜乎该书只出了上编,而“小石调”、“中吕”、“南吕”、“双调”、“越调”、“般涉调”则付阙如。笔者和畏友宁继福自制《元曲选》全部索引,以资排比。另对《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也依法炮制。隋树森先生的《全元散曲》也是我们排比曲韵的重要资料。但剧曲与散曲的“习惯”要求似乎也有差异,如[中吕·迎仙客]首句,散曲58首中24首不叶,34首叶;《元曲选》36支曲中10支用韵;《元刊杂剧三十种》11支中3支入韵。

现存诸种曲谱当然是我们经常查阅的重要参考书,如今人吴梅

的《南北词简谱》、王玉章《元词斠律》、涂宗涛的《诗词曲格律纲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唐圭璋的《元人小令格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年新二版)及明人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李玉的《北词广正谱》、清代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还有 *Yuan Music Dramas: Studies in Prosody and Structure and a Complete Catalogue of Northern in the Dramatic Style*(《元代北曲之结构与曲律及金元戏曲北词谱》), by Dale R. Johnso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1980。

三

系联归纳,以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曲韵 19 韵来衡量,白朴剧曲及散曲的用韵情况如下表:

白曲用韵情况表

	剧　曲	散　曲
一 东 钟	东墙记四折[越调]14 支	天净沙 2 支　德胜乐 1 支 阳春曲 1 支
二 江 阳		驻马听 1 支　阳春曲 1 支 小桃红 1 支
三 支 思	[越调·酒旗儿]1 支[①]	阳春曲 1 支　寄生草 1 支
四 齐 微	墙头马上一折[仙吕]12 支 箭射双雕[中吕]14 支	天净沙 1 支　德胜乐 2 支 阳春曲 2 支
五 鱼 模	梧桐雨楔子[仙吕]2 支 墙头马上四折[中吕]13 支 东墙记楔子[仙吕]2 支	德胜乐 1 支　阳春曲 2 支
六 皆 来	墙头马上二折[南吕]13 支 东墙记三折[中吕]16 支	德胜乐 1 支　醉中天 1 支
七 真 文	东墙记一折[仙吕]12 支	天净沙 1 支　阳春曲 1 支

续　表

	剧　曲	散　曲
八寒山	梧桐雨二折[中吕]14支	青杏子5支
九桓欢	②	
十先天	东墙记五折[双调]13支	天净沙1支
十一萧豪	梧桐雨四折[正宫]23支	庆东原1支　德胜乐1支
十二歌戈		恼煞人2支　伊州遍2支 尾声1支
十三家麻	梧桐雨三折[双调]20支	点绛唇7支　庆东原2支 天净沙1支　德胜乐2支
十四车遮	墙头马上三折[双调]18支	乔木查6支　驻马听1支
十五庚青	梧桐雨一折[仙吕]14支 东墙记二折[正宫]17支	
十六尤侯	流红叶三折[正宫]17支	驻马听2支　阳春曲1支 沉醉东风1支
十七侵寻		天净沙1支
十八监咸	②	
十九廉纤		天净沙1支　阳春曲1支
曲数总计	235支	60支

注：①《流红叶》杂剧残存[越调·酒旗儿]一支。"疑属四折残曲"，此曲叶支思韵。
②无通首押桓欢、监咸二韵的曲子，但此二韵有少数字叶入其他韵。

四

在白朴现存作品中，除桓欢与监咸二韵未见通首使用外，其余17韵并非都各自壁垒分明，若干韵之间有通叶，甚至这种合韵现象颇为突出。兹述如下：

（一）东钟与庚青互叶

1. 个别东钟韵字叶入庚青。

《梧桐雨》一折[仙吕·金盏儿]叶“蒙盛敬卿情顶擎”。
按,“蒙”为东钟韵字。《元曲选》共使用[仙吕·金盏儿]85次,皆首句入韵,《元词斠律》于白朴此曲“蒙”下注“借韵”。《元刊杂剧三十种》出现32次,首句皆用韵。

《梧桐雨》一折[仙吕·混江龙]似叶“兴醒鞓灯令拥呈”。
按,此曲最末两句为“多喒是胭娇簇拥,粉黛施呈”,“拥”为东钟韵字。现存白曲共用[混江龙]四支,《东墙记》一折押真文韵,其最末两句也是对句,为“憔悴了玉肌金粉,瘦损了窈窕精神”,“粉神”皆叶。《墙头马上》一折及套数中的[混江龙]于“拥”、“粉”处则不押韵。《元曲选》有[混江龙]98首,其中《金线记》、《争报恩》、《东堂老》、《楚昭公》、《梧桐雨》、《蝴蝶梦》、《救孝子》、《㑇梅香》、《金线池》、《误入桃源》、《盆儿鬼》、《罗李郎》于“拥”处用韵。考虑到白朴四支[混江龙]的押韵情况,《梧桐雨》一折中的“拥”字可能是韵字。

2. 一些庚青韵字叶入东钟

《东墙记》四折[越调·秃厮儿]叶“东钟惊重”。
按,“惊”为庚青韵字,《元曲选》中《赚蒯通》、《争报恩》、《楚昭公》、《来生债》、《老生儿》等共19剧皆于“惊”处押韵。《元刊杂剧三十种》之《疏者下船》、《冤家债主》、《介子推》等9剧亦全如是。

《东墙记》四折[越调·圣药王]叶“境中浓鬆重东溶”。
按,“境”为庚青韵字。《元曲选》19剧中《鸳鸯被》、《赚蒯通》、《争报恩》、《楚昭公》等18剧,首句皆押韵,唯明初人贾仲名之《萧淑兰》不叶。《元刊杂剧三十种》9剧中,《调风月》、《疏者下船》等8种首句皆叶,唯郑光祖《周公摄政》不叶。

《东墙记》四折[越调·麻郎儿]叶“浓重萦弄”。
按,“萦”为庚青韵字。《元曲选》出现[麻郎儿]19次,如《鸳鸯被》、《小尉迟》、《谢金吾》、《倩女离魂》等于“萦”的位置均用韵。《元刊杂剧三十种》之《七里滩》、《周公摄政》二剧全叶韵。

《东墙记》四折[越调·绵打絮]叶“庭风重拥逢中”。
按,“庭”为庚青韵字。《白朴戏曲集校注》此曲首四句为“深闺静悄,幽僻庭空。月轮展纸,儿扇屏风”(“空”为东钟韵字)。《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及覆排本《孤本元明杂剧》皆作“深闺静悄,幽僻空庭。

月轮展纸，几扇屏风"，李玉《北词广正谱》作"深闺静悄，幽僻空庭。月轮碾纸，几扇围屏"，王文才的校语云："作'空庭'，失韵。"则是不了解白曲庚青时与东钟通叶的韵例，臆改而失误。《元曲选》之《倩女离魂》、《丽春堂》二剧之[绵搭絮]皆于"庭"处押韵，《元刊杂剧三十种》中《调风月》、《冤家债主》、《周公摄政》三剧于"庭"的位置上押韵，《东窗事犯》则否。

《东墙记》四折[越调·拙鲁速]叶"从盈种共栊送梦"。

按，"盈"为庚青韵字。《元曲选》之《倩女离魂》、《丽春堂》、《两世姻缘》、《柳毅传书》四剧的[拙鲁速]皆于"盈"的位置上用韵。《元刊杂剧三十种》之《调风月》、《东窗事犯》、《周公摄政》三剧亦然。

（二）支思与齐微互叶

《箭射双雕》残折[中吕·六幺令]似叶"士威议起欺随"。

按，此曲系据《盛世新声》移录，首二句为"他道是纵横壮士，他道是末周德威"，其中"士"是支思韵字。但李玉《北词广正谱》以此曲作为其紧上之《六幺序》曲之部分，首句作"他道是纵横壮士周德威"，则"士"非韵字。但广正谱所录较今存明本曲集省减者不少。

小令[仙吕·寄生草]（欢饮）似叶"思字事志非是"。

按，"非"是齐微韵字，其他为支思韵字。《全元散曲》收[仙吕·寄生草]22 首（内一首重见），第六句即"非"位置上押韵者有查德卿一首及无名氏 5 首。《元词斠律》录臧本 68 支同调作品，其中《金线记》、《墙头马上》、《老生儿》、《儿女团圆》、《两世姻缘》、《金安寿》、《㑳梅香》、《单鞭夺槊》于此处叶韵。《元刊杂剧三十种》31 首内《调风月》、《老生儿》、《贬夜郎》、《周公摄政》用韵。白朴《墙头马上》一折[仙吕·寄生草]叶"密飞类碎系籍悴"，因此这首小令的"非"有可能是韵字。

（三）齐微与鱼模偶叶

《墙头马上》四折[中吕·耍孩儿]叶"诉古湖炉禄车福妻"。

此据《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本。《新镌古今杂剧·柳枝集》和《元曲选》本叶"诉古湖如曲车福炉"，则通支叶鱼模韵。

（四）歌戈与萧豪、鱼模互叶

套数[小石调·恼煞人]叶"波索"。

套数[小石调·伊州遍]叶“肚末苦著挫阁过锁”。

按,在《中原音韵》,“索”、“阁”为萧豪韵字,“肚苦”为鱼模韵字。吴梅《南北词简谱》卷一云:“小石调曲,作者绝少,欲取他曲比附,又无从搜采。”“此曲只白兰谷一套”。吴氏批评《太和正音谱》、《钦定曲谱》与《北词广正谱》之误析,故笔者据吴梅所辨,确定韵字。

(五)先天与寒山、桓欢互叶

1. 寒山叶入先天。

《东墙记》五折[双调·沽美酒]叶“宣颜天殿见”。

按,“颜”为寒山韵字。白朴杂剧使用[双调·沽美酒]3次,另2次为《梧桐雨》三折,《墙头马上》三折,皆于“颜”处押韵。《元曲选》42剧如《金线记》、《陈州粜米》、《冻苏秦》、《儿女团圆》、《渔樵记》、《青衫泪》、《隔江斗智》、《误入桃源》等均于“颜”处叶韵。《元刊杂剧三十种》9剧如《拜月亭》、《单刀会》、《博望烧屯》等亦然。

2. 先天叶入寒山。

《梧桐雨》二折[中吕·迎仙客]叶“甘绽间悭安践”。

按,“践”为先天韵字。凡押韵之文学作品末句必须用韵,故毋庸证明。此句末句为“因此上教驿使把红尘践”,明代李开先《词谑》嫌此字为先天,改“践”为“犯”。

《梧桐雨》二折[中吕·普天乐]似叶“限山盼雁鞍园安”。

按,“园”为先天韵字。该曲末三句为“伤心故园,西风渭水,落日长安”。《元曲选》内出现[普天乐]27支,在“园”位置上押韵的有《玉镜台》、《楚昭公》、《梧桐雨》、《合同文字》、《倩女离魂》、《王粲登楼》、《梧桐叶》、《误入桃源》、《百花亭》、《抱妆盒》、《赵氏孤儿》、《还牢末》12剧。另《墙头马上》四折[中吕·普天乐]末三句为“怎做家无二长,男游九郡,女嫁三夫”。脉望馆抄校本亦如是,《新镌古今杂剧·柳枝集》“家无二长”作“家无二主”,则叶韵。《元刊杂剧三十种》有[普天乐]的十剧中,《疏者下船》、《赵氏孤儿》、《范张鸡黍》、《焚儿救母》4剧在“园”的位置上押韵,另一剧似有脱文。故此《梧桐雨》二折[普天乐]中的“园”很可能是韵字。

3. 桓欢叶入先天。

《东墙记》五折[双调·梅花酒]叶“沿川原延鞭穿选銮边宣传”。

按,“銮”为桓欢韵字。《元曲选》录[梅花酒]35支,如《汉宫秋》、《张天师》、《墙头马上》、《冻苏秦》、《渔樵记》、《刘行首》、《碧桃花》等皆于“銮”处押韵。

《东墙记》五折[双调·水仙子]似叶“喧缘怨然年断远圆”。

按,“断”为桓欢韵字。《元曲选》34剧中《合同文字》、《玉壶春》、《蝴蝶梦》(二、四折)、《倩女离魂》、《扬州梦》、《王粲登楼》、《青衫泪》、《忍字记》、《红梨花》、《灰阑记》、《东坡梦》、《气英布》、《货郎旦》中第六句叶韵。《元刊杂剧三十种》13剧中《调风月》、《赵氏孤儿》、《紫云亭》、《周公摄政》、《追韩信》、《博望烧屯》在“断”的位置上用韵,有一剧文字上可能有脱漏。

(六)廉纤与先天互叶,监咸与寒山互叶

1. 廉纤叶入先天。

《东墙记》五折[双调·驻马听]叶“坚仙贱檐源眷选践”。

按,“檐”是廉纤韵字。白朴《梧桐雨》三折,《墙头马上》三折,小令四首[双调·驻马听]于第四句均押韵,《元曲选》36剧亦然,如《汉宫秋》、《荐福碑》、《城南柳》、《留鞋记》、《张生煮海》、《冯玉兰》。《元刊杂剧三十种》15剧亦如是,如《拜月亭》、《单刀会》、《追韩信》、《竹叶舟》。

《东墙记》五折[双调·得胜令]叶“前宣筵烟剑绵贤”。

按,“剑”为廉纤韵字。《元曲选》出现51次,如《汉宫秋》、《救风尘》、《墙头马上》、《虎头牌》、《桃花女》、《生金阁》、《冯玉兰》等皆于“剑”处用韵,《元刊杂剧三十种》出现16次,如《单刀会》、《遇上皇》、《替杀妻》、《焚儿救母》等亦如是。

2. 监咸叶入寒山。

《梧桐雨》二折[中吕·迎仙客]似叶“甘绽间难悭安践”。

按,“甘”为监咸韵字。《元曲选》36支同调曲子中,《楚昭公》、《梧桐雨》、《合同文字》、《王粲登楼》、《鲁斋郎》、《后庭花》、《桃花女》、《红梨花》、《冤家债主》、《梧桐叶》首句叶韵。《元刊杂剧三十种》11剧内《疏者下船》、《介子推》、《东窗事犯》、《焚儿救母》4者亦如是。

(七)真文与侵寻偶叶

小令[越调·天净沙](夏)似叶“簪金阴愠襟”。

按,“愠”为真文韵字。白朴《东墙记》四折[天净沙]叶“容松同痛胧”,小令一首叶“添甜檐簟缣”,皆为第四句用韵。《元曲选》5剧即《楚昭公》、《来生债》、《酷寒亭》、《盆儿鬼》、《看钱奴》悉于第四句叶韵。《元刊杂剧三十种》之《调风月》、《汗衫记》2剧亦如是。《全元散曲》108首(内有复收)中商衜4首,张弘范1首,严忠济1首,白朴2首,马致远1首,张养浩1首,乔吉4首,张可久32首,徐再思7首,吴西逸1首,朱庭玉1首,李致远1首,王举之1首,周德清2首,孟昉13首,汤式3首,无名氏7首共87首于第四句叶韵。因此似可认为“愠”为韵字。

五

为给《中原音韵》及元曲研究者提供数据,列下表:

白朴曲韵韵字表

依《中原音韵》次序排列,字的右下角为出现次数,若为1次,则不标出。

1. 东钟

平声　阴　东$_4$○钟中$_4$ 衷终○通○冲○空$_5$○风$_4$○鬆$_3$○功攻公$_2$○胸　**阳**　同$_4$ 桐鼕○穷○胧栊$_2$○浓$_4$○重○逢$_2$○丛○容$_4$ 溶蓉○蒙○红$_2$ 鸿　**上声**　种$_3$○拢○拥$_2$ 永$_2$○冗　**去声**　风○共$_2$○送$_3$○弄$_2$○控○痛$_4$○重$_6$○　纵○梦$_2$

2. 江阳

平声　阴　妆$_2$○光○香$_2$○妨　**阳**　扬○梁○肠○娘$_2$　**上声**　往　**去声**　样恙○上$_2$○唱

3. 支思

平声　阴　肢○思$_2$ 司　**阳**　儿○时○词　**上声**　子　**去声**　是市士事$_3$○字○志至

4. 齐微

平声　阴　机$_3$ 基○归$_2$ 闺○低$_3$○妻$_2$ 萋栖○西$_4$ 嘶○杯○威$_4$ 偎○非菲飞$_6$○溪欺○稀$_2$○衣$_4$○推$_2$○盔窥○催○锥○知　**阳**　离篱漓○媒$_2$ 眉○雷○随$_4$○齐$_3$○回○围$_4$○肥○期$_3$ 旗○移疑宜仪○提○垂○皮○迟$_3$○谁$_3$　**入作平**　实石$_2$ 射食拾○直$_2$○疾$_2$○

习席$_{2}$　**上声**　倚○美○已○里裏$_{3}$○底$_{2}$○起$_{4}$○你$_{3}$○喜○垒○水$_{2}$　**入作上**　只○七戚○湿$_{3}$○息○的$_{3}$○得○隙　**去声**　味○悴○议$_{2}$ 艺$_{2}$ 意$_{2}$○气$_{2}$ 器$_{2}$ 契○地$_{6}$○备辈被○唳○砌○细婿○醉$_{3}$○队$_{2}$○计系$_{2}$ 骑○闭○睡$_{2}$○退○碎○坠○治○势$_{6}$○擂类○珮辔○戏$_{2}$○内　**入作去**　蜜○密$_{2}$○力

5. 鱼模

平声　阴　居车○珠○疏$_{3}$○虚吁○孤姑辜○书$_{6}$○鬚酺○夫$_{2}$○初$_{2}$○都$_{2}$　**阳**　闾○如$_{4}$○无$_{2}$○模[1] 谋$_{3}$○图$_{2}$ 途○炉$_{2}$○舆愚○娱$_{3}$○除蹰○糊湖壶乎　**入作平**　毒突○属○俗○蜀　**上声**　语雨与宇○缕○主○祖○古○府○母○举$_{2}$○许○取○苦$_{2}$○女$_{2}$
入作上　福○烛○曲○哭○簇　**去声**　觑○住柱○绪○妒肚度○辅付妇$_{2}$○户扈护○诉○暮○路○顾○簿$_{2}$ 步○处○去$_{3}$○聚　**入作去**　禄$_{2}$○睦○辱○玉狱$_{2}$

6. 皆来

平声　阴　堦$_{3}$ 阶街○该$_{3}$ 垓○栽灾$_{2}$○钗$_{4}$ 差○台胎○哀$_{2}$ 埃○猜○挨$_{5}$○腮$_{4}$○歪$_{2}$○开$_{11}$○斋$_{2}$○乖$_{2}$　**阳**　来$_{9}$ 莱○鞋谐$_{2}$ 骸$_{2}$○排牌○怀$_{5}$ 槐○埋$_{2}$○捱$_{3}$[2]○才$_{9}$ 财○台$_{5}$ 抬$_{2}$ 苔　**入作平**　白$_{5}$○宅○划　**上声**　海$_{5}$○骇○霭○妳[3] ○解$_{5}$○改$_{3}$　**入作上**　策$_{2}$○格○客$_{4}$○摘侧○色$_{6}$○摔　**去声**　债$_{2}$○态$_{3}$ 泰○盖$_{2}$○爱$_{7}$○奈$_{4}$○害$_{7}$○带待$_{3}$ 黛○界$_{2}$○外$_{4}$○快○在$_{5}$○迈○赖$_{2}$○拜$_{2}$ 败○煞○赛
入作去　额

7. 真文

平声　阴　分$_{2}$ 纷$_{2}$○昏$_{5}$○因○身$_{2}$○春$_{3}$○跟○欣○真○新$_{2}$○滨○君○温$_{2}$○村○亲$_{2}$　**阳**　邻○频○人$_{10}$仁○伦○勤○门$_{3}$○论

---

① 《墙头马上》四折[中吕·满庭芳]第六七两句，王文才本作"他那三昧手能修手，模读五车书，会写休书"，则是两"书"字入韵，《元曲选》作"他那三昧手能修手模，读五车书会写休书"，则"模"、"书"叶韵，甚是。据D.R.Johnson书，此曲第六七两句均六字句，且为对句，又"手模"，不应拆开，义为"手印"，《任风子》二折[中吕·普天乐]，《遇上皇》一折[仙吕·天下乐]之"手模"可证。

② "捱"《中原音韵》有平去二音，现将白曲韵字"捱"姑置于平声内，《东墙记》三折[中吕·醉春风]第三句，《孤本元明杂剧》叶"捱"字，王本改为"移"，兹从前者。

③ "妳"即《中原音韵》之"奶"。

○文○辰$_2$○唇○巡○匀○焚$_2$○魂$_5$○神$_3$○存　**上声**　引○狠○忍$_2$○忖$_2$○粉　**去声**　阵○信○愠○尽晋○近○印○俊○顺○润○问$_3$○闷$_4$○训○困$_2$○寸○恨$_3$○嫩○褪○趁[①]

8．寒山

平声　阴　山$_4$○干$_2$ 乾$_2$○安$_3$ 鞍○姦间$_4$○看$_2$○关$_2$○斑班○弯○番翻○珊○悭○餐　**阳**　寒$_3$○阑$_3$ 兰襴○环$_2$ 鬟$_2$ 寰○残$_2$○闲$_3$○檀$_2$ 弹○繁$_2$○难$_3$○蛮○颜$_4$　**上声**　反○晚$_2$ 挽○板○简拣$_2$○产○罕○盏$_2$○眼$_2$　**去声**　汉翰汗○旦惮○万○按$_2$○灿○栈绽$_3$○盼襻○馔○慢$_2$○惯$_2$○间○办瓣扮○泛[②] ○限○雁$_2$○散$_3$

9．桓欢

平声　阳　銮　**去声**　断

10．先天

平声　阴　先仙$_2$ 鲜$_2$○坚○娟○边编鞭○喧○迁○轩○烟○偏○宣$_3$○川穿$_2$○天$_4$　**阳**　连○绵○然○前$_3$○钿○贤$_3$ 悬○延筵$_2$ 缘$_3$ 言$_2$ 沿○圆$_3$ 园原源○全$_2$○传$_2$○联○年$_3$　**上声**　远○卷○蹇○撚○显$_2$○浅○选$_2$　**去声**　愿$_2$ 怨○见○殿$_3$○宴○眷$_3$○面○便○羡$_2$○贱践$_2$○篆○恋

11．萧豪

平声　阴　箫潇绡消$_3$ 宵$_6$ 霄○凋○梢$_2$○娇$_3$○蕉焦○标○交○高$_3$ 膏皋○叨○骚○遭○朝$_2$○邀夭幺腰○飘$_2$ 漂○敲$_2$○烧○操$_2$　**阳**　饶○苗$_2$ 描○迢条$_2$○朝○熬$_2$○翘○袍○咷○槽　**入作平**　铎度○箔$_2$○着$_3$　**上声**　袅鸟○了$_4$○窈娆○悄○搅○老$_2$○恼$_2$○扫○早○倒$_3$ 捣○挑○沼$_2$○少○巧○晓○炒○草　**入作上**　角觉○索○剥○错○阁　**去声**　笑$_2$○调$_2$○爆瀑○抱报$_3$○衮○兆照诏○道$_3$ 到$_2$○叫$_3$ 觉○罩○貌$_2$○噪○庙○闹$_3$○窍○哨　**入作去**　乐约$_2$○幕寞○落$_2$ 乐$_3$○萼$_2$ 恶○虐

12．歌戈

---

① 《东墙记》一折[仙吕·寄生草幺]“郎才女貌皆相趁”，“趁”字脉望馆本及《孤本元明杂剧》本作“称”。

② 《梧桐雨》二折[中吕·古鲍老]“更带着瑶琴音泛”，“泛”诸本作“范”。

平声 **阴** 歌○过$_2$[1] ○波 **入作平** 着 **上声** 锁○舸○我 **入作上** 聒 **去声** 舵○挫○和○那○个○破 **入作去** 末寞○落

13．家麻

平声 **阴** 家$_6$ 加$_2$ 茄$_1$○沙$_3$ 纱$_1$○鸦$_2$ 呀$_2$○差○花$_{13}$○瓜 **阳** 麻$_2$○哗华$_3$○牙$_2$ 芽涯$_3$○霞$_4$ 遐○琶$_2$○茶$_3$○拿○咱$_3$ **入作平** 达踏$_3$○峡匣$_3$○伐$_2$ 罚○拔○杂 **上声** 马$_4$○洒$_3$○贾○寡剐○瓦○打 **入作上** 榻塌○杀$_4$ 霎○察○法$_2$ 發$_2$ 髮○甲$_2$○搭○飒$_2$ 撒○刮○八○掐$_2$ **去声** 驾嫁价架○跨○亚讶○帕怕$_3$○乍$_2$○下$_{13}$唬$_2$ 暇○化画$_2$ 话$_4$○那○罢$_3$ 霸○卦$_2$ 挂$_4$○骂 **入作去** 腊○纳○押○袜$_2$

14．车遮

平声 **阴** 嗟$_3$○奢赊○车$_4$○遮$_2$○些$_3$ **阳** 爷$_2$ 呆$_3$○斜$_2$ 邪$_2$○蛇○瘸 **入作平** 穴$_3$ 挟缬○杰$_3$ 碣○叠$_4$ 迭牒蝶$_3$○折$_2$ 舌○截$_3$○别$_3$○绝$_4$ **上声** 野也$_7$ 冶○者$_3$○捨○惹$_2$○扯 **入作上** 切$_3$ 妾$_2$○结$_5$ 洁○怯$_2$○节$_3$ 接$_3$○血歇蝎○阙$_2$ 缺○决○铁帖○撇○别$_3$ 憋$_2$○辙○折○雪$_3$○说$_3$ **去声** 舍$_2$ 赦$_2$○谢$_3$ 榭○夜○藉 **入作去** 灭○叶○业○冽○月$_4$○热$_2$ ○劣$_2$

15．庚青

平声 **阴** 更惊○生$_{11}$○扃○兵○灯○撑○称○英萦○轻$_4$ 卿○清$_5$○声$_6$○听$_3$ 鞓○星$_2$ 醒○觥 **阳** 平屏$_3$ 瓶$_2$○明$_5$ 盟$_3$ 名$_3$ 鸣$_3$ 冥○灵$_4$ 棂零泠陵○盈赢瀛迎○擎$_2$○行$_6$ 形$_1$○情$_{10}$○婷庭$_2$○澄呈程$_2$ 成$_6$ 城$_2$ 诚$_2$ 盛$_2$ 乘○横○宁$_3$ **上声** 景$_3$ 境$_2$○省○影$_3$○整$_3$○鼎$_2$ 顶○冷○等○永$_2$ **去声** 敬$_2$ 径镜○应$_3$ 硬$_2$○庆○命$_2$○挣○证$_2$○莹○病$_{14}$并凭○令$_2$○盛○性$_6$○娉聘○净静$_2$○幸$_2$ 倖兴$_3$○称○定$_7$○听

16．尤侯

平声 **阴** 揪$_2$○搜飕$_2$○休○鸥瓯$_2$○钩沟$_2$○兜○秋$_3$○幽$_2$○

① "过"有平去二音，姑置于此。

修羞○洲州舟$_2$○收$_4$ **阳** 游$_3$ 悠$_2$○侯○留$_2$ 流$_6$○柔$_3$○缪眸$_2$○楼搂○酬$_2$ 筹○毬○头$_{10}$投$_2$○愁$_2$ **入作平** 逐$_2$○熟 **上声** 友○柳$_2$○醜○久○手$_3$ 守○叟○偶○酒$_2$○走○口$_3$ **入作上** 竹烛 **去声** 又○昼○旧$_3$ 究$_2$○受$_3$○袖$_3$○皱○溜○候$_3$ 後$_4$○就$_3$○逗$_3$○彀○甃○嗅○瘦$_3$○僽○透$_2$ **入作去** 肉

17. 侵寻

平声 阴 金襟○簪○阴

18. 监咸

平声 阴 甘

19. 廉纤

平声 阴 缣○忺○添 **阳** 钳○檐严○甜$_2$ **去声** 剑俭

总计如下：

白朴曲韵分韵字数及使用次数表

	东钟	江阳	支思	齐微	鱼模	皆来	真文	寒山	桓欢	先天	萧豪	歌戈	家麻	车遮	庚青	尤侯	侵寻	监咸	廉纤	总计
字数	44	13	14	114	84	73	56	65	2	57	100	18	78	68	88	67	4	1	9	955
使用次数	89	17	17	189	113	186	97	105	2	88	147	19	159	136	190	128	4	1	10	1697

《中原音韵》未收字：

齐微：歧籍$_{\text{狼籍}}$膝职 皆来：歹$_3$ 碍$_2$ 获概$_2$ 杀 萧豪：椰靠$_3$ 桌 家麻：娃他$_7$ 痖煞 车遮：彻$_3$ 蜇辄烈$_2$ 咽捻 庚青：莺楹併幄另$_5$① 尤侯：俅叩 廉纤：簟

六

用其后的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衡量，现存白曲用了 17 韵，桓欢

① 白朴曲叶"映"两次，《中原音韵》有"暎"，《正字通》云："暎，俗之映字。"唐宋元法书亦多写作"暎"。

与监咸两韵字只零星地羼入他韵中。大体说来,《中原音韵》厘分 19 韵是符合元曲(我们这里只研究了白曲)用韵实际的。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此可谓“大同”。

但二者也有一定差异,最显著的是白曲有若干通叶现象。据现今所知,白朴作曲时并无曲韵专书可循,只能凭自己的口语用韵。当然,不同的作家有押韵宽严的某些区别,再次,出于剧情等的需要,虽名家有时也难免落韵(《墙头马上》一折[仙吕·混江龙]“一刻春宵”句,《元词斠律》注“应叶”,则是落一韵。套数中的[寄生草]“归绣帏”的“帏”字处亦落一韵)、趁韵或借用邻韵的现象。当然,哪些是方言音同,或用韵宽泛,或牵强叶韵,则有待研究。

白朴曲韵的独用与同用可以下表显示:

东钟	江阳	支思	鱼模	歌戈	皆来	真文	监咸	寒山	先天	廉纤	家麻	车遮	尤侯
庚青		齐微		萧豪		侵寻				桓欢			

注:隔以实线者表示彼此不相杂厕,有虚线相连者表示有互叶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通叶现象主要在剧曲内:

《东墙记》五折共 13 支曲子,主体押先天韵,但一支羼入寒山,两支杂入桓欢,两支叶进廉纤。又,《梧桐雨》二折共 14 支曲子,押寒山韵,然叶入监咸韵一字,先天韵二字。先天与廉纤互叶,寒山共监咸同用,即周德清以为大病的“开合同用”。

东钟与庚青的通叶最为突出:《梧桐雨》一折 14 支曲子,叶入东钟两次;《东墙记》四折 14 支曲子,5 支叶入庚青字。据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云:白仁甫为真定籍曲家之首,其他作家为李文蔚、尚仲贤、史九敬先等。他们的现存剧作也有东钟与庚青相叶的现象,如李文蔚《燕青博鱼》三折[中吕·滚绣球幺]叶“精清定棖鬆青证生灯明”,《圯桥进履》一折[朝天子]叶“童精幸横共定恐并脡命”,尚仲贤《气英布》二折[南吕·骂玉郎]叶“柄生并重成定”,史九敬先《庄周梦》一折[仙吕·那吒令]叶“成空凶用瞳”。如为真定籍作家的共同特点,即是方言问题。但关汉卿、马致远也有这种现象,也许在“中原”曲家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吧。

白朴曲韵有若干通叶现象,关汉卿及其他作家也存在或多或少

的类似现象，那是不是周德清的书大有问题？我们认为，周德清的书是正音之书，煌煌书名下明标着“正语之本，变雅之端”，他大声疾呼，要宗“中原之音”，要使戏曲家用韵一归于正。在《中原音韵》中责备杨朝英，指出他的[德胜令]以“檐帘恹尖恢恢”（廉纤）与“怨”（先天）同押，在《正语作词起例》中又指出杨朝英的[水仙子]以“名清英”（庚青）“印村”（真文）和“今寻”（侵寻）“开合同押，用了三韵”，痛斥杨氏“词之法度全不知，妄乱编集板行，其不耻者如是”。周德清嘲笑、严责同时的曲家用韵混乱，然而他推崇备至的前贤白朴、关汉卿、马致远又何尝没有通叶现象呢？也许是为贤者讳，也许是不敢忤权威。他要推行他的根据实际语言分韵，曲家应严格遵循的主张，故据“中原之音”而著此书。可以说《中原音韵》是“作”而不是“述”。

明王骥德《曲律》卷二《论韵》：“德清浅士，……其所谓韵，不过杂采元前贤词曲，掇拾成编，非真有晰于五声七音之旨，辨于诸子百氏之奥也。又周江右人，率多土音，去中原甚远，未必字字订过，是欲凭影响之见，以著为不刊之典，安保其无离而不叶于正者哉！”既说周德清采编前贤词曲以著韵书，又说他多江右土音，是自相矛盾。不过二说皆影响深远，尤以前者为甚。陆志韦先生的《释中原音韵》（《燕京学报》第31期，1946年）开题就说：周德清“因为唱曲的需要，把当时盛行的北曲的韵脚，用纯粹归纳的工夫，排列成十九个韵部”，“所以他的老师是关郑白马”。廖珣英先生也说：“《中原音韵》是归纳关汉卿和别的元曲大家的杂剧用韵来区分韵部的。”如果仅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怎样来对付前代和当代曲家中有同有异的各种合韵现象呢？只能说，周德清对“中原之音”有深刻的研究，据以审音定韵，有破有立，旗帜鲜明，绝非“述而不作”，所以《中原音韵》这部著作才有其永不磨灭的价值。

关于具体字的归韵，详见第五节白曲韵字表，略举数例以见其与《中原音韵》的同异，如“永”分别见于东钟、庚青，“烛”入鱼模和尤侯，“着”两属歌戈与萧豪。但“射”只见于齐微，“客”和“额”只见于皆来不见于车遮，“觥”只见于庚青不见于东钟，“竹”只见于尤侯不见于鱼模。可注意者，[小石调·恼煞人]“波”叶“索”，[伊州遍]“锁”等叶“阁”，“索阁”是《中原音韵》的萧豪韵字。按，中古铎药觉韵的入声字

重见于《中原音韵》的萧豪、歌戈二韵，白曲既以“阁索”叶歌戈，是不是《中原音韵》的歌戈韵漏收了呢？更堪重视的是白曲韵字中《中原音韵》未收者达31字(其中皆来的“杀”与家麻的“煞”也许是字形问题)，如果周德清真的下了纯粹归纳的功夫就不应漏收这些字，尤其是那些文学作品中的常用字。须要申言的是，本文所研究的只是白朴的现存作品，估计约占白朴作品的1/5，如若白朴全部作品传世，那与《中原音韵》的同处也必增多，而异处也必增多。

关于声调，首先，中古入声字在白曲中与阴声字通叶，《中原音韵》派入何声皆著之于谱，而在白曲中是不是也押入那一声呢？其次，有些非入声字在同韵内有两调，如“醒听过凭”等，怎样确定它们在某具体押韵位置上的声调呢？如能确定他们，以与《中原音韵》相较该是件有意义的工作。得凭同曲牌的作品排比，如《梧桐雨》一折[仙吕·醉中天]叶“凭擎扃静影听盟”，小令[醉中天]叶“在灾来杀白态腮”，要辨“凭杀白听”的声调，我们以《元曲选》所收同调作品44首，《元刊杂剧三十种》12首，《全元散曲》20首同部位的韵字各自排比，结果只能得到“凭”是仄声(因同部位的多是去声、上声和入声字，平声字只有两个)而不知它是去声抑或上声。“听”是去声(同部位的多是去声字，少数上声字，一个平声字)。“杀”字(中古入声字)只能定为仄声字。至于“白”字(中古入声字)，无法确定，因相当位置上的字分布百分比如下表：

	《元曲选》	《元刊杂剧三十种》	《全元散曲》
平	45.5%	50%	40%
上	29.6%	16.7%	25%
去	18.1%	33.3%	20%
入	6.8%		15%

又如《梧桐雨》一折[仙吕·醉扶归]第五韵字“听”字，以上表三书同曲牌的作品排比，相同部位的韵字分布很散，平上去入皆有一定数量，结果这一“听”字在白曲里该是何调，难定。古入声字更是难以确

定其声调，故本文第五部分古入声字的排列位置悉据《中原音韵》，并非从白曲或其他曲韵排比归纳得来，有些非入声字而具两调的又读字姑置于其中一处，皆不得已也。以元曲具体用韵来核校《中原音韵》入派三声是否正确，是有意义的，也是艰难的。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宁继福同志的大力支持，如为我制《元曲选》索引即是一端，高谊可感；周维培同志的帮助也令我感激。本文发表于《中原音韵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近读宁宗一《白朴杂剧创作研究综述》(《元杂剧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该书指出《东墙记》的作者问题有争议：一说白朴作，一说经明人篡改，一说乃元末明初无名氏作。看来《东墙记》用韵的特殊并非无因。又，我在研究白朴曲韵过程中迫切需要《元曲选》曲牌索引，宁继福兄为我制了一个宫调的曲牌索引，在其激励下我下决心完成了全部《元曲选》的曲牌索引，此后我的白朴曲韵的研究工作颇为顺利。我想曲学家对此索引当更为需要，拟公诸同好，若重印《元曲选》时，附上曲牌索引，岂非美事？

将现存全部元曲的用韵作穷尽式的研究，是一大好事，也是一大工程，需年轻有志者为之，于是我将这一课题交博士生邓兴锋同志，惜其至今只完成大都作家的用韵研究。

2002年吴葆勤同志用电脑制成全部元曲的曲牌索引，并研究了《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用韵。

2003年8月

致宁继福论《中原音韵》书

继福：

信和材料均收，感谢感谢。

大著《中原音韵表稿》的绝大多数论点我很同意，而且在教学中引用了。为了对你的赠书和赐函表示谢意，似乎应该写点什么，那就谈谈我在教学过程中偶得的一些看法和疑问吧，跟你讨论，请你指正。

关于《中原》的音系基础问题，是目前的争论焦点之一。关键似在“中原”之义。从李涪、陆游、虞集等人的话看来，“中原”不是指大都，李新魁同志的话我颇同意。提倡新说者往往要排斥大都，大都与中山很近，我看，当时的大都音应也在中原音即北音内。可否这样提：以今河南地区为主的北音(或北方话)，大都音也在这北音内，不应排斥，嫡系是河南音，旁支是大都音，是兄弟关系。宋元人笔记中偶有记载方音之处，如宋张舜民《画墁录》：“晏丞相殊领京兆，辟张先都官通判。一日张议事府内，再三未答，晏公作色操楚语……”可见晏殊在京做大官，平素并不说家乡话，大概是操当时的“普通话”吧，只在“作色”时操“楚语”(看来是指江西临川话)。又如元郑元祐《遂昌杂录》：“邓光荐先生，文信国客也。宋亡，以义行著。所著鹧鸪词有云：‘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驼，天长地阔多网罗，南音渐少北音多……’”提到了“南音”、“北音”。如能从宋元人的笔记或其他典籍中多搜集些当时人关于语音分歧的直感的记载，也许对解决“中原”的词义和《中原音韵》音系基础问题有一定的帮助。这工作困难，要翻阅大量的书，沙里淘金。

我看，迄今对于汉语音韵的研究(包括《中原》的研究)都着重于语音系统的考察，而单个字音的演变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近年来，近代词义的研究方兴未艾，而近代字音的研究却很沉寂，《汉语大词

典》、《汉字大字典》正在编纂中，如果对字义、词义的变化写得很详细，而对字音、词音的演变不作探讨，未免是美中不足。我看单个字音的研究应该重视。我写了三篇宋词用韵考，曾利用《广韵》、《集韵》、《中原音韵》等与宋词韵字参稽比较，考察了二十几个字音。陆、杨诸先生研究了《中原》的东钟、庚青、尤侯、鱼模、歌戈、萧豪诸韵的重出问题，这还是带系统性的问题。讷庵本收 5866 字，不同字形数 5443，5866－5433＝433 字重出，大可研究。这类字中有若干是破读现象在《中原》的表现，我的《闽词韵考》曾涉及此，研究破读史应该使用《中原音韵》这项重要资料。你的这部书可否专列一章探讨重读问题？

陆志韦先生曾几次谈到，《中原》韵谱是周德清单纯机械地归纳元曲韵脚而成。你不同意，我赞成你的意见。元曲押韵字如果搜齐，估计不会有 5866 字。我是根据宋词韵字推测的，《全宋词》收词几近二万。我已研究了四千首，归纳其韵字，发现不少常用字都未被用作韵脚。我想，周德清除归纳元曲韵字外，还根据自己审音所立的间架，填进了很多未曾充作韵脚的字。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一再强调《中原》是纯归纳元曲韵字而成。

萧豪韵的特点是，唇舌牙喉一、二、三、四等重出。我认为还有一个重大特点：萧豪韵的内容就是等韵的效摄(还加了些转化而来的其他摄的入声字)。这是一个一二三四等俱全的不分裂的摄。山、咸、假摄在《中原》均分裂成洪细二韵(山摄还分裂出个桓欢)，故拟成 a、ɛ 两个主元音。若萧豪也分裂成二韵，则好办。事实是，未分裂，今音亦然。故陆、杨、邵三先生拟其第三类音为 iɛu，就不太适宜了(这样做就等于说萧豪分裂了)。因为它是不分裂的，内部又三类对立，故构拟其主元音时令人左支右绌。只好拟一等为 ɑ(唯一的 ɑ，使构拟不调谐)。这个想法对吗？萧豪的 uau 问题怎么解决的？

微母，陆先生拟为“w”。大著从之，写作 ʋ。我的意见是 v。陆先生说：“世界上恐怕没有一种语言可以把 f 阴调、f 阳调、v 浊音三项同时保存的。”我的方音(江苏泰州话)是：

f 阴平 夫 飞 分

f 阳平 扶 肥 坟

v 阴平 乌 威 温

v 阳平 无 微 文

纵行四者韵母同而因声母或声调而互异(其来源不一定都是古唇音字)。

日母,陆先生为"ʐ"。王先生为 ɽ,理由之一现代汉语 ts、tsʻ、s、tɕ、tɕʻ、ɕ 等皆无相配的全浊音。可是在《中原》如果承认有浊音 v,摩擦音 f、v 清浊相配,那么摩擦音 ʂ、ʐ 清浊亦可相配。王先生的见解对现代汉语来说,有道理,可是今北京话是 ɽ 否,最好用现代物理声学的实验手段证明一下就好了。

全浊入读全清问题,你的遥配阴阳证明法,好像是孤例,力量不够,可有其他例?我看"审以今音"法虽不是强有力,还是不得已的办法。

赵荫棠先生拟见系二三四等声母为 tɕ、tɕʻ、ɕ,引《韵会举要》:"交字属半齿。"如不同意 tɕ,怎么反驳、解释这一条?赵氏创始之功不可没,似应评价高些。

泰定时代,北曲作家南移。元曲在蒙古时代除北京外,山西也是重点。诸家对元曲的历史似乎还研究得不够,我这是放肆妄言了。

《中原》与《蒙古字韵》、《韵会》、《洪武正韵》什么关系?罗先生几位有解释。为什么同时代出了两类韵书?大作虽只研究《中原》,但对这个问题也讲几句为好,以为何如?

建议搞个索引。就写到这里吧,疑问请你解答,错误请你纠正,务必。

敬祝

撰安

国尧敬上 1981.8.17 于金陵

此文原载于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年)第 354、355 页。

《中原音韵音位系统》译者弁言

多年的闭关政策使我们对海外的学术动态茫然昧然，但是这十年来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即以音韵学界而言，回国讲学的专家联翩而至，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薛凤生教授是最积极最热心者之一。他几乎每年都回国，足迹遍海内，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及北京、南京、武汉、天津、成都、重庆、广州、徐州等地的大学多次讲学，他的《北京音系解析》一书就是在华中工学院研究与讲学期间整理出来的。他是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会员，该会的第二次和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他都不远万里赶赴参加，并宣读论文。今年夏又飞来北京参加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在武汉的《语言研究》杂志、北京的《语言教学与研究》杂志及香港的《纪念王力先生论文集》上都可以读到他的涉及语言学多分支学科的文章。（其实他对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他还是《元稹年谱》的作者。）可以说，国内语言学界对他不仅不陌生而且很熟悉，他对祖国、对学术的热爱，待人的直率与热忱赢得了普遍的推许与赞佩。如果转文，则"海内无知与不知，皆敬其人而重其文"。

1985年他第二次回到家乡江苏，在南京大学弘播学术时，我们初步了解了他对汉语音韵学的系统观点。随后我们读到了他的 *Phonology of Old Mandarin*，不胜佩服。在这本著作中，薛凤生先生为《中原音韵》所代表的"早期官话"，建立了一套严密的音位体系，逻辑地、系统地解释了《中原音韵》韵谱内各个同音字组显示的所有语音对立，制定了合理而简约的规则，阐明了从中古汉语至"早期官话"，从"早期官话"至现代汉语的发展。他将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与西方现代语言学的严密的理论与方法"融于一炉"，写成了这本独树新帜、别具风格的专著。我们认为应该把这本书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学人，它对我们如何扬弃（按，《现代汉语词典》的第一义，非第二

义)我国语言学的传统与借鉴国外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而合二而一,都会起到可贵的推动作用,其意义又何限于《中原音韵》研究之本身?

我们在1986年将此书译成中文,后携往美国,薛先生于1987年7月亲自校阅一过,并赠序一篇。

此书1972年写成,1975年由荷兰海牙Mouton出版社出版。薛先生总是自强不息,日新又新,研究不断深入。十余年来发表了好几篇高水平的论文,其中尤以《试论等韵学之原理与内外转之含义》为最(《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第35—56页)。该文初稿曾于1979年在第十二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法国巴黎召开)上宣读,获得当代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的高度评价(当时王先生尚不识其人)。王先生在《我的治学经验》一文(《高教战线》1984年8期,第14—19页)中说:"关于内外转的问题,罗常培先生写过文章,我看了不满意。我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觉得也没有解决问题。两年前看到美国的汉学家的文章,我认为他解决了问题。"就是指的薛凤生先生。薛先生在审校本书译稿时根据他近年的研究成果加了十六条"追注",虽对某些"旧说"有所修正,但其研究精神与方法是"一以贯之"的,这些修正对原书的基本理论毫无影响。

此书由鲁国尧、侍建国合译,钱厚生同志曾对部分初译稿提出若干意见。在著者本人阅校后,译者又进行了文字和技术加工,并按著者建议,为所引字例注出中古音。考虑到此书出版后三年,国内影印了讷庵本《中原音韵》(附陆志韦、杨耐思校勘记),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也是最佳的《中原音韵》版本,自较赵荫棠校订者为胜,有些证实了著者的推论,经原著者同意,译者据讷庵本加了少量"译注"。

著者和译者感到十分荣幸的是,本书承周祖谟先生题签。

译者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1987.12.15

《中原音韵音位系统》,[美]薛凤生著,鲁国尧、侍建国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年。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著作与元代语言

提要　元明之际的陶宗仪著述颇丰,《南村辍耕录》尤为知名。笔者从语言学角度对陶氏三书作了穷尽式的研究,指出陶著反映了元帝国存在多种语言文字及其相互影响的事实,揭出“方言”一词可指外族语言。笔者发掘并论证了陶氏的中州之韵入似二声说,这与《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说颇相径庭,后者一贯受人推崇,视作元代中原之音的唯一的真实记录,如今我们不能排除在元代中原地区入声还有其他的演变路线。笔者从陶著中钩稽出当时通语及大都话的若干语音现象及词语,还考察了元代的韵书流行情况与有关韵学的著作。

一

搜辑以往文献中的零星材料加以甄别、分析,以研究古代的语言现象,从事这项工作的代不乏人。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九“方音”条,即依据史籍,钩稽材料,论述历代方言,尤其是南北朝时代的方音差异颇为详明。此后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元时方音”条指出《古今韵会举要》所载有关入声的现象,“殆元时方音也”,又引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论及入声的材料一则。现代学者在这方面无论从理论上、从方法上更进了一步,罗常培先生《汉语方音研究小史》综述明清以来中外学者研究汉语方言的成果。周祖谟先生《宋代方音》剌取散见于宋代多种笔记中有关当时方音的条目,条分缕析,以窥一个断代的若干方音现象。前辈成果,启迪良多,不揣冒昧,仿作此文。

笔者的工作是,只就元明之际陶宗仪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从语言学和语言学史的角度作穷尽式研究。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居士,黄岩人。出身于下层官吏家庭,青壮年时热心于科举而不第。

1351年刘福通、韩林儿为首的红巾军在今河南及皖西北地区起义，次年攻入浙江，不久，张士诚、朱元璋两军各自占领江浙部分地区，东南战事连年，此时陶宗仪隐居于松江，谢绝张士诚的征辟，闭户著述。宋濂称他"积学能文辞，尝览传记一千余家，多士林所未见"(《书史会要叙》)。《说郛》即是他选辑汉魏至宋元的各种笔记，汇编而成的笔记丛书。他本人的著作则以《南村辍耕录》(以下简称《录》)为最著，毛晋《津逮秘书本〈桯史〉跋》云："唐迨宋元，稗官野史，盈箱溢箧，最著若《朝野佥载》、《桯史》、《辍耕录》者，不过数种。"孙作《南村辍耕录·叙》云："余友天台陶君九成，避兵三吴间，有田一廛，家于松南。作劳之暇，每以笔墨自随。时时辍耕，休于树阴，抱膝而叹，鼓腹而歌。遇事肯綮，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去则埋于树根，人莫测焉。如是者十载，遂累盎至十数。一日，尽发其藏，俾门人小子，萃而录之，得凡若干条，合三十卷，题曰《南村辍耕录》。"孙序作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丙午六月，笔者曾钩稽《录》中载有时间的全部条目，未见有迟于该年的。卷一"列圣授受正统"条末为"至正今二十六年"。卷二四"天陨鱼"条载"至正丙午八月"，是明言时间最晚的一条。称元为"国朝"、"本朝"、"我朝"、"国家"、"皇元"、"大元"、"我元"、"我大元"等，称元顺帝为"今上"，称太子为"今上皇太子"，称皇后为"今上皇后"，现存元刊本均提行空格，这都是由于陶氏写作时处于张士诚辖区内的缘故，张士诚起事后不久即降元，奉元正朔。《明史·太祖本纪》载至正二十六年秋八月辛亥，命徐达、常遇春"帅师二十万讨张士诚"。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九"本朝取天下先后"条载偏将"俞通海亦取太仓、崇明、嘉定、昆山、松江，遂从徐达进围苏州"。该年十一月癸卯徐达大军合围张士诚所据之平江(今苏州)。因此可以断定，《录》结集写定时间是元至正二十六年俞通海攻克松江前，《录》所载诸事(包括语言现象)不晚于1366年冬，即皆为元代事。卷二九"纪隆平"条称朱元璋军为"集庆一军"亦可为旁证。

孙作之序说宗仪"少工举事业，晚乃弃去，阖户著书"，可见《录》成书时已是陶氏中年。陶氏入明后著有《书史会要》，是一部法书学历史辞书，自序及宋濂序皆作于洪武九年(1376)。尚有《南村诗集》，结集更晚，内有一首诗，题为"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

日亥时大行皇帝崩，十六日皇太孙即位，十八日大赦天下，改明年为建文，感而恭赋”，另《己卯元日》诗中有“凤历新颁纪建文”句，是年为1399年。

笔者先将《录》中有关元代语言的资料爬罗搜辑，然后分成若干专题，予以论述或疏证，《书史会要》及《南村诗集》也受到重视。与之同时或相距不远的学者的有关记述被用作佐证。本文的重点在研究陶宗仪著作所反映的元代汉语和元代汉语学的情况，陶著中所涉及的其他语言情况以及语言间的相互影响也作适当的论述。《录》中关于汉语吴方言的材料特别丰富，另为专文。需要指出的是，《录》中有些关于元代的条目源于其师友笔记或文集，陶氏引录或改写，但未明言，对于研究元代语言来说，这些材料具有同等的价值，因此亦在爬梳之列。但是陶氏抄录的宋人著作如张世南《游宦纪闻》(见卷十七“古铜器”条)，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十八“叙画”条)、赵与时《宾退录》(卷十九“射字法”条)、其中亦有若干语言材料，一般来说，则割爱不论。

本文内凡引自《录》的，是以1923年武进陶氏影元刻本、1936年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吴县潘氏滂熹斋藏元刊本及中华书局1959年铅字排本互校，择善而从。《书史会要》则为1929年武进陶氏影洪武九年刻本。《南村诗集》则为1926年商务印书馆影汲古阁本《元人十种诗》本。

二

元朝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以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而著称。汉语是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而蒙古语在当时占有特殊地位，对其他各族语言影响甚大。《录》对此多有反映。

《录》多次提到“国语”、“国言”、“国字”，如卷一“列圣授受正统”条：“太祖……讳铁木真，国语曰成吉思。”卷二“杀虎张”条：“后以国言赐名拔突。”又“巴而思”条：“世祖赐名巴而思，国言虎也。”卷十“国字”条中的“国字”指的是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

《录》中称汉语为“华言”，卷八“狗站”条：“高丽以北，名别十八，华言连五城也。”汉语被称为“汉儿字”，卷二十“汉儿字圣旨”条：“世

祖招谕诏旨……白麻正书,北方谓之汉儿字圣旨。"此可以《老乞大》参证:"世间用着的是汉儿言语,我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地面里行的。"

从《录》可看出,有些蒙古语词在当时被广泛使用,渗透进汉语和其他语言中。如卷一"答剌罕"条:"答剌罕,译言一国之长,得自由之意。……至元壬申,世祖录勋臣后,拜王宿卫官袭号答剌罕。"又"大军渡河"条述元世祖赏一有功汉人,"遂封为答剌罕"。卷八"志苗"条:"杨完者……所统苗獠洞猺答剌罕等,……"卷二九"纪隆平"条:"杨完者统领苗獠洞猺名曰答剌罕。"杨为元末驻江浙的苗军首领。又如卷二"杀虎张"条中的"拔突"即"拔都",这作为勇士美称的蒙古词,在元代颇为通行。卷二"染髭"条记述元世祖忽必烈呼史天泽为史拔都。又如卷二八"处士门前怯薛"条:"杜清碧先生本应召,次钱唐,诸儒者争趋其门。燕孟初作诗嘲之,有'紫藤帽子高丽靴,处士门前当怯薛'之句。……怯薛则内府执役者之译语也。"又如卷十"马判"条:"所谓乌剌赤者,下马跪泣,……乌剌赤,站之牧马者。"由于元帝国版图广及今云南,所以蒙古语词"乌剌赤"也播至边陲。还有若干蒙古词《录》列专条讨论,如卷一的"云都赤"、"贵由赤"、"昔宝赤",卷二的"巴而思"。这些都是进入汉语的蒙古语译音词,元亡以后,也就消失。但"站"却例外,"站",《广韵》"俗言独立",《集韵》"久立也",《龙龛手鉴》"立也"。"驿站"之"站"乃是从蒙古语Jam借来的音译词,《录》多次使用,卷十"马判"条:"冯公士启梦弼尝言,为八番云南宣慰司令史日,尝因公差抵一站,日已暮矣。站吏告曰:今夜马判上岸,麻线须暂停驿程以避之。……比曙,抵前站。站吏惊曰……站之牧马者。"元以前叫"驿",元代使用"站",陶宗仪此条除"驿程"外用了五个"站"字。此条源自其师辈郑元祐的《遂昌杂录》,但郑著中只出现"驿"、"驿吏"二词。《录》卷八"狗站"条:"征东行省每岁委官……须用小车,每车以四狗挽之……站有狗分例。"在这部用汉语写成的著作中,"站"用得如此纯熟自如,可见这个音译借词已经深深渗透进汉语词汇中了。关于蒙古语词,可参看《韩儒林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有关部分。

当时的蒙语也必然受到汉语的影响，如《录》卷十四“妇女曰娘”条指出，在当时汉语中，“娘”为妇女通称，列举“老娘”、“师娘”、“夫娘”、“婆娘”诸词，中有二语：“娼妇曰花娘，达旦又谓草娘。”按，“达旦”即“鞑靼”、“达靼”、“达达”（卷二八“乐曲”条）指蒙古人，“草娘”一词当源于汉语。

在《录》中，其他民族及其地区笼统叫“番”、“夷”，如卷五“朱张”条：“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卷二七“金甲”条：“嘉定州大场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但西藏地区则特谓之“西番”（见卷二“诏西番”条，卷四“发宋陵寝”条）。“番”地语言也笼统谓之“番言”或“番语”，卷二三“猴盗”条：“番语嘱猴，适译史闻得。”卷二七“金果”条：“泉州万年枣三株，识者谓即四川金果也，番中名为若鲁麻枣，盖凤尾蕉也。”可能指的藏语。《书史会要》卷八“西夏国”条：“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指的西夏文、西夏语。《录》卷十“国字”条提到“外化蕃书”，卷三“木乃伊”条：“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按，“木乃伊”是阿拉伯语没药的音译，进入了汉语，直至今日。

《录》记载了若干其他非汉语词，卷二八“嘲回回”条：“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阿老瓦、倒剌沙、别都丁、木偰非，皆回回小名。……阿剌，其语也。”阿剌，现通译安拉，是伊斯兰教主宰宇宙之神的名称，原本阿拉伯语。还有西南民族语言的词儿，卷二九“称地为双”条：“尝读黄金华老人诗，有‘招客先开四十双’之句，殊不可晓。近读云南杂志曰：夷有田，皆种稻。……犁一日，为一双，以二乏为巳，二巳为角，四角为双，约有中原四亩地。”（明胡侍《真珠船》卷七亦载此事，大意相同，略有出入。）卷八“志苗”条载元末杨完者率领的苗军在江浙活动的史实，内有很多专门名词：“相谓曰阿哥，曰麻线，至称主将亦然。”“制衣……总名曰草裙、草裤。固脰以兽皮，曰护项。”“夜遣士卒伏路，曰坐草。”“抄掠曰检刮。”“掳得男女……壮者曰土乖，幼者曰赖子。”“人之投其党者，曰入火。妇人艳而皙者，畜为妇，曰夫娘。” 按，其中的“麻线”一词肯定为西南民族语言词，卷十“马判”条可证，详见下对“方言”一词的析论。至于“护项”、“入火”、“检刮”、“夫娘”等当为这支苗军在江浙汉族地区吸收的汉语词，卷十四“妇女曰娘”条：“苗人谓妻曰夫

娘,南方谓妇人之无行者亦曰夫娘。”可证。

《录》卷九“磨兜鞬”条,又卷三十“磨兜坚箴”条:“磨兜坚者,古之慎言人也。”当是译音词,第三字异,“盖译语无正音故也。”然源自何种非汉语,待考。

我们要着重讨论《录》中提到的“方言”一词,全书共出现四次。

卷八“温暾”条:“南人方言曰温暾者,乃微暖也。”这“方言”是通语的地方分支义,与今无别。

卷二一“喝盏”条:“天子凡宴飨,一人执酒觞,立于右阶,一人执柏板,立于左阶,执板者抑扬其声,赞曰‘斡脱’,执觞者如其声和之,曰‘打弼’。……盖沿袭亡金旧礼,至今不废。……‘斡脱’、‘打弼’,彼中方言,未暇考求其义。”此条述元帝宴飨之礼,明言沿袭亡金旧礼,则“彼中方言”当指金代女真语。

卷七“回回石头”条:“回回石头,种类不一,其价亦不一。大德间,本土巨商中卖红剌一块于官,……用嵌帽顶上,自后累朝皇帝相承宝重。……呼曰剌,亦方言也。”元代的回回,指信伊斯兰教者,分布于我国西部及中亚、西亚地区。

卷十“马判”条述冯士启为官云南,日暮抵一站,遇怪物,站吏告曰:“麻线须暂停驿程以避之。”后冒险抵前站,站吏惊曰:“是何麻线,大胆若是耶!”条末解释:“麻线,方言曰官人。”清康熙时贵州巡抚田雯所著《黔书》卷下“蚂蟥”条即袭自此,然作“麻色,方言官人也。”《录》卷八“志苗”条亦提及苗军中用词“麻线”,可见此“方言”是指西南少数民族语言。

《录》四例“方言”中有三例肯定指非汉语,这是值得特别重视的,遗憾的是在各种辞书中“方言”一词的释义都缺少这一义项。宋元时代的其他“方言”用例,详见拙文《“方言”和〈方言〉》,此处不赘。

陶宗仪的著作涉及那么多语言,记录了不少语言相互影响的事实,其前的宋代,其后的明代罕有其例,这是由于经历使然,时代使然。

三

陶宗仪的著作中有三条记载了当时“中州之音”入声的情况,迄

今尚未受到音韵学界的重视，现结合有关资料加以论析，以显示其在元代语言研究中的高度价值。

（一）《录》卷四“广寒秋”条：“虞邵庵先生集在翰苑时，宴散散学士家。……席上偶谈蜀汉事，因命纸笔，亦赋一曲曰：‘鸾舆三顾茅庐，汉祚难扶。日暮桑榆，深渡南泸。长驱西蜀，力拒东吴。美乎周瑜妙术，悲夫关羽云殂。天数盈虚，造物乘除。问汝何如，早赋归与。’……今中州之韵，入声似平声，又可作去声，所以蜀术等字皆与鱼虞相近。”

虞集这曲“广寒秋”是短柱体，两字一韵，十二句共二十七个韵字，除“蜀、术、物”外，都是《广韵》鱼、虞、模三韵的平、上、去声字，《广韵》此三韵在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里合为鱼模韵。“蜀、术、物”三字在《广韵》和《中原音韵》里的地位差异很大：

	蜀	术	物
广　　韵	入声烛韵	入声术韵	入声物韵
中原音韵	鱼模韵的 “入声作平声”	同　左	鱼模韵的 “入声作去声”

在唐诗、宋词里，《广韵》的入声字通例不和阴声的平上去声字相押，而在元曲则可。

（二）《录》卷十七“哨遍”条全文移录了钱霖（松江人，后为道士，更名抱素）的套数《哨遍》，用了“究臭后尤矛富”等韵字，在《中原音韵》多为尤侯韵字。但钱曲两次押“逐”，一次押“赎”，一次押“菊”，在《广韵》均为入声字。陶宗仪特别加了个案语：“乐府中押‘逐、赎、菊’字韵者，盖中州之音轻，与尤字韵相近故也。”

（三）《书史会要》尚有一条，其价值足与上二者相侔。卷七“帝师八思巴字”：“字之母凡四十一，……但只一字具平、上、去三声而无入声，入声轻呼，则同平声矣。”众所周知，八思巴字是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颁行的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元史·释老传》）。它确实也传留下了大量的译写汉语的文献，译写汉语当然是根据的汉语“中州之音”，而不会是方言。

有一条可作佐证。《录》卷二“杀虎张”条：“(张兴祖)后以国言赐名拔突。拔突即拔都，都与突，字虽异而声相近，盖译语无正音故也。”陶氏指出的平声字“都”与入声字“突”“声相近”，值得玩味。

关于元代汉语的“中原之音”有无入声问题，学术界聚讼纷纭，主张入声消失者大有人在，反对者亦颇众多，两派的主要依据都是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周氏多次言及入声，如“夫声分平仄者，谓无入声，以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也”，“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者，以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然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两派学者都引用这些话，但却加以不同的诠释，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让我们再看一段周德清的话：“平上去入四声：《音韵》无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前辈佳作中间，备载明白，但未有以集之者，今撮其同声，或有未当，与我同志改而正诸！”周德清入派阴声的做法当与元曲的用韵实际有关。虞集为周书作过序，其小令《广寒秋》及钱霖套数用韵也是入派阴声的。陶宗仪在抄录了曲子全文后，不厌其烦地就入声问题特别加了说明。我们应该仔细体味，方可得其三昧。陶氏是这样描述的：“中州之音轻(按，指入声字轻，蒙上文而省)”，故“逐赎菊”“与尤字韵相近”，“蜀术等字皆与鱼虞相近”，“都与突”“声相近”；“今中州之韵，入声似平声，又可作去声”。请特别注意，陶氏用的是“相近”、“似”、“可作”这样的字眼儿！“入声轻呼，则同平声矣”，只有在“轻呼”的前提下，入声与平声的关系，陶氏才使用“同”这个词。阴声字才能叫鱼虞，才能叫“尤字韵”，而入声字不够资格得此名称，只是与之“相近”而已，本声、外来区别何其严格！《中原音韵》自序于1324年，《辍耕录》结集于1366年，《书史会要》作于1376年，因此将陶、周二人关于入声的话结合起来考察的话，就令人倾向于元代“中原之音”确有入声存在。

我们不能止步，还要深究。据陶氏所云，入声首先与平声有某种特殊的关系，也与去声有关系。这是不是反映了当时的语言事实？带着这样的问题再去细绎《中原音韵》，就会注意到周氏同样重视入声与平声的关系：“夫声分平仄者，谓无入声，以派入平上去三声也。作平者最为紧切，施之句中，不可不谨。”“入声句中不能歌者，不知入声作平声也。”“入声作平声，施于句中，不可不谨，皆不能正其音。”

"中州之音"里,入与平的密切关系何以既受到周德清,也受到陶宗仪的青睐?按,《辍耕录》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涉及面极广,有关戏剧、元曲、韵书多条,皆未提及周德清,无因袭痕迹,卷四"广寒秋"条、卷十七"哨遍"条用的术语是"鱼虞"和尤字韵,而不是《中原音韵》的"鱼模韵"和"尤侯韵",亦可作佐证。因此,他的关于"中州之音"入声的记述才更宝贵。

在宋词里也存在少量入声字跟阴声字互叶的现象(笔者辑得七十余首、著有专文《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收入《音韵学研究》第二辑)。南宋沈义父《乐府指迷》谈到填词时的四声运用问题时说,若是"平声,却用得入声字替",这是十三世纪词学家的言论。张炎《词源》(钱良佑序于元仁宗延祐四年即1317年)卷下"音谱":"盖五音有唇齿喉舌鼻,所以有轻清重浊之分,故平声字可为上入者此也。"清沈祥龙《论词随笔》"入声可代平声"条解释为:"张玉田《词源》谓平声可代以上入,沈伯时(本文笔者按,即沈义父)谓入声可代平声。"于此可见周德清、陶宗仪前的学者认为平声与入声关系密切。

周、陶后有否这方面的资料?两位朝鲜李朝时期学者的著作值得重视。申叔舟(1417—1475),朝鲜文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曾主纂《洪武正韵译训》,并据《译训》编定《四声通考》。现存的《四声通考凡例》说,汉语"入声诸韵终声,今南音伤于太白,北音流于缓弛。蒙古韵亦因北音,故不用终声"(按,"终声"即韵尾)。这与《书史会要》的关于八思巴字母"便只一字具平、上、去三声,而无入声"之语若合符契。申氏又云:"且今俗音虽不用终声,而不至如平、上、去之缓弛。"入声毕竟与舒声的"缓弛"有别,此又可与《辍耕录》的"入声轻呼,则同平声矣"相互印证。

跟《辍耕录》差不多同时的《朴通事》和《老乞大》是古代朝鲜人学习汉语的课本,流传广远,后来卓越的朝鲜语文学家崔世珍(1473?—1542)用正音为之注音,即在每个汉字下注上汉语读音,这就是著名的《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前者所附崔著《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凡例》对汉语声调描写如下:

平声全清、次清之音,轻呼而稍举。

全浊及不清不浊之音,先抵而中按,后厉而且缓。

上声之音低而安。

去声之音直而高。

入声之音如平声浊音之呼而促急。

“平声浊音”即周德清的“平声阳”或今之阳平。请注意崔世珍描述入声“如平声浊音之呼”但较之“促急”。

朝鲜自1443年创制的“训民正音”起，就有在每字左侧加旁点表示声调的惯例。在《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凡例》的“旁点”条中，崔世珍说明了他的标记汉语声调的办法：

汉音平声全清、次清：一点。

汉音平声全浊及不清不浊之音：二点。

汉音上声：无点。

汉音去声：一点。

汉音入声有二音，……其声直而高，呼如去声者：一点；先低后厉而促急，少似平声浊音之呼者：二点。

按，崔世珍说，“汉音去声之呼与国音（按，指朝鲜音）去声相同”，“汉音平声全清、次清”“其呼与国音去声相似”。故二者虽同加一旁点，但仍有区别。详见陈植藩《论崔世珍在朝鲜语文和汉语研究方面的贡献》文（载《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再查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80年6月5日发行的《原本老乞大谚解》，据其谚文旁的声调标点可知，入声字或归入阳平或归入去声，例如：

全清入：北黑角　织惜的

次清入：脱克铁　匹促赤

全浊入：活特薄　直局轴

次浊入：劣脉莫　入蜜立

↓　↓

平声浊音　去声

如果此时再诵读陶宗仪的话：“今中州之韵，入声似平声，又可作去声。”我们就会惊叹，何其相似乃尔！从沈义父、张炎至陶宗仪，再至申叔舟、崔世珍，约二百余年，汉语中州之音一直是入声似平声，又可作去声。

陶宗仪揭示入似二声，而周德清的做法却是入派三声。唐作藩先生《汉语音韵学常识》(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普通话和《中原音韵》入声字派入平上去三声比较表”，收616字(按，《中原音韵》个别僻字未收)，据之统计古入声字在《中原音韵》里派入三声数字及比例：

平声阳	160字	26%
上　声	284字	46%
去　声	172字	28%

上声比例特高！廖珣英《关汉卿戏曲的用韵》(《中国语文》1963年6期)指出，以关曲用韵实际考核周书，周氏的“平声阳”、“去声”中所收的派入的入声字大体尚符合，而清入声字派入上声字则相差太远，例如关曲中清入声字有70%不派入上声。

再据唐表作“古入声字在今普通话归入四声数字及比例表”：

阴　平	77字	12%
阳　平	188字	31%
上　声	38字	6%
去　声	313字	51%

值得重视的是，阳平加去声是大宗，阴平和上声是少数，上声尤少。陶宗仪的元代入似二声说启示我们，阳平和去声在后代“溢出”小部分字，跑到了阴平和上声中去了，所以逐渐成了当今这个格局。中外众多专家研究近现代入声演变史，总要以《中原音韵》为出发点，至少绕不开这块“绊脚石”，如今可不可以换一个思路？

从前陶宗仪在《录》“广寒秋”条中的话只被学者引用来反对《中原音韵》无入声论，现在我们将陶氏的四则笔记的关于入声的论述辑聚在一起，挖掘出他的入似二声论，这与周氏的入派三声论矛盾，后者是否完全符合“中州之音”的实际，或者说，是否是“中州之音”的唯一的记录，不是不可怀疑的。元代通语的真实情况，有待深入研究。

杨耐思先生《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认为元代汉语的入声不带喉塞音尾，非短调，只保持一个独立的调位。不过如果相信陶宗仪的话，再以申叔舟、崔世珍作佐证，我们认为元代中原之音的入声，喉塞音尾已削弱而未全部丧失，令人有促急之感，

如果轻呼，即至末尾时气流舒缓，不是戛然而止，而后即可“同平声矣”，另一部分“又可作去声”。在元曲里入声字可与非入声字押韵，只要歌者唱到入声韵脚时，注意个“轻”即可。

人们会奇怪，一位生长在浙东、隐居在浙西（元时松江为浙西地，《录》卷二六“浙西园苑”条，卷三十“银工”条亦可证）的儒生能对“中州之音”熟悉吗？他的记述可靠吗？这需对其家世、生平作一番考证。其父陶煜（1286—1358），号白云漫士，据郑元祐《侨吴集·白云漫士陶君墓碣》云：“学成乃出游，足迹遍天下，京师王公贵人闻君言论，莫不惊喜倾下。”《书史会要》卷七载陶煜“早岁馆授京师时，学书于雪庵，得其典则”。“释溥光”“号雪庵”，“特封昭文馆学士、荣禄大夫”，“尤工大字，国朝禁扁皆其所书”。据郑元祐文，宗仪母赵德真，“故宋宗室孟本女也”。孙作《沧螺集·陶先生小传》述及宗仪向舅氏赵雍学书事，《录》卷十七“崔丽人”条亦称赵雍为舅氏，赵雍是赵孟頫长子，孟頫（1254—1322）历仕五帝，长期居于大都。这样的家庭环境使他在青少年时对北方必有所了解。《明史·陶宗仪传》：“师事张翥、李孝光、杜本。”三人《元史》皆有传，张翥官至翰林侍读学士兼祭酒，李孝光官至秘书监丞。《录》卷八“嫁妾犹处子”条：“先师钱先生璧……壬申科进士。”陶宗仪的老师多在大都做过“京官”。宗仪本人是否终身囿于江浙行省？否。他到过江汉地区，《南村诗集》二二《熟食日有怀》：“去年今日天台路，布袜青鞋扪薜萝。……孤灯客鬓愁中改，千里乡关梦里过。江汉悠悠为客泪，先茔回首倍滂沱。”他肯定到过大都，《拟古用陆国隐韵》诗：“古人重节义，出处盖弗苟。而我何为者？南北事奔走。”《九日次韵》诗：“重阳佳节古今同，老我凄凉思不穷。……两浙东西淹日月，一身南北类萍蓬。”又《长安市》诗：“长安市上多青楼，楼下美人娇以羞。千金买笑复何惜，万里作客还自愁。勋业未成惭宝鉴，英雄何限看吴钩。百年世事如云雨，老大徒伤易白头。”江汉为客，则曰“千里乡关”，蹀躞大都，故云“万里作客”。在元代，江南士子往往北上求官，流寓京师，时人有言：“南人求名赴北都，北人徇利多南趋。”《录》卷五“角端”条述师辈黄溍对他讲的话：“子将以举子经学取科第。”宗仪在青壮年时热衷功名，南北奔走，只是在遇挫后绝意仕进，又值战乱，乃隐居松江，直至老死。清康熙《松

江府志》卷三载宗仪《晓发松江》诗:"故喜吴淞堪寄食,不愁江汉尚屯兵。经纶事业成虚掷,一寸葵心白日倾。"这是他的自白。一本《辍耕录》,固然记载东南之事为多,然对于元代典章制度,宫闱秘事、文人逸事,记述亦不为少,卷五"碑志书法"条有"尝闻诸翰林大老"语,《录》卷二"端本堂"条:"右二事乃贡尚书师泰……所目见者,至正丙申间避地云间,每谈朝廷典故,因及此。"(卷三十"诗谶"条:"云间,松江别名也。")可见其交游。他对大都话、北方话很为留心,卷十四"妇女曰娘"条两述"都下"语,卷七"屈戌"条述北方语,卷六"亲家"条,袭自宋赵与时《宾退录》卷五"以亲字为去声",陶氏特加"今北方"三字。身在大都的洛阳人姚燧对歌妓微操闽音能迅速觉察(详下),那么有明显塞音入声尾的吴语区学者陶宗仪对"中州之音"的入声特点颇为敏感,因而一再记述,就不足为怪了。

四

《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众说纷纭,"中原"、"中州"所指为何,若能明确,对解决问题将有帮助,杨耐思先生著作对"中原"作了考证,我们再来看看当时人陶宗仪是怎样使用"中原"、"中州"二词的。

《录》中"中州"出现两次,一曰"中州之韵",一曰"中州之音"。在元代"中州"与"中原"为同义词,虞集为周德清《中原音韵》写的序,中有"高安周德清""自著《中州之韵》一帙"之语可为证。

《南村诗集》有《折杨柳送夏西畴谪居大梁》诗:"吾闻中原百战余,民物鲜少城邑虚。"大梁乃中原之地。《录》出现"中原"一词九次,叙及元末今河南、皖西北红巾军起义时使用三次(卷十四"张翰林诗"条,卷二七"旗联"条,卷二八"花山贼"条)。

《录》之"中原"所指多超出今河南地区,如卷十九"钱武肃券"条有"吴越虽禀中原正朔"语,"中原"指五代及宋,其统治区域超出今河南省。卷十"丘真人"载成吉思汗给丘处机的诏书:"天厌中原,骄华太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此"中原"指当时统治北中国的金,而且"北野"与"中原"对言。卷二"钱币"条:"今陛下龙兴朔漠,君临中夏。"元人吴莱《渊颖集》卷十二"书欧阳氏急救章解后序":"自我国家起自北土,经理中原。"用法类似。《录》卷九"谣言"条:

"民间谣言,朝廷将采童男女,以授鞑靼为奴婢","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之南,"民皆惊扰。此条以"直北"、"中原"、"江南"对言,可与下条比照:卷二三"醉太平小令":"自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京师"即大都。卷二九"称地为双"条谓云南之"双","约有中原四亩地",此"中原"绝不限于今河南。卷三"贞烈"条录烈女韩希孟诗,已统治北中国的元大举进攻南宋,破岳州,韩氏赋诗却曰"天果丧中原",当然她不会哀悼金之为元所灭,那么"中原"至少"包含"岳州。

明确指出地点的是卷二十"皇舅墓"条"河间路景州蓨县河浒一土阜,相传为皇舅墓。……至正辛卯,中原大水,舟行木杪间,及水退,土阜崩圮,墓门显露。"显然蓨县在"中原"区域内,今为河北省景县。

总之,考察陶著,可知元人心目中的"中原"并不限于今河南省,前于元的女真族统治下的北中国在其所指内,至少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陶宗仪的"中州之音"和申叔舟、崔世珍的"北音"是一贯的,他们都揭示了元明时期汉语入似二声的规律。

五

《录》有些条目反映了元代汉语语音的差异。卷五"邓中斋"条:"邓光荐先生剡,号中斋,卢陵人。宋亡,以义行著。其所赋鹧鸪诗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驮,天长地阔多网罗,南音渐少北语多,……"这描写了被俘北行的南宋人在途中所感觉到的方言差异,诗人以此渲染亡国之恨。卷二十"狷洁"条述南宋遗民郑思肖"誓不与朔客交往,或于朋友坐上见有语音异者,便引去。"郑系福州连江人,宋亡后隐居苏州,他认为的"语音异者",是指操"北语"的"朔客"。以上两则袭自郑元祐《遂昌杂录》。卷三十"祖孝子"条述建宁浦城人祖浩然寻母,"既渡江,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道途间,闻操南音者,必就与语。"此河南,指元代的河南江北行省,可见长江之北已不属于"南音"的范围。卷二二"玉堂嫁妓"条述姚燧见歌妓中有一人"微操闽音",问之再三,方知为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之后。嘉兴贝阙为之作诗,内有"或闻操南音,未解歌北风"句。查《元史·姚燧传》,燧乃洛阳人,仕宦不及闽地,而对微操闽音者敏感若此。13 世纪蒙古依次

灭金、灭南宋,使中国复归统一,北人南下,南人北上,促进了方言的交流,但在当时人的意识中,“北语”、“南音”是最大的差异,而吴方言、闽方言都属于南音的范围。

令我们感兴趣的还有《录》中反映当时语音现象的若干条目。

卷二“杀虎张”条:“张万户兴祖……后以国言赐名拔突,拔突即拔都,都与突,字虽异而声相近,盖译语无正音也。”在《中原音韵》鱼模韵里,“都”是平声阴字;“突”是“入声作平声”字,与“独读毒”同音,可证其声母不送气,与今异。陶宗仪说“都突”二字“声相近”,其最小语音对立当为入声字“突”还有轻微喉塞音尾(详前)。“译语无正音”说对后世颇有影响,顾炎武《日知录》卷九有“外国之音皆无正字”条,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有“译音无定字”条,卷十六“题讳填讳”条自注,“译音无正字”。凡此对研究古代语音很有启发意义。卷二九“骨咄犀”条:“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故曰蛊毒犀。唐书有古都国,必其地所产,今人讹为骨咄耳。”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诸字的关系:古—蛊—骨,前二者上声字,“骨”入声字;都—毒—咄,后二者为入声字,“咄”《中原音韵》未收,然在《广韵》与“突”同在没韵。两组字各自讹转,由于入声字阴声字“声相近”之故。

卷二四“精塑佛像”条述塑像名家刘元事,“凡两都名刹,有塑土范金、抟换为佛,一出元之手,天下无与比”,“抟丸又曰脱活,京师语如此”。明确指出这是大都话,此条源自虞集《道园学古录》“刘正奉塑记”。今北京东城区尚有“刘蓝塑胡同”。且看诸字的音韵地位:

	广　　韵	中 原 音 韵
抟	度官切(桓韵定母)	桓欢韵平声阳
换 丸	胡玩切(换韵匣母) 胡官切(桓韵匣母)	桓欢韵去声 桓欢韵平声阳
脱	他活切(末韵透母) 徒活切(末韵定母)	歌戈韵入声作上声
活	户括切(末韵匣母)	歌戈韵入声作平声

“抟换”、“抟丸”,叠韵;“脱活”亦叠韵。前者阳声,后者入声。若袭用

传统音韵学术语，不妨谓之元代大都话的阳入对转现象，阳声韵尾 n 脱落，故与入声韵母近似。此亦可证明桓欢韵与歌戈韵的韵母主要部分相同，有助于构拟。

卷六“亲家”条：“凡男女缔姻者，两家相谓曰亲家”，“今北方以亲字为去声”。按《广韵》去声震韵“亲，亲家，七遴切。”陶氏此条源于南宋赵与时《宾退录》，特加“今北方”三字，说明十四世纪北方话仍是如此，至今亦然。

卷二三“预知改元”条：“元统间，在都门，见一全真先生，……曰：‘此后当改至元，至元后改至贞。’……及改至正，则知贞者，正也。”在《广韵》、《集韵》，“贞正”二字韵母同，声母有知、章之别。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八“嫌名”条内原注，宋人程大昌《雍录》以贞女树为正女木，仁宗讳祯，“贞”为嫌名；英宗讳曙，“树”为嫌名，故代以“正木”，说明宋代知章仍别。从《录》此条可知元代二者声母也同，知章合流，韵母也同，与《中原音韵》合。细揣文意，事实跟预言的语音差异当是调之别，道士讲的是平声，听者以为是“贞”字，后来改元事实是“至正(去声)”。但今北京话“贞正”声母同，韵母有 -n、-ŋ 之异，这肯定是陶宗仪之后的音变。

六

陶宗仪对当时汉语中的若干词语饶有兴趣，列专门条目，考证出处，这些元代汉语词汇的资料，很有价值，今辑于下，为省篇幅，只作节抄，并附分析或疏证。陶宗仪对一些语词条目往往以“今”、“世”、“俗”起头，可见他们是当时通行的词语，《〈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文多有论述，此处从略。

卷七“官奴”条：“今以妓为官奴，即官婢也。”同卷“忠倡”条引宋陈世崇《随隐漫录》，“召官奴毛惜惜佐酒”。卷二二“先辈风致”条：“宪府设宴，命官奴小玉带佐觞。”在近代汉语中，此词出现颇早，如欧阳修《渔家傲》词“官奴为我高歌送”。此与古汉语中“官奴”异实，《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王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

卷九“面花子”条：“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唐昭容上官氏所制，……事见《酉阳杂俎》。”

卷十“重台”条：“凡婢役于婢者，俗谓之重台。”此系近代汉语通用词，元邵桂子《雪舟脞语》：“婢之婢，世谓之重台。评书者谓羊欣书似婢学夫人，米芾学羊欣书，故高宗谓米字为重台。”比喻更下一等。

卷十一“贤孝”条：“然俗谓男子布衫曰布袍，则凡上盖之服或可概曰袍。”卷十二“文章政事”条：“吕仲实……欲携布袍贸米于人，……戏作一诗曰：‘典却春衫办早厨。’”

卷十二“厕筹”条：“今寺观削木为筹，置溷圊中，名曰厕筹。”明胡应麟《甲乙剩言》“厕筹”条“北齐文宣帝如厕，令杨愔执厕筹”，“三藏律部宣律师上厕法，亦用厕筹”。按，厕筹是拭粪用的木竹小片，古印度俗用之，中国僧俗亦多袭用。

卷十二“乞求”条：“世之曰乞求，盖谓正欲若是也。然唐时已有此言。王建宫词：只恐它时身到此，乞求自在得还家。又花蕊夫人宫词：种得海柑才结子，乞求自过与君王。”按，皮日休《新秋即事》：“乞求待得西风起，尽挽烟帆入太湖。”敦煌变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乞求长大成人，且要绍继宗祖。”《西厢记》二本四折“乞求得效鸾凤”，王季思注“意犹今语巴不得。”

卷十四“妇女曰娘”条：“今乃通为妇女之称，故子谓母曰娘。”卷十二“贞烈墓”条：“娘死亦在旦夕。”今很多方言如济南、徐州、丹阳等皆然。“世谓稳婆曰老娘”，也是通语词。

卷十“三姑六婆”条：“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也。”其中“牙婆”指从事人身买卖的妇人，《水浒传》二十四回：“老身为头是做媒，又会做牙婆。”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二：“这光棍牙婆，见了银子，如苍蝇见血。”师婆即巫婆，卷十四“妇女曰娘”条：“女巫曰师娘。”元曲《罗李郎》三：“也不索唤师婆擂鼓邀神。”虔婆指妓院的鸨母，故也移作对妇女的詈辞。《琵琶记》十七出：“倒不如做虔婆顶老。”《拍案惊奇》卷二：“这正是老虔婆神机妙算。”稳婆即接生婆，又称老娘，卷十四“妇女曰娘”条：“世称稳婆曰老娘。”

卷十七“改常”条：“今人谓易其所守者为改常。”引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按元曲《渔樵记》三：“这厮原来是个忘人大恩、记人小恨、改常早死的弟子孩儿。”

卷十九“庞居士”条：“世斥贪利之人，必曰：汝便是庞居士矣。盖相传以为居士家资巨万，殊用劳神，窃自念曰：若以与人，又恐人之我若，不如置诸无何有之乡，因辇送大海中，举家修道，总成正果。”陶氏依释氏传灯录庞居士传，以为即襄州庞蕴。然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九述衡阳庞蕴事迹，二书皆以之为正人，但据《录》，元时民间以庞居士为贪吝之徒的代名词。

卷十五“邓思贤”条：“尝见人戏呼一哗讦者为邓思贤，初不可晓。后读笔谈，始得其说云，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盖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则是以邓思贤为讼棍的代名词。

卷二八“黄门”条：“世有男子虽娶妇而终身无嗣育者，谓之天阉，世俗则谓之黄门。”此条抄自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六。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七载玄应《阿毗昙毗婆沙论》第三卷音义云：“应言般荼迦，此言黄门。”周密列为专条，陶复引录，足证此词宋元时代一直存在于通语中。

又卷六“奴材”条：“世之鄙人之不肖者为奴材。”卷七“课马”条：“利市之说，到处皆然。”同卷“汉子”条：“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同卷“不耐烦”条：“不耐烦三字见宋书庾登之弟仲文传。”卷十“不中用”条：“不中用，不可用也。”卷十八“书手”条：“世称乡胥为书手，处处皆然。”卷十九“经纪”条：“今人以善能营生者为经纪。”这些元代通语的语词保存于后世的通语和方言中，因在传世的吴语文献中载有这些词，所以在拙文《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载《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中作了疏证，此不赘。

下面诸条涉及北方话或大都话的词语：

卷七“屈戌”条：“今人家窗户设铰具，或铁或铜，名曰环纽，即古金铺之遗意。北方谓之屈戌，其称甚古。梁简文诗‘织成屏风金屈戌’，李商隐诗‘锁香金屈戌’，李贺诗‘屈膝铜铺锁阿甄’，屈膝，当是屈戌”。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三“屈戌”条认为应作“屈戌”，黄生《字诂》“屈膝”条：“俗作屈戌，非。”似以陶宗仪之说为是，如《水浒全传》(中华书局上编所 1962 年版)第二一回：“那婆子瞧见宋江要走的意思，出得房门去，门上却有屈戌，便把房门拽上，将屈戌搭

了。”《红楼梦》七十三回：“原来是外间窗屉不曾扣好，滑了屈戌，掉下来。”（此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启功注释本，1964 年 2 月）注释：“屈戌，为了关锁门窗等物所钉的铁圈套。……屈戌，北方一般读成 qū xūr”。

卷十一“贤孝”条：“国朝妇人礼服：达靼曰袍，汉人曰团衫，南人曰大衣。”元代统治者管北中国人民为汉人，那么团衫为北方词。

卷十四“妇女曰娘”条：“都下及江南谓男觋曰师娘。”“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国夫人，皆曰娘子。”按，元曲《鸳鸯被》一折：“员外今年二十三岁”，“还不曾有娘子”。《水浒传》八回：“只见林冲的娘子号天哭地叫将来。”可证陶说。

卷二十“汉儿字圣旨”条：“至元”“宋扬州守臣朱焕以城降”，“世祖招谕诏旨”“白麻正书，北方谓之汉儿字圣旨”。

卷二三“嗓”条述大名王和卿与大都关汉卿相讥谑事。“王忽坐逝，而鼻垂双涕尺余”，关云：“不是玉箸，是嗓。”“凡六畜劳伤，则鼻中常流脓水，谓之嗓病。又爱讦人之短者，亦谓之嗓。”

卷二六“五龙车”条：“叶公李为宋太学生”，“及世祖平江南”，“官之”，“凡有军国大事，必问曰：曾与蛮子秀才商量否？”则是在元代南人被叫作蛮子。

卷二四“汉魏正闰”条载元世祖中统年间，郝经使宋，被拘于仪真，作《续汉史》成，“忽长叹曰：‘某辛苦十余年，莫不被高头巾辈已做了也。’”“高头巾辈”指儒生。郝经，山西人。

卷一“昔宝赤”条：“头鹅，天鹅也。以首得之，又重过三十余斤，且以进御膳，故曰头。”这可能是大都或辽金故地的词儿。

卷十七“奴婢”条记载了蒙古人、色目人的奴隶名称及有关词，有“奴”、“婢”、“驱口”、“红契买到者”、“陪送”、“抄估”、“放良”、“家生孩儿”等。

卷九“想肉”条：“淮右之军嗜食人”，“名曰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淮右之军指在今河南、皖西北起义的红巾军。

《录》也记载了其他方言的一些词语，尤以吴语为多，详见拙文《〈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再如：

卷八“玉腴”条：“江邻几杂志云：丁正臣赍玉腴来馆中。沈休

文云：福州人谓之佩羹，即今鱼脬是也。”

卷六“沙魘”条：“湖南益阳州，夜中同寝之人，无故忽自相打”，“名曰沙魘”。

卷七“梵嫂”条：“唐郑熊番禺杂记：广中僧有室家者，谓之火宅僧。宋陶谷清异录：京师大相国寺僧有妻，曰梵嫂。”

卷九“想肉”条录南宋庄绰《鸡肋编》所载高宗时登州范温军队的有关人肉的秘密语：“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

陶氏还记载了大量专门词，如卷二十“九姑玄女课”条、卷二七“裱背十三科”条、卷二八“乐曲”条，触目皆是，兹不论。

七

陶宗仪博综群书，故其著作涉及面极广，小学是其一。陶氏多次征引《说文》、《释名》、《玉篇》、《类篇》，也喜作考证（如卷四“无恙”、卷五“角端”、卷三十“巾帻考”等）。并多次引用韵书，评论得失，笔者拟利用这位通儒的著作（包括其所引录的同时代人的著作）考察多种韵书在元代流行和使用的情况，这也可以算作语言学史的一项课题的随机抽样调查吧。

明言引用《广韵》的有卷四“无恙”条：抄《广韵》“㺊”及“恙”训释，除缺两个虚字外悉同传本《广韵》。卷二四“刚卯”条：“《广韵》：‘㲻𢼊，大开坚也。’”笔者查了泽存堂本、北京图书馆藏宋本、宋巾箱本、小学汇函明内府本《广韵》，切韵残叶（P3695）、笺注本切韵（S2071）、王一（P2011）、王三及《集韵》、《五音集韵》，释语皆非“大开坚也”，何以如此？不解。

《录》卷十二“园池记”条：“唐南阳樊宗师”“所撰《绛守居园池记》艰深奇涩”，“偶得滦阳赵仁举笺注本”。赵注有很多反切，现以之与《广韵》、《集韵》、《增韵》、《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简称《附释文礼韵》）的反切用字作对比：

	参	硗	䶗	倔
赵仁举	所今切	口交切	苦下切	渠勿切

广　韵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衢物切
集　韵	疏簪切	丘交切	口下切	渠勿切
增　韵	同　上	同　上	无	同　上
附释文礼韵	梳簪切	同　上	无	同　上

	蜃	很	缦	睟
赵仁举	时忍切	胡恳切	莫半切	虽遂切
广　韵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集　韵	是忍切	无	同　上	同　上
增　韵	时轸切	下恳切	同　上	同　上
附释文礼韵	时忍切	无	同　上	同　上

	搏	帑	累	绦
赵仁举	补各切	於元切	力追切	土刀切
广　韵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集　韵	伯各切	於袁切	伦追切	他刀切
增　韵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附释文礼韵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无

	屃	巉	挠	墆	捩
赵仁举	虚器切	钼衔切	奴巧切	徒计切	力计切
广　韵	同　上	锄衔切	同　上	特计切	郎计切
集　韵	同　上	同　上	女巧切	大计切	力结切
增　韵	同　上	钼咸切	同　上	无	无
附释文礼韵	同　上	钼衔切	同　上	无	无

	鏖	欱	垫	歗	咍
赵仁举	薄猛切	呼合切	都念切	呼恬切	呼来切
广　韵	蒲幸切	同　上	同　上	许咸切	同　上

集　韵	白猛切	同　上	同　上	虚咸切	同　上
增　韵	薄猛切	同　上	同　上	无	同　上
附释文礼韵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无	同　上

	荟	嚪	婏	汩	沮
赵仁举	乌外切	虚郭切	鱼毁切	于笔切	将预切
广　韵	同　上	无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集　韵	同　上	无	五委切	越笔切	将豫切
增　韵	同　上	无	无	同　上	同　上
附释文礼韵	同　上	无	鱼毁切	同　上	同　上

赵氏的27个字的反切，切上字“钽”、“锄”实为一字，所以同于《广韵》的21字，同于《集韵》9字，《增韵》9字，《附释文礼韵》12字（按，四书相同的6字）。《广韵》在元代比较通行，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四次猛烈抨击《广韵》亦可作佐证。清邵长蘅《古今韵略叙录》说：“吾意当时虽有《广韵》、《集韵》，二书不甚通行。”恐系未究宋元史实的臆测之辞。

《录》五次提到“韵书”二字，指的哪本韵书？卷十二“厕筹”条“厕”字引“韵书”云如何如何，合于《增韵》而不合于其他三书。

卷三十“官制字讹”条：“按古官制取义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后世或讹其音者有矣，音虽讹而义则不讹也。如仆射……射音神夜反，关中人讹为寅谢反。韵书不取其义于神夜反中，却收在寅谢反下。尚书，……尚犹主也，……音时亮反。后世乃以尚书之尚讹为辰羊反，陆德明亦音平声，韵书遂两收之。洗马，……先，先之也，从先见反，今韵书作苏典反，字作洗。愚意此类并当从其正义，不当从其讹音。今人但见读仆射之射作神夜反，尚书之尚作时亮反，洗马之洗作先见反，便非哂之，不究其义故也。”此条讨论了“射、尚、洗”三字，检诸现存韵书，“射”字，合于《附释文礼韵》寅谢切“释云：仆射也，古者重武，以主射名官。关中语转为此名。”《集韵》释同，但为“夤谢切”；《增韵》“寅谢切”，但无“关中语”等七字。“尚”字这一段，基本与《集

韵》、《增韵》合。“洗”这段合于《增韵》,其他三书中未言及“洗马”。陶宗仪仅云:“今韵书作苏典反,字作洗。”而《增韵》“洗”字头下云:“亦作先”,紧接的字头“先”下云:“或作洗。”

《录》三十“巾帻考”条:“帢(乞洽反)……韵书:弁缺四隅谓之帢,一曰按头使下,故曰帢。《增韵》、《埤苍》皆曰帽也。”所引反切和释义合于《集韵》、《附释文礼韵》,不合《增韵》,在这段里“韵书”与《增韵》分别而言,殊堪注意,卷三十“屦舄履考”:“至若履者……毛氏曰:舟能载物,履能载人。草曰扉,麻曰屦,皮曰履。”引《增韵》则明确点出,此段确只与《增韵》合。

陶氏引《增韵》往往明言,一般不泛言“韵书”,诸条引“韵书”的反切和释义,与《广韵》距离颇远,跟《集韵》、《附释文礼韵》又不尽合,究为何书?这需了解宋代韵书的修纂史。宋初偃武修文,为了科举考试,重视官修韵书,真宗景德四年(1007)颁行《韵略》、大中祥符元年(1008)颁行《广韵》;仁宗时修成的则为景祐四年(1037)的《礼部韵略》、宝元二年(1039)的《集韵》。景祐《礼部韵略》颁行后,修订者颇多,孙谔、黄积厚、黄启中、张贵谟、吴棫等先后核正、补充。但皆亡佚。现存的只有南宋初毛晃、毛居正父子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简称《增韵》)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前者增改甚多,后者只是众多的一般修订本中的一种而已。

《元史·选举志》:“乡试、会试,许将《礼部韵略》外,余并不许怀挟文字”,因此《礼部韵略》及其修订本成了宋元文士的案头书。宋庄绰《鸡肋编》卷下“后因检《礼部韵略》‘恅’字注”云云,赵与时《宾退录》卷一:“今《礼部韵》‘尹’字下有‘钪’字。”周去非《岭外代答》述其以《礼部韵略》调查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词汇事。值得注意的是下列两条: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五“释豉”条:“韵书释‘豉’云:‘配盐幽菽。’四字甚工。”周密《齐东野语》卷九“配盐幽菽”:“昔传江西一士,求见杨诚斋,颇以该洽自负。越数日,诚斋简之云:‘闻公自江西来,配盐幽菽,欲求少许。’士人茫然莫晓,亟往谢曰:‘某读书不多,实不知为何物。’诚斋徐检《礼部韵略》‘豉’字示之,注云:‘配盐幽菽也’。然其义亦未可深晓。”可见罗氏所说的“韵书”即《礼部韵略》。现存《增韵》及《附释文礼韵》都不能与罗、周所言密合,当是其时流行

的是《礼部韵略》某种修订增补本。《鹤林玉露》乙编卷五“识字”：“杨诚斋云：‘无事好看韵书’。”这位杨万里另有一段与韵书有关的佳话，《鹤林玉露》甲编卷三“于宝”条：“杨诚斋在馆中，与同舍谈及晋于宝，一吏进曰：‘乃干宝，非于也。’问：‘何以知之？’吏取韵书以呈，‘干’字下注云：‘晋有干宝。’诚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师。’”笔者查《集韵》、《增韵》，皆无此语，唯五代刻本韵书残叶、《广韵》、《附释文礼韵》有“左传宋有干犨”语。杨万里及其属吏所见韵书当是另一种礼部韵。这种礼部韵，换了个后代的例证，此本却未能流传下来。因为景祐《礼部韵略》及其多种订补本十分流行，所以文士们（包括陶宗仪）迳以通名“韵书”指代之。

陶宗仪两次引用《韵会》，见《录》卷三十“屦舄履考”，引文悉同今传本。

令我们注意的是，以见闻十分广博著称的陶宗仪在《录》中未言及周德清及其《中原音韵》，虽然陶氏对戏曲非常熟悉，如卷二五“院本名目”条、卷二七“杂剧曲名”、“燕南芝庵先生唱论”条大量引抄戏曲资料，前已指出，卷四“广寒秋”条、卷十七“哨遍”条的“鱼虞”、“尤字韵”，也与《中原音韵》用语不侔。是否与周德清僻处江西，当时《中原音韵》流传不广有关？

八

从陶宗仪的著作还可了解一些元代音韵学史的情况。

首先要讲到的是杜本的《华夏同音》。《录》卷十“国字”条：“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有所编五声韵，自大小篆分隶真草，以至外化蕃书，及国朝蒙古新字，靡不收录，题曰《华夏同音》。”可见此书收集了八思巴字、汉字的各种书体，还有“外化蕃书”，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八“外域”一节关于日文、畏吾儿文等各种民族文字的内容或许即取材于杜本此书，既曰同音，又曰五声韵，可能是本涉及多种语言的声韵、词汇著作，惜乎不传。但是杜本其人应该表彰。《元史·杜本传》谓为清江人，至正十年卒，年七十五，则是生于 1276 年，卒于 1350 年。据孙作《沧螺集·陶先生小传》，宗仪曾师事杜本。陶氏《书史会要》卷七有杜本小传（谓本为武夷人），《录》卷十“国字”条、卷二八“处

士门前怯薛”条皆述其事迹。特别是叙杜本与浙省平章论声律之学及八思巴字，尤堪注意。杜本是南人，而其著作不仅涉及汉语，并且囊括蒙古等多种语言文字，这是庞大的元帝国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书史会要》卷七“盛熙明”条叙盛为豫章（今南昌）人，“能通六国书”，亦可为证。

《书史会要》还载有下列韵学著作。卷八“张天锡”条：“字君用，号锦溪老人。河中人，官至机察。……有《草书韵会》行世。”其书今存，张氏为金人。以下为元人，卷七“鲜于枢”条：“曾见手编《草韵》，下用小楷音释。”卷七“吴正道”条：“番阳人，世为儒家，著……《存古韵谱》等书，吴文正为序之。”从吴澄集知书全名为《隶书存古辨误韵谱》。《书史会要·补遗》：“李钧”，“溧水人”，“有所撰《稽古韵》”“传于世”。有些可能是按韵编排的书体字典，若不佚散，对于考证元代韵书体制必有裨益。上述《草书韵会》、《草韵》、《稽古韵》三书，清谢启昆《小学考》失收。

难能可贵的是元人对上古音已有正确的认识，陶宗仪对其师吾丘衍很为敬重，《录》中多条记述，卷二九“字音”：“吾衍子行《闲居录》云：‘舜生诸冯及冯妇等，皆音皮冰切，古不音符容切也。’”清代大师钱大昕引录其说而证明之，《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古无轻唇音”条：“吾衍谓《孟子》‘诸冯’、‘冯妇’之‘冯’皆皮冰反。按《水经注》，皇舅寺是太师昌黎凭晋国所造，考《魏书》，冯熙字晋国，文明太后兄也，封昌黎王，是魏时读冯姓皮冰反，故或作凭也。”

附记：1981年8月17日我在《致宁继福论〈中原音韵〉书》中说：“如能从宋元的笔记或其他典籍中多搜集些当时人关于语音分歧的直感的记载，也许对解决‘中原’的词义和《中原音韵》音系基础问题有一定帮助。这工作困难，要翻阅大量的书，沙里淘金。”在这前后，我看了若干宋元笔记，最后选择了《南村辍耕录》，钱大昕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四库馆臣却贬之甚力。我认为陶宗仪是元代最博学的学者，称他的书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不为过誉。于是我以陶氏一人的著作做研究对象，取穷尽式的研究法，目的不仅在辑聚、胪列其中关于元代语音、词汇、语言学史等现象的记录，而且从时空的角度

观察、论析其历史变化与地域差异。这些也许是跟前代、前辈学者“立异”之处。自本世纪初《中原音韵》被表彰以来，极受尊崇，然而陶宗仪的入似二声说使得周德清的入派三声说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再考虑到《中原音韵》的萧豪韵使所有的构拟家左支右绌(详见拙文《致宁继福论〈中原音韵〉书》)，那么周德清的书是否反映了“正宗”的中原之音，是否跟中原之音的实际完全符合，换言之，元代通语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就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这篇文章在1984年至1986年间数易其稿，我在《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4期)中曾引述了本文的一些观点。本文在写作、修改过程中先后得到杨耐思、鲍明炜、王锳、何九盈、吴葆棠、宁忌浮、孙建元诸先生之助。当时王显先生拟主编大型学术刊物《古代汉语研究》，将拙文《〈诗·豳风·东山〉“蜎”“蠋”二字音议》收入第一期，又将此文收入第二期，审稿时提了几十条意见，令我十分感动，1986年末我再作修改。而该刊迄今未能出版，王先生也归道山，拙稿也就一直束在北京了。今夏应蒋荫楠兄之约，取出十年前的旧稿，因《〈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发表在前，与之重复处则删削之，加上附记。本文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提要里有几句话，原作：“陶氏的中州之音入似二声说，与周德清《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颇相径庭，使人对后者是否跟语言实际完全相符产生怀疑。”平山久雄先生于当年12月3日赐函指教，承先生同意，谨录如下：“我读完了大文，对其丰富充实的内容(真像一所宏大的邸宅，过完一进又有一进，如此几遍，令人叹羡)、精确周密的考证，深深受到感动，甚至有一种畏怖之感。我对高见有一点不能赞同，即大文考证出元代中原的入声近似阳平和去声，以此怀疑《中原音韵》的入声派法是否符合中州之音的实际。我以为，当时中原一带入声的状况会是相当复杂的，如同现代北方话里(甚至北京话里)儿化韵母的分法相当错综(或零声母读法有各种分歧)那样。大文发掘陶宗仪关于中州入声的记载，并且将它与崔世珍的描述结合起来解释，这是对汉语声调史的一大贡献，不过窃以为不能以此否定《中原音韵》式的入声演变的情况曾经实际存在。如《七修类稿》‘杭音’一条的记载根据《中原音韵》式的入声分法才能得到圆满解释。现代胶东半岛一

带入声分法完全跟《中原音韵》一样(我所谓北京话A层亦如此),济南一带的山东方言只以清入变阴平为异(此可解释为,清入早先跟上声相近,后来由于调值的演变,变得跟阴平相近了)。由此可以推测,《中原音韵》的入声分法应该有相应的实际根据。我宁愿认为,元代的中原地区入声的变法除《中原音韵》式的一派以外还有接近阳平与去声的一派。大文认为'贞'字的韵尾由ŋ变为n是陶宗仪以后的音变,这未必是。最近看到台湾出版的周祖谟先生遗著《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第660页指出,'贞'有n尾似乎是很早就存在的方言性变异。151页表上'物'字作'入声作上声','上声'应是'去声'的排印错误,想必您早已改过了。"平山先生批评极是,谨受教。

1996年年底

此文发表后我专寄一份请近代音专家黎新第教授指正。黎教授特撰《"广'入似二声论'"献疑——与鲁国尧、李无未先生商榷》(《古汉语研究》1999年4期)对拙说提出批评。读了平山久雄先生赐函和黎新第先生大文,我同意如下的看法,元代中原地区有"入派三声"的方言,也有"入似二声"的方言。我现在认为,不应以陶宗仪说否定周德清说,反之亦非是,"挖掘"、表彰陶宗仪说显示了元代"中州之音"是多彩的,或多元的,而不像以前所知那样,是单元的。

2002年12月19日

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

——读《利玛窦中国札记》

提要 本文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关明代官话的几种关键性材料，对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作了新的探索。这些关键性材料是：一、当时除各地方言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Guonhoa)”。二、“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三、利玛窦认为：“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习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四、在从南京去北京的中途，同行的刘太监把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送给神父们，“因为这个男孩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

据此，本文推断：到北京去工作的外国人，学习当时“官方的国语”，要学习“纯粹的南京话”，说明当时“官方的国语”(即官话)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应该是代表着江淮方言的当时的南京话，而不是后来的北京话，这一推断反映着这些关键性材料的内在联系。本文所使用的材料是确定性的，根据这些材料所提出的推断也应该是确定性的。本文的推断成为近代汉语研究上一个新的视点。关于明代的汉语共同语，还有许多需要深入开掘的问题，而作为开掘的方向，本文所发现的新的路标，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李思敬撰**)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 年生于意大利的马塞拉塔城，1571 年加入天主教内忠于教皇的耶稣会，1582 年来到澳门，翌年进入广东肇庆，此后历韶州、南昌、南京，1601 年入北京，并深入宫廷，1610 年卒于北京。利玛窦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但他把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记忆术等向中国学者传播，无疑的，他对中欧文化的交流有着重要贡献。

利玛窦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徒，也是一位博学的学者。他来到语言、文字迥异的中国，经过艰苦的努力，熟练地掌握了汉语、汉文，他把《四书》译为拉丁文，还加了注释。他用汉文写作，著述甚丰，如《天主实义》、《四元行论》、《西国记法》、《交友论》、《二十五言》、《畸人十篇》等等，他的有关中国语言文字的著作，是最令研究汉语史的学人感兴趣的。现在能见到的是，在明末程君房（名大约，字幼博）编的墨谱《程氏墨苑》中的四篇利玛窦写的罗马字注音文章，前三篇被汇集，取名《西字奇迹》。1927 年北京辅仁大学用王氏鸣晦庐藏本影印出版，取名《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1957 年文字改革出版社重印，更名曰《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这四篇文章为《信而步海疑而即沉》、《二徒闻实即舍空虚》、《淫色秽气自速天火》、《述文赠幼博程子》，后三篇皆明言万历三十三年腊月朔题。罗常培先生曾据以研究，1930 年发表《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一文（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 本 3 分），首先从利玛窦这四篇文章中 387 个不同音的字归纳出声母、韵母、声调的系统。接着把它与另一来华的耶稣会士比利时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的《西儒耳目资》（1626 年刊行）进行比较，指出二者除去几处小的出入，大体并没有什么差异。

但笔者发现还有另一重要材料应该充分利用。利玛窦在晚年即 1608 年开始用意大利文记叙他在中国近三十年的经历，临终时基本完成，他并无意于公开刊行。不久金尼阁来华，他于 1613 年携带此手稿回罗马述职，途中译成拉丁文，并加了若干补充，1615 年在德国出版。封面题字有“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和“著者同会比利时人尼古拉·金尼阁”等语。这就是著名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此书的著者主要是利玛窦，但金尼阁的若干增补，也有不小贡献。此后各种欧洲文字的译本陆续出现，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3 年意大利文原稿于发现后第一次刊布。中国学者早就知道此书的存在，并且通过翻译的介绍而知道它的部分内容，但一直无完整的中译本，1983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何高济等译的中文本，现在我们有幸能读到全文。一位十六世纪的西洋传教士看中国，必有偏颇，但是应该说，这本书比较忠实而客观地反映了明末中国社

会的各个侧面。利玛窦说:“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并曾游历过它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本土的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习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可见此书的真实性与那些道听途说者不可同日而语。无怪乎三百多年来其影响持续不衰。

我们最有兴趣的是看书中怎样记述汉语。他们来到中国的第一关就是语言关,“当时传教尝试的最大困难是不懂(中国)语言”。书中多次记叙利玛窦自己和其他教士如何努力学习汉语的事迹。作为异国人士,他们对汉语必然是很敏感的,他们在中国长期居住,刻苦钻研,对汉语应当是很了解的。《札记》共分五卷,第一卷是序篇,是对中国全面而概括的介绍,若干见解堪称鞭辟近里,其中有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概述。利玛窦指出,中国各省,口语也大不相同,即各有方言、乡音。此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Guon-ho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这种国语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所有的行政长官都不是他们所管辖的那个省份的人,为了使他们不必需学会那个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这种通用的语言来处理政府的事务。官话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是不说的,虽然有教养的人在他的本乡可能说方言以示亲热,或者在外省也因乡土观念而说乡音。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该书第二卷还叙述了耶稣会士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奉命于1579年抵澳门,“他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就是学习中国语言,像人们所称呼的那样,学习这种语言的官话,即在全国通行的特殊语。”当时的澳门,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及从内陆到澳门做生意的人,“都不熟悉使用官话”,“本地的商人倒都懂官话但说得很差,因为他们习惯用他们的地方话交谈。”利玛窦于1589年初至韶州,拜访当地官员,自诩实际上比他们更懂得中国语言。1595年他写道,他对汉语官话及汉

文的熟练程度超过了其母语,“至于意大利文,我再没有勇气使用它了,由于已不习惯”。《利玛窦中国札记》明确地记述了明代官话的存在,是高于方言的全国共同语,通行于各地,尤在官员和知识分子中很流行,其普及程度连妇孺也懂,外国人学汉语就是学的这种官话,当然在边远省份,方言势力比较顽固的地区如广东,官话影响相对地小些。这些关于早期官话的记述十分宝贵。“官话”一词在元代尚未出现,明代谢榛(1495—1575)《四溟诗话》卷三:“及登甲科,学说官话,便作腔子。”何良俊(1506—1573)《四友斋丛说·史十一》:“雅宜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张位(隆庆、万历时人)《问奇集》曾云:“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这些是“官话”一词的较早用例,但是语焉不详。相形之下,利玛窦的叙述就显得清楚、明确多了,这大概是中国学人身在此中,习焉而不觉其可贵;而外国来客,最为敏感的就是语言,故详加观察,屡屡记述。

利玛窦是这样描写这个官话的声调系统的:共有五种声调,“非常难于掌握,区别很小而不易领会”。欧洲语言的一个音节,在汉语由于声调的不同,就至少具有五个不同的意义,“并且彼此由于发音时的声调不同而可能相去有如南极和北极”,每个字的确切意义是由声调决定的。利玛窦说:“我要冒昧地说,没有一种语言是像中国话那样难于被外国人所学到的。”第四卷谈到利玛窦等传教士 1598 年首次去北京活动未成,南返途中编成了《宾主问答辞义》等几套汉语字词表,因为汉语“共有五声”,他们这次创造了五种记号来标志五种声调。我们可以在现存的利玛窦写的那四篇罗马字注音文章中看到,阴平、阳平、上、去、入五声的调号分别为“ˉ”、“∧”、“\”、“/”、“∨”,位置在元音之上。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袭用之,其《译引首谱·列音韵谱问答》云:“音韵之学,旅人之土产;平仄之法,旅人之道听。音韵敢吐,平仄愿有请焉,何也?平仄清浊甚次,敝友利西泰首至贵国,每以为苦。惟郭仰凤精于乐法,颇能觉之,因而发我之蒙耳。”按,利西泰即利玛窦,郭仰凤即郭居静(Lazane Cattaneo)。罗常培先生 1930 年文中引用了这一段,但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对此事叙述则更为详悉:“郭居静神父对这个工作做了很大贡献,他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善于分辨各种细微的声韵变化,能很快辨明声调的不

同。善于聆听音乐对于学习语言是个很大的帮助。这种以音韵书写的方法,是由我们两个最早的耶稣会传教士所创作的,现在仍被步他们后尘的人们所使用。”郭居静的音乐才能是利玛窦素所敬佩的,《札记》第四卷第十二章记载了庞迪我(Diegeo de Pantoja)神父在北京宫廷教授演奏古翼琴的事,“庞迪我神父还是很久以前在利玛窦神父的建议下向很有修养的音乐家郭居静神父学的古琴。”由于《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明确记录,我们要说,这种借助音乐原理暗示汉语调型的记调法是在十六世纪末由来华的西方音乐家郭居静发明的。

《札记》这两段关于郭居静发明汉语官话声调记调法的文字,根据文意,可知是金尼阁的手笔。金尼阁后来在其著作《西儒耳目资》中完全继承了这种方法,并对明代官话的五声有所申述:“中华所用之音极少,而字则极多,……音少必难免同音之乱,故中华先圣,出巧法以救之,每总音乘五声,则音虽少而能多矣。”“平声有二:曰清、曰浊。”“余曾见有一书,分称阴阳者,则与清浊之义相合也。”“清平不高不低,如钟声清远,浊平则如革鼓冬冬之音,旅人所知如是,恐于五方未免有一二不相合耳。”“正音如是,或有不合,土音而已。”“仄声有三:曰上,曰去,曰入。五者有上下之别:清平无低无昂,在四声之中,其上其下每有二,最高曰去,次高曰入,最低曰浊,次低曰上。”我们可以将这些文字说明与暗示调型的记调法结合研究,揣测明代官话,至少是利玛窦、郭居静、金尼阁时代的汉语官话的五个声调的调值。清平(即阴平)肯定是个中平调——33。去声是高升调——35,上声是低降调——31。浊平(即阳平)是曲折调,可能是131或121,因为起点低,所以听感上就比上声还低。而入声可能是535或424的曲折调(问题在于入声若是带喉塞音尾或较短促,是很难形成曲折调的,或者它就是一个不促的独立调类)。还有,曲折调的起点和终点可能是齐的,也可能不那么齐。

令我们注目的是入声问题。元明时代汉语共同语中有没有入声,一直是聚讼纷纭的问题,很多学者主张入声已于此时消亡,这首先出现在若干关于《中原音韵》的论著中,其实,周德清“入派三声”的做法是否意味着入声消失,有不同的解释。《蒙古字韵》、《古今韵会举要》都有入声。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成书于1366年)卷四云:

“今中州之韵,入声似平声,又可作去声。”卷十七云:“乐府中押‘逐、赎、菊’字韵者,盖中州之音轻,与尤字韵相近故也。”其《书史会要》(刊于1376年)卷七云:“入声轻呼,则同平声矣。”十六世纪前期的朝鲜学者崔世珍的《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凡例》等著作也反映了当时的汉语有入声。笔者著有《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与元代语言》一文论及这个问题。如今《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的四篇罗马字注音文章和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更有力地证明了明代的汉族共同语即官话是有入声的,明末来华的西洋传教士的著作对我们了解十六世纪的汉语有着重要作用。

那末,《西儒耳目资》所反映的音系应该是官话而不是方言。有的专家根据此书曾得绛县韩云、泾阳王征之助,而认为它反映的是山西方音或西北方音。可是金尼阁在该书自序中说:“然亦述而不作,敝会利西泰、郭仰凤、庞顺阳(按,即庞迪我)实始之,愚窃比于我老朋而已。”韩云序亦云:“四表金先生,利先生之后进,哲人萎矣,尚有典刑。”《西儒耳目资》的音系跟从利玛窦四篇罗马字拼音文章所归纳出的音系大体上并无差异,而据利玛窦、金尼阁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所学习、研究的正是明代的官话。利玛窦等几个最初来华的传教士已经制定了用西洋字母拼写汉语语音的原则方案,且有实践活动,其依据当然是当时的官话,不会是方言,尤其不可能是山西方言。利玛窦没有到过山西,他所结交的上层人士大多是南方人。再说,韩云、王征及捐资刻印《西儒耳目资》的大官僚张问达父子虽为方言区人,但如《札记》所云,在官员和文士中,各省的方言是不说的,通行的是官话,因此,韩、王、张等人必然懂官话,而且有较深研究。《西儒耳目资》一书是金尼阁为西方传教士学习汉语、汉字,在其前辈体系的基础上编写的,同时受到对传统等韵深致不满的韩、王、张诸人的激赏,认为对“中士”亦有大用,也“可以昭同文之化,可以采万国之风,可以破多方拗涩附会之误”,因而其中以问答形式写的大量诠释,其对象与其说是西土教士,毋宁说是中国学人。由于地理、历史的原因,山西方言一直有很大的封闭性,在历代汉语中并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看来金尼阁、韩云、王征不可能以山西音为依据,他们动辄“华言”、“我华之言”、“中华”、“中原”,以“正音”与“土音”对言,并自居

"正音",于引用"土音"处必特别注明。他们怎么能以山西土音作为"正音"呢？正音者,官话也。因此应该给《西儒耳目资》以应有的位置：其音系是明代官话的反映。

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什么？它与北京话有何关系,或者与中原方言有何关系？我们的看法是,未必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与利玛窦同时的顺天布衣徐孝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订于 1603 年)中没有入声的地位。至于《西儒耳目资》中多次言及"中原",但细察之后,就会发现"中华"、"中原"二词经常换用,并无差别。如该书《译引首谱·小序》云："图有二：首图万国音韵元泉,末图中华音韵宗派。"《中原音韵活图说》则云："此中原音韵活图,继万国音韵活图而设也。"等等。此书的"中原音韵"乃中华音韵之意。《利玛窦中国札记》没有直接提到明代官话以什么地方的音为标准音的问题,但他所记的另一件事发人深省。1600 年利玛窦再次由南京去北京,新来的庞迪我神父是他的助手,他们乘坐由一个姓刘(?)的太监率领的马船船队沿运河北上,到了山东省西北的临清,太监因故先行,"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这样送礼是因为这个男孩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如果在明代,南京话是有别于官话的一种方言,那庞迪我就没有必要,至少不值得花力气在一开始学中国话的时候就去学纯粹的南京话,因为《札记》讲过,懂得通用的语言即官话,"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罗明坚神父到澳门,第一件事是学中国话,但学的是官话,而不是澳门一带的土话或广州话。而且庞迪我此时是去北京,力图在北京打开局面,从事传教活动。事实上他此后一直住在北京,为什么要学纯粹的南京话呢？书中往后又记下了一笔："作为利玛窦神父在北京伴侣的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中国话。"

众所周知,明代初年,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及成祖朱棣早期都建都于南京,从洪武元年(1368)算起长达五十四年。明郑晓《今言》(嘉靖四十五年刊)卷二："盖长陵崩后,仍称北京为行在,则南都为京师。……正统六年,定都北京,去行在。"《明史·仁宗本纪》载,洪熙元年(1425)"将还都南京",改北京为行在。历宣宗,至英宗正统六

年(1441)仍以北京为京师,罢称行在。则建都问题前后历七十四年始定。徐达攻取大都,朱棣坐镇北平及后来迁都北京都曾带了大批南京人及其他江淮方言区的人北上,南京话在明代占据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或许即为官话的基础方言,这个假设尚需从语言学、历史学等方面进行论证,《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述的太监赠送南京男孩教神父学南京话一事,可以作为思考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之一。

《札记》还零星地记述了汉语的一些特点。第一卷和第四卷都指出汉语的单音节性,“我从未遇到过双音或多音字,虽然有些字可能包含两个甚至三个元音,其中有些是双元音。”利玛窦指出欧洲语言里的一些辅音在汉语里却没有。第五卷记述一个年轻的北京教徒学习用拉丁文背诵教义回答,“他们在这方面的困难在于缺乏某些相当的字母”。缺乏什么呢?他们在肇庆传教时,“为了使权威的观念和上帝之名配合起来,传教士们……总是使用天主这个称呼,意思是上天之主。他们难以找到一种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因为在中国语言中没有辅音D,在他们看来,这个特殊名称中有一种庄严和神圣的意味。”这是指的拉丁文Deus(上帝)的D,汉语无此浊辅音。又,元代,蒙古称大都为Campalu,辅音P常与B互换,蒙古人开始称之为Cambalu,“但是中国人很少用辅音B,仍把这个名字读成Campalu”。按,汉文即“汗八里”。《札记》又说,“中国人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流音‘R’,而且从不使用中间没有元音的两个辅音。”从上引的《札记》各段,就能理解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的下列安排了:该书列二十九个字母,其中“不鸣”者四,即“他国用中华不用”的辅音b、d、r、z,《列音韵谱问答》云:“敝土更加其四,其号为b、d、r、z之状,夫四者不但中华不鸣,亦不能鸣,何也?人口不习,岂能强而出之?”利玛窦、金尼阁二人的观点和做法实出一辙。

《札记》还提到“南京(Nankin)一词,葡萄牙人最初在福建省漳州的居民中得知此名,但叫做Lankin,“因为该省的人总把N读成L”。按,今闽南不少方言仍然如此。书中还提到,广东的省城叫广州,“但葡萄牙人弄混了省的名字,也叫它广东”。按,英语承其误,至今仍以Canton指广州。

明代文言和口语的严重脱节也自然成了这些欧洲人的话题。

《札记》中说:“在风格和结构上,他们的书面语言与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语言差别很大,没有一本书是用口语写成的。一个作家用接近口语的体裁写书,将被认为是把他自己和他的书置于普通老百姓的水平。”下面的一段描绘堪称惟妙惟肖:“人们不可能靠听写中文来笔录一部书,把一本书念给听众听,他们也无法听懂书的内容,除非人人眼前都有这样一本书。发音相同的各种不同书写符号不可能用耳朵听准,但是可以用眼睛把符号的形状以及它们的意义分辨清楚。事实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几个人在一起谈话,即使说得很清楚、很简洁,彼此也不能全部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有时候不得不把所说的话重复一次或几次,或甚至得把它写出来才行。如果手边没有纸笔,他们就蘸水把符号写在什么东西上,或者用手指在空中划,或甚至写在对方的手上。这样的情况更经常地发生在有文化的上流阶级谈话的时候,因为他们说的话更纯正、更文绉绉并且更接近于文言。”这里揭示了文言适于目治而不宜耳治的特点,明代知识分子口语中文言成分如此之重,以致妨碍交际,并非如今人所想象的文言只限于书面语,《札记》所记述的明代这一社会语言学现象很有价值。利玛窦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一直把绝大的注意力放在书面语的发展上,而不大关心口语。就是现在,他们的辩才也只见之于他们的写作而不在于口语。……结果有时候甚至是住在同一城市而且离得很近的朋友,也是书信往返,而不见面谈话。”

《札记》也涉及到语法问题:“两个人谈话时,他们从来不用语法上的第二人称,……在谈到自己时从不用第一人称代名词,除非是主人对仆人,或上级对下级讲话。”他指出,汉语中表尊敬和谦虚方式之多,“很明显的是如果不想显得没有教养或无知,如果想懂得别人所说的或所写的是什么,一个人就必须深通各种不同的表达思想的公式”。

《札记》记叙了利玛窦与徐光启在北京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一事,“这里也可以指出,中文当中并不缺乏成语和词汇来恰当地表达我们所有的科学术语”。在序篇里讲到中文“不仅是用几个短语而是用几个字就清楚明白地讲出各种想法,而那在我们就必须啰嗦半天还没有讲清楚。”这可能主要是指文言而言。

利玛窦又叙述了用汉字写的书面语不仅广及全国，而且播及东亚。“任何以中文写成的书籍肯定可以进入全国的十五省份……，而且，日本人、朝鲜人、交趾支那的居民、琉球人以及甚至其他国家的人，都能像中国人一样地阅读中文，也能看懂这些书。虽然这些种族的口头语言有如我们可能想象的那样，是大不相同的。”当时的越南使者定期入朝中国，路过广东肇庆时总要乘机访问利玛窦等人的天主教堂，并被赠予用中文写的教义问答，“他们和中国人一样地阅读它，尽管他们说的语言有天渊之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其《列边正谱·小序》也说：“中华一统，车书会同，其字从意。一统之外，邻近诸国，余还闻有几国字皆从意，每号象之绘之，后加其音耳。”“中华从意之字，邻国幸而用之，虽风气之音，大不相通，但使中文如本地之文，即无不通之者。”

另外，在序篇及其后还数次述及汉字的繁难及表意特点，兹不赘论。

总之，由利玛窦撰写、金尼阁补充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了利玛窦在中国近三十年的经历，相当充分地反映了明代末年的中国。这部名著对于研究明代中外交通史，乃至明史都很有史料价值。书中涉及汉语达数十处，特别是记述了明代汉语共同语，即官话的性质、使用范围以及口语和书面语的使用情况等等，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对我们研究明代汉语及明季汉语音韵学的外来影响都有很为重要的价值。

本文初稿曾得李思敬、杨耐思二先生赐阅，谨致谢忱。

此文原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1985 年第 4 期。何高济等的中译本《利玛窦中国札记》是据英文本译的，而其祖本则是金尼阁的拉丁文本。书中述及在山东临清，姓刘的太监送给庞迪我一个在南京买的男孩，教庞迪我纯粹的南京话，拙文已经论及。杨福绵先生见到拙文后，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并惠予支持，其《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所纪录的明代官话》一文指出，《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利玛窦意大利文本是：“太监刘步惜很高兴地把在南京买的一个书童送给神父们当做礼物，因为这个男童会讲地道的中国话（che parlave molto bene [la] lingua cina），可以教正要开始学中国话的庞迪我神父。”杨

先生接着说:“金尼阁把利玛窦原文的‘地道的中国话’改成了‘纯粹的南京话’,可见当时的南京话就是地道的中国话,换言之,就是当时官话的基础方言,是明末标准官话的代表,否则庞迪我就没有必要去学纯粹的南京话,而应该等到到北京后,学纯粹的北京话了。鲁国尧据何高济的中译本看出了这一点,今以利氏意大利文原本证明之。”杨文引征利氏论述甚多,见解精辟,高明之著。又拙文把利氏的五种调号说成是“暗示调型的记调法”,进而揣测调值。杨先生指出,这五个符号是借自拉丁文和法文,1990 年夏我为杨先生整理上述文章时,读到了批评我臆说的一段,感愧不已。此次结集时未按成规删去这则谬见,否则读者见到杨文(北京《中国语言学报》第 5 期)时会感到无的放矢。我不知以为知,当引以为戒。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王顺洪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年)云,江户时代(1603—1867)的中国语被称作“唐话”,学习者主要是唐通事(1604 年起设置的,负责对来日唐船的翻译和贸易事务的官员)。该书页 270 摘录了唐通事子弟练习唐话的教科书《小孩子》中的一段:“打起唐话来,凭你对什么人讲,也通得了,苏州、宁波、杭州、扬州、绍兴、云南、浙江、湖州这等的外江人,是不消说,对那福州人、漳州人,讲也是相通的了。他们都晓得外江说话,况且我教导你的是官话了,官话是通天下,中华十三省,都通的。”六角教授指出:“所说的‘福建人和漳州人也通’的唐话,是指南京口,即南京语。”按,“中华十三省”即明代的十三布政使司。明初大批南京一带的人随沐英向云南移民,至今云南很多地区的人的家谱记载,先人来自南京应天府高石坎柳树湾,《小孩子》将云南列入“通得了”的外江范围内,是符合明代南京话的实际情况的。该书页 273 引录了唐通事卢笃三郎的自传:“笃三郎(高朗),弘化四丁未……生于长崎港……,卢家因当唐通事,跟郑干辅……诸先生学支那话(支那南京音)。”该书页 276 录载了著名的唐话学者冈岛冠山(1674—1728)撰写的《唐译便览》卷一之首的话:“每字注官音。”六角先生随后指出:“这里所谓的官音是指官话的南京音。”明治四年(1871)日本外务省设立汉语学所,教的仍是“唐话时代的南京语”,明治九年(1876)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科(其前身为汉语学所),将“南京

语教育转换成了北京语教育,唐通事以来的南京语教育就此告终"。这一史实也有力地证明了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承王松木先生提供这一学术信息,谨此致谢。)

1993年

国外学术界常将《中原音韵》音系称作古官话音系,其实"官话"一词在元代并未出现,明代方有。拙文已列三例,今再录"书证"数则。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十四年(按,相当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即公元1483年)九月:"头目葛贵见《直解小学》曰:'反译甚好,而间有古语,不合时用,且不是官话,无人认听。'"(转引自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中译本第206页)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成于1584—1588)附录《宾主问答辞义》:"如今你晓得我们这边官话不晓得。"(见上引杨福绵文)顾起元(1565—1628,江宁人)《客座赘语》:"海盐多官话,两京人用之。"(见《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2期邓兴锋文)凌濛初(1584—1644)《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叙述徽商程宰在辽阳遇海神,海神作法,"便有几只鹦鹉飞舞将来,……或诵佛经,或歌诗赋,多是中土官话。"(承刘丹青、李葆嘉二先生见告)徐充(明人)《暖姝由笔》:"凡问物之在者则曰在那里,此官话也,吾地曰来边,常州曰来头,无锡曰来上,苏州曰来打。"(转引自上述太田辰夫书)日本东京大东文化大学濑户口律子教授的名著《琉球官话课本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1994)研究了明清时代琉球人学习中国官话的历史,中有闽县老儒林户升于乾隆十八年(1753)为《白姓官话》写的序:"予今年登七十有四,间尝考天下言语,各有不同,俱系土音,难以通行,惟有正音官话,所以通行天下。"琉球人《学官话》课本有"学生一心要学习官话"之类的会话语言。濑户口教授多年悉心研究,其结论是,明清时代琉球人学习的中国官话是南京话。[美]崔颂人《美国汉语教学的先驱——戈鲲化》(《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3期)云,清光绪五年(1879)宁波人戈鲲化应聘至美国哈佛大学教汉语,教的是南京音,即南方官话。(此承邓兴锋先生见告)1898年Franz Kühnert博士在维也纳出版了研究南京话的著作《Syllabar des Nanking-Dialectes oder der correcten Aussprache sammt Vocabular》(此承古

屋昭宏、石汝杰先生见示)。美国人K. Hemeling著《Nanking Kuan Hua》(上海,1902)。近十年明代官话已成为汉语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外专家论著甚夥,兹不赘引。日本京都研究汉语的专家木津佑子女士正全面研究明代官话。

《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的中译本刚在南京书店出现,平素好看"闲书"的我即被吸引住了,就开始着力研究,提出了若干见解。文章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李思敬先生一直对我鼓励有加,1996年春又亲自为拙文撰写"提要",过奖之处愧不敢当,但又不敢删改,只得全文照录。

1996年12月

北师大伍铁平教授1996年1月18日来函赐教:日语中有很多表示事物名称的词由"南京"构成,而无以"北京"构成的普通名词,这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得启发,我查了《国语大辞典》(小学馆,1981年)收"南京",释义1.地名,今江苏省会。2.中国人的别称,南瓜的异名。"南京烧"的略称。3.语素,放在表事物的名词前,表示中国产的,从中国地区引进的,或表示珍奇小巧的。收有下列词:南京操、南京梅、南京瓜、南京石榴、南京军鸡、南京繻子、南京錠、南京虱、南京钱、南京玉、南京椿、南京七竈、南京鼠、南京黄櫨、南京鳩、南京袋、南京南瓜、南京酸漿、南京米、南京豆、南京虫、南京木綿、南京烧、南京綿;再查《广辞苑》(第二版补订版,岩波书店,1976年)、《广辞林》(第六版,三省堂,1958年),尚有:南京人、南京小桜、南京珠、南京町。最有意思的是"南京"是中国人的别称,"南京人"是中国人的俗称,可见在那个时代日本人的心目中,在利玛窦等欧洲人的心目中南京话的地位远非今日可比拟。

1996年12月

南京大学张宏生教授在其编集的《戈鲲化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前言中考证戈鲲化是安徽休宁人,后寓居宁波,由宁波赴美教中文。该书附录:美国人杜维德(Edward Bangs Drew)说:"戈鲲化先生平时讲的是南京普通话,这与北京官话差别不是很大。北京

官话虽然流行,但南京普通话使用得很普遍。"(页 292)按,刚才电话询问张宏生教授,方知"南京"、"北京"二词后的英文原文皆为 Mandarin,则是均应译为官话。宏生教授同意拙见,将于第二版中更改。

关于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的问题,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林焘先生《北京官话溯源》不同意拙见(《林焘语言学论文集》页 176,商务印书馆,2001 年)。蒋绍愚先生《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大出版社,1994 年)叙述了拙见后说:"我们同意这种意见:说明代官话以江淮方言为基础方言,这至少在目前还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论证的假设。"(页 121)曾晓渝先生《试论〈西儒耳目资〉的语音基础及明代官话的标准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 年 1 期)云:关于《西儒耳目资》的语音基础,有三说:罗常培的北京音说,陆志韦、李新魁的山西音说,鲁国尧的南京音说(页 67)。"我们同意鲁国尧先生的观点"(页 71)。还有李思敬先生的观点,见他为本文所撰写的提要。

2002 年 12 月 17 日晚

木津祐子教授 2001 年发来伊美尔(E-mail)告诉我:在中国的明清时代,日本和琉球与中国贸易的文件上有以"官"作为起首词素的词:"官布"、"官绢"、"官猪",都跟南京有关。又转告我:大冢秀明先生的文章中引用了许多"官话"的书证,如冯梦龙《笑府》卷九"闺风部":有好阙者,妻谓之曰,我看妓家容貌,也只平常,你爱他有甚好处。夫曰,我爱他官话好听耳。妻即应云,这也何难。卷十一"谬误部":有兄弟经商者,学得一二官话。将到家,兄因如厕,暂留隔河,命弟先往见父。父一见,问曰,汝兄何在。弟曰撒屎。父惊曰,何处杀死。答曰河南。父方哀苦,而兄适至。父遂骂其次子曰,如何妄言如是。曰,我官话耳。父曰,如此官话,只好吓你爷。

2003 年 2 月 20 日

请见本论集跋语。

2003 年 6 月 14 日

《诗·豳风·东山》"蜎"、"蠋"二字音议兼辨《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之误

提要 本文利用自晋迄清的三十余种音义书、韵书、韵图、字书等考证"蜎"、"蠋"二字的各种音读，辨明《诗·豳风·东山》"蜎蜎者蠋"的"蜎蜎"今音应为 yuānyuān，"蠋"应为 shǔ。同时指出多种《诗经》注释本和当代著名辞书之误，究其原因在"小学不修故也"。

《诗·豳风·东山》有"蜎蜎者蠋，烝在桑野"两句，其中的"蜎"、"蠋"二字读音如何？最近查阅了若干《诗经》选本或注本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之类的书，发现这些书注音错误触目皆是，即以此二字音而论，注错者亦不为少，甚至某些大型辞书亦然，兹分论于下。

一 "蜎"字音议

《国风今译》（蓝菊荪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中华书局，1962）、《先秦文学作品选》（吉林师大中文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历代诗歌选》（季镇淮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均注《东山》之"蜎"为 juān 或"娟"；《诗经选注》（蒋立甫注，北京出版社，1981）、《诗经选译》（唐莫尧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则音 xuān。

最近出版的《辞源》第四册（修订第一版，商务印书馆，1983）"蜎"字列二音。

第一音为 yuān，下管四个义项：

（一）蚊的幼虫，即孑孓。《尔雅·释鱼》："蜎，蠉。"注："井中小蛣蟩，赤虫，一名孑孓。"（二）姓，春秋楚有蜎渊，……（三）弯曲。《周礼·考工记》"庐人"："句兵欲无弹，刺兵欲无蜎。"（四）蠕动貌，见下。

第二音为 xuān，下辖一个义项："飞翔，通'翾'，见'蜎飞蠕动'。"下有二词，一为"蜎蜎"，释为"蠕动貌"，引《东山》诗句及毛传作书证；一为"蜎飞蠕动"，都特别标明两个词语中的"蜎"字同为第二音，即 xuān。

显然，《辞源》对于"蜎蜎"的注音前后矛盾，上举多种选有《东山》诗的注释本更为错误，现论析于下。

《辞源》的体例规定，每字后要注上《广韵》的反切与声纽。"蜎"字第一音 yuān 后列了《广韵》的三个反切，依次为乌玄切、於缘切、狂衮切(按，系"狂兖切"之排印错误)。第二音 xuān 后未列反切。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系假借为"翾"而致的，甚是，以后不再讨论。

这就需要对《广韵》"蜎"字的各个反切分清异同，辨明主次，而且要结合《广韵》前后的韵学文献加以考核分析。先将《广韵》所载"蜎"的音切及其注释移录于下：

(一) 平声仙韵於缘切，"蠲貌，又狂兖切"。於缘切推成今音为 yuān。

(二) 上声狝韵狂兖切，"《尔雅》曰：'蜎，蠉。'郭璞云：'井中小蛣蟩，赤虫，一名孑孓。'又姓，《汉书·艺文志》有老子弟子楚人蜎渊著《蜎子》十三篇"。狂兖切推成今音是 juàn。

(三) 平声先韵乌玄切，"蜎，蠉，又殴泫切。"按，"乌"和"於"同为影母字，反切下字"玄"与"缘"不同韵部，是为二音。但乌玄切推成今音也是 yuān。

狂兖切音跟乌玄切音同注"蜎，蠉"，但详略有异。狂兖切小韵共四字，"蜎"居首；乌玄切小韵有十字，末为"蜎"，所以我们把乌玄切列第三。

还要注意《广韵》列出的又音"殴泫切"，据之可推出今音 yuǎn，但铣韵并无"殴泫切"这样的反切。《集韵》有与之相当的於泫切音，收此切语有其意义(详下)。但在《集韵》里一个"蜎"字竟列了十一个音：先韵圭玄切、萦玄切，仙韵隳缘切、萦缘切，铣韵於泫切，狝韵馨兖切、葵兖切、下兖切、以转切、巨卷切，线韵逵眷切。注释皆为"虫名"、"井中小虫"之类，可谓治丝益棼，这与《集韵》广收又音而又欠缺精审有关。《类篇》收了十音，仅缺葵兖切。

众所周知，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诏刊修《广韵》及景德《韵

略》,景祐四年(1037)景祐《礼部韵略》先成,宝元二年(1039)《集韵》成,二者是简本和繁本的关系,景祐《礼部韵略》今不存,各种修订本也多亡佚,今存者仅三种,一为宋高宗赵构的《草书礼部韵》(仅列字而无释语),一为《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一为毛晃、毛居正父子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简称《增韵》)。我们可考察此三书"蜎"字的读音。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只在狝韵收"蜎":"狂兖切,虫名。[释]按《尔雅》,蜎蠉也。郭璞云,井虫小蛣蟩,赤虫。"《草书礼部韵》在狝韵与上相同的位置上有"蜎"。毛晃在《拟进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表》中说他的这本书"以古今字书,诸儒音释,互加考证,凡九经、子、史、苍、雅、方言中遗漏要字,定其可否,参入逐韵","仍于字下互注音切及诸义训,辩释疑似,订正是非,庶令新学士子开卷晓然,不至误用,主司考校,亦无所疑"。《增韵》三收"蜎":(1)狝韵:"狂兖切,虫名。又桡也,《考工记》'庐人''欲无蜎'。"(2)先韵萦年切,与"渊"同在一小韵,注:"虫行貌,《诗》'蜎蜎者蠋'。"下有特别标志"增入"二字,说明此条系毛晃所增。(3)铣韵胡犬切,根据是《汉书》载扬雄《甘泉赋》"蜵蜎"一词中"蜎"的颜师古音注,此乃毛居正所"重增"。可见《礼部韵略》原只有狂兖切一音。宋元等韵图《七音略》、《切韵指掌图》、《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也都列于狝韵群母的位置。元代《蒙古字韵》九先韵中有"蜎",与"渊"同音,俞昌均《较定蒙古韵略》在九先韵中两收"蜎",一次于群母上声"圈"字后,一与么母平声"渊蜎"同音。

因此,根据《广韵》及其后的若干韵书,应该重视的是於缘切和狂兖切二音,《东山》诗"蜎蜎者蠋"的"蜎"显然是於缘切,而狂兖切音是虫名之音。

如果查阅《广韵》前的文献,也会助于我们确定《东山》诗的读音。先秦及汉缺乏表示确切音读的资料,我们只得靠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音义书与韵书了。

首先是陆德明《经典释文》,在"蜎蜎者蠋"的"蜎"下注:"蜎,乌玄切,蠋貌。"又在《庄子·秋水》"还虷蟹与科斗"下注:"虷音寒,井中赤虫也,一名蜎。《尔雅》云:'蜎,蠉。'郭注云:'井中小蛣蟩,赤虫也。'蜎音求兖反,……"《周礼·考工记·庐人》"刺兵欲无蜎",郑玄注:"玄

谓蜎亦掉也,谓若井中虫蜎之蜎。"《经典释文》特别注"虫蜎"之"蜎"为巨兖反。求兖反与巨兖反同音。陆德明区分得很清楚,依其说推出今音,《东山》诗的"蜎蜎"音 yuān yuān,作虫名的"蜎"音 juàn。

在唐五代韵书中,据周祖谟先生编《唐五代韵书集存》,笺注本《切韵》(斯 2071)、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宋跋本)狝韵皆有狂兖切,注释是"蜎,蠉,井中虫。"又大徐本《说文解字》十三上"蜎"字,用孙愐《唐韵》音切:狂沇切(中华书局 1963 年缩印陈昌治一篆一行本作在沇切,系形近而讹),此当为《广韵》狂兖切之"源"。五代本《切韵》(伯 2014)"蜎","於缘反","蜀貌,又狂兖反",此当为《广韵》於缘切及其注之"源"。"蜎"在敦煌本、宋跋本王韵并有先韵乌玄切,"挠,又瓯泫反"。韵字残叶(伯 2758)有"蜎,瓯泫反",次于"渊,乌玄反"后,居"涓蠲,古玄反"前,则是上下皆为平声先韵合口字,周祖谟先生考释说:"残卷中有些字的反切是属于上声或去声的,但那都是又音,抄者脱去平声反切,以致前后在四声上不一致。""这个残卷所根据的韵书时代一定比较晚,可能是晚唐五代期间流行的一种韵书,这种韵书最接近于《广韵》。"这就是《广韵》先韵乌玄切及其注的"又殴泫切"的"源",只是王韵释义为"挠",而《广韵》改为"蠉",虽然《广韵》铣韵无殴泫切音,但此音渊源有自,于此可见。另外殴泫切音在多数宋元等韵图上有其位置:《韵镜》外转二十四合口呼图,上声铣韵喉音清;《七音略》外转二十四重中重,上声铣韵影母;《四声等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俱列于山摄外四合口呼上声狝韵影母。于此便可见《广韵》这个又音不可忽视。

我们再看看佛徒所作的音义一类的书怎样记载"蜎"音的。汉译佛经中多次出现"蜎飞(或作'蜚')蠕动"一语,唐初的玄应《一切经音义》、《光赞般若经》卷二"蜎":"一泉反,《字林》'虫貌也,动也',或作蠉,古文翾同,呼泉反,飞貌也。"(载于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九)玄应的意思是,作虫貌的"蜎"音一泉反,作飞貌的音呼泉反。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三《佛说菩萨逝经》"蜎"字注:"一缘反,《毛诗》曰:'蜎蜎者蠋也。'"卷三一《佛说无极宝三昧经》:"一缘反,《韵英》云:'蜎蜎,虫貌也。'《毛诗》传云:'蜎蜎,蠋虫貌也。'"有些地方注作"壹缘反"。可是卷十七《太子和休经》却注成血缘反,卷十九《般舟三昧经》下卷

注成恚缘反。一缘反与壹缘反同音,血缘反与恚缘反同音,则是同一“蜎飞”之“蜎”有二音！是耶非耶？请读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九五“音弘明集”卷二“蜎飞”注:“上一缘反,《尔雅》云‘井内小赤虫也’,恐非义。案,合是翾字音,许缘反,《说文》云‘小飞貌’,稍合于义。”这最后一注实为定论,精当不移。“蜎飞”之“蜎”应为许缘反,音义家往往只见字同,不顾义别,误注以其他音切。

总之,将《广韵》及其前后的《经典释文》、唐五代韵书、佛经音义、宋元等韵图、《增韵》、《蒙古韵略》等书中的反切推成今音,“蜎”至少应有四音:

(一) yuān

(二) juàn

(三) yuǎn

(四) xuān

第四音是“翾”的假借音,不论。

这些音各自表达什么意义,很值得作一番全面的,带有历史性的考察,现依《辞源》的四个义项将诸书音读列表于下:

意义 / 今音 / 古文献	蠕动貌		虫名			姓		弯曲		
	yuān	yuǎn	juàn	yuān	yuǎn	juàn	yuān	yuān	yuǎn	juàn
尔雅郭璞注			+							
经典释文	+		+					+	+	+
博雅音					+					
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							+			
玄应音义	+									
慧琳音义	+									
笺注本切韵(斯 2071)			+							
敦煌本王韵(伯 2011)								+		
宋跋本王韵			+					+		
唐韵(大徐本《说文》引)			+							
韵英(慧琳音义引)	+									

续 表

意义 今音 古文献	蠕动貌		虫 名			姓		弯 曲		
	yuān	yuǎn	juàn	yuān	yuǎn	juàn	yuān	yuān	yuǎn	juàn
五代本切韵(伯2014)	+									
新撰字镜				+				+		
龙龛手鉴			+							
广韵	+		+	+	+	+				
大广益会玉篇	+	+								
集韵、类篇			+	+	+		+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			+							
增韵	+		+							+
五音集韵	+		+	+	+	+				
古今韵会举要	+		+	+	+	+		+		+
洪武正韵	+		+							+
字汇	+		+	+						+
音韵阐微	+		+	+	+		+	+		
五方元音	+			+						

注：①《广韵》先韵收又音殴泫切，而铣韵未录此音。但《集韵》铣韵於泫切，“井中小虫”。据此知《广韵》殴泫切系虫名之音。

②《集韵》仙韵隳缘切，“虫行貌，一曰井中小赤虫”，据此“蠕动貌”与“虫名”今音并有 xuān 音；狝韵馨兖切，“井中小虫”，以此反切推成今音，则是虫名有 xuǎn 音；狝韵下兖切，“井中虫名”，则是虫名有 xuàn 音。凡此皆未录入表内。

③《字汇》虫行貌、虫名并有乌员切、圭渊切、胡犬切，推成今音则有 yuān、juān、xuàn。

从这张表可以看出：

(一)《东山》“蜎蜎者蠋”的“蜎”，今音应为 yuān，几无可疑。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修订的《大广益会玉篇》卷二五“蜎：於犬、於沿二切，蜀貌。”二切语折成今音为 yuǎn、yuān，在我们所考察的文献中，yuān 音是唯一的。我们再看看金代至清代的文献：《五音集韵》“乌玄切，蠋貌。”《古今韵会举要》“萦缘切，音与渊同”，引《东山》诗句为证。《洪武正韵》萦圆切，“虫行貌”，引《诗》句。《音韵阐微》先

韵影母四等纡绢切,"又动貌",引《东山》句。《五方元音》雍正五年年希尧增补本天韵云母上平声合口有"蜎","虫行貌"。并可证明"蜎"应为 yuān。

(二) 表示虫名的"蜎",应据《经典释文》、《广韵》等书的求兖切、巨兖切、狂兖切,定今音为 juàn。辽释行均《龙龛手鉴》"渠辩反",合口字"蜎"以唇音字为反切下字。《古今韵会举要》以此音为葵兖切,"音与圈同"。

作为虫名,还有 yuān 音,此音后起。日僧昌住九世纪末编的《新撰字镜》(享和本、群书类从本)"一全反,蠉也,井中出。"在我们所考察的文献中此条最早。本文前面说过,敦煌本、宋跋本王韵并有先韵乌玄反,末字为"蜎",释义为"挠"。《广韵》先韵乌玄切所收字及字序大致同王韵,末字亦为"蜎",但释义改为"蠉",不知何所据。昌住的"一全反"和王韵广韵的"乌玄反(切)"推成今音相同,但在彼时韵母并不同,有仙先之别。自《广韵》定虫名为乌玄反后,诸书陈陈相因,如《五音集韵》"蜎"字收十音,其一为乌玄切,"蜎蠉,又殴泫切"。《五方元音》置于天韵云母上平声合口内,"井中虫也。"

虫名还有一个又音 yuǎn,就我所知,曹宪《博雅音》注为乌泫切,《广韵》有又音殴泫切,《集韵》为於泫切。此后《五音集韵》、《古今韵会举要》、《音韵阐微》并有此音。

虫名的"蜎"如果依《集韵》、《五音集韵》的隳缘切、火玄切,则有 xuān 音;依二书的馨兖切、香兖切,则有 xuǎn 音;依《集韵》的下兖切,则有 xuàn 音。

如若"定于一",则应是 juàn。

(三) 表姓的"蜎"该读何音?《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蜎,姓也,音一元反。"《集韵》萦玄切,虽然按广韵音系,韵母有元韵、先韵之别,声母则同,推成今音皆为 yuān。《广韵》、《五音集韵》并音狂兖切,《古今韵会举要》葵兖切,"音与圈同",如此今音则是 juàn。

(四) 关于弯曲义的"蜎",《周礼·考工记》"庐人""刺兵欲无蜎"郑玄注:"蜎或作绢,郑司农云:'……绢读为悁邑之悁,悁谓桡也。'"陆德明《经典释文》注此"蜎":"於全反,又於兖反,李(本文作者按,指李轨)又乌犬、乌玄二反,或巨兖反。"昌住《新撰字镜》注音为一全反。

《古今韵会举要》在萦缘切“音与渊同”和葵兖切“音与圈同”二音中皆引《考工记》此句。《增韵》、《洪武正韵》分别音狂兖切，巨兖切。这些反切推成今音有 yuān、yuǎn、juàn。

为什么“蜎”的读音如此纷纭而在某些义项上又比较一致？这是由于“蜎”所表示的词都是古语词，“蜎蜎”见于《诗经》，可谓最古，作为蚊的幼虫之名见于《尔雅》，被解作弯曲义的“蜎”源于《周礼·考工记》，如果相信《汉志》，“蜎渊”则是老子弟子：无一不古。这些词在当时肯定有其确定的读音，民歌中的形容词“蜎蜎”还是口语词呢。《诗经》在先秦时代流传之广，作用之大众所周知，儒家奉为经典，两千年来，知识分子都要诵读它，读音都有师承（如朱熹《诗集传》音乌玄切）。音义书、韵书、字书对这个古语词的读音是认真的，所以在“蜎蜎”的注音上历代比较一致。宋代的景祐《礼部韵略》只收虫名狂兖切一音，毛晃《增韵》特别“增入”表“虫行貌”的萦年切，并引《诗》句，此亦可为证。

《尔雅》的“蜎”，《淮南子·说林训》作“孑孓”，高诱注以“结蟨”“到跂虫”释之。张揖《广雅》：“孑孓，蜎也。”《尔雅》郭璞注叫“蛣蟨”。唐成玄英在《庄子·秋水》的疏里说：当时叫“到结虫”。清郝懿行《尔雅义疏》：“今登莱人呼跟头虫。”王念孙《广雅疏证》：“今扬州人谓之翻跟头虫。”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今苏俗谓之打拳虫。”这说明自汉代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口语词多种多样，“蜎”成了仅见于书面的古词，又非常见，这就易于产生歧读。一般的韵书、字书、韵图保守性很强，后代的编者兼“收”并“抄”以求全，宋金元以来的韵书表现得很突出。表姓的“蜎”和表弯曲义的“蜎”读音分歧，其理当同上。

对于现代辞书《辞源》来说，当然没有必要把每个义项的又音都列出。但是“蜎蜎者蠋”的“蜎”应为 yuān，这是一；依《广韵》狝韵“蜎”的狂兖切音及其注释，增 juàn 音，“蚊的幼虫”这义项应归于其下，这是二；“姓”义项似也可列于 juàn 下，因《辞源》的注音主要依据《广韵》，这是三；《周礼·考工记》中表弯曲义的“蜎”定为 yuān，还是可以的。虽然《广韵》、《集韵》未载此义，但《经典释文》及《广韵》的“先代”韵书王韵皆著录。

《辞海》（1979 年版）认定《诗经》“蜎蜎”音 yuān yuān，是其长处，

但“孑孓”和“姓”二义项都归入 yuān 下，其误与《辞源》同。

二　“蠋”字音义

现在讨论“蠋”字。

《辞源》的注音是 zhú，按例随后抄录《广韵》的反切：

之欲切，入，烛韵，照。

直录切，入，烛韵，澄。

释义是：“蛾蝶类的幼虫。《诗·豳风·东山》：‘蜎蜎者蠋，烝在桑野。’传：‘蜎蜎，蠋貌。桑虫也。’《庄子·庚桑楚》：‘奔蜂不能化藿蠋。’疏：‘蠋者，豆中大青虫。’”

《辞海》的注音也是 zhú，释义是“本作‘蜀’，鳞翅目昆虫的幼虫，青色，似蚕，大如手指。”下引书证为《东山》诗句及朱熹注、《尔雅·释虫》“蚅，乌蠋”及郝懿行疏。

在《广韵》内，“蠋”作为字头只出现两次，两个反切如上。依广韵音系，二者声异，故不同音。但这两反切，推成今音，都是 zhú。（“直”是全浊澄母字，依规律，直录切今音为 zhú，自不成问题；而全清章母字今音声调是否为阳平，很难说，姑依该小韵首字“烛”而定为 zhú。）那么两部辞书在“蠋”音问题上是否已无可讨论了呢？

不然，之欲切和直录切并非《东山》中“蠋”字的音。且看《广韵》烛韵的“蜀”：“巴蜀。《说文》曰：‘葵中虫也。’《淮南子》云：‘蚕与蜀相类而爱憎异也。’亦作‘蠋’，市玉切。”“市”是禅母，推成今音为 shǔ。这个不单立字头而藏在“蜀”字注里的“蠋”才是《东山》中的“蠋”。

今本《毛诗正义》作“蜎蜎者蠋”，毛传是“蜎蜎，蠋貌，桑虫也”，郑笺云“蠋蜎蜎然特行”，三者字形都作“蠋”。但是今传大徐本《说文解字》的“蜀”字：“葵中蚕也”引《诗》作“蜎蜎者蜀”。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同，承培元校勘记云：“今诗作蠋。”玄应《一切经音义·鞞婆沙阿毗昙论》卷十四“蜀虫：时烛反。《诗》云：‘蜎蜎者蜀。’传曰：‘蜀，桑虫也。’……《尔雅》‘蚅’一名‘乌蜀’是也。”（此据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三所录，海山仙馆丛书本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八悉作“蠋”）玄应《阿閦佛国经》音义“蜎飞”条注：“毛诗传曰：蜎蜎，蜀虫也。”（据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六）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七：“《毛诗》云：‘蜎蜎

者蜀也。'即蜀者桑虫也。"卷三三:"《毛诗》曰:"蜎蜎者蜀也。'"(但卷三一作"蠋",日僧空海(774—835)《篆隶万象名义》:"蜀,时烛反,桑虫。"昌住《新撰字镜》:"蜀,时烛反,桑虫也。"《大广益会玉篇》:"蜀,市烛切,桑虫也,亦作蠋。""蜎,蜀貌。"再看"凡字训悉本许慎《说文》"的《集韵》,其烛韵以"蜀蠋蠾"三字为字头,注曰:"殊玉切。《说文》'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者蜀。'或作蠋,亦从屬。"《类篇》全同。以上诸例都可证明毛诗原作"蜀",而"蠋"是后起的或体。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蜀"指出:"今左旁又加虫,非也。"王筠《说文解字句读》:"诗诂:蜀本从虫,加虫,俗字也。"郝懿行《尔雅义疏》"释虫":"今诗作蠋,亦非。"

饶有兴趣的是,宋高宗赵构《草书礼部韵》和《附释文礼部韵略》皆列"蜀"、"蠋"为两个字头,毛晃《增韵》亦然,"蜀"字注引《说文》及《淮南子》,"蠋"字注引《诗》句,并曰:"本作蜀,中已从虫,又加虫焉。"《古今韵会举要》也连列二字头,引用毛晃语后云:"案,《说文》、《集韵》蜀蠋字同出,《礼韵》别出蠋字。"这几本韵书在相当于《广韵》之欲切和直录切的小韵里都未列"蠋"。

总之,依据以上文献,《诗·豳风·东山》里的这个字本作"蜀",《古今韵会举要》:"今文作蠋。"既然本作"蜀",就应该按市玉切推出今音为 shǔ。

就是以"蠋"字论,《诗·豳风·东山》《释文》:"蠋音蜀。"《庄子·庚桑楚》"奔蜂不能化藿蠋"《释文》:"蠋音蜀。"《广韵》:"蜀……亦作蠋,市玉切。"根据这些也应该将《东山》诗中的"蠋"的今音定为 shǔ。

以上从正面论证。我们还应讨论《广韵》之欲切的"蠋"和直录切的"蠋"。

(一)《广韵》烛韵之欲切音的"蠋"下注:"蚅蠋。"模韵哀都切音的"蚅"字下注:"蚅,蚅蠋,虫也,大如指,白色。"麦韵於革切的"蚅"下注:"蚅,乌蠋,大如指,似蚕。"可见在《广韵》里,之欲切的"蠋"是双音单纯词"蚅蠋"(或写作"乌蠋")的后一部分的音。可以说,韵书、字书、音义书凡有"蠋,之欲切"的必注"蚅蠋",也必相应地有"蚅,蚅蠋"和"蚅,蚅蠋",如宋跋本王韵,《篆隶万象名义》、《新撰字镜》、《龙龛手鉴》、《广韵》、《集韵》、《类篇》、《五音集韵》等无不如此。而《增韵》、

《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未收“蚅”、“蚼”,因而同时在相当于《广韵》之欲切小韵里没有“蠋”,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蚅,乌蠋”似乎最早见于《尔雅·释虫》。《经典释文》里“蠋”出现三次,一为《诗·豳风·东山》的“蜎蜎者蠋”,一为《庄子·庚桑楚》的“藿蠋”,一为《尔雅·释虫》的“乌蠋”,陆德明皆“音蜀”。可堪注意的是,玄应音义引《尔雅》作“乌蜀”;宋刻十行本《尔雅》三卷,每卷末都附有《尔雅音义》(周祖谟先生《尔雅校笺》云:不知是否为后蜀毋昭裔所作),正文作“乌蠋”,音释作“蠋蜀。《诗·大雅·韩奕》“鞗革金厄”,通志堂本《经典释文》:“厄”,“毛云乌噣也”,陆氏释文:“噣”,“音蜀”(阮本《十三经注疏》“噣”作“蠋”)。大概因为“蠋”、“噣”都是从“蜀”得声之故。但是据顾野王《玉篇》而作的空海《篆隶万象名义》:“蠋,之欲反,蚼蠋。”(同书“蜀,时烛反,桑虫。”)《大广益会玉篇》:“蠋,之欲切,蚼蠋,又音蜀。”(同书“蜀,市烛切,桑虫也,亦作蠋。”)在唐及其后的多数韵书、字书里,之欲切是“蚼蠋”之“蠋”的专用音,而不是“蜎蜎者蠋”的“蠋”音。

(二)再论直录切的“蠋”。《广韵》烛韵直录切小韵“蠋”:“蝷蠋,虫名。”又,昔韵直炙切小韵“蝷”:“蝷蠋,虫名。”可见“蝷”和“蠋”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字,字形皆从“虫”,声纽皆澄母。这双声连绵词的后一部分音直录切。

“蠋”之直录切音何时见于记载?答曰较迟。现存的唐五代韵书、《篆隶万象名义》、《新撰字镜》、《大广益会玉篇》皆不见此音,也无“蝷”字。就我浅闻,收“蠋,直录切”音的除《广韵》外,有《龙龛手鉴》:“蝷,直炙反”;“蠋,直玉反,蝷蠋,虫名”。《集韵》“蠋”有四音,其一为厨玉切,释为“蝷蠋,虫名”。《五音集韵》亦然。但《增韵》、《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及通俗性、实用性的韵书如《中原音韵》、《韵略易通》、《韵略汇通》、《五方元音》等不收此连绵词。

“蠋”何以有直录切音?这就得考察“蝷蠋”这一连绵词之源,试作解说如下。“蝷蠋”当与“踯躅”有关,它们是完全同音的双声连绵词。“躅”字各字书、音义书、韵书都有。《说文》有“蹢”无“踯”,此二字当系古今字的关系(前者以入声字为声符,后者以阳声字为声符,犹如“擿”与“掷”,以阳声字为声符的多是后起字,《说文》不收)。《篆

隶万象名义》足部二字并收,其后为"躅",《大广益会玉篇》亦然。《广韵》先是"踯,踯躅,行不进也",后是"蹢,上同"。而《集韵》收字、训释宗《说文》,则先"蹢"后"踯"。"蹢躅"(或"踯躅")诸书的释义都是"住足"或"行不进",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指出"蹢躅"的双声叠韵词很多,常见的有"踟蹰"、"踌躇"。桑虫"蠋"在树的枝叶上时进时停地蠕动,又由于"蠋"与"躅"形体太近,这两个因素就使得由"踯躅"而类推出"蝍蠋",由谓词而产生名词,《广韵》、《集韵》、《龙龛手鉴》皆训"蝍蠋"为"虫名",至于是什么样的虫,这类语词性的韵书、字书当然不会告诉我们了。我们所关心的只在于"蠋"及其直录切音与"蝍"及其直炙切音在形、音上都是"连体孪生兄弟"。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谓词"蹢躅"、"踯躅"二形并存,竞争的结果前者失败;训虫名的无"蝻蠋"只有"蝍蠋",于此亦可见后者产生时间之晚。

总之,众多历史文献资料可以证明,今本《诗·豳风·东山》"蜎蜎者蠋"的"蠋"只能"音蜀",经书的权威性保证了此音的稳固性(如朱熹《诗集传》也注明"音蜀"),推成今音为 shǔ。之欲切是单纯词"蚼蠋"的"蠋"音,直录切是单纯词"蝍蠋"的"蠋"音。

遗憾的是,《辞源》、《辞海》注音皆错。《辞源》之误在张冠李戴,未能细读《广韵》,径取"蚼蠋"(或"蝍蠋")中"蠋"音以注"蜎蜎者蠋"中"蠋"音。《辞海》不辨二者之异,混而为一,统注 zhú。连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也误定"蠋"音为 zhú。

近年出版的古籍注本,如《诗经今注》(高亨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诗经译注》(袁梅编,齐鲁书社,1980 年)、《诗经全译》(唐莫尧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年)都将"蜎蜎者蠋"的"蠋"音误注为 zhú。如果翻开近几十年的几十种诗经注译本,就会发现,除少数几本外,多数在注音和论韵方面错误百出,这并非是危言耸听。研究诗经须论及诗韵古音,自宋代吴棫、朱熹后蔚然成风,清代自顾炎武后,尤其是乾嘉时期,《诗》韵学大盛,成为音韵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此后,不论是关于诗经的专门著作或是普及性的选本,不能不涉及到古音古韵,这成为一个传统(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的研究就缺乏这个传统)。可悲的是,这个传统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危乎殆哉,何以致此?这是由于现代的文学史家"小学"修养不足之故,个别

人甚至视韵学为小道，近来有些诗经译注本少谈韵或干脆不谈韵，步赋、诗、词、曲研究的后尘。但也有些有识之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呼吁青年学子继承传统，这是值得欣慰的。

附记：本文成于1984年，其后出版的《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所注“蜎”音、“蠋”音亦不尽如人意。本文正式刊于《语苑撷英——庆祝唐作藩教授七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8年)。又《古汉语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96年)。

拙文考证的结论是，“蜎蜎者蠋”的“蠋”，其读音应该是 shǔ。《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年)从此新说。《古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古今汉语字典》(商务印书馆，2003年)注音仍旧作 zhú。

2003年2月20日

富有时代气息与创新精神的《古音系研究》

——为纪念魏天行师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二十世纪初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绵亘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王朝被推翻了,而代之以共和政体,这是与世界接轨的重大的一跃。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清末民初,西方的各种思想、学术潮水般地涌入国内,中西学术、新旧思想激烈碰撞,形成了罕见的百家争鸣的轰轰烈烈的局面。

在音韵学的领域内,主要表现为西方历史语言学的输入。众所周知,中国音韵学有悠久的传统,若以服虔、应劭使用反切法为起点,则已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成就辉煌。十八、十九世纪乾嘉诸大师的古音学及其后的陈澧、章炳麟、黄侃的韵学论著都是中国学者的标志性成果,这可称为传统音韵学的顶峰。而在同一时期,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蓬勃发展,盛极一时,成为显学。它起先以印欧语为研究对象,后来扩展到其他语言,以瑞典高本汉为代表的若干学者将历史比较法引进汉语音韵学,取得了非凡的成绩。高本汉关于汉语音韵学的系列著作即《中国音韵学研究》在1915—1926年陆续发表,其学说同时迅速传入中国,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视,引起了中国音韵学的重大突破,中国音韵学界就出现了新音韵学和旧音韵学两个壁垒。这一时期,好几位新音韵学者都编写了新型的教科书,多从语音学入手,介绍辅音的发音方法、发音部位,绘有元音舌位图,讲舌位的前后、升降,唇的圆否、口的开合,等等,较之旧的概论书,面目焕然一新,魏建功先生的《中国声韵学概要》即是其一。

而魏建功先生的《古音系研究》,与音韵学的通论和一般教材不同,应该说,是更高层次的专著。此书是魏先生十余年读书、研究、思考、实践的成果,1934年写成,193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出版。1996

年中华书局出重排本，2001 年收入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魏建功文集》，列为第一卷。这套《魏建功文集》共五卷，十分精美，代表了当今中国的出版水平，此非虚誉。

中国传统音韵学的特点是实用。顾炎武《答李子德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于诸子百家之书莫不然。"戴震《六书音均表序》："训诂音声相为表里，训诂明，六经乃可明。后儒语言文字未知，而轻凭臆解以诬圣乱经，吾惧焉。"段玉裁《广雅疏证序》："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依我之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家中，最有理论头脑的是段玉裁，惜乎段氏缺乏理论表述。其《六书音均表》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巅峰之作，仅 52325 字。这部经典性的著作提出的假说数以十计，有若干蕴含真理或逼近真理，然皆寥寥百余字，最多数百字，如《古四声说》："古四声不同今韵"，"古无去声之说，或以为怪，然非好学深思不能知也。"《古谐声说》："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都欠缺必要的充分的申说与论证，又如《音韵随时代迁移说》共 105 字，仅将"唐虞而下，隋唐而上"的音韵史分为三期而已。段氏尚且如此，他人可知矣。而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则是另一番景象，魏建功先生的《古音系研究》却建构了一个堂堂皇皇的理论框架，纵观中国语言学史，此前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著作，这是中国人自我创构的第一本研究自己语言的理论书，无论如何，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且看其书的结构，共分六章，前两章叙述"古音系的分期"、"古音系的内容"，重点是其后的三章"研究古音系的材料"、"研究古音系的方法"、"研究古音系的条件"，章下各节，条分缕析，细密周详。书末提出的古音系研究的二十个实际问题全是大题目，理论色彩很强的题目。《古音系研究》是一本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的专著，体大思精，出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自然有石破天惊的效应，即至今日，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1906 年章炳麟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主张将经学的附庸"小学"之名更为"语言文字之学"，这表明在中国的学术诸领域内，语言学谋求独立的地位，这是林间的第一枝响箭。二十年后，后继者的呐喊声更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魏建功先生在《古音系

研究》一书的《开宗明义(引言与总纲)》中说,“凡是在今日国音以前的音韵的研究皆属于‘古音系’中”,因此“古音系的研究成为语音史的意味”;又说,“凡是中国语言文字所表示的音的内容都是古音系研究的东西”,因此“古音系的研究成为语言史的意味”。这说明,上世纪初年,在长期的语文学传统仍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当时的中国青年语言学家已经具有建立汉语语音史和汉语语言史的自觉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作者接着讲:“无论谁何目前都没有办法完成这种宏愿。所以现在所谓‘古音系研究’必得说明是:对于如何担负完成中国语音语言史工作使命的讨论和报告。”作者的本意在导乎先路,所以此书的宗旨在讨论如何研究“古音系”,即如何建立语音史和语言史。

此书首先详述古音系的分期和内容,将汉语语音史自公元前十一世纪至二十世纪分为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元明清及现代共七期(此分期本于其师钱玄同的学说而有发展)。书中论列的研究古音系的材料共十种,除了人们熟知的“文字之假借及谐声者”、“文学作品之有韵者”、“反切和直音”、“古籍注疏及校勘记”、“韵书及韵学书、字典”外,还有“古今方言”、“中外译音”、“连绵词及古成语”、“汉字支音”和“同语族语”,后五者在旧音韵学书籍中是难以见到的。“中外译音”一节中引用了张星烺《菲律宾史上“李马奔”Limahong之真人考》和玄应、慧苑、慧琳音义的资料。“汉字支音”是指日本、朝鲜、越南的汉字音。“同语族语”即现在常言的汉藏语。在七十年前就强调这后五种资料,显示了先生思想的新颖和视野的广阔,乡曲陋儒岂能望其项背?在“研究古音系的方法”一章中,提出了“分部”、“审音”、“论变”、“探源”。“论变”就是研究语音变化的原因和规律,这正是今日我们后辈语言学人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书中构建出了一个庞大的音轨原则。先生将“分部”、“审音”、“论变”三法视作“语音范围中的音韵史性质的探源”,而“关乎形义”的“探源方法”的两个方面则是“语根”、“语法”。“如何使得这些研究的工作有完满的结果”?先生提出“书音、语音须等视”、“方言凡通语须分别”、“形音义须贯通”、“立论解释须为通则”等十条,都是真知灼见。指点针砭,议论纵横十四事,无不痛快淋漓。兹举一例:“我以为‘方音’的调查

是不够的,应该从‘方言’整理入手。方音的调查还是脱不了汉字块体的牵累。许多方音的特别在读字的音里找不出来。……真正许多语言有自然变化的痕迹并不是汉字的方音,而是汉语的方言。”今日的方言学家读到这一段,一定会五体投地,惊叹先生的先见之明。在《古音系研究》中,像这样的宏通之论,俯拾皆是。

《古音系研究》可视作新音韵学自二十世纪初出现至此书完稿时的成长过程的总结,表现了新音韵学的朝气蓬勃、充满创造力的特色,它将旧音韵学的“今音”、“古音”、“等韵”一以贯之;不仅详论“音韵”,且兼“形体”、“训诂”而通之。所征引、所评论的中外时贤的论著达数十种之多;所讨论的范围、所涉及的资料,上自甲骨文,下迄婴儿学语的讹音,东自日语、朝鲜语汉字音,西至敦煌遗书;所评论的新书新文有日本学者前间恭作的《鸡林类事丽音考》、国人赵元任的《广西猺歌记音》。凡此种种,囊括古今,包举宇内,气魄宏大,令人震服。

此书为新音韵学而呐喊,推崇新引进的高本汉学说,重视域外译音,重视北京音系十三辙和各地方音,提倡对资料的分析应具有时空观点,列举成说,而有按断,勇于争论,敢于批评,如对马宗霍、潘尊行、郭沫若、徐中舒、林语堂等的评论,多中肯綮,作者自述的“综论古今通塞,尚论群贤得失”的精神确乎在全书一以贯之,有“破”有“立”,“破”“立”兼重。

《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在那风云激荡的时代,魏建功先生的《古音系研究》堪称是音韵学乃至语言学领域内的最富时代气息、最富战斗精神的著作,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这部宏通的著作,至今读之,仍感到其充沛生机、震慑力量。

毕竟是七十年前的著作,由于当时学术水平和条件的限制,书中的所谓“音轨”原则失之琐细,汉藏语系的分类不确,等等,然而,我们不能苛求于前辈,评论一本书,应该看它比前人超出多少,应该看它比同辈高明多少,应该看它给后人留下多少。先生此书胜义纷若,启迪后学良多,如认为孙穆《鸡林类事》是研究十二世纪汉语和朝鲜语的宝贵资料,遗憾的是,孙书在国内至今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于此

可见《古音系研究》价值的一斑。

2001年5月底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20日，《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4期，现有增改。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语言学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291的《古音系研究》条系本文的略本，但撰写、交稿皆在此文之前。

“布文”辨识本末及其他

赵元任先生《语言问题》第七讲“方言和标准语”里有一段话：

> 不过方言这个名词在广义上讲起来么，也当根本不同的语言讲，比方清末在北京有广方言馆，事实上就是教英国语言、德国语言、俄国语言、法国语言、日本语言，各处很不同的语言，根本不一定有关系的、历史上不一定同源的一些语言。

为此，我就去找《广方言馆全案》读，我看的不是江南制造局原刻本，而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中的铅字新排本，1989年出版。

拙文《“方言”和〈方言〉》略叙了广方言馆办设的始末，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奏设上海同文馆，后改称广方言馆。《广方言馆全案》是当时的部分原始案牍的汇编，故价值颇高。赵元任先生列举了当时教学的语种，我顺着他的思路，所以拙文中也讲到上海广方言馆的情况：

> 学习的外国语文主要是英文，其次是法文、俄文、布文、德文。(光绪五年的“江海关道刘禀复南洋通商大臣沈”的文书中有“至俄文、布文，似应一并令其肄习”，“沪上广方言馆，向有学习英文、法文、布文生徒”，“至俄文、布文本应兼习”诸语，其中“布文”不知何指。)

日文一科未见提及。我说的五文是从《广方言馆全案》一书中勾稽出来的，英、法、俄、布四文见上引光绪五年文书，“德文”见于光绪十五年(1889)“江海关道龚移制造总局”文书，内云：“如有翻译俄文、德文精熟者，亦可咨送一二名。”

上个世纪，西方列强的舰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后，在这所培养洋务人才的外语学校里，教学的语种除英语外，还有法、俄、德语，自是情理中事，怎么又冒出个“布文”来？在《广方言馆全案》中出现了三

次，当非手民误植，百思不得其解。我想起了《书林清话》所载的一则史实：清高宗万机之暇观赏宋代书画，屡见建安“勤有堂”字样，想知道原委，于是在乾隆四十年正月丙寅谕军机大臣：“询之闽人之官于朝者，罕知其详，若在本处查考，尚非难事，着传谕钟音，于建宁府所属，访查余氏子孙……逐一查明，遇便复奏。”他身居九五，自会得到满意的解答，我是老九，只得在文中加注，盼通人赐教。可至今未得高明诲导，疑滞蓄于胸，总思得理而后安心。说来好笑，我也曾怀疑“布文”或许与比利时有关，但是转念一想，在19世纪后半叶蚕食鲸吞中国的列强中，比利时还排不上号，而且比利时用的主要是法语和佛兰芒语。我查了刘正埮、高名凯等《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岑麒祥《汉语外来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黄长著《各国语言手册》(重庆出版社，1990)，刘涌泉、赵世开《英汉语言学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辞海》(1989年版)和《汉语大词典》，均不得其解。后来也查过旧《辞源》、旧《辞海》，问题依然。

一日理不得，一日心难安，最近又查《中文大辞典》(台北中国文化研究所，1968)，没有“布文”条，却有“布国”、“布路斯”两条(后又查书，知袭自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我恍然大悟：“布文”者，德文也！郁积两载，一夕涣然冰释，浮一大白可也。且慢，还留有问题，何以《广方言馆全案》所录载的文书又有“德文”呢？

我长期不得其解，总结教训，犯的错误有三条：

第一，《广方言馆全案》收文书50多通，上起同治二年(1863)，下迄光绪二十年(1894)，仅31年，通常用“清末”二字即可概括，实际上“清末”的外延大于它。这31年时线虽短，其内却有时点之异，中西两方中最大的变化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乘普法战争胜利之威于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国。这段历史我在小学时就学过了，“文革”中在农场须读马恩著作，其一为《法兰西内战》，故更为熟悉。但是我思考“布文”问题时，总是立足于中方，中国历史太悠久，这“清末”中的31年，可谓“弹指一挥间”。压根儿就没想到普鲁士与德意志的问题。

有了德意志，所以广方言馆的光绪十五年(1889)的文书中有了

"德文"。但是光绪五年(1879)"江海关道刘禀复南洋通商大臣沈"文书中还叫"布尔",称布文教习为"布师",可是该文书中已出现"德国"字样,原文如下:

沪上广方言馆,向有学习英文、法文、布文生徒,以所请外国翻书儒士三人,兼充教习。嗣因布师金楷理离局,生徒无多,早经撤馆。……去夏教习法文傅兰雅请假回国,……现在傅兰雅经署理德国李星使咨留三月,翻译西书,……

再看《清史稿》卷一五七"邦交志"五"德意志":

德意志者,日耳曼列国总部名也,……同盟三十六国,而中唯布路斯最强。……(同治)十年春,李福斯递国书,言德意志各国共戴布国君主为德意志国大皇帝。

我错将时线压成时点,以至勾稽出来的材料"布文"、"德文"并列,而没有想到它们的先后关系。

第二,王念孙《广雅疏证序》云:"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此之不悟,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这段名言,耳熟能详,若遇先秦典籍,我也许会警惕,而于同光文书,视作近代。我没有能从"布文"想到"普文"(在汉语文献中不知有否出现此词)。再举最近一例,1993年5月19日在北师大宿舍区内的淮扬餐厅里,精致的菜单上有"鲜磨豆腐",我惊讶:饭馆里还磨豆腐?问了服务员,才知是"鲜蘑"。有文化的人往往拘执于形体,或许文化越高的人其蔽越深。王念孙说:"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其实,也应该"就今音以求今义","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第三,德语 Preussen,中国人先译为"布路斯",大概因为德语 P 是送气的,在重读音节中尤然,后译作"普鲁士"(清谢清高《海录》之"埔鲁写"、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之"普鲁社"当系据英语 Prussia)。如果广方言馆案牍中出现的是"普文",我想我能联想到普鲁士,而三次碰到的都是"布文",于是屯兵于坚城之下几近两载。与德语不同,汉语/P/、/P'/对立,送气与否,区分音位,自古已然。宋元切韵学著作对此都是严加区别的:《韵镜》和沈括《梦溪笔谈》为"清"和"次

清”,《卢宗迈切韵法》、《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为“全清”及“次清”,《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则为“纯清”与“次清”。我求解“布文”时,曾想到“比利时”,怎么也想不到“普鲁士”,我跳不出“全清”的藩篱,思想的触角涉及不到“次清”的领域,这大大影响了我的“认知”过程。

这都是愚鲁所致,特解剖如上,献丑了。

本末道罢,复附赘文:

一、我们需要一部完备的汉语外来语大词典、更大的汉语历史大词典。上海的《汉语大词典》即将出齐,这是空前的,但是也不应讳言,未惬人意。客观原因之一是汉语历史悠久,文献充栋汗牛,而研究太少。

二、汉语词汇的研究在乾嘉之世登上了一个高峰,但是直到本世纪上半叶,基本上限于先秦两汉(尤其是先秦)。五十年代起,唐宋元俗语词的考释蔚为红学,近年又有移师魏晋南北朝之势。这十几年由于台湾词语及粤方言词的大量涌进,新词语新词义受到语言学界的青睐,出版了不少论著。但是自上一世纪中国走出封闭起,西方语言和日语对汉语的影响,特别是对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形成所起的促进作用不为不大,而这段时间汉语词汇的研究显得很薄弱,如果研究得多,也就被词典吸收得多。

现在对汉语史的研究确实较以前深入多了,各个时期皆有学人在奋力攻关,但是有些论著,冠以“近代”或“魏晋南北朝”,所引材料上下数百年,地域遍全国,而书中却没有或较少言及时空的差异,则有压时线成时点,聚平面为一点之嫌,仍然有欠于精深。

三、我从《广方言馆全案》中辑录出有关语言文字的词语若干条,列于下,为研究同光之世的语言、历史、文化的学人提供些素材。括弧内为该词语首次出现的文书的时间。《总理各国事条衙门奏折》(页115—117)未署时间,置于同治六年(1887)和八年(1889)两文书间,只得标以“1887—1889”。兹分四类:

甲 语言文字(1863) 言语文字(1863) 语言(1863)

乙 中外文字(1867) 中西文字(1871) 汉洋文字(1887—1889)

丙 中国语言文字(1870) 中国语言(1870) 中国文字(1867)

清汉文字(1863) 清语(1863) 汉语(1863) 汉文(1887—1889) 华文(1870)

丁 外国语言文字(1863) 西国语言文字(1881) 西人语言文字(1870) 西语西文(1863) 西文西语(1863) 外国语言(1867) 外国言语(1867) 西语(1870) 西文(1863) 洋语(1863) 洋文(1867) 洋字(1863) 番语(1863) 夷语(1863) 英文(1879) 法国语言文字(1879) 法文(1879) 法语(1879) 俄文(1879) 布文(1879) 德文(1889)

“番语”、“夷语”皆仅一见于同治二年的公文中,可见清政府官员的倨傲之情,此后则习用“西语”、“外国语言”等。按,“英文”、“俄文”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方逐渐让位于“英语”、“俄语”,但至今仍有人使用。

四、章太炎(1869—1936)的《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丙午年即1906年第24、25期)在论述传统的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后,说:“合此三种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儿童占毕所能尽者,然犹名为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这为汉语言学史家所称道。章氏拈出“语言文字”四字必有所本,《广方言馆全案》的1863年及其后的文书中已屡次道及“语言文字”,或冠以“外国”、“西国”、“西人”、“中国”。

五、100多年前的上海广方言馆的历史应该是我国外语教育史上值得重视的一节。语种的地位,英语最高,法语其次,俄语、德语是兼习的科目。现在法语是小语种了,二次大战后法语的地位大为降低,以前则不同,请看光绪五年(1879)“江海关道刘禀复南洋通商大臣沈”的公文:“光绪五年正月十五日祗奉钧谕并抄总理衙门公函,以上海广方言馆学生,应令学习法文、法语。各国遣使办理公事,法文较为适用,现在同文馆学习法文者无多,将来必不敷用。上海广方言馆学生,向虽专习英文,刻下自应择其资质聪颖者,赶令学习法国语言文字,以期有济于用。”以后对法文生徒一直比较重视。总的来说,法文次于英文,光绪二十年(1894)广方言馆经费开支账内,英文设正教习兼翻译一名,副教习兼翻译一名,前者“每月薪修一百三十元,伙

食银三两六钱，油烛洋一元，跟丁钱五千文”，而法文教习兼翻译只一名，“每月薪修一百元，从前延聘洋人，现请华人，薪水较轻”。可见洋人待遇高，自“古”即然。

1993年6月

补志：“语言文字”四字的更早用例：《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仁传》：“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元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自序（撰于延祐二年）：“今士之读经，虽知主朱子说，不知读之固有法也。读之无法，故犹不免以语言文字求之，而为程试资也。”“文字语言”四字的更早用例是宋陈善《扪虱新话》上集（跋于绍兴己巳）卷三“三舍文弊”条：“崇观三舍，一用王氏之学，及其弊也，文字语言，习尚浮虚，千人一律。”又《金史·世宗纪》：“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

本文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通讯》第29期（1994年3月）。

1996年10月21日苏州大学石汝杰教授示我《齐如山回忆录》（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1989年）第28页：“同文馆乃经曾袭侯纪泽等奏请，于同治元年成立，即附庸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初只有英文法文。……普法之战（即德法之战）以后，德国日强，于是又添了德文，我入同文馆之初，还名曰布文，通称布国文字，布者布鲁斯也，后来称普鲁斯，后来才改写德文二字。”读毕大快。

1996年底

请见本论集跋语。

2003年2月20日

“退了”和“离了”

1995年9月2日上午，在虎踞路边碰到一位老领导，多年不见，问起他的情况，他劈头第一句就说：“我退了。”

当时我打心底里就嘀咕，他不是解放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嘛？应该是离休啊，怎么不说“我离了”？

回到家后，赶紧查《汉语大词典》，“退休”这词儿唐宋时代就已经在文献上出现了，现代更是个常用词了。“离休”这词儿是从“退休”衍生出来的，八十年代才出现。为了跟一般的“退休”区分开来，1949年10月1日前参加革命的，到规定年龄退休的时候，给一个特别的词儿，叫“离休”。离休者的各种待遇都比退休者丰厚得多，于是各单位纷纷多了一个机构，叫“老干部局（处、科）”，是为离休干部“办实事”的。“离休”一词历史太短，离休干部人数毕竟少，而“退休”则年远代长，退休人员比比皆是，“退休”一词可以涵盖“离休”，反之则不能，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里常用的术语说，浑言（统言）无分，析言则别。这也许是我的这位老领导宁愿说“退了”而不说“离了”的原因之一吧。

我再揣摩，看来还有第二个原因，“离了”的“离”往往指离婚。两年前吧，有位北京的老同学告诉我，北京的青年文化人离婚现象比较普遍，若干天不见，遇到时就问：“你离了没有？”最近看到一张小报上的文章《姜昆在家哄夫人》，里面有一段：“姜昆打趣说：‘常有人问我，哎，姜昆，圈里好多人都离婚了，你怎么还不离呢？我说：我也想离，可离不开啊，时间太长了，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多不容易啊！’”在新编的汉语词典里，“离”似乎可以加一个义项：离婚。虽然离婚跟结婚都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但是中国人尤其是老年人的习俗心理，离婚的事儿终究不宜逢人就说，张之于众的。如果一个老头子或老太太说：“我离了。”听者是要惊诧莫名的。“离”是忌讳字，好多地区民间不作兴两人

合吃一只梨，因为谐音字是"分离"，须知避讳是通常的社会现象。

看来就只有三种可能的说法了：

一是"我离休了"。但是这就表明说话者在显示自己的身份："我是老干部"，"我是老革命"。这有点儿不太符合中国人的自谦的传统道德准则。如果显示身份，易于引起对方反感。校图书馆的老×跟我讲过不止一次："有一天有个人到我们馆里来，自我介绍：'我是某学院教授。'馆里的人到今天还视为笑柄。"我的这位老领导知道我早知道他是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那是1965年我在他的领导下做越南留学生的汉语教员的时候。如果他现在在老部下面前摆身份，该是不合适的。他人我很了解，确实一贯的谦虚谨慎。

第二种说法是"我退休了"。未尝不可，然而在这"新时期"（按，这是借用研究现当代文学史的专家创造的新词儿，不知这"新"能"新"到什么时候），"退休"跟"离休"毕竟不同。上月清晨在校园锻炼时遇到一位西班牙语专业的屠教授，寒暄后他冲着我说："你知道我已经退休了？"他五十年代上大学时是调干生，但他是解放后才参加工作的，他只能用"退休"这词儿。

临到第三种说法"我退了"。在汉语中似乎有这种倾向：用双音词，比较明确，风格也比较庄重；但是在口语中，即使是知识分子的口语中，也常用单音词。不是做报告，而是路边寒暄，当然是口语，用了单音词，还有"浑言"的味儿，浑言的模糊自有其独特的效果。而且"退"跟"退居二线"、"从第一线上退下来"、"从省（市）委、省（市）政府退到省（市）人大、省（市）政协"的"退"又十分相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都是干部，而且是领导干部，至于从实权单位退到没有实权的单位的绝对是领导干部。

我的这位老领导脱口而出的"我退了"恰如其分，恰到好处。

1995年9月3日晚初稿

1995年12月14日三稿

本文曾先后请杨锡彭、张万起、蒋荫楠等先生赐阅，谨致谢忱。

此文原发表于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词库建设通讯》杂志1996年8月号。

《同义成语词典》序

闻得蒋荫楠、郭熙同志的《同义成语词典》大功告成，我等不得它转化为铅字，就迫不及待地拿来，一鼓作气地读下去，现在已近子夜，我反而觉得精神抖擞，当然是先睹之快的缘故了。

汉语同义词丰富，这我早就知道，而“同义成语”这名称，还是近几年耳濡目染方始熟悉的，从这儿也可看出近年来汉语研究的深入和普及。荫楠同志是国内最早研究汉语同义成语的学者之一，五年前即有专著问世。“君子以自强不息”，现在又推出这部四十万字的词典，收成语 1046 个，按同义关系集为 504 组，可谓洋洋大观。就我这个书店的老主顾所知，迄至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这样的词典，就此，也可垂之竹帛之史了。

我的先睹之快更在于这本词典之精。跟同义词一样，真正同义的成语很少见，绝大多数是近义，或许只有毫厘之差，倘若使用不当，也会谬以千里的。一本同义词典的关键在于辨异，于细微处见精神，荫楠、郭熙二同志正是于此奋其全力的。寓辨异于释义是其特点，例如“另眼相看”与“刮目相看”，乍看何其相似，词典解释前者为“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待”，后者是“改变过去的看法，用新眼光看待人或事物”，显豁如是！他如“苦口婆心”与“语重心长”，“惊天动地”与“惊心动魄”，“处之泰然”与“泰然自若”等组亦然。词典指出“刻不容缓”是客观形势紧迫，而“迫不及待”则是主观心情急切。“放任自流”、“起死回生”是施之于他人，使他人获得某种结果，而“放荡不羁”、“绝处逢生”则述自己。这类成语的歧异，我们纵然心知其义，而口不能言，编著者轻轻拈出数语，道出个中真谛，岂能不令人心折？对“泪如泉涌”和“泪如雨下”、“不约而同”和“不谋而合”等条，词典指出各自“偏重”所在，一语破的。

汉语成语大多数是四字，绝大多数是汉语不同时期的沉积物，我

们往往是囫囵吞枣地理解它，一般词典也不涉及其内部结构，而这本词典辨义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结构分析。譬如“光怪陆离”，不学如我向来朦胧地以为“光怪”与“陆离”并列，及至读到此条，才省悟到昨日之非，词典分析为“怪”与“陆离”并列，而为“光”的谓语，据此进而指出这个成语的意义是光彩奇异各式各样，确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如果经常查阅这部词典，不啻是朝夕晤对良师益友。

越是读下去，越发能体会，从句中的功能辨别同义成语是行之有效的。如“良莠不齐”通常做谓语，而“参差不齐”则可充任状语、定语，“甘拜下风”、“五体投地”、“心悦诚服”三者的差异也体现在各自的作用上。这本书对同义成语在句中的功能一一缕述，是又一特色。我想，“作某语”之类的叙述常为一般读者所忽视，其实如果想要更好地运用成语，对成语的作用应当重视，而且更应结合例句细加体会，如“参差不齐”条下的三个例句恰如其分地显示了它的三个功能。

谈到例句，我不禁想起一句熟语，“事非经过不知难”，读书人往往不知著书人的艰苦：有时要从十几张以至几十张卡片中才筛选出一条典型例句，有时“众里寻他千百度”，依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本词典里的几千条例句，固然取自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为多，但是稍稍注意一下括号内的出处，就会发现采集面之广，这都是作者惨淡经营的结果。有不少例句是几个成语连用，例如：“接二连三，又有几位幸运者被治好了，感谢信接踵而来，自然惊动了院党委和神经外科。”“他们不仅对孩子放任自流，甚至对孩子的错误也百般袒护。儿子在其父母庇护下，放荡不羁，由打群架到结伙偷盗现金、粮票以及珍宝器物，直至被公安机关拘留。”像这样的既能显其同，又复示其异的佳例委实难得，如何不令人击节叹赏？

每读一条总有所得，大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势。

如果要提建议的话，首先盼作者再接再厉，编出一本更大的成语词典，收录更多的汉语同义成语，还希望例句的范围更广些，更具典范性，释义与辨析能臻于善美的境地。两三年后想必能使我再一次享受先睹之快吧。

《同义成语词典》，蒋荫楠、郭熙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

《反义成语词典》序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这是唐诗中脍炙人口的名句，我想换一个字儿移赠荫楠同志，那就是把“人”改成“书”。记得去年的一个夜晚，怀着“先睹为快”的心情读完荫楠同志的汉语《同义成语词典》的手稿后，写了篇读后感，末了儿有这么一句话：盼荫楠同志再编出一本新词典，让我再次享受先睹之快。果然不到一年，这部汉语《反义成语词典》的厚达十几厘米的手稿就置于我的案头。而追溯以往，荫楠同志已写过四五本书了。我想，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书不同”作为荫楠同志近若干年的“业务考核”的“结论”，不可谓不恰当吧。

只要上街，我总爱往书店跑，看看有什么新书没有，那辞书架或词典柜前少不了我这个顾客。堪称琳琅满目，然而总觉得仍然缺少些什么。荫楠同志去年填补了一个空白，如今又填补了词典领域中的一个空白，以后逛书店的时候，心里肯定会觉得充实了许多。

跟前面那部词典一样，这本词典也是从意义、结构、用法、色彩及语法功能几方面，来解释、辨别一组反义成语的差异和主要特点，可算是“一以贯之”了，显然这是行之有效的一套方法。例如“理屈词穷”，有的成语词典解释为“由于理亏而无话可说”，对吗？不错。可是当我读到这部词典时，就觉得这样的解释更为得当：“理由道理站不住，没有辩解的话可说。”原成语是由两个主谓结构联合而成，今译如果加上“由于”就略微离了点谱儿。又如“众口一词”，有的成语词典解释是“所有的人都说同样的话”，而这部词典则以“大家”解释“众”字，就显得贴切多了。于细微处见精神，这正是在一词一句上的推敲斟酌之功啊。

现在常见的一句话：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的确如此。这部《反义

成语词典》收词条的标准是从意义和结构两方面综合考虑,因而比较严格。335组收成语695个,基本上是一组含两条反义成语,只有个别组含三条或四条。相比之下,有的书中有收词过泛之嫌,如与“假公济私”、“自私自利”反义的有“大公无私”,还有“克己奉公”、“廉洁奉公”;与“嫉恶如仇”反义的有“从善如流”,又有“拒谏饰非”;“安如泰山”的对立面是“危如累卵”,又兼及“岌岌可危”、“摇摇欲坠”。我看还是严格些好,宁缺毋滥比宁滥毋缺好。如今出版物之多确是空前,当然是繁荣的表现,可是繁荣的伴生物是“滥”字,这已是众口訾议的了。词典也一本厚似一本,条目也越收越多,未必不存在过泛的问题。不过我得加一个声明,不滥的多,不泛的厚当然是受到欢迎的。

作为读者,我的印象是这部《反义成语词典》比那部《同义成语词典》进了一步。这也表现在例句上。查一本词典不觉得,如果查两三本或更多的词典就会发现,那里面的例句常是辗转相抄、陈陈相因(又得加但是:完全不利用以前的成果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寻觅新例句是件大苦事,谁个不欲速成呢?而这本《反义成语词典》的例句三分之二是第一手资料,这是十分可喜的。诸如“好画还须有好题。题得好,对于画不啻是锦上添花。但反过来,假使题得不好,那算是佛头着粪。”在一段文字中同时运用一对反义成语,彼此相衬,更能显示反义成语的运用特色。准确的释义、精当的分析配以这类好例句,不啻是锦上添花。而这样的“花”在这部词典里是屡见不鲜的,若非殷勤搜觅,那得如此!这是这本词典的明显优点。

写到这里,我要回到这篇短文的开头,荫楠同志“岁岁年年书不同”,称之为多产学者不为过分,但要特别指出的是他可是位严谨的作者。为什么要作这样的“郑重声明”呢?因为近来报章杂志之多,令人眼花缭乱,而文抄公应运而生,错误百出的劣质货充斥市场,饱含水分的长文厚书触目皆是。班孟坚在《汉书·儒林传》里说:“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数千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不意复现于今日。不过这类低劣的“精神产品”犹如青霉素等药品一样,上面都打上个近在目前的“失效期”的字样。我跟荫楠同志十载相知,他“忠信”与“好学”兼而具之。学风犹人品,他一日一日地爬梳,一点一点

地积累，终于成就了一本一本的书，这本词典从收词、编组到释义、例句，无不是他寒窗灯下汗水的结晶。我敢说，这是本好词典，是一本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失效的词典。当然，不是说它丝毫没有可争议之处，例如“当面错过”是成语还是一般的四字格，就存在着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荫楠同志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从未想到停步，他只说过，退休之后就不大干了，可见他七十岁退休之前的二十年仍然是要大干的，试问至时驰骋了五十年的骑手会突然按辔徐行吗？且不论过远的将来吧，我相信，我将在最近的将来年年会读到荫楠同志的新著。

1987 年 10 月

《反义成语词典》，蒋荫楠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年。

关于《应用汉语词典》的一段对话

序　书可以有序，近年坊间的书几乎都有序，而且多为名人的序，但是是真货还是赝品，作者肚里明白。古代诗词偶或有序，就我浅闻，书评好像没见过有序的。何妨自我作古？本文之序曰：如今评书，优点一二三四五六，往往继以七八，畅叙良久，无可奈何，只得笔锋一转，缺点一二，难得三四，如此这般，蜻蜓点水，作者评家，皆大欢喜。可叹者，当今书评，千文一面，高度程式化。在下不揣浅陋，试写一篇可能只是在形式上给人一点新鲜感的书评，请诸位批评指正。

学生：老师，您家的书一定很多吧。

老师：是不少，橱子放不下，只好摞在地板上。不过，我有些朋友书比我多得多。

学生：请问，您哪一类书最多？小说吧。

老师：不，我的小说书很少。最多的，……嗯，嗯，……该是词典。

学生：您有多少本词典？

老师：那可多，论本数，上百。双语词典、外语词典不谈，《词律辞典》之类的也不谈。只谈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辞源》、《辞海》，加起来，就有二十几本了。古代的字典，如《玉篇》、《类篇》、《字汇》、《正字通》、《广韵》、《集韵》等等，线装书，本数就更多了。

学生：《唐诗鉴赏辞典》之类的书，您也有吧。

老师：那是有辞典之名的非辞典。

学生：您上课的时候常常说到，您读书、看报、写文章，总离不开词典，请问，是什么词典？

老师：现在手头常用的是《应用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的。

学生：为什么您要说“现在常用”呢？

老师：因为这本词典是2000年1月出版的，4月我的一位老同学送给我一本，我在使用和比较过程中发现这本词典对我最管用，所以成了我现在手头常用的一本了。

学生：请问老师，您说的“手头常用”，是什么意思呢？

老师：我用词典，一是在备课、写作时，一些字、词的形音义记不得，或者把握不准，就需要查词典，这是经常的事。还有一种情况，我是语言学人，二十年前则叫做“语言工作者”，虽然我的专业方向是古代汉语，但是我认为，我也应该关心当前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所以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的时候，碰到近十几年出现的新词新语新义或者我不太熟悉的、不懂的词语，我就随手摘记下来，有空的时候，就查查手边的几本词典，看他们收录的情况如何。相比之下，就算《应用汉语词典》收录的比较多，它能基本上满足我的这两种要求，所以成了我“手头常用”的词典。

学生：可以举些例子吗？

老师：我以前喜欢抄卡片，但是常丢，吸取教训，这次我就记在词典后面的几页白纸上。让我打开词典，念给你听听：

艾滋病 白马王子 百分点 保安 参照系 产出 炒作 充电 错位 代沟 定位 二手 反差 反思 肥皂剧 峰会 共识 含金量 黑马 滑坡 积淀 价值观 减肥 教父 卡拉OK 卡通 拉动 力度 立马 亮点 亮丽 绿色食品 卖点 泡汤 品牌 强暴 强势 强项 情结 热点 热销 软环境 软科学 三点式泳装 审视 T恤 效应 信息高速公路 性解放 性骚扰 整合 滞后 自然保护区 做爱

学生：那我们不如买本《新词新语词典》，上面新潮的词儿可多着呢！

老师：专门研究，就要使用专业性词典，比如说，要认识某个僻字怪字，就要去查《汉语大字典》，甚至《集韵》、《龙龛手镜》、《四声篇海》。不过，一般人随身携带的是小型词典，

手头常查的是中型的综合性词典,"手头常查"转文就是"案头必备",至于专门性的或大型的词典,那是插在书架上备用的。

学生: 新词语收得比较多,这是这本中型综合性词典的优点,我懂得了,谢谢老师。我再请问,对一般词语,这本《应用汉语词典》解释得也好吗?

老师: 让我再翻翻我的记录。哦,记了两条,一是"教学相长"这个成语,有一本我也经常用的词典,这样解释:"通过教学,不但学生得到进步,教师自己也得到提高。"讲得简单了些,是那本词典的体例决定的。《应用汉语词典》则详细得多:"《礼记·学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原意是学的人通过学习知道自己有不够之处,教的人通过教别人知道自己有搞不通之处,因此教和学是互相推进的。现在指通过教学,不但学生得到进步,教师自己也得到提高:教师天天在课堂上讲课,不单是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是教学相长,老师也得到益处。"引了《礼记·学记》的原文,解释了《礼记》的原意,也叙述了现在的意义,是繁了点,但是"繁于所当繁",繁得好,"应用"的意义于是在这儿凸现。又如,今年 6 月,我看到一本《文学评论》丛刊,第一篇是一位当今特有名的作家写的,题目也特吸引人,是《文学的悖论》,出于好奇,当然也有慕名的因素,我拜读了,读完以后,发现他通篇用错了"悖论"这个词。可是究竟是我对还是他对?得查书。当然,首先查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96 年修订本)没收这个词,《辞海》1999 年版解释比较专,还是《应用汉语词典》讲得明白些,容易懂:"指某些语意朦胧,是非难定,真伪难分的说法。如有人说:'我正在说的这句话是谎话。'对于这句话本身,人们根本就分辨不出,它到底是谎话还是实话。"后来我又查了些书,那位名作家的错,铁定了的。

学生: 请问这本词典,还有什么值得肯定的?

老师：它列了若干逆序词，就有了《佩文韵府》式的特点，那类诗韵书，列了大量“韵藻”，这种形式到了现代辞书里，就称为“逆序词”，这对于作诗的人，很管用。你到街上书店里走走，就会发现现代汉语逆序词典这样的书。《应用汉语词典》收了不少逆序词，我们买它一本书，就等于买了正序、逆序两本词典。我更欣赏的是词典的“文化方框”，它介绍和词目有关的文化知识、民间风俗、生活习惯等等，比如说，第1077页的“三宝歌”方框里有“江苏三宝”：“镇江香醋，苏州藕，南京板鸭没处找。”我是江苏人，我还不知道这个歌呢。这叫人长知识，好。又如第220页“主要旁系亲属称谓”，第240页“妻子对丈夫的各种称法”，第981页“妻子的别称”，这三个表格不仅对学汉语的“老外”管用，就是年龄不太大的中国人也未必能一一掌握这些说法。像第1332页的“五更、五鼓、五夜与古代时辰、现代时间对照表”，第1334页“五行与五方、五色、四季、五音对照表”，尤其是后者，其中的对应关系，我好多推不出来。第1173页“用手指比划的数字”，不是文化方框，而是“文化图”，这“文化图”是我给他杜撰的名称，不当吧，我曾经将这图特别介绍给外国留学生，他们个个兴趣横生，直是用手比划个不停。又如第721页“口令”的文化方框讲：“口令在中国很早以前就用于军事了。”举了春秋的时候吴国公子光和楚国打仗的例子。我这两年的科研题目是“古吴语北域之研究”，经常读《左传》中的吴史部分，昭公十七年的这一段吴楚之战的历史我看了好多遍，很熟悉，可是压根儿就没想到这就是口令的出处。看了《应用汉语词典》的这个文化方框以后，有一种快慰的感觉。

学生：请问老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条目还有什么？

老师：有，就是“沙尘暴”，我为什么特别重视这一条？因为在今年四月初吧，我和老伴儿一同去南京的名噪一时的“月牙湖”去游览，忽然阵阵尘沙扑面而来，真有点“风头如刀面

如割”的味儿，我好生诧异，位处长江之南的南京怎么会有这样的怪天气！难道是《西游记》里的什么魔王施妖法了？傍晚下雨，白衬衫上斑斑泥迹，晚上看电视，才知道这是从华北而来的沙尘暴。四月中，我去北京开会，发现北京人“谈暴色变”。5 月 12 日，我读了《应用汉语词典》第 1086 页“沙尘暴”条：“近年来中国西北地区沙尘暴发生的时间一年比一年提前，而且呈每年加重趋势，根本原因是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这个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看完了这几句，我疑心这词典是四五月间出版的，当时我还特地去翻找版权页，一看，明写着“2000 年 1 月第一版”。三天后，《新华日报》第三版头条新闻载，朱镕基总理视察河北内蒙古时指出：“今年我国频繁发生沙尘暴天气，直接原因是气候异常，但重要的原因是，北方一些地区毁林毁草开荒，乱采滥挖，草原过度放牧，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造成了土地沙化不断扩大。”我当即剪下了这张报纸，夹在第 1086 页。喏，就这张剪报。

学生：真有意思！真有意思！老师，这本词典还有什么精彩的内容？

老师：你说“有意思”，有个例句可真有意思。

学生：是什么？

老师：等我来翻，哦，“含金量”的第二义项“比喻实惠”，例句是：“局长工资虽不多，但含金量高呀。”我看了以后，不禁击节叹赏者久之。

学生：妙，妙。嗯，……老师，天底下没有没有缺点的事物，这本词典也会有吧，老师可不可以谈谈，启发启发我们。

老师：别忙，我刚才讲的是词典的内容，这本词典装帧也有特色。记得 1990 年秋冬，我在日本东京大学访学的时候，曾经几次去过神田神保町，看了岩波书店、三省堂等几十家书店，我很感叹，人家的词典各色各样，装帧都十分考究，看我们的书，多粗糙，多土气！现在这本《应用汉语词典》快赶上日本人的了，你看，我把书合起来，汉语拼音的

23个字母的黑影都现出来了,查起来十分方便。这有没有个专门术语?你知道不知道,请告诉我。

学生:我也不晓得。

老师: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本词典也有缺点,我就讲讲,不过这些是我翻查过程中发现的。先说排校上的问题,我发现了一些,例如第59页右栏第6、7行两个"谎话"错成"慌话"。请看第1076页,"三"的若干逆序词中有个"封三",就可以商榷。不是说它不对,我觉得逆序词也要列常用的,我在前面说过,写诗的人为了押韵,就喜欢从逆序词中挑选,就我的感觉,"封三"很难入诗,而且它太专门。"文化方框"里有"春联"、"挽联",而无"对联",何不以"对联"统"春联"、"挽联"?哦,我谈出兴趣来了,现在想跟你着重讨论一下"三点式泳装"一条,我琢磨了许久,也请教了好些朋友,现在跟你谈谈,怎么样?

学生:当然好啦。让我们长长见识。

老师:《应用汉语词典》的释义是:"一种女式游泳装,由乳罩和三角裤组成。简称三点式或比基尼(bikini)。(Bikini 比基尼岛,在太平洋中部偏西,由20个珊瑚礁组成,其中较大的为比基尼礁、恩尤礁和纳穆环礁。)"读者看完了,不禁要纳闷:"比基尼"泳装跟"比基尼"岛有什么关系?又,只有乳罩和三角裤两件,怎么叫"三点式"呢?语言学人往往喜欢刨根问底,追究词源,即得名之由,这也许可以叫做职业病吧。

学生:是的,我们也有这种习惯,这未必见得不好吧。

老师:如果读者再去查"比基尼"条,就会懂得百分之八十了。词典这样解释:"一种女子泳装。由遮蔽面积极为狭小的三角裤和两个乳罩组成三点的形式,所以也叫三点式。比基尼原是太平洋中马绍尔群岛之一珊瑚岛的岛名,由20来个珊瑚礁组成,其中以比基尼礁、恩尤礁和纳穆环礁为最大。1946年7月和1956年5月,美国军事当局曾先后两次在这个岛上进行了原子弹和氢弹试验,以测量

爆炸的威力。三点式泳装即以比基尼命名。"写得繁了些,但是只要能说明问题,就行。好就在于它叙述了"比基尼"女子泳装得名之由来,也谈了"三点式"的词源。看来《应用汉语词典》的"三点式泳装"条,不必对比基尼岛做简介,只要写"参见'比基尼'"即可。再说一句,"比基尼"条,将"三点"写得清清楚楚,倒不如移到"三点式泳装"条下,而"三点式泳装"条的"由乳罩和三角裤组成"一句则本应在"比基尼"条下,因为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第二版,1989)和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1981)等英文词典都说 bikini 是两件(two-piece)的泳装。人家着重 two,我们重视"三",如今什么"文化学"呀,"比较文化学"呀,很时髦,这可以不可以说是中外文化视角的差异?还有,"比基尼"条里的"马绍尔群岛之一珊瑚岛"这一句,也别扭。另外,我觉得,还有个精确问题也值得注意。

学生: 很抱歉,什么"精确",我不明白。

老师: 那我就多讲几句。早就有人说过,词典是无声的老师,是最博学的老师,词典给人的知识要正确。这是不言而喻的。《应用汉语词典》的"比基尼"条说,比基尼岛"由 20 来个珊瑚礁组成";"三点式泳装"条说,"由 20 个珊瑚礁组成":这是失于照应。究竟是多少个珊瑚礁?我为此查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1985),那书说:"由大约 20 个珊瑚礁组成"。可是《世界大百科事典》(日本平凡社,1988)说,"约 30 个珊瑚礁组成",比基尼岛在二战前是"委托日本统治"的,日本人该对比基尼岛也很熟悉。*The New Columbia Encyclopedia*(1975)则说比基尼岛包括 36 个小岛。而最新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1999)则说:"它由一串环形小珊瑚岛屿组成。"再谈另一点,《应用汉语词典》的"比基尼"条讲:"1946 年 7 月和 1956 年 5 月,美国军事当局曾先后两次在这个岛上进行了原子弹和氢弹试验。"可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说:"1946～1958年间,美国将比基尼岛作为核武器试验基地","1946年7月1日进行第一次原子弹试验,在空中爆炸;紧接着于7月25日进行水下试验","1954、1956和1958年进一步进行氢弹试验。先后共试验21次。1954年3月1日第一次氢弹试验时,……"《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说得概括:"1946年比基尼……进行过数次原子弹试验。在1954～1958年间进行进一步原子弹和热核试验中,比基尼……一直是美国原子弹委员会的太平洋试验场。"我为什么要去查权威书籍呢?大概有一丁点儿考证癖吧。我以为,编词典要力求精确。最后的,但是不是不重要的,就是"比基尼"的命名问题,还得推敲。

学生: 哦,这里面也有名堂?

老师: 《应用汉语词典》说:"1946年7月和1956年5月,美国军事当局曾先后两次在这个岛上进行了原子弹和氢弹试验,以测量爆炸的威力。三点式泳装即以比基尼命名。"这就是说,"比基尼"的词源和原子弹、氢弹爆炸有关。讲得更显豁的是《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 1978—2000》(花城出版社,2000):"因其亮相后引起极大的轰动,不亚于美国在太平洋比基尼岛上进行的原子弹爆炸试验,故以之命名。"不过,这是在中国流行的说法。我为此专门请教一位法语教授,他告诉我,他的老师一位加拿大的语言学专家的讲义上说,二战后期美军士兵到了比基尼岛,看到土著居民的这种简单的遮羞服,就叫它"比基尼",后来服装师再加以改进,做成这种极为简单的两件式的女式泳装,如果这一说成立,那么就与原子弹试验无关。日本平凡社的《世界大百科事典》介绍了两种关于"比基尼"词源的说法:1947年这种女式泳装在法国出现,引起轰动,有人联想起震惊世界的美国在比基尼岛的原子弹试验(按,该条撰写者误作氢弹试验),于是把这种泳装叫做比基尼。另一说法是,法国人 Louis Ruault 制作了这种样式的

女子游泳衣，申请专利出售，以“比基尼”命名。但是该条撰写者对此二说都表示怀疑，最后说：“词源还不清楚。”*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第二版)列了 8 条书证，头条引自法国报纸 1947 年 8 月的一篇文章，但是都没讲得名之由。看来，“比基尼”的真正词源还值得深究呢。

学生： 哦，这一对音译词和意译词竟然有这么多讲究！

老师： 我接着你的话发挥一下。对汉语来说，“比基尼”是音译词，至于“三点式泳装”，可以这样说，是中国人见到这“新生事物”后的“重命名”。“重命名”，是我点击电脑菜单时常见到的词儿，现在把它借用来，满合适的，我自己以为。嗯，我想做个预言家，若干年以后，“三点式”会战胜“比基尼”，就像“电话”和“德律风”，“扩音器”和“麦克风”的关系一样。“三点式”，重命名，能抓住特点，形象，很成功。

学生： 老师常说自己有一丁点儿考证癖，我们年轻，水平低，不敢谈什么“考证”，但是我们也想刨根问底，现在还打算问两个问题，请老师解答，“三点式泳装”……

老师： 慢，慢，我认为，“考证”就是刨根问底，你刨根问底，你就是在搞考证。你说有问题，什么问题？你说吧。

学生： 请问，“三点式泳装”这个汉语词什么时候出现的？在什么报纸或者杂志上首先使用的？如果能知道这位“重命名”的人就好了。

老师： 问得好，问得好！你的问题可真把我难倒了。我在读过《应用汉语词典》以后，也曾查过几本“新词新语词典”的书，遗憾得很，它们也只是释义，然后举两条中国报纸的书证，你刚才的三个问题它们都没讲到。人家的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可不是这样，几乎对每个词，都能达到你的要求。中国语言学界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寻找古书证特别起劲，甲专家说，某词是唐代出现的，乙找到六朝时的书证，丙说汉代就有了，我戏称为“甲乙丙竞古律”。可是对当代出现的新词新语新义，学人们却不留心，不及时记录，大概要等到这些词语成了古词语

的时候，然后由那个时代的词汇史专家去钻故纸堆考证，重演上述的甲乙丙的“故事”。你好学深思，今后多多注意这些问题，你如果能找到这个给比基尼“重命名”的人，我看，可以授予他奖金，现在的“奖”可真名目繁多，不少授给了那些不当授的。好了，扯得远了。

学生：不，不，您的话对我们很有启发，老师通过“三点式”和“bikini”，讲了那么多道理，真是“解剖”了“一只麻雀”。如果论这本词典，老师，恕我直言，您说的这些缺点好像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老师：这本词典就收了“大不了”。我说的是都是小小不言的事儿。

学生：对了，这“小小不言”，收了没有？

老师：待我查查，嗯，没收。我近两月看报纸，记下了一些词儿，它也没收。看，封三前的一页白纸上，我记了这些词语或者义项，在《应用汉语词典》没能查到：(电脑)病毒　担纲　跌破眼镜　封杀　附加值　高科技　搞定　搞笑　过电影　互动　酷　捆绑式销售　联勤　另类　马太效应　派红包　前卫　入道　亲和力　锁定　脱口秀　提升(水平)　揾钱　小蜜　演艺圈　艺员　涌动　造势　增加值。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要求《应用汉语词典》把今后未必能站得住的词儿或义项统统收进，例如“克力架”、“曲奇饼”之类。我在上面举的词儿里，有些似乎应该被收录，例如前些时，我走过一座大院儿，在大门门楼上，往常见到的招牌“南京军区后勤部招待所”不见了，换上的是“南京军区联勤部招待所”，我到今天还不懂，这“勤”怎么“联”法？谁跟谁“联”？我近来在报纸上常看到“高附加值”，我总是不懂，这些我真希望能在这词典里查到。

学生：我们今后也要注意搜集新词新语，学语言学的要紧跟时代，学习语言。老师，您是不是建议商务印书馆把这本词典增订一下？

老师：不用我们建议，出版社会积极增订的。如果见到主编，我倒是要建议两条：1. 每隔三四年出一个增订本，《辞海》

是每隔十年修订一次,《应用汉语词典》不能像它那么长,但是也不能增订得太勤,隔三四年,不左不右。2. 希望出版社利用电脑建立一个大型语料库,这样增订起来,既方便,又科学。我衷心希望商务的这本词典成为品牌词典,就像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学生:老师谈起词典来头头是道,您肯定是位内行。

老师:内行,谈不上,谈不上,我曾经参编过几本词典。做学生的时候,参加编《汉语成语小词典》、《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后来也滥竽《辞海》的编者,《辞海》1999 年版末尾有个编写人员名单,首列"1979 年版、1989 年版和 1999 年版均参加者"84 人,我倒数第 6。我希望我能再参加两次甚至三次。

学生:我衷心祝愿老师心想事成。今天收获真大!您累了吧,我该告辞了。

老师:你如果想要了解这本词典,还是自己去认真地读它的"前言"、"凡例"和封四。这本词典几百万字,它究竟有多少字,我不知道,中国绝大多数书的版权页上都载明字数,《应用汉语词典》我仔细找了,没找到。这样一部上百万字的词典,我没有从头到尾通读,只是就这两月翻查所得而言,谈到它的几条特色可真是挂一漏万,例如它的辨析同义词,标注词类等等,都是高明之处。我刚才议到它的不足之处,也是"姑妄言之姑听之"。

2000 年 7 月 29 日初稿

9 月 15 日修改毕

原载《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 年 4 期页 61—66。

说“读字典”

读者诸君，你们见到我的文章的这个题目“读字典”，一定会纳闷：“说起‘读’字，我们只听说过‘读书’、‘读报’，也有时听说过‘读文章’，什么时候听说过‘读字典’？谈到‘字典’，常常听到的是‘查字典’，偶尔也有‘翻翻字典’的说法，‘读字典’嘛，好像很少听说过。”

是的，教科书、小说书……这些书，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读”它们。为了考试，教科书必须自始至终地反复地读；有些好的小说书，像《水浒传》、《红楼梦》，我们往往读过好几遍；就是那些艰深的学术书，特别是经典著作，许多专家也能通读一遍，甚至多遍。而“字典”，一个字一个字的，一条一条的，有必要去读它？一本字典，那么厚，有兴趣去读它？能读得下去吗？中国古代的字典，数《康熙字典》最有名，编成以后，康熙皇帝赐名叫《字典》，后来这个专名成了通名，凡是“以字为单位，按一定次序排列，每个字注上读音、意义和用法的工具书”，都叫做“字典”，那康熙朝编的《字典》，只得加个帽子，人们管它叫《康熙字典》。这本字典恐怕只有一个人从头到尾通读过，这就是王引之，他奉道光皇帝的命令，勘正这本字典的错误，最后写成了《字典考证》，“更正 2588 条”。“考证”是委婉的说法。至于 1986 年至 1990 年间出版的《汉语大字典》，八大本，城砖似的，叫人望而生畏，除了主编和极少数专门的研究者外，一般读者谁敢说一声“读”？

一般说来，字典，确实不是给人读的，而是备查的。至于那大字典，更是只供人查的，读不得。可是小型字典，未尝不可以读，而且能读得下去。我认为，读字典，尤其是通读字典，值得提倡。

读字典，肯定有收获，可以大大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文化水平。如果认真地通读，那么字典上的每个字的形、音、义都能很好地掌握，掌握了，就能很好地运用，就不会出错、闹笑话。由于篇幅的限制，这篇文章只谈谈读字典和念错字的问题。

人们学习汉字，都有个过程。学会了若干基本汉字以后，类推律就起作用了。由于汉字里面形声字占大多数，形声字的读音和声旁的关系十分密切，因而许多字可以靠念偏旁念出来。念偏旁的办法有时确实管用，这是终南捷径，我小时候就听说过的家乡谚语“秀才识字念半边”，可以称做最精炼又带有风趣的概括。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众多的笑话也就由此而生。我亲耳听到有人把“不屑一顾”的“屑”念做“肖”，“唾手可得”的“唾”读成“垂”，“苦心孤诣”的“诣”成了“旨”，“以免向隅”的“隅”说成“偶”，“一蹴而就”说作“一就而就”，“龋齿”说成“禹齿”，“裸体”错成“果体”，“濒海”念做“频海”，“妃嫔”成了“妃宾”，犯这种错误的人文化并不低，他们多是大学文化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二十几年前，我听过很多老干部的报告，不是在乡下，而是在大城市里，那时的报告里面，有句常用语：“经过酝酿，……”，“大家在会后再酝酿酝酿”，这“酝酿”几乎十个有九个人说成 wēnrǎng。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一位造反派，当时在大学里是讲师吧，居然当众大声朗诵式地高叫“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 dāndān 的红太阳”，原来她不认识“红彤彤”的“彤彤”。以上讲的都是第一手资料，绝对真实。下面讲一个第二手的趣闻，是以前从我的一位朋友那儿听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山东大学校长成仿吾，接触过现代文学史的人无不知道他的大名，他，在二十年代的“创造社”里，坐第一把交椅，也是参加过长征，到过延安的老革命，可是到了 1966 年，他成了“走资派”，他坐“喷气式飞机”被批斗的时候，革命小将大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朗读毛主席诗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 xióngbà”。而两只手臂被反扭向上，腰弯得超过 90 度的成仿吾，却努力地拗起头来侧着脸，对小将们讲：“不对，是‘更无豪杰怕 xióngpí’。”最近的也是很著名的例子可以举出两则：有人将反对法轮功最力的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念成何作麻，这是一。第二今年 3 月 15 日全国各报几乎都刊登了这么一则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说，有一个县里的执法人员在办案时，竟然把“贿赂”说成“有各”！他说，今后要实行公开招聘加考试的办法，考试要笔试加面试，而且，这种考试要由专门的考试中心负责。李长春还风趣地说，这样一来，看他还怎

么“有各”?

这种念白字的事儿我们每个人都会知道很多。

不仅是今人有,古人也不少。有兴趣的,可以到冯梦龙之流编的笑话书中看看,多的是。叫人喷饭的两则笑话是,旧时的人学文化,总要读《论语》、《孟子》,于是有人将“季康子”念做“李麻子”,把“王曰叟”说成“王四嫂”,我想,这恐怕是故意编出来逗笑的,未必真有其事。我倒要在这儿讲一个古代的故意“念半边”的故事,极可能是真的,至少我以为。话说那大宋神宗年间,风流倜傥的才子周邦彦向皇帝献他的得意作品《汴都赋》,周邦彦是著名的词人,后来到徽宗时,他和汴京的名妓李师师及宋徽宗三者之间有一段皇帝与妓女、才子与佳人的感情纠葛,稗官小说常常作为话头,不知为什么现在的以“戏说”为拿手好戏的编剧、导演们偏偏冷落了这大好题材。言归正传,宋神宗接到献上的《汴都赋》,就在朝廷上立马命令一个文臣名叫李清臣的朗读,李清臣读得很是流畅,好像他对这篇赋早就熟悉的样子,在场的文人学士无不惊讶、佩服,因为赋尤其这种大赋里面,必有许多怪字,他居然都认得?皇帝,在封建时代被称为“圣人”,“圣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人,宋神宗对李清臣的朗读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李清臣怎么读,皇帝就怎么听。事后终于传出来了,对于赋中的怪字、僻字,李清臣就按半边念!要问上面说的李清臣读半边字的事儿“典出何处”?这是一般专家找不到的,我也是得自偶然。几年前,我为了查找宋代的语言学史资料,就去读南宋人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这是本目录书,正正经经的学术著作,从这本书我知道了这个故事,印象很深,所以记得。读了《直斋书录解题》后,我好奇,这《汴都赋》有没有传下来?我设法终于在一部罕见的古代丛书里找着了,果然有不少怪字。打破沙锅问到底,我倒要知道李清臣何许人也,到《宋史》里一查他的本传,端的了得!他是当时的大文人欧阳修的弟子,老师很赏识他,夸他和另一高足苏轼差不离。俗话说:“秀才识字念半边”,岂止是秀才,原来大臣和皇帝也不例外。可见“念半边”是古已有之的传统。不过这传统要不得。如今研究赋史的文学史家和《昭明文选》的研究家讲起赋的文学意义来肯定头头是道,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赋是跳着看的,我敢这样断言。为什么呢?遇

到僻字、怪字，下面双行小注里虽然有反切，但是没本事切出今音来，无可奈何，只得跳过去。如果请这些专家出声把赋读一遍，那真是将他们的军了。

我年轻的时候也勇于“念半边”，因为它有管用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训的增多，渐渐地怯于“念半边”，因为发现它不管用的频率渐渐高起来，真有点像古代武侠小说里一句套话，“江湖越走越寒心”，所以现在总要提醒自己：“勤查字典”。

是的，要勤查字典，遇到不认识的字，或者对某个字的形音义犯疑的时候，偷懒不得。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怀疑的字，就是说，自以为满有把握的字，我们是不会去查字典的。但是问题和笑话往往出在这些“绝对无疑”的地方，谁愿意“明知故犯”，在大庭广众之下，高声朗读“hóngdāndān 的太阳”，“更无豪杰怕 xióngbà”？那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自以为不会念错的字往往就有可能念错。

那怎么办呢？就应该由查字典进而读字典，最好是通读字典。你挨个儿读下去，就会时时惊出一身冷汗：“啊，这个字，我原来读错了！”“哦，这个字还有这么一个音！”

去年我要求我指导的每位博士生都要通读《新华字典》。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原因之一是我自己尝到读《新华字典》的甜头，读了《新华字典》使我免于出丑。

去年四月，我去北京开会。早到一天，是为了上街买书。王府井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两片门市部，那是我每次必去的地方，我买了好几本书之后，就走进商务印书馆大楼，去看老同学张万起。张万起是我们同学中的佼佼者，语法史、词典学上都很有贡献，出了很多书。叙罢别愫，我起身告辞的时候，万起撕开一摞小书的包纸，掏出一本递给我：“这，送你。”远看，花花绿绿的，挺漂亮，原来是《新华字典》，1998 年的修订本。我说：“你留着，送给哪位朋友的孩子吧。”万起用他那道地的北京话对我说：“甭客气，从我这儿出来的不会是盗版，准是真货。”

说起这发行几亿册的《新华字典》，我怎能不知道？但是，以前只是查查而已。自从有了《现代汉语词典》，最近得了《应用汉语词典》，我总是使用中型词典，把《新华字典》看作是小学生的字典，就很少去

查它了。四月那天我从张万起那儿得到了这新版《新华字典》,瞧,多么漂亮,挺招人喜爱的,回到了宾馆,我就躺在床上翻看起来,先是随意翻翻,后来就挨页读起来,越读越有趣,越读越吃惊。第二天、第三天开会,就在会前会后读,甚至会上,也禁不住偶尔查查。

我为什么由翻而读呢?是因为读了它,我发现我不认识的字有好多;读错音的字也好多,特别是那些多音字,有不少我只能读出一个音,实在惭愧,虚长一把年纪。比如说,“氽”、“𡈼”、“欻”、“膪”、“㩟”、“芡”、“蟅”,这些字我压根儿不认识,它们的音义全然不晓。再说“券”字,“入场券”当然是 rùchǎngquàn,可是建筑上的“拱券”,我一向都念成 gǒngquàn,浑然不觉其误。又如“慊”,我从来都读做 qiàn,这是个形声字嘛,声符是“兼”,自然“慊”是 qiàn 了,读了《新华字典》才知道,只是在意义是不满意的时候才这样念,可是意义是满意的时候,却念做 qiè!又譬如“镦”字,我一直只知道念做 dūn,一读《新华字典》,啊,它还可以读 duì,后来想想,大概是古音的什么“阴阳对转”的痕迹吧。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很多,限于篇幅,只得割爱了。

人生总有难忘的事,我总忘不了去年的 4 月 5 日,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最后一天,都被邀请去人民大会堂参加《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1 卷本的首发式,语言学界的在京专家二百多人出席,主编李荣先生和名公钜卿若干人莅临,很是隆重,《方言》杂志 1999 年第 2 期有关于这次首发式的详细报道,此处不赘。在这首发式上,我也有发言任务,发言稿我事先起草好了,纸上写容易,到时读就又是一回事了,在那样的场合,要是念错字,可就糟了,绝对是“贻笑大方”。我的发言稿讲到《牟平方言词典》,稿子上白纸黑字写着“牟平”,我长期以来都把“牟”字念成阳平声,压根儿不知道还有去声一读。可是在 4 月 5 日的会上,我却把“牟平”读成 mùpíng,我想,如果那天我念做 móupíng,在场的李荣先生准会生气:“怎么搞的?这个字都念错了!”我当时能读对,不是菩萨保佑,福至心灵,而是多亏在前一天晚上我读了《新华字典》。在这本字典的第 350 页上,我看到“牟”字,除了熟悉的 móu 音外,还有第二音,“mù 见 352 页”。我感到奇怪:还有这个又读?”于是跟踪到 352 页,只见:“mù[牟平]地名,在山东省。”我猛地一惊:“差一点儿明天要出洋相!”

地名、人名念错的可能性很大,例如唐代有令狐楚,是位诗人,也是高官,今人有令狐安,现任云南省委书记,这“令狐”一姓,我从来都念 lìnghú,直到读了《新华字典》,才知道应该念 línghú。至于“龟兹”应该读为 qiūcí,“月氏”应念 yuèzhī,“可汗”读做 kèhán,“冒顿”该读 mòdú,这些是老师教给我的,后来读了字典,就更加确信了。

读字典,特别是通读字典,绝对是件好事,应该提倡。我也听说过,以前有极个别人通读过《新华字典》,他们是先知先觉,值得学习、效法。读《新华字典》,要有决心,但是更重要的是恒心,坚持不懈地读下去,就能收大效。我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江学旺,他是个朴实的青年学人,去年他将 1998 年修订本《新华字典》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并做了颇为精确的统计。1998 年新版《新华字典》“凡例”:“修订后的字典计收单字(包括繁体字、异体字)10 000 余个。”我现在将这位青年学人的笔记摘抄如下:

《新华字典》(1998 年修订本)通读一遍后,我完全不认识和不完全认识的字,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音、形、义均不知的(其中有些形声字,虽然根据声符,也许可以推知其读音,但由于字形陌生,意义不知,故从严,仍归入音、形、义均不知的一类)有 1287 字。

二、对多音字,知其一音,而另一音不知,此类字 233 个。

三、读音不确者:

1. 声调不确者 75 字。

2. 声母不确者 14 字。

3. 韵母不确者 7 字。

4. 声母、声调均不确者 15 字。

他的笔记里,在每一项下,都工楷列举了所有的字,兹不录。

这位青年学人不会是第一位通读《新华字典》的人,但是他大概是通读了《新华字典》而且能做出精密统计的第一人,如果是的话,他应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

他的这个统计数字对于社会语言学、词典编纂学甚至教育学,应该说,都有一定意义。

请允许我冒昧进言:读者诸君,如果你们通读字典,可否也做一

次统计？这是利己、利人、利学术的善举。

2000 年 10 月

原载《语文建设》2001 年 1 期页 9—10。

附："贿赂"竟变"有各"

——广东人大代表猛轰庸才法官

北京 2000 年 3 月 14 日电 将"贿赂"念成"有各"，反映出一些基层法官综合素质低下、不能胜任执法工作的严重问题。人大广东团代表在审议"高法"、"高检"报告时，措辞严厉地对这种现象予以批评。

陈丽妮代表说，法官判案就像外科医生动手术，关乎性命。让不懂法的人去执法，无疑如同取人性命。但现在一些基层法院成了安排熟人的地方。她认为，对法官的任职要有严格的规定，上级法院只靠纠正错案解决不了问题。

昨天，听了陈丽妮及其他代表的发言，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说，有一位县里的执法人员在办案时，竟然把"贿赂"说成是"有各"！他说，今后要实行公开招聘加考试的办法，考试要笔试加面试，而且，这种考试要由专门的考试中心负责。李长春还风趣地说，这样一来，看他还怎么"有各"？

李长春最后强调，古时尚有"八百里内不做官"的规矩，而今在提拔、任用干部上，更不能"近亲繁殖"。他说："近亲繁殖容易退化。"

扬子晚报 2000 年 3 月 15 日

请见本论文集跋语。

2003 年 2 月 20 日

《孟子》“以羊易之”、“易之以羊”两种结构类型的对比研究

提要 在《孟子》里，甲型结构“‘以’＋介词宾语＋动词＋宾语”和乙型结构“动词＋宾语＋‘以’＋介词宾语”并存，很多古汉语语法书认为“‘以’＋介词宾语”可置前也可置后，或泛言某些差异，但是未中肯綮。《孟子》里还存在丙型结构“‘以’＋介词宾语＋动词”、丁型结构“动词＋‘以’＋介词宾语”。本文既对甲、乙型，又对丙、丁型的同异作了周详的分析，并且指出前组比后组出现频率高，表达内容广。本文进一步把这一问题放在汉语语法史的长流中考察，《孟子》语言反映了战国时期“以……”状语比起“以……”补语，已占很大优势；往后的发展前者逐渐淘汰了后者，也战胜了名词作工具状语的结构，而成为唯一的格式。

实际问题的细致研究应该导出带有理性的结论，故本文提出“调节论”：由于句内、句外成分的制约，语言对近似结构有所选择，自行调节，使各成分得其所，称其职，以达和协，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规则。

一

在《孟子》的“梁惠王”篇“齐桓晋文之事”章有这样三段话：

(1) 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

(2) 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3) 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

可见在《孟子》的语言里，“以羊易之”和“易之以羊”意思相同，这两种结构都能成立。

“以羊易之”的结构是“‘以’+介词宾语+动词+宾语”，我们称之为甲型。

“易之以羊”的结构是“动词+宾语+‘以’+介词宾语”，我们称之为乙型。

甲型和乙型的区别在于，“‘以’+介词宾语”一前置，作状语；一后置，作补语。他们所修饰或补充说明的成分叫述语。甲型是状述结构，乙型是述补结构。

对于古代汉语里“‘以’+介词宾语”的位置，不少古汉语语法书只是一般地说，可以前置，也可以后置。

也有些古汉语语法书指出了甲型和乙型的一些差异，如中国语法学的开山著作《马氏文通》讲：“‘以’字司词概先动字，其有后乎动字者，则司词长，不则语意未绝也。”[①] 又说：“转词介以‘以’字置于止词之后者，盖止词概为代字，而转词又皆长于止词，句意未绝耳。”[②] 但是杨树达的《马氏文通刊误》批评马说：“马氏谓‘以’字及其司词短者例居动字之前，长者则居动字之后，此但据类例之多少为言，绝无何等理论为根据也。……以‘句意未绝’为例外之理由，不成为理由也。盖凡无理论为根据，而但据见例之多少以立规则，其规则往往不能成立，有如此者。”[③]还有些著作也指出了甲型和乙型的某些特点，本文后面将予以讨论。

究竟这两种结构类型有没有区别？有什么区别？笔者拟就《孟子》这个内容一致的先秦语言材料，对甲、乙二型从结构和功能上进行对比分析。关于《孟子》，司马迁说，孟轲晚年“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朱熹说，全书“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观七篇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可就”（《朱子大全》）。《孟子》的语言口语性很强，明白流畅，句式纷繁而富于变化。《孟子》的语言基本上反映了战国中期的汉语的面貌，可以依据这部书的语言材料来研究上古汉语语法的某

① 马建忠原著，章锡琛校注《马氏文通校注》第335页，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② 同上，第189页。
③ 杨树达《马氏文通刊误》（1955年校订本）第89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些问题。

在《孟子》里，甲、乙二型有其相同之处，但也有较大的差异，试述如下：

（一）甲、乙二型的“以”都能表示“用”、“拿”。如：

(1) 汤使人以币聘之。（《万章上》）

(2) 贤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尽心下》）

(3)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梁惠王上》）

甲、乙二型的“以”都能表示“按照”。如：

(1)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梁惠王上》）

(2) 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尽心上》）

甲型的“以”还能表“因为”。如：

(1)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①]（《尽心上》）

(2)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尽心下》）

这是乙型的“以”所不具备的。[②]

（二）甲型如作句子的谓语，其主语都是施事。如：

(1)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万章上》）

(2) 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告子下》）

乙型则不然，其主语有的是施事：

(1) 王语暴以好乐。（《梁惠王上》）

有的是受事。如：

(2)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离娄下》）

(3)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梁惠王上》）

为什么这种句子的谓语取乙型而不取甲型呢？这与述语中动词的宾语“之”有关，“之”要与所指代的对象靠近，那就不让表工具、手段的介宾结构夹在中间，而把它放在后面。这两个“之”都是指代句

---

① 马建忠认为此句的“以”是“用”义，见《马氏文通校注》第189页。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译为“因为”，此从杨说。

② 王力先生已指出，见《汉语史稿》（中册）第37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中主语的。又如“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万章上》),因为“之”要靠近所指代的对象“汤”,故置介宾结构于后。

(三)在甲式里,“‘以’+介词宾语”在前,随后的不止是一个“动词+宾语”的结构,而比较复杂。如:

(1)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梁惠王上》)

(2)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尽心下》)

(3)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离娄下》)

(4)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万章上》)

在介宾结构之后的,第一例是由两个述宾结构组成的并列结构,第二例是兼语结构,末两例是述补结构,都比较复杂。如果把“以+介词宾语”也置后做补语的话,那“太挤”了。尽管“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很长,符合马建忠的“后置”的原则,但也后置不得。

在乙型,“以……”作补语,其前的被补充说明的成分只能是单纯的述宾结构。如:

(1)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梁惠王上》)

(2)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公孙丑下》)

(四)甲型可以和特别的指示代词“者”[①]组成体词性结构。如:

(1)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公孙丑上》)

(2)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梁惠王下》)

未见乙型加“者”的用例。

因为“谓词性结构+者”变成体词性结构时,其中的谓词要尽量靠近“者”,这样介宾结构置于前为宜,所以只有甲型可以加“者”。

(五)如果“以”的介词宾语是特指代词“所”,只能取甲型,如果是疑问代词“何”,也多取甲型。如:

(1)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告子上》)

---

① “所”和“者”,《马氏文通》称之为接读代字,黎锦熙《比较文法》称为联接代词,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称为特别的指示代词。

(2) 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滕文公上》)

(3)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梁惠王上》)

(4) 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梁惠王下》)

代词"所"、"何"作宾语时必须放在介词"以"的前面，所以整个介宾结构前置。

在《孟子》里，只有一例"何以"置于述语之后：

敢问招虞人何以？(《万章下》)

这也许是整个"招虞人何以"作"敢问"的宾语的缘故吧。

(六) 甲型的"以"可以不带介词宾语。

(1) 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尽心下》)

(2) 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梁惠王上》)

(3) 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滕文公下》)

关于这种句型里"以"不带介词宾语的问题，流行的见解是，"以"后省略，而且是省略了一个"之"。①可是在《孟子》里未出现过"以之"，马建忠早就注意过这个现象，他说："'以之'二字，经籍罕用。"②王力先生说："至于介词后的宾语被省略的就比较多了。最常见的宾语的省略是在介词'以'字和'为'字的后面。其所省略的应该认为是代词'之'字或'此'字。但是，这里所谓'省略'就仅仅是为分析的便利而说的；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根本不能补出这个代词宾语来。"③ 否定了省略"以之"说是对的。以上举三例而论，第一例可说"以"后省"关"；第二、三两例省略什么词语呢？只能说，"以"的意念上的支配对象不是确定的，第二例指某道理，第三例指梓匠轮舆的劳动。本文的提法是，"以"后可以不带介词宾语，犹如及物动词可以不带宾语，

① 见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第51页、407页，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杨伯峻《文言语法》第122页，北京出版社，1956年版。刘景农《汉语文言语法》第130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 见《马氏文通校注》第337页。该页引"以之"五例，皆出自韩愈文。

③ 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第46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不得谓之“省略”。

（七）“以……为……”是甲型结构的一种。如：

（1）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告子上》）

（2）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告子上》）

（3）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离娄下》）

（4）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万章下》）

第一、第二两句中“为”的动作意义较强，三、四两句表示意念中认为什么是什么。虽不尽相同，但结构是一样的。“以”也可不带介词宾语。

未见“为……以……”句。

（八）如果两个谓词性结构在一起，则甲式必居于前，而乙式必居于后。如：

（1）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尽心下》）

（2）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告子下》）

（3）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万章上》）

两个谓词性结构在一起，其核心——谓词要尽量靠拢，语言自然地调节“以……”的位置。

（九）甲型前可以有副词“不”、“无”，构成否定式。如：

（1）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告子下》）

（2）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万章下》）

（3）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万章下》）

也可前有助动词。如：

（1）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梁惠王下》）

（2）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下》）

未见乙型前加否定副词构成否定式或前加助动词之例。在乙型里，述语和补语是紧密结合的。

但是下面的例子值得讨论，似乎二者之间可以有副词：

（1）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

利。(《公孙丑下》)

(2) 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尽心下》)

可是,这些"不"后的"以"是否是介词,值得怀疑。请看下面诸例:

(1) 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离娄上》)

(2) 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人而闭之门也。(《万章下》)

(3) 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告子上》)

例(1)(2)中,"不以……"与其前的谓词性结构之间有连词"而"。例(3)中,"以"前有"必",甚至还有个"亦"。这三例的"以"如果还看成介词,那是扞格难通的。这应该是动词。从历史上看,很多介词是渊源于动词的,在战国时期的《孟子》里出现动词"以"是不足为怪的。下面诸例也是动词"以"做谓语的:

(1)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离娄上》)

(2) 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万章下》)

其主语是"主语+'之'+谓语"的结构,而且有语气"也"停顿,这两例中的"以"该都是动词了吧。关于第一例,马建忠说:"'以',动字,'仁',止词,合之为语词。"① 黎锦熙先生同意马说。② 而杨树达的看法不同,他说:"'以'字是介字,'仁'字乃'以'字之司词。……不得谓'以'为动字,'仁'为止词也。盖此语在常法当云'三代以仁得天下'。然孟子之语气欲侧重'以仁',故与常法之组织先后不同,而词性则无异也。如马氏说,则意义用法全同之词,其词性亦变迁无定,学者岂尚有规矩可循耶!"③ 显然马是而杨非,下面两例委实找不到"常法之组织",还能认为其中的"以"是介词吗?

(1)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公孙丑上》)

(2)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

---

① 《马氏文通校注》第17页。

② 黎锦熙《比较文法》(1957年校订本)第138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③ 《马氏文通刊误》第5页。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

总之，要区别动词"以"和介词"以"。从"以"由动词衍为介词的历史发展看，在《孟子》里"以"有动词用法似不足为异。

"以……"做状语的甲型结构功能比较齐全，可以有否定式，能愿式，是个有前途的结构，而乙型结构则反是。

（十）在乙型里，动词的宾语都很简单，其中代词"之"较常见。而补语中，"以"的介词宾语的词的数量，除一例外，或比动词的宾语多，或与之相等。换句话说，论长度，补语或长于述语，或相等。如：

（1）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滕文公上》）

（2）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欿然，则过人远矣。（《尽心上》）

（3）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万章上》）

（4）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离娄下》）

（5）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梁惠王上》）

三十几例中只有：

（6）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尽心上》）

其中的介词宾语短于动词的宾语。

至于甲型，介词宾语的长度或和动词宾语相等。如：

（1）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梁惠王下》）

（2）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滕文公上》）

介词宾语的长度或小于动词的宾语。如：

（1）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梁惠王上》）

（2）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告子上》）

（3）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告子下》）

介词宾语或长于动词的宾语：

（1）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上》）

（2）伊尹以割烹要汤。（《万章上》）

这些如果换用乙型表示也未尝不可，如"以行与事示之"换成"示之以行与事"，试与"杀人以梃与刃"（《梁惠王上》）比较可知。

但介词宾语长于动词宾语的，很多例不能换成乙型，亦即他们只

能取甲型。如：

(1)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尽心上》)

(2) 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离娄上》)

(3) 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万章上》)

(4)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万章下》)

例(1)有"者"，例(2)前有"不"，例(3)后有补语"于虞"，例(4)是"以……为……"式，这都是甲型结构的特点，尽管介词宾语长，也得前置，前已论述。

马建忠说："转词介以'以'字置于止词之后者，盖止词概为代字，而转词又皆长于止词。"① 以《孟子》语言来检验，这个看法大体还可以，只是不够严密：第一，乙型"动词＋宾语＋'以'＋介词宾语"中，动词的宾语(即马氏的"止词")不一定都是代词，也可以是名词或简单的词组；第二，"转词"亦不"皆长于止词"。杨树达批评马氏时说："马氏谓'以'字及其司词短者例居动字之前，长者则居动字之后。"② 事实上，动词前的"以"的介词宾语有短的，有长的。

二

上面对甲型"'以'＋介词宾语＋动词＋宾语"、乙型"动词＋宾语＋'以'＋介词宾语"作了对比、描写、分析。如果述语部分仅仅是动词，不带宾语或不能带宾语，也可以用"'以'＋介词宾语"作状语或补语，那么，

丙型："'以'＋介词宾语＋动词"

丁型："动词＋'以'＋介词宾语"

下面将对丙型和丁型作一些对比分析。

其相同处在于无论丙型或丁型，充任述语动词的可以是不及物动词，所以不能带宾语，这是跟甲、乙型的大异之处。如：

---

① 《马氏文通校注》第189页。
② 《马氏文通刊误》第89页。

(1) 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万章上》)

(2) 孔子进以礼,退以义。(《万章上》)

在《孟子》里,“来”、“进”、“退”都是不及物动词、唯“来”与“进”各有一例带宾语:“劳之来之(《滕文公上》)、“国君进贤”(《梁惠王下》),但都是不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①] 杨伯峻先生认为:“动词为不及物者,虽单音词,‘以……’仍在前。”[②] 按之《孟子》,这话是可商榷的。

丙、丁二型里,述语有些是由不带宾语的及物动词担任。如:

(1) 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万章上》)〔比较“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万章上》)〕

(2)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告子下》)〔比较“食而弗爱,豕交之也”(《尽心上》)〕

(3) 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公孙丑下》)〔比较“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公孙丑上》)〕

(4) 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滕文公上》)〔比较“教人以善谓之忠”(《滕文公上》)〕

(5) 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公孙丑下》)〔比较“辞尊居卑,辞富居贫”(《万章下》)〕

诸例中“养”、“交”、“畔”、“教”、“辞”都是及物动词(从比较可知),但不带宾语。吕叔湘先生说:“动词后既省‘之’字,‘以’字就非居动词后不可。……不能说‘以钱与’,只能说‘与以钱’。”[③] 观《孟子》诸例,“以币交”、“以殷畔”是能成立的。

丙型和丁型的不同之处在于:

(一) 丙型作谓语时,主语都是施事。[④]如:

(1) 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公孙丑上》)

---

① 朱熹《孟子集注》释“劳之来之”为“劳者劳之,来者来之”。

② 《文言语法》第121页,北京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吕叔湘《文言虚字》第4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新1版。

④ “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离娄上》)主语是受事,这是由于谓语里的“可”起作用的缘故。在“可”字句中,动词有被动意义,见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第419页。

(2) 沈同以其私问……(《公孙丑下》)

在丙型里,介宾结构所修饰的述语,可以是单个动词,还可以是由动词组成的较复杂的结构。如:

(1) 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公孙丑下》)

(2) ……而以他辞无受,[①] 不可乎?(《万章下》)

(3) 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公孙丑上》)

(4)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尽心上》)

前两例述语是状述结构,后两例是述补结构。

丙型前可有否定副词和助动词。如:

(1) 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告子下》)

(2) 孔子则欲以微罪行。(《告子下》)

在丙型里,特指代词“所”、疑问代词“何”皆置于“以”前。如:

(1) 敢问其所以异。(《公孙丑上》)

(2) 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梁惠王上》)

丙型的“以”可不带介词宾语。如:

(3) 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滕文公下》)

(4) 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梁惠王下》)

前例“以”意念上的支配对象指上文的牛羊,后例“以”的意念上的支配对象指前面述说的一段话。

以上所述特点皆丁型所不具备。

(二) 丁型作谓语时,其主语可以是受事,“以”后的介词宾语比较长。如:

(1)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万章上》)

(2)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万章上》)

在第二例中,“以”的介词宾语颇长,而在丙型里,“以”后的介词宾语也可以较长,前引诸例可证。

---

① 《孟子》孙奭疏为“饰以他辞而不受”,可证“无”为副词。

从功能上说，丙型似甲型，丁型似乙型。在《孟子》里，丙、丁二型的核心述语动词是不及物动词，或虽是及物动词却不带宾语。甲型乙型的动词都带宾语，因而表达的内容广，出现频率高得多。

三

几点看法：

（一）甲型和乙型，丙型和丁型在结构上的差异是，“‘以’+介词宾语”前置为状语还是后置为补语问题。在功能上也有相当差异。“以……”的位置不都是随意的，并不如一般所云：可以前置，也可以后置。在《孟子》里，“以羊易之”和“易之以羊”之所以能在同一章内出现，是由于他们的“动词+宾语”部分与“‘以’+介词宾语”部分都很单纯的缘故。而且应注意到，“易之以羊”的出现环境：它是两个相连的谓词性结构的后一结构。原文是：“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

（二）有些著作提出一种“侧重论”，在古汉语研究和教学中颇有影响。刘景农先生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大抵用做状语时，述说的重点是在动词上；若做补语，就侧重在介词的宾语。”[①] 所举例子中有两则出自《孟子》：

（1）汤使人以币聘之。（《万章上》）

（2）招虞人以旌，不至。（《滕文公下》）

刘氏认为，前者述说的重点是在动词“聘”上，后者侧重在介词“以”的宾语“旌”，“就做动词‘招’的补语了”。

笔者的看法与之不同：如果仅仅一个动词（或带宾语），述说的重点自然是在动词上。但是当“以……”被加在前面的时候，“以……”这个状语不是无足轻重的，较之原来的单个动词（或带宾语），工具状语就是被侧重点。试揣摩《滕文公上》篇“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的一段著名的对话。孟子问陈相的几个是非问句，按先后次序排列：

（1）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① 刘景农《汉语文言语法》第200页。

(2)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3) 许子冠乎？

(4) 自织之与？

(5) 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

(6) 自为之与？

前三句孟子问话的重点是在动词“种”、“食”、“织”、“衣”和“冠”上，“必”起强调作用。第四、六句的重点在“自”，第五句的重点呢？决非“爨”和“耕”（若是，“耕”和“种”义近犯复），孟子是在问：许子是不是用釜甑来烧火煮饭，用铁器来耕田？重点在状语。待陈相回答“然”后，紧接着追问一句“自为之与？”这“之”就是指的“釜甑”与“铁”，诱出陈相的答案“以粟易之”，孟子马上就抓住不放，大发议论：“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械器”、“陶冶”都是承“釜甑”与“铁”而言的。第五句的重点不是明明在“釜甑”与“铁”吗？

再看《万章下》篇“敢问不见诸侯”章的几个正常的甲型句和乙型句：

(1) 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

(2)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

论语气的激烈，还是第二例中的几个“以……”状语显得突出。

再看该章末了儿的对话：

万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然则孔子非与？”

曰：“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也。”

难道不是强调的“以其官”吗？

我们的看法是：动词（或带宾语）如果加上了“以……”，这“以……”无论做状语还是做补语，都是侧重之点。现代汉语的工具状语皆前置，司空见惯，而古汉语却有工具补语，后置，这易于使现代人产生工具补语后置即为侧重点的错觉。

(三) 本文开始时曾引述了杨树达批评马建忠的一段话，在那里，杨氏有须以理论为根据以立规则的意思。笔者拟提出一种“调节论”。

在语言里，一个句子内的各个组成部分根据相互制约的关系而

自动调节，以求构成一个协调、和谐的统一体。在《孟子》的语言里，有“以……”，可担任状语，也可担任补语，从而造成不同的结构类型。选择什么结构类型，要受相互关系的制约。如“子产……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句，必须取甲型，因为“济人”后有补语“于溱洧”，如果把“以其乘舆”也放在后面，往哪儿摆？岂非太“挤”了？而“济人”前有状语，后有补语，就显得轻重得宜。“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句，“说”和“就”两个动词尽量靠拢，“之”要与被指代者“汤”接近，就必须以“以伐夏救民”殿后了。在两个连贯的谓词性结构中，甲、丙型必居前，乙、丁型必置后，这也是语言为了更好地表达思想，根据各个结构的形式特点，对他们自动调节、选择，以求协调、和谐的体现。

上面所讲的是在一个小环境内各个组成成分的自动调节，因受相互关系的制约而产生的调节可以在比上述稍大的环境内进行。请看下面诸例：

(1)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告子下》)

(2) 嫂溺，则援之以手乎？(《离娄上》)

(3)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梁惠王下》)

这三例都是取的“以……”后置式，是有原因的。例(1)，前有“则有庆”，紧接着来一个“庆”，“以……”就被调节到后面去了。例(2)，“之”指代“嫂”，靠近为宜。例(3)，“事”的宾语“之”指代前面的“狄人”，也应接近。

再观察下面三例：

(1) 王好战，请以战喻。(《梁惠王上》)

(2) 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公孙丑下》)

(3)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尽心上》)

三例“以”的宾语都是重复前面句子里的动词的宾语，[①] 若后置就距

① 三例中“以”的宾语都没有承前用代词“之”。马建忠说，经籍罕用“以之”，笔者曾查阅了若干先秦古籍，信然。

离远了，前置则有气势顺注之感。

吕叔湘先生在《文言虚字》里说，有些句子是宜于"以"字在后的，如"先以书遗之，告以将归"句，改成"以将归告之"就觉得不顺。[①] 我们认为，其所以不顺，是因为两个谓词性结构，前者取甲型，后者又取甲型的缘故。前为甲型，后为乙型，"以……"一居前，一殿后，则两翼舒展，重心平稳。

我们讲，在语言里，由于受着句内、句外成分的制约与影响，对近似结构有所选择，从而加以调节，以求协和，不是指某个具体人在说话的时候边思考，边调节，边说话，而是指语言自行调节，使有关成分各得其所，各称其职，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规则。

（四）很多介词是由动词变来的，这在语言史上不乏其例。《孟子》所反映的是战国时期的汉语，其中有动词"以"，也有介词"以"。动词"以"出现次数不算少，具有一般及物动词的功能，如可带宾语，可受副词"不"的修饰。由动词变来的介词"以"，可置于动词前，也可置于其后。在《孟子》里，介词"以"在前的结构很活跃，出现频率高，具有很多特有的功能；而介词"以"在后的结构出现频率低，与其他词的结合受着很多限制，例如就未发现乙型、丁型的否定式。这说明在那时，比起"以……"补语来，"以……"状语是个占优势的有前途的格式。后来"以……"状语逐渐取得胜利，淘汰了"以……"补语，也战胜了名词作工具状语的表达方式，[②]成为独一的形式。现代汉语的工具状语"用……"、"拿……"，置于动词前，至少在词序上就是承自"以……"状语的。

1964 年春初稿
1980 年夏修定

此文原载于程湘清主编《先秦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 年）。我在北京大学做研究生时，毕业论文是《〈孟子〉句法结构初探》，"文革"结束后取其中一节改增而成此文。今加提要。

① 《文言虚字》第 42 页。
② 如"子欲手援天下乎"（《离娄上》）

“隶书”辨

提要　本文作者在读了大部分现存两汉人著作及部分现代考古资料的基础上，考证史实，力辨成说。本文首先指出当代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启功的隶书之名起于秦代或秦汉之际说及康有为、钱玄同的隶书之名创于刘歆说之误，进而辨正班固《汉书·艺文志》“萧何六体”说和许慎《说文解字·叙》“秦书八体”说之非。首次明确提出西汉及东汉初只有“今文”一词，而无“隶书”其名。王莽复古，崇“古文”而黜“今文”，班固继踵，始命名为“隶书”，王充首先接受，许慎张扬其说，遂使“隶书”之名逐渐通行。江声、刘师培、马叙伦、胡朴安、唐兰、启功皆认为隶书是郡县小吏如狱书佐使用的草率、简便的书体，本文笔者用词义学和语法学的方法对秦及西汉的大量文献资料及考古资料作归纳分析，并以班固《汉书》作佐证，驳正前此诸家之误，阐述了“隶书”得名的真正涵义。

笔者尝试将文化史的研究融进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中。

文中还指出段玉裁擅改许慎《说文解字·叙》两处之谬。

也据大量文献考证了汉代若干词语的意义及其衍变。

目　　次

一　“隶书”究竟何时得名

（一）　“隶书”的名称变迁

（二）　辨“隶书”之名创自刘歆说

（三）　辨班固“萧何六体”说、许慎“秦书八体”说

（四）　辨前汉孔安国、孔臧三文之伪

二　“隶书”的真正涵义

（一）　“隶”不指称奴隶

（二）　“隶”和“徒隶”并不指称下层官吏

（三）　“隶”、“徒隶”、“徒”都指称罪犯

（四） 释"陪隶"

（五） 班固"隶书"说的涵义

三、辨程邈、王次仲创造隶书的传说

作为汉字重要书体之一的"隶书"，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在若干场合中使用。它这个名称始于何时？又有什么特有的涵义？历来不少文字学著作和论文都论及这两个问题。例如，对于前者，启功先生的颇有影响的专著《古代字体论稿》明确提出："字体的各种专门名称，实自秦代才有的。""把各种字体命以专名，始自秦代。"[①]这本书以较多篇幅论述了多种书体名称的涵义与关系，其立论皆与此观点有关。认为"隶书"之名始于秦代几乎是人同此言，该是不成问题的定论了，然而恰恰大有问题在。至于"隶书"得名的涵义，可以说，学术界迄今尚无正确的解释。何以致此？这是由于历来关于"隶书"的文献资料和说法，为数甚多，而"虚实之事，并传世间，真伪不别也，世人惑焉，是以难论"。[②] 我们必须花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笔者拟就这两个主要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简略地讨论一下隶书的创造者问题。

一、"隶书"究竟何时得名？

（一）"隶书"的名称变迁

长期以来学者们都相信班固、许慎的话，以为"隶书"这种书体在秦始皇时才出现。可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量的考古发现，尤其是云梦睡虎地出土的大批秦简，有力地证明了，"隶书"这种书体在秦始皇以前就已出现了。秦始皇在结束剪灭六国诸侯的战争后，惩于前此文字的分歧繁复，于前 221 年即统一的当年，下令"书同文字"，前 213 年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毁儒家经典，并重申"同文书"的禁

①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64 年，页 7—8。

② 王充《论衡·谈天篇》。

令,[①] 就是以秦国文字来统一关东六国文字。命令李斯等人整理出“秦篆”作为标准字体,实只用于刻石、诏书等庄重场合。而当时政务军务的繁剧、经济文化的发展、民间交往的频仍却使早已形成的“隶书”更广泛传播。就现有文献资料言,这种书体在秦始皇前或始皇时可能尚无名称。一个新事物刚产生,人们还来不及赋予专名,这在古代并非罕见之事。

至汉代,大一统帝国的长期稳固,政治、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使这种书体更为通行。汉时的人们就给予它“今文”的名称,以别于前此的书体。两汉时代的书籍大多是用“今文”书写的,例如马王堆三号墓中的帛书,很多是用“今文”写的,临沂银雀山一号墓出土的4942枚竹简,其文字则全部为“今文”。[②] 西汉的儒家经典多数也是用通行的“今文”写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今文经”。还有另一类儒家经典,即用以前的古文字书写的“古文经”。《汉书·艺文志》:“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又《景十三王传》:“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后汉书·儒林传》:“东莱费直传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汉书·郊祀志下》:“臣愚不足以迹古文。”可见“古文”就是统指“今文”以前的古字。“古文”、“今文”这两个相对的词都是先秦所无,汉代才有的。由于“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③] 到了汉代,这些陆续发现的用“古文”写的经书,看不懂了,需要转写成“今文”。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里就曾记载过:“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荀悦《申鉴·时事》云:“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今文”和“古文”的不同就形成了两类经书的差别,例如马融《书序》:“今文《泰誓》,皆无此语。”[④]《礼记·聘礼》“缫三采”郑玄注:“古文‘缫’或作‘藻’,今文作‘璪’”。又《士冠礼》“礼于阼”郑玄注:“今文‘礼’作‘醴’。”发人深

---

①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李斯列传》。

② 见《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75年第1期。《临沂银雀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2期。

③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④ 《尚书·泰誓序》孔颖达正义引。

省的是，历史上只有“今文经”这个术语，从无“隶书经”或“隶经”的说法。若是像历来专家们所说的那样，在秦代即有“隶书”专名出现，那么两汉用“隶书”写的儒家经典为什么不叫“隶文经”或“隶经”呢？而且，如在秦时即已存在“隶书”其名，那么汉人就应该经常使用这个词儿了。事实恰恰相反，笔者曾下了一番死功夫，查阅了现存的大部分两汉典籍，也翻阅了部分考古资料，竟没有寻找到一个真正的西汉时期的以“隶”作为书体名称的用例。

前人也曾认识到所谓“隶书”即“今文”，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四》：“汉之所谓……今文者，隶书也。……隶书，秦汉间通行。”清人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谈》也说：秦时的隶书，“汉谓之今文”。但是他们是“二元论”者，总认为两名并存。尚未有人提出这样一条明确的断语：在西汉和东汉初，就只有“今文”一词，而无“隶书”其名。

“自秦灭六国，席百战之威，行严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划灭，而民间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故自秦灭六国以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①] 这就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焚毁儒书双管齐下的效果。在西汉，立于学官的十四博士皆今文经学，而“古文”只见于偶或发现的古文经及出土的古器物上。宣帝时在扶风郡美阳县得了一只鼎，大臣们“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唯独张敞能识读铭文，辨认出这只是周代的一般彝器而已，[②] 可见几乎在整个西汉时期，古文已是与大众无涉，非专家不能认识的古董了。而至王莽执政、称帝时，情况却迥然不同。王莽“寻旧本道，遵术重古”，[③] 他曾“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④]。“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⑤] 霎时间大大热闹起来。刘歆在汉哀帝时与诸博士争立“古文经”于学官而未成功，此时成了王莽的股肱，“古文经”因而得以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② 见《汉书·郊祀志下》。
③ 《汉书·王莽传》。
④ 《汉书·艺文志》。
⑤ 《说文解字·叙》。

广泛流播,正式立于学官。[①]另一学者扬雄擅长“奇字”,刘歆之子刘棻就曾专门向他学习。[②] 好古之风甚嚣尘上。据《说文解字·叙》载,王莽及其心腹甄丰等定当时文字为“六书”:首列“古文”,“孔子壁中书也”;次为“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为篆书;第四才排上今文,但被改名为“左书”。左,佐也。左书,辅助性字体的意思。[③] 如此,僵死的“古文”、“奇字”竟昂然列于所谓“六书”之首,而长期通行的,官方和民间使用的主要书体“今文”却遭到这样的贬抑。

不久,赤眉、铜马等农民起义军于公元23年摧毁了王莽的“新”王朝,随之刘秀取得政权,统一中国。东汉王朝建立伊始,文字使用情况颇乱。史载,公元42年马援上书,禀陈了当时的文字混乱情况,到了他向光武帝提出“荐晓古文者”以正印文的地步。[④] 许慎记述了公元一世纪后期的知识分子对“古文”“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⑤] 可见“古文”、“奇字”在一世纪初年所以命运亨通,不过是王莽、刘歆等上层统治者“动欲慕古,不合时宜”[⑥] 的结果。违背历史潮流而泛起的沉滓很快被冲没下去,而活生生的“今文”始终是通用的主要书体。王莽等给的卑称“左书”也只留下一点痕迹:成为“今文”的别名,后代文字学家有时把它与后起的另一卑称“隶书”连用,如晋卫恒的《隶势》:“鸟迹之变,乃惟佐隶。”

“隶书”这一卑称怎样来的呢?它首先为班固所提出。班固是东汉初年的史官,他了解到“今文”是秦始皇时代的重要书体,这是他的“功”。(其实这种书体在秦始皇前就有了,1975年云梦秦简的发现证明了此点。)但是班固把这种书体的产生与两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所痛恨的秦始皇的严刑酷法联系起来,杜撰了一个这种书体的起

① 《汉书·儒林传赞》:“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汉书·艺文志》在“《周官经》六篇”下注:“王莽时刘歆置博士。”

② 见《汉书·扬雄传》。

③ 晋卫恒《四体书势》、北魏江式《文字源流表》、《说文解字》大徐本皆作“佐书”。

④ 见《后汉书·马援传》注引《东观记》。

⑤ 《说文解字·叙》。

⑥ 《汉书·食货志》。

源说,给了它一个更卑的卑称:隶书。《汉书·艺文志》"小学家"序讲:"是时(按,指秦始皇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

《汉书》成于汉章帝建初(公元76—84年)年中,"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①] 就现有文献资料言,在班固提出了"隶书"这一名称后,首先使用的是王充。其《论衡》称章帝或为"今上",[②] 或为"孝章",[③] 几次提到建初后的年号"元和"、"章和",[④] 尤其是在《宣汉篇》中提及《汉书》,可见《论衡》的成书是在班固《汉书》之后。王充师事班彪,年长于班固,但很服膺这位师弟,著作中多次称道,因此他也使用"隶书"这一名称是不足怪的。《论衡·正说篇》讲到《论语》时云:"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⑤]

虽然如此,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并不肯接受"隶书"这一名称。请看许慎的话,他在《说文解字·叙》(写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即公元100年)中承认:"诸生竞说字解经,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从"诸"、"竞"两字可见此辈人数之众!这群人坚认"今文"是仓颉造的,自古传下的正文,怎肯承认它是秦时起于官狱多事"施之于徒隶"的书呢?名称自然也在改易不得之列。他们依然按照今文"说字解经"。当时"学术界"争论如此激烈。许慎斥之为俗儒鄙夫,他继承并发挥了班固的观点:"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⑥]

由于许慎的《说文解字》曾"进呈御览",又是文字学的权威著作,影响巨大,再加上秦始皇的严刑酷法一直是人们抨击的目标,"隶书"

---

① 《后汉书·班固传》。

② 如《恢国篇》、《须颂篇》、《佚文篇》、《宣汉篇》。

③ 如《讲瑞篇》。

④ 如《讲瑞篇》、《自纪篇》。

⑤ 关于"隶书"一词的早期使用情况,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罗列了一些资料,但不完备。《论衡》的这个用例迄未为人提及。

⑥ 此从大徐本、小徐本。"隶卒"、"兴役戍",段注本改为"吏卒"、"兴戍役"。段改非是,后详。

之名遂为以后的学者所沿用，而“今文”一词逐渐被泯没。崔瑗的《草书势》：“惟作佐隶，旧字是删。”[①] 赵壹的《非草书》：“故为隶草，趣急速耳。”郑玄《尚书大传序》：“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欧阳生从其学而受之，声音犹有讹误，先后犹有差舛，重以篆隶之殊，不能无失。”《汉制度》[②]：“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③] 蔡邕的《圣皇篇》：“程邈删古立隶文。”魏晋时成公绥《隶书体》：“虫篆既繁，草藁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④] 潘岳的《杨荆州诔》、《杨仲武诔》、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草书状》、江式《文字源流表》等都把“隶”当作书体名称使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法云寺》载：“摩罗聪慧利根，学穷释氏，至中国即晓魏言及隶书。”“隶书”已经成了当时汉字的名称了。

（二）辨“隶书”之名创自刘歆说

“隶书”之名始见于《汉书·艺文志》，而前人多未加省察地把《汉书·艺文志》看作是抄自刘歆《七略》的，因此就有人认为“隶书”一词为刘歆所创。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中讲：“《艺文志》即《七略》原文，人皆知之。”又采其门人陈千秋说，认为隶书“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故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钱玄同称此说“真是颠扑不破之名论”。[⑤] 诚然在《艺文志》总序中有就刘歆《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之语，但他们把《汉书·艺文志》的话归在刘歆的账上则大可商榷。汉志于“《周官经》六篇”下注“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又著录了与刘歆同时的扬雄著作多种，刘歆后的杜林著作两种；在“赋”类序中引用扬雄的话称“扬子”。再看看我们着重研究的“小学家”类，序中提出了“隶书”的名称，下了定义，其下文内还

---

① 《晋书·卫恒传》。

② 《后汉书·礼仪志上》刘昭注：“谢沈书曰：‘太傅胡广博综旧仪，立汉制度，蔡邕依以为志。’”

③ 《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

④ 《初学记》二十一。

⑤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古史辨》第五册。

有这么一段话：“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这里首先讲到平帝时征天下通小学者赴京师一事，《汉书·平帝纪》有同样记载。按，刘歆受命继父校书，著《七略》，皆为平帝前哀帝时事，后来刘歆因移书让太常博士，忤执政大臣，外出补吏去了，仍是哀帝时发生的事。《七略》怎能写到平帝时事，并论及扬雄著作呢？至于“臣复续扬雄”的“臣”指谁？清刘光蕡《前汉书艺文志注》说：“此‘臣’字当是歆以父向《别录》为《辑略》中语，班未及改者。”这就是认定这些文字全是刘歆所作的主观成见的必然结果，刘向怎会去续扬雄的书？还是韦昭讲得对，“班固自谓也”。[①] 班固著有《在昔篇》、《太甲篇》，《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班固都提及自己的著作了，怎能把汉志算是刘歆的呢？

再者，如像康、陈、钱那样认定“隶书”一名是刘歆创造的，那么刘歆既已在哀帝时把“今文”改作“隶书”，为何事隔不久，至王莽定“六书”时再将“隶书”更为“左书”呢？《说文解字·叙》记载了“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定“六书”一事，许慎距王莽不远，所述当为可信。刘歆是王莽复古改制的得力助手和顾问，《汉书·王莽传》称“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定六书之名及次序一事，大司空甄丰是主管部门最高长官，不一定是主要的具体制定者。[②] 这件事怎会没有刘歆的份儿？凭学问和地位，他会属于“甄丰等”的“等”字之列的。他早在《移太常博士书》中就大为抨击秦始皇，试问，在辅助王莽制礼作乐声势煊赫时，他却抹掉自己前时创造的具有反对秦始皇严刑酷法含义的“隶书”这个名称，换上了一般的卑称“左书”，这种退步是可能的吗？

《七略》已佚，但后人在类书和注释中引用过，清代不少人做过辑佚工作。试以严可均《全汉文》所辑之数十条与《汉书·艺文志》对校，

---

① 《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

② 《后汉书·马援传》注引《东观记》载，马援上书请正印文，“事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奏可”。可见大司空是主管此类事的最高长官。

甚至对具体书的叙述语言也不太同。再看汉志，每一类书名列举后，总有个小计，如“书”类，小计为“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班固自注：“入刘向《稽疑》一篇。”颜师古发其凡例：“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可以认为：汉志所列书目系据《七略》而略有增删，每类的序则是班固自己撰写的。《汉书》的其他部分也有类似情况，如《律历志》：“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誉，征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羲和刘歆等典领条奏，言之最详。故删其伪辞，取正义，著于篇。”取刘歆之义罢了。

（三）辨班固“萧何六体”说、许慎“秦书八体”说

要确认“隶书”之名起于班固，还必须辨清“萧何六体”与“秦书八体”说，尤其是后者被奉为金科玉律，致历代文人及近现代文字学论著普遍认为秦人已规定字体专名，本文开始所引述的启功先生的话，即是代表。与此略有不同的是唐兰先生的见解：“秦书八体的说法，应该是秦汉之际才有的。”[①] 秦代或秦汉之际果真有“八体”吗？

“萧何六体”说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的：“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这段话极为可疑。前已论证，在秦始皇同文书和焚书坑儒、严禁私挟《诗》、《书》的双重打击下，“古文由此绝矣”。众所周知，汉承秦制，“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②] 东汉人陈宠谈到“萧何草律”时，也说“圣汉初兴，改从简易”。[③] 去秦法之苛繁，务从简易，这是两汉人对汉初律的共同认识。刘邦、萧何怎会在刚取得政权时就慌不迭地以法律形式复活不“宜于时”的，已为秦法所划灭的“古文”、“奇字”呢？特别应该指出，不是高祖时，而是惠帝四年，始除秦代的挟书之律，而萧何卒于惠帝二年，萧

① 唐兰《中国文字学》，开明书店，1949年，158页。
② 《汉书·刑法志》。
③ 《后汉书·陈宠传》。

何草律时,那些"古文"、"奇字"赖以传播的儒家经典还为伏生、张苍等少数人私藏,尚未公开重现,"古文"、"奇字"怎会如此昂然居首呢?刘邦、萧何既未除挟书之律,那么秦始皇同文书的禁令当时也未必取消。

又,汉王朝初建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①] 汉初帝后将相,多出身微贱,文化不高,怎会规定"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呢?又怎会定个讽书九千个不同的字这样的高标准来卡应试的学童呢?

班固之说自是难通,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继而提出"秦书八体"说:"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经过这一修正,确比班固的说法精巧了许多,如"书或不正,辄举劾之"的主语已不是一般"吏民"了。时间也被推前至秦时,但因秦"划灭古文"是无法抹杀的史实,故"古文"、"奇字"只得割爱。然而正如唐兰先生指出的:"李斯们既然要统一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又取史籀大篆省改而作小篆,又称秦篆,那末,假如是官定的字体,就不应该有大篆。"[②] 又,许慎讲,经过整理后的结果,"自尔秦书有八体",象"刻符"、"署书"、"殳书"等是否实有,究竟何指,后人挖空心思也讲不清。如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引萧子良说:"署书,汉高六年萧何所定,以题苍龙白虎二阙。"那怎么是秦书之一体呢?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论及这些字体时说得对:"其体茫昧。"秦始皇同文书后是不是有这许多"花体字",至今考古学无法证实。

班固说汉兴以六体试学童,许慎说是八体,二说甚相牴牾。弥缝者大有人在。如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当是汉初试以八体,其后重定《尉律》,乃以六体,许言其始,班要其终,各存其是,不必牵

① 《史记·儒林列传》。
② 唐兰《中国文字学》157 页。

合。"如此臆断！更多的人如李赓芸主张用许说纠正班说，[1] 王鸣盛的话尤为典型："二说大相矛盾，以予考之，许说是，汉志非也。"主要理由是"凡论文字，必以许慎为正，班虽在许之前，……不如许氏确也"[2] 更有人如宋王应麟要将汉志的"六体"改为"八体"。[3] 启功先生认为："可知学童受太史考试始得为史，这是自萧何以来的汉律。而所试内容，却前后不同。西汉承秦之后，试以'八体'；东汉承莽之后，试以'六体'。《汉志》沿用刘歆的蓝本，叙述没有《说文叙》详细，好似萧何之律即试'六体'。"[4] 许慎的说法就一定对吗？许慎自己感叹："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这部《尉律》既当时尚存，不应只为他一人所知。"隶书"乃秦八体之一，而汉兴又长期用以试学僮，是著之于煌煌《尉律》的，何以"诸生……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如此茫昧无知！尤其是早于许慎的班固，职为史官，更不应见不到这部《尉律》，他怎会把"八体"错成"六体"呢？王充也是早于许慎的，其《论衡·别通篇》云："孝明之时，读苏武传，见武官名曰栘中监，以问百官，百官莫知。夫仓颉之章，小学之书，文字备具，至于无能对圣国之问者。"最后的话与许慎颇相似，但未提到《尉律》。前人有云，许说，"固别有所本"，[5]《汉志》"小学家"类不是著录有《八体六技》一书吗？讲得最干脆的是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文序纠谬》："此云'八体'者，盖《八体六技》刘歆所伪撰，许慎用其说也。"试问，如果《八体六技》书中的"八体"确指"秦书八体"，[6]那末《汉书·艺文志》的著者班固（康有为说著者是刘歆），在著录该书后为何在序中摒弃"八体"说，反去大谈"萧何六体"呢？胡朴安讲得对："若据《汉书·艺文志》叙论，则《八体六技》一书，非汉兴所试之八体，合以亡新所定之六书。"[7]

---

① 见钱大昕《三史拾遗》所录。

②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廿二"试学童六体首古文误"条。

③ 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

④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页28。

⑤ 《说文解字·叙》段注。

⑥ 唐兰《中国文字学》页15："秦汉之际有一本书叫《八体六技》，八体固然是秦书八体，……"

⑦ 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页24。

班说既非，许说亦误，我们还要深究。现把"萧何六体"、"秦书八体"同"王莽六书"放在一块考察，看他们关系如何，依下列次序列表：

王莽六书	1．古文	2．奇字	3．篆书	4．左书	5．缪篆	6．鸟虫书	
萧何六体	1．古文	2．奇字	3．篆书	4．隶书	5．缪篆	6．虫书	
秦书八体			2．小篆	8．隶书	5．摹印[①]	4．虫书	1．大篆 3．刻符 6．署书 7．殳书

于此不难识破真相：西汉中后期儒家"古文经"陆续重现，王莽、刘歆等好古，遂使"古文"、"奇字"泛滥起来，作为"制作"的项目之一，他们把当时的各种书体概括为"六书"，但在次序和名称上注进了厚古薄今的观点。可以说，首先给书体排队并赋名的是王莽等人，而不是秦人，王莽等贬通行的"今文"为"左书"，启一恶端。"萧何六体"的内容与顺序全同于"王莽六书"，但是班固却把这"王莽六书"逆推二百年，挂在开国名臣萧何的名下，托古以饰其说，还踵继王莽、刘歆，进而给"今文"一个更卑的卑称：隶书。然而"萧何六体"沿袭之迹难掩，"隶书"名称及起源说又无多少人接受，许慎遂起而造出个"秦书八体"说以纠班固之失，屏"古文"、"奇字"而列大篆于首，又多搞了些"花体字"的名目来凑数。秦汉最通行的书体在班固的笔下得一"隶书"名称已属不幸，而至许慎，地位更为卑下，竟居末座，连任何一个"花体字"都不如了。如此，时人和前人（包括班固）"莫达"之说终于被他"达"了。

应劭《汉官仪》载东汉光武帝的《四科取士诏》，内有"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②] 光武帝以儒生而跻帝位，年青时，"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明帝"十岁能通《春秋》。……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章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摹印即缪篆。

② 《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

帝自幼“好儒术”。[①] 诸功臣及官吏皆通经艺。这与西汉高惠时君臣迥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就严格了，士人若“书疏不端正”，有司就要举劾。东汉初这一套制度是班固、许慎所熟悉的，“祖宗”立的法度，其后诸帝也许仍然遵行，那就可能更为班、许所亲知了。《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叙》的“书或不正，辄举劾之”，或许是班固、许慎取之于近而托之于古吧。

（四）辨西汉孔安国、孔臧三文之伪

我们在查阅现存的西汉时代的典籍时，发现把“隶”作为书体专名使用的有三例。一是孔安国的《尚书序》：“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按，着重号是本文作者所加，下同）二是孔安国的《古文孝经训传序》云：“鲁恭王使人坏夫子讲堂，于壁中石函得古文《孝经》二十章，载在竹牒，其长尺有二寸，字科斗形。鲁三老孔子惠抱诣京师，献之天子，天子使金马门待诏学士与博士群儒以隶字写之。”另一是孔臧的《与侍中从弟安国书》讲：“知以今雠古，以隶篆推科斗，以定五十余篇，并为之传云。”若上述著作可靠，则“隶”作为书体名称在汉武帝时已见载籍。

可是这些都是赝品！《史记》及《汉书·艺文志》均不言孔安国为《尚书》作传事，至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及《隋书·经籍志》才提及孔安国的《尚书传》。伪孔传乃魏晋间人所著，早成定谳。[②] 现存古文《孝经》孔安国传是清代乾隆时从日本传来的，清人考证是伪作。[③] 孔臧文则见于《孔丛子·连丛子》，而《孔丛子》也是地道的伪书，曹魏时人作。[④]

三文中都提到“科斗文”一词，似乎汉武帝时已有此名，实则“科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又《明帝纪》、《章帝纪》。

② 丁晏《尚书余论》指为王肃伪造。

③ 见丁晏《孝经征文》、郑珍《巢经巢文集》卷一《辨日本国古文孝经孔氏传之伪》。

④ 见罗根泽《诸子考索·孔丛子探源》。

斗书之名起于后汉，而大行于魏晋以后”① 作伪者企图托之于孔子后代以自重，却摭拾了当时流行的用语，恰恰露出了麒麟皮下的马脚。“科斗书”如此，“隶书”之名何尝有异？

伪书倒也不可因其伪而置之不顾，辨其伪，知其作伪年代，亦自有它的用场。本文前已论证，魏晋是“隶书”之名开始普遍使用的时期，这三篇伪孔文的用例不是可以作为有力的佳证吗？

孔颖达《尚书正义》引卫宏《古文奇字·序》，述秦始皇坑儒事，首有“秦改古文以为篆隶，国人多诽谤”语，但是孔氏同时代人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十七、《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还有《后汉书·陈蕃传》李贤注、《史记·儒林列传》张守节正义均引述同一坑儒事，开头悉无“改古文以为篆隶”一语，书名还有的引作《诏定古文尚书》，有的作《诏定古文官书》。唯宋代类书《太平御览》卷八十六作：“秦改古文以为大篆及隶字，国人多诽谤怨恨。”而且段玉裁认为《古文奇字》、《诏定古文尚书》等皆为《古文官书》之讹，并疑为南北朝时人依托为之。② 孙诒让和朱希祖提出《诏定古文官书》的作者不是东汉的卫宏，而是晋初的卫恒。③

清代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曾引《尚书考灵曜》：“秦改古文以为小篆及隶字，国人多诽谤怨恨。”查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及赵在翰《七纬》，皆无此语，当是桂馥误题书名。“隶书”一词并未在汉代纬书中出现。

二、“隶书”的真正涵义是什么？

“隶书”这一名称，使用了近二千年，涵义是什么，历来是有争论的。宇文钧的观点具有代表性：“‘隶’，过去有一种说法是指奴隶，这是错误的。‘隶’，是指官吏中的下层，即书吏和狱吏之类。他们为了书写的方便，就采用了民间通行的草篆，于是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字体。因为这种字体在被称为徒隶的下层官吏中普遍使用，所以称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科斗文字说》。

② 见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七《卫宏官书考》。

③ 见孙诒让《籀高述林》卷四《卫宏诏定古文官书考》、朱希祖《汲冢书考》。

为隶书。"①

对"隶书"涵义的不同解释，总是根源于《汉书·艺文志》的"是时（本文作者按，指秦始皇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短短数语，班固指出了"隶书"兴起的时代、原因、作用，道出了"隶书"得名的涵义。显然，在这段话中，"隶书"之"隶"，即徒隶也。要理解班固命名的真正涵义，就必须了解"隶"和"徒隶"究竟是什么意义，这是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隶书"说发端于班固，张扬于许慎，他们都是汉人，因此比较笨拙但也比较可靠的方法就是仔细研究两汉人著作中这些词的使用情况，从而确定其真正涵义，舍此别无他径。

（一）"隶"不指称奴隶

我们同意宇文钧的看法，把"隶"解释为奴隶，确是错误的。齐佩瑢说：隶书"这种苟趋省易的平民文字与六国古文的诡变简率，是不无关系的，或者因六国是亡国奴隶，故秦人斥其文字为奴隶文字"。②他认为隶书脱胎于六国文字，因六国是亡国奴，故得此名，这是错误的。

我们曾查阅了大量的两汉人著作，发现在汉代，作为奴隶名称的是下列诸词：奴、婢、僮、仆、苍头、庐儿、臧、甬、侮、获等，兹摘取数例于下：

民以饥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刘邦《罢兵赐复诏》③）

乃髡钳季布，衣褐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诫其子曰："田事听此奴。"（《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仆。（《史记·南越列传》）

---

① 宇文钧《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人民日报》1974年7月25日。

② 齐佩瑢著，赵荫棠校《中国文字学概要》，1942年8月，国立华北编译馆，页234。

③ 两汉诏疏文赋皆依这种方式注明，以示其语言的时代性。这些文章或见之于本集，或载之于史书。严可均辑《全汉文》、《全后汉文》可查。又，字下着重号是笔者所加，后同。

尝有客,遣苍头市酒,迂久,大醉而还。客不堪之,骂曰畜产。宽须臾遣人视奴,疑必自杀。(《东观汉记·刘宽传》)

奴从宾客浆酒霍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鲍宣《谏哀帝疏》)

臧、甬、侮、获,奴婢贱称也。(扬雄《方言》卷三)

在先秦,“隶”确作奴隶解,如《左传·昭公三年》:“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又《哀公二年》:“克敌者,……人臣隶圉免。”又《定公九年》:“臣尝为隶于施氏矣。”而在两汉,有少数“隶”作奴隶解,但多是仿古的用例。如:

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刘向《极谏用外戚封事》)

叔群既在皂隶矣,六卿兴而为桀。荀寅肆而颛恣兮,吉射叛而擅兵。(刘歆《遂初赋》)

论士苟定于志行,勿以遭命,则虽有天下不足以为重,无所用不可以为轻,处隶圉不足以为耻,抚四海不足以为荣。(王符《潜夫论·论荣》)

况此隶竖,生女为妾,生男为虏。(张安超《讥青衣赋》)

先秦的“隶”是奴隶义,但词义在变化、引申,至两汉,其主要意义之一是“卑贱者”、“卑贱的”,有时用作骂人语。试看下面诸例:

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汉书·叙传》)

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壶关三老茂《上武帝书》)

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司马迁《报任安书》)

饿馑流隶,饥寒道路。(班彪《王命论》)

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司马相如《上林赋》)

上以应天变,下以安民隶。(马融《延光四年日蚀上书》)

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①] 曾饿得寄食漂母,可从来没有做过奴隶。江充,前已明言是“布衣之人”,这“隶”用作定语,颜师古注为“贱

---

① 《史记·淮阴侯列传》。

也”。司马迁受宫刑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1] 岂是奴隶?“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说的是他与宦官无异,宦官是宫中备扫除的贱役。“萌隶”同“甿隶”,贾谊《过秦论》称农民起义领袖陈涉为“甿隶之人”,陈涉原是“与人佣耕”[2] 的雇农,不是奴隶。

富有启发意义的是,汉元帝时人史游的《急就篇》里有“奴婢私隶枕床杠”一语,乍看来,这“隶”不指奴隶又指什么?但注《汉书》的颜师古却解为动词:“隶,附着之义也。私隶者,言属著私家,非给公役者。”颜师古是了解汉代多数“隶”不作奴隶解的。而宋代号称博洽多闻的王应麟补注《急就篇》,却解为“隶,仆隶”,以正颜注。当为颜是而王非。

在汉代,“隶”并不跟“奴”连用为双音名词。汉语在古代,单音节词占优势,当双音节词逐渐增多时,因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便往往将前代语言中某单音节词拈来,与其时同义某单音节词结合成一个新的并列结构的双音节词,先秦“隶”(奴隶义)与魏晋的“奴”(奴隶义)组成一个双音名词便是一例。《汉书·司马迁传》颜注引晋尚书郎晋灼曰:“臧获,败敌所被虏获为奴隶者。”《后汉书·西羌传》:“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此例转变痕迹宛然。后来逐渐用开:《晋书·刘元海载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汝将何以视天地,尚不愧奴隶耶?”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原困屠解,奴隶厌肥豚。”人们往往因汉以前“隶”有奴隶义,汉以后出现的双音名词“奴隶”日益大量使用,于今尤烈,就误以为汉代的“隶”也是奴隶义。对具体语言未作具体分析,易于使人将“隶书”之“隶”释作奴隶。

(二)“隶”和“徒隶”并不指称下层官吏

“隶”和“徒隶”指称下层官吏,如书史、狱吏之类,持这种见解的除上述宇文钧同志外,又如唐兰先生认为:“把他们叫做隶书,徒隶

---

① 《汉书·司马迁传》。
② 《史记·陈涉世家》。

的书","恐怕只是郡县小吏所写,是隶书一类"。[1] 马叙伦先生认为:"此类书出自诸隶之手,犹今日官府文书皆由书记作之也,故号隶书。[2] 讲得更明确的如胡朴安:"隶书的兴起,是秦代专供给狱吏隶人用的。"[3] 丁易:"把它叫做'隶书',说是官府衙门里差人皂隶用的字。"[4] 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亦云:"当时办公文的小官叫做'徒隶'。"[5] 可见这是文字学界中的极为普遍的观点。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答曰:不然。

在官制上,汉亦承秦制。"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6] "吏"是官员的通称。高级官员可以叫"吏",如《汉书·谷永传》:"上从之,以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而平阿侯谭位特进,领城门兵。永闻之,与谭书曰:'……拜吏之日,京师士大夫怅然失望。'"这"吏"指最高执政官。又如刘歆因移书让太常博士,触忤执政大臣,"惧诛,求出补吏",此"吏"乃河内郡太守,[7] 不可谓低。笔者查阅了《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辑本),低级官员尽管在统治者的营垒中地位卑下,但他们绝不叫"隶"或"徒隶",而也可以叫"吏",还有的叫"史"或"书佐",具体名目繁多。在三书中职司刑狱和文书的就有"狱掾"、"狱吏"、"狱小吏"、"狱法吏"、"狱法小吏"、"狱史"和"书吏"、"书佐"等名称。如:

平阳侯曹参者,沛人也。秦时为沛狱掾。(《史记·曹相国世家》)

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秦时狱法吏冠柱后惠文。(《汉书·张敞传》)

吉本起狱法小吏。(《汉书·丙吉传》)

求为狱小吏,因学律令,转为狱史,县中疑事皆问焉。(《汉

---

① 唐兰《中国文字学》页165、页157页。

② 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二十九。

③ 胡朴安《文字学ABC》,ABC丛书社,1931年四版,页41。

④ 丁易《中国文字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外出版社,1950年,页72。

⑤ 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各种书体源流浅说》,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页41。

⑥ 《汉书·百官公卿表》。

⑦ 《汉书·楚元王传》。

书·路温舒传》)

既至官，当遣从史西，召善书吏十人于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遵冯几，口占书吏，且省官事。(《汉书·陈遵传》)

育径出曹，书佐随牵育。(《汉书·肖育传》)

其他如"监门吏"(《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里吏"(《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市吏"(《东观汉记·樊晔传》)、"驭吏"(《汉书·丙吉传》)、"御吏"(《汉书·张敞传》)、"骑吏"(《汉书·韩延寿传》)、"卒吏"(《汉书·何武传》)、"卒史"(《史记·萧相国世家》)、"市掾"(《东观汉记·第五伦传》)等等。笼统而言，则叫"下吏"(《汉书·韩延寿传》)、"小吏"(《东观汉记·第五伦传》)、"掾吏"(《东观汉记·吴良传》)、"掾史"(《汉书·杨敞传》)、"佐史"(《汉书·朱博传》)等。这些名称有的在秦时已出现，如云梦秦简有"佐史"(《金布律》)、"佐吏"(《置吏律》)。

这些人在地主官僚行列中属于下层，汉制，"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①]这些"佐史"都是为统治阶级卖力的，"治书定簿，佐史之力也"，[②]其地位仍在人民群众之上。贾谊《治安策》曾经描绘了这个金字塔式的统治机构："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这些"小吏"非但不叫做"隶"或"徒隶"，而且是站在"隶"或"徒隶"的对立面。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很多文字学论著将两者名称混同，以致误解了"隶书"的真正涵义。

(三)"隶"、"徒隶"、"徒"都指称罪犯

"隶"字，前已论及，在两汉，除了一些仿古的用例外，主要意义之一是"卑贱者"、"卑贱的"。"隶"还有另一主要意义，是罪犯、刑徒。从语源上看，这一义也是由奴隶发展而来的。在古代社会，经常把罪犯充作奴隶，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隶也，著于丹书。"杜预注："犯罪没为官奴，以丹书其罪。"后来阶级斗争和生产的发展，犯罪和服刑便有大小轻重之分。在两汉，刑徒与官私奴婢虽同是失

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

② 《论衡·效力篇》。

去自由的人，同样受“髡钳”或“黥”的刑，但刑徒的服刑及强制性服役是有一定期限的。

秦时有一种刑徒，是以“隶”作为名称的。1964年西安出土的秦昭王三十三年的高奴铜石权，铸有“工隶臣𢀛”等字①。秦昭王廿七年和四十年的上郡戈也都是隶臣铸造的。② 这些“工隶臣”，是被迫在官营手工作坊中劳动的男性刑徒。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多数是秦律条文，秦律中经常出现“隶臣妾”，如“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仓律》）。这种刑徒因年龄差别而有“大隶臣妾”、“小隶臣妾”、“免隶臣妾”（《仓律》）等不同名称。因被迫从事的工作差别而有“工隶臣”（《军爵律》）、“府隶”（《金布律》）、“牢隶臣”（《贼死》）等不同名称。在《汉书·刑法志》里也有“隶臣妾”，颜师古注：“男子为隶臣，女子为隶妾。”《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就记载了戚圉侯季信成、襄城侯韩释之等因犯罪成了隶臣。“隶”单独用的例子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③《汉书·刑法志》：“卒隶之徒，还为敌仇。”这两例中的“隶”都是指刑徒，如英布等；“卒”指戍卒，如陈涉等。④ 又《说文》十二上：“阍，常以昏闭门隶也。”以刑人看门，古有其例。

这个“隶”和“徒隶”意义是完全相同的。《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生为愍隶，死为转尸”，颜师古释为“愍隶者，言为徒隶，可哀愍也”。班固讲的“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

---

① 见《西安市西郊高窑村出土秦高奴铜石权》，《文物》1964年9期。

② 见张政烺《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8年3期。

③ 此从大徐本、小徐本。段注本改“隶卒”为“吏卒”，“兴役戍”为“兴戍役”。（今人引用，多依段改，如启功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钮树玉《段氏说文订》：“此不知因何本改。”按，段改非是。许慎原意，当为“隶”，与“役”（如骊山之役）相应，“卒”与“戍”（如渔阳之戍）相应。秦汉时隶与卒经常被驱遣修建大型工程或执行其他任务。汉代文献中还常见“卒”与“徒”（义同“隶”）连用，如“诸请诏省卒徒自给者皆止”（《汉书·宣帝纪》）、“卒徒蒙辜”（《汉书·成帝纪》）、“卒徒衣食县官”（《盐铁论·复古》）、“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盐铁论·水旱》）。

④ 《史记·李斯列传》：“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史记·叔孙通列传》：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汉书·五行志》：“亡自戍卒陈胜发。”《汉书·晁错传》：“陈胜行戍。”可证。

徒隶也”，他自己就是把“隶”解作“徒隶”的，历来很多人直至宇文钧都这样理解，这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徒隶”是什么意义，往往被解释错了。请看下面诸例：

(三年)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汉书·惠帝纪》)

令徒隶衣七缕布。(《史记·孝景本纪》)

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

埍，徒隶所居也。一曰女牢，一曰亭部。[1] (《说文解字》十三下)

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

这“徒隶”是指办公文的书吏、狱吏之类的小官吏吗？否。再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这个“徒隶”又与“徒”所指完全相同，试比较下面五对例子：

甲、(七年)春，免徒隶作阳陵者。(《史记·孝景本纪》)

(中四年)秋，赦徒作阳陵者。(同上)

乙、其后安国坐法抵罪，……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史记·韩长孺列传》)

孝景时，梁人韩安国坐事被刑，起徒中为内史。……安国徒隶，……还治其国。(蔡邕《谏用三互法疏》)

丙、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贾谊《治安策》)

丁、建和元年夏四月丙午，诏曰：“比起陵茔，弥历时岁，力役既广，徒隶尤勤。顷雨泽不沾，密云复散，傥或在兹。其令徒作陵者减刑各六月。”(《后汉书·桓帝纪》)

戊、于是罚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不挠。(《三国志·魏书·崔琰传》)

太祖以为琰腹诽心谤，乃收付狱，髡刑输徒。前所白琰者又

---

① 《后汉书·崔篆传》李贤注：“《前书音义》曰：‘乡亭之狱曰犴。’”按，犴、埍古音同属寒部，同系喉音。《说文》段注：“徒隶，贱者称。”不确切。

复白之曰："琰为徒，虬须直视，心似不平。"(《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裴注引《魏略》)

"徒"指的什么？《论衡·四讳篇》："被刑谓之徒。"徒就是有罪受刑服劳役的犯人。史载甚夥，仅举数例于下：

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汉书·成帝纪》)

邴吉为廷尉监，治巫蛊于郡邸，怜曾孙之亡辜，使女徒复作淮阳赵征卿、渭城胡组更乳养。(《汉书·昭帝纪》)

坐须贾于堂下，置莝豆其前，令两黥徒夹而马食之。(《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青尝从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宠妻梦赢袒冠帻踰城，髡徒推之。(《东观汉记·彭宠传》)

后三例分别以刑名"黥"、"钳"、"髡"作定语。

总之，"隶"、"徒隶"、"徒"绝非指称书吏、狱吏之类的低级官员，都是罪犯、刑徒。《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司隶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颜师古注很有价值："以掌徒隶而巡察，故云司隶。"原文、颜注都充分证明了"隶"、"徒""徒隶"三者意义相同。[①]从语源上看，"徒隶"正是由同义词素"徒"和"隶"构成的，比较后起，《春秋》三传、《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皆不见，《管子·轻重乙》及云梦秦简始各一见[②]。

秦汉的徒隶除了要服劳役或在官营手工作坊中做"工"(如云梦秦简的"工隶臣"，汉成帝时起义的"铁官徒")，还可能被迫做各种"低贱"的差使，如看门(《说文》的"阍")，官府中的"听差"(秦简中的"府隶")，拘捕犯人、勘测现场和监管犯人(秦简中的"牢隶臣"及司马迁

① 郭沫若、尚钺释"徒"为奴隶，非是。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2版)页66："所谓'徒'也同样是奴隶，一部分是有罪的人，一部分是从民间征发来的。"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页37："在铁官之下，设吏(监工)、卒(工头)、徒(工奴)攻山取铜铁，像这样的工奴在十万以上。"

② 《管子·轻重乙》："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云梦秦简《为吏之道》："徒隶攻丈，作务员程。"

《报任安书》中的“徒隶”)，这些是“徒隶”的词义转化为差役的基础。但变为差役义，大概是较后的事，具体如何，尚待研究。这里举唐代的两例，柳宗元《梓人传》：“彼为天下者，本于人。其执役者为徒隶，为乡师里胥，其上为下士，又其上为中士，为上士，又其上为大夫，为卿，为公。”这个庞大的统治机构的最低层就是官府衙门里的差役——徒隶。陆龟蒙《野庙碑》：“车马徒隶，丛杂怪状。”元张养浩《牧民忠告》卷上“御下”“待徒隶”：“皂卒徒隶，非公故勿与语，非公遣勿使与民相往来。若辈小人，威以莅之，犹恐为患，一或解严，必百无忌惮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萧先生”条：“拾笔责在皂隶，非吏所任。”可资佐证。

我们切不可拿后代的词义去理解前代语言里的词，否则就会产生错误。汉代的“隶”和“徒隶”非书吏、狱吏，而是刑徒，这是正确理解“隶书”得名时涵义的一把钥匙。

（四）释“陪隶”

在东汉及其后的典籍中有“陪隶”一词，例如：

昔为陪隶，与臣从事。(班固《为第五伦荐谢夷吾疏》)

臣以负薪之资，拔于陪隶之中，奉职宪台，擢授戎校。(袁绍《上献帝书》)

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气决然。自君章之后，转相放式，好干上怵忮，以采名誉，末流起于爱憎而政在陪隶也。(应劭《风俗通·过誉篇》)

乘虽见察授，函封未发，未离陪隶。(《风俗通·十反篇》)

毛遂，赵之陪隶，犹假锥囊之喻，以寤主立功。(曹植《求自试表》)

这些“陪隶”显然是指称政府官员，里面又有个词素“隶”，它是不是指差役，办公文的小官？而且，第一例出自班固作品，与我们研究的“隶书”说有关系吗？这些“陪隶”用例可不可以推翻我们上述的观点及论证？这是必须辨明的。让我们看看谢夷吾的“陪隶”身份是怎么样的，第五伦称谢夷吾“昔为陪隶，与臣从事”，那指的是第五伦任郡太守时，擢谢夷吾为督邮，督邮代表一郡的行政长官太守督察县乡，宣

达"政令",兼司讼狱捕亡等事,职权极重,岂是差役所可比拟!再看袁绍,自称"陪隶",绍何许人?史载,他是"司徒汤之孙","少为郎","后辟大将军何进掾,为侍御史,虎贲中郎将",迁"佐军校尉"。出身于豪门显族,官运亨通,何尝是低级下吏?汉制,公卿郡守等中央及地方高级官吏皆可自置属官,"大将军何进掾"、督邮就是这类地位颇不低的属官,东汉的"陪隶"一词即指此。

"陪隶"一词怎样产生的?它是"陪臣"的类化词。"臣"及"仆"、"隶",原义皆为奴隶。"臣"最早由奴隶义演化出来,指做官的人,而且与"陪"[①]结合成"陪臣"一词。《礼记·曲礼下》:"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自称曰陪臣某。"《左传·僖公十二年》载管仲见周天子,自称"陪臣"。这指的诸侯的大夫。《论语·季氏》"陪臣执国命"指的是大夫的家臣。至汉,仍沿用此词,如《东观汉记·梁鸿传》:"初与京邑肖友善,约不为陪臣,及为郡吏,鸿以书责之而去。"则是指的当时的郡国守相的高级属官。当时的语言中既然有"陪臣"一词,于是由类化作用,人们又把与"臣"同义的"隶"拈出,[②] 与"陪"组成"陪隶",它是"陪臣"的同义词。东汉陈元《驳江冯督察三公议疏》中,"至乃陪仆告其君长"的"陪仆"也是这种类化词。

东汉的"陪隶"一词不是指的差役、文书之类的下级官吏,这个"陪隶"与"隶书"的"隶"无关。

(五)班固"隶书"说的涵义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首先提出"隶书"一名:"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按照班固的说法,"隶书"就是"施之于徒隶"的"书"。很多人据之简化或推导,近人如康有

① 《后汉书·袁绍传》李贤注:"陪,重也。"

② 晋代袁宏《三国名臣序赞》:"至如身为汉隶,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谓。"文若乃曹操的首席谋士荀彧之字,这"隶"既不是奴隶义,也不是卑贱者或刑徒义,也不是衙役义,而是"臣"(做官的人)义。"臣"最早由奴隶义演化出来,变成"做官的人"。袁宏文中"隶"的这种罕见用法也是语言类化作用的结果。

为，今人如唐兰、启功都认为，隶书就是徒隶的书；[①]也有人如宇文钧、胡朴安、马叙伦认为，隶书是徒隶使用的书体；[②]也有人如江声、刘师培则说，隶书是为了“以便徒隶”。[③]这些说法已为人们所习见、所常道，其实，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原因之一，他们都把“隶”和“徒隶”解释错了。前已论证，“隶”、“徒隶”是指称罪犯、刑徒。这些徒隶绝大多数是劳动者，试问，他们在犯“罪”判刑前或者被强制服劳役的时候，能不能掌握文字？在古代封建社会里，文化垄断在剥削阶级手中，这群“犯人”怎能享有或者使用一种特有的书体？哪怕是简率的、粗俗的、不标准的书体？这种书体怎么“便利”他们？

也许有人说，徒隶中并非没有掌握文字的，例如秦代铸造兵器和衡器的工匠，汉代自应也有。诚然，在秦的上郡戈和高奴铜石权上，是刻铸有铸工刑徒的名字，但那是因为“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④] 是为了检查质量向徒隶算账加罪用的。而且铸器上的文字，也不一定是徒隶的手笔；即令是，这种徒隶也为数极少。[⑤] 如果说，隶书就是极少数掌握文字的徒隶的书，或是为了方便他们，那么，“起于官狱多事”、“官狱职务繁”之语怎么着落？

这种认为隶书就是徒隶之书的看法，其根源除了对“徒隶”一词有误解外，还因为把班固的“施之于徒隶”的“施”字理解为施行、推广的缘故。在徒隶中施行、推广，不就是“徒隶的字”或“徒隶使用的字”

---

①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故以徒隶之书比之。”唐兰《中国文字学》页165：“统治阶级……把它们叫做‘隶书’，徒隶的书。”启功《古代字体论稿》页26：“什么叫隶书？我们已知就是徒隶的字。”

② 宇语、胡语见前引。《马叙伦学术论文集》页134：“秦朝规定徒隶写字用这一体，所以便于办事。”又启功《古代字体论稿》页6：“秦代……隶是徒隶用的、不标准的‘俗体’。”

③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一：“江艮庭先生生平不作楷书，虽草草涉笔，非篆即隶也。一日书片纸，付奴子至药肆购药物，字皆小篆，市人不识。更以隶书，往，亦不识。先生愠曰：‘隶书本以便徒隶，若辈并徒隶不如耶？’”刘师培《刘申叔遗书》第十一册《小学发微补》：“盖秦程邈改篆为隶，以便徒隶。”

④ 《礼记·月令》。

⑤ 在剥削阶段的内部斗争中，有少数人犯“法”成了徒隶，如韩安国等，他们是有文化的。但此种人在徒隶中为数极少。

吗？可是，统治者驱使徒隶服苦役，唯恐不能及早地榨干他们，例如"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1] 又如汉成帝永始二年诏书，承认为了筑昌陵，"卒徒蒙辜，死者连属"。[2] 1972年春在汉景帝墓阳陵附近，发现钳徒墓，尸骨成叠，刑具遍坑，都是在非人待遇下惨死的[3]（史载的"免徒隶作阳陵者"，[4] 不过是欺骗手法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有何善心，又有何暇去向徒隶们施行、推广一种书体？如果说因为"官狱多事"，那么在徒隶中施行、推广一种书体干什么？又"趋"什么"省易"？这些也令人难以索解。

又一个关键问题横在面前："施之于徒隶"的"施"是什么意义？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施"的词义，其常用义除"施行"外，还有"加"、"施加"义。《淮南子·原道训》："德施百姓而不费"，高诱注为"德泽加于百姓"可证。陈琳《为袁绍檄豫州》："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这"施"决不能释为"施行"，也是"加"义。我们认为"施之于徒隶"的"施"应释为"加"、"施加"。现把语法上与之同类型的结构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例如：

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书·艺文志》）

夫君子之于言也，所致贵也。虽有夏后之璜、商汤之驷，弗与易也。今以施诸俗士，以为志诬而弗贵听也，不亦辱己而伤道乎？（徐干《中论·贵言》）（按，"诸"是"之于"的合音。）

楚已诛秦，必加兵于赵。（《史记·陈涉世家》）

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汉书·武五子传》）

秦，形胜之国，……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史记·高祖本纪》）

---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汉书·成帝纪》。

③ 见秦中行《汉阳陵附近钳徒墓的发现》，《文物》1972年7期。

④ 《史记·孝景本纪》。

诸例中,介词"于"后的宾语都是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承担对象。"加兵刃于太子"的"加"是"施加"义,介词"于"后的宾语"太子"并非得到"兵刃",据为己有,而是后来升官为北地太守的人"加兵刃"这个动作的承受对象。同理"施之于徒隶"句中,徒隶并非得到这种书体,作为己用,据为己有。班固的意思是,秦始皇把这种草率的,简便的书体施加于徒隶们的头上,是为了对付、处理徒隶们的犯罪案件的。绝不是向徒隶们施行、推广一种书体,让他们掌握,在他们中间普及。

班固的这种观点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思想根源的。了解班固及其前人关于秦始皇的某些言论,将有助于对班固隶书说涵义的正确理解。秦亡后,两汉人经常把秦始皇的暴虐恣睢,严刑峻法引为鉴戒,可谓是共识,《史记》、《汉书》就录载了贾谊、贾山、伍被、刘安、路温舒、吾丘寿王、谷永、刘歆等人关于这方面的言论,他们都严厉抨击秦始皇的苛刑酷法。例如《汉书》全文载录了吾丘寿王《议禁民不得挟弓弩对》一文,中有"秦兼天下,……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其后民以耰鉏箠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至于赭衣塞路,群盗满山。"又如扬雄《廷尉箴》"秦繁其辜,五刑纷纷,靡遏靡止,寇贼满山,刑者半市,……秦以酷败。"暴政的恶果,用"赭衣塞路","刑者半市"二语,描绘得淋漓尽致。班固在批判秦代苛政这一点,完全继承了上述前人的观点。如《汉书·食货志》云:"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饟,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的一段话,应该把它与《艺文志》关于"隶书"的数语结合起来研究。《刑法志》云:"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看,路上尽是罪犯,到处都是监狱,这还不是"官狱多事"吗?秦始皇帝自己到了"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的地步,那狱吏们的繁忙、紧张之状更可想而知,为了处理如此惊人多的刑事犯罪案件和公务文书,就要求快速,"苟趋省易",因而产生了施加于徒隶,对付、处理徒隶们犯罪案件的简便的新书体。罪犯们叫"徒隶",也叫"隶",因此这种书体就叫做"隶书"。这就是班固"隶

书”说的真谛所在！

班固笔下的“隶书”本是汉代通行的“今文”，西汉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学，其儒经即用“今文”写的。王莽执政称帝托古改制时，古文经学大行，“古文”广为流播，“王莽六书”的规定者是贬抑“今文”的始作俑者。“新”朝灭亡，今文经学又复抬头，《说文解字·叙》中所述的诸生以“今文”为仓颉时的“正文”，并“大共非訾”古文，这些当是承自师学，早已有之的。当时属于古文经学营垒的班固则崇古文而抑今文，他的《汉书》多古字古义，时“多未能通”，从马融伏于阁下从班昭受读一事可见一斑。[①]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定今文这种书体为秦始皇时的产物，并把这与他所痛恨、批判的秦始皇的酷法严刑牵扯在一起，说这是为了对付、处理徒隶们的大量犯罪案件而创造出来的简率的书体，名之曰“隶书”。其后的许慎继承并发挥了班固的观点：“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这位权威文字学家的言论逐渐为人们所信奉，请看东汉赵壹的《非草书》：“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分飞，故为隶草，趣急速耳。”又如唐张怀瓘《书断》：“秦造隶书，以赴急速，为官司刑狱用之。”班、许的“隶书”说千余年来遂定于一尊，“隶书”之名大行于世，直至今日。

然而人们往往误定“隶书”得名的时代，至于“隶书”得名的真正涵义，亦无正确的诠解。“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占”，致使“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②] 今天我们应该做一番认真的清理工作，去虚说，求实事，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辨程邈、王次仲创造隶书的传说

在汉字的各种书体中，关于“隶书”的说法和传说大概是最多的了。世传程邈创造隶书说和王次仲创造隶书说，尤以前者最为流行，解放后不少书、文接受此说。

最早提出“隶书”名称的是班固《汉书·艺文志》，只说秦始皇时

① 见《后汉书·曹世叔妻传》。

② 王充《论衡·正说篇》。

“始造隶书”,没有讲到创造者。许慎《说文解字·叙》在述及王莽六书时,有一段话:“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但是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认为“秦始皇帝”以下十三字是错简,应系于下文“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之下,那么“隶书”即为程邈所作。其实真正最早提出程邈作隶书的是东汉末的蔡邕,其《圣皇篇》云,“程邈删古立隶文”。但晋初卫恒的《四体书势》主张程邈作篆书,只在最后挂个尾巴:“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注中讲:“篆书,谓小篆,盖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隶书,亦程邈所献,主于徒隶。”足见二人还是从许慎说为主。卫恒乃晋初人,卫恒之说也可证明段、桂的错简说是站不住脚的。程邈何许人也?据卫恒说,“为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到了北魏江式,明确地把程邈创造隶书说与班固的徒隶说结合起来:“隶书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隶,即谓之隶书。”到了唐代,张怀瓘《书断》云:“程邈字元岑。”几百年不见载籍的程邈的字忽至此时找到!创造隶书的过程则被讲得更具体:“始为衙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

王次仲创造隶书的传说更与秦始皇的苛刑酷政相关。本来蔡邕《劝学篇》只说:“上谷次仲,初变古形。”卫恒《四体书势》:“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王次仲何时人?忽有人说是东汉章帝时人,忽有人说是灵帝时人。[①] 至北魏郦道元《水经·漯水》注与梁任昉《述异记》,都记载了一则传说,王次仲也成了隶书的创造者。郦道元云:“郡人王次仲,少有异志,年及弱冠,变仓颉旧文为今隶书。秦始皇时,官务烦多,以次仲所易文简,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征而辄不至。次仲履真怀道,穷数术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槛车送之。次仲首发于道,化为大鸟,出在车外,翻飞而去,落二翮于斯山,故其峰峦有大翮小翮之名矣。”王次仲化鸟仙去,戏弄了也战胜了秦始皇。

程、王创造隶书说,起源既晚,史不足征。尤其是1975年云梦睡虎地大批秦简的发现,证明了秦始皇前隶书这种书体早已出现,是广

---

① 张怀瓘《书断》引王愔说及萧子良说。

大文字使用者的成果。这两则传说，究其源，都是从班、许的隶书说化生出来，附会增益层累而成，总是不离“监狱”、“囚车”，总是与秦始皇的无道有关。

1978年8月修改定稿

附记：1978年3月北京地区语言学规划会议在虎坊桥远东饭店召开，笔者有幸旁听，在会议休息时间数次向当代卓越的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请教“隶书”问题，有些观点虽与唐先生相异，然唐先生非但不以为忤，反而热情勉励我写成文章，故于是年暑假增补定稿，以成此文。唐先生时七十八岁高龄，步履强健，不意于次年遽尔逝世。谨此志悼。

本文发表于《语言学论丛》第七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和《语文集刊》第一辑（南京大学学报和中文系语言教研室编，1982年）。

1993年

《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傅杰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收录缪荃孙、孙诒让、章炳麟、王国维等160余家文，都350万字。拙文《“隶书”辨》亦附骥尾（页1814—1830），在下深感荣幸。

2002年底

重论“隶书”的名称

——答谢阿辻先生

拙文《“隶书”辨》见《语言学论丛》第七辑)承阿辻哲次先生予以评论(见《均社论丛》第11期),感到十分荣幸。阿辻先生于文字学造诣之深,见解之精,令我深为敬佩。关于“隶书”问题,他的许多观点与鄙见若桴鼓之相应,快何如之!例如中国文字学界因受许慎《说文解字·叙》的影响,普遍认为“隶书”得名于秦代或秦汉之际,阿辻先生和我都对这种说法持反对态度,我们把“隶书”得名的时间往后拉了二百年左右。我们又都认为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与刘歆的《七略》“两书并不一样”。中国文字学界的多数学者把“徒隶”解释成郡县小吏即书史、狱吏之类,从阿辻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是不同意这种传统解释的,正与鄙见相符。阿辻先生与我远隔数千里,未曾谋面,他的广博的学识、他的热情支持,使我钦佩、感动。

特别要感谢的是阿辻先生指出拙文遗漏了一条很重要的材料,即东汉人荀悦《汉纪》卷二十五成帝纪中的一段关于六体的叙述。这条确是我失引失论的,承阿辻先生指示,谨表谢忱。

阿辻先生大作云:“据《后汉书·荀悦传》,荀悦受献帝之命,按《左传》的体例,重新编写一部西汉的历史,这就是《汉纪》。当时献帝‘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后汉书·荀悦传》),所以命他另编一本史书,那么荀悦所据的材料,也须与班固有所不同。”“再而上述涉及‘隶书’那一部分,是放在‘刘向典校经传,考集异同’讲述学派源流的一段里。那条资料极有可能是从《七略》抄引出来的。”“如果那段《汉纪》是抄引自《七略》的话,这样,‘隶书’的名称不起于刘歆而起于班固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看来,关键在于《汉纪》这本书的性质,特别是成帝河平三年“刘向典校经传,考集异同”这一段是否抄引自刘歆《七略》。现谨述鄙

见,以就正于阿辻先生。

根据《后汉书·荀悦传》及《汉纪》的自序,建安三年汉献帝令荀悦将班固《汉书》改编成编年体的史书。荀悦自己说:“抄撰《汉书》,略举其要”,“省约易习,无妨本书”。刘知几《史通》的《二体篇》称之为“剪截班史”,《古今正史篇》称之为“删为《汉纪》三十篇”。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二十载宋李焘跋曰:“悦为此纪,固不出班书,然亦时有所删润,而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谏疏,班书皆无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八“汉纪”:“观其书,盖专取班书别加诠次论断之,而班书外未尝有所增益,玩自序可见,而其间或与班书亦有小小立异者,在悦似当各有所据,若班书传刻脱误处,藉此校改者,亦间有之,然已仅矣。”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四《再读荀悦汉纪》文云:“荀氏《汉纪》,以《汉书》纪传为根据,而十志八表,各择取其切要者,依世代编入。”观荀悦自序及前人所论,比较二书,似乎可以这样说,《汉纪》是将《汉书》的各传及诸志表之文,选其切要者,按照年月先后,散入本纪各年之下,在语言上则尽量采取“缩写”的方式。正因为是缩写,未免过分而失当,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荀悦汉纪”曾有所批评。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四《三跋荀悦汉纪》讲他曾“以五旬之功力读荀悦《汉纪》一再过”,“纠其舛错二百六十余条”(包括传刻之误)。这本书,前人曾努力举出它详于班书者亦即别有所本者,然为数很少,可见采录《汉书》以外的材料甚鲜。此书的独到之处是其评论,荀悦亦以此自诩,旧时学者对此亦多所肯定。

再看《汉纪》成帝纪河平三年,略记了正月楚王来朝、二月地震、八月日蚀三事后,复将刘向校书、刘歆继卒父业而撰《七略》这一汉代文化史上持续多年的大事系于此年之末。仔细将这一段近一千四百字的文字与《汉书·艺文志》、《汉书·儒林传》比勘,便可发现,这段文字实际是《汉书·艺文志》的浓缩本,而将《汉书·儒林传》的内容择其切要者散入有关的叙述中,补充之。如果把司马迁的《史记·儒林列传》与《汉纪》比较,更可看出,无论叙述次序,行文遣词,《汉纪》与《史记》距离颇远,而与《汉书》何其相似乃尔。

《汉纪》:“凡书有六体,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也。”

《汉书》:“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汉纪》:“有六体,谓古文、奇字、篆书、隶书、虫书也。”(案,疑脱“缪篆”二字。)

《汉书》:“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

《汉纪》:“秦时狱官多事,省文从易,施之于徒隶,故谓之隶书。”

《汉书》:“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

似乎看不出,这三句话乃至刘向校书这一段另有所本。王鸣盛的话比较正确,《十七史商榷》谈到荀悦对于《汉书》,“其实于志文,亦往往摭入,非但取纪传者。”

关于秦汉刑徒,确如阿辻先生所言,刑徒的大范畴内有很多名目,有若干区别。在云梦秦简发现后,有更多的历史学家讨论这个问题。这里只想说一点,无论是班固或是荀悦,都认为“隶书”的得名是由于这种书体“施之于徒隶”。有的徒隶确实有任务,如看门、当官府的听差、拘捕犯人、监管在押犯,甚至为司隶校尉所统管,捕巫蛊、督大奸猾。司马迁下狱,“视徒隶则心惕息”,可见这种徒隶还很厉害呢。但是他们毕竟是刑徒,秦始皇时“骊山之徒七十万”,汉惠帝时“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筑阳陵的大量徒隶,起义的颍川铁官徒,这些徒隶绝大多数在服刑期间是干苦活的。他们中除个别人会掌握文字外,想必都是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如果认为个别徒隶能使用“隶书”,那么班、荀的“施之于徒隶”这句指称很为广泛的话怎么解释呢?

我的文字学素养很差,只是在那几年内偶尔涉足其间,写了那么一篇文章,不敢自信,转求教于阿辻先生,承阿辻先生盛意,撰专文评介,鄙见若干得到阿辻先生的认可,甚感荣幸,又承指出我的疏漏谬误,更为感激。有个别论点,我有不同看法,不揣冒昧,讲出来,很可能是错误的,恳请阿辻先生及诸位专家批评指正。

再重复一句:衷心感谢阿辻先生的赐教。

癸亥年正月初六初七于金陵

本文原发表于《均社论丛》(日本京都)第13号(1983年5月)。

兹将阿辻哲次先生的《读鲁国尧氏〈"隶书"辨〉》迻录于下:

我没有见过鲁国尧先生,只知道鲁先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四十多岁,是专门研究汉语音韵学。不过他的研究并非限于一方面,最近写了篇文字学的论著,就是这里要谈到的《"隶书"辨》。

这篇文章发表在《语言学论丛》第7辑(1981.7.商务印书馆,P.68~112)。在出版前,承蒙鲁先生惠赐我一份打印的稿本,并叫我提提意见。以我的识力,是不配向这篇论著提任何意见的,但又不好推却鲁先生的一番好意,因此,不顾浅陋,大胆写了下面一段文字,希望鲁先生和各位先进不吝赐正。

《"隶书"辨》主要有两个论点:

1."隶书"这个名称始于何时?

2."隶书"这个名称究竟是什么意思?

先看看第一个问题。

鲁先生在稿本的"前言"里说:"启功先生的颇有影响的专著《古代字体论稿》明确指出:'字体的各种专门名称,实自秦代才有的。''把各种字体命以专名,始自秦代。'这本书以较多篇幅论述了多种书体名称的涵义与关系,其立论皆与此观点有关。以为'隶书'之名始于秦代几乎是人同此言,该是不成问题的定论了,然而恰恰大有问题在。至于'隶书'得名的涵义,可以说,学术界迄今尚无正确的解释。"

我非常同意鲁先生这个看法。《古代字体论稿》对初学来说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在这些问题上,略嫌太过于传统,和尚欠周密。

从新近的考古资料,我们可以知道"隶书"这种书体在战国时代已经存在,只不过当时还没有特别的名称。

鲁先生认为"隶书"的最早的名称是"今文"。他说:"至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使这种书体更为通行。汉时人们给予它'今文'的名称,以别于前此的书体。"(P.87)

又说:"翻遍西汉书籍,并未发现'隶书'的踪迹,也未找到一个真正以'隶'字作为书体名称的用例。"(P.87)而且肯定地认为:"在西汉和东汉初,就只有'今文'一词,而无'隶书'其名。"(P.87)(至于,假托为西汉的三种伪书中有"隶"字,鲁先生一·4节里已有

辨明)。

那么,"隶书"这个名称在什么时候才出现呢?他认为是班固首先提出。《汉书·艺文志》"小学家"里有"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一段,就是"隶书"一词最早出现的地方。

提到《汉书·艺文志》自然会联想到刘歆《七略》,所以鲁先生接着讨论这两者的关系。

他说:"'隶书'之名始见于《汉书·艺文志》,而前人未加省察地把《汉书·艺文志》看作是抄自刘歆《七略》,因此就认为'隶书'一词为刘歆所创。"(P.91)

鲁先生反对康有为等人的看法,重新对《艺文志》加以分析,认为:"汉志所列书目系据《七略》而有增删,每类的序则是班固自己编写的。"(P.92)按这个论断,则"隶书"之名不是来自刘歆,而是班固所创。为了加强这个论点,他还将所谓"王莽六体"、"萧何六体"、"秦书八体"联系起来,一起讨论。他的结论认为:"首先给字体排队并赋名的是王莽等人,而非秦人。……'萧何六体'的内容与顺序全同'王莽六书',但班固却把这王莽六书逆推二百年,挂在开国名臣萧何的名下,托古以饰其说,还踵继王莽刘歆,进而给今文一个更卑的卑称:'隶书'。"(P.96)

以上是鲁先生对第一个论点的看法。就《汉志》与《七略》的关系这方面,我非常赞同他的见解,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知两书并不一样。但是,就"隶书"一词的来源,鲁先生似乎没有提到一条很重要的资料。

在荀悦《汉纪》卷25成帝纪有这样一段:"二年……秋八月乙卯晦,日蚀,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故典籍博矣。刘向典校经传、考集异同云,《易》始自鲁商瞿子木,……。凡书有六本,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也;有六体,谓古文、奇字、篆书、隶书、虫书也(疑脱"缪篆"二字)。秦时狱官多事,省文从易,施之于徒隶,故谓之隶书。"(请见本文后面所附的四部丛刊本《汉纪》有关部分。尧按,为节省篇幅,附文略去。)

荀悦,东汉人,148—209,稍晚于班固,据《后汉书·荀悦传》,荀悦受献帝之命,按《左传》的体例,重新编写一部西汉历史,这就是《汉

纪》。当时献帝“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后汉书·荀悦传》),所以命他另编一本史书,那么荀悦所据的材料,也须与班固有所不同。

再而上述涉及“隶书”那一部分,是放在“刘向典校经传,考集异同”讲述学派源流的一段里。那条资料极有可能是从《七略》抄引出来的。

鲁先生所列举的资料非常精博,特别是P.89所引的《论衡·正说》篇的“隶书”的用例,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不过,可惜的是没有论述那条《汉纪》的资料。

如果那段《汉纪》是抄引自《七略》的话,这样,“隶书”的名称不起于刘歆而起于班固之说,根本不能成立。不知鲁先生对此段《汉纪》的文字有怎样的看法。

关于第二个论点,鲁先生写得非常详尽,好像是一篇古代制度史的论考。他深入研究秦汉的“隶”,“徒隶”以及其他相关的文字。他一个一个地否定以前的观点。

他首先指出“隶”不是指“奴隶”。把“隶书”的“隶”字解为“奴隶”是常见的看法,但常见的不一定是正确。鲁先生查阅了《史记》、《汉书》等两汉人著作,发现极少数的“隶”字解作“奴隶”,而且解作“奴隶”的多是模仿《左传》。在两汉,“隶”字的主要意义是“卑贱者”、“卑贱的”,有时用作骂人语。所以把“隶书”释为“奴隶们所用的书体”是不对的。

他接着否定“隶”是下层官吏——这是文字学者中最普遍的看法。鲁先生举出唐兰、马叙伦、胡朴安、丁易等都支持这个看法。

鲁先生经过精密的考证,指出不论高级或低级的官员都叫做“吏”,而低级官员有时还叫“史”或“书佐”,但是“他们尽管在统治者的营垒中地位低下,可绝不叫‘隶’或‘徒隶’”(P.102),因此可以否定“隶书”是“下级官员所用的文字”这个传统而又权威的看法。

那么“隶”、“徒隶”是什么意思?鲁先生认为是指“罪犯”。他列举了一些例子,根据这些例子,指出“总之,‘隶’、‘徒隶’、‘徒’绝非指称书吏、狱吏之类的低级官吏,都是指罪犯、刑徒。”(P.106)

“隶”字的意义确定了,接着就是班固所说“施之于徒隶”一句应怎样解释的问题。过去的学者都把“施”字解作“施行”、“推广”的意

思。而鲁先生从句子结构分析，主张应释为“施加”的意思。

鲁先生的结论见P.111：“施之于徒隶”一语，“徒隶并非得到这种书体，作为己用。班固的意思是，秦始皇把这种简率的书体施加于徒隶头上，是为了对付、处理徒隶们的犯罪案件的，绝不是向徒隶们施行、推广一种书体，让他们自己掌握，在他们中间普及”。

以上是鲁先生的主要论旨。

鲁先生的考证非常详审，但似乎也遗漏了一条重要资料。在P.103—104提到云梦秦简里“隶臣妾”的用例，却没有引用《汉书》里“隶臣妾”的资料。

《刑法志》说：“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言……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

据上面的资料，罪犯当中分有几个等别。看来“隶臣妾”是比较轻的罪犯。因此说“隶”就是“罪犯”是否过于笼统。

再而，云梦秦简又有下面一条：“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睡虎地秦墓竹简》P.201，1978文物出版社)。

“将城旦”的“隶臣”有一定地位并负责一些工作任务，这样，也可算是“罪犯”，跟其他罪犯一样吗？

负责工作任务的“隶臣”们是否绝对不用书写文字吗[①]？这样，“隶书”难道不可以说是“徒隶”们所用的文字吗？

解放后考古收获，真叫人大开眼界。古文字的资料不断发掘出来，对古文字的研究有极大的帮助。鲁先生的文章把最新成果综合起来，是一篇富有启发性的论考，我们后学从中吸收了不少东西，这是非常感谢鲁先生的。

1982.5.12

此文原发表于《均社论丛》(日本京都)第11号(1982年5月)。承阿辻哲次教授1996年8月来函，同意我迻录其文的请求。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P.234有一条：“可(何)谓‘耐卜隶’、‘耐史隶’？卜，史当耐者皆耐以为卜、史隶。”可供参考。

从宋代学术史考察《广韵》《集韵》时距之近问题

提要 汉语音韵学史上的两大韵书《广韵》的颁行和《集韵》的纂修何以相距仅二十余年？长期令学人困惑。笔者将此难题置于宋代经学、史学、文学、金石学和考古学等学术大发展的背景中考察，指出仁宗之世是宋代学术的转捩点，显露出“宋代特色”。在语文学上，也就由抄缀旧文的“述”的《广韵》进至义例谨严体现“宋学”的“作”的集韵。这是一篇文史语言学的论文。

长期令音韵学人困惑不解的是，祥符元年(1008)颁行《广韵》后，何以又在景祐元年(1034)诏修《集韵》？相隔仅二十六年！许多音韵学史论著避而不言。近见宁继福《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稿本)涉及此问题，平田昌司为此撰长文《广韵与集韵》。笔者近若干年专力于宋代韵学史的研究，沉思数载，自诩渐悟有得，然一孔之见能否成立，尚祈方家赐正。

要解答这一问题，必须纵观宋代历史，尤其是宋代学术史。太祖建国，太宗时方统一中国，然而与契丹的战争屡屡失利，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辽订澶渊之盟，此后双方宁息达百年。仁宗时虽有西夏侵边，但毕竟是局部战争，且宋略占优势。总的来说，仁宗之时宋帝国处于相对安定的时期，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众所周知，唐诗分初、盛、中、晚四个时期，自 618 至 711 年为初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可谓是盛唐的开始。仿此，宋自 960 年起，历太祖、太宗、真宗、章献太后刘氏执政时期为“初宋”，明道二年(1033)仁宗亲政，标志着宋文化升入一个新阶段。由于宋国势较唐为弱，仁宗庸懦，再加上历来的古代中国文化高峰在唐而不在宋的观点，所以载籍极少有“盛宋”的说法。然而仁宗之世及其后五十年宋文化进入了颠峰时期，在整个中

国史上发出耀眼的光芒,则是事实。

太祖定下重文抑武的国策,太宗取得皇权(976)后的第六月即诏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后又修《文苑英华》,真宗时修《册府元龟》,这就是后世所称誉的宋初四大书。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玉海》所记录的太宗、真宗时纂修的几十种书,就可发现其基本特点,一言以蔽之曰“述”,即抄撮前代文献,虽然有时也有某些增补。以小学书而论,真宗景德四年(1007)颁行《校定切韵》,章如愚《山堂考索》前集卷十一诸子百家门韵学类云:“景德四年刊正,大中祥符元年命儒臣增损,改为《重修广韵》。”《广韵》卷首前的景德四年牒文云“特加刊正”,祥符元年牒文云“校雠增损,质正刊修。”《集韵》韵例载宋祁等攻《广韵》“多用旧文”。可见《广韵》是在前此韵书的基础上校订编就的。很多学者指出,《广韵》与今存《唐韵》残卷在反切上有继承关系。但是作为字典来说,二者在整体面貌上还有一定差别。可惜的是,有许多唐五代及宋初韵书亡佚,难以核查。即以笔者从文献勾稽所得而言,宋初在《校定切韵》和《广韵》之前尚有几次重要的修订韵书活动。《玉海》卷四五载,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五月诏太子中舍陈鄂等五人同详定《玉篇》、《切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载,兴国七年(982)六月令王著详定《玉篇》、《切韵》。《玉篇》卷四五载,兴国八年吴铉献《重定切韵》。这里特别指出一条史实:太宗雍熙年间(984—987)邱雍重定《切韵》,根据有二:《玉海》卷四五:“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诏颁行《新定韵略》,送胄监镂板,先以举人用韵多异,诏殿中丞邱雍重定《切韵》。”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序》叙述自《切韵》至《广韵》的历史时说:“在本朝太平兴国及雍熙、景德皆尝命官讨论。”所谓雍熙命官讨论,当即指邱雍重定《切韵》一事(据《集韵》韵例,邱雍至真宗时,又副陈彭年修《广韵》)。如果这些韵书(还有某些类书)传世的话,则我们可以发现《广韵》的更为贴近的“蓝本”或“原型”。

至仁宗之世,承平已久,经济的繁荣带来文化的发展,逐渐蕴积的宋代学术特色终于喷薄而出,迈进到“作”的高层次。试就学术史的几个分支阐论于下。

经学在漫长的帝制时代的学术史上处于核心的地位。东汉确立

了古文经的正统地位，特点是重训诂章句。唐代的《五经正义》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在经学史上唐代没有什么重要贡献。与之相比，宋代却大放异彩，形成所谓“宋学”，从仁宗时代起，宋人不再拘守成说，疑古惑经蔚然成风。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按，仁宗年号，1042—1048），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按，刘敞著）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按，王安石著）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应该着重提出的是，欧阳修（1007—1072）撰《易童子问》，辨系辞、文言以下为非孔子言，著《毛诗本义》，专攻毛传郑笺之失，对真宗咸平间（998—1003）颁行的官书《周礼注疏》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具有冲破桎梏的意义。

再看封建时代重视的史学。宋仁宗对后晋刘昫的《旧唐书》深致不满，宋祁奉令于庆历四年（1044）起重撰新书，欧阳修继修，历十七年成。太祖开宝六年（973）诏薛居正修《旧五代史》，至仁宗时欧阳修讥其“繁猥失实”，发愤自撰《五代史记》，景祐三年（1036）前已着手，此即《新五代史》。欧史不仅旨在史实的处理上超过旧史，而且要仿春秋，寓褒贬，表现长期稳固王朝所要求的道德观、价值观。可见其时君臣都不满旧史，积极要求撰写具有宋代意识、宋代特色的新史书。至于目录学，太祖乾德六年（986）有《史馆新定书目录》四卷，至仁宗亲政后的翌年即景祐元年（1034）令张观、李淑、宋祁等查检皇家藏书，又令王尧臣、王洙、欧阳修编《崇文总目》六十六卷，庆历元年（1041）成。

在学术史上宋代突破前人的重大成就之一是使金石学和考古学成为独立研究的学科。1063年欧阳修《集古录》一千卷成书，同年刘敞的《先秦古器记》撰成。

至于文学，宋初的诗文词大体上都是继晚唐五代的余风，白体诗、晚唐派、西昆体先后成为诗坛的主要流派，但若干有识的作家提出改革文风的主张。至仁宗朝诗文革新运动趋于成熟，欧阳修是这次改革运动的主帅，他及其友人弟子把诗文创作推向高峰。至于词，打开唐圭璋先生编的《全宋词》，宋初作品寥寥，至柳永（987—1053）专力作词，他是北宋第一位大词人，讴歌了富庶的都市，描绘了多彩的市民生活，祝穆《方舆胜览》引范镇语：“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

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歌,乃于耆卿词见之。"

在语言学上,宋代特色也在仁宗之世充分表露出来。《玉海》卷四五:"景祐元年四月丁巳诏直史馆宋祁、郑戬、国子直讲王洙刊修《广韵》、《韵略》,命知制诰丁度、李淑详定。祁等言,多疑混字,举人误用故也。"根据是《续资治通鉴长编》景祐元年四月丁巳条。《玉海》后又云《集韵》"景祐四年翰林学士丁度等承诏撰。"引用《集韵》韵例,文作"景祐四年(自注:一云元年三月)"云云,现存诸刊本《集韵》卷首韵例皆作景祐四年。王氏何以自注"一云元年三月",请看孝宗淳熙十四年安康金州军刊本《集韵》(日本宫内厅图书寮藏,存第二至十册)卷末跋文之语:"景祐元年三月"宋祁、郑戬等言《广韵》、《韵略》之失,"乞朝廷差官重撰定《广韵》"。关于《集韵》纂修的时间,王应麟两说并载。鄙见当以景祐元年说为是,兹举一力证:《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三九录孝宗乾道五年正月三十日礼部贡院文书,内有"景祐元年所修集韵"之语。当是景祐元年三月宋祁等奏言《广韵》之失,四月诏修《集韵》。

这新时期的《集韵》有何特点?详见其篇首的"十二凡",后世学者多所阐明,此不赘论。我拟指出一点,宋祁等要求重撰定《广韵》,并非在《广韵》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而是旨在另编一本新型韵书。音韵学家往往主要从反切、韵目、同用独用等比较《广韵》、《集韵》,其实应从字典的角度观察二者的异同。韵书本是按韵编排的字典,字头之下,除了注音外,应为语词式的释义,现存的《切韵》、《唐韵》残卷和王韵无不如是。但《广韵》却是带有百科性的字典,在平声两卷尤为明显。"公"字下训释最长,达八百多字,其中仅有三十六字是语词性的释义。训释字数的多寡依次是"丘、孙、阳、东、梁、贺、卫"等。《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叙及"杂家者流"云:"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可以移来描述《广韵》。这遭到后世学人的攻击:"姓望之出,旧皆广陈名系,既乖字训,复类谱牒。"(《集韵》韵例)《广韵》何以如此繁杂?是因为"多用旧文"的结果,类书当也是抄撮的来源之一。另外我们还应从字典编纂史来进行考察。《文献通考·经籍考》"小学类"解题引《宋三朝艺文志》曰:"自齐梁之后,音韵之学始盛,顾野王《玉篇》、陆法言《切韵》尤行于世。"第一代篇韵中,《切韵》是语词性的

字典,《玉篇》繁征博引,对古代的名物典章制度以至车服器用考述往往不惮其烦。宋真宗时修的第二代篇韵中,《广韵》带有百科性,而《大广益会玉篇》释义简要。唐代和宋初类书风行,姓氏书亦夥,文士要了解百科性的知识尽可查类书,何必使字典芜杂?《广韵》释义长者数百字,短者二字,"繁略失当"如是!使韵书回到语词性字典去成了编者读者的共同要求,所以宋仁宗时的第三代篇韵,《集韵》和《类篇》都是语词性的字典。《广韵》是"述",抄缀旧文而成的内部矛盾纷杂的韵书;《集韵》是"作",义例谨严组织致密的字典。《集韵》小韵按声类聚,改类隔为音和,平、上声卷的切上字尽量用与被切字同声调的字,这些都显然是吸收了晚唐五代切韵学(明清方名等韵学)的成果,也包纳了《广韵》所不收的唐宋出现或通行的字和音(参见陈燕文《集韵与唐宋时期的俗字俗语》和笔者关于宋词韵诸文)。李焘说:"自《集韵》、《类篇》列于学官,而《广韵》、《玉篇》微矣。"司马光著《名苑》"以《集韵》本为正"。我们应该重视南北宋之交的王观国的学术笔记《学林》卷九"敕"条,先连言许氏《说文》、《玉篇》、《广韵》如何,次言《集韵》如何,而后又说"《集韵》本朝所修"。这是宋人意识的自然流露,只承认《集韵》是本朝所修!宋人的"本朝"特色意识很强烈,请看《陆九渊集》卷三四引王顺伯语:"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议论远过之。"先谦抑而后实自扬也。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王朝在立国年久蕴积多时之后,总要发出自己的吼声,迸出特有的光芒。东汉建立后六十五年即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伐北匈奴大胜,班固在《封燕然山铭》中喊出"振大汉之天声"。宋人虽武功不足,而文治则有余,到了仁宗之世,充分显露出宋代特色,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宋学","述"遂一变而为"作","述"的《广韵》遂一变而为"作"的《集韵》。

时下国内外学者喜谈"语言学是领先的学科",验之于《集韵》的撰修,此言不虚。仁宗明道二年三月亲政,次年即景祐元年三月宋祁等学者即上书批评真宗时编的《广韵》,要求编新型的韵书。同年仁宗下令编囊括宋代皇家丰富藏书的《崇文总目》。几乎同时,欧阳修不满太祖时的《旧五代史》,开始自撰表现宋人价值观、道德观的《五代史记》,此后在众多学术领域新著迭现,蓬蓬勃勃,生机盎然,使大

宋文化,也使中国文化登上高峰。

附言:1.《集韵》的"韵例""十二凡",义例谨严,然结果亦未能尽如人意,往往遭后世学者批评。2.在后世,《广韵》比《集韵》更受重视,此为另一专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本文发表于《语言研究》1996年增刊。

话说江苏语言学家

因为语言学文章精严有余而文采不足，所以尝试写成随笔体。冠以“话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罕闻则长，周知则短。“说”得短的，“说”不到的，未必是不重要的，也许是很重要的。故厚古薄今，详老略少，“史”“论”非是，“全”“备”不能。敬希博雅君子，原谅则个。

话说，话说，话要从头说。1993年10月著名语言学家丁邦新先生回国讲学，返乡探亲，29日应邀来南京大学作学术讲演，次日我陪丁太夫人、丁先生和丁太太游夫子庙。以夫子庙为中心的秦淮风光带一律是明清风格的建筑，“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古色古香。晋时的桃叶渡、乌衣巷遗迹，明末李香君的故居都还在，历来文人学士、骚人墨客留下了许多题咏，著名的如刘禹锡的“淮水东边旧时月”、杜牧的“夜泊秦淮近酒家”等诗句，朱自清、俞平伯的同题散文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总之，这是一处使得文人流连忘返的所在。

这里单表我们一行四人进了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江南贡院是明清时期的科举考场，能同时容两万多考生，如今只保存了明远楼和很少的几排号舍。西边的三排号舍里安放了十几个考生蜡像，有振笔迅书的年轻士子，有凝神憔悴的老书生，壁上的配诗并不高明，但是丁先生兴致勃勃地逐首念给老母听。展览厅内陈列了考篮、试卷、作弊用的夹带等实物，还有常熟翁同龢家的状元匾等，最令丁先生、丁太太感兴趣的是正壁上的清代状元、榜眼、探花统计表，兹录于下：

	状　元	榜　眼	探　花
江　苏	49	42	26
浙　江	20	29	27

续　表

	状　元	榜　眼	探　花
安　徽	9	7	4
直隶(含顺天府)	4	7	9
山　东	6	5	3

丁先生是如皋人,丁太太是江阴人,离乡四十余年方始由美国回到省城,自然带着强烈的感情在这统计表前议论起来。江苏被誉为人文荟萃之地,盖有年矣。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接着又谈起江苏语言学的传统,我们历数了好几位江苏籍的现代语言学家的大名,……

现在我写这篇文章,部份是追记当日的欢谈,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充实"与"续话",若有谬误,责任概由我负。

先秦两汉时期,中原是"发达地区",今江苏地区在那时还是"发展中地区"(这是我类推时下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生造出来的词语)。《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注引袁准劝曹爽捐淮汉以南的一段话:"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对抗。"可见当时人的观点。三世纪时孙吴在淮南、江南立国,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开始发展。最早的江苏语言学家大概是吴的韦昭(204—276),《三国志》卷六五本传载其狱中上孙皓书云:"又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然物类众多,难得详究,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职训》及《辩释名》各一卷,欲表上之。"《隋书·经籍志》著录其《汉书音义》七卷,颜师古注《汉书》收录韦昭注若干条,韦昭是云阳(今丹阳)人,墓在今金坛境内。李步嘉《韦昭〈汉书音义〉辑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年)辑得韦注近八百条,煞费苦心,诚堪敬佩。

南北朝时,江南迅猛发展,梁武帝时达到顶峰,超过北方。《梁书·武帝纪》:"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梁陈时代江苏地区出了好几位杰出的语言学家:著《玉篇》的顾野王,吴(今苏州)人;著《经典释文》的陆德明,也是吴人。顾、陆及其名著,可参见各种专著和工具书,毋庸我多言。我在这里要着重讲的两位是

颜之推和萧该。颜之推的大名对语言学人来说，该是“如雷贯耳”，萧该则可能陌生些。其实论音韵学的造诣和成就，二人是齐名的。众所周知，音韵学的最重要的经典是《切韵》，这是隋文帝开皇六年(586)长安论韵的结晶。论韵的十人都是著名的学者、诗人，有北人，也有南人，都是南北朝后期至隋时的文化精英。这次长安论韵不仅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重要意义，而且是分裂近三百年后南北文化汇流的里程碑，是大统一的先声。美国语言学家 J. H. Greenberg 在七十年代初提出“Linguistics as a pilot science”，我国语言学理论家北师大的伍铁平教授也倡言“语言学是领先的学科”，而在中国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里，在名称上“语言”踞于“文学”之前，实际上处境艰难，依我看，中国从古至今，就只有公元 586 年长安论韵这一次语言学算是“领”了“先”。《切韵序》载，十人“夜永酒阑，论及音韵”，最后“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此据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广韵》卷首所载则为“萧、颜多所决定”)。颜之推的著作以《颜氏家训》为最著，其中的“音辞篇”脍炙人口。特别要指出的是，颜之推是建康(今南京)人。之推九世祖颜含是琅邪人，永嘉丧乱时渡江，之推本人虽生于江陵，但他一直视建康为故乡，他的《观我生赋》云：“我祖于是南翔，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经长干以掩抑(自注：长干旧颜家巷)，展白下以流连(自注：靖侯以下七世坟茔皆在白下)。”本世纪五十年代在南京西北狮子山附近考古发掘，发现了南朝时颜家的一座古坟。因此颜之推该是南京籍的大语言学家。萧该的祖先也是北人，永嘉后渡江居南兰陵(今丹阳)。《隋书》卷七五：“萧该者，梁鄱阳王恢之孙也。”萧恢是梁武帝的九弟，其墓在南京东郊栖霞山附近，石兽辟邪保存完好。1983 年我陪李方桂先生访南朝石刻时说：“这就是萧该祖父之墓。”李先生注目久之。萧该是江苏人，毋庸置疑。若进一步，可以说他是南京人。萧该著《汉书音义》十二卷，《范汉音》三卷及《文选音义》，是位音义专家。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卷中“萧该汉书音义”：“予曾见萧该《汉书音义》若干篇，时有异议，然本书十二篇，今无全本，颜监集诸家汉书注独遗此不收，疑颜当时不见此书云，今略记于后。”考颜师古《汉书叙例》列举二十三家旧注，其中汉至晋二十二家，北魏一家。大

概是“厚古薄今”，颜师古不独未录萧该《汉书音义》，梁刘显《汉书音》、夏侯咏《汉书音》、隋包恺《汉书音》并未录。萧该著作未能流传，以致今人知之者甚少。总之，在南北朝时期，江苏地区的语言学家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跟苏州一样，扬州自古以来也是出人才的地方。承南朝余绪，隋代扬州著名的语言学家有曹宪，注《广雅》(其中的《博雅音》近来好几位语言学家作了研究)，著《尔雅音义》、《文选音义》。其高足唐初的李善注《文选》，那是名著，李善的音切成了音韵学人争相研究的对象。由南唐而入宋的徐铉、徐锴兄弟，也是扬州人，以说文学而名垂中国语言学史。

明人空疏，似成共识。上比两宋，下较清代，在学术史上明朝确是低谷。在明代江苏也有若干语言学家，如《韵学集成》的编者章黼是嘉定人，嘉定在明代系苏州属县，隶南京，清代、民国直至本世纪五十年代均属江苏省，1958 年方划归上海市。《声韵会通》的著者王应电是昆山人，《书文音义便考私编》、《六书指南》的作者李登是上元(今南京)人，《韵谱本义》的作者茅溱是丹徒(今镇江)人，等等。最有识见的当推江宁人焦竑(1540—1620)，南京至今还有焦状元巷的地名。《焦氏笔乘》中有若干条论及诗经音，抨击叶音说不遗余力。陈第著《毛诗古音考》，焦竑全力支持，并为之作序。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初，第作此书，自焦竑以外，无人能通其说，故刊版旋佚。”

语言学的勃兴必须有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积累作为温床。南朝经济、文化一度十分发达，但隋南下灭陈，统一中国，历唐五代而至北宋，文化中心仍在北方。近读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 年)，这是一本好书！该书第 20 页云：“很明显的，中国文化发展到了北宋末年，中心已趋向东南。北宋政权的毁灭，只是加速这个中心的迁移，一下子从中原跳到了江南。”明清江南经济、文化突飞猛进。陈正祥说：“明代自洪武四年(1371)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先后 245 年之间，每科的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共计 244 人；南方计 215 人，占 88%；北方仅 29 人，只占 12%。”按南直隶 66 人，占 27%。陈氏又说：“清乾隆元年(1736)诏举博学鸿词，先后选举者 267 人；

其中江苏占 78 人。”江苏是文化大省，毫无疑义。有如此发达的文化为基础，加上整个学术的繁荣，江苏语言学终于在清代臻于大盛。众所周知，《康熙字典》是字典辞书史上的里程碑，卷首列纂修官的名单，共三十位，其中江苏 15 人，浙江 4 人，直隶 3 人，山西 2 人，湖北 2 人，安徽、江西、贵州、陕西各 1 人。江苏人中，苏北 6 人，苏南 9 人；若以府统计：扬州府 5 人(泰州 2 人，高邮 2 人，宝应 1 人)，江宁府 1 人(江浦 1 人)，镇江府 4 人(丹徒 2 人，溧阳 2 人)，常州府 2 人(武进 1 人，无锡 1 人)，苏州府 3 人(常熟 2 人，吴县 1 人)。笔者上述统计的根据是邵荣芬先生对《字典》编纂官里籍的考证，见其《〈康熙字典〉注音中的时音反映——声母部分》。(载于《薪火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 年)

清代迄今近四百年，江苏语言学大师辈出，如群星璀璨，光耀中国语言学史。顾炎武(1613—1682)，昆山人，是位伟大的学者，淹贯经史百家，著作等身，语言文字之学只是他治学的一个方面，其《音学五书》开启了一代音韵学。乾嘉时代的钱大昕(1728—1804)是嘉定人，段玉裁(1735—1815)金坛人，王念孙(1744—1832)高邮人，他们在漫长的中国语言学史上都应该属于最卓越人物的行列，是真正的大师。(可笑的是现在“大师”帽子成批量生产，满天乱套。)段玉裁以文字学显，其实王念孙于文字之学也有极深的造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开列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其中“篆隶分校官”二人，首为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和《广雅疏证》是中国传统语言学史上最杰出的两部著作，因此世称“段王之学”。语言学是科学，所以语言学人冷静、宽厚，不扬彼抑此，不厚此薄彼，文学史家则不然，外国有歌德、席勒优劣之辩，中国有李白、杜甫高下之争，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笼”的《李白与杜甫》褒李贬杜，登峰造极，语言学界至今倒还没有段王优劣论的文章或著作出现。在清代，江苏的语言学家可谓车载斗量，说文四大家两位是江苏人，另一位朱骏声(1788—1858)是苏州人。江声、江沅祖孙也是苏州人，钱大昭、钱绎父子嘉定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高邮人，形成了传统。应该指出的是，清代学者大多治学面很广，“小学”只是他们的“特长”之一，如阮元(1764—1849)，仪征人，一生亨达，历任高官，但倡导学术，厥功甚

伟,主编《经籍籑诂》,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研经室集》,后者收有多篇训诂学、词源学的文章。又如刘宝楠(1791—1855,宝应人)的《论语正义》、焦循(1763—1820,甘泉今扬州人)的《孟子正义》都汇聚了他们时代的小学研究成果。焦循是位多方面有成就的名学者,《雕菰楼易学三书》是哲学名著,他还有《剧说》、《花部农谭》,在戏曲史上,难能可贵,他还有《里堂学算记》。

话要说到现代。那天丁邦新先生和我历数的现代江苏语言学家,第一位是马建忠(1845—1900),丹徒(今镇江)人。1898 年问世的《马氏文通》是汉语语法学的开山著作,杨树达说:“自马氏著《文通》而吾国始有文法书,盖近四十年来应用欧洲科学于吾国之第一部著作也,其功之伟大,不俟论矣。”对《马氏文通》的推崇和研究历久不衰,可参见蒋文野先生《马建忠编年事辑》及《〈马氏文通〉论集》。郭锡良先生《1992 年的古汉语语法研究》(《语文建设》1993 年 12 期):“八十年代以来,语法学界对《马氏文通》的研究一直很重视,总的评论倾向是提倡对《马氏文通》进行科学的再认识,有的文章从语言共性的理论高度肯定了《马氏文通》采用拉丁语法框架的合理性,有的文章论证了《马氏文通》与传统语文学的关系,并驳斥了文化断层说。”我们认为,应该大书特书的是,《马氏文通》的出版开辟了中国语言学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诞生。再过两年,我们应该隆重庆祝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期颐之寿。

年龄次于马建忠的有孙锦标(1856—1927),南通人,《通俗常言疏证》、《南通方言疏证》的著者。刘鹗(1857—1909),镇江人,这位蜚声近代文学史的《老残游记》的作者还著有《铁云藏龟》,对甲骨文的传布其功匪浅。徐昂(1877—1953),南通人,其《徐氏全书》中有《诗经声韵谱》、《石鼓文释音》、《说文音释》、《律吕纳音旨法》、《等韵通转图证》等音韵学论文十余篇和《马氏文通订误》等语法学论文。汪荣宝(1878—1933),吴县人,他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开辟了古音研究的新途径。朱文熊(1883—1961),昆山人,提倡汉字改革,著《江苏新字母》,“普通话”一词似乎最早见于此书(此承陈旻同志告我)。刘师培(1884—1919),仪征人,《刘申叔先生遗书》收书七十四种,内有小学论著。

这里特别要提到刘复(1891—1934),江阴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赴西欧留学,是早期的洋博士之一。他在语言学方面的著述说明他是新学营垒中的杰出学人,他是中国实验语音学的鼻祖,在语法、文字、敦煌学诸方面都有建树,他在二十年代中期推广国际音标,提倡"调查各地的方言","还希望按照法国语言地图的办法,编成一部方言地图"(见魏建功《黟县方音调查录》,《国学季刊》第4卷第4期,1935)。前几年其故乡建成"三刘纪念馆",但是南京的《扬子晚报》报道时,居然写出"老大刘复"、"老二刘天华"、"老三刘北茂"这样的文字,不文若此,可发一噱。

中国现代语言学在其近百年的光辉历史中,涌现出许多名家,其中首推赵元任(1892—1982),常州人。他在多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尽人皆知,毋庸赘言(以后仿此)。他被称为汉语学之父,我看,应尊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领相望。……呜呼,何其盛也。"(借用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语)赵元任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世界的,是在国际语言学坛上最有影响的中国学者、亚洲学者。

我们再接着介绍若干老一辈江苏籍语言学家,其中有些在别的学科有更突出的成就。郭绍虞(1893—1986),苏州人,著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他在抗战前即发表关于汉语言文字的论文多篇,后结集为《语文通论》及续编,"文革"结束后不久即出版了《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上下册。叶圣陶(1894—1988),苏州人,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同时也是著名的语文学家,著有《文章例话》、《文心》,编《开明国语课本》等,为文谨严不苟,学高德高。陈邦怀(1897—1986),原籍丹徒,生于东台,早年在东台、无锡任教,1954年任天津文史馆馆员,1979年任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顾问,著有《殷虚书契考释小笺》、《殷契拾遗》、《殷代社会史料征存》、《嗣朴斋金文跋》等。朱自清(1898—1948),扬州人,杰出的散文家,诗人,文学史家,他在语文教学与写作方面的著论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这些论著是《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论白话》,《语文拾零》等。1943年为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写的长篇序言《中国语法的特征在那里》就收在《语文拾零》内。张弓(1899—1983),灌云人,长期在北方的大

学任教,其《中国修辞学》是中国修辞学的开拓性著作之一。黄淬伯(1899—1970),南通人,年轻时以《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名噪一时,晚景凄凉,死于“文革”中,他的一部隋唐音的遗著至今未能出版。闻宥(1901—1985),松江(1958年方划归上海市)人,一生颇为坎坷,他是研究汉藏系语文及少数民族古器物的名家。魏建功(1901—1980),海安县西场镇人,西场原属如皋,所以在《古音系研究》里,他自称如皋人。《古音系研究》是本世纪的音韵名著,至今还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台湾自甲午战后沦为日本殖民地,光复时魏建功为推行国语委员会主任,“民到于今受其赐”,于统一大业,功昭青史。袁家骅(1903—1980),沙洲县(今张家港市)人,他在汉藏语和汉语方言学方面都有高度成就,《汉语方言概要》是汉语方言学的经典著作,泽施几代方言学者,夫人钱晋华(江阴人)翻译了裴特生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这一名著。吕叔湘(1904—),丹阳人,当今中国语言学界的泰斗,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语言学家。江苏出了三位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先生是第一位。丹阳吕氏出了好几位文化名人:画家吕风子;佛学专家吕澂,其五卷佛学论著集由齐鲁书社出版;语言学家兼英语专家吕叔湘,《吕叔湘文集》(六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两部文集几乎同时问世。周有光(1906—),常州人,献身于语文现代化事业,年过九旬犹自笔耕不辍。葛毅卿(1906—1977),无锡人,著名音韵学家,“文革”前曾灌国际音标唱片。高明(1909—1993),高邮人,在台湾出版多种著作,影响巨大。朱星(1911—1982),宜兴人,认为《中原音韵》和《广韵》代表不同的音系,现代汉语通语溯源于古燕方言。董同龢(1911—1963),音韵学、方言学、南岛语的名著至今仍为学人研读。关于他的籍贯,《董同龢先生小传》(《史语所集刊》第36本,1965年)、《绚丽的文化世界——南通人文科学论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页177)、《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都说他是如皋人。这次我请教了丁邦新先生,丁先生说,应是武进人。他生于昆明,长在如皋。叶籁士(1911—1994),吴县人,青年时代即投身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解放后是文字改革工作委员会的实际主持人。胡乔木(1912—1992),盐城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卓越的政论文作家,对语言文字也有很深的造诣,是解放后语言

文字工作的决策者。据云，五十年代的“普通话”一词由他提出，或因他而定。上海《咬文嚼字》杂志 1996 年 2 期第 7 页载国家语委党委书记某公透露，“普通话”将改为“通用语”，确实不宜再用 1949 年前的“国语”，然而“普通话”、“通用语”这两个专名皆欠雅。若容小民置喙，不如用“通语”为宜，“通语”一词出自扬雄《方言》，于古有征，当今妇孺亦不难知晓。殷焕先(1913—1994)，六合人，不仅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而且书法精妙。管燮初(1914—)，无锡人，上古汉语语法专家。继甲、金文语法专著后，最近又推出《左传句法研究》。邢公畹(1914—)，高淳人，生于安庆，知名的侗台语专家。周法高(1915—1994)，东台人，于音韵、文字、语法、古籍整理等皆有杰出成就，著作等身。去世前一年眼疾严重时还口述给我的信(师母笔录，先生签名)，引魏武名句“烈士暮年，壮心未已”，要我复印一篇大陆学人写的关于古汉语系词的文章，准备手术后写论文。朱德熙(1920—1992)，苏州人，为国为民为学术赍志以殁，1993 年初我写了悼念文章《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本拟倒用李白句“寂寞身后事，千秋万岁名”为题，以后还要写缅怀朱先生的文章，要用这题目。李成蹊(1921—)，靖江人，徐州师范大学教授，致力于词汇学、训诂学，著有《中国训诂学史》(待刊)。王均(1922—)，南通人，著名的汉藏语专家，三十岁时任广西壮文制订组副组长，现正主编《南通方言志》，官话方言中最特殊、最有学术价值的当推南通方言。蒋希文(1922—)赣榆人，贵州大学教授，于赣榆方言、贵州方言、汉语近代音、南北朝音皆有突出贡献。至于七十岁以下的学者为数更多，不一一缕述。

江苏籍的老语言学家在江苏执教的以钱玄和徐复“最为老师”。钱玄(1910—)吴江人，著有金文语法的系列论文，耄耋之年数载足不出宿舍大院门，成《三礼辞典》；越三载，于 1995 年末巨著《三礼学》成，而目疾重矣。三礼之学，绝学也。数年前我去拜年，先生指着面前的一本线装书说：“人是活的，搞不过他；书是死的，对付得了。”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十六字记在我的学术札记本上。徐复(1912—)武进人，当今著名的训诂学家、文献学家，《秦会要订补》、《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后读书杂志》、即将出版的《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訄书校注》均为名山之著。主编之《广雅诂林》堪称尽善尽

美，功德无量。年登八五，身无一病，自朝至夕，伏案著述，孜孜不倦。

自清代以来，江苏语言学界可谓人才济济，但从地域分布看，不可一概而论。1995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多卷本巨著《江苏省艺文志》，苏州、无锡、扬州几卷皆千页以上，徐州、淮阴则相形见绌。在清代，语言学家以苏南（尤其是苏南东一中部）人居多。还有苏北的扬州府学者，乾嘉时期形成扬州学派，张舜徽为之著《清代扬州学记》，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六谈“扬学”，何等推崇！赵航著《扬州学派新论》，对王念孙、王引之、阮元、黄承吉、刘台拱诸人的成就都有透彻的述论。在苏北，扬州府外只有少数学者，如著《别雅》的吴玉搢是淮安人，著《音学考源》的吴振勃和著《许氏说音》的许桂林是东海人。至现代，苏北语言学家为数渐多，如赣榆的蒋希文（前已述）；邳县的薛凤生，关于近代语音史和现代普通话的专著影响深广；宝应的刘坚，著名的语法史专家，任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和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多年。

最后要谈一下长江北岸西起泰州东至南通的通泰方言区，清代也出过几位语言学家，如兴化任大椿著《字林考逸》、辑《小学钩沉》，刘熙载《古桐书屋六种》中有小学数种，泰州田宝臣著《小学骈支》，泰兴何萱著《韵史》，如皋姜日章著《天然穷源字韵》，其后还有南通的孙锦标、徐昂。本世纪所出的学者则远胜前代，如海安魏建功、东台周法高，南通黄淬伯、王均，还有长在如皋的董同龢，皆见前述。还有泰兴李人鉴，语法学者；泰州马汉麟，古汉语专家；如皋任铭善著《汉语语音史要略》。本文最末以丁邦新压轴，《中国语言学大辞典》说他是杭州人，应为如皋人，其成就和职衔众所周知，不赘。

总之，文化的发达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孙吴在江淮立国，江苏地区始出语言学家。在江苏的两千年的语言学史上，三个时期为最盛：一为南北朝时。一为清代，康熙帝在二十三年（1684）南巡时作《示江南大小诸吏》，诗有“东南财富地，江左人文薮”句，本文上面所述的清代语言学家乃其“荦荦大者”，限于篇幅，不得不从略。一为现代语言学时期，在全中国的地位如何？中国人有避嫌的习惯，我不便饶舌。还是让我抄一段古人的话吧，宋代江西吉水人曾敏行著《独

醒杂志》，永嘉人陈傅良跋曰："余尝次本朝学问多出江西，至欧公遂以议论文章师表天下，曾、王又相次第起，最后鲁直且以诗擅一代，盛矣！"

主要参考文献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行本。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通行本。

季羡林、周祖谟等《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陈海洋等《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许嘉璐《传统语言学辞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

曹述敬《音韵学辞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

《中国语言学家》编写组《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一至五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1—1986年。

吉常宏、王佩增《中国古代语言学家评传》，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

濮之珍《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

按，诸书皆有可增补者，如沈步洲《言语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1）收入近年出版的《民国丛书》第一种，可见有相当价值。沈系江苏武进人。又如《中国语言学大辞典》于汪荣宝不载生卒年，而置于王照（生于1859）之前。

1993年11月初稿
1994年冬二稿
1996年元旦修订

此文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1996年4期（总第226期）。

1996年7月底台湾中正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所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著名的语法专家戴浩一先生和语音学家陈洁雯教授访问南京，8月2日他们去苏州，卞觉非教授和我去火车站送行，在月台上，我们说："此行也，镇江——马建忠，丹阳——吕叔湘，常州——赵元任，苏州——朱德熙。"宾主无不兴奋拊掌。

1996年11月徐州杨亦鸣教授专函赐教，建议我补上几位“很重要的”语言学家，今遵命增补。又加上了一段《康熙字典》江苏籍纂修官地域分布的统计，这与笔者以前所做的江苏语言学家地理分布的分析很为符合。

1996年底

《汉语与汉文化》序

语言与文化这个专题，苏州学者师为公同志研究多年，发表过系列专论，近来又修订充实，精益求精，勒成专著，大概是师法让弟子作序的陆宗达先生(北师大名教授，中国训诂学会首任会长)吧，不请名人，却嘱我作序。我跟为公是先后同学，十年前在南京又相互切磋一载，拜读过他的书稿，推辞不得，只得写几句读后感。

在中国，1950年问世的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可谓是开山之著，但是此后几成绝响。新时期以来，语言与文化的研究风起云涌，为公同志置身于这变幻的风云中，对其大势、流别当然看得颇为真切，开宗明义，抵掌纵论。不仅眼高，而且手高。他不广告式地宣传语言与文化研究的伟大意义，也力除泛泛之论，他脚踏实地，胼手胝足地去"立"。不同于已经刊行的同类论著，他的架构有自己的特点，从语言的三大块即语音、词汇和语法入手，逐个地研讨其与文化的关系，条分缕析，淹贯博达，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当然对于"语言与文化"这一课题，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是认真的著作都在努力建立自己的架构，各有千秋。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为公同志的体系是一种较佳的体系，他的这本学术著作自有其千秋在。叹其精深之余，我又惊其赅博。这本书上天下地；古到十三经，今到现代民间"脏话"；高到先圣先贤，低到匹夫匹妇；本国吴语官话，西方英语俄语，引用古今中外书达数百种之多！有好些我没看过，或竟连书名也不知，惭愧自己的不学。等为公这本书出版后，我要放在案头，在教学和写作中引述它的观点，采撷它的例证。

我们见到的学术著作往往经院气太重，不食人间烟火味，当然这也是文化身上的时代烙印。为公同志这本书，本旨在纵论学术，但它"入世"，或者用若干年前的老词语说，即"干预生活"，请看第9页：

八十年代后，伴随着开放而来的是崇洋思潮，文化上也再现

了轮回现象，译音词不甘寂寞，又染指汉语。如称公交车为“巴士(bus)”还有汉英合壁的“大巴”、“中巴”、“小巴”的说法，饼干叫“克力架(cracker)”等，从汉语史看，此风成不了气候。

高见，高见！我举双手赞成，“克力架”不久肯定要夭折的，勿谓言之不预也。又如第85页的两段：

侯宝林、马季等相声演员都一再表示了对相声现状的担忧，慨叹好的作品太少，批评了相声表演中的庸俗化倾向。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滑坡，经过“文化大革命”，全中国人的文化营养不全。不仅汉语知识水平低，传统文化的知识更低，许多人简直是空白，“之乎者也矣焉哉”对一些人来说比外语还难理解。在历史上，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不仅学子从小读《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就连山野匹夫、市井小民对圣人的言语也不陌生。所以优戏及相声中以孔孟之言语作包袱就能收到奇特的效果。而对今天的听众来说，这块传统的风水宝地却难以利用开发，比如“二三子以我为隐乎”、“贤者然后乐此”等包袱，普通人连句段关系的意思都吃不透，更遑论联想关系了。其次，对相声作品限制太多，古人可以用圣人的话调侃逗趣，而今人却不能或不敢用当代的领袖或名人的话语歪讲曲解，随意联想，这就又失去了为当代人熟悉而又可以作为包袱的材料。再比如，针砭现实的作品常因文艺审查而搁浅，梁左曾撰文叙述过某年春节晚会为姜昆准备了一个好段子，但因审查未通过而报废，不得不临时凑合一个应景之作。

庸俗化作品的出现也与民族文化素质下降相联系，由于素质低，就欣赏不了高雅一些的相声作品，只能感受肤浅东西，它与目前传统正宗文化式微而市井文化泛滥、严肃音乐滑坡而流行音乐盛行、古今名画卖不出去而裸体美人不胫而走、博物馆冷冷清清而游乐场人满为患、不追求造福社会人群流芳千古而追求吃喝嫖赌遗臭万年等怪现状是同一症候，需假以时日，综合治理！

我不仅要连呼：深刻，深刻！痛快，痛快！为公语汇丰富，为文若行

云流水,于此亦可见一斑。

再饶舌几句。新时期学术热点很多,比较文学是其中之一,论著也是如泉水不择地而涌现,刚开始也很有吸引力,但是时间一长,就不同了,因为无论其广度和深度,中国文学何其大哉,外国文学何其大哉,拈来一点或几点异同,谈谈说说,煞有介事,这样的文章多了,读者有腻味之感,就伸手要有真知灼见的论著。语言与文化这一热点也有类似之处,语言何其大哉,文化更何其大哉!我们回过头看看那些呼喊性的,泛泛之论的文章,就觉得未餍人意,甚至讨厌,当时谋得名与利,留下的却是假大空。(按: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而保存下的论著仍是有价值的。)像为公这样倾十载之力,广收博罗,潜心钻研,作系统的比较,终于托出这份硕果,难能可贵。然而语言与文化,这样的大题目,做二十几万字的文章是不够的,十倍的篇幅也未必够。在语言的三大块中,词汇与文化的关系最为明显,其次是语音,再次是语法,这就激励我们去攻关。记得我在读彼特森(Holger Pedersen)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时,就很惊讶上一世纪很多西方语言学家为一个专题竟写出多卷本的巨著,为公好学深思而又富于春秋,希望数载之后他也写出多卷本的《汉语言与汉文化》的巨著来,我这个老同学会再次面上生辉。

我看到不少序言,往往以“是为序”结尾。我想,师为公同志的这本好书应该由合适的名学者作序,我是个勉强的人选,只得勉强为之,是勉为序。

1996年元月于南京大学

《汉语与汉文化》,师为公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

校辑本《山中白云词》之讹误

提要　时至今日，古籍需要整理，自不待言。然而整理过的古籍，讹误不少，尤其是诗、词、曲、赋，整理者往往昧于音韵之学，致成较多错误，殊堪惋惜。自诗经、楚辞以降，历代韵文的校勘、注释、考辨无不与该古籍述作时的语音密切相关，音韵学是古籍整理的有效武器，此乃颠扑不破之理，惜乎晓此理者甚尠。校辑本《山中白云词》之误多与不明韵学有关，故胪列辨析于文中。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之一《山中白云词》，吴则虞校辑，成于1958年。后经整理加工，于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拜读后，发现若干点校和排印的错误，谨述于下。

一　确定韵字问题上的讹误

（一）当为韵字而未视为韵字

该书《编后记》云："依通例于韵字下用句号，无韵句末用逗号。"笔者近年从事宋词韵的研究工作，故将该书韵字全部校读一过，发现有四十三例，校辑本不定为韵字，但依据张炎自著或其他宋人词的同调同体的韵律，并参照万树《词律》、王奕清等《词谱》诸书，可视为入韵：

5页《绮罗香》"良宵谁念哽咽"，按，末字与"切、节、叶"等叶韵，27页同调可证。

8页《三姝媚》"芙蓉城伴侣"，按，"侣"与下"护、度、雨"等叶韵，12页同调可证。

10页《琐窗寒》"香留酒殢"、"形容憔悴"二句之末字皆应入韵，与"里、碎、鬼"等相叶。《词谱》卷二十七定如此，可从。

15页《琐窗寒》"通幽径"，按，"径"与"润、信"等叶，10页同调

可证。

15 页《琐窗寒》“待移灯剪韭,试香温。鼎分明醉里,过了几番风信。”按,“鼎”应属上,是韵字,应加句号。可以 10 页《琐窗寒》为证,该首此位置句为“恨玉管埋云,锦袍归水”。

18 页《甘州》“谁古谁今”,按,“今”应入韵,9 页《甘州》,48 页《甘州》等可证。

21 页《忆旧游》“飞入秋冥”,按,“冥”与“凭、云、陵”相叶(自此首起一般不再赘言例证)。

23 页《台城路》“虚沙动月”,按,“月”与“折、缺、节”相叶。

26 页《月下笛》“天涯倦旅”,按,“旅”与“鹭、苦”叶。

30 页《祝英台近》“锄浩渺”,按,末字与“悄、草、少”等叶。

31 页《疏影》“窥镜蛾眉淡抹”,按,“抹”与“灭、洁、彻”为韵。

36 页《西子妆慢》“遥岑寸碧”,按,此词全部韵字为“意、泪、碧、气、此,外、闭、世、倚、醉、里”,“碧”应入韵,万树《词律》卷十四论及此词云:“其词是‘意’字起韵,‘碧’字乃以入声为叶者。”据张炎自序,此调乃吴文英自度曲,张炎仿之,吴词于“碧”的地位入韵。词中入声与阴声通叶,万树、戈载、王国维都曾指出,笔者曾于二万首宋词中搜辑出七十二首,著《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一文,载于《音韵学研究》第二辑(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中华书局,1986 年)。

36 页《西子妆慢》“斜阳外”,按,万树云:“换头起句,叔夏用‘外’字,或谓可以不叶。余云:词中多以‘外’字叶支微韵,作者自当用韵为是。”吴文英词于换头句亦用韵。“外”与支微韵相押,于张炎词俯拾皆是,如 10 页《琐窗寒》、49 页《真珠帘》、60 页《湘月》等等,校辑本均定“外”为韵字,何独此处不然?

41 页《斗婵娟》“明朝斗草”,按,可认“草”为韵字。

43 页《长亭怨》“故人何许”、“钓珊瑚海树”、“烟篷断浦”三句之末字均可认为韵字。

44 页《玲珑四犯》“问种桃莫是前度”,按,可视“度”为韵字。

52 页《探芳信》“恨凝蛾岫”,按,“岫”与“骤、首、柳”诸字韵,据张炎自序,此系为和周密而作,周密原词“岫”入韵。

54 页《甘州》“闲锁北山云”,按,“云”与“吟、林、君”等相叶。同

书9页、18页、48页同调于此位置皆用韵。

56页《台城路》“荒台只今在否”，按，“否”为韵字，与“去、处、旅”等叶，“否”与鱼模韵上去声字相押，在宋词中习见，如本书44页《玲珑四犯》、26页《月下笛》、102页《台城路》皆然。

60页《湘月》“随风万里”，别本“从龙万里”，此二“里”均应视作韵字。

69页《南楼令》“一片赤城霞，无心恋海涯”，按，“霞、涯”二字与下“家、琶、车”等字为韵。

72页《木兰花慢》“有园林、如此更何如”，“如”字应为韵字，《词谱》卷二十九，此调列十二体，相当于此词“如”之位置，无不用韵。

75页《清波引》“寒汀古溆”，按，“溆”字与“鹭、渡、楚”等为韵。

91页《南乡子》“庭户隔尘寰”，按，“寰”与“间、关、攀”等叶韵。

92页《壶中天》“心事时看天语”，“语”与“雨、补、树”等相押。

95页《祝英台近》“湖天日暮”，按，“暮”可视作韵字，叶“语、处、雨”等。

97页《瑶台聚八仙》“晚香淡似夜来些”、“云髻双丫”，二句中的“些、丫”与“沙、斜、夸、葩”押韵。

98页《甘州》“斜倚竹篱边”，按，此首与9页《甘州》(记玉关踏雪事清游)同一体，“边”应视作韵字，叶“寒、弯、环”等。

102页《台城路》首句“扁舟忽过芦花浦”，“浦”应入韵，《词谱》卷三十一所收姜白石“庾郎先自吟愁赋”阕首句即押韵，张炎此词与之同体。

103页《月下笛》“别后。都依旧但靖节门前，近来无柳。”按，“旧”应点断，系韵字，应施加句号，26页同调可证。

109页《摸鱼子》“乾坤静里闲居赋”，按，“赋”可视为韵字。

113页《蝶恋花》“还似瘢痕涂獭髓”，按，“髓”与“焙、退、醉”叶，为韵字。

114页《新雁过妆楼》“谩嗟吁”，按，“吁”与“无、书”等为韵。

133页《祝英台近》“衣楚楚”，按，“楚”可视作韵字，叶“露、许”等。

134页《台城路》首句“老枝无着秋声处”，“处”字入韵，此阕与

102 页《台城路》同体。

138 页《摸鱼子》"黄河路接银河路",按,"路"字可视作韵字。

153 页《华胥引》"粉黄清绝",按,"绝"字叶"别、粒、发"等。

(二) 不当为韵字而视为韵字

笔者还发现十例,校辑本认为是韵字,而实非韵字。述如下:

10 页《琐窗寒》"空帘剩月",按,"月"不得与"外、里、碎"等押韵,《词谱》卷二十七不认为是韵字。

15 页《琐窗寒》"试香温","温"非韵字,见上节第五条。

17 页《水龙吟》"纤裳玉立",按,"立"非韵字。《词谱》卷三十此调收二十五体,此位置未见有押韵者。

51 页《渡江云》"浦潮夜涌平沙白","白"非韵字。

58 页《长亭怨》"恨西风不庇寒蝉",按,"蝉"乃阳声字,断无与入声"说、叶、节"等相叶之理。

60 页《真珠帘》"见说苏堤晴未稳",按,"稳"字为阳声字,亦不能与阴声字"雨、去、古"相叶。

61 页《大圣乐》"就树揽香",按,"香"不与"趣、处、语"相押,阳声韵不得与阴声韵相押。

96 页《瑶台聚八仙》"看满楼依旧",按,通首叶阳声东钟韵,岂能间入阴声"旧"字?

97 页《瑶台聚八仙》"悠然意",按,"意"不得与"花、家"等押韵,察其前两首,亦可见此位置不入韵。

108 页《南乡子》"童子策驴人已醉",通首押尤侯韵平声字,不可能羼入支微韵去声"醉"字,此位置不押韵。

二　其他错误

184—185 页"词话"第二条:"张叔夏《国香》词自序云:'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师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属余纪其事。词成,以素罗帨书之。'"(按,原词文不录。)其下注出处为"录自宋吴曾《能改斋漫录》"。6 页《国香》词的校语中也多次出现《能改斋漫录》。按,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吴曾乃南宋高宗绍兴时人,曾党附秦桧。《能改斋漫录》编成

于绍兴二十四至二十七年(1154—1157),张炎乃南宋末年人,生于理宗淳祐八年(1248),后半生在元代度过。观《国香》词序,似为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290—1291)张炎北上大都时事。吴曾书何能记述张炎事迹与作品?查阅《能改斋漫录》一过,无此条。

166页录《词源》钱良祐跋,笔者以蔡桢《词源疏证》所载与此校辑本对校,发现校辑本有如下错误:一、"其故友处伯雨","处"应为"张",张雨,字伯雨,乃元代著名道士,有《句曲外史集》等行世,《南村辍耕录》载其事迹数则。二、"子仁与余买小舟并湖同为道客","并"为"泛"之误。三、"一洗怡然心眼","怡"为"悠"之误。后二条可以151页为证。又,标点错误:一、"乙卯岁余以公事留杭数月。而玉田张君来寓钱塘县之学舍,时主席方子仁,始与余交,道玉田来所自,……"其中的"席方子仁"如此标点,似乎姓席名方字子仁,其实应为"时主席方子仁",161页亦作"方子仁"。二、"伯雨为设茗具馔盘,旋日入而归"句,应在"馔"字点断,"设茗具馔"是并列的两个动宾词组,"盘旋"乃一连绵词甚明。

164页"拊几击缶,同声附和,如梵呗,如步虚",按,"梵呗"是指和尚唱诵佛教歌赞,"步虚"是指道士通经礼赞,二者性质相同,步虚岂能打书名号?可能点校者以为"步虚"乃词牌名,即西江月。

160页"……石刻碑文后有镃曾孙桎跋,盖以五行相生为世次之名者,功于功甫之子'赏心乐事'称为'小庵主人'而佚其名"。按,"功"为"始"之误,"功甫"二字应点断,"之子"前复夺"功甫"二字。此乃江藩《词源跋》。

169页"孔行素至正真记","至正真记"系"至正直记"之误。

176页"亦有寒、删间杂,覃、盐、寒、删亦抵颚,覃、盐亦闭口",此句应标作"亦有寒、删间杂覃、盐,寒、删亦抵颚,覃、盐亦闭口"。在音韵学中,"寒、删"属山摄,收n尾,覃、盐属咸摄,收m尾。校辑者不明音学,致有此误。

关于张炎词的点校,据笔者所见,其讹误有:

108页《南乡子》:"晴野事春游。老去寻诗苦未休。一似浣花溪上路,清幽。烟草纤纤水自流。　何处偶迟留。犹未忘情饲酒筹。

童子策驴人已醉。知否。醉里眉攒万国愁。”通首押尤侯韵平声，“醉”非韵字，前已辨。问题在“否”的位置确应入韵，可是“否”乃上声字，怎能与平声字相叶？宋词押韵的规则是：平声字互押，上、去声字互押，入声字互押。点校者未能校出这个问题，其实“否”应改作“不”，彊村丛书本正是。《广韵》“不”有三音：一、平声尤韵：“不，弗也。……甫鸠切。”二、上声有韵：“不，弗也”，“方久切”。三、入声物韵：“不，与弗同”，“分勿切”。张炎这首《南乡子》是押的平声韵，“知不”的“不”合乎《广韵》平声尤韵甫鸠切，在宋元词中这种现象很为普遍。辛弃疾词凡四见，如《破阵子》：“掷地刘郎玉斗，挂帆西子扁舟。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燕雀岂知鸿鹄，貂蝉元出兜鍪。却笑卢溪如斗大，肯把牛刀试手不。寿君双玉瓯。”全词押尤侯韵平声，“不”是韵字之一。比张炎小几岁，也是由宋入元的南方人刘将孙《沁园春·壬戌之秋》“客亦知夫，盈虚如彼，山月江风有尽不”，通首押“舟流幽州蝣浮缪不游”，皆平声。宋元诗亦如是，欧阳修《居士集》凡四见，元好问《赠答刘御史云卿》之三亦然，均以“不”作平声韵字。

52 页《探芳信》注八云“……草窗和韵即如此”，实际上张炎此阕乃和作，别本题作“次周草窗韵”可证。校语反客为主，误。

39 页《长亭怨》注三：“龚本作‘花□’，曹本作‘花径’，许本同，水竹居本作‘花底’，四印本亦作‘花底’，兹从许本。”第一、三、五的逗号应改作句号。“亦作‘花底’”四字可以“同”字代之。

6 页《庆春宫》“听隔柳、谁家卖锡”，注五：“‘隔柳人家’一作‘绿水人家’……”注释与原文不符。

27 页《绮罗香》：“慢倚新妆，不入洛阳花谱。”上四字有注，下六字另有注，为“一作‘小字金书，心事已成尘土’”。45 页《凄凉犯》“犹自留连，醉筇游屐”上四字有注，下四字的注：“原注又云：‘一作慷慨犹歌，唾壶空击。’”此皆失于照应，宜为“连上句作……”。

143 页《临江仙》上下片之间未空两格。

前言中讲张炎“大约在元仁宗延祐七年庚申（公元 1320 年）死去”，159 页《玉田年表》：“公元 1321 年（元英宗至治元年辛酉），玉田卒于此年之前后，年约七十岁左右。”是前后失于照应。

以上所言未必正确，祈请通家指正。

1985 年 2 月

此文原发表于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办《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 年第 1 期（上海古籍出版社）。

从曲律、曲韵查核诸家对白朴曲点校的失误

提要 白朴是元曲大家，所以元曲选本几乎无不收录其作品。现从曲律、曲韵查核中国大陆近四十年出版的十一种元曲选本，发现其中的白曲的点断错误，无一能免，有些数量颇多。本文所录的诸家点断失误数可视作抽样检查的数据，百种元曲的点断失误数自必可观，这一问题应引起古籍整理专家和曲学家的重视。点校时只据文意而忽视曲律、曲韵必然导致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

元代著名散曲作家、戏剧评论家周德清在其《中原音韵·序》中说："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说："元代作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作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历来得到高度的评价。白朴剧作，据《录鬼簿》著录，共十五本，加上见于明代戏曲选本的《李克用箭射双雕》残折，共十六本。他也作了不少套数和小令。遗憾的是，散佚甚多。近四十年，中国大陆出版的元杂剧选集几乎无不收录白朴的作品，王文才的《白朴戏曲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是现存白朴作品的汇集，既有剧曲，又有散曲，兼附词集。

元曲的格律十分复杂，较词为甚，较诗更甚。而辨析曲律，戏曲又远难于散曲，所以研究曲律的专书，无代无之，至今不衰，甚至西洋学者亦有著作，且水平甚高，于此亦可见个中消息。若要从事元曲的断句及校勘工作，除了必须具备校勘学教科书中所要求的条件、学养、方法等外，尚须娴熟地掌握曲律、曲韵，令人抱憾的是，这恰恰被忽视，也许是曲律、曲韵之学过于专门，一般的校勘家、点校者难于兼通之故。笔者依据曲律和曲韵，查核近四十年大陆出版的收有白朴

作品的集子，发现诸书对白朴曲的点校均有或多或少的错误。以白朴剧曲而论，现存 235 支曲子，其中 42 支曲子（占 18%）出现点校错误。

现将诸书名及其点断失误数列表于下：

书　　名	编校注者	出版社、出版年月	收　　剧	点断错误数
白朴戏曲集校注	王文才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	梧桐雨全本、墙头马上全本、东墙记全本、流红叶残折、箭射双雕残折、散曲 60 首	47(另误校 2 则)
元曲选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断	中华书局 1958 年 10 月第 1 版，1979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墙头马上全本、梧桐雨全本	17
		中华书局 1989 年重排本	同上	19
元曲选外编	隋树森编	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1 版，1987 年第 4 次印刷	东墙记全本	3
元人杂剧选	顾肇仓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印刷	梧桐雨全本	9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	王季思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墙头马上全本	4
元曲四大家名剧选	徐沁君、陈绍华、熊文钦校注	齐鲁书社 1987	梧桐雨全本、墙头马上全本	1
元杂剧选注	王季思等选注	北京出版社 1985	梧桐雨二、三折、墙头马上二折	5
中国戏曲选(上)	王起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梧桐雨三、四折、墙头马上三折	3

续　表

书　名	编校注者	出版社、出版年月	收　剧	点断错误数
元代杂剧赏析	陈俊山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	梧桐雨四折	5
元代戏曲选注	胡忌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墙头马上二折	1
元人杂剧钩沉	赵景深辑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流红叶残折，箭射双雕残折	2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元曲选》，明臧晋叔编，中华书局本，笔者使用的本子其版权页作“1958 年 10 月第一版，1979 年 6 月北京第三次印刷”。卷首有隋树森 1961 年《校订说明》：“中华书局利用过去世界书局的旧版本，嘱我作一次校勘，改正了不少断句和排版上的错误，重印以应读者需要。”中华书局编辑部 1977 年《重印说明》：“这次重印，我们以 1961 年重印本与涵芬楼影印本校对，并重新审核断句有无差错，改正了二百余处明显的错误。”其第一册收《墙头马上》、《梧桐雨》二剧。1989 年出重排本。旧本点断错误数 17，重排本改正了 1 处错误，而较严重的错误未改，还新增 3 处错误。中华书局的《元曲选》是印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本子，至少经过三次修改，而重排本点断错误反有增加，令人费解。“重新校勘和标点”，当待何日？《元曲选外编》，隋树森编，中华书局，1959 第 1 版，1987 年第 4 次印刷。隋树森 1981 年《编者附言》说，第 3 次、第 4 次印刷时都改正了若干错误。收白朴《东墙记》。还有其他名家的选本也发现若干点校错误。

笔者查核诸家对白朴曲点校失误的程序是，每读白朴一曲后，即查曲谱一类的书，了解其曲律、曲韵，以决定其某一位置是否应点断。如诸曲律书有相互矛盾处，经比较研究后择善而从。重要办法是，笔者及畏友宁继福曾将《元曲选》及《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徐沁君校，中华书局，1980 年）的曲子制成索引（后见 Johnson 书，亦有索引），因此某一曲牌某位置点校是否有误，曲律书孰是孰非，一般地说，只要将同宫调同曲牌的曲子类聚在一起，辨析后便可得知。

笔者使用的曲律书有下列九种:

(一)《太和正音谱》,明朱权撰。

(二)《北词广正谱》,清李玉撰。

(三)《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清周祥钰等编。

(四)《南北词简谱》,吴梅著。

(五)《元词斠律》上编,王玉章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

(六)《汉语诗律学》(增订本),王力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

(七)《元人小令格律》,唐圭璋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八)《诗词曲格律纲要》,涂宗涛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九) *Yuarn Music Dramas: Studies in Prosody and Structure and a Complete Catalogue of Northern in the Dramatic Style* (《元代北曲之结构与曲律及金元戏曲北词谱》) by Dale R. Johnso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1980。

下文征引此九书时概以著者名代书名。

本文所认为的断句上的失误,不是指点断后用新式标点符号时,打句号还是打逗号甚或顿号的问题(这当然也有是非,但见仁见智的因素也不在少,故不具论);也不是指按律不应点断而据文意点断的问题,如《梧桐雨》三折[双调·沉醉东风]第六句"剿除了贼徒救了国家",有的书在"徒"后点断。本文认为的点断的失误是指:

(一) 依曲律为一句,应点断而不断者,特别着重指出的是,押韵处必须点断。元人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二"续补句读例":"凡诗铭韵语,以韵为句。"可是不少点校元曲者往往在这儿犯错误,原因是不谙曲韵,特别是对那些古入声字在剧曲中如何辨别的问题闹不清楚。

(二) 也指那些据律不该断,从词汇学角度也不应断的问题。至于文字的脱漏和讹误现象附于文末。下面依白曲的顺序胪列诸家的失误之处。

一、断句之误

(一)《梧桐雨》

楔子 [仙吕·端正好么篇]首二句

《校注》页6"且着你做节度渔阳去",《元曲选》页350、《元人杂剧

选》页 82 并同。

按，[仙吕·端正好]正格与么篇句法悉同，首二句皆为三字句，朱权、吴梅、王玉章、Johnson 都如此认为。吴梅云："《广正谱》又将么篇首句作七字语，更误。"此处"且着你"是衬字，"做节度"为正字，与"渔阳去"皆为三字句，且"度"押韵，故应于其后点断。可为佐证的例子有《薛仁贵》楔子"你如今离了村庄，别了乡党"（按，衬字下加点），《金线池》楔子"郑六遇妖狐，崔韬逢雌虎"等等（为节省篇幅，此后一般不举此类佐证例）。

一折 [仙吕·天下乐]第二、三句

《校注》页 12"惊的那娉婷将銮驾迎"

按，李玉、周祥钰、吴梅、王玉章、涂宗涛、Johnson 皆认为第二句为二字句，第三句为三字句。王力页 806 将二、三两句并为五字句，Johnson 第 279 页以为非是。王玉章定"惊的那"为衬字，"娉婷"为正字，"婷"押韵，点断，是为第二句。"将"衬字，"銮驾迎"是第三句。《校注》页 100《东墙记》一折[仙吕·天下乐]第二、三句为"欢欣，可意人"，点断，甚是。王文才先生对同一曲牌，点断与否，前后相违。

一折 [仙吕·赚煞尾]第六、七句

《校注》页 15"月澄澄银汉无声"

按，朱权、吴梅、王玉章、涂宗涛、Johnson 皆认为此曲共十一句，第六句为三字句，第七句为四字句，王玉章卷三页 191 指出二句"皆须调韵"。则"月澄澄"为一句，"澄"字押韵，必断，"银汉无声"为一句。《校注》页 56《墙头马上》一折[仙吕·赚煞]第六、七句为"莫疑迟，等的那斗转星移"，如此断句，方为正确。

二折 [中吕·叫声]第二、三句

《元人杂剧选》页 91"等闲等闲"，《元杂剧选注》页 128 同。

按，周祥钰、吴梅、王力、Johnson 皆以第二、三句为叠句，两"闲"字押寒山韵，应断。

二折 [中吕·醉春风]第四句

《校注》页 18"把一搭儿亲自拣拣"

按，李玉、周祥钰、吴梅、王力、涂宗涛、Johnson 以此章第四句为叠字，或叠前句末字，或自叠；可叠二字，也可叠三字，且押韵，故两

"拣"间应点断。《校注》页 112《东墙记》、页 145《箭射双雕》的[中吕·醉春风]第四句的两叠字皆点断,可见其前后不一。

二折 [中吕·古鲍老]首句

《元曲选》页 354"屹刺刺撒开紫檀黄翻绰向前手拈板"

按,"檀"是韵字,应于此后断开。

二折 [中吕·古鲍老]第五、六、七三句

《校注》页 20"红牙筋趁五音击着梧桐按",《元人杂剧选》页 93 同,《元杂剧选注》页 129 同(但"按"作"案")。

按,李玉、周祥钰、吴梅、Johnson 皆认为五、六、七三句悉为三字句,因此"筋"、"音"二字后须点断。

二折 [中吕·剔银灯]第五、六句

《校注》页 20"那些个齐管仲郑子产",《元人杂剧选》页 93、《元杂剧选注》页 130 并同。

按,朱权、李玉、周祥钰、吴梅、王力、Johnson 皆认为第五、六两句是两个三字句,"那些个"是衬字,"齐管仲"后应断。

三折 [双调·搅筝琶]第十、十一句

《元曲选》页 358"看寡人也合饶过他一地胡拿"

按,吴梅卷三第 11 叶指出"他"处叶韵,应点断,甚是。

三折 [双调·太平令]第五、六、七三句

《元曲选》页 359"你呀。见他问咱。"

按,李玉、周祥钰、吴梅、王力、唐圭璋、Johnson 皆认为五、六、七三句均为二字句,末字均叶韵,如是则"他"后应断。请看《元曲选》对同宫调同曲牌同一位置如何点断:页 292《楚昭公》"这信誓。在彼。怎悔。"(1989 年重排本反而增加错误,"彼"不点断。)页 342《墙头马上》"相公便把贱妾栲折。下截。"(1989 年重排本竟然也在"折"处不断!)页 731《陈抟高卧》"纵有那女娘。艳妆。洞房。"同一书内自乱其例,不同版本间矛盾龃龉若此。

三折 [双调·川拨棹]第一、二句

《元曲选》页 360"痛怜他不能勾水银灌玉匣",《元人杂剧选》页 103、《元杂剧选注》页 140、《中国戏曲选》页 89 并同。

按,李玉、吴梅、王力、Johnson 均认为首句为三字,"他"字叶家麻

韵。Johnson 页 124 注指出,《元曲选》应于“他”后点断,加标点,其说甚是。

四折 [正宫·端正好]第一、二句

《校注》页 36“自从幸西川还京兆”,《元曲选》页 360、《元人杂剧选》页 106、《元代杂剧赏析》页 148 并同。

按,朱权、周祥钰、李玉、吴梅、王玉章、王力、涂宗涛、Johnon 皆定此章共五句,首二句皆为三字句,对仗。“川”后应点断,“自从”乃衬字。

四折第三曲 [正宫·滚绣球]第五、六句

《校注》页 37“这待诏手段高”,《元代杂剧赏析》页 148 同。

按,王玉章谓此章格律第一、二、三、四句为第一叠,第五、六、七、八句为第二叠,句法大抵相同,两叠首句“均可叶韵,或均不叶韵”。白朴《梧桐雨》此曲叶韵,“诏”系韵字,应于其后点断。类似例子有《鸳鸯被》二折“他为咱,我为他”,《救风尘》三折“你则是忒现新、忒黄昏”。

四折第四曲 [正宫·倘秀才]第四、五句

《校注》页 37“谁想你乘彩凤返丹霄”

按,朱权、周祥钰、李玉、吴梅、王玉章、涂宗涛、Johnson 都认为第四、五是两个三字句,对仗,则“乘彩凤”后应断,“谁想你”是衬字。

四折第四曲 [正宫·倘秀才]第五、六句

《元曲选》页 361“返丹霄命夭”

按,“命夭”为一句,其前为一句,“霄”叶韵。

四折第十曲 [正宫·倘秀才]第四、五句

《校注》页 38“甚法儿捱今宵”

按,“甚法儿”为一句,应断,理由同上。

四折第十曲 [正宫·倘秀才]第五、六句

《元曲选》页 361“捱今宵懊恼”

按,“捱今宵”为一韵,“宵”是韵字。

四折 [正宫·芙蓉花]第三、四句

《校注》页 38“玉漏迢迢才是初更报”

按,据朱权、李玉、周祥钰、吴梅、王玉章、Johnson,“玉漏迢迢”为

一句,“迢”叶韵。

四折第十四曲 [正宫·倘秀才]第四、五句

《校注》页39“道太真妃将寡人邀”,《元人杂剧选》页108、《中国戏曲选》页94、《元代杂剧赏析》页150并同。

按,“太真妃”为三字句,其后应断。

四折第十四曲 [正宫·倘秀才]第三、四、五、六句

《元曲选》页362“忽见青衣走来报道太真妃将寡人邀宴乐”

按,连续四句竟不点断!吴梅于“报”后点断,王玉章在“道”后点断,是为第三句。“妃”、“邀”后也应点断。“报(或道)”、“邀”、“乐”皆萧豪韵字。

四折第十七曲 [正宫·滚绣球]第七、八句

《元人杂剧选》页109“碎声儿刿剥增百十倍歇和芭蕉”,《元人杂剧赏析》页151同。

按,此为第二叠第三、四句,同折有三支[滚绣球],自可比较。通折押萧豪韵,“剥”在周德清《中原音韵》隶萧豪韵“入声作上声”,系韵字,其后应点断。

四折第十七曲 [正宫·滚绣球]第十、十一句

《元曲选》页362“平白地瀽瓮番盆下一宵惹的人心焦”

按,“宵”为第十句末字,押韵。1989年重排本改正了这一错误。

四折第十九曲 [正宫·倘秀才]第四、五句

《校注》页40“只好把泼枝叶做柴烧”,《元曲选》页363、《元人杂剧选》页109、《中国戏曲选》页95、《元代杂剧赏析》页151并同。

按,应于“叶”后点断,理由见前。此折使用了四支[倘秀才],而断句往往不一致,良可注意,这是由于编者据文意信手点来,置曲律于不顾,连一折之内的四支同曲牌的曲子都不能取来比较,遑论他剧?

四折第十九曲 [正宫·倘秀才]第五、六句

《元曲选》(1989年重排本)页363“做柴烧锯倒”

按,韵字“烧”后应点断。此曲第四、五、六句“只好把泼枝叶,做柴烧,锯倒”,《元曲选》1979年第三次印刷本“叶”后未断,但“烧”后点断;1989年重排本对前者改谬为正,但对后者却弃正从误,可谓得

之东隅，失在桑榆。

四折第二十曲　[正宫·滚绣球]第九、十、十一句

《元曲选》页363“是兀那当时欢会栽排下今日凄凉厮辏着暗地量度”

按，21字竟不分句！“下”后应点断，“着”后也应点断，“着”、“度”皆为《中原音韵》萧豪韵“入声作平声”字，与其他古阴声字相叶，《梧桐雨》第四折押萧豪韵。如将本折所使用的三支[滚绣球]略作比较，这一错误便不致发生。

（二）《墙头马上》

一折　[仙吕·天下乐]第二、三句

《校注》页53“咱萱堂又觑着面皮”，《元曲选》页333、《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页37、《元曲四大家名剧选》页497并同。

按，“萱堂”为第二句，两字句，应点断，其前之“咱”是衬字，理由见上《梧桐雨》一折[仙吕·天下乐]条。王玉章卷四页74：“其第二语为两字”，“而并不叶韵者”，“如《墙头马上》是”。

一折　[仙吕·那吒令]第一、二句，第三、四句，第五、六句

《校注》页53“本待要送春向池塘草萋，我且来散心到荼蘼架底，我待教寄身在蓬莱洞里”，《元曲选》页333，《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页37并同。

按，朱权、李玉、吴梅、王玉章、唐圭璋、涂宗涛、Johnson皆以第一句为二字句，第二句为四字句。第三、四句，第五、六句同之。所以“送春”、“散心”、“寄身”后应点断，其前三字、后一字乃衬字。

一折　[仙吕·寄生草]第三句

《校注》页54“这人、人和柳浑相类”

按，于曲律此为一句，不宜点断。“人人”是宋元常用词，对昵爱者之称，如欧阳修《南乡子·好个人人》：“好个人人，深点唇儿淡抹腮。花下相逢，忙走怕人猜。”周邦彦《红窗回·几日来》：“有个人人，生得济楚。”杨端臣《渔家傲》：“有个人人情不久，而今已落他人手。”《董西厢》卷四《中吕调·古轮台》：“怎不教那稔色的人人挂心头。”“人人”岂能拆开？

二折　[南吕·骂玉郎]第五、六句

《校注》页 61“把你那小性格且宁奈”，胡忌《元代戏曲选注》页 59 同。

按，朱权、李玉、周祥钰、吴梅、王力、唐圭璋、Johnson 皆以此章末两句为两个三字句。通首押皆来韵，在《中原音韵》里，“格”为皆来韵“入声作上声”字，此亦为应点断的理由之一。“把你那”是衬字。

三折　[双调·太平令]第五、六、七句

《校注》页 73“相公便把贱妾梼折下截”，《元曲选》(1989 年重排本)页 342“相公便把贱妾。梼折下截。”

按，据曲律应分为三句，详见前述。按曲韵“妾”、“折”、“截”三字皆为古入声字，在《中原音韵》都变为车遮韵字，其后均应点断。《元曲选》原排本不误，重排本反误。

三折　[双调·七弟兄]第一、二、三句

《校注》页 74“是那些劣㦎，痛伤嗟也”，《元曲选》页 342 同。

按，朱权、李玉、周祥钰、吴梅皆认为此曲牌前三句依次是二字句、二字句、三字句，因此“些”后也应点断，“些”、“㦎”均车遮韵字。《喜剧集》页 48、《元杂剧选注》页 118、《中国戏曲选》页 108、《元曲四大家名剧选》页 537 皆以第三句为“痛伤嗟”，“也”字属下，“嗟”亦为车遮韵字。Johnson 页 116 注云：“第一句缺。”可能是据中华书局《元曲选》本标点误言。

四折　[中吕·醉春风]第四句

《校注》页 82“怎想有这场苦苦”

按，两“苦”间应断，理由见前。

四折　[中吕·满庭芳]第六、七句

《校注》页 83“他那三昧手能修手，模读五车书，会写休书”

按，据李玉、周祥钰、吴梅、唐圭璋、涂宗涛，第六句应押韵。据 Johnson，第六、七句皆六字句，且为对句，因此应作“他那三昧手能修手模，读五车书会写休书”，“模”、“书”均叶鱼模韵。“手模”二字不应拆开，义为手印，旧时契约文书，有关之人须打手印。元曲中不乏此词，如《任风子》三折[中吕·普天乐]：“将手帕铺在田地，就着这水渠中插手在青泥内，打与你个泥手模便当休离。”《遇上皇》一折[仙吕·天下乐]：“动不动要手模，是不是取招状。”

四折　[中吕·石榴花]第四、五句

《校注》页83“你是窨付、负与、何辜”,《元曲选》1989年重排本页345“你是窨付负与何辜”

按,朱权、李玉、周祥钰、吴梅、Johnson皆以第五句为四字句,故应作“你是窨付、负与何辜”。《元曲选》第一版不误,重排本反而失误。

四折　[中吕·上小楼]第六、七句

《校注》页84“幸得个鸾凤交琴瑟谐”

按,李玉、周祥钰、吴梅、唐圭璋、Johnson皆以第五、六句为两个三字句,则“交”后应断开,“幸得个”是衬字。

四折　[中吕·上小楼幺篇]第六、七、八句

《校注》页85“一个儿一个女都一时啼哭”

按,“儿”、“女”后都应点断,与同曲牌曲子比较亦可知。

(三)《东墙记》

一折　[仙吕·油葫芦]第六、七句

《校注》页100“罗帏绣被寒孤,欲断魂”

按,《元曲选外编》页203作“罗帏绣被,寒孤欲断魂”。王玉章卷四页61:“此章正格九句”,“第六、七语均三字”。Johnson亦持是说,但于页313为此曲特加注云,第六句不合常规,为两个二字并列的四字词组“罗帏绣被”,则“寒孤”属下。

一折　[仙吕·赚煞]第五、六句

《校注》页102“串香焚被冷谁温”

按,此曲又名“赚煞尾”,应有十一句,而此章只十句。Johnson页197云,第五句缺,则“串香焚”为第六句,末字押韵;“被冷谁温”实为第七句。参见上关于《梧桐雨》一折[仙吕·赚煞尾]条。

二折　借[中吕·上小楼]第三、四、五句

《校注》页108“想前夜月下,鸣琴韵,和新诗,福至心灵”

按,依律此三句为三个四字句,如同书页84《墙头马上》四折作“治国忠直,操守廉能,可怎生做事糊突”(下加点者为衬字),同书页112《东墙记》三折作“只见他东倒西歪,倚床靠枕、身体斜挨”,故此处应为“想前夜月下鸣琴,韵和新诗,福至心灵”。

四折　[越调·秃厮儿]第四、五、六句

《校注》页120、121“恨人,又见花梢儿窗影下重重”,《元曲选外编》页214则通为一句。

按,Johnson页287云,此曲前四句皆以“恨人”二字置前。朱权、周祥钰、王力、涂宗涛、Johnson以第四、五句均为三字句,第六句为二字句,因此应作“恨人又见花梢儿,窗影下,重重”。

五折　[双调·七弟兄]第一、二、三句

《校注》页126“我这里向前,谢得完全”,《元曲选外编》页217同。

按,“我这里”为首句,“向前”为次句,“谢得完全”乃第三句。理由见上关于《墙头马上》三折[七弟兄]条。

(四)《流红叶》三折

[正宫·端正好]第三、四句

《校注》页135“趁西风独步闲游想一年世事如翻手”

按,“游”后应断。

借[中吕·古鲍老]第五、六、七句

《校注》页136“浑一似血染般胭脂透”,《元人杂剧钩沉》页8同。

按,应于“似”、“般”后点断,参见前《梧桐雨》二折[古鲍老]条。

(五)《箭射双雕》残折

[中吕·粉蝶儿]第四、五句

《校注》页145“一个个手张狂脚趔趄”

按,朱权、李玉、周祥钰、吴梅、涂宗涛、Johnson皆以四、五两句为两个三字句,故“狂”后应断(“一个个”乃衬字)。

(六)散曲

[仙吕·寄生草]第一、二句

《校注》页162“凭阑久归绣纬”

按,朱权、李玉、吴梅、王力、涂宗涛、唐圭璋、Johnson皆以首二句为两个三字句,故此处应折作两句。

[双调·挂搭沽序么篇]第五、六、七句

《校注》页158“柳絮飞玉砌。长郊万里,粉污遥山千叠”

按,李玉、周祥钰及隋树森《全元散曲》以“玉砌”属下,则后二句大致相对,似较胜。

二、误　　校

以上均为断句之误。误校两则如下。

《校注》页 122《东墙记》四折[越调·绵打絮]:“深闺静悄,幽僻庭空;月轮展纸,几扇屏风。似海棠半醉春睡重,鲛绡上绿鬓拥。有情人何日相逢,几时得赴高唐梦中。”明赵琦美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及商务印书馆 1939 年复排本《孤本元明杂剧》第二句皆作“幽僻空庭”,李玉《北词广正谱》首四句作“深闺静悄,幽僻空庭;月轮碾纸,几扇围屏”。王文才校记云:“作‘空庭’,失韵。……今乙转。”孰是孰非?依律,此曲第二句必押韵,如是“庭”字,在《中原音韵》为庚青韵字;如是“空”字,为东钟韵字。其下之“风重拥逢中”皆隶东钟韵。《东墙记》四折共用越调十三个曲牌十四支曲子,有四支确是东钟与庚青通叶:[秃厮儿]叶“东钟惊重”(下有◦号者为庚青韵字),《圣药王》叶“境中浓松重东溶”,[麻郎儿]叶“浓重萦弄”,[拙鲁速]叶“从盈种共栊送梦”,则此[绵打絮]岂无可能为第五支?又,白朴《梧桐雨》一折也有二例:[仙吕·金盏儿]叶“蒙盛敬卿情顶擎”,[仙吕·混江龙]叶“兴醒鞓灯令拥呈”。白朴是真定人,其他真定作家如李文蔚《燕青博鱼》三折[中吕·滚绣球么]叶“精清定棂松青证生灯明”,尚仲贤《气英布》二折[南吕·骂玉郎]叶“柄生并重成定”,史九敬先《庄周梦》一折[仙吕·那吒令]叶“成空凶用瞳”皆为东钟、庚青互叶例。关汉卿剧曲亦有此现象(详见廖珣英《关汉卿戏曲的用韵》,《中国语文》1963 年四期)。可见此[绵打絮]曲首韵作“庭”为是,不明曲韵通叶之例则致误改。

《校注》页 121《东墙记》四折[越调·络丝娘]:“粉花笺写下更长漏永,专诉着瘦减香肌玉容。写罢了眉尖一皱,更教人悲痛。”校记:“原抄‘皱’作‘纵’。”此不言证据而迳改。“纵”是而“皱”非,有三证:一、脉望馆抄校本、《孤本元明杂剧》均作“纵”。二、作“纵”叶韵,反是不叶,此须考察[络丝娘]第三句是否押韵。查《元曲选》中《合汗衫》、《小尉迟》、《倩女离魂》、《丽春堂》、《举案齐眉》、《两世姻缘》、《赵礼让肥》、《㑳梅香》、《萧淑兰》、《望江亭》十剧中的十一支[络丝娘]均于第三句叶韵。《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疏者下船》、《汗衫记》、

《薛仁贵》、《东窗事犯》、《七里滩》、《周公摄政》六剧中的六支曲子亦然。三、在元代,主语“眉”后可用动词“纵”,如元好问[双调·乔牌儿]:“病将愁断送,愁把病搬弄。春山两叶愁眉纵,断肠诗和泪封。”马致远《汉宫秋》第一折前宾白:“眉头一纵,计上心来。”《清平山堂话本·戒指儿记》:“那尼姑眉头一纵,计上心来。”今尚有人如此使用,汪曾祺《云致秋行状》:“致秋有个习惯,说着说着话,会忽然把眉毛、眼睛、鼻子‘纵’在一起,嘴唇紧闭;然后又用力把嘴张开,把眼睛、鼻子挣回原处。这是用粉彩落下的毛病。”(1983年)

白朴作品散佚甚多,现存者未见有元刊本,皆为明本,校勘问题本不多,上述二则系肊改致误,原因在不明韵例,不谙曲律。

三、文字脱漏、讹误及其他

《校注》页135《流红叶》[正宫·叨叨令]“喒两个去来也波哥”句应叠,竟夺一句。

《元曲选外编》页212《东墙记》三折[中吕·三煞]“几得一发明白”,“几”后脱“时”。

《校注》页99[吕仙·点绛唇],“吕仙”应乙转。同书页145[中吕·活快三],“活快”应乙转。

《元人杂剧选》页88《梧桐雨》一折[仙吕·金盏儿]“咱也合嬴”,《校注》页14亦然,“嬴”乃“赢”之误。

《校注》页30《梧桐雨》三折[落梅花],“花”乃“风”之误。页32同上折[川拨掉],“掉”系“棹”之误。

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附编《天籁集编年》(词集)收“小桃红”(页256),而“散曲”部分亦收“小桃红“(页181),重出。按,只应收于曲中。

附记:郑骞《北曲新谱》(台北,1973)久闻其名,奈南京无此书,惜未能征引。然Johnson书对郑谱观点屡屡引用、评论,故可略补斯憾。

此为笔者近两年研究白朴词韵、曲韵的第三文,以此奉献给曲学家、校勘家、古籍整理与出版部门的专家和领导,希不吝指正。笔者

研究曲韵时，曾得到宁继福、杨耐思、周维培、俞为民、吴新雷等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

1988年12月2日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后记：此文原发表于《中华国学》创刊号（香港，1989年）。承师友认为，此文虽非纯汉语史论文，但对曲学和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不无裨益，故略作修改，部分文字叙述改成图表，也许醒目些。中华书局的《元曲选》于1989年出重排本，自应取以相校，白朴两剧，改正原版点断错误1条，严重错误未改，竟然新增错误3条，颇出意外。

1996年10月

欣喜·忧虑

——序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

这篇文章内容有二：一是谈董书和对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愚见；另一是述近两三年对当前学术景况的观察、思考，忧虑盈胸，骨鲠在喉，一吐为快。

今年志翘从益州顺江东下，来金陵执教，下车伊始，即将此书付我，令我作序。原因之一，他与我的君子之交已二十多年，我又曾是他的博士论文的评阅人之一，料我推辞不得。之二，他把我引为同道，知道我有一丁点儿考证癖，对词汇史也曾有所涉猎——二十多年前，我在《"隶书"辨》中曾考证过"隶"、"徒"、"徒隶"、"陪隶"、"隶书"、"今文"、"施"诸词；在对《南村辍耕录》的语言研究的两篇论文中，对"温暾"、"客作"、"课马"等八十个近代汉语词语作过疏证；在另外的一些文章中，考证过"官话"、"方言"、"切韵"、"等韵"、"布文"的出现时代——他以为我能对其劳作的甘苦有体会。

我推辞过，最后还是答应了，这也有原因。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上海版和石家庄版我都买过，翻过，特别是1990年秋冬我使用平山久雄先生的研究室时，曾多次翻阅过他的藏书小野胜年先生的四巨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の研究》，不胜敬佩。圆仁西渡登陆，踏上中国土地，就是海陵县境，我就是海陵人。1998年孟冬，我曾在老同学木津祐子教授的陪同下，登比叡山礼谒延历寺。所以这位古代日本高僧与我有缘，我不可不读他的书，不可不为志翘的关于他的书的书写些文字。而且，志翘之书是可传之作，何不附其骥尾叙述我对近年学术状况的看法？匹夫之言，本不值得一提，但是本着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点悃诚，借作序的机会略叙一二，也许所言皆误，敬请批评，以至批判；或许为人所不屑一顾，那就作为一丝淡淡的痕迹留下

吧：世间也曾有忠言说论在。

大概七十年代末吧，使神州天翻地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好不容易结束了，我到苏州大学去参加一个什么学术会，我在人群中首次看到董志翘同志，不过没说什么话。那时我是青年教师，他是办会的跑腿小青年，此后我们交往也少。如今志翘非复吴下阿蒙，已是备受海内外学人赞誉的知名汉语词汇史专家。他不是上峰提拔、领导垂青，靠什么重点培养、钦点“第二梯队”、御批“跨世纪人才”做出来的，或是夤缘附会，自我炒作等等方式爬上去的，我们只要看看他的近十几年发表、出版的一摞论著，实在，硬邦邦，干货，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这样赢得了学界的瞩目。

请看他这本书，原型是他的博士论文，还有发表过的若干论文。又复经过数载的锤炼，增删，方始成就这精品。当今学术著作出版之多，可称热闹、繁荣，但也毋庸讳言，如志翘此书之精者，则甚少。

我认为，这本著作，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志翘把论证语料的精确程度和研究价值放在重要地位。他十分重视语料的真实性、可靠性。他在考察《行记》的渊源和版本上花了超乎寻常的力气，几乎将现存于世的《行记》版本网罗殆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了精审的校勘。他对国内外关于《行记》一书的研究现状了如指掌，仅日本及西方的有关研究论著就收集了224种之多，其阅读面之广泛、调查取证工作之仔细可见一斑。做了如此扎实的材料工作，再加上周密严谨的考辨、认真细致的分析，因而书中创获卓卓，既能订前贤之失，又能发他人之所未发。比如，“先日，伏蒙慈流及问，殊慰勤慕，无任感庆。限以旅情，不获被(见)。豁欣之诚，何以为喻”(《行记》卷二，开成五年正月廿日)一条，因抄本虫蚀，“被”字模糊不清，其后又脱落一字，于是此处成了疑案。美国学者赖肖尔阙疑；日本学者小野胜年补为“被见”二字；中国学者白化文从小野之说。志翘则指出：“‘不获被见’为文，殊不可通。从抄本看，虫蚀之字，依稀可见，乃‘披’字也，由此推之，‘披’后一字应为‘展’，当作‘不获披展’为是。‘披展’乃唐代习语，为‘披诚展拜’、‘拜见’之义。”接着历举唐代书仪中在相同场合出现的“披展匪赊”、“未即披展”、“未由披展”、“未蒙披展”等大量外证，以及《行记》中“披展改岁”、“不获诣展”、“诣展不获”之内证，如此考

求，彰明较较，确切不磨(见第二章第四节)。深刻把握研究对象，乃是研究工作取得成功的基础。《行记》一书研究难度很大，该书以当时的汉语写作，因而书中有大量的唐代口语词，但是作者由于受到母语的影响，出现了若干不规范的语言现象，即 interlingual error(“母语干扰性误差”或“语际错误”①)。以往国内外的研究者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在研究中出现的舛误匪尠。志翘在对《行记》的语言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敏锐地指出：《行记》使用的是一种以唐代口语为主体，并杂有文言词汇和日语词汇的混合语言。管它叫“混合语言”或者什么别的名称，这不是要紧的，关键在于志翘明确提出，《行记》的语言不是纯质的或同质的，而是异质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大合我心。多年前吧，有些文章盛赞《行记》对研究唐代汉语词汇的重要性，我曾写信向刘坚先生请教：一个人成年后，学习外语，再好也不能跟本以这种外语为母语的人相比，必然不自觉地搀有自己母语的成分，圆仁《行记》的语言似乎要认真分之析之以后，方可作为汉语词汇史的资料使用。如今见到志翘此著，我以为，其成功处就在于，志翘每每能在考释中对语料加以鉴别，因而高见迭现。如在第三章辟专节讨论《行记》中羼入的日语词，在其他许多章节里也经常运用古、今日语来印证词义，这在研究方法上，十分可贵，可为研治外籍人士撰著的汉文作品者立一楷范。某些疑难词语，前修冥思苦索而不得其解者，一经作者点破，便涣然冰释。如志翘指出“指棹”即日语“棹指す(さおさす)”，乃“撑篙”之义；“储供养”即“设供养(设置斋食)”之义，因日文中“储ける”、“设ける”均读作“もうける”，二者为同音词，原来圆仁在无意中用了一个同音通假字(见第三章第一节)。

此书虽是专书词汇研究，但志翘将它置于汉语词汇发展史的宏观背景之下，因而呈现出某种“上下而求索”的放射状态。从前代语料中追溯源头，从同时代语料中广求旁证，有时还从后世语料中察其发展变化，并以理论阐述挈其纲领，因而此书对汉语词汇发展规律的

---

① Richards, J. C., J. Platt and H. Platt. 2000 *Longman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 Applied Linguistic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王宗炎《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年。

认识、对汉语史分期的探讨、对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修订,均颇具参考价值。此书重点在唐代口语词研究,众所周知,口语词较之文言词,研究难度更大,因为它较少依傍,需要作极大的努力去发掘语料,并要求有更多的创造性。本书对《行记》中新词新义的研究、对口语词的来源及发展变化的考察,堪称左右逢源,胜义纷披。比如表示概数的“来”,吕叔湘、胡竹安、太田辰夫、江蓝生诸家都推测源自“以来”,似乎已成定论。而本书作者从《行记》中发现了 15 个“数 + 来 + 名/量”的例子,证明成说之可商。这一观点不仅是新见,而且具有启发意义:从事研究,不能株守已有的论点,必须不断进取,才得继续发展。另外,作者对《行记》中一些疑难词语的考释,亦颇见功力。书中不仅注意征引同类著作如《往五天竺国传》、《行历抄》、《参天台五台山记》等以证词义,并广泛征引东汉以来佛典、六朝中土作品、唐诗、敦煌文书、禅宗语录、笔记小说等加以比较参证,故取材广博而翔实,结论坚实而可信。如谓“步碇”为“出碇”之讹、“贪祥”为“贪程”之误,其对“板头”、“抃戏”、“空饭”等词语的考释亦均能使人有获益良深之感(见第六章)。

当然,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行记》词汇的著作,存在不足之处亦为意料中事。比如,作为专书词汇研究,应对一些重要词语的出现频率作出统计,虽书中也已涉及,但还做得不够。作者以《汉语大词典》的始见例的时代为标准来确定《行记》中的新词新义,就目前而言,不失为一种办法,因为至少有了一个统一的参照尺度;不过《汉语大词典》由于多种原因,其本身疏漏即多,故有些始见例也不足为凭。另外,所释词语的选择还更应求精,关于疑难词语的考释,也许还可以向纵深开掘。相信志翘今后仍会对《行记》继续钻研,精益求精,使此书进一步完善。

记得当年我应四川大学之命,对志翘的博士论文评阅时,曾写道:“《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非常人所能研究之书,董君不仅古俗语之学根柢深厚,智力、素质皆高出侪辈,而且通日文,曾游学扶桑,与圆仁若冥冥之中有默契者,故张永言教授建议董君专治之,可谓得人。”如今志翘毕功,成功,于汉语词汇史亦立一大功矣。

再陈愚见。将外籍人士的汉文著作作为语料,确实必须像志翘一样,认真屏除其母语干扰的成分。似乎还应考虑到,汉语,对外国人来说,毕竟是外语,若非孩提时代习得,极难达到纯正的地步。我们在批改外国留学生的作文、论文时会发现,他们往往利用类推律或因其他原因造出某些汉语并不存在的词儿和语法格式,如果这些文章形成书面文献,并且流传下去,后世的汉语词汇史专家据此证明前代汉语有某词或某种语法格式,那可真是以讹传讹了。以今例古,在古代外籍人士撰写的汉文语料中,发现异于一般的现象,似乎不宜立刻都看成俗语词或俗语语法现象,还要考虑到作者是否错误地使用了汉语。凡是研究汉语史的学人,在寻觅语料时,都有同一心理:司空见惯便置弃,偶见奇特心花放,其实这"奇特"处正待甄别,或许前贤的"例不十,法不立"的警句还有现实意义。不过,我这是纸上谈兵,志翘见笑了。

在汉语语言学的领域内,汉语词汇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比较显著,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要算最多,胜于其他分支学科。汉语词汇史研究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即对某词、某语出现年代的考证日臻精详,我戏称之为ABC竞古律。A说某词语是唐代的,B则考证为六朝词语,C找到更古的例子证明汉代就已出现。这是学人勤奋,学术繁荣的表现。这类文章成功与否在于掌握材料的多寡,用五六十年代学术界流行的老话说,就是是否充分占有材料。如果用当今的术语说,即这些论文著者的语料库容量有多大。写到这儿,我想起了三四十年前吧,我读过历史学家李亚农的一本书,我很敬佩他写的序言,所以印象特深。李亚农先生说,清代学者自幼时、童时即读古书,把古书都读遍了,读得滚瓜烂熟,遇到一句话,就能如数家珍般把所有古书上的例证和盘托出。我试"阐发"如下,清代学者的大脑近似现在的电脑,他们大脑中的先秦两汉古籍语料库容量很大很大。但是如今研究汉语词汇史特别是近代、中古词汇史,需要掌握的语料更多,而环境迫使当今学人为发表数、为引用率、为排行榜,急不可耐地做书做文,怎么可能把这些古籍背得滚瓜烂熟呢?我们很敬重像董志翘同志这样的一班学者,他们虽不能背熟那些古籍,却在勤奋和时间上竞赛。看谁爬梳的资料多,抄的卡片多,谁就能运用ABC竞

古律获胜。但是时至二十世纪末,电脑辅助研究语言的工作已经蓬勃开展,海内外很多机构和电脑专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联手,已经将大量古籍输入电脑。如果古籍基本上或全部录进电脑,资源共享,估计五至十年内,词汇史专家人人都能充分使用庞大的计算机语料库,那么专家们的劳动强度将大为减轻,那时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水准将大大提高;但是这"第一战场"的意义也就随之淡化。

1998 年、1999 年我和汪维辉同志论学的时候,我们有一共识:似乎应该及早开辟"第二战场",就是说,将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和现代汉语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结合起来。① 这儿简要地叙述一下我的读书"经历":在八十年代末,我先后拜读了蔡镜浩、吴金华二位同志的考释魏晋南北朝词汇的文章,他们都论及"叛"字,这"叛"不是叛变的意思,而是逃避的意思,证据确凿,可为定谳。1993 年吧,李荣先生来南京与江苏教育出版社商讨编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事务时,交给我一本波多野太郎的《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的江苏分册,要我点断。我以慢速一字一字地读完了这本书,我发现了清代和民国的几本苏南地方志中也有"叛"一词,亦为逃避之意,不由平添一份惊喜:一千多年前的词儿居然还活在方言中!我赶快去查叶祥苓老师的《苏州方言志》、许宝华老师的《上海市区方言志》,果然都收录此词。而最近江苏教育出版社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中的《苏州方言词典》第 120 页、《上海方言词典》第 101 页、《崇明方言词典》第 52 页也都收了这词,后者在释义中还举了古籍例证。最近石汝杰、姚永铭二位同志帮我作了调查,知道除了上海、崇明、苏州外,常州、无锡、宜兴、昆山、吴江、青浦、嘉定、宝山、川沙、南汇、湖州、桐乡、海盐、余姚、嵊县等地都有这个词儿。现在不是提倡学科交叉吗?不是提倡边缘科学吗?如果词汇史专家尤其是研究近代、中古词汇史的学人在古籍中搜集词语例证的时候,同时把视线也倾注于现代方言的调查、研究,使两个分支学科交融,合则双美,本世纪上半期的一位大师曾提倡"双重证据法",这以书面文献结合活方言的方法不也与大师之旨相合吗?

---

① 这一观点李行健同志等早就提出,我十分赞同。

读了志翘这本书稿，我感到由衷的欣喜。志翘现在是知名学者，这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的出版，将使志翘的知名度更加厚重。所幸者，志翘富于春秋，如若继续勇猛精进，有望成为一个大学者，但是他绝对成不了大师，这是命中注定的，无可奈何。我如是说，请志翘不要生气。我认为，知名学者不等于大学者，更与大师不相涉。我为什么这样说，就要花些笔墨介绍我近年的观察、思考及由此而得出的看法。在叙述我的见解之前，我得郑重声明：我将讨论的范围限制在语言学，最多是部分人文科学内，因为我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无知，“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人文科学里有些学科近于社会科学，所以我只说“部分人文科学”。我认为，语言学或部分人文科学的专家，可分为三级：一是大师；二是大学者，如果用双音词，就叫大家；三是学者，如果要与“大家”对言，不妨贬之曰“小家”。近年来书评、祝寿辞等美文中常常封某某为“大师”，真可谓大师帽子成批量生产，满天乱套，当然对这些炒作之辞是认不得真的。二十世纪即将过去，这百年的学术史，值得回顾，更值得深思。现在我想抄录许嘉璐同志的一段话，之所以引用他的，并非因为他地位高，而是他的话是认乎其真的。《未辍集——古代汉语论文选》“自序”：

> 每读前辈论文集，都要感叹：他们那一辈人生活的年代，国无宁日，其中许多人，家境贫寒，时为温饱奔波，但是却出了那么多大师级的学者，写出那么多好文章。
>
> 我所说的前辈，大多是上个世纪与本世纪之交出生的一代。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在学术的所有领域，都出现了一批至今还需学人仰视的巨人。
>
> ……
>
> 我们这一代呢？固然也经历过动荡、挫折，但是如果放眼一生，总环境还是要比前辈强得多。我们的学术功底和成绩呢？环顾宇内，似乎大师级的学者一个也未见。[①]

潘文国同志的《汉语研究：世纪之交的思考》也是一篇认真的文

---

① 许嘉璐《未辍集——古代汉语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章，其中也论到“大师”问题：

> 汉语研究在二十世纪突然进入“现代期”，……这是一个呼唤大师、也造就大师的时代。这一百年来在汉语研究上也确实涌现出了一批这样的大师，其成就既辉煌于当时，也成为我们现代人的骄傲和榜样。其中最值得我们自豪的是马建忠、赵元任、王力和吕叔湘。
>
> ……因此我们说他们是时代造就的大师，前一世纪的学者无其外语，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学者，在海外的则无其汉语(国外治汉语者，即令是华裔，也大多出身外语系，汉语基础，特别是古汉语基础往往相当薄弱)，在国内的则有时两者皆无，既没有古文底子，外语又不过关，要产生重大的突破实在很难。①

这是我所见到的语言学家论“二十世纪大师”的两则高见。我对他们二人的高论要作一点补充，按照我的三级论，前半叶的学坛既“出了那么多大师级的学者”，更出了数量多得多的大学者即大家。再看看我们的相邻学科的学人的看法：《文学遗产》杂志的《走向学科新纪元——2000 年献辞》：

> 二十世纪曾经涌现过一批古典文学研究大师，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钱钟书等人的事迹，我们耳熟能详，引为荣耀。但目前“没有大师的时代”却令人颇为尴尬。②

许嘉璐同志说得比较婉转：“环顾宇内，似乎大师级的学者一个也未见。”恕我冒昧，我就直截地讲了：近五十年走上学坛的学人中，大师，绝无蔑有；大学者即大家，凤毛麟角；而学者即小家，则车载斗量。比起上半世纪来，学者的数量翻了几番，这是不争的事实，很可把人乐得手舞足蹈；可是高层次的专家却如此稀少，却令人沮丧。何以至此？许嘉璐同志的序文中没有做出解释，但是潘文国同志给了答案，也有的同志认为是大学教育课程设计失当造成的。不揣浅陋，在下曾在 1999 年秋将多年的思考和喟叹写成如下文字：

> 我是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我认为必须把语言学史置于学

① 《语言研究》2000 年 1 期。第 4、6 页。
② 《文学遗产》2000 年 1 期，第 2 页。

术史、文化史乃至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考察,由此我悟到一条道理:开国之初只能是学术史上繁荣时期的准备阶段,用流行的词语说,则是过渡阶段。……

我悟出的这一"高见",放之于中国历史而皆准。我比较熟悉宋代史事,就从宋代说起。宋太祖忙于征战,遑论文化。历代学者们津津乐道的宋初四大书中的《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都是成于太宗时,似乎文化已臻繁荣。其实这多是招纳的南唐和后蜀的文人编纂的。宋真宗也下令编了许多书,其特点也是"述"而非"作"。仁宗于明道二年(1033)亲政,这是宋代文化史、学术史重大转折的标志时点,此后在经学、语言学、文献学、史学、金石学、考古学、文学诸方面"创"、"作"迭兴,形成了真正具有宋代特色的"宋学"。当今时兴"特色"一词,我就借用来了。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有"宋学"一词,我在这里将其义扩大,指不墨守传统,敢于独立思考,有创新、有特色的自仁宗亲政时开始的宋代各个学术领域。对这广义"宋学"的创立,欧阳修起了重大作用。宋代自开国起经历七十三年,方始进入新时期(详见拙文《从宋代学术史考察〈广韵〉〈集韵〉时距之近问题》,《语言研究》1996年增刊)。唐代诗歌最为发达,众所周知,唐诗分初、盛、中、晚四个时期,自618年至711年为初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可视作盛唐的开始。至于清代,至乾嘉之世,学术方臻鼎盛。如果有人问,清初不是有三大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太宗时不是有陆德明、孔颖达等十八学士吗?答曰:皆前朝学士也。本朝学士还要待国家稳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之后才能脱颖而出。①

本世纪下半叶,前三十年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劳动"使得当时的"精力最充沛,智力处于巅峰时期"的学人不能读书治学,这是那一辈人的悲哀。何妨阅读一下志翘此书的"后记":

而我二十一岁时在干什么呢?那时我正在苏北黄海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插队落户、战天斗地。……在这对知识如饥如渴

① 鲁国尧《跟在老叶后面做人梯》,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2000年4期。

的年岁，我们却被抛进了文化的沙漠。

我比董君大十几岁，他在苏北海滨劳动的时候，我则在苏南丘陵上的校办五七农场爬稻、手搅烂猪粪，剪桃树枝；因为晚上看了点欧苏古文，班长向连长、指导员告发，并要求在全连大会上批评，请问，如此环境，尚复何言？

斗转星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时人欢呼"科学的春天"的到来，似乎是产生大师的时代降临了，好不令人高兴！然而到了世纪之末，认真回顾一下，我们报喜也报忧——有其应该积极肯定的成果，也有令人忧虑的负面。现在分别道来：值得庆幸的是，最近二十年学术条件大为改观，高等教育的普及，竞争机制的引入，使众多学人争相著述，人人操觚，家家出书，学者如云，教授如雨，这是尽人皆知的。一位大家在十年前说过："五十年代以来培养的学生，其中虽然也不乏杰出者，但总的看来，失之于陋。"① "陋"基本上可以涵盖整体。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如今浮躁之风，甚嚣尘上，"急就章"，"急火饭"，急如星火，上下交征急。有的教授、副教授，一年可以制造两位数论文。打个比方，就像时下市场上的激素催生的果蔬，琳琅满目，大则大矣，美则美矣，然而畸形、异型，……。可叹的是很多学人"专"识越多，常识越少，位至教授，不知道《四库全书》，不知道称呼自己老师的同学为"师叔"，前卫的专著以怪异文其浅陋，病句连篇，硬伤百出，连题目都不通的研究生论文可以得奖，以致有人斥之为"文化垃圾"。如若不信，诸君可以看看《中华读书报》，吴小如等先生抨击硬伤、无知、浅薄的文章最耐看。有道是，昔人读书为素养，今人做书为稻粱。有些人心术不正，争名逐利，对国家、民族缺乏责任感，甚至于炒作、做假、捉刀、抄袭，则无处无之。

我还是将我的论述范围限制在我所熟悉的语言学或者部分人文科学内，我讲的是我所亲见、所亲历的事。如今大学里，规定硕士生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博士生则要在核心期刊甚至权威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有的大学甚至要求三篇论文。花样繁多的评比、

① 朱德熙《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序》，《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

评奖、检查、考核，教研室、系、院、校、市、省，彼此之间比拼论文数、著作数、奖金数、基金数，取学位、升职称、晋级别，没有这些，就休想过关。我再次声明：我认为，这些举措有其必要性，可以防止懒惰；也确有成效，十年不发表一篇文章的教授混不下去了，发表过论文的学生的研究能力、写作水平有所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一个大学的资深教员，我对此有深切的感受，也感到欣慰。

但是凡事要有个度。语言学和部分人文科学的博士生在三年学习期间内，要花一年多的时间写一篇博士论文，还要通过外语和政治课的考试，其余时间只能为在核心期刊、权威期刊上发两至三篇论文而奋斗，请问，还有多少时间系统读书？这些博士生毕业后，假如在高校和研究所从事学术工作，又要为升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赶论文、做书，又要为系、院、校争取基地、中心、重点学科等等地位赶论文、做书，整日价凄凄惶惶，不搞"短平快"，怎能取青紫？请问这班人能在今后成为"还需学人仰视的巨人"吗？按照现在的这种标准，大师黄侃先生、一级教授方光焘先生只能当个讲师，因为他们只有文没有书，也许系主任开恩，赏他个副教授吧。他们身后，才由学生将其论文裒集成书，但也未必能追赠个"教授"衔，因为现在规定升职称的三要素，缺一不可，还有年均基金数，得国、省级奖这两项，看来黄、方二位先生的子女还得通关节，走后门，另想办法。

如今校系比攀之风、排行榜之举，盛行天下。使我想起 1958 年的大跃进时代，捷报频传，今天亩产两万斤，明天亩产五万斤，后天又放特大卫星，亩产二十万斤。那时我是大学生，每个消息都使我兴奋不已。过了好多年，我终于看到了李锐同志的《庐山会议实录》，最近又读了《李锐诗词本事》，我想起了其中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如今学校、教育部门的书记、主任、各种名称的"长"竞相创造政绩，这本无可厚非，我辈教员、学生自当大力支持。但是我们也诚恳地希望，不要制造名目繁多的数字竞争，"与民休息"，给部分人文科学留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少设什么奖，如果要设的话，我倒建议一些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的领导者设"磨剑奖"，[①]也可通俗些，叫做"冷

① 贾岛诗句："十年磨一剑。"

板凳奖"。[1]不知哪位有耐心设？待到收获时，已是退线后。

我建议，请诸位领导同志听听大科学家杨振宁先生的话："数学、理论物理等学科，容易在年轻的时候出成果，但有的学科，如历史、哲学，很少在50岁以前便取得杰出成就。"[2] 人文科学（包括语言学）的特点是需要积累，中外经典要精读，原著要精读，古人、前人的精义要吃透，负担多重？没有深厚的基础、巨量的积累，广阔的视野，勇敢的开拓，没有数十年的潜心苦读与刻苦修养，怎能继往开来，怎能成为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 的高尚品德的大家、大师？古语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4] 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硬道理。

二十世纪前半叶，大师迭现，而后半叶却绝无蔑有；时代呼唤大师，但是却造不出大师来！难道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不能培养出自己的大师来么？愿前三十年的动荡，后二十年的折腾，俱往矣，人文科学（包括语言学）大师的产生，还看明朝。

最后，衷心预祝董志翘同志能巍然屹立于大家之林！

2000年9—11月

原载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页1—1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又《语言研究》2001年1期页84—89。

简启贤先生《〈字林〉音注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1月）页374："在汉语史这个领域，我很赞同鲁国尧先生设立'冷板凳'奖的意见。"

我在此文中主张"及早开辟'第二战场'"，将汉语词汇史研究和现代汉语方言词汇的调查结合起来，董志翘同志深表赞同，汪维辉近发表《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嚆矢也。

2003年8月

① 据云范文澜先生撰联："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
② 《杨振宁教授南京行》，《扬子晚报》2000年4月4日A5版。
③ 许嘉璐《未辍集·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④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读《魏建功先生纪念专辑》稿书后

半年前我跟永坤说："魏至大师兄，不是搞我们这行的，为了老师的文集、诗稿，奔走于大江南北，他是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啊。"于是我向《文教资料》主编李灵年、李泽平、于平同志建议，为魏建功先生出一纪念专辑，他们非常热情地表示支持，徐复老也十分关心。今天读完了魏至师兄所约写、所搜辑的十几篇稿子，往事萦回，感慨万千，不能已于言。先生年谱载："1946 年 2 月，农历年前到达台北，立即着手组建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工作。"抗战胜利已现曙光时，好不容易苦熬了八年，谁不想早日返乡？先生却接受政府之令，准备到失去五十余年的国土台湾去推行国语，那种艰辛比回母校北大任教不啻有壤天之别（请参看杨藻清女士《俞敏先生，我的心里仍然充满了你》一文的有关记述，该文将发表于《文教资料》1997 年 1 期《俞敏先生纪念专辑》），后来还兼程在农历年前赶往台北，立刻投入工作，那么先生是在台湾过的年了。我很感动，于是在这乙亥除夕起草这篇缅怀先生的文章，记述一些往事。

1955 年我考取了北大中文系，10 月入学，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古代汉语课由魏先生上，魏先生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相当于今天的"院士"），担任助教的是讲师梁东汉先生。看看现在的大学，还有哪个院士或一级教授上一年级基础课的？1956 年 6 月最后一课，先生说："我用传统方法，给同学们吟诵一篇古文。"当先生"唱"出第一句时，一百余名中外学生莫不掩口葫芦而笑，但谁也不出声，最后一句余音袅袅未停之时，大笑哄堂，下课电铃声几乎同时响起。近五十年来，此道不弹久矣，如今不会吟诵而自诩为古典文学专家、古汉语专家者却比比皆是。

到了高年级，魏先生又给我们上选修课，记得有位同学说："有次课上，我有心思，没好好听。这时魏先生拿着一本古书，走下讲坛，指

给前排的同学看。我在后排,估计不会到我这儿,可是魏先生竟挨个儿地也走到我面前指给我看,真不好意思。”先生没有一次课不是十二分认真的,这使每个学生都深为感动。

1958 年大跃进,提倡学生自己编书,我们五五级语言班编汉语成语小词典,请魏建功、周祖谟二位先生指导,审阅稿件。我们的卡片发还回来时,朱笔批改很多,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文学班的同学看了直是说:“他们语言班的老师真严格。”怎么出版?魏先生写了介绍信给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傅彬然先生。班上同学下乡大炼钢铁,孟琮和我被派去跟傅先生、章锡琛先生一块定稿,后来又跟总编辑金灿然以及李侃先生,还有一位姓刘的青年编辑一块下印刷厂车间赶排赶印,连续七十二小时不睡觉。最后我们的词典出版了,这是魏、周二先生以心血浇灌的。

古代汉语第一课,魏先生的苏北口音使我感到十分亲切,课间休息我就走上前去操地道的乡音与先生交谈起来。苏北穷,长期受苏南人尤其是上海人歧视和欺侮,所以苏北人有很强的认同心理。渐渐地我常到先生住所去请教,谈论苏中方言如“为事”、“了首尾”等。先生待我特好,把他的全套《中国语文》杂志借给我看,领我到卧室内,看他在二十年代在汉城买的朝鲜版韵书,随时教我许多常识,如什么叫“金镶玉”(古籍装潢术语)等等。我在三年困难时期饿得浮肿,病很多,先生特别介绍我去城里东受禄街找孙仁和先生看病。孙先生是苏北盐城人,研究词学和先秦古籍的大学者,兼善岐黄。记得魏先生用宣纸写的介绍信,首有“泰县鲁生国尧”六字,那时我不懂,没有向孙先生要下来收藏,近来闲时看《三希堂法帖》,魏先生的介绍信不就是名帖吧?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饱含了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啊。先生还叮嘱我,吃中药不能喝茶。1959 年暑假我回家,带着小本子到菜场记录方言词语,我写信向先生汇报、请教,不久就收到先生的回信。返校后,陆俭明告诉我:“假期中我们去看魏先生,先生把你的信拿给我们看,着实地表扬了你一番。”所以在我的 1988 年发表的十万字长文《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鸣谢名单中魏先生名列第二。有次先生对我说:“天津有个人做了一箱子卡片,过世后他儿子拿来给我看,只是些零散的资料,而用了这么大的力气,太可惜了。

你们既要踏踏实实地做基础工作,也要有观点,形成自己的特色、体系。”先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们不要囿于我们的圈子,你们要有识见,有自己的境界,要超过我们。”六十年代初茅盾有一篇文章引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涉及到越的领土向北扩张问题的一段话,我的理解与茅盾不同,于是写了篇短文,呈魏先生看。先生肯定了我的看法,也指出了我论证、行文的毛病,要我“须好好努力”。何双生等同学看了,都很感动。

如今我很后悔。年轻时不懂事,经常跑魏先生住所去,也求教,也论学,也聊天,而从来没有看到先生的厌烦的脸色,这可浪费了先生至少写半部著作的时间啊!可是这还算不得什么,还给先生招来更大的麻烦。1964 年继农村之后,城市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彭真和陆定一派了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联合的工作队进驻北大,中文系也来了工作组。第一次会议的参加者除了全体教员外,那时为数不多的研究生也列席了,首先系主任杨晦先生致辞表示欢迎,继之工作组成员亮相,接着革命群众初试锋芒,炮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群资产阶级教授。其中有位青年教师站起来发言:“有些教授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严重,却和走白专道路的研究生关系密切,例如魏建功和鲁国尧,这种现象很值得重视。”当时我坐在会议室的旮旯里,在这阶级斗争气氛极浓的大会上被当众点名,着实地蓦地一惊,但是哪敢作声?此后惴惴不安者多日,亏得运动还来不及扫向我这样的小人物,但老到先生家不是连累了先生被点名吗?

下面谈谈几本跟先生有关的书的情况。有一次魏先生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中华书局本来打算再版《十韵汇编》,我准备做些增补,但是周达甫说了些话,印不成了!”就我所知,后来台湾却影印出版了。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好多 1949 年前的语言学著作重印出版,有次我跟魏先生说:“《古音系研究》现在买不到了,何不重印呢?”先生却说:“不,能有时间做一次增补再出版。”谁知以后就是“四清”、“文革”了。先生有次跟我说:“我母亲姓仲,仲氏在泰州也有一支,你认识姓仲的吗?”我说:“我中学时的老师,现在是我家房东的仲一侯老先生,是泰州耆老。”其时吴晓铃先生正编《古本戏曲丛刊》,收有清代中叶的《红楼梦传奇》两种,如皋仲某所著,但不了解其生平仕履,

于是魏先生让我回家时请仲一侯先生查家谱。吴晓铃先生得到资料后十分高兴地说："魏先生是我的老师，在昆明时跟先生朝夕相处，这次先生可解决了我的问题。"他将两本传奇抄了副本让我带交仲老先生，作为答谢，记得其一的跋记说，原本是河南常氏咬得菜根香斋所藏的手抄本。"文革"初期，仲一侯先生被迫害致死，书尽散失。八十年代初期，我看到此书被泰州古旧书店油印出售，仍是线装本。我也年近花甲，应该把这与魏先生有关的书出版流传经过记述下来。那时，扬州、苏州古旧书店油印、出售给各图书馆的线装书为数更多，这不算是"非法出版物"，而应该叫作"无法出版物"吧。这是中国书籍史上颇有意思的一段时期，记此留一资料。研究中国图书史的专家该不会忽略这些油印本的珍贵文物吧。

1978 年 3 月下旬我奉南大领导之命进京去接一批越南高级进修生，抽空回了母校，往燕南园魏先生家走去。约下午一点多吧，门只半掩着，我径直侧身进去，只见在客厅的一张床上，先生和衣而睡。我轻声叫醒了先生，先生见到我，十分高兴，跟已经中风不能言语的坐在轮椅上的师母大声讲："鲁国尧来了。"只见师母眼中含着泪花，我心中凄然。我们当下谈到了"文革"，我跟先生说："1974 年我跟南大中文系领导到国务院科教组申请设立语言专业时，曾来看您，想悄悄地告诉您，那时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因为先后有几个北大教师找您，所以没谈成。"先生对我说："我以前不了解真实情况呀，以为这都是毛主席说的呀。"这是先生对无官无位远道而来的老学生的肺腑之言。我也问及先生最近从事什么研究？先生说，时时翻翻《广韵》，打算搜集里面的联绵词做研究。我在先生家呆了一个多小时，犹如二十年前一样，只是感到先生老了许多，情绪不高。不料这是我跟先生的最后一次漫谈，两年之后，先生竟因动肾手术而未能走下手术台。我再至北京，再回母校，然而再也见不到先生了！

综观先生一生，于国于民，待人接物，都出以"真""诚"二字，所以其功巍巍。且不论对语言学(特别是音韵学)的贡献，且不论培养了多少高级人才，我以为，先生立有三大功：受命于国民政府，至刚光复的台湾推行国语，于国家统一大业，功莫大焉；受命于人民政府，组建有国史以来的第一个古典文献专业，于承继发扬文化传统，功莫大

焉；自发主编《新华字典》，泽及数十亿人，于全民教育，功莫大焉。有此三功者，并世学者能有几人？有此三功者，百年文士能有几人？

丙子岁元月初二成

原载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杂志 1996 年 4 期（总第 226 期）页75—84。现有增补。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

——悼俞叔迟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叔迟先生是在十二年前。“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好不容易结束，科学的复苏也好不容易到来。1983 年 4 月在太原晋祠召开了全国语言学规划会议，出席的只有二十余人，半是老专家，半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记得某日会后，我们四五个后生簇拥着叔迟先生论学聊天，先生妙语连珠，富蕴哲理、学理，回到寝室后我们还在回味、咀嚼。俞先生渊深广博，幽默诙谐，我久已闻知，而这次却是亲聆謦咳了。我跟俞先生不熟，当时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想来那次先生未必认得我。

1985 年王力语言学奖金评审工作开始，俞先生是评委。我提交的论文之一是《元遗山诗词用韵考》，认为宋金元近体诗韵也能反映当时语音，而通常的说法则认为古体诗才能反映时音，文中也对钱大昕和王了一先生的借韵说提出了异议。后来听说，俞先生赏识我的这一说法，因而使我得以滥竽首届奖金。1986 年 5 月我进京，见到杨耐思先生，正好他要去看俞先生，我也想去叩谢“座主”，就跟着一道去了。俞先生主要跟杨先生谈话，并把新出版的《经传释词札记》托杨先生带了送给语言所的几位先生。俞先生问问我的籍贯、家乡方言，约两三分钟的时间，并未谈到有关评审王力语言学奖金的事。

1987 年底，中国语言学会第四次年会在广州举行，俞先生没有出席，但年会推定他为《中国语言学报》第四期的主编。1988 年春学会秘书曾上炎同志通知我：把论文《词韵随语音之变而变》修改后直接寄俞先生审阅。于是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修改增补，易名为《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正好吴永坤同志到北师大出差，我就将增订稿托他带交俞先生。吴永坤回南京后，告诉我：“俞先生正下围棋，翻了翻稿子说：‘这么长，搁这儿吧。’”《中国语言学报》规定每

篇稿子不得超过两万字，可我的文章四万字，凭这一点，大概就不会被采用了。谁知过了一段时间，突然语言学会秘书处发还了我的稿子，几十处眉批，正文中直接修改的地方也不少，朱笔粲然，语语中肯。我的文章这么冗长而俞先生看得那么认真，该耗费多少时间与精力啊！

杨耐思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谈到，某日他去看俞先生，先生参加街道敬老会去了。师母说，俞先生很欣赏南京的一个姓鲁的年轻人的文章。看完此信后我感到诚惶诚恐。

前年5月我到北京开会，先生执意要在北师大宿舍区内的淮扬餐厅宴请杨耐思先生和我，他拄着从美国带回的有四个支撑点的手杖，两次下楼看我们到了没有，然后坐着轮椅到餐厅。席间先生解答了我提出的好几个问题，包括德语塞辅音送气与否的问题。先生和蔼热情，我们如坐春风之中。

俞先生学术地位崇高，在国家级的学术机构中担任要职，因年高多病主动告退，荐举后辈，据说也将我名列其中(按，先生从未对我提过此事)。我没有听过俞先生的课，也没有听过俞先生的学术演讲，面谒请教甚少，信件往来也只几封，而俞先生却对我褒奖有加。究其原因，先生看到我写了两篇平实文章而已。清人汪德钺《四一居士文钞》卷四中说："其好恶也，褒秋毫之善，贬纤芥之恶。"我那两篇文章如能称之为"善"，也难以叫作"秋毫之善"。

记得几年之前，我曾听过国家学位委员会文学科评审组的一位成员说，某次会上，一位颇有名气的唐诗专家说错了，俞先生当场反驳，不留情面，弄得那位面红耳赤。在一言堂的时代，俞先生正道直行，敢怒而敢言，自然难逃每次运动之劫，因而有"运动员"之称。俞先生这位天才学者生不逢辰，中年壮年才智未得充分发挥，这是应该长太息以掩涕的。天既诞育英才，而不能祐之，天乎！人乎？

虽然长期运交华盖，但俞先生以其睿智，以其勤奋给学术界留下了丰硕的遗产。先生论著，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百世之后仍旧会被学人研读，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浅薄如我，岂敢赞一辞？中国人自古以来重气节，贵操守，常言道"道德文章"，总是"道德"居首。而当今腐败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健康的肌体，学界何尝不然？像俞先

生这样公、正的高尚品德,处当今之世,更觉难能,更为可贵。俞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浩然之气必将充塞于长空广宇。

附言:1994年夏刘广和兄来函云,拟为俞敏先生的八旬华诞出一祝寿论文集,令我撰文,我虽不才,敢不应命?而至仲秋,老母病笃,直至弃养,我心力交瘁,不能成文,只得向俞先生和刘兄告罪:"一定为庆祝叔迟先生九秩寿辰论文集著文。"孰料今年7月先生仙逝,悲痛之余,请求写一缅怀文章以补我的罪过。我以为,先生的文章,光焰烛世,必传于百代千秋;而先生的道德应由其友人和学生来实录。谨撰此文以纪念先生。

近年是中国语言学界的痛苦时期,大老凋零,哲人萎逝,哀哉!痛哉!

原载谢纪锋、刘广和主编《薪火编》页389—391,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又载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1997年1期。

“啊，门——”

——缅怀周祖谟师

“是哪一年？”任我在往事之海里怎么搜索，也记不清了，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后周祖谟先生来过南京好几次，于是我只得把束之高阁的一摞日记本找出翻寻，终于翻到了。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　星期一　晴

周燕孙先生应南大之邀来宁讲学，今上午陪周燕孙师、师母去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我们从东门进入，过传达室，向一九四九年五月前的中央研究院后楼即历史语言研究所办公楼缓步走去。离楼约十多米时，燕孙师忽然快步起来，约六七米处由缓而止步，直视大门，喃喃自语：“啊，门——，大——红——门，大——红——门，大红门依旧呀！四——十——五——年，四——十——五——年——了。”老人陷入沉思中，许久许久，才缓过来，指着二楼的一个窗户对身后的周师母和我说：“赵先生的办公室，这、这、这——就——是。”

燕孙师抚摸了几遍大红门，抚摸着楼梯栏杆，踏上了二楼，辨认出他当年的工作室，走到了门前。我建议敲门进去看看，他制止我：“不，不要影响里面的同志的工作。”只见他的头微微俯仰，口唇翕动，仿佛这扇门与这位当年的青年而今的老叟在低叙别愫。

我们又悄然返回楼前，徘徊久之。燕孙师向我叙述往事。一九三六年，先生实足年龄二十一岁，北大毕业，投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这以前，如丁声树先生进史语所，不用考，是推荐的。而一九三六年，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要求考，先生和清华的董同龢先生同时应考，先生分数最高，董先生也考得很好，语言组主任赵元任先生将二人都录取了。先生与吴宗济先生同一工作室，与董同龢先生同一寝室，丁声树先生住外室。

当先生讲到这儿时，我插话道：“我到语言所（尧按，指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向丁先生请教过好几次，丁先生十分热情，特谦虚。”

先生说：“丁先生年轻时就非常谦虚，也喜欢开玩笑，常学我的北京话‘可不是吗’。”

先生接着说：“当时史语所的年轻人还有周一良、张政烺、胡厚宣。”

啊，周先生提到的这五六位先生不都是鼎鼎大名的学者吗？我不禁问道：“当年史语所的年轻人后来没有太大成就的有没有？”

先生当即回答：“没有。”

“为什么呢？”

“进来时都精选过的。”

先生告诉我，他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到中央研究院的，第二年六月就离开了。

我问：“为什么您在史语所工作的时间这么短？”

“因为母亲生病，我回北平侍奉汤药。下月日本侵略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铁路断了，回不了南京啦。不能在史语所工作，是我感到十分遗憾的事。”

“您那时工资多少？”

“我当时是助理员，相当于助教，每月薪水九十个银元，可以买四十袋面粉，那时每袋面粉四十斤。”

先生在《自传》里也谈到这段往事：

> 一九三六年夏大学毕业之后，有幸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本想跟赵元任先生、李方桂先生学习更多的语言学知识，并且从事一些方言调查的工作，以丰富自己对方言词汇语法各方面的理解，进一步探讨汉语发展的历史，没想到“七七事变”以后这个想法竟成泡影，在一年之内只写成《广韵校本》和《广韵校勘记》一书，大违心愿。[①]

关于燕孙先生投考史语所事，还有一段佳话。可惜的是，我在北

---

① 周祖谟，《自传》，《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页 633—642。

大上本科和当燕孙先生的汉语史研究生的时候都没有向先生问过，这次在史语所楼前也没有问，但是周法高先生记下了这则佳话：

董同龢先生(1911—1963)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先任研究生一年。据说当时董和周祖谟先生同时参加考试，董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是王力先生的学生；而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是罗常培先生的学生。其中有一项是记音练习，原来赵元任先生在南京成立了语音实验研究室，用铝片记录了好多方言，在当时实在是一种创举。在考记音时，两位都希望靠近一点记得好一点，在傅所长"拔尖儿"的原则之下作公平的竞争，结果因为两个人都是成绩优异，也都录取了。[①]

燕孙先生在史语所工作期间完成了一本著作。先生在一九八七年底写的《往事自述》曾述及此事：

在北大临毕业的时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托校勘宋本《广韵》，于是就当时所能运用的材料，如唐本的韵书、《玉篇》、《集韵》、各种刻本的《广韵》以及有关的古籍相互比勘，以张士俊所刻泽存堂本《广韵》为底本，改正其讹误，作为定本，并写成《广韵校勘记》五卷，这是我第一次写出的一本著作，后来到一九三八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我毕业那一年，一九三六年，……考入历史语言所语言组，任助理员。秋季八月到南京北极阁任职，得谒见主任赵元任先生，承蒙恳切指导，这是多年向往的事。同年入所的还有董同龢先生，……我们两人同居一室，朝夕相处，研讨音韵，大有论学之乐。……同在一个办公室的则是吴宗济先生。我在誊录《广韵校勘记》准备付印，吴先生则在帮助李方桂先生编写《龙州土语》。[②]

内地的老图书馆都藏有一九三八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广韵校勘记》，线装五册，书皮、封面皆印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① 周法高，《记董同龢先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通讯》，1991年3月。

② 周祖谟，《往事自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1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又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1995.3。

研究所专刊”十六字。校本于一九五一年始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线装五册，封面题“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一九六〇年中华书局合校本与校勘记为精装二册出版，一九八八年重印，加索引。至今海内外的音韵学家和国学的其他门类的研究者无不奉《广韵校本》及校勘记为圭臬。写到这儿，我要“别生枝节”：一九八三年九月四日李方桂先生和师母徐樱女士访问南京，要我带他们去购书，我引到中山东路新华书店，经售货员特许，李先生和我进入柜台里面，直接从高高的书架上选书，李先生每拿一本书出来，总要翻阅二分钟左右才决定取舍。他拿起《钜宋广韵》，翻到“前言”末页，见到署名，李先生不禁出声：“啊，周祖谟。”立刻合起书，侧过身来放到玻璃柜台面上的一些要买的书的上面，燕孙先生的韵书研究的成就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于此可见一斑。燕孙先生写成这部《广韵校勘记》和《广韵校本》的时候是二十二岁，可谓风华正茂之年。

燕孙先生在大学时代就以勤奋、聪颖而崭露头角，请看他同时代人的记述。周定一先生说：

> 一九三五年秋进北大中文系，沈兼士先生教我们新生班文字学概要。他在课堂上有时谈些似乎离题其实很有意义的话。比如有一次说：“咱们中文系语言文字学方面，每隔几年就出个‘状元’：魏建功是乙丑科状元（一九二五年毕业），丁声树是壬申科（1931）状元，现在读四年级的周祖谟看来是丙子科（1936）状元。”①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首任会长严学宭先生说：

> 我们在北大同学，他是莘田师的得意高足。当时北京大学流传着两句口头禅：“前有丁声树，后有周祖谟。”这是北大中文系培养的两位天才学者。丁先生当时已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北大的老师都想把周先生收在门下。一九三四年秋，周先生读大学二年级，年仅十九岁，就在北大《国学季刊》上发表了《说文解字之传本》一文，得到了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先生的嘉许，曾赠以“高轩谢车马，小学主昆鱼”一联，是沈先

---

① 周定一，《纪念俞敏兄》，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1997.1。

生用甲骨文写成,可见他对周先生的赏识。后来周先生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对文字、音韵、训诂无所不精,同时擅长诗词歌赋。①

燕孙先生在学生时代的论著除了《说文解字之传本》、《广韵校勘记》外,还有毕业论文《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九万多字,为研究《万象名义》,抄录卡片即达一万五千余张,此文收于《问学集》中。抗日战争时,先生在陈垣先生任校长的辅仁大学任教,开多种课程,同时埋首读书,著述益丰,学更大成。一九四〇年先生二十五岁时发表《陈氏切韵考辨误》,一九四一年先生二十六岁时发表《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一九四三年先生二十八岁时发表《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宋代汴洛语音考》、《四声别义释例》三篇名文。我该着重介绍一下《宋代汴洛语音考》,此文首先研究了邵雍《皇极经世书》的"声音倡和图"以及宋代汴洛文士的诗词用韵,须知在其前只有个别学者偶或举少量唐诗用韵做立论的佐证,时至今日,唐宋金元诗词曲韵考的论著大量涌现,创始之功当归燕孙先生。先生二十九岁时开始校释《洛阳伽蓝记》,四十一岁毕工,著名的南北朝史专家王伊同著文评介,称誉先生为杨衒之的功臣,犹如颜师古之与班孟坚。先生三十五岁时出版《方言校笺》,集清代大家戴东原、卢文弨、刘台拱、钱绎诸人的大成,系后出转精之作。四十三岁时,主撰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两汉分册出版,魏晋南北朝部分也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八年间成稿,八十年代整理补充,于一九九六年始得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书名《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抗战时期完成的《尔雅校笺》则于一九八四年在南京出版。而集数十年之功的《唐五代韵书集存》两巨册也迟于一九八三年在北京出版,此书一九九三年台北再版,这是研究敦煌韵书最具权威性的著作。一九六六年结集出版的《问学集》在北京、台北、东京皆有印本,这是引用率最高的汉语史论文集。乾嘉大师段玉裁有一段名言:

古之以别集自见者多矣,而多不传;传矣,而不能久;传且久矣,而或不著;其传且久,久而著者,数十家而已。其故何哉?盖

① 严学窘,《八十自述》,武汉《语言研究》1993年增刊。

学有纯驳浅深,而文有工拙之不等也。[1]

周先生的那些名文名著,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光芒愈现,例如《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这篇长文发表后不久就被瑞典学者马悦然翻译成英文,介绍至西方,张琨先生在《〈切韵〉的综合性质》一文中将周燕孙先生此文与陈寅恪先生的《从史实论切韵》并列为关于"切韵"性质讨论的两篇最重要的论文。燕孙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为并世学人所推许,周法高先生称之为"声望日隆"。[2] 燕孙先生是位杰出的汉语学家、校勘家,其研究领域广及音韵、训诂、方言、文字、版本、目录、校勘、敦煌学等,他还积极主持和参加了若干大型辞书的编纂工作。他是《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的顾问,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副主编、实际主持者。五十年前他和魏建功先生等共同编《新华字典》,这本字典的使用者累计已达数十亿,今后还将不断有数以亿计的人人手一册,这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贡献何等巨大!先生在五十年代中期所写的《汉语词汇讲话》,是以少许胜多许的精品,影响至今不衰。

燕孙先生还是诗人、书法家。先生生前曾发表少量诗词,身后由其长公子士琦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文教资料》(双月刊)总二一九期上,名为《片羽集诗词抄》,收诗四十一首、词十一首。但是一九九一年春,我在京都池田武雄教授家中见到燕孙先生赠池田先生夫妇的一首长篇歌行,诗、书俱为珍品,却失收。先生之书法宗二王,遒劲之气盎然,中、日、美很多语言学家都藏有先生的墨宝。

燕孙先生还是位杰出的语文教育家。先生因日本侵华而不能南返中央研究院,一九三九年起在辅仁大学任教,一九四六年回到母校,直至一九九五年逝世。燕孙先生记述在五十年代初,"首先主持开设'现代汉语'(最初称为'中国现代语')一门课程,草拟大纲,进行讲授。同时又首创开设'工具书使用法'课,以提高学生利用工具书自学的能力。"[3] 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间,"曾被借调教少数民

① 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

② 周法高,《记董同龢先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通讯》,1991年3月。

③ 周祖谟,《酬答祝寿的谢辞》,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音韵学研究通讯》17/18(1996.12)。

族医科预备班和外国留学生班的汉语课"，[①] "探讨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②] 一九五三年他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这是较早出现的研究这一领域的具有理论价值的文章。

燕孙先生说："在指导研究生方面，在人文科学范围内，我不主张学生抱着一门课程孤立地去研究问题，而主张扩大范围，以历史的发展为线索，从近到远，从古到今去探讨。换言之，就是要从根本中来，不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学识要有根柢，要有系统性。所以凡是从我学习的，都要古今兼顾。有好几位及门的同学毕业后在大学都能承担多方面的教学工作，未始不与此有关。连带的事情就是要求端正的学风，避免流于浮夸，不切实际。"[③] "鼓励青年学会自学，古与今要兼顾，然而要知古又必须先知今，所以必须研究现代方言。除研究语言之外，还要重视历史文化和历史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认真读书最为重要。"[④]

以上是燕孙先生晚年对自己毕生教书育人的经验带有理论升华性质的总结。我，作为燕孙先生早年的学生，有责任记述恩师对我的培养、教育，何况如今我也已至花甲之年了！在大学本科期间，我学过燕孙师讲授的现代汉语课、汉语言文学要籍课、汉语言文学史课。一九六〇年我有幸成为先生的第一个汉语史研究生。先生要我每两周到他家中面授一次，布置必读的书目，给我讲这些论著的要点、阅读的方法等。先生要求写读书札记，在下次面授前两天交。下次指导时，就我的读书札记评点、解惑，再布置后两周的学习任务，如是者两年多，先生为培养我付出了多少心血！三年困难时期的纸张粗而黑，我写的字丑而小，看起来很吃力，但是先生经常在我的札记上朱笔加批。沈兼士先生的名文《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

---

① 周祖谟，《往事自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11 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又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1995.3。

② 周祖谟，《酬答祝寿的谢辞》，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音韵学研究通讯》17/18（1996.12）。

③ 同上。

④ 周祖谟，《自传》，《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页 633—642。

我读后对其学说有些不同的看法，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写在札记上。燕孙先生用红笔在这段后加了双圈，面诲时又表示首肯，一个学子在蹒跚学步时得到这样的鼓励，这对于以后的成长该有什么样的意义呀！在先生的精心指导下，我按部就班地读了音韵、训诂、文字、语法四方面的重要论著，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在袁家骅先生和周燕孙先生的教导和影响下，在本科时期我对家乡方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研究生期间，我更迷恋于此，三年（主要利用寒暑假）写了六稿，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完成了《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提出了吴方言本北抵淮河说，提出了通泰、客、赣方言同源说，魏天行（建功）先生和周燕孙先生都曾阅过我的稿子，长达十万余字，而大陆的杂志一般只肯刊登最多万把字的文章，所以这篇论文迟至一九八八年才在东京发表。我年轻时贪得旁骛，一九六二年想到中央民族学院学藏语，那必须导师书面证明学有余力方可得到系的批准，我鼓起勇气向周先生申请，先生当即欣然同意。关于毕业论文的选题，先生跟我讨论，建议我研究宋词用韵，因为那是太老师莘田先生的未竟之业，燕孙先生希望有一个年轻的学生来完成。我却说：“跟先生学了两年，音韵训诂居多，古文字和语法也学了不少，为了毕业后教学和科研的面能广些，我是不是做古代专书的语法论文？宋词韵作为业余的题目吧。”先生当即同意了，可见燕孙先生的民主作风，这也是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的体现。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我写成了《〈孟子〉句法结构初探》。

有一件事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情景，我至今仍然没有忘记。北大的研究生在专业学习阶段结束后必须考试，我为此紧张地准备了六十三天。一九六二年一月五日上午，我走进了五院考场，王力、周祖谟、林焘三位先生主考，口试题目涉及汉语史的各分支学科，三位先生又就着我的回答不停地追问，整整一天，最后给了我高分和很好的评语，在电灯光下，燕孙先生面上露出特别高兴的神情。王力先生也很为满意，所以在第二年他要我做他的助教，找我谈话要我留校。如果没有导师的严格甚至于严厉，我是不可能顺利地通过这次专业考试的，也是不可能在毕业后写些平实的论著的。我做研究生的第一年，顿顿吃不饱，以致浮肿，而燕孙先生每次布置的必读论著又多，我

在宿舍里嚷吃不消，先生知道后，布置的阅读量并不减少，而且批评了我，我再也不敢叫苦了，我永生永世记得这次批评，我永生永世感激这次批评，我……。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是我家乡的俗谚。

门，对于一个学人太重要了。

“啊，门——”。

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于颜之推、萧该故里

原载《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页619—629，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1998年。

“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记我给王力先生当助教

人，在青年时代，勇往直前；到了中年，虽有回顾，但总是前瞻为多；过了花甲，则怀旧日甚。时下创造体系、命名定律的风气流行，我也随俗，将我“发现”的上述现象“高度概括”，名之曰“前瞻递减律”或“回顾递增律”。

细察如今的我，已过早地将这定律发挥到极致的地步，何以如是说？每当独处静思之时，我几乎不再“憧憬未来”，而总是“回首往事”。往事，大半生的往事，淡如流水者占绝对多数，遗憾后悔的固有一握，但是值得欣慰自得的也不在少，特别是那风华正茂的峥嵘岁月。

在我个人来说，永恒的回忆之一是，我曾经给王先生当过助教，亲聆謦欬，王先生言传身教，我获益良深，师恩如山，永铭于心。现在为纪念王先生百岁诞辰诗文集写文章，我记述这件事，以表示我对王先生的崇敬和感激之情。

得从头说起。

我是1955年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在系主任杨晦先生召开的新生入学大会上，在大饭厅里，学生都坐在一边，老师们则在相对的一边，其中就有我们崇拜的王力先生。王先生是先我一年到北大的，他原是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主任。1952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说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决不为过，其是非功过自有历史学家、教育学家评说，我不敢置喙。但是有一点还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彼时挟战胜之威，令行禁止，如臂使指，那么大的动作，涉及多少个学校、院、系，多少个个人及其家庭，分分合合，无不从命；而至今日，撤销一个机构，调动一个官员，难乎其难。当时的高教部在1952年将原北大、清华、燕京的中文系按照苏联模式合并组成了综合大学北京

大学的中文系,54 年又将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进,于是王先生来到了北大,直至逝世。我在校读本科期间,王先生给我们上过汉语史、汉语诗律学的课。诗律学课的考试方式是,每个学生写一首诗词,记得我当时填了一首调寄“诉衷情”的词,是歌咏伊拉克革命使“王冠落地”一事的。从此我知道了什么叫填词,不过此后也只填过一首词,是“江城子”吧,那是 1991 年 2 月写在东京大学中文系留言簿上的告别辞。这个留言簿是平山久雄先生特为王力先生访问东大而置的,第一页是王先生的题词,我曾跟平山先生说:“这留言簿可是‘重要文化财’啊。”拙词是写在第二册上,当然是附骥尾了,“骥尾”一词典出《史记》,我得声明,我这里不是用典,不敢不敢,我是用的常义。

王先生对我影响至钜的是 1957 年秋季和我的一席谈,何以说“至钜”,因为这一席谈影响我到今天,而且要影响我整整一辈子。我在江苏省扬州中学读书的时候,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因此进了大学后,更是如此。当时我们上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到了三年级,要分文学和语言两个专门化,在分专门化的动员会议上,杨晦先生和王力先生连续作了报告,王先生在报告最后说:“同学们如果有什么问题,什么想法,欢迎来找我谈。”接着学生报名,语言班定员 20 人,可是还差好几个。孙维张这时来怂恿我学语言学,那是因为我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跟着一些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张家口地区的方言调查,对语言学产生了兴趣。不过,要扔掉多年心爱的古典文学,我还下不了决心,就是说,我是个动摇派。这时我想起了王先生的邀请,于是和李世凯等几位同学,来到了王先生在燕南园的小洋房的客厅,当时我们这些乡下孩子觉得见所未见的富丽堂皇,其实现在很多小青年家庭装修得才真叫富丽堂皇。见到了王先生,我们几个人都很拘谨,谈了我们的彷徨、踌躇,王先生非常和蔼地解答了我们的问题,要言不烦。走下了燕南园 60 号的台阶,我就定下了终身,真是要终其身了。

在研究生阶段,我和王先生的接触就多些了,因为王先生每两周就在他的客厅里给牟国相、我、冯志白三人讲一次课。王先生的课,一次两小时,中间并无休息,课前课后不谈闲话,不叙家常。那时王先生的长公子秦似同志到北大当进修教师,所以也来跟我们一块听

课，不过这位大师兄是老革命，老作家，任过广西省委宣传部长、那时任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我们这些小青年敬而神之，不敢跟他搭讪。王先生讲课就和他的文章一样，川流不息，洋洋洒洒，我们学生总是觉得："怎么就到了下课时间了？"

我通过了研究生论文答辩以后，等着分配、报到。这时就看看闲书，在旧的《参考消息》报上练练毛笔字(那时没钱买毛边纸)。忽然某日在燕南园的东北角遇见王先生，王先生对我说："鲁国尧，我正要找你。"我赶紧答道："请问王先生，找我有什么事？""我现在教古代汉语，缺助教，我想让你来担任。"我一听，顿时怔住了，好一会儿我才嗫嚅地说："我……怎么……能做……王先生的……助教？我的水平……差得远呢？"王先生却对我说："我了解你，你来吧。"这，就需要倒叙一年前的一桩事：原来当时有规定，研究生几门专业课学习结束后，必须通过考试，方能进入做毕业论文的阶段。我是 1963 年 1 月 5 日考试的，那时都是口试。考试委员会由王力先生、周祖谟先生、林焘先生组成，王先生任主考，唐作藩先生是秘书。口试到了正午，还没考完，王先生宣布："吃饭，休息一会儿，继续考。"我说："我保证不看书。"王先生微笑地说："你看书，也没关系。"下午仍然主要是王先生就我的回答，不紧不慢地不停地追问。我现在还记得，在回答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音系时，我说："声母该是 27 个，王先生《汉语史稿》上册讲的 24 个声母的观点，我……不太……赞成。"王先生问我："怎么是 27 个？"当时我讲的什么理由，现在委实记不得了，大概不是什么强有力的理由。我回答完这个问题后，王先生不再追问了，但是又向我提出别的问题。到了天黑的时候，诸位先生的提问才结束。口试总算完毕，让我退出考场，四位老师商量给我的评语。最后召我进来，向我宣布："平时学习努力，知识掌握全面，基础扎实，回答问题时有自己明确的见解，言之成理，叙述清楚。唯嫌重点不够突出，今后应注意综合概括的能力。考试成绩评定为五分。""五分"是苏联的评分制度中的最高分数，解放以后学习苏联老大哥，百分制几乎被废弃了。刚在我以前考过试的高班同学都没有得到理想的分数，那时的考试还是很严格的，我被考了整整一天也能说明问题，我这成绩在我以后考试的研究生同学中起了鼓舞士气的作用。通过这次考试，

我越发崇敬王先生,不仅是因为王先生给了我好分数,好评语,而是他的精神感人至深,王先生不以学生对自己的学说提出异议为忤,相反地还给予鼓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对王先生总怀着知遇之感。他这么大的学问,这么高的学术地位,亲自找我当他的助教,能不令人感激涕零?这里我还要再讲一件往事,虽然我在以前的回忆文章中提过。1964年某日,王先生(当时职务是副系主任、汉语教研室主任)委派唐先生找我正式谈话,要我留校任教。我向老师陈情:父母在江苏,爱人在安徽,我想到南京大学工作。我拜见过南大的方光焘先生,方先生跟我谈了半天,热情地表示要我。又过了些日子,王先生再次要我同意留校,我冥顽不灵,再次陈情,谈了许多。南归江海以后,我常常为此后悔,至今依然。去冬的雪日,在中山陵宾馆,我向来宁开辞书学会的曹先擢、李行健、熊正辉三位学长还谈到这件事。我在本文开首所说的"回首往事时""遗憾后悔的固有一握",此即其一也。以王先生之尊,两次令我留校,如此机遇,于他人,求之而不得;可我,竟拒绝,有负师恩,每思及此,能不懊恨?

还是回过头来再说我给王先生当助教的事儿。王先生原来是教汉语史,后来教研室重新分工,王先生改教古代汉语,马上主编了一套新体系的教材。王先生教的是64级语言班和古典文献班,学生有张双棣、殷国光、张卫东、刘丽川、黄丽丽、赵中方、王长发等等。我都记不得当时王先生为什么缺助教而要来找我,1998年母校百年大庆时,我想起了这个问题,问张双棣同志,他告诉我:"原来的助教奉命到湖北去参加社教了。""社教"者,"社会主义教育"也。不过,这不是个普通词组,而是个专有名词,特指"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次运动,懂得的大概只有我辈过来人了。

我怎么也不能忘记这件事:在我当王先生助教的某日,我到燕南园,敲王先生的家门,老保姆把我让进家,一会儿王先生就从楼上下来。在客厅里,我汇报了辅导当中的情况和学生学习存在的问题,王先生一一作了指示。最后我鼓起勇气说道:"您的《古代汉语》教科书,有两处好像……有点儿……错。"讲完,我忐忑不安地等候他的反应,只听王先生说:"等一等。"他同时站了起来,走出客厅。我一时愣

住了，听着登登的楼梯声，只好坐着等一等了。片刻，又响起登登的声音，我忙站起来表示迎候，只见王先生已到了跟前，右手拿着本书，往下摆了两摆，示意我坐下。在我懵懵懂懂之际，王先生一边打开书，一边问道：“哪一页？”“什么地方错了？”他把夹在书里的钢笔拔出来，在书上认真地记，原来他拿着的那本书也是《古代汉语》第一册。待到我讲完了，王先生也记好了。最后，他合起书，对我讲：“以后多留心，错的地方记下来告诉我。”

就这两句，短短的两句，却时时回响在我的耳边。快四十年了，仍然时时回响在我的耳边。

就这几分钟，短短的几分钟，那上楼时的背影，持书而下的步履，打开书的动作，……常常显现在我的脑际屏幕上，快四十年了，仍然常常显现在我的脑际屏幕上。

我在南方十几年后，某次有幸听一位南下的老专家讲治学方法，其中一条是“不违师说”，闻之骇然。我为什么骇然？“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我做王先生的助教做了大半个学期，1965 年 6 月我告别师门，南归江海。再过一年，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每依北斗望京华”，担心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的老师们的命运，果然，时时传来王先生和其他老师，被关进牛棚，被专政，被侮辱，被打的消息，那是什么样的年代啊！

1974 年春，我才有机会出差晋京，当然要回母校看望老师和同学。我去了燕南园，王先生住的那座小楼，一楼被他人占去。我上了楼梯，一只脚刚刚踏上二楼楼板，一张书桌已经碰到我的上衣的下摆，只见塞在桌子和门框间的田小琳同学正跟王先生谈话。去年四月我到香港中文大学，田小琳特来看我，一见面就谈起那次在王先生家邂逅的情景。“瞧，王先生竟然被逼到这般地步！”“啊，这还是小小不言的，在文革中，王先生受的苦可大呢。”

苦难总不会没有尽头，这才该是“人间正道”吧。终于听到王先生“解放”的消息，我立即写了一封信给王先生。王先生也马上复信给我：“刚刚收到向熹同志的来信，现在又收到你的信，很高兴。”

不停地被改造了多少年，知识分子又可以看自己的专业书的时

代终于来临了。我在《南京大学学报》1979 年第 2 期上发表了《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我寄了一份抽印本给王先生,是向他汇报,一个远方的老学生还没有荒废学业,请他教诲,我同时向他请求墨宝。不久就收到王先生的回信:“看过了你的文章,觉得很好。”并说:“等从城里买来宣纸,就给你写字。”几天以后,收到了王先生为我书写的条幅: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国尧吾弟属书　　　　王力　一九七九年七月时年八十

此阕乃是辛稼轩的名篇《青玉案·元夕》。了一先生的老师王静安先生在其名著《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先生手书条幅,我一直珍藏,我爱稼轩词,我爱了一师的墨宝。

1985 年 8 月在昆明召开中国语言学会第四届年会,王先生和师母都出席了,在会上王先生宣布捐献十万元设立语言学奖金,须知那时的十万元多值钱啊!朱德熙先生宣读了向国家教委申请在北京大学成立语言学系的意见书,而在当时泱泱中国竟没有一个语言学系。这是那次年会最激动人心的两件事。结果如何呢?只有“王力语言学奖金”设立了,而且是很快地设立了。王先生那时已经是步履蹒跚,孟琮对我说:“见一次少一次了。”我们两个老同学相对黯然。我在昆明还教给了王先生两个锻炼身体的动作:往上举臂,握拳,展掌,握拳,展掌;往左右伸臂,握拳,展掌,握拳,展掌。后来我看到专为王先生拍的一部纪录片,就有王先生坐在轮椅上伸臂握拳展掌的镜头。

1985 年秋,黄侃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在南京举行,邀请王先生参加,我负责跟王先生联系。谁知开会前夕,王先生来了一封信说,还是几十年前去过南京的,很希望在老年再看看南京。但是前几日在临湖轩接待外宾时,支持不住,跌了一个跟头,现在病较重,医生要求好好检查,因而不能赴宁与会了。次年,我们

就得到先生辞世的噩耗，我们为失去一位敬爱的老师、亲爱的老师而悲恸不已。

我们为不能在南京车站迎接恩师而抱憾，1987年春我们南京的几个老学生邀请王师母光临金陵，以表示对老师师母的敬爱于万一。

这篇文章，破题以后，我文思尚称顺畅，信笔而书。但是写到这里，嗒焉神伤。恩师仙去多年，如今我亦老矣。往事悠悠，夫复何言？

……

……

2000年3月20日于金陵愚鲁庐荒疏室

原载《王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页157—164，语文出版社，2000年。

重温朱德熙先生的教导

——为纪念朱德熙先生逝世十周年而作

敬爱的老师朱德熙先生逝世整十周年了。

我经常怀念朱先生。

我1955年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到了1956年，“现代汉语（二）”课即现代汉语语法课由朱先生开，先生刚从保加利亚讲学回国。先生讲课讲得太好了，他不是靠风趣幽默，不是靠趣闻轶事，而是靠逻辑力量征服了学生，抓紧了学生的注意力。这是必修课，百分之八十的旨在学文学的同学也得听，而那些“文学同学”十之七八对语言学课很为厌倦，可是朱先生的语法课却赢得了他们的高度赞誉。

我在校读本科、读研究生期间，经常听朱先生的课，向朱先生请教。毕业南下以后，先生关心我、爱护我、教导我，每出一本书都送给我，我崇仰先生的高尚人格、敬佩先生的渊博学问。

朱先生十分关心语言学事业，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先生有一段话，我已经引用过好几次了，先生在《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中说：“回过来看五十年代以来培养的学生，其中虽然也不乏杰出者，但总的来说，失之于陋。”先生指出造成这种弊端的原因，提出了救治的办法。朱先生还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那就是王力先生。朱先生在这段话的前面说：“了一先生一生不懈的事业是治学和树人。”王了一先生执教五十余年，“亲炙先生教益的弟子不下数百人，再传及三四传弟子不可胜数。先生为培养我国语言学人才所作的贡献可谓大矣。”朱德熙先生接着称颂王了一先生的学术成就：“在治学方面，先生的特点是方面广，举凡语言学的各个门类，如音韵、训诂、词汇、语法、诗律都曾经涉猎过，而且都有成系统的专著，先生之学，证古论今，融会贯通，博大与精深兼而有之，所以能够蔚为大家。”朱德熙先生对王了一先生的评价绝非虚美

之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史上，在整个中国语言学史上，王了一先生是大家，朱德熙先生也是大家，写到这里，我不禁吟诵起韩昌黎的名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记得十年前的春夏，我在美国访学，而其时朱先生正在美国执教。我跟先生通过多次电话，向先生请安，请教，并且约好，待我 7 月从西海岸回国时专程趋先生寓所拜谒先生、师母。孰料我在圣迭戈时，噩耗传来，我即仓皇奔赴 Palo Alto，哭奠先生，帮助料理丧事，是为先生送行的仅有的几个老学生之一。每思及此，能不泫然？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一件往事，那发生在先生去世前一年多。1991 年春我在日本京都大学访问，其时朱先生在美国讲学已经有几年了。我很思念老师，就写了封信，向老师请安，同时也请求指导。1991 年 3 月 23 日我收到了先生的回信，什袭珍藏至今。先生逝世已经十年了，先生的教诲我永远牢记。在这怀念的日子里我又将先生的信取出，我重温，我研读。现在将有关学术的部分抄录如下：

> 看到来信很高兴。这几年足下学业精进，于音韵学史的研究，俨然自成一家。不懈的钻研精神和踏实的学风尤其令我佩服。来信说今后拟重点学习理论及方法。我意此事不可强求。一个有成就的学者必有其所长，同时也难免有其所短。象[1] 丁梧梓先生那样样样拿得起的学者可以说是全才了，但理论似亦非其所长。研究语音史，自然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根本道理还是那些，近年来虽不乏新著，但都不易读，而且其中如有新理论，亦未经时间和事实的考验，最后能不能成立还很难说。所以对足下来说，不如卑之无甚高论，**细读**：Bloomfield 和 Palmer 二书中有关历史比较的部分以及皮特生的《十九世纪语言学史》（此书有袁家骅夫人的中译本，但最好能看原文[2]，这是最好的一本介绍历史比较方法的书）。我看主要精力和时间仍应放在语言事实的搜集和分析上。近年来，美国语言学有重理论轻事实的弊病，而且不独语言学，经济学甚

① 那时的简化字"像"作"象"。

② 朱先生指中译本所据的英文本。

至物理学亦有类似的情形。(附上李昂迪夫谈经济学的一则剪报,供参考。)

朱德熙先生附给我的剪报,也颇有意义,美国经济学家谈美国经济学的弊病。

李昂迪夫谈经济问题

抨击专家昧于事实

认不应使用太多假设与理论

【纽约邮报讯】诺贝尔得主魏惜理·李昂迪夫批评其经济学家同侪使用太多的假设和太少的事实来玩他们的水晶球。

出生俄国的李昂迪夫在圣若望大学发表的"经济现状"一篇特别演讲中告三百名大学部的学生说:"我觉得目前经济学上的许多问题之一是许多理论、许多假设,和太少的事实。"

李昂迪夫说:"只要看看经济刊物上出现成千上万的方程式就知道今天经济专家的问题是极为明显的。"

他说:"列出方程式是不错的,但你必须把事实放进去才能说明——真正地解释眼前的情况。"

高龄八十四岁的李昂迪夫经常还在纽约大学教书。他于1973年因发表投入产出分析法而获得诺贝尔奖。他用这种分析方法根据事实自经济的任何一项变化中预测波浪的因果。

他在哈佛大学教经济学时最先于1941年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帮助罗斯福总统预知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可能发生的事。

他说:"谁都知道钢铁工业将趋衰落,后经事实证明他的预言果然正确,战后因民间建筑业旺盛,出现了钢铁供应短少的现象。"

李昂迪夫说:"当今经济专家过分依赖方程式的危险,好比一架飞机飞离跑道进入天空然后在空中来回穿梭,永不著陆,虽然情况不错,但又为我们解释了些什么呢?"

李昂迪夫说:"亚当·史密斯借体验观察,然后试图解释。但现在的经济学家和那个时代的学者不同,他们宁借推理作为分析的基础而不顾事实。使用假设虽较为安全,你们知道,假设是廉价的东西。"

李昂迪夫发明的投入产出已为一百廿个国家采用,中共和日本

的“庞大”作业也都被包括在内，挪威则根据投入产出制定其全部预算，石油工业巨擘菲利普斯使用这一方法研究它的作业。

朱德熙先生给我的这封信，于1991年3月16日写于美国加州Palo Alto，斯坦福大学旁边的一个小镇。

先生是语言学大家，也是位教育家，凡是真正的教育家对学生都是因材施教的，先生了解我资质驽钝，所以要我不必强求理论及方法，教导我从事“语言事实的搜集和分析”，知弟子莫如师。

这封信中关于论学的部分，对我们有极为深刻的教育意义。朱先生为如何建立汉语语法学而探索一生，奋斗一生，先生对外国的学术一直是非常关心的，取其长而弃其短，这是先生的一贯态度。特别是朱先生在去世前几年应美国学者的邀请，赴美讲学，并在很多大学和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他在美国，和美国学者交流，观察、了解美国的学术状况，当然能洞烛其优点与缺点，先生的话可谓中其肯綮。

我记得好多年以前，读了一本中国哲学史的书，在中国哲学史上对朱熹的学说有所谓“朱子晚年定论”。朱德熙先生在给我这封信后不久，就发现患了癌症，次年辞世。因此“美国语言学有重理论轻事实的弊病”，完全可以称作“朱子晚年定论”。

先生逝世十周年了，重读先生的教导，温故而知新，“主要精力和时间仍应放在语言事实的搜集和分析上”，这十年我做了一点点，最近完成了一篇《“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兼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算是我在中国语言史和汉语方言事实的搜集和分析上前进了一小步，但是离先生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成绩微微，愧对先生之灵。

今后当努力，当认真。

谨以此文作祭文。

2002年8月31日

原载《语文研究》2002年4期。

李昂迪夫談經濟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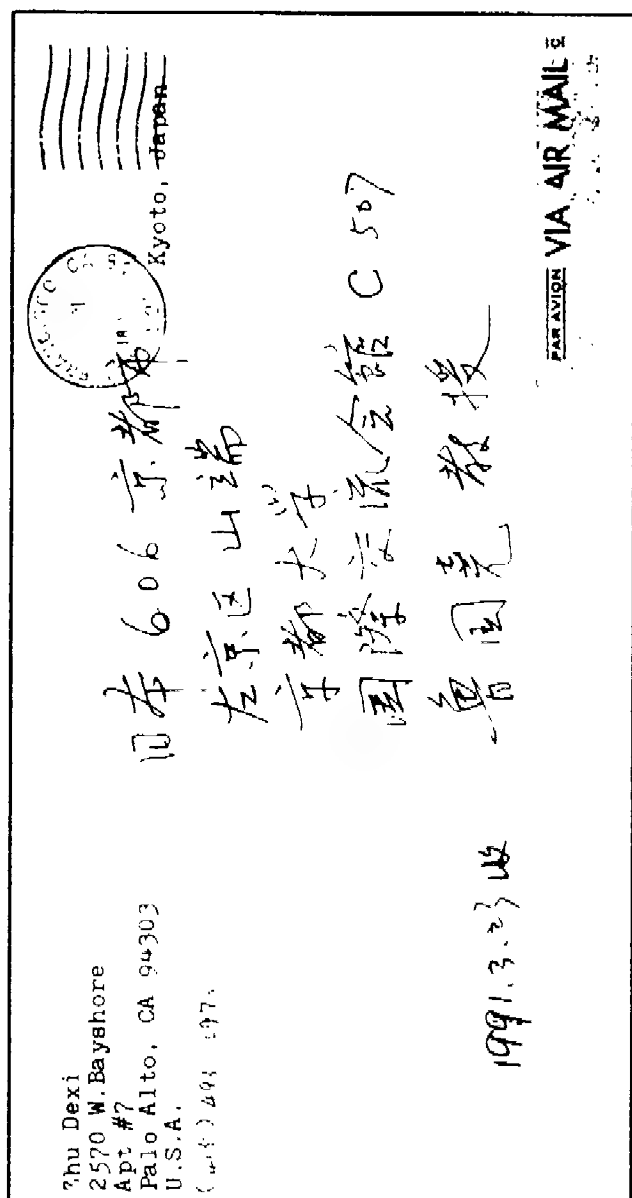
抨擊專家昧於事實

認不應使用太多假設與理論

【紐約郵報訊】諾貝爾得主魏錫理．李昂迪夫批評其經濟學家同僚使用太多的假設和太少的事實來玩他們的水晶球。

出生俄國的李昂迪夫在聖若望大學發表的「經濟現狀」一篇特別演講中告三百名大學部的學生說：「我覺得目前經濟學上的許多問題之一是許多理論，許多假設，和太少的事實。」

李昂迪夫說：「只要看看經濟刊物上出現成千上萬的方程式就知道今天經濟專家的問題是極為明顯的。」



他說：「列出方程式是不錯的，但你必須把事實放進去才能說明——真正地解釋眼前的情況。」

高齡八十四歲的李昂迪夫經常還在紐約大學教書。他於一九七三年因發表投入產出分析法而獲得諾貝爾獎。他用這種分析方法根據事實自經濟的任何一項變化中預測波浪的因果。

他在哈佛大學教經濟學時最先於一九四一年使用投入產出分析法幫助羅斯福總統預知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可能發生的事。

他說：「誰都知道鋼鐵工業將趨衰落，後經事實證明他的預言果然正確，戰後因民間建築業旺盛，出現了鋼鐵供應短少的現象。」

李昂迪夫說：「當今經濟專家過分依賴方程式的危險，好比一架飛機飛離跑道進入天空然後在空中來回穿梭，永不著陸，雖然情況不錯，但又為我們解釋了些什麼呢？」

李昂迪夫說：「亞當．史密斯藉體驗觀察，然後試圖解釋。但現在的經濟學家和那個時代的經濟不同，他們寧藉推理作為分析的基礎而不顧事實。使用假設雖較為安全，你們知道，假設是廉價的東西。」

李昂迪夫發明的投入產出已為百廿多個國家採用，中共和日本的「擴大」作業也都被包括在內，蘇俄則根據投入產出制訂其全部計劃，什麼工業應將力量集中使用這一方法研究它的結果。

国尧兄：

看到来信很高兴。这几年足下学业精进，于音韵学史的研究，更是自成一家。而你的钻研精神和踏实的学风尤其令我佩服。来信说今后拟重点学习理论及方法。我意此事不可强求，一个有成就的学者必有其所长，同时也难免有其所短。像丁梧梓先生那样样样拿得起的学者，可以说是全才了，但理论似乎非其所长。研究语言史，自然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根本道理还是那些，近年来虽不乏新著，但都不易读，而且其中如有新理论，尚未经时间和事实的考验，最后能不能成立还很难说。所以对足下来说，不如[illegible]甚多说，细读。Bloomfield和Palmer二书中有关历史比较的部分以及汤姆生的《十九世纪语言学史》（此书有袁家骅先生的中译本，但最好能看原文，这是最好的一本介绍历史比较方法的书）。我看主要精力和时间仍应放在语言事实的发掘和分析上。近年来美国语言学有重理论轻事实的弊病，而且力求将语言学、语法学变成物理学、数学那样的精确科学。（附上李昂也来谈语法学的一则剪报，供参考。）

七月底课程结束后，仍返西雅图一直留到年底，然后回北京。

即颂

研安

德熙

三月十六日（一九九〇年）

这三声“老师好”

如果走到幼儿园门口，或者小学门口，在上学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片“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的声音，稚嫩、清脆、响亮。就我的观察，“老师好”，好像只是幼儿或者幼童特有的叫法，再大些，就不这么叫了。

可是我却听过另样的“老师好”，也很响亮，一样清纯，但是出自老人口中，我这大半生只听过三声。

1962年，我正在北京大学做汉语史研究生，那年中文系举行教职工除夕晚会，当时的系办公室在二院。我们研究生也可以参加，那时不是谁都能带研究生的，导师要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一个导师也只带一两个，所以研究生人数很少，不像现在一个系有几百个硕士生、博士生。那次晚会，在大厅入口不远，靠墙摆了一溜沙发，我和周祖谟先生来得早，就坐在沙发上先谈谈，当然内容主要还是关乎学术。我正讲得起劲的时候，坐在我左侧的周先生霍地站起来，将帽子快速摘下，拿在手里，我颇是惊讶，也懵懵懂懂地跟着站直，只听得周先生用道地的北京话响亮地叫道：“老师好。”原来魏建功先生走进来了。周祖谟先生在1954年大学教授评级时就是二级教授了，他在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等方面的高度成就早就为海内外学人所一致赞誉。

再说我听到的第二声“老师好”。1978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知识和学术有苏醒的希望了，语言学界在“新时期”的首次会议是这年4月在苏州召开的“批判‘两个估计’、商讨语言学科发展规划座谈会”。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语文》主编的吕叔湘先生从北京南下主持会议，会后吕先生应邀到南京大学来讲学。吕先生特地要去看望他的老师陈钟凡先生，由我陪同，我们走进南阴阳营陈钟凡先生的家，进了小洋房——这是陈老抗

战前做教授时自己盖的。陈老的长公子,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把吕先生和我让进客厅坐下,我就跟吕先生讲些闲话。谈了好一会儿,忽听吕先生猛地大声喊道:“老师好。”他已经笔直地站起,面向东侧的房门,这时陈老在儿子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正跨东卧室的门槛,只见吕先生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帮助搀扶,动作真叫敏捷。须知那时的吕先生,74岁,是位闻名遐迩的汉语学大家兼英语学大家。

我的思路继续向前,1986年9月,我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参加国际汉藏语学会。出席那次讨论会的有很多中国语言学家,如旅美的李方桂先生、薛凤生先生;大陆去的学者如唐作藩、蒋希文、李行健等先生;还有台湾的周法高先生。记得在会间,在一个楼厅里,我碰到周法高先生,这位我心仪已久的大专家,1915年生,中央大学毕业后即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堪称著作等身,他是《中国古代语法》、《中国语言学论文集》、《金文诂林》等书的作者和编者。周法高先生,江苏东台人,东台是清乾隆年间方从泰州析置的县份,他和我的方言几乎完全一致,所以当时我们在俄亥俄用家乡话交谈,很感亲切。突然他侧过身体喊道:“老师好。”这时李方桂先生向我们这边走来。李先生对周法高先生说:“我跟你说过好几次了:‘以后不要叫我老师。’”只听得周先生回答道:“您是老师嘛。”“是”是重音所在。

这三对老人都已先后作古了,我的耳际却经常回荡着这三声响亮的“老师好”。

定稿于2003年3月30日

发表于上海《语言文字周报》第1004号(2003年5月21日)

索　　引

索引一　本论集所涉及的部分学术观点、现象、问题

我的一些老友曾对我说："你的很多文章太长，有好些观点被淹没了。比如说，你讲的'段玉裁擅改许慎的《说文序》之误'，你主张《史记》《汉书》等所载的诏疏文赋应该视为撰作时代的语言资料，而不能看成司马迁、班固的语言，这些观点都有价值，而且讲得很早，但是都藏在注释里，有几人能注意到?"所以我这次编论文集时试做一个"涉及的学术观点、学术现象、学术问题"的索引，必须说明的是：1. 所列者只是部分，不是全部，例如主张将段玉裁、王念孙、郝懿行、魏建功论著中的方言词辑出，与现代方言作比较，我未收进。2. 本论集所涉及者，不皆是本人所提出者，如"方言"一词在文献记载上首见于东汉末应劭《风俗通义》、《方言》书名在文献记载上首见于东汉末应劭著作，是前人早就讲到的，我之所以列入，目的是引起学人重视，不要都归之于扬雄。"自宋以来徽州人不断迁入泰州，有程姓、洪姓、胡姓等"，则是俞扬同志提供的。3. 深感分类排序之困难，只得大致上以类相从：以文字撮述也很困难，有时很长。只得如此了，请诸公赐正。条目后的数字是本论集的页数，也偶有"第一序"、"第二序"和"跋语"。

（一）

汉语学的中心在中国 191、跋语之一
人正学正第二序
治学二原则：坚实、会通、创新第二序
对待外来学术二原则：不崇洋、不排外跋语之一、188、307
外来文化必须与中国传统相结合，亦即必须中国化 189、307、跋语之一
玄奘与慧能 189、307、跋语之一
"新"学派、学说与"旧"学派、学说之关系 188
为学术而学术，勿为功利而学术 214
实践是检验方法的惟一标准 187、271
中华民族博大兼容的胸怀，强健的吸纳辐射能力 307

外来学术，只有与中国的固有传统相结合，亦即必须中国化，才能生根 189
一种学说，愈早则愈粗糙原始，愈晚则愈精致完善 369
实际问题的细致研究应该导出带有理性的结论 571
《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所录载的诏疏文赋应视为撰作时代的语言资料，而非史书作者的语言 600 注③
许嘉璐论“大师”672
潘文国论“大师”673
《文学遗产》论“大师”673
在下论“大师”673
“黄宗羲定律”和“颜之推谜题”跋语之一
当今学风浮躁 675
文抄公、劣质书、饱含水分的长文应该受到谴责 551
当今花样繁多的评比、评奖、检查、考核 676
“磨剑奖”或“冷板凳奖”677
古代吴越地区民风剽悍好斗，南朝以后成为文化之邦 154
《颜氏家训》是一部比较文化学的著作 128、139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王朝在立国后蕴积若干年方臻鼎盛时期 627、674
国初之文化与学术 674
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发展高峰在宋代，而仁宗之世及其后则为巅峰时期 623
宋太祖、太宗、真宗、章献太后刘氏，可谓之初宋，初宋之书特点为“述”，宋仁宗及其后特点则为“作”623、674
论“宋学”及欧阳修 674
自宋以来徽州人不断迁入泰州，有程姓、洪姓、胡姓等 257 注②
《南村辍耕录》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217
《南村辍耕录》结集成书不晚于 1366 年冬 218、483
虽然陶宗仪入明多年方卒，但“《南村辍耕录》，明陶宗仪撰”的题法非是 218、483
陶宗仪与周德清同为元末人，陶宗仪书无因袭周德清痕迹 489
《新唐书·郑虔传》不载郑虔字，《辍耕录》言郑虔字弱齐 229
陶宗仪长期生活在吴方言区，但于元时曾至大都与江汉 218、482—483
明代 1368 年建都南京，历 74 年，即于 1441 年方最后确定以北京为京师 514—515
戴震《方言疏证序》云“应劭集解《汉书》”，实为“臣瓒所作”11
清末所设之外语学校：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武昌方言学堂 11、540、跋语
赵元任先生《语言问题》云“清末在北京有广方言馆”记忆有误 11、540、跋语

陈寅恪先生"吴音之特点为轻清"一语之误 162
罗常培先生云汉扬雄《方言》后研究方言的传统断绝，其实未断 10、193、263
十六国时期敦煌人刘昞著《方言》三卷，南宋前人王浩著《方言》十四卷，北魏人王长孙著《河洛语音》，惜乎方言学通论性的论著均未予表彰 10、193、263
魏建功先生三大功 681
吴晓铃主编《古本戏曲丛刊》之《红楼梦传奇》两种 680
"文革"结束后扬州、泰州、苏州古旧书店油印之线装古籍 681
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中译本问题 257 注①
大跃进时代学生自己编书 679
古代诗、词、曲、赋等韵文的校勘尤需以音韵学为武器 544
点校曲作，如只据文意而忽视曲律、曲韵，必易致错误 651
吴重熹石莲庵刊《遗山新乐府》所收诸作的真伪须加甄别 428—434
毛奇龄、纪昀、焦循宋人词韵漫无定纪不足推求论之误 386
沈雄《古今词话》"宋人著词韵书"说不可信 387—389
词韵书始于明胡文焕《文会堂词韵》389
清代词韵书的三个时期 389
戈载《词林正韵》之误 390
宋词合韵通叶现象 395—405

（二）

"语言入侵"149、175
中国东晋南北朝时期北语"入侵"江淮与欧洲公元前 2 世纪起拉丁语"入侵"高卢惊人相似 158—159
朱子(朱德熙先生)晚年定论"美国语言学有重理论轻事实的弊病"703
朱子(朱德熙先生)晚年定论"主要精力和时间仍应放在语言事实的搜集和整理上"703
汉语学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188
中国是汉语学的中心 188—189
2002 年将作为中国汉语学走向完全自立和伟大复兴的标志性的一年而载入史册 192
中国语言学者应该踊跃参加国际学坛的争鸣，积极开展批评和反批评 191
文史语言学 623、第二序、跋语之五
一条关键性的史料胜过上千字的对语言材料的分析跋语之五
关键性史料的决定性作用跋语之五

江苏语言学史上的三个高峰时期 638
语言研究应该与社会历史、人口迁移历史的研究相结合 60、123、208
魏建功、罗常培的建立汉语语言史、汉语语音史的自觉意识和具体规划 380
历史文献考证法 60、176—177、181—185
历史比较法 60、176—177、185—190
“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 176—177、181—190
“二重证据法”和新的“二重证据法”或汉语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176—177
语文学与历史比较语言学 187—188
“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方法的四个特点 271—274
“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方法的四难 272—273
“扬长”不“避短”,“取长”以“补短”189、275—276
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190—192
研究语音本身的“遗传”及“变异”的机制以论语音衍变的内因 135
“声韵谐接原则”168、171
“官话”一词元代并未出现,明代方有 519
母方言 185、195
“方言”一词,在文献记载上,首见于东汉末应劭《风俗通义》4
《方言》书名,在文献记载上,首见于东汉末应劭著作 4
“方言”的原义指各地的语言,包括汉语的地域土语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境外语言 1—8,跋语
在中国古代,“语言”、“语”、“言语”、“方言”为近义词 5
古籍中,“土语”、“土言”、“俗语”、“方言”相提并论 6
“方言志”一词始见于唐刘知几《史通》10—11
调查、描写、研究方言的三种人 213—214
方言史的研究比较薄弱 12
从历史运动的角度出发进行方言现状的描写 13
将方言放在同邻近诸方言及民族共同语的相互联系、制约中观察并比较 13
研究方言史的目的在于更清楚地认识方言的现状,了解方言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预测它今后又将循着什么样的道路继续发展 13
方言调查、方言描写的生命在于认真谨严 214、255
方言的“三维调查”、“三维描写”116
重视向高龄老人调查其父、祖的语言状况 49、60
“口语音”和“书面语音”及其层次 41、60
应该记录方言的歧异,方能反映方言的真实面貌 116

某字该读何音,只有在具体的词语里才能确定,因此描述时,必须列出具体词语以显示之 19、116
音因词生,音依词存,音无与之同性质的词为依托则亡 64
“通泰方言”命名之由 116—117
泰州方言通过向宁扬方言的接近途径,而向民族共同语集中靠拢 16、59
泰州方音语音系统内要素的增、减、变 57—58
泰州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原因:“官音”的影响,外地人口的迁入,民族共同语的文学语言的影响 61—63
“官音”61、63、70、73
研究方言史的四种途径: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稽考历史文献,实地调查特别向老人调查,运用历史比较法 60
泰州方音向民族共同语集中的四种模式:调节、组新、引进、消变 83—85
方言内,新派、老派读音之歧异已达到妨碍交际的地步,说明音变的深入:以泰州方音韵母ū-ɛ为例 76—77
在外学习、工作的人回乡,方音能够很快回复,而用词和句式则很难复原 79
泰州青年人说口语词也改用书面语音,或者抛弃土词代之以普通话语词 80
泰州人利用自己方言音系中跟普通话近似的成分(自我心理感觉如此)代替差异大的成分 83—84
方言韵书 101、114—115、198
反映方言特点的竹枝词 78、198、203
江苏方言由南而北、由东而西的递变倾向 19
现代通泰方言中,南通方言保守而泰州方言趋新 13
通泰方言具有吴方言的底层 93—94
“颜之推谜题”136—180、183—184、第二序
古吴语及汉语古吴方言北抵淮河说 86—89、126—127、693
扬州(古广陵)、泰州(古海陵)本系吴语区 87—89、126—127、149
本为非汉语的古吴语何时变成汉语的古吴方言 148
通语 127
“南朝通语”与“北朝通语”128—129、149—160
江苏、安徽两省江淮方言和吴方言分野图与东晋南朝江淮地区侨州郡建制图的相似 152
从通泰、赣、客方言共有的性状探讨其祖语的特质 134
南朝通语的浊塞音、浊塞擦音是送气的 134、135
永嘉之乱大量北方移民南迁导致黄河流域的北方方言深入淮南和江南北部

90—93
永嘉之乱后南逃的汉人把汉语北方方言由黄河流域带到了长江中下游的原吴语区、楚语区 125、127
四、五世纪及其后北语与吴方言在江南北部的“争夺战”92、152—153
通泰方言、赣方言、客方言同源论 94—98、693
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 123—135
南朝通语的“后裔”是江淮方言，而非吴方言 13、90—98、128—134、160
如何看待通泰、赣、客方言一致性中的例外 115、131—132
通泰、徽、赣、客四方言对吴、闽方言形成包围的态势 132—133
对吴、闽方言包围圈的缺口（指扬州-南京-芜湖等洪巢方言）的解释132—133、95
宁扬方言比较接近广大的北方方言 95
徽方言与通泰方言的“神似”之处 132—133、259—260
古全浊去、全浊上混入阴平，通泰方言的多数点，徽州之屯溪、休宁，客家话的少数点皆然 260
南朝时代的南方庶人不尽是土著吴人的下层民众，不全操吴语 175
《颜氏家训》、《经典释文》、《切韵序》关于南语、北语的差异所指同一 129、161—162
“谈”“覃”和“寒”“桓”的平行性 97—98、163—173
《李氏音鉴》中的“南音”系指江淮方言语音 77
宋初“火寸”到元代“焠儿”的变化可视作杭州方言由吴方言儿尾韵（或儿化韵）向具有官话式儿尾词变化的历史资料 232—233、251
跟浙南吴语相比，北部吴语一致性强，带上了相当的北方话色彩 261
中国古代的方言研究史 193—195、481
明代书面语跟口语严重脱节 515—516
吴棫《毛诗叶韵补音》327、379
《诗经》“蜎蜎者蠋”的“蠋”应音 shǔ 530 -531
诗经学中的“诗韵学”的衰落 533
上古重唇轻唇不分元人已晓 505
东汉河南地区真部、元部音同或音近，“温暾”在唐宋时代真部读音定型化 235
隋文帝开皇六年（586）颜之推、萧该与陆氏父子等共十人长安论韵 631
颜之推是建康（今南京）人 138、631
宋代通语十八部 382、392—394
宋词合韵通叶现象所反映的宋代方言状况 395—405
汉语语音史研究的长链 380—384

三代“篇韵”341—344
《广韵》之特点为“述”,《集韵》之特点为“作”623
《广韵》两次修订、两次命名 302、342、624
宋巾箱本《广韵》304—307
周祖谟先生《广韵校本》、《广韵校勘记》303、687—688
《集韵》始修年有“景祐元年说”,有“景祐四年说”,应以前者为是 310、626
明州本《集韵》316、跋语
安康金州军刻本《集韵》316、372、跋语
《集韵》吸收当代读音 312
《集韵》广收又音而欠缺精审 523
《广韵》认为的俗字,《集韵》不认为是俗字 314
《集篆韵》326
《四声韵》327
《礼部韵略》502—504、523—524
元代韵书流行情况的考察 500—504
唐五代辽宋夏金元称“切韵学”,明清民国谓之“等韵学”308、319、327、336—340
失传的某种早期切韵图复原 320
韵图是多时代、多学人层累地造出来的复合的产品,具有多层级的积淀 308、350
广韵系韵图、集韵系韵图 341—355
切韵诗 335
《韵总》327
王宗道《切韵指玄论》318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切韵之学”条 317—325
《卢宗迈切韵法》318—319、326—379
《卢宗迈切韵法》所提供的宋代语音史资料 364—369、370
《卢宗迈切韵法》载明全浊上变为全浊去 364
《卢宗迈切韵法》载明知照合一、彻穿合一 365
互用切 323、356
往还切 356
往来切 356
切韵家卢宗迈生平仕履 330—332、379、第一序
近体诗牢守官韵的成说应该打破,宋金元近体诗韵也能反映当时实际语音 435—438、683
元好问近体诗韵植根于口语 435—438、683

从元好问诗词曲用韵归纳出的韵系早于《中原音韵》音系百年之久，其在北音史的价值弥足珍贵 406—408、426—444
从诗律学观察元好问诗词用韵 441—443
钱大昕、王力的"借韵"说可以商榷，宋金元近体诗的"借韵"和"出韵"都是植根于实际语音 435—438、683
白朴词曲的用韵特点 409—311、445—457
白朴曲韵和《中原音韵》韵系之比较 458—475
张可九词的用韵特点 412—413
张翥词的用韵特点 413
金元九家词用韵比较表 414—417
两宋金元十一家词用韵比较表 418—423
词韵随语音之变而变 405—423
应该重视字音及其演变的研究 439—441、476—477
《草书韵会》505
《草韵》505
《存古韵谱》505
《华夏同音》504
《稽古韵》505
《中原音韵》萧豪韵构拟的困难 477
元代北方"亲家"之"亲"去声 496
陶宗仪的"中州之韵入似二声说" 486—493
元代中原地区既有周德清所述的"入派三声"的方言，又有陶宗仪所说的"入似二声"的方言 481、507
黎新第《"广'入似二声论'"献疑——与鲁国尧、李无未先生商榷》507
明代官话以南京话为基础方言 508—521、跋语之五
李思敬关于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是代表江淮方言的南京话的观点 508、跋语之五
明万历时，太监将在南京买的男孩送给西洋传教士，目的在教传教士纯粹的南京话 514、517—518、跋语之五
《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原稿"地道的中国话"，金尼阁改为"纯粹的南京话"，可证明代的南京话就是地道的中国话 508、514、517—518、跋语之五
杨福绵的学术贡献 517—518、跋语之五
"牛"字在古代，除了有尤韵疑母一音外，尚应有侯韵疑母一音 54
时贤关于明清词汇的论著在追寻某词语的出处或早期记载时，往往至《辍耕录》

而止，未能再进一步溯源 232
研究古代词语，目的不止是寻觅古籍作一般的疏证，语言史家更力图从语言史的角度探赜其千百年来的变化与发展：一、通语词和方言词的相互转化，汉语词和非汉语词的转化；二、由古至今，仍存、消亡、转化；三、词性的转变250—251
研究近代词语，不仅要勾稽文献资料，而且应作调查特别是向健在的高龄老人调查 217、232、251
甲乙丙竟古律 561、670
ABC 竟古律 561、670
开辟“第二战场”即将词汇史的研究和现代方言的调查研究结合 671、677
书面文献结合活方言的方法 671
外籍人士的汉文著作难免“母语干扰性误差”或“语际错误”668
外籍人士的汉文著作难免有自造的汉语并不存在的语词和句式 670
中古汉语词汇地域差异的研究是高难课题 183
《孟子》语言反映了战国时期“以……”状语结构比“以……”补语结构已占优势 571、585
《孟子》“‘以’+介词宾语+动词+宾语”结构和“动词+宾语+‘以’+介词宾语”结构的差异 573—579
《孟子》“‘以’+介词宾语+动词”结构和“动词+‘以’+介词宾语”结构的差异 580—582
句法结构调节论 571、583—585
唐兰、启功先生的隶书之名起于秦代或秦汉之际说之误 586、587
康有为、钱玄同隶书之名创于刘歆说之误 586、592
《汉书·艺文志》“萧何六体”说之非 586、594
《说文解字·叙》“秦书八体”说之非 586、595
西汉和东汉初，只有“今文”一词，而无“隶书”其名 588
班固命名为“隶书”，许慎张扬其说 586、590
班固隶书说的涵义 612
刘师培、马叙伦、唐兰、启功认为隶书是郡县小吏使用的草率、简便的书体 586、603、609
段玉裁擅改《说文解字·叙》两处之谬 586、605 注③

索引二　本论集所探究或涉及之字音(条目按音序排列)

暨-辍耕录字音条 229
類-辍耕录髹器条 230—231

璗-辍耕录嘲回回条 230
鎗-辍耕录鎗金银法 231
弱齐、揑儿、䍧泥-辍耕录双砚堂条 228—229
梢当-辍耕录髹器条 230—231
陶宗仪以敷切奉-辍耕录屦舄履考条 230
挑-辍耕录髹器条 230—231
吾衎之音东钟合-辍耕录字音条 229
元代江南伯百谐音-辍耕录江南谣条 230
元代西浙俗呼靸翣同音-辍耕录靸鞋条 230

索引三　本论集或引用之文献所涉及之语言文字学专门词语

在中国古代，"语言"、"语"、"言语"、"方言"为近义词 5
古籍中，"土语"、"土言"、"俗语"、"方言"相提并论 6
（此下按音序排列）
八思巴字 487
北音 77、476
北语 494
标准语 8
布文 11、544、545
楚语 476
德文 11、544、545
等 322
地域方言 8
俄文 11、544
法国语言文字 544
法文 11、544、545
法语 544
番 485
番言 485
番语 485、544
蕃书 485
蕃语 485
梵文 5
梵言 5
方言 1—11、486、510
方言志 10—11
方音 7
方语 5
共同语 7
官话 510—521
官韵 386
国言 483
国音 7
国语 140、483、510
国字 483
汉儿字 483、499
汉文 544
汉洋文字 543
汉语 5、544
胡言 2
华文 544
华言 483
话语 5
借声 323
晋言 2
句读 327
绝言 4

蒙古新字 504
闽音 494
南音 77、476、494
平 321
齐言 89、149
切韵 317—319、336、339
切韵法 317—319、335、339
切韵家 319、339
切韵诗 335
切韵图 319、339
切韵之学 317—319、339
秦言 5
秦语 5
轻中轻 324
清代贵州少数民族语 2、3
清汉文字 544
清语 544
飒字韵 230
阇婆国方言 2
社会方言 8
世语 7
殊方绝域四方之语 4
殊言 4
殊语 4
宋代高丽语方言 2
宋代广西蒌语 2
俗语 7
唐言 2
天竺书 5
天竺语 5
土话 7
土俗语 7
土言 6
土音 7
外国言语 544
外国语言 544
外国语言文字 544
外化蕃书 485
文字语言 545
吴方言 8
吴音 158、299、345
吴语 6、158
五音 321—323
西国语言文字 544
西人语言文字 544
西文 544
西文西语 544
西语 544
西语西文 544
先代绝言 4
鲜卑语 139—140
乡邦俗语 7
小学 327
言语 5
言语文字 543
洋文 544
洋语 544
洋字 544
夷言 87、126
夷语 544
异方之语 5
异国殊语 4
异言 4
异语 4
音韵 327
英文 11、544、545
尤字韵 388、487
语言 5、7、543

语言文字 7、543、545
元代蒙古语 2
元末在浙江作战的苗军由于语言接触而吸收的汉语词 485
粤方言 8
中国文字 543
中国语言 543
中国语言文字 543
中外文字 543
中西文字 543
重中重 324
dialect 7
dialecte 7
dialectos 7
dialectus 7
koinè 7

索引四　本论集所涉及、讨论的一般词语(按音序排列)

阿剌(元代回回语词)-辍耕录嘲回回条 485
阿谁-辍耕录阿谁条 247
阿瘖瘖-辍耕录阿瘖瘖条 250
挨 297
鏖糟-辍耕录鏖糟条 240
拗花-辍耕录拗花条 236
巴而思(元代蒙古语词)-辍耕录巴而思条 484
拔都(元代蒙古语词)-辍耕录杀虎张条 484、488
拔突(元代蒙古语词)-辍耕录杀虎张条 484、488
北 142—143
北方 143、144
北间 143
北人 143
北俗 143
北士 143
比基尼 558
婢 600
脿子-辍耕录醋钵儿条 239
不快-辍耕录不快条 241
不耐烦-辍耕录不耐烦条 248
不中用-辍耕录不中用条 248
猜想 137—138
苍头 600
草娘-辍耕录妇女曰娘条 485
厕筹-辍耕录厕筹条 497
撑目兔-辍耕录废家子孙诗条 236
重命名 561
重台-辍耕录重台条 497
传席-辍耕录传席条 245
焠儿-辍耕录发烛条 232—233
答剌罕(元代蒙古语词)-辍耕录答剌罕条 484
打弼(金代女真语词)-辍耕录喝盏条 3、486
大衣-辍耕录贤孝条 236—237
邓思贤-辍耕录邓思贤条 498
点心-辍耕录点心条 243
发脑-辍耕录发脑条 249
发烛-辍耕录发烛条 232—233
梵嫂-辍耕录梵嫂条 500
方头-辍耕录方头条 244
分疏-辍耕录分疏条 247

夫娘-辍耕录妇女曰娘条 239
府隶 605
改常-辍耕录三姑六婆条 497
高头巾辈-辍耕录汉魏正闰条 499
工隶臣 605
关节-辍耕录关节梯媒条 249
官奴-辍耕录官奴条 496
官奴 604
贵由赤(元代蒙古语词) 辍耕录贵由赤条 484
含金量 557
汉子-辍耕录汉子条 246
河北 143
花娘-辍耕录妇女曰娘条 238—238
花子-辍耕录面花子条 496
黄门-辍耕录黄门条 498
获 600
加 611
家公-辍耕录家翁条 242
家主翁-辍耕录家翁条 242
监门吏 630
江北 143
江东 143
江南 143
江南人 143
江左 143
金甲-辍耕录金甲条 237
经纪-辍耕录经纪条 241
井珠-辍耕录井珠条 249
客作-辍耕录客作条 240
课马-辍耕录课马条 244
剌(元代回回语词)-辍耕录回回石头条 3、486
牢隶臣 605
老娘-辍耕录妇女曰娘条 238
离 546
离休 546
里吏 604
吏 603
利市-辍耕录利市条 243
隶 601
隶臣 605
隶臣妾 605
隶妾 605
隶书 586
庐儿 600
麻色(清代贵州少数民族语词)2
麻线(元代西南少数民族语词)-辍耕录马判条 2、484、486
马蚌(清代贵州少数民族语词)2
马判(元代云南少数民族语词)-辍耕录马判条 2、484
蛮子 辍耕录五龙车条 499
谜题 137—138
名题 137
磨兜坚(元代汉语外来词)-辍耕录磨兜鞬条 486
磨兜鞬(元代汉语外来词)-辍耕录磨兜鞬条 486
木乃伊(元代番言)-辍耕录木乃伊条 485
南 142—143
南方 143、144
南间 143
南人 143
南宋初有关人肉的秘密语-辍耕录想肉条 500
难题 137—138

娘-辍耕录妇女曰娘条 237—240
娘子-辍耕录妇女曰娘条 499
奴 600
奴材-辍耕录奴材条 245
奴隶 602
暖房-辍耕录暖屋条 242
暖屋-辍耕录暖屋条 242
叛- 265、671
畔- 265、671
庞居士-辍耕录庞居士条 497
袍-辍耕录贤孝条 236—237、497
陪臣 609
陪隶 608
佩囊-辍耕录玉腴条 499
婆娘-辍耕录妇女曰娘条 239—240
仆 600
乞求-辍耕录乞求条 497
虔婆-辍耕录三姑六婆条 497
怯薛(元代蒙古语词)-辍耕录处士门前怯薛条 484
屈戌-辍耕录屈戌条 237、498
入月-辍耕录上头入月条 244
靸鞋-辍耕录靸鞋条 236
三点式泳装 558
嗓-辍耕录嗓条 499
沙尘暴 556
沙魔-辍耕录沙瘴条 500
山东 143
上头-辍耕录上头入月条 244
少吏 604
施 611
师娘-辍耕录妇女曰娘条 238
师婆-辍耕录三姑六婆条 497
史 603
市吏 604
市掾 604
书吏 603
书手-辍耕录书手条 246
书佐 603
双(元代云南少数民族语词)-辍耕录称地为双条 485
算发-辍耕录宣发条 248
缩头龟-辍耕录废家子孙条 236
太公-辍耕录太公条 242
梯媒-辍耕录关节梯媒条 249
僮 600
头-辍耕录昔宝赤条 499
徒 606
徒隶 602、606、608
团衫-辍耕录贤孝条 236—237、499
退 546
退休 546
温暾、温吞-辍耕录温暾条 3、235
稳婆-辍耕录三姑六婆条 497
斡脱(金代女真语词)-辍耕录喝盏条 3、486
乌剌赤(元代蒙古语词)-辍耕录马判条 484
吴 144
吴越 144
侮 600
西番-辍耕录诏西番条发宋陵寝条 485
昔宝赤(元代蒙古语词)-辍耕录昔宝赤条 484
下吏 604
咸杬子-辍耕录咸杬子条 245
想肉-辍耕录想肉条 499
小吏 604

宣发-辍耕录宣发条 248
丫头-辍耕录丫头条 234
牙郎-辍耕录牙郎条 241
牙婆-辍耕录三姑六婆条 497
夜航船-辍耕录夜航船条 246
邺下 143
依 297
伊美尔(E-mail)521
甬 600
驭吏 604
狱法吏 603
狱法小吏 603
狱吏 603
狱史 603
狱小吏 603
狱掾 603
御吏 604
元代蒙古人、色目人的奴隶名称-辍耕录奴婢条 499
掾吏 604
掾史 604
月事-辍耕录上头入月条 244
越 145
云都赤(元代蒙古语词)-辍耕录云都赤条 484
臧 600
站(元代蒙古语词)-辍耕录马判条、狗站条 484
长年-辍耕录长年条 234
中原 143、476、493—494、514
卒吏 604
卒史 604
佐吏 604
佐史 604

跋语:读书恨少

这个集子编好了,最后的清样也出了,版式不能再更动了。但是近时读书读报却又发现了一些资料,觉得很可贵,可遇而不可求,本应该放在有关论文的末尾"附记"里,如今只得撮抄在跋语里面了,间附推衍、思考的一得之见。

一、我在2002年正式发表的《"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的论文中,将南北朝时期的大学者颜之推讲的"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四句命名为"颜之推谜题",这个谜题涉及中国语言(方言)史、中国民族史、中国人口史上的大问题。我在今年读到了《光明日报》所载《破解"黄宗羲定律"的有效实践》(2003年4月11日)一文,方知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有个"黄宗羲定律",甚感快慰,因为该文后附"背景材料"即《黄宗羲定律》云:"黄宗羲为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史学家。他在农民赋税研究中揭示出一个历史现象:历史上每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高潮。后人把这种现象称为'黄宗羲定律'。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与湖北代表团座谈中表示: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我们一定能够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一定能够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看来财政史学科已经提出了个"黄宗羲定律",我在汉语史学科内也提出了个"颜之推谜题",正好与之相对、相当,也许是"异学同工"吧。而且,"谜题"对"定律",平仄调叶,当然这一点是巧合。更有进者,我愿借此生发开去,就理论创新等问题再申述几句:在《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一文中我指出:"汉语学的中心在中国。"我们中国学者有志气,有智慧,能够自主创新,包括原始性创新。我们应该努力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理论体系,掌握汉语学的话语权。在对待外来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问题上,我们中国学者应该坚持"不崇洋、不排外"这两项原则。"崇洋"是没有气节、没有出息的表现。"我们绝不排外,我们有强健的吞吐能力","外

来的东西，只要是有益的，中国必然会吸纳消化以强健自己、壮大自己；但是外来品，只有与中国的固有传统相结合，亦即必须中国化，才能生根”。我曾经多次举过的例子：玄奘创立的“最接近于印度佛学的”慈恩宗很快由盛而衰，而慧能的禅宗则是隋唐时期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竟绵延千余年，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极具典型性的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贞观政要·论任贤》）

二、关于“方言”指称非汉语的几则资料（应赘于《“方言”和〈方言〉》一文后，即页 11 末；又《“布文”辨识本末及其他》一文后，即页 545 末）：

《柳弧》（《清代史料笔记》丛书之一，中华书局，2002 年），作者丁柔克（1840－？），江苏泰州人，编定于光绪八年（1882），光绪九至十一年有增补。该书卷二“方言”条：“蒙古……其言语不同，如‘扪兜’，好也；‘齐扪兜’，都好也；‘牙步’，走也；‘招苏’，钱也；‘猛骨’，银也；‘乌苏’，水也；‘玻璃根’，嫂也；‘大磨戛’，烟也；‘大磨’，酥油也；‘乌贵’，财也：诸如此类，不可枚举。如法国之言，一曰‘阿哪’，二曰‘刮德’，三曰‘得勒’，四曰‘都勿’，五曰‘金窥’，六曰‘舌亦’，七曰‘释突’，八曰‘奥铎’，九曰‘恼勿’，十曰‘叠切’。盖洋人之语，须似是而非，有音无字，斯为得之。回教之言曰‘母是’‘马纳’，则对曰‘板达’，各有不同。”（页 7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 1936 年中华书局《饮冰室专集》本）“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同时又因国际交涉种种麻烦，觉得须有些懂外国话的人才能应付，于是在北京总理衙门附设同文馆，在上海制造局附设广方言馆。”（页 26—27）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 年）：“大概在光绪三十年左右，……那时候，在武昌作两湖总督的是张之洞，他办了一些洋务，一些新政，其中有一样是办新式教育，在武昌办了一所外语学校，叫‘方言学堂’。”（页 6）“如果我要再大几岁，父亲就要我上方言学堂了。父亲很重视学外文。方言学堂的学生也受到很优厚的待遇，……。据说将来出路也很好，一定在外交界大小混个事。”（页 7）

吴徕《我们的家风和校风》(《文汇报》2003年4月28日11版):“我的父亲吴瀛,于19世纪末的1891年出生,祖籍江苏武进。祖父吴稚英曾任过清朝县令,后被清朝洋务派领袖张之洞请入幕府参与策划洋务运动。……父亲13岁时就进入当时的浙江大学,后来转入中国最早专修外语并培养外交人才的高等学府——湖北方言学堂(武汉大学的前身)英文专业。”

张清常先生在他的书里没有提到清朝末年的“广方言馆”和“方言学堂”的事情,当是由于他比赵元任、冯友兰小好多岁,又与上海、武昌没有什么瓜葛的缘故。至于我这样的后生小子,对“方言”词义,则完全是“考古”了。

三、读字典的例子(应赘于《说“读字典”》一文后,即页570末):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五“识字”条:“西汉诸儒,扬子云独称识字。韩文公云:‘凡为文者,宜略识字。’则识字岂易乎哉?晁景廷晚年日课识十五字。杨诚斋云:‘无事好看韵书。’”(据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1983年)按,杨万里是南宋大诗人,韵书是按韵编排的字典。

《梁实秋读书札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书中有一篇《约翰孙的字典》:“这部字典在当时可以说是搜罗宏富,定义精审。以著《英国文明史》闻名的柏克尔曾读这部字典以求多识字;诗人白朗宁也曾熟读这部字典。读字典是不足为训的读书方法,在从前或许不失为一种方法。”(页49)

至于林语堂先生读牛津袖珍词典,钱钟书先生在抗日战争时到湘西的途中读了一个月的英文词典的故事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专门去查有关书籍找出处,俟之他日吧。

胡适《劝善歌》:“少花几个钱/多卖两亩田/千万买部好字典/它跟你到天边/只要你常常请教它/包管你少丢几次脸。”(《现代评论》卷21期,1925年5月2日)

四、关于《集韵》的资料(应置于《〈集韵〉——收字最多规模宏大的韵书》一文后,即页316后):

《集韵》十卷,宋丁度等编撰。丁度(990—1053),字公雅,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官至端明殿学士,拜参知政事。北宋仁宗景祐元年

(1034)，宋祁、郑戬等上书，以宋初所修《广韵》、《韵略》"所载疏漏，子注乖殊，宜弃乃留，当收复阙，一字两出，数文同见，不详本意，迷惑后生"，已不适科举取士之需，请求"重撰定《广韵》，使知适从"。仁宗遂令宋祁、郑戬、王洙、贾昌朝一同刊修，丁度、李淑总领其事。宝元二年(1039)全书修成，诏名《集韵》，颁行天下。

《集韵》凡十卷，平声四卷，上、去、入声各二卷。分二百零六韵，收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较之《广韵》增加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集韵》的编撰原则是"务从该广，经史诸子及小学书更相参定"，并注意反映宋代语言现状，故奇字异音搜罗备至，该博逾前，可谓古代韵书集大成者。虽然如此，由于《集韵》规模庞大，内容繁复，不久即为其缩编本《礼部韵略》所代替，以致元、明两代湮没无闻，清初博学如顾炎武作《音论》竟谓其不存于世。直至朱彝尊得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集韵》，属曹寅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刊刻于扬州使院，该书始大显于世，是为通行的楝亭五种本。清代学者段玉裁、顾广圻、方成珪等考校《集韵》，即以曹楝亭本和影宋抄本为依据。

《集韵》初刻于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原刊已不存。现存三种宋刻本：

一是南宋初年明州(今浙江宁波)所刊，经南宋中期修补印行的本子，是《集韵》传世最早的刊本，也是清代以来通行诸本的祖本。其半页十一行，行大小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下有刻工姓名。该本清初为钱曾所藏，有"虞山钱曾遵王藏书"印，即《述古堂藏书目》和《读书敏求记》著录的宋版《集韵》。康熙雍正之际进入怡王府，同治间转归翁同龢，长期为翁氏收藏，后流传海外，2000年入藏上海图书馆。文物出版社1996年据此影印，作为"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之一种。毛氏汲古阁、钱氏述古堂分别有《集韵》影宋抄本，二者行款格式相同，当皆出于明州本。钱氏述古堂影宋抄本藏于上海图书馆，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影印。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藏于宁波天一阁。

二是南宋孝宗时湖南刻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出版，收入"古逸丛书三编"中。其半页十行，行大小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双鱼尾，有刻工姓名，多为长沙人。依避讳可

断定为南宋孝宗时刊刻。该本明清两代一直为宫廷所藏,明《文渊阁书目》著录,各卷卷端有“文渊阁印”。清乾隆间入藏天禄琳琅,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等印,《天禄琳琅书目续编》著录。

三是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金州(今陕西安康)军刻本,即此次影印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该本字大行疏,版框高广异常,高28厘米,宽19.7厘米。其半页十行,行大小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正文卷十后有“宝元二年九月十一日延和殿进呈,奉圣旨镂版施行”牒文,下列赵师民等八人衔名。又有“庆历三年八月十七日雕印成,延和殿进呈,奉圣旨送国子监施行”文字及下列贾昌朝等三人衔名。最后是金州驻劄御前诸军都统制田世卿的跋文,说明此次刊刻《集韵》是以蜀本为底本,校之以中原旧本,并用《说文》、《尔雅》等书纠谬。

现存三种《集韵》宋刻本均十分珍贵,它们长期藏于皇宫贵邸,一般人难得一见。其中湖南本、明州本及其影抄本已影印出版,唯有深藏于日本皇宫之中的金州本,长期以来,国内学者仅能依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等书的介绍,方可窥其一二,却少有亲睹其全貌者,以致对它产生种种猜测和误解。其中之一即认为国图和宫内厅的两个本子是《集韵》的同一重刻本。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金州本和湖南本都刊刻于南宋孝宗年间,而两本行款格式又大致相同。但我们经过实际比勘,可断定金州本和湖南本绝非同一版本。二者有以下几点不同:一、字体不同。此点需细加辨认,方可发现。二、版框尺寸各异,金州本大于湖南本。三、金州本是单鱼尾,湖南本是双鱼尾且版心上下有本页大小字数及刻工姓名。四、湖南本与明州本系统的版本一样,牒文仅存约三分之一,“上烦”以下均付阙如,而金州本则牒文、衔名和跋一应俱全。明州本“上烦”以下换页,当是缺页造成牒文不全;湖南本“上烦”以下本页尚有空白,说明它是根据明州本或明州本系统的版本刊刻的,只是行款格式有所改变。但金州本与湖南本正文大小字排列位置相同,又绝非偶然,其中或有传承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日本宫内厅所藏金州军刻本的价值除在于它是不同于通行本系

统的一个详加校订的宋刻本之外,还在于它有保存完好的牒文、衔名和跋文,为后人提供了关于《集韵》一书的宝贵历史资料。它清楚地表明《集韵》的编撰及刊刻年代,可纠《四库全书总目》之误,也可补由于其他版本牒文残缺而造成的《集韵》成书和刊刻问题不详的遗憾。它还显示《集韵》的宋刻本除我们所知的以外,尚有蜀本、中原本等,只是与庆历原刊同样不存于世了。唯一遗憾的是,现存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集韵》金州军刻本已非完璧,缺首卷,仅存二至十卷。现据原版缩小影印。(《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第一辑影印说明 撰稿人:顾歆艺)

五、拙文《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是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的中译本出版后写成的,而在次年即1985年正式发表。这篇文章当时没有提要,而收在此集中,却有了"提要"(请见本论文集第507页)。按理提要当然是自己写,可是这个提要的最后却署"李思敬撰",读者要奇怪:"提要要别人写?"我在这儿必须交代一下原委。1996年春,杨耐思先生、李思敬先生给我来信:"商务印书馆要出《近代汉语论文集》,第一本是语音的,此后是语法、词汇的。我们负责主编第一本,准备收你的一篇音韵文章。"我跟他们商量,李思敬先生建议选我的《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因为他任南开大学的兼职教授,刚在南开讲了好几天课回到北京,他说,他在南开讲到我这篇文章,他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的。我说:"好极了。如今的论文都要有论文提要,我就恭请您替我这篇论文补写一个吧。"他欣然同意,所以在拙集中有这个奇特的提要。可是,这个《近代汉语研究(一)》,至今没有出世,他的弟弟却先呱呱坠地了,这就是蒋绍愚、江蓝生主编的《近代汉语研究(二)》(商务印书馆,1999年)。叙述这个原由,借以纪念李思敬先生,他是个天才,是个好人,是音韵学界的思想家。

我也乘机在此重申自己关于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的学术观点。下面分几项来谈:

1.《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中译者序言"云:"(《利玛窦札记》)手稿是用利玛窦的本国语言意大利语写成的","1614年,金尼阁为了保存这份珍贵

文献,便把它从澳门携回罗马。在漫长单调的旅途航行中,金尼阁着手把它从意大利文译为拉丁文,并增添了一些有关传教史和利玛窦本人的内容,……”。“利玛窦的原意大利文手稿并没有遗失,而是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发现了。当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之际(1910 年),汾屠立神父把它连同利玛窦的其他书稿一起刊布,题名为《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集》。这部著作集的上卷即本书原稿。”“1942 年德礼贤神父再把它收进他编辑的《利玛窦全集》中。”“原意大利文稿的公布,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引起一些讨论。有的学者比较拉丁文本和意大利文本,认为拉丁文本除明显的增补而外,还有些不大显眼的修订和有系统地进行过改动的痕迹。”“金尼阁所增修的地方,有的是他本人的见闻,另一些则得自可靠的来源。作为一个和利玛窦同时代的来华传教士,金尼阁的增修本身也是富有历史价值的。”(页 2 - 4)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附录:1978 年法文版序言”:“至于拉丁文译本的长处,批评者的评价并不一致。……但是最详尽的还是鲁尔(Paul Rule)的见解,……鲁尔以原稿和金尼阁文本进行了比较,他发现除了上文所提到的重要增补之外,还有‘许多细小的补充和修改’。”(页 657 - 658)“不应该忽视金尼阁文本中所特有的而为利玛窦原文中所缺乏的某些特点。首先应该指出,在翻译和刊行利玛窦札记时,金尼阁明显地改进了原稿的文字质量。……至于金尼阁,他被人认为是一位优秀的拉丁语学者,如果利玛窦札记在文学上是成功的话,那主要地应归功于他。”(页 665 - 666)

我摘抄上面的若干文字,是为了得出结论: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稿和金尼阁的拉丁文本的对勘往往有重要学术意义。

2.《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澳门神学院院长)指派庞迪我神父作为同伴和郭居静神父一起回去,或是留在南京,或是随同利玛窦神父到北京去。庞迪我神父来自托莱多(Toledo)省。他原是参加日本传教团的,但由于交通阻隔,滞留在澳门。”(页 378)“郭居静神父和他的同伴到达南京这件事,使利玛窦神父深信他可以打消一切犹豫,从事北京之行了。”(页 382)“庞迪我神父和两位修士钟鸣仁和游文辉则要陪同利玛窦神父前往北京。”(页 383)“正在此时,一位身居要职的太监率领六艘马船载着丝绸,正要动身去北京。利玛窦和

他的同伴们在这样一艘船上分到了一个舒适的位置，……。”（页384）“负责马船船队的太监在临清停下来，前往拜望这个收税官马堂。”（页388）“负责远航队的太监高高兴兴地乘船走了，并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页391）后来利玛窦、庞迪我及其同伴到达了北京，“利玛窦神父派庞迪我神父去皇宫教音乐课，并派了一名修士陪他同去”。（页409）“作为利玛窦神父在北京伴侣的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中国话（尧按，请注意：该书没有说“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北京话”！），还会读中国字并极为正确地写中国字。有这两个人在工作，基督教在都城获得了进展。”（页471－472）后来为了向万历皇帝请求赐给利玛窦墓地，连连奔走于官府，到众多的大官僚处走后门、拉关系，全靠庞迪我，如果他的中国话不娴熟怎能成功？笔者再举出一条史料：《利玛窦中国札记》的翻译者、增补者金尼阁后来著《西儒耳目资》，此书被当时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赞为“千古所未发”的奇书，在今日看来，它确是汉语学史上的重要著作。金尼阁在天启六年即1626年写的“自序”，述及他的这本书的撰作，他表示谦虚：“然亦述而不作，敝会利西泰、郭仰凤、庞顺阳实始之，愚窃比于老朋而已。”金尼阁所推许的三位泰西汉语学者即利玛窦、郭居静、庞迪我，他按中国人的习俗，称字表敬。从金尼阁的话可见庞迪我的汉语水平和汉语学水平后来都很高，成了《西儒耳目资》的先驱者之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610年耶稣会中国教团监督利玛窦死于北京，由庞迪我任代理监督，向明神宗申请墓地，“呈给皇上的奏疏用的是庞迪我神父的名义”。（页618）奏疏中有这几句话：“我，庞迪我，是一个从极遥远的国家来的外国人，深慕贵国的声名和光荣，用了整整三年时间远涉重洋，行经六千多里路，历尽无穷的艰难险阻，终于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和利玛窦以及另外三个同伴来到陛下的朝廷。”（页618－619）我们不禁要问：“庞迪我说的‘另外三个同伴’是谁？”前面的引文中已经讲明两个了，即两位修士钟鸣仁和游文辉，在《利玛窦中国札记》里，钟鸣仁这个人物多次出现。一同晋京的还有谁呢？看来就是这个太监送给外国传教士的礼物，即“在南京买的一

个男孩”。两个洋人中,尤其需要学习中国话的是新来的庞迪我,利玛窦已经会说中国话了,他必然也会主动地教庞迪我的中国话,可是若论做一个合格的中国话的教师,利玛窦无论如何总是不适宜的,他会有自知之明,应该由中国人担任教师!起初只有两个中国人,让我们来看看钟鸣仁和游文辉何许人也,请读该书前面的叙述:“我们称他们为兄弟,是因为不久之后他们就加入了耶稣会作为修士。一个叫钟鸣仁,一个叫游文辉(Emanuele Pereira),两个都是中国人但有葡萄牙的名字,都是澳门本地人。他们是信教的华人子弟,同时接受了葡萄牙的生活方式。当他们受洗时,就取了葡萄牙的名字,而在这时候他们似乎倒更像葡萄牙人而不像中国人。”(页317)于是我们清楚了:利玛窦、庞迪我和钟鸣仁、游文辉四人搭太监的马船从南京出发经运河北上到山东临清的途中,教庞迪我中国话的任务主要由钟鸣仁、游文辉承担,不过此二人是澳门人,而且是葡化的澳门人,这样的中国话教师显然也是不够格的,不得已而求其次也。太监当然是操的地道中国话,在与传教士结伴的长途旅行中自然对庞迪我学汉语的尴尬处境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先回北京,扔下了传教士们,为了表示歉意,投传教士之所好,知道传教士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这必然也就是最贵重的,于是太监送了个“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从临清以后,这男孩就成了这个传教士群体中的一员了。他“不负重托”,果然使“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中国话”。洋人到北京,目的就想在中国首都,在皇帝的身边长期居住、传教,他必得学中国话,而一直在北京深宫的操道地中国话的太监却要洋人以南京的男孩为老师,学“纯粹的南京话”,这在今日,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

3.《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述的这一段史实实在太发人深省了!短短52字迫使人不能不提出下列假说。鲁国尧云:“如果在明代,南京话是有别于官话的一种方言,那庞迪我就没有必要,至少不值得花力气在一开始学中国话的时候就去学纯粹的南京话,因为《札记》讲过,懂得通用的语言即官话,‘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而且庞迪我此时是去北

京,力图在北京打开局面,从事传教活动。事实上他此后一直住在北京,为什么要学纯粹的南京话呢?""南京话在明代占据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或许即为官话的基础方言,……《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述的太监赠送南京男孩教神父学南京话一事,可以作为思考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之一。"(《南京大学学报》1985 年 3 期,请见本论集页 514 - 515)

4. 杨福绵教授长篇论文《罗明坚、利马窦〈葡汉词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述及太监将南京男孩送给庞迪我,让他学"纯粹的南京话"这一段时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面这一段记事是译自由金尼阁改订出版的《利马窦中国传教史》而不是译自利氏意大利原文。这一段记事的原文是:'太监刘步惜很高兴地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书童,送给神父们,当做礼物。因为这个男孩会讲地道的中国话(che parlava molto bene[la] lingua cina),可以教正要学中国话的庞迪我神父。'金尼阁把利玛窦原文的'地道的中国话'改成了'纯粹的南京话',可见当时的南京话就是地道的中国话,换言之,就是当时官话的基础方言,是明末标准官话的代表,否则庞迪我就没有必要去学纯粹的南京话,而应该等到达北京后,学纯粹的北京话了。鲁国尧据何高济的中译本看出了这一点,今以利氏意大利文原本证明之。"(《中国语言学报》第五期页 70,商务印书馆,1995 年)杨福绵教授本人是耶稣会士,到过梵蒂冈,他懂意大利文,能读到、能读懂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稿或其印本。杨福绵先生长文中翻译的利玛窦原稿的一段话的根据是 Pasquale M. D'Elia(德礼贤神父)所编的 *Fonti Ricciani*(《利玛窦全集》),杨先生的译文当为可信,他的论断也当为可信。

前面已经讲过,《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本书,金尼阁的拉丁文本跟利玛窦意大利文本存在一定差异,有改动,有增补。在叙述太监送给耶稣会士南京男孩的目的时,金尼阁也许是不经意间的改动,但是不管无意、有意,这一更动却泄漏了"天机"。

5. 李思敬先生极为重视《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的关于明代官话的珍贵资料。他为拙文《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所写的"提要"说道:"本文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关明代官话的几种关键性材料,对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作了新的探

索。这些关键性材料是：（按，李思敬先生原文的一、二、三点略而不抄）四、在从南京去北京的中途，同行的刘太监把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送给神父们，'因为这个男孩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据此，本文推断：到北京去工作的外国人，学习当时'官方的国语'，要学习'纯粹的南京话'，说明当时'官方的国语'（即官话）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应该是代表着江淮方言的当时的南京话，而不是后来的北京话，这一推断反映着这些关键性材料所提出的推断也应该是确定性的。本文的推断成为近代汉语研究上一个新的视点。关于明代的汉语共同语，还有许多需要深入开掘的问题，而作为开掘的方向，本文所发现的新的路标，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详见本论集页 508）

6.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四个"关键性"的观点：

(1) 利玛窦意大利文原稿的"地道的中国话"＝金尼阁拉丁文本的"纯粹的南京话"

(2) 建议西洋人向南京男孩学纯粹的南京话的是什么人？是太监！太监是什么人？皇帝身边的仆役。众所周知，太监自幼即净身入宫，那么太监操什么话？按照今人通常的理解，太监说的不是北京话是什么？可是那太监却叫洋人向南京男孩学纯粹的南京话，即标准的中国话！

(3) 利玛窦、庞迪我、钟鸣仁、游文辉四人是在 1600 年（万历二十八年）5 月 18 日从南京启程的。（页 384）太监向利玛窦、庞迪我赠送南京男孩就在这一年。1601 年 1 月 24 日利玛窦一行五人抵达北京。（页 402）请注意，明朝亡于 1644 年，《利玛窦中国札记》泄漏的有关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的"天机"时值明代末年，那么整个明代汉语通语的情况可知矣！

(4) 研究语言史当然应该重视语言本体的研究，但是语言本体对语言史的研究未必能提供所有的，或者足够的信息。而且，就汉语语言史而言，它是中国史的一部分，研究语言史也应该重视有关语言史的文史资料的研究。"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条关键性的史料其价值完全可以超过上千字的对语言材料的分析，这就叫做"关键性史料的决定性作用"。我们认为，"文史语言学"值得提倡，值得大力提

倡！然而当今一些学者并不以为然，这是令人遗憾的。1600 年太监赠送南京男孩给传教士的目的，利玛窦意大利文原稿和金尼阁拉丁文本的对勘后发现的差异，对此二者，主张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非南京话的学者却回避不予讨论，这也令人不免有点遗憾。

7. 最近读到黎新第教授的《明清官话语音及其基础方音的定性与检测》（徐州师范大学主办《语言科学》杂志 2003 年第 1 期页 51－59），新第教授是我尊敬的专家，以语言本体和文史资料并重著称。如果他的文章的第 53 页之首、第 54 页之首述及持南京音说者及南京音说的证据时，提到杨福绵先生就更全面了，提到金尼阁翻译时把利玛窦原文的'地道的中国话'改成了'纯粹的南京话'这样一件事就更充分了。杨福绵先生墓木已拱，他对汉语学的研究，尤其是明代官话的研究，是做了一定的贡献的。

现在我临近 66 足岁了，每每有"去日苦多"之感。但是我喜爱英国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威廉·哈兹利忒（Willian Hazlitt 1778－1830）的名言："One half of time indeed is flown — the other half remains in store for us with all its countless treasures; for there is no line drawn, and we see no limit to our hopes and wishes."① 我用近体诗体试译为：

韶光半逝固堪哀，
另半辉煌待我来。
二者何曾存畛界？
前程憧憬自心开。

借此以自勉，亦以赠与我同年龄段的或同样境况的朋友、同学。

2003 年 8 月 8 日于南京南秀村

① 承杨正润教授告诉我：[redacted]散[redacted]出自哈兹[redacted]忒《论[redacted]轻人流芳百世之志》（*On The Feeling of Immortality in Youth*），发[redacted]1827 年 3 [redacted]每月杂志》，收入 Geoffrey Keynes 编《哈兹利忒论说文选》（伦敦，Nonsuch 出版社，1930）。

One half of time
indeed is flown——
the other half
remains in store for
us with all its
countless treasures;
for there is no line
drawn, and we see
no limit to our
hopes and wishes.

——William hazilitt

韶光半逝固堪哀
另半辉煌待我来
二者何曾存畛界
前程憧憬自心开

——威廉·哈兹利忒





ISBN 7-5343-5499-4
G · 5194　定价:48.00元